



# 托洛茨基 反动言論摘录

上

(供内部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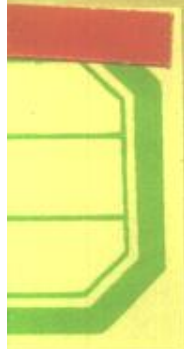




# 托洛茨基 反动言論摘录

下

(供内部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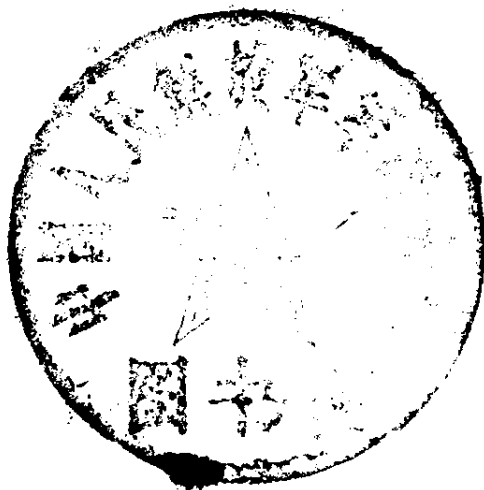
## 編者說明

本書分十五個專題，摘錄托洛茨基的有關言論。各專題是作為獨立的材料編選的，因此部分材料難免重複。

各專題內的材料，按內容分類編排；各章節內的材料，按寫作時間順序排列。內容提要基本上採用托洛茨基的原話，某些地方作了改寫。為便於閱讀，正文中較重要的地方用黑體排印，原有的着重號一律用黑點標出。

托洛茨基的許多反動言論往往利用一些革命詞句作偽裝，如果不結合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托洛茨基反動集團的整個言論、活動而孤立起來看待，很容易魚目混珠。由於本書的體例和性質，不能在書中把這些情況一一指出，希望讀者在使用的時候注意。

編者水平不高，時間倉促，從選材到編排，錯誤在所不免，希讀者批評指正。



# 目 录

## (一) 关于“不断革命論”

- 一、妄談“不断革命論”的基本內容 ..... 1
- 二、主張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次完成 .....12
- 三、鼓吹革命在一国胜利后立即向邻国扩展并使世界  
革命化 .....38

## (二) 关于“世界革命”

- 一、认为我們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47
- 二、鼓吹革命在一国胜利后立即向国际舞台扩展 .....53
- 三、說我們的直接責任是用武装力量帮助其他国家  
革命 .....62
- 四、宣传“欧洲联邦”是我們这个时代的口号 .....73

## (三) 关于一国建設社会主义

- 一、一国社会主义理論的由来、錯誤和目的 .....82
- 二、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 .....89
- 三、关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規律 .....94
- 四、关于国际分工 ..... 100



五、世界社会主义經濟 .....	121
六、西方革命和一国社会主义 .....	130

#### (四) 民族和殖民地問題

一、鼓吹废除民族国家 .....	136
二、否认有反帝正义战争 .....	140
三、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革命性 .....	143
四、混淆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阶段 .....	145
五、鼓吹“欧洲联邦”，取消民族自决 .....	149

#### (五) 关于“欧洲中心論”

一、断言革命中心在西方 .....	153
二、宣称只有“欧洲革命”才能拯救俄国 .....	155
三、鼓吹“欧洲联邦”是“革命时代的口号” .....	163

#### (六) 关于战争与和平

一、战争的根源 .....	167
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反战策略 .....	169
1.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 .....	169
2. 反战策略 .....	171
三、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反战策略 .....	182
1. 战争的性质和起因 .....	182
2. 反战策略 .....	186
四、关于反苏战争 .....	190
1. 反苏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	190
2. 保卫苏联的策略 .....	191

五、关于保卫和平的道路 .....	197
1. 裁軍問題 .....	197
2. 国际联盟、集体安全和仲裁法庭 .....	203
3. 人民陣綫 .....	206
4. 国际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 .....	209
六、战争与革命 .....	212

### (七) 关于布列斯特和談

一、鼓吹不战不和同时复員军队的机会主义路綫 .....	218
二、变相拥护“革命战争” .....	225
三、攻击贊成签订和約是投降情緒的表現 .....	231
四、依賴欧洲革命 .....	237

### (八) 工业化問題

一、工农业的关系 .....	242
二、工业的发展速度 .....	250
1.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 .....	250
2. 一九二八年以后 .....	255
三、資金的来源 .....	258
四、工业化和苏联經濟对世界經濟的依賴 .....	269
五、国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 .....	274

### (九) 农业集体化問題

一、胡說农业集体化取决于工业提供机器的能力 .....	279
二、污蔑全盘集体化使苏联充滿了毁灭的气息 .....	282
三、断言集体农庄不是社会主义企业 .....	286

## (十) 关于苏联过渡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一、过渡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	295
1. 說“誰战胜誰”的問題要在长期阶级斗争中解决 .....	295
2. 談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期間的基本阶级 .....	296
3. 断言新的阶级分化不断出現 .....	300
二、工人 .....	310
1. 宣传应当不断改善工人的生活 .....	310
2. 造謠工人生活水平显著下降 .....	310
3. 声称无产阶级内部分化, 出現工人貴族 .....	314
三、农民 .....	318
1. 說农村在进行着日益尖銳的阶级斗争 .....	318
2. 指責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在农民問題上修正列宁主义 .....	320
3. 宣传农民的阶级分化 .....	330
4. 攻击官僚为爭权夺利而进行反富农斗争 .....	335
5. 妄談党应当采取的政策 .....	338
6. 断言全盘集体化沒有消灭富农, 反而培植了“资产阶级 集体农庄” .....	346
四、新资产阶级 .....	353
五、官僚阶层 .....	359

## (十一) 关于苏联国家的性质

一、污蔑当时苏联的社会制度不是社会主义制度 .....	360
二、說超过限度的“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摧毁国有制 和集体农庄所有制 .....	368
三、攻击当时苏联已从无产阶级专政退向资产阶级 政制 .....	373



## (十二) 关于苏維埃国家和布尔什維克党 “官僚化”和“蜕化变质”

- 一、說世界革命不取得胜利,就会出现資本主义复辟 ..... 381
- 二、說当时苏联出现了五六百万人的官僚阶层, 他們  
独占了文明的新老成果 ..... 389
- 三、认为官僚統治的基础是缺乏消費品 ..... 400
- 四、攻击斯达汉諾夫运动培植了工人貴族, 集体化建  
立了一批資产階級集体农庄 ..... 405
- 五、断言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和平溶入世界資本主义  
体系; 資产階級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实现复辟 ..... 410
- 六、声称党的执行机关之代替党、领导干部和全体党  
員的对立将使党和老干部蜕化变质 ..... 424

## (十三) 关于工会国家化

- 一、声称經济机构和工会并存不是“工人国家的原則” ..... 433
- 二、鼓吹工会国家化, 由工会来管理生产 ..... 436
- 三、詭称工会国家化不是工团主义 ..... 446

## (十四) 关于党内派別斗争

- 一、妄談派別斗争的必然性 ..... 447
  - 1. 說派別斗争是社会矛盾的反映, 声称真正的革命組織  
不可能沒有暫时的派別組織 ..... 447
  - 2. 声称官僚主义是派別活动的主要来源之一 ..... 454
- 二、妄談对待派別活动的办法 ..... 459
  - 1. 攻击禁止反对派是非常时期的临时不得已的坏做法 ..... 459

2. 妄談联共党内几种消除派別活动的正确方法..... 465
3. 攻击斯大林的办法是扼杀反对派，进行人身攻击以至  
肉体消灭..... 467

## (十五) 对列宁和斯大林的攻击

一、对列宁的攻击 .....	473
二、对斯大林的攻击 .....	475
1. 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	475
2. 攻击所謂斯大林主义 .....	484
3. 叫嚷反对对斯大林的“神化” .....	493
4. 历数斯大林的“錯誤” .....	499
(1) 起初是孟什維克，一九〇六年属分地派 .....	499
(2) 在反动年代是調和派分子 .....	503
(3) 二月革命后有考茨基主义傾向，十月革命前夕暗 中反对起义 .....	507
(4) 在布列斯特和平談判时主张只談判而不簽訂和約 .....	515
(5) 在国内战争中违抗軍令，是軍事反对派的首脑 .....	517
(6) 在民族問題上犯过許多錯誤 .....	520
(7) 和列宁的关系 .....	524
(8) 全盘集体化使用粗暴、冒险的方法，使苏联充滿 了毁灭的气息 .....	532
(9) 暗害和处死了大批领导人 .....	534

## (一) 关于“不断革命論”

### 一、妄談“不断革命論”的基本內容

声称“不断革命論”有两个基本論点：(一)尽管俄国在历史上是落后的，但是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先于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二)一个被资本主义包围的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所碰到的矛盾，只能“在世界革命的战场上找到出路”。

說“不断革命”包含互相联系三个思想：(一)民主革命必須立即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二)社会主义革命本身是不断的，“即在國內引起內战，在国外引起革命战争”；(三)社会主义革命是国际性的，一国的革命只是“国际鏈条中的一个环节”，而“国际革命是个不断的过程”。

至于說到“不断革命論”，我认为沒有理由要摺弃我在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和一九〇六年以及后来就这个主题所写的一切。在今天看来，我仍坚决认为在当时我所發揮的思想，整个說来要比当时許多布尔什維克同志所写的更加接近列宁主义的眞諦。

“不断革命”这个术语是馬克思对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所用的一个术语。在馬克思主义文献中——当然不是在那些修正主义的馬克思主义文献而是在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文献中——，这个术语是



被公认的。弗兰茨·梅林曾用这个术语来说明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的革命。“不断革命”这个术语忠实地翻译出来也可以译为“永久革命”或“不间断的革命”。这个术语所包括的政治概念究竟是什么呢？

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在既取得这一个或那一个政治成就之后，在实现了这种或那种社会改革之后，革命并不就此完结，它仍旧继续向前发展，而它的唯一限界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因此，革命一旦开始（既然我们参与其间，特别是当我们在领导革命的时候），不论在哪个形式阶段上，我们都决不能使它中断。反过来说，只要革命运动的所有潜力和所有资源尚未耗尽，当然我们就要根据情况继续不断地坚持把革命推向前去。这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内的革命胜利，同时也适用于革命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展。

对俄国说来，这个理论意味着：我们需要作为政治上最高成就的并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也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而是受到农民支持并开辟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纪元的工人政府。<sup>①</sup>

可见，不断革命这个概念是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战略方针完全符合的。如果说在十八年或者十五年前看不到这一点，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当这个总的公式已经得到实际历史过程证实的今天，再不理解和不认识这一点那是不可能的了。

任何人也不可能在我当时的著述中发现丝毫想要越过农民的意图。不断革命的理论直接导致了列宁主义，特别是导致了一九一七年的四月提纲。

可是大家知道，预先决定我党在十月革命整个时期政策的这个提纲，在那些今天一提起“不断革命论”就吓得有如见到鬼神似

<sup>①</sup> 参看列·托洛茨基著《总结与展望》，俄文版。——托洛茨基注

的很大一部分人当中却引起了混乱。

摘譯自《对农民的“估計不足”》(1923年年底)，  
載于《新方針》伦敦 1956 年版第 52—54 頁。

不断革命論有两个基本論点。第一，尽管俄国在历史上是落后的，通过革命可以在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取得政权以前就把政权轉移到俄国无产阶级的手里去。其次，一个被无数资本主义敌人包围的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所将碰到的那些矛盾，将在世界革命的战场上找到出路。第一个論点是以对发展不平衡的規律的正确理解作为基础的。第二个論点則依靠对资本主义国家之間的經濟政治紐带的不可分割性具有正确的理解。布哈林說得对，甚至今天我仍然坚持不断革命論的这两个基本論点。今天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坚持这些論点。因为，依我看来，它們已經完全得到证实：从理論上得到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的证实；在实践中得到十月革命的經驗的证实。

摘譯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 1936 年版第 40 頁。

不断革命，从馬克思賦予这个概念的意义來說，意味着一种同階級統治的任何形式都不妥协的革命，这种革命并不停留在民主主义阶段，而要进一步采取社会主义措施并进行反对外国反动势力的战争，这就是說，这种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同前一阶段相衔接，它只有在階級社会完全消灭的时候才能够結束。

为了澄清圍繞着不断革命論所产生的各种混乱思想，必須弄清楚这一理論中互相联系的三个思想。

第一，就是关于民主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問題。这一点实质上是这个理論的历史根源。

不断革命的概念是十九世紀中叶的伟大共产主义者馬克思和他的信徒們提出来同民主主义思想相对立的，大家知道，民主主义

思想所主张的是，“合理的”或民主的国家建立以后一切問題都可以通过改良主义的或进化的措施和平地加以解决。馬克思曾經把一八四八年的資產階級革命看作是无产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馬克思“犯了一个錯誤”。不过他的錯誤是事实上的，而不是方法論上的錯誤。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沒有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也正是为什么它沒有获得民主制的原因。至于一九一八年的德国革命，它并不是完成了民主任务的資產階級革命；而是被社会民主党人扼杀了的无产階級革命；更确切些說，这是一种在战胜无产階級以后被迫保持假民主形式的資產階級反革命。

庸俗的“馬克思主义”設計出一套历史发展图式，按照这种图式，每个資產階級社会迟早要建立民主制度；有了民主制度以后，无产階級就会在民主的条件下为社会主义而逐漸組織起来并受到教育。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际情况，有許多不同的設想；自称的改良主义者設想这种过渡就是用改良的办法以社会主义的内容来充实民主制（如饒勒斯）。正式的革命家則承认，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必須使用革命的暴力（如盖得）。但是这两种人都认为，对于一切民族和国家說来，民主和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中的两个阶段，由于在時間上彼此相距很远，这两个阶段不仅完全不同，而且是彼此割裂的。在那些一九〇五年时期属于第二国际左翼的俄国馬克思主义者当中，这种观点也占支配地位。俄国馬克思主义的杰出先驅者普列汉諾夫认为，在当代的俄国，无产階級专政的思想是一种空想。为这种观点辯护的，不仅有孟什維克，而且还包括絕大多数布尔什維克领导人，特别是現在党的领导人。当时他們毫无例外地都是坚决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不过在他們看来，不仅在一九〇五年，而且在一九一七年前夜，社会主义革命的問題仍然是遙远的未来的音調不清的音乐。

在一九〇五年重新提出的不断革命論，向这些思想情緒宣了



战。这个理論指出，在我們这个时代，落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可以直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則可以把社会主义任务提上日程。这就是这个理論的中心思想。传统的观点认为，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民主制时期；不断革命論則肯定，落后国家通向民主制的道路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民主制不是在数十年之内停滞不前的制度，而只不过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序幕。两者由一条牢不可破的链条互相联结在一起。因此，在民主革命和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間就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断性。

“不断”論的第二个方面是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不断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在不能确定的长时期內和經常不断的內部斗争中得到改造的。社会继续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性质。改造的每个阶段都直接从前一个阶段产生出来。这个过程必然带有政治性质，就是說，它是通过改造中的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集团之間的冲突来发展的。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的爆发是同“和平”改革时期相互更替的。经济、技术、科学、家庭、道德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革命，是在錯綜复杂的相互影响中发展的，它不让社会达到平衡状态。这就是这种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

不断革命論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这一点是从人类的經濟和社会结构的現状中产生的。国际主义决不是抽象的原則，而是世界經濟的性质、生产力的世界性发展、阶级斗争的世界規模在理論上和政治上的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开始的——但是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在民族范圍內維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一种暂时状态——尽管象苏联經濟所表明的，是一种长时期的暂时状态。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各种国内外矛盾必然随着成就的增加而增加。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继续处于孤立状态，那末，无产阶级国家最后就必然成为这些

矛盾的牺牲品。摆脱这种状态的唯一出路就是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从这个观点来看，民族革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只是国际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尽管它有暂时的衰退和低潮。

不肖徒辈<sup>①</sup>反对——尽管并不总是同样明确地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所有这三个方面。既然这个问题是一个整体中不可分割地连结在一起的三个部分，那末事情又怎么能够不是这样呢？不肖徒辈机械地把民主专政同社会主义专政割裂开来。他们把民族的社会主义革命同国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割裂开来。他们认为，从本质上说，在民族范围内取得政权不是革命行动的开始，而是革命行动的终结；随后就是走向民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时期。在一九〇五年，他们甚至不承认俄国无产阶级可以先于西欧取得政权的思想。在一九一七年，他们鼓吹在俄国进行独立自主的民主革命而拒绝无产阶级专政。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他们提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要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方针。后来，他们给中国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来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相对立。他们宣称在苏联有可能建设孤立无援的和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对他们说来，世界革命已经不是胜利的必要前提，而只不过是一种有利的环境而已。不肖徒辈就这样在反对不断革命论的不断斗争的过程中大大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这种从人为地复活历史的回忆和歪曲久远的过去而开始的斗争，使得革命领导阶层的世界观完全改变了。我们已经一再说明，对于价值的这种重新估计，是在苏联官僚集团的社会需要的影响下进行的，而这个集团已经变得空前保守，它拼命维持国家的秩序，并要求现在应当把已经实现的革命——这次革命保证了这个

---

<sup>①</sup> 这是托洛茨基对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的污蔑性称呼。——编者注

集团享有特权地位——看成是适合于和平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我們不想在这里再来談論这个課題。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官僚深刻地意識到，它在物质上和思想意識上的地位是同民族社会主义理論有联系的。这一点現在表現得非常明显，尽管有这样的事实，或者不如說是由于有这样的事实，即斯大林主义的政府机器在它沒有預見到的矛盾的压力之下，現在正在拚命向左轉，正在狠狠地打击昨天的右派鼓动家。那些官僚分子虽然急急忙忙借用了馬克思主义反对派的口号和論据，但是大家知道，他們对反对派的敌对态度絲毫沒有改变。当反对派成員为了支持工业化方針等而提出恢复党籍的問題时，就被要求首先譴責不断革命論，并且承认——即使只是間接地——一国社会主义理論。通过这一点，斯大林主义官僚表明，它在保持民族改良主义战略基础的同时向左轉这种做法，純粹是策略性质的。这意味着什么，用不着多加解释；在政治上如同在軍事上一样，归根到底策略是从属于战略的。

問題早已超出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具体范围。这个問題逐漸扩大，今天实际上已經涉及到革命世界观的一切問題。是不断革命还是一国社会主义？——这个抉择同时涉及到苏联的国内問題和东方革命的前途，最后，还涉及到整个共产国际的命运。

摘譯自《不断革命》(1929年)，  
伦敦1962年版第6—11頁。

我希望，讀者不会反对我在結束这本书的时候，不嫌重复，試把我的基本結論簡單明了地表述出来。

一、不断革命論現在要求每个馬克思主义者給予最大的重視，因为階級斗争和意識形态斗争的进程終於把这个問題从回忆俄国馬克思主义者旧意見分歧的領域中充分地提出来了，并且使它变成一个关于一般世界革命的性质、内在联系和方法的問題。

二、对于資產階級发展較迟的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国家說来,不断革命論意味着,要彻底地真正解决它們的民主和民族解放任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被压迫民族的领导者、首先是作为它的农民群众的领导者——的专政才有可能。

三、在民主革命中,不仅土地問題而且民族問題都給落后国家中占人口絕大多数的农民安排了一个特殊地位。沒有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民主革命的任务就不可能解决,甚至不可能认真地提出。但是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只有通过同民族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进行不可調和的斗争才能实现。

四、不管个别国家中革命的最初插曲性阶段的情况如何,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联盟,只有在組織为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鋒队的政治领导下才有可能实现。这也就是說,民主革命,只有通过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为基础并且首先解决民主革命的所有任务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五、从历史的角度来估价,布尔什維主义的旧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确切地表达了上面所說的那种无产阶级、农民和自由资产阶级之間的关系。这已經为十月的經驗所证实。但是列宁的旧公式并没有預先解决在革命联盟内部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間的相互关系問題。換句話說,这个公式有意保留了某种代数学的性质,这种性质就是要在历史經驗的过程中演算出比較确切的算术数字。然而,历史經驗表明,而且在不可能作任何歪曲解释的情况下表明,农民所担任的革命角色無論多么伟大,它决不能担任独立的角色,更不用說担任领导的角色。农民不是跟着工人走,便是跟着资产阶级走。这就是說,“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只有作为领导着农民群众的无产阶级的专政才是可以設想的。

六、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就其阶级內容來說,是与无产阶级专政不同的一种制度,它只有在建立了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这个党要能够代表农民的利益和总的來說也

能够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要能够在无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程度的援助下夺取政权，并且要能够决定自己的革命纲领。整个现代史表明，特别是最近二十五年的俄国经验表明，在建立农民政党的道路上，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就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缺乏独立性及其深刻的内部分化，由于这种原因，小资产阶级(农民)的上层分子在一切决定性的关头，尤其是在战争和革命中，总是跟着大资产阶级走，下层分子跟着无产阶级走，中层分子则不得不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选择。在克伦斯基政权与布尔什维克政权之间，在国民党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阶段，即没有工农民主专政。

七、共产国际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这个口号强加于东方国家的企图，早已为历史彻底粉碎，这种企图只能起反动的作用。只要这个口号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对立，它在政治上就会促使无产阶级溶解于小资产阶级群众之中，这样就会为民族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因而也会为民主革命遭到失败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在共产国际纲领中采用这个口号，就是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十月传统。

八、无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取得了政权以后所实行的专政，必然立即面临同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有密切关系的任务。民主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不断革命。

九、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不是革命的完成，而是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民族范围和国际范围展开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在资本主义关系在世界舞台上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这种斗争必然要引起爆炸，即在國內引起內战，在国外引起革命战争，这里就包含着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不断性质，不论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昨天才完成民主革命的落后国家，还是一个在民主革命后经历了漫长的民主制与议会制时代的老资本主义国家。

十、在民族範圍內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象的。資產階級社会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种社会所創造的生产力不再能同民族国家的界限协调一致。因此，一方面产生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就产生一种資產階級的欧洲联邦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舞台上开始，然后发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最后在世界舞台上完成。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一种在更新和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不断革命，只有当新社会在我们整个地球上获得最后胜利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才告完成。

十一、上面关于世界革命发展的簡要論述，一笔勾銷了現在的共产国际綱領迂腐死板地把国家划分为社会主义“已經成熟”或“尚未成熟”的問題。既然資本主义已經建立了世界市場，創造了世界的分工和生产力，整个來說它也就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世界經濟。

不同的国家都将以不同的速度經歷这个过程。在一定的条件下，落后国家能比先进国家早实现无产階級专政，但要比它們晚进入社会主义。

一个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它的无产階級沒有作好联合农民和夺取政权的充分准备，就不能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反之，在一个无产階級由于进行了民主革命而掌握了政权的国家，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命运归根到底不仅取决于民族的生产力，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十二、从反对十月革命的反动势力方面发酵出来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論，是坚决、彻底反对不断革命論的独一无二的理論。

不肖徒輩由于受到我們的严厉批判，便想借口俄国的特点(地大物博)而把一国社会主义理論的运用范围只限于俄国，这种企图是徒劳无益的，只能弄巧成拙。背离国际主义立場，就必然要走向民族救世主义，即认为本国具有一些特殊的优越性和特点硬說这

些优越性和特点使它能担任别的国家所不能担任的角色。

世界性的分工,苏联工业对于外国技术的依赖,欧洲先进国家的生产力对亚洲原料的依赖等等,使得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建设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成为不可能的事。

十三、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理论与俄国革命的全部经验背道而驰,它不仅机械地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对立起来,而且把民族革命同国际革命割裂开来。

这种理论向落后国家的革命提出建立一种根本不能实现的民主专政制度的任务,同时又把这种制度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这样,这种理论就把幻想和虚构带到政治中来,麻痹东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妨碍殖民地革命的胜利。

从不肖徒辈的理论观点来看,无产阶级夺取到政权就意味着革命的完成(按照斯大林的公式,完成了“十分之九”)和国家改造时期的开始。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世界资产阶级“中立化”的理论,都必然是同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分不开的。它们是息息相关的。

按照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共产国际已被贬低为一种只对反对武装干涉的斗争有用处的辅助性武器。共产国际目前的政策、制度及其领导人物的选择,是同共产国际被降低为不是要解决独立任务的辅助性机关这种角色完全适应的。

十四、布哈林所写的共产国际纲领,是彻头彻尾的折衷主义的纲领。它妄图把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而这种国际主义同世界革命的不断性是不可分割的)调和起来。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为了使共产国际采取正确的政策和建立健全的制度而进行的斗争,是同争取制订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关于纲领的问题又是同关于不断革命论和一国社会主义论这两种互不相容的理论的问题分不开的。不断革



命的問題，早已不是列宁同托洛茨基之間的插曲性的意見分歧，这些分歧已經由历史彻底解决了。現在的斗争是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思想同中派的折衷主义思想之間的斗争。

同上，第 152—157 頁。

依照其直接任务說，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但是俄国资产阶级是反对革命的，所以革命的胜利只有成为无产阶级的胜利才有可能。但是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綱上，它将走到社会主义的政綱上去。俄国革命将成为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之第一阶段。

这即是在一九〇五年为我所提出的不断革命的理論，此后即在“托洛茨基主义”名义下遭到人們最严厉的批評。

更精确些說，这只是这一理論的一部分，其特別适用于現在时机的另一部分是：

現在的生产力早已发展得超过了国家的界限。社会主义社会在国家的界限內是不能建立的。無論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的經濟成績如何大，“一国社会主义”的綱領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烏托邦。只有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欧洲联邦，以后是世界的联邦，才是和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园地。

摘自《十月革命之历史意义》（1932年11月27日），載于《俄国革命与五年計劃》新生命书局1933年版第22—23頁。

## 二、主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次完成

1. 說资产阶级是反动的。断言“無論什么地方，无产阶级一作为独立力量出現，资产阶级就要轉入反革命阵营去”。

认为俄国“缺乏革命民主派”，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东方无法形成资产阶级民主派。俄国的手工业工人是个“愚昧的”、“凶狠的阶级”。

宣传农民“不能起独立的作用”，它的革命作用日益缩小。硬说它从来也不是社会主义同盟军，“工业无产阶级只能在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层中找到真正可靠的同盟者”。声称“农民必须在物质上或精神上不再成为农民，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在一九二四年以前，马克思主义阵营内没有一个人会把农民看作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因素”。

说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它注定要在民主革命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资产阶级将把一切革命阵地交给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将作为解放者阶级来解放农民”。

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首先应当为自己提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问题：它可以依靠哪些阶层或阶级呢？

**大资产阶级谈不上是革命的力量**，这是我们都同意的。某些里昂工业家甚至在法国大革命时代也起了反革命的作用，这是在最广泛意义上的民族革命。但是有人对我们说，中等、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但这小资产阶级是什么呢？

雅各宾派依靠从手工业行会中成长起来的城市民主派。小工匠、帮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小市民组成了革命的长裤汉大军，领导政党山岳党的支柱。正是这经历过长期的行会手工业的历史学校的密集的城市居民群众承担了革命变革的全部重担。革命的客观后果是创立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正常”条件。但是历史过程的社会

結構造就了这种情况，即資產階級統治的条件是由平民、街头民主派、长褲汉創造的。他們的恐怖專政为資產階級社会清除了旧的垃圾，然后資產階級推翻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專政进行統治。

.....

不錯，我們有大量的革命农民群众。但是孟什維克同志知道得不比我差，农民，不管它如何革命，不能起独立的作用，尤其是起政治领导作用。农民无疑可以以其巨大的力量为革命服务；但是如果认为庄稼汉的政党有能力领导資產階級变革，并能主动地把国家的生产力从古老的枷鎖中解放出来，那就不配称作馬克思主义者。城市——現代社会的领导者，也只有它才有能力扮演資產階級革命的领导者的角色。而我們的有能力领导民族的城市民主派在哪儿呢？

馬尔丁諾夫同志已經不止一次地拿着放大鏡来寻找它了。他找到了薩拉托夫的教師、彼得堡的律師和莫斯科的統計学家！他以及他的所有同道們只是不願看到，在俄国革命中工业无产阶级已占領了十八世紀末长褲汉的手工业半无产阶级民主派的地盘。同志們，我提請你們注意这一根本事实。

我們的大工业不是从手工业中自然成长起来的。我們城市的經濟史完全不知有行会时期。我們的資本主义工业是在欧洲資本的直接逼迫下产生的。它实质上占据了原始的处女地，而沒有遇到手工业文化的反抗。外国資本通过国債的渠道和私人倡导的孔道流入我国。它在自己周围糾集了工业无产阶级的大軍，不让手工业得以产生和发展。由于这个过程的结果，在我們这儿当临近資產階級革命的时候，城市中的主要力量是属于极高的社会类型的工业无产阶级。这是不容辯駁的事实，这一事实必須作为我們全部革命策略論断之基础。

如果少数派同志相信革命能胜利，或甚至仅只承认有这种胜

利的可能，那么他們就不能否认，除了无产階級之外在我們这儿沒有革命政权的历史竞争者了。正如法国革命中小資产階級城市民主派领导了革命民族，同样，**无产階級，这一我們城市中的唯一的革命民主派**，必須在农民群众中找到支柱并掌握政权，——只要革命取得胜利的話。直接依靠无产階級，并通过它依靠革命农民政府还不就是社会主义专政。現在我不去談无产階級政府的今后前途。也許无产階級注定要失敗，如同雅各宾民主派的失敗一样，为資产階級的統治扫清地盘。我只想肯定一点：**如果我們这儿的革命运动如普列汉諾夫所預言的一样，作为工人运动而取得了胜利，那末革命的胜利在我們这儿只可能是无产階級革命运动的胜利，——或者是根本就不可能。**

我以全部决心坚持这种結論。如果认为无产階級和农民群众之間的社会矛盾使无产階級不能领导后者、无产階級还没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那就必須得出結論：**我們的革命是根本就命定不能胜利的。在这种条件下革命的自然終局必然是自由資产階級和旧政权的妥协。这是其可能性决不能否认的結局。但是非常清楚，这是由于革命內部軟弱所造成的革命失敗道路上的結局。**

摘譯自《革命中的无产階級政党和資产階級政党》（1907年5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載于《一九〇五年》莫斯科1922年第2版第250—252頁。

第三等級是資产階級民主派和欧洲革命动力的社会基础。其核心乃是城市小資产階級——手工业者、商人和知識分子。十九世紀下半叶是其完全衰落的时代。**資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扼杀了西欧的手工业民主派，并且不让它在东方形成。**

欧洲資本在俄国碰到了农村家庭手工业者，并且，不让它从农民中分出并变成手工业者，就立即用工厂来摧殘之。同时它把我們旧的古老的城市——其中包括莫斯科这“大村庄”——变成最新

工业的集中点。沒有过手工业的过去、沒有传统和偏見的无产阶级立即成为大量集中的阶级。在一切主要的工业部門中，大的和最大的資本沒經過任何战斗就夺去了中小資本的基地。

摘譯自《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論孟什維主义的俄国革命論)》(1908年), 同上, 第 262—263 頁。

我們的、就其所引起的直接任务而言是资产阶级的革命, 由于工商业居民的激烈的阶级分化, 不会有能领导人民群众、把自己的社会威望和政治經驗和他們的革命毅力結合起来的这种资产阶级。

同上, 第 265 頁。

俄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手工业民主派的工业职能的同时, 也夺取了它的任务, 其中包括对农民的政治领导。是它的任务, 而不是它的方法和手段。

同上。

欧洲資本扼杀了萌芽状态中的俄国手工业, 从而也就抽掉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基础。是否可以把現在的彼得堡或莫斯科与一八四八年的柏林或維也納, 甚而与一七八九年的巴黎(不論是铁路还是电报它都梦想也沒有想到过, 并且把有三百名工人的工場看作是最大的企业) 相提并論呢? 我們这儿根本就沒有那种經歷过整个世紀的自治和政治斗争的学校, 然后和年輕的、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并肩冲击封建制度的巴士底獄的健壮的市民阶层。代替它的是什么呢? “新的中等阶层”, 职业知識分子: 律師、記者、医生、工程师、教授、教师。在社会生产中失去独立作用的、人数不多的、經濟上不独立的这个阶层, 正确地意識到本身的无力, 始終不渝地在寻求可以依靠的坚强的社会阶级。妙事! 这种靠山起先不是在資本家那儿, 而是在土地占有者那儿找到了。

.....

也就是这个对抗在小生产还具有意义的一切部門彻底粉碎了小生产。手工业无产阶级在大工业的环境中发展，因而和工厂无产阶级沒有多少不同。被大工业和工人运动所挤压的俄国手工业工人是个愚昧的、半饥饿的、凶狠的阶级，它和流氓无产阶级一起是黑色百人团示威和蹂躪的打手……

結果，在一片社会主义的詛咒声中誕生的、无可挽回地迟到了的资产阶级知識分子悬身于无底的阶级矛盾之上，为地主的传统所重压和为教授的偏見所欺騙，沒有主动精神，在群众中沒有影响，并且失去对明天的信心。

摘譯自《一九〇五年》(1909年)，莫斯科  
1922年第2版第48—49頁。

无产阶级的影响是由它在現代經濟中的作用决定的。民族的最强大的生产手段是直接依赖于工人的。……

……………

因此，手工业，整个小生产的微不足道和俄国大工业的极端发展的性质在政治上使无产阶级民主派排挤了资产阶级民主派。除了小资产阶级的生产作用，工人阶级还夺取了它过去的政治作用及其在农民阶层从貴族—国庫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时代中领导农民的历史僭望。

同上，第50—51頁。

俄国革命就其直接任务而言是“资产阶级的”，因为它力求把资产阶级社会从专制制度和封建所有制的束縛和桎梏中解放出来。但是这一革命的主要动力是由无产阶级組成的，——因而就其方法而言它是无产阶级的。

同上，第55—56頁。

在这十年間我們的社会关系的全部发展都是沿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可能的革命作用的繼續縮小和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和生

产作用继续增长的道路进行的。如果說一九〇五年不可能完成“民族的”革命，那末第二次的民族革命，即联合整个“民族”来反对旧政制的革命甚至不可能为历史所提出。

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斗争中自然顾及并利用其他社会力量的任何反对派运动。但是大問題、基本問題是：我們是否认为在对外政策上已彻底暴露了其帝国主义反动本性的俄国資產階級在对內政策上能起革命作用？我們是否使俄国革命的发展，因而也就是在实践上使俄国无产階級的运动从属于俄国知識分子、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农民的革命运动？或者是我們使俄国无产階級的运动服从整个欧洲无产階級运动的任务和目标？

摘譯自《軍事潰敗和政治前景》(1915年9月)，  
載于《战争与革命》第1卷第255—256頁。

然而这封“信”<sup>①</sup>的作者完全避而不談这些問題。一九一五年俄国的“人民革命”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他們只告訴我們說，它“应当”由无产階級和民主派去完成。什么是无产階級，这我們是知道的。但什么是“民主派”呢？是个政党嗎？从以上所說的那些看来显然不是。那末是人民群众嗎？是什么样的群众呢？显然，是指小工商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农民，这里所談的只能是这些人。

我們在以《軍事潰敗和政治前景》为題的一系列文章中已經对这些社会力量可能具有的革命意义作了一般的估計。我們根据上次革命的經驗探討了一九〇五年的力量对比在过去十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民主派（資產階級的）？这是在討論革命的前景和无产階級策略时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心問題。俄国資產階級民主派从一九〇五年以来究竟是强大起来了，还是更加衰落了？我們以前所有的爭論都圍繞着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命

<sup>①</sup> 指由巴·阿克雪里罗德、阿斯特罗夫、馬尔丁諾夫、馬尔托夫等孟什維克分子具名的《俄国无产階級的任务。給俄国同志的一封信》。——編者注



运問題，而誰要是到現在仍然沒找到对此問題的答案，那他还是在黑暗中摸索。我們对这个問題的回答是：由于不存在真正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俄国不可能有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的时代已經过去了（至少对欧洲是如此），正如民族战争的时代已經过去一样。在民族革命和民族战争之間具有一种深刻的內在联系。我們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这不仅是一种殖民掠夺的体系，而且也是一定的国内政制。它不是使資產階級民族和旧政权对抗，而是使无产阶级和資產階級民族对抗。

手工业的和商业的小資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就已是微不足道的。这个阶层的社會意义在过去十年中无疑地更为縮小了；在我們这里，資本主义对付中間階級的办法比老的經濟文明国家殘酷得多和劇烈得多。

知識分子的数量无疑是增长了。它在經濟方面的作用也增长了。但是与此同时，他們以前那种虛妄的“独立性”也最終喪失了。知識分子的社會意义完全决定于他們在組織資本主义經濟和資產階級輿論方面的作用。他們同資本主义的物质联系使他們身上充滿了帝国主义傾向。如我們已經听到的，这封“信”說：“甚至一部分激进的知識分子……也要求为国防事业而把一切社会力量动員起来。”这是完全不对的。不是一部分激进知識分子，而是全体激进知識分子。事实上，應該說，不仅是全体激进的，而且甚至相当大的一部分（如果不是极大一部分的話）社会主义知識分子。我們未必能用夸大知識分子特性的办法来增加“民主派”的人員。

这样，工商业資產階級进一步沒落了，而知識分子則放弃了革命的立場。城市民主派作为一个革命因素來說已不值一提了。剩下的是农民。但是就我們所知，不論是阿克雪里罗得还是馬尔托夫都从沒有对农民的独立革命作用寄予过大的希望。他們是否得出了在农民当中不断发生階級分化的过去十年中这种作用已經增

**强的結論呢？这种假定是既违背理論見解又违背历史經驗的。**

那末，这封信所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派”呢？而“人民革命”又是什么意思呢？

立宪會議的口号需有革命形势作为前提。存在这种形势嗎？存在。只是它絲毫不取决于下面这一点：仿佛俄国终于出現了資產階級民主派，它現在准备并能去和沙皇制度进行清算。相反地，如果这次战争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什么的話，那恰恰是表明了国内缺乏革命民主派。

摘譯自《为政权而斗争》（1915年10月17日），載于《一九〇五年》莫斯科1922年第2版第289—290頁。

农民在俄国的生活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在一九〇五年，农民直到它的最底层都动起来了。农民赶走了地主，焚毀了庄园，夺取了貴族的土地。但是，农民最糟糕的地方是他們的分散、互相隔絕、落后。而且，农民的不同阶层的利益又很不一致。农民曾挺身而出反对他們本地的农奴主，可是他們对全俄的农奴主却敬若神明。此外，农民士兵不懂得，工人流血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他們，而他們作为沙皇政权的盲目工具镇压了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的工人起义。

無論誰只要仔細想想一九〇五年的經驗，并纵观一九〇五年起到目前止的这段期間的情形，他就会懂得，我們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所抱的无产階級与自由資產階級实行革命合作的希望，是多么渺茫和多么可怜。最近十二年以来，大資本在俄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中小資產階級变得更加依赖于銀行和托拉斯。人数已有增長的工人階級，現在被一道比一九〇五年更深的深淵同資產階級隔絕开来了。如果說，十二年前“全民族的”革命沒有成功，那末，現在对它的希望就更加小了。誠然，这些年来农民的文化和政治水平提高了很多。可是，对农民作为一个阶层起革命作用的希望，

还是比一九〇五年小得多。**工业无产阶级只能在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层中找到真正可靠的同盟者。**

摘译自《伟大的一年的教训》(1917年1月20日),载于《战争与革命》莫斯科1925年版第2卷第434—435页。

这样一来,对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便成了区别社会民主党中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试金石了。俄国革命能够进行多远,未来临时革命政府将具有什么性质,它将面临什么任务,它将依照什么次序来解决那些任务,——这些问题的重大意义,必须同无产阶级政策的基本性质联系起来,才能正确地提出来;而无产阶级政策的基本性质首先是由无产阶级对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决定的。普列汉诺夫装腔作势地固执地闭起眼睛,不理睬十九世纪政治史上的实际教训:无论什么地方,无产阶级一作为独立力量出现,资产阶级就要转入反革命营垒去的。群众斗争愈加勇敢,自由派就愈加迅速变为反动派。至今还没有人发明一种能使阶级斗争规律不起作用的办法。

摘自《斯大林评传》(1940年),三联书店1963年版下册第553页。

民粹派把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看做简单的“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同样关心社会主义;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乃是小资产阶级分子,农民必须在物质上或精神上不再成为农民,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民粹派以其特有的感情认为上述那种社会学的分析乃是对于农民的一种刻薄的侮辱。俄国各派革命者曾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主要的斗争达两代之久。为了了解后来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冲突,必须着重指出:列宁遵照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传统,从来没有把农民看做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同盟军;恰好相反,正因为农民占居压倒的多数,列宁才断言在俄国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的所有直接或间接地与土地问题有关的论文中

都再三發揮了这个观念。

一九〇五年九月間，列宁写道：“当农民运动是革命民主运动的时候，我們是支持农民运动的。我們准备着（現在立刻准备），当它一旦变为反动的、反无产阶级的运动时，就同它作斗争。馬克思主义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提出这一双重任务。……”<sup>①</sup> 列宁把西方无产阶级看做社会主义同盟軍，在某种程度上也把俄国乡村中半无产阶级分子看做社会主义同盟軍，但他从来没有把全体农民看做社会主义同盟軍。他以他特有的坚定性反复地说：“我們起初是用一切方法支持一般农民反对地主，直到沒收地主的土地，然后（甚至不是然后，而是同时）我們支持无产阶级去一般地反对农民。”<sup>②</sup>

一九〇六年三月間，他又写道：“农民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获得胜利，因而将完全耗尽他們作为农民的革命性。无产阶级也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获得胜利，因而将真正开始發揮它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性。”同年五月間，他重复道：“农民运动是另一个阶级的运动；……这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基础的斗争，而是替资本主义的基础清除农奴制一切残余的斗争。”<sup>③</sup> 我們从列宁的这一篇到那篇文章，从这一年到那一年，从这一卷到那一卷著作，都可以找到这个观点。文句和例证有所不同，但基本思想則是不变的。这个基本思想不可能发生过变化。列宁如果把农民看做社会主义同盟軍，那么他坚持革命的资产阶级性，把革命限制在“工农民主专政”范围内，限制在純粹的民主任务的范围内，就会毫无根据了。有时列宁指責我对农民“估計过低”，他的意思并不是說我没有認識农民的社会主义倾向，而是說我没有充分認識（就列宁的观点說）：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独立性，农民有建立自己的政权的能力，

---

① 《列宁全集》第9卷第220頁（指中譯本頁次，以下同）。——編者注

② 同上，第222頁。——編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10卷第381頁。——編者注

**又有通过它去阻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建立的能力。**

对这个问题的重新估价，是到了“热月”反动年代才开始的；这个反动大体上是从列宁患病和逝世时开始。从此以后，俄国工农联盟就被宣布本身含有足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充分保证，含有在苏联境内达到社会主义的可靠保证。斯大林拿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来代替世界革命论之后，就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对于农民的评价称为“托洛茨基主义”，不仅指现在，而且追溯到整个过去。

当然，可以提出马克思主义对农民的经典看法是否被事实证明为错误的問題，但这个問題将使我们远远地超出本附录的范围。目前，我们只说下面一点就够了，即马克思主义把农民看做非社会主义的阶级的时候，从来没有赋予这一评价以一种绝对的不可更改的性质。马克思早已说过：农民有判断能力，也有臆断能力。农民的本性是随条件不同而改变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发现了影响农民、改造农民的十分巨大的可能性。历史还没有彻底探明这个可能性的限度。然而已经清楚的是，苏联的国家强制作用的日益增长，不仅没有驳倒使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有别于民粹派的对于农民的评价，反而根本证实了这个评价。现在，新政权建立了二十多年之后，无论关于这个情况如何，**下面的事实是不可磨灭的，即在十月革命以前，或宁可说在一九二四年以前，马克思主义阵营内没有一个人曾把农民看做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因素，列宁更不待说。**列宁一再重申：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俄国资产阶级复辟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并没有想错：斯大林的官僚政制，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一阶段。

同上，第 556—558 页。

在写了《一月九日以前》这个小册子之后，我一再恢复发展和论证不断革命论的工作。鉴于不断革命论后来在本传记的主人公

的思想发展上具有重大意义，用摘录的形式在这里介绍一下不断革命論是必要的。以下便是我的一九〇五到一九〇六年著作的准确的摘录。

“在現代的城市中，至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城市中，居民的核心乃是急剧分化了的雇佣劳动階級。正是这个在法国大革命时基本上还不存在的階級，注定要在我們的革命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經濟上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階級，可以比資本主义較发达的国家的无产階級更早获得政权。认为无产階級专政是机械地受本国技术力量和技术手段所决定的这一种思想乃是极其簡單化的‘經濟’唯物主义，这一种观点与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美国工业生产力虽然比我国高十倍，可是俄国无产階級的政治作用，它对于本国政治的影响，以及不久之后对于世界政治发生影响的可能性，要比美国无产階級的作用和影响大得多。……”

“我觉得俄国革命将会造成这样的条件，使政权在資产階級自由派政治家尙未能充分施展其統治才能以前就有可能（在胜利情形之下則必然）落入无产階級手中。……俄国資产階級将把一切革命障地交給无产階級，它也不得不把对农民的革命領導权交給无产階級。掌握政权的无产階級将作为解放者階級来解放农民。……依靠农民支持的无产階級，将动員一切力量来提高乡村文化水平，来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

“但农民自己不会把无产階級赶走而取代它的地位么？那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历史經驗都否定了这个假設。历史經驗证明：农民完全不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从以上所說就可以清楚看出我对‘工农专政’的思想的看法。問題并不在于我原則上承认不承认它、‘要’‘不要’这种政治合作形式。我认为，这种合作形式是不能实现的，至少不能馬上直接实现。……”

有人硬說这里闡述的观点是“跳过資产階級革命”，后来人們

喋喋不休地重复这一說法，上面所引的几段話业已证明这种說法多么不正确。我同时写过：“为俄国的民主革新而斗争，整个說来，是从資本主义来的，是資本主义基础上所形成的力量领导的，它的矛头首先直接指向資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道路上的封建障碍。”但是問題的实质在于用什么力量、什么办法才能克服这些障碍。“可以用下面的說法限定一切革命問題的范围：我們的革命，就其客观的目的以及从而就其一切不可避免的结果說来，是資產阶级革命。同时可以闭上眼睛不看这个事实，即这个資產阶级革命主要的能动的力量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靠革命的一切冲击力量推动自己向政权前进。……人們也可以以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經濟的社会条件尚未成熟这种想法安慰自己，而同时忽略这个思想，即无产阶级执政后，它的地位必然推动它靠国家的力量去管理經濟。……无产阶级的代表，不是作为无力的人质，而是作为领导力量进入政府的，他們只靠这个办法打破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的界限，即把集体主义提到議事日程上来。无产阶级朝着这个方向走多远，要看各种力量間的相互关系而定，决不随无产阶级政党的最初的意图而定。……”

“但我們已經可以自問道：无产阶级专政是否一定不可避免地要打破資產阶级革命的框框？它打破这个框框后，能不能根据現存的世界历史情况期待胜利的前途？……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即：如果沒有欧洲无产阶级政府直接支援，俄国无产阶级将不能保持自己的政权，将不能把自己暫时的統治轉变为持久的社会主义专政。……”但这不一定导致悲观的預断。“俄国工人阶级所领导的政治解放，将把领导者提到历史上空前的高度，将赋予领导者以巨大的力量和手段，使其成为在世界范围内肃清資本主义的創始人，历史已經为在世界范围内肃清資本主义創造了一切客观前提。……”



关于国际社会民主党能够执行其革命任务到什么程度，我在一九〇六年写道：“欧洲的各个社会党，首先是最强大的德国党，已经发展了它们的保守性，随着倾向社会主义的群众增多，随着这些群众的组织和纪律的效力提高，它们的保守性也愈加强烈。因此，社会民主党这个体现无产阶级政治经验的组织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成为工人和资产阶级反动派之间的公开斗争的道路上的直接障碍。……”但我在总结我的分析时表示确信“东方革命将以革命的理想主义影响西方无产阶级，将激发它开始同它的敌人说‘俄国话’的愿望。……”

同上，第561—563页。

2. 宣传“旧政制的马厩只能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扫帚来打扫干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有无产阶级夺取革命政权才是可能的”。

断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就会和国家的经济落后发生冲突”。它“不仅要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和资产阶级发生敌对冲突的同时，还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所以，无产阶级一取得政权就必然变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取消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之间的分界线”。攻击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成两个阶段，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和工农民主专政之间规定原则性的区别是“纯粹形式主义的推论”。

我们知道革命的典型例子，在这个革命中，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条件是由胜利了的长褌汉的恐怖专政所准备好的。这是城市居民的主要群众由手工业-商业市民组成的时代。雅各宾派率

領他們。目前俄国城市居民的主要群众是工业无产阶级。仅仅这一类比已经提示出关于出现下列历史形势的可能性的思想：在这种历史形势下，“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有无产阶级夺取革命政权才是可能的。革命是否会因此而不成其为资产阶级的呢？又是，又不是。这不取决于形式上的定义，而取决于事变的发展。如果无产阶级被各资产阶级的，其中包括为无产阶级所解放的农民的联盟所抛弃，那么革命将保持其狭隘的资产阶级性质。而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并善于把自己政治统治的全部手段用于打破俄国革命的民族界限的运动，那末俄国革命就能够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激变的序幕。关于俄国革命将走到哪个阶段的问题，自然只能是有条件地解决。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是肯定的：空洞地规定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等于根本没有谈其内部发展的型式，并且无论如何也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应当使自己的策略去适应作为国家政权自然合法的追求者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行为。

摘译自《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论孟什维主义的俄国革命论）》（1908年），载于《一九〇五年》莫斯科1922年第2版第260—261页。

拉薩尔从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事件中吸取了如下不可动摇的教训：“欧洲的任何斗争，只要它不从一开始就宣布是纯粹社会主义的斗争，那么都不会成功，社会问题在斗争中只是个模糊不清的因素并被置诸脑后，而且表面上是在民族复兴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旗帜下进行的斗争，任何这种斗争都再也不会成功了。”……

在一九〇五年开始的革命中，无产阶级第一次在自己的旗帜下，为自己的目标而行动。同时也毫无疑问，没有一个旧的革命象到目前为止的俄国革命那样耗费了如此大量的人民的精力，而给予了如此微小的积极成果。我们远非企图预言在最近数周或数月

事变将如何发展。但对我们来说有一点是清楚的：只有沿着拉薩尔在四九年提出的那条道路才可能取得胜利。从阶级斗争回到资产阶级的民族团结已成为过去。俄国革命的无所成就不是别的，而是其深刻的社会性质的暂时反映。在这一没有革命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事物的内部进程把无产阶级推向领导农民和为国家政权而斗争。

摘译自《一九〇五年》(1909年)，同上，第60—61页。

完全正确！——布尔什维克说道。我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农民必须共同斗争。列宁在《Przegląd》(《评论》)第二期上说，但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sup>①</sup>其活动的内容是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范围内使经济和政治关系民主化。列宁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和工农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专政之间规定了原则性的区别。他觉得这种逻辑上的、纯粹形式主义的推论完全能解救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工人阶级统治之间的物质矛盾。他说，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就会遭到政治上的破产。但是既然无产阶级和农民共同执政，确认其专政只有“民主主义性质”，那么一切都得救了。从一九〇四年起，列宁孜孜不倦地重复这一思想，但是这种思想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正确一些。

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条件还未成熟，因此政权对无产阶级来说会是个极大的不幸。孟什维克是这样说的。列宁回答说，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认识到问题只在于民主革命，这也許是对的。换句话说，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客观条件的矛

---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第38页。——编者注

盾的出路在于无产阶级政治上的自我限制，同时由于理論上認識到工人階級起領導作用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这种自我限制是必然会出现的。列宁把客观矛盾轉到无产阶级的認識中去，并用階級禁欲主义来解决之，这种禁欲主义的根源不在于宗教信仰，而在于“科学的”公式。只要清楚地想象一下这种設計，就足够了解它那不可救药的唯心主义性质。

在另一个地方我已詳尽地指出<sup>①</sup>，在“民主主义专政”的第二天这种准馬克思主义的禁欲主义的牧歌就会烟消云散。无产阶级無論在何种理論标志下执掌政权，它不能不馬上（就在第一天）面对面地碰着失业問題。在这种事情上，解释社会主义专政和民主主义专政之間的区别未必能有力地帮他的忙。执政的无产阶级必須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共工程等等）立即由国家开支来保障失业者的生活。这种做法本身立刻会引起經濟斗争的强大高涨及整整的一篇罢工的英勇的史詩：这一切在一九〇五年年底我們已經小規模地見到过了。而資本家将会以当时回答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那样来回答它：关闭工厂。他們在大門上鎖上一把大鎖，并对自己說：“我們的私有财产不会遇到危險，因为已經規定，現在无产阶级搞的不是社会主义专政，而是民主主义专政。”在关闭的工厂面前工人政府能做些什么呢？它必須使工厂开工，并由国家开支来恢复生产。但是这难道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嗎？当然是！你們难道能提出別的道路嗎？

可能会有人反駁說，你們描繪的是无限制的工人专政。而要知道这里讲的却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专政。——好吧，就把这种反駁也考虑在內。刚才我們已經看見，无产阶级是如何违背其理論家們的善良意願，在实践中消除了那种必定把它限制

---

① 《我們的革命》第 249—259 頁。——托洛茨基注

于民主主义专政的邏輯特征。現在有人建議以合作者-庄稼汉的形式給无产階級政治上的自我限制加上一个客观的反社会主义的“保证”。如果想以此說明，和社会民主党一起执政的农民政党不会允許由国家开支負擔失业者和罢工者，也不会允許打开資本家关闭的工厂供国家生产，那么这就是說，就在第一天，即远在完成“联盟”任务之前，我們将会看到无产階級和革命政府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可能以农民政党制服工人告終，或者是以前者被排除出政权之外而結束。而前一种或后一种情况都和联合“民主主义”专政很少有共同之点。全部不幸就在于布尔什維克只把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进行到革命胜利的时刻：此后它就暂时消融于“民主主义”合作之中。而只有在最終建立共和制之后，无产階級才以純粹的形式（这一次是在直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形式下）重新进行階級斗争。如果說孟什維克从“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这种抽象概念出发，陷入使无产階級的全部策略迎合自由資產階級的行为直到它夺得国家政权为止的思想，那么布尔什維克从“民主主义的，而非社会主义的专政”这同样是赤裸裸的抽象概念出发，陷入使执掌国家政权的无产階級保持資產階級民主主义的自我限制的思想。是的，这两者之間在这个問題上的区别是非常大的：孟什維主义的反革命一面現在已表露无遺，而布尔什維主义的反革命特点只有在革命胜利的时候才会有巨大的危险性<sup>①</sup>。当然，孟什維克以及布尔什維克經常談論无产階級的“独立”政策（前者在对待自由資產階級的态度上，后者在对待农民的态度上）这一事实絲毫也不改变下列事实，即无論是前者还是后者（只是在事变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都为階級斗争的后果所吓倒，而想用自己形而上学的設計

---

① 对本版的附注。如所周知，这并没有发生，因为在列宁同志领导下布尔什維主义在1917年春，即夺取政权以前，在这极端重要的問題上完成了（不是沒有內部斗争地）自己思想上的重新武装。——托洛茨基注

来使之严守秩序。

摘譯自《我們的意見分歧》(1909年)。  
同上,第283—285頁。

革命胜利后只能把政权交给能依靠城市的武装人民即无产阶级民警的政党手里。社会民主党执掌政权后就处于最深刻的矛盾之中,它不能用“只是民主主义专政”的天真的幌子来克服。工人政府的“自我限制”不是别的,而只会是为了实现共和国而叛卖失业者、罢工者、以至全体无产阶级的利益。在革命政权面前摆着种种客观的社会主义任务,但是要解决这些任务在一定阶段上就会和国家的经济落后发生冲突。在民族革命的范围內沒有摆脱这种矛盾的出路。在工人政府面前从最初起就提出下列任务:使自己的力量和西欧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只有在这条道路上,它的暂时的革命统治才会变成社会主义专政的序幕。因此,不断革命对俄国无产阶级来说,是阶级自卫的要求。如果工人政党缺乏足够的革命-进攻<sup>①</sup>政策的主动性,并且打算转向干巴巴的只是民族的和只是民主主义的专政,那么欧洲联合起来的反动派将会毫不延迟地对它说明,执掌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必须把全部政权放在天平的社会主义革命一边去。

同上,第286頁。

在一九〇五年我們有个很大的优越性,这就是在革命序幕的时代,我們馬克思主义者已經用認識历史过程的科学方法武装起来了。这使得有可能从理論上来搞清楚那些历史的物质过程只給予某些暗示的关系。南俄一九〇三年混乱的七月罢工已提供了作出下列結論的材料,即俄国革命的基本方法是无产阶级的总罢工及其随后向武装起义的轉变。明显地证实了这一預測的一月九日的事变,要求具体地提出革命政权問題。从这时起,在当时的俄国

<sup>①</sup> “进攻”的原文为 агрессивная,也可譯作“侵略的”。——編者注

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尖锐地提出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内部阶级动力的问题。正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个期间，本书作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论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奇妙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在由于历史的必然性而突破了俄国革命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之后，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突破其民族国家的范围，也就是应当自觉地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序幕。

虽然事隔十二年，这种估计却完全被证实了。俄国革命不能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完成。它必须把政权交给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一九〇五年还无力夺取政权，它是被迫在六月三日政变后的沙皇制度下的地下活动中、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壮大和成熟起来的。无产阶级依据其老前辈在一九〇五年获得的经验，在一九一七年掌握了政权。年轻的工人们应当掌握这些经验，应当知道一九〇五年的历史。

摘译自《〈一九〇五年〉第一版序言》  
(1922年)，同上，第3—5页。



农民阶级对布尔什维克完成了民主主义的土地革命和他们奠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这二者之间作了严格的区分。国家和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掌握；农民再无需交纳五亿卢布左右的地租，这是民主革命的好处。但是农民由于价格差距（“剪刀差”）付出的一笔钱比这要大得多，这笔钱归国营工业所得。因此，把十月革命同时进行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算一笔总帐，对农民阶级来说，直到目前还是要吃几亿卢布的亏。对于愿意既弄清国家的经济状况又弄清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人来说，这是个无可争辩的而且是最重要的事实。我们应当明确地正视这一事实。农民阶级和苏维埃政府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的根源就在这里。

摘译自《十月革命十二周年》（1929年10月17日），载于《托洛茨基文选》第1卷巴黎1955年版第75页。

布尔什维克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政党。但是那时它一定知道自己当前的历史任务是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民主制度。当时革命的主要内容是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社会主义革命被推到了非常遥远的未来，至少是不确定的未来。只有西方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这一革命才能实际上提上日程，这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在反对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所得出的论点，是党最宝贵的财富之一。由此就产生一种设想：如果民主革命在俄国具有宏伟的规模，它就能直接推动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将促使俄国无产阶级在以后迅速取得政权。即使按照这个比较顺利的方案进行，总的历史前途仍然没有改变，只是发展进程加速了和期限提前了。

正是按照这些观点的精神，列宁在一九〇五年九月写道：“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

义革命过渡。我們主张不断革命。我們决不半途而废。”<sup>①</sup>令人奇怪，这段引文竟被斯大林用来证明党对一九一七年事变实际进程早有预测。不过仍然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党的干部当时被列宁的《四月提纲》弄得大吃一惊呢？

实际上，按照旧的概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内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才能开展起来。困难在于，农民在满足了自己的渴望土地的要求以后，就会失去支持一次新的革命的热情。因为在国内占明显的少数的俄国工人阶级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夺取政权，所以列宁一贯认为，在西方无产阶级胜利以前，就谈不上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在一九〇五年写道：“现在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今天的农民的要求一得到满足，反动势力一被完全粉碎，民主共和制度一争得，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就会开始。”<sup>②</sup>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指农民而言。

在这种条件下，“不断”革命的口号是从哪里来的呢？列宁的回答是：俄国革命家，由于具有许多欧洲老前辈的经验，应该“有理想”，能“空前完满地实现一切民主主义改造，实现我们的全部最低纲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候……那时候革命的火焰将延烧欧洲……欧洲工人也将发动起来，并向我们表明‘该怎么办’；那时候欧洲的革命高潮就会反过来影响俄国，使几年的革命时代变成几十年的革命时代”<sup>③</sup>。俄国革命的独立内容——即使它发展到最高限度——，也不会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即使对于

---

① 《列宁全集》第9卷第221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115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8卷第257页。——编者注

俄国无产阶级来说，也只有西方的胜利的革命才能够开辟一个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代。直到一九一七年四月，这种观点在党内是完全有效的。

如果抛开成堆的插话、论战中的种种夸大和一些个人的错误，则从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七年間关于不断革命问题的争论的实质，并不是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能否建立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一九二四年以前，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失口提到过——，而是在俄国仍然有可能进行真正能够解决土地问题的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为了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列宁在其四月提纲中修改了他早期观点的哪些部分呢？他从来连一分钟也没有放弃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的学说，以及落后的俄国只有在西方的直接协助之下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但是，就是在这里列宁第一次宣布，正是由于本国的条件很落后，俄国无产阶级能够比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日掌握政权。

二月革命表明，它既没有力量解决土地问题，也没有力量解决民族问题。俄国的农民和各被压迫民族在争取实现民主目标的斗争中不能不支持十月革命。只是因为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无力完成他们的西方前辈已经实现的历史任务，俄国无产阶级才得到了比西方无产阶级早取得政权的机会。一九〇五年，布尔什维主义企图要到完成民主任务以后才过渡到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一九一七年，却在没有完成民主任务的基础上产生了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俄国革命的复杂的性质还不止于此。工人阶级取得了政权，这就自然而然地取消了“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之间的分界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但只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民主任务必然要发展成为社会主义任务；尽管欧洲工人还没有来得及

**告訴我們“該怎麼辦”。**

西方和東方之間的革命程序上的變化儘管對俄國和全世界的命運都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畢竟只有歷史局限的意義。不論俄國革命向前躍進得多麼遠，它對世界革命的依賴性既沒有消除，甚至也沒有減少。民主改革轉變為社會主義改革的可能性，是直接由複雜的國內條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產生的。但是，歸根到底，社會主義改造的界限要取決於世界舞台上的經濟和政治條件。這個國家的沖力不論多大，它總不可能跳出這個星球。

共產國際在譴責“托洛茨基主義”時，特別大肆攻擊這樣一種見解：俄國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而得不到西方支援的情況下，“會和那些協助過它取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群眾發生敵對的衝突……”即使你們認為歷史的實驗已經完全駁倒了這個預測（它是由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作的，現在批評他的人中間，當時沒有一個人哪怕是贊同無產階級在俄國實行專政的觀點），即使如此，俄國的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包括列寧在內，當時都把農民看作是一個不可靠的、叛賣的盟友，這一點仍然是一個不可辯駁的事實。布爾什維主義的真實傳統與認為工農利益預先註定是協調的這種說法，毫無共同之處。相反地，對這種小資產階級理論進行批判，在馬克思主義者反對民粹主義者的長期鬥爭中一直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

摘譯自《單獨一國的社會主義？》（1932年），載於《俄國革命史》倫敦1936年版第1222—1225頁。

無產階級的历史使命之所以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正是因為小資產階級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不言而喻，如果沒有農民以武裝分遣隊、地方委員會等等形式積極參加，是不可能進行農民革命的。然而農民革命的命運不決定於鄉村，而是決定於城市。農民階級在現代社會中是缺乏定形的中世紀的殘余，它不可能有

**独立的政策；它需要外来的領袖。两个新兴的階級在夺取对农民的領導权。如果农民跟着自由資產階級走，革命就会半途而废，結果还会倒退。如果农民以无产階級作为領袖，革命就会不可避免地超出資產階級的范围。不断革命的前景正是建立在历史发展比較落后的資產階級社会里这种特殊的階級相互关系的基础上的。**

摘自《斯大林評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年版上册第108—109頁。

一九〇五年，在发动强大的一月罢工的同时，人們向沙皇递交了天真的請愿书。一九一二年，工人們立即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一九〇五年的思想、传统和組織經驗——它們为在反动时代取得的辛酸教訓所丰富——滋养了新的革命时期。从一开始，領導作用就是属于工人的。在无产階級先鋒队內，領導权属于布尔什維克。这在实质上預先决定了未来的革命的性质，虽然布尔什維克自己还没有清楚認識到这一点。通过加强无产階級，并且为它取得在国家經濟和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作用，工业复兴加强了持久革命前景的基础。旧政制的馬廐只能用无产階級专政的扫帚来打扫干淨。民主革命只有把自己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因而也是征服自己，才能够胜利。

“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場繼續是这样。

同上，第173頁。

俄国民主制，恰恰相反，只能作为大規模革命暴动結果而实现，这个革命暴动的动力不容許工人政府保持在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框框之內。

同上，下册第561頁。

不断革命論的見解可以概括如下：俄国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只有采取依靠农民支持的无产階級专政形式，才是可以思議的。无产階級专政将不可避免地不仅把民主任务提到議事日程上来，

而且把社会主义任务提到議事日程上来，同时有力地推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唯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保障俄国免除资产阶级复辟危险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以上的概括的公式同样清楚地显示后两种观点<sup>①</sup>是相似的，它们与自由派孟什维克的见解是根本对立的，同时显示后两种观点在革命必然产生的“专政”的社会性质和任务问题上也有极其重大的本质差别。现在的莫斯科理论家的著作时常埋怨无产阶级专政纲领在一九〇五年提得“过早”，这說得不恰当。經驗证明，工农民主专政纲领也是提得“过早”的。第一次革命时期各种力量配合不当与其說有碍于无产阶级专政，不如說有碍于一般革命的胜利。然而，各个革命党派所依据的是对完全胜利的希望；没有这一种希望，就不可能有最高的革命斗争。革命的一般前途以及由此生出的战略问题是意见的分歧所在。孟什维克对革命前途的看法是根本错误的：他们给无产阶级指出错误的道路。布尔什维克对革命前途的看法是不全面的：他们正确地指出斗争的总方向，但关于斗争的阶段說得不正确。布尔什维克对革命前途的看法的缺陷，一九〇五年革命时还没有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是仅仅因为革命本身还没有进一步发展。可是，一九一七年革命开始时，列宁就不得不改变他对革命前途的看法，而直接与他的党的老干部发生冲突了。

同上，第 564—565 頁。

### 三、鼓吹革命在一国胜利后立即向 邻国扩展并使世界革命化<sup>②</sup>

认为无产阶级在本国取得胜利后应立即“使革命扩

<sup>①</sup> 指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論”的观点和列宁的观点。——編者注

<sup>②</sup> 本节論点詳見本书第二部分：《世界革命》。——編者注

展到毗邻的国家并拿起武器支持这些国家的起义”，进行世界革命。“国际主义”和“阶级自卫”都要求这样做。說“只有当新社会在我们整个星球获得最终胜利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才告完成”。

此外，俄国无产阶级在执掌革命赋予的政权的同时，将做到环境所规定的一切，以便立即把本民族事业的命运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直接联系起来，不仅无产阶级政策的一般国际主义原则要求这样做，——阶级自卫的威严的要求也将迫使它走上这条道路。

俄国无产阶级只有在打破我们伟大革命的民族框子，并使之成为劳动取得世界胜利的序幕的条件下，才不会被赶回去，才能够把我们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摘译自《三十五年以后，一八七一——一九〇六年》  
(马克思著《巴黎公社》一书序言，1905年12月)，  
载于《巴黎公社》彼得堡1906年版第XXI页。

但是现在，在俄国革命的大有希望的开端之后，我们有一切理由期望，就在这次战争期间，强大的革命运动会在全欧洲开展起来。很明显，它只有作为全欧的运动才能顺利发展和走向胜利。如果它仍然是民族范围内的孤立的运动，那么它必然会遭到毁灭。我们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指出了威胁着俄国革命的来自德国军国主义的危险。这种危险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危险。对俄国革命来说，英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军国主义比起霍亨索伦王朝的军事机器来，并不是威胁性更小的敌人。拯救俄国革命的方法是把革命转到整个欧洲去。如果革命运动在德国扩展开来，那么德国无产阶级就会在西方的“敌对”国家中寻找并找到革命的反响；而如果欧洲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了政权，那么即使仅仅是为了掌握住这个政权，它也会不得不立即使

这个政权去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换言之，稳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建立，只有在全欧洲的幅员之内，也就是说在欧洲共和联邦的形式下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靠武力、靠工业和外交协定都不能取得的欧洲的国家联合就会成为得胜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一项迫切任务。

欧洲联邦是我们已经进入的革命时代的口号。不管今后军事行动的进程如何，不管外交对目前的战争如何总结，不管革命运动在最近时期的发展速度如何，欧洲联邦口号在一切情况下都将作为欧洲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政治公式而获得巨大意义。这一纲领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民族国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框框，作为阶级斗争的基地，因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都已经过时了。只有当我们把建立新的、更高级的革命“祖国”——共和欧洲的进步任务同保守地保卫过时的民族祖国对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对“保卫祖国”这一过时的无产阶级政治纲领的否定才不再成为在思想政治上的自卫的纯粹消极的行动，而获得自己的全部革命内容。无产阶级只有以共和欧洲为出发点，才能使全世界革命化，才能把全世界组织起来。

有些人教条主义地问：“为什么是欧洲的联合，而不是全世界的联合？”这里顺便也对这种人作了答复。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而且是某种经济和文化历史的共同体。欧洲革命不必等待亚洲和非洲的革命，甚至也不必等待澳洲和美洲的革命。然而，没有德国的革命，俄国或英国的胜利的革命是不可想象的，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现在的战争被称为世界大战。然而甚至在美国参战以后，作战的仍然是欧洲。而革命的问题也首先摆在欧洲无产阶级面前。

不言而喻，欧洲联邦将仅仅成为世界经济组织的两个中枢中的一个。另一个中枢将是美洲联邦。



为反对联邦口号而提出的唯一的多少是具体的历史性的理由，曾由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归结为下面的一句话：“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民主党人报》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因而每一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决条件<sup>①</sup>。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意见。可是，这个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国、奥国、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是不一样的。可是，跟非洲和亚洲比较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已经成熟到实现社会革命的资本主义“欧洲”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在自己的斗争中“等待”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使国际间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际间消极等待的思想暗中顶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说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国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国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

在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就会意味着成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实质的那种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用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的办法来为保存革命的民族基地而斗争，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挖革命的墙脚；革命不能不在民族基地上开始，但是在目前欧洲各国经济上和军事政治上处于相互依赖的情况下，革命是不可能不在民族基地上完成的，这种相互依赖正是在目前这场战争中空前有力地暴露出来了。欧洲联邦口号也就是这种将直接促使

---

<sup>①</sup> 当时《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托洛茨基这里指的是列宁1915年在该报发表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1页）。——编者注

## 欧洲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行动一致的相互依赖的表现。

摘译自《和平纲领》(1917年5月),载《战争与革命》  
第2卷莫斯科1925年版第497—501页。

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馬尔托夫同志的同道們,与我們相反,他們否认对政治任务的社会革命提法。他們在自己的政綱中宣称: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所以我們的任务只能限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整个議論是建立在完全践踏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和国际任务之上的。如果說世界上只有俄国,那末馬尔托夫的議論或許是对的。可是,問題却在于消灭世界大战,在于同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在于履行世界无产阶级包括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馬尔托夫同志不是向俄国的工人进行解释:說俄国的命运現在跟欧洲的命运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必将保证我們更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反过來說,欧洲工人的失敗将把我們抛回到帝国主义独裁和君主制去,最后变为英国和美国的殖民地;不是使我們的全部策略服从于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总目标和总任务。他反而从带有局限性的民族的框子来看俄国的革命,并把革命任务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样提問題是根本錯誤的,这种提法籠罩着一种导致第二国际崩潰的該受詛咒的民族局限性的危險。

.....

夺取政权的斗争,对于我們不只是当前民族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不,这是完成一項国际义务,这是在同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整个战綫上占領最重要的陣地之一。正是这一基本观点,决定着我們对待所謂民族自卫的态度。战綫暂时移动到某个方面,既不能使我們停止,也不能使我們放弃反对资本主义基础本身的斗争,这种资本主义已到了使各国人民进行帝国主义的互相殘杀的地步。

## 不断革命反对不断屠杀！这就是决定人类命运的斗争。

摘译自《国际主义的策略》（1917年9月），  
载于《无产者报》1917年9月6日第10号  
第4—5版。

但是我要追溯更远的过去并引证我自己在一九〇五年所写的几段话。

“这点（俄国革命的发展）一开始便赋予正在展开的事件以国际的性质，并开拓了一个最伟大的前景：俄国工人阶级所领导的政治解放把领导者提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使他掌握了巨大的力量和手段，并使他成为在世界上消灭资本主义——历史已经为它提供了一切客观前提——的开路先锋。

如果俄国无产阶级在暂时取得政权的情况下不是出于自己的主动把革命推行到欧洲的土地上，那末，欧洲的封建-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将迫使它这样做。

现在来预测俄国革命将通过怎样的道路延及老资本主义的欧洲，这自然是白费力气，因为这条道路可能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们打算谈谈作为联系革命的东方和革命的西方的链环的波兰问题，这与其说是预言，倒不如说是为思想提供例证。

俄国革命的胜利必然意味着波兰革命的胜利。不难想象，俄属波兰十个省的革命制度将必然使加里西亚和波兹南行动起来<sup>①</sup>。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政府将把他们的军队集中到波兰边境上来回答这一点，以便然后越过边境并在敌人的中心华沙打击他们。无疑，俄国革命是不会听任它在西方的先头部队落在普鲁士-奥地利大兵的手中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威廉第二及弗兰茨·约瑟夫政府作战对于俄国革命政府来说将成为自卫的法律。那

---

<sup>①</sup> 我回想起，这是我在1905年写的。——托洛茨基注

时德国和奥地利的无产阶级将采取怎样的态度呢？无疑，他们不会漠不关心地旁观本国军队的反革命十字军征伐。封建-资产阶级的德国反对革命的俄国的战争必然意味着在德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让那些认为这种断言过于绝对的人去臆想另一个更适合于把德国工人和德国反动势力推上公开的力量较量的道路的历史事件吧。”（见托洛茨基《我们的革命》〔一九〇六年〕，俄文版第280—281页）

当然这些事件没有按照在十六年前的这几段话中仅仅作为假设并且为了叙述生动而预先描绘的历史顺序发生。但是整个的历史进程已经证明并且今后还要证明这一预言：**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将不可避免地变成革命战争的时代，年轻的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这就将不可避免地把它推向和世界反动势力的列强作战。**可见我们在十五年以前就已经基本上弄清楚我们将必须创造“什么样的军队”以及“为了什么任务”而创造它。

摘译自《军事学说还是臆造的军事空谈》（1922年），载于《共产国际》杂志德文版1922年第9期第148—149页。

如果我们从一个国家发展甚至完成社会主义的概念出发，事情就完全变样了。我们今天有一种“理论”，说什么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说什么这个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相互关系可以建立在“中立”世界资产阶级的基础上（斯大林）。如果采取这种基本上是民族改良主义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观点，那末就没有必要、至少是不象原来那样必要提出欧洲联邦的口号。但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个口号是重要的，十分必需的，因为它包含着对孤立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的谴责。对于每一个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使革命扩大到毗邻的国家并拿起武器支持这些国家的起义是极为必要的，甚至比对苏联更为必要——当然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这样说并不是出于任何有关国际团结的抽象的考

慮——仅仅这些考虑是不能使各个阶级行动起来——，而是出于列宁曾经千百次提出过的那些重要理由，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国际革命的支持，我们就无法支持下去。苏维埃联邦的口号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进程，无产阶级革命不会在所有国家内同时爆发，但是它会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要求这些国家——特别是在欧洲范围内——为了抵抗最强大的外部敌人和进行经济建设而建立最紧密的联系。

摘译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纽约1936年版第16—17页。

在民族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象的。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种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不再能同民族国家的界限协调一致。因此，一方面产生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就产生一种资产阶级的欧洲联邦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舞台上开始，然后发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最后在世界舞台上完成。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一种在更新的和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不断革命，只有当新社会在我们整个地球上获得最终胜利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才告完成。

摘译自《不断革命》(1929年)，  
伦敦1962年版第155页。

托洛茨基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即在取得政权的时候说过：“如果欧洲人民不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就会被打倒，这是肯定无疑的。不是俄国革命将在西方掀起斗争的旋风，就是各国资本家扼杀我国的革命。”当时会议席上有一人喊道：“还有第三条道路！”也许，这是斯大林的喊声吧？不是，这是一个孟什维克的喊声。这是在布尔什维克发现那个“第三条道路”以前若干年的事。

由于斯大林派的国际报刊无数次的反复宣传，在许多不同的政界人士当中差不多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布列斯特-立托夫

斯克意見分歧的基础是两种观念。一种观念的出发点是不仅能够支持下去,而且能够依靠俄国的内部力量建成社会主义;另一种观念是把自己的希望只是寄托在欧洲发生起义上面。实际上,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是在几年以后捏造出来的,捏造者沒有煞費苦心做到使自己的发明哪怕是非常表面地符合历史文件。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所有的布尔什維克在布列斯特时期都一致认为,如果欧洲不在最近的将来爆发革命,苏維埃共和国就注定要灭亡。有些人估計是几个星期的事,另一些人估計是几个月的事,就沒有人是估計为几年的。

摘譯自《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1932年),載于《俄国革命史》伦敦1936年版第1231頁。

我們取得胜利以后,在一九一九年建立了共产国际。我們不止一次地宣称,革命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責任去援助被压迫的和起来反抗的阶级,而且不仅是思想上进行援助,如果可能的話,还要拿武器去援助。我們也并没有局限于只是三番五次地宣告这一点。我們在我們自己那个时期曾經用武装力量去援助芬兰、拉脫維亞、爱沙尼亚和格魯吉亞的工人。我們曾經试图以紅軍进攻华沙的行动去援助正在暴动的波兰无产阶级。我們派遣了組織者和指揮官去帮助中国人革命。一九二六年我們募集了千百万卢布去援助英国的罢工工人。而現在,所有这些似乎都变成誤会。是悲剧的誤会嗎?不,是喜剧的。难怪斯大林宣称,住在苏联已經成为“愉快”的事。甚至共产国际也从一个严肃的角色改变成一个喜剧性的角色了。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48頁。

## (二) 关于“世界革命”

### 一、认为我们的时代是 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认为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先决条件的成熟程度已经达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的顶点”。断言在这个时代，任何党都不能仅仅从“本国条件及其发展趋势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纲领。“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已经永远为民族性纲领敲了丧钟”。说共产国际是作为“世界革命的党”而建立起来的。宣传欧洲“比其他各洲冲突得更加厉害”，“从‘有组织的’时代到革命时代的过渡”“特别急骤”。胡说革命中心已从苏联“转到了西方”。“在我们的时代，只有国际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力量”。

在我们目前的社会状态和社会主义之间还要经历一个社会革命的大时代，即无产阶级为国家政权而进行公开斗争、夺取政权和运用这个政权使社会关系彻底民主化并把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地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这不是一个和解和平静的时代，正相反，而是社会斗争极其紧张的时代，是人民起义、战争、无产阶级制度的经验日益扩大、社会主义改革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无产

階級对关于今后民族存在的条件及其与国家和經濟的相互关系問題作出实际的,即直接有效的回答。

摘譯自《和平綱領》(1917年5月),載于《战争与革命》第2卷莫斯科1925年版第494頁。

有些人教条主义地問：“为什么是欧洲的联合,而不是全世界的联合?”,这里順便也对这种人作了答复。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詞,而且是某种經濟和文化历史的共同体。欧洲革命不必等待亚洲和非洲的革命,甚至也不必等待澳洲和美洲的革命。然而,沒有德国的革命,俄国或英国的胜利的革命是不可想像的,反过來說也是一样。現在的战争被称为世界大战,然而甚至在美国参战以后,作战的仍然是欧洲。而革命的問題也首先摆在欧洲无产階級面前。

不言而喻,欧洲联邦将仅仅成为世界經濟組織的两个中樞中的一个。另一个中樞将是美洲联邦。

同上,第499頁。

由世界大战和我国革命所开始的時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時代,这是布尔什維主义的一个根本內容。共产国际是作为一个“世界革命的党”而建立起来的。“二十一个条件”中包含着对这个事实的承认。并且,正是沿着这条路綫,共产党人同各种各样社会民主主义的“独立的”孟什維克分裂了。

承认战争和十月革命开始了世界革命的時代这一事实,当然并不意味着每时每刻我們身边都有立即爆发革命的形势。在一定时期中,在个別的国家里,在个別的生产部門里,“垂死的資本主义”(列宁)是能够局部重建其經濟甚至进一步发展其生产力的。世界革命的時代将有它的高潮和低潮时期。工人階級及其政党的准备,反动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程度,共产国际的正确領導,也就更加重要了。但是,革命的这种涨潮和退潮並沒有改变列宁关于



当前历史时代的全面根本估计。只有这个估计才能成为共产国际革命战略的基础。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1—92页。

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的时代，即金融资本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任何一个共产党都不能仅仅或主要从自己本国的条件及其发展趋势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纲领。这个论点对于在苏联疆域以内掌握政权的党也完全适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sup>①</sup>已经永远为民族性的纲领敲了葬钟。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只能以符合目前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和资本主义崩溃的时代——的性质的国际纲领作为自己的基础。国际共产主义的纲领决不是各国纲领的总和，也不是各国纲领共同特点的混合物。国际纲领必须直接从这样一点出发：即以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体系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分析，对它的各种联系和矛盾，也就是它的各个部分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加以分析。在目前这个时代，在比过去大得多的程度上，无产阶级必须而且只能从整个世界的方向中找到自己本民族的方向，而不能加以颠倒。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和主要区别正在于此。

摘译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纽约1936年版第3—4页。

战略策略一章<sup>②</sup>根本没有对帝国主义时代作为和战前时代截然不同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战略”特点作任何有条理的阐述。

的确，纲领草案第一章说，整个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特点是

① 这一天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注

② 指《共产国际纲领草案》中的有关章节。下文及以下从《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中摘录的言论中提到的“纲领”都是指上述文件。——编者注

“用瓜分和武力夺取尚未被占领的殖民地的方式，使资本主义相对地不断发展和扩大到全世界的时期。”

这种概括的确是十分矛盾的，它显然使工业资本主义的全部时期理想化了。这个时期是一个充满巨大的震荡、战争和革命的时期，其程度远远超过在此之前的全部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震荡、战争和革命。为了对纲领草案的作者最近提出的荒谬的争辩至少提供部分理由，这种对特点进行牧歌式的描述显然是必要的。他们争辩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根本还谈不上”〔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将工业资本主义全部时期的特点说成是“继续发展”是不真实的，但是，另一方面，将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四年，或至少到一九〇五年划为一个欧洲的特别时期是极其重要的。这是一个矛盾的有机积累的时期，就欧洲内部的阶级关系而论，这些矛盾几乎从未超出合法斗争的范围，就国际关系而论，这些矛盾都使它们自己适应一个武装的和平的局势。这是第二国际发生、发展和僵化的时期，它的进步的历史作用随着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而完全告終了。

在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力量来考虑时，政治总是落后于经济的。因此，虽然金融资本和托辣斯垄断集团的统治在十九世纪末叶已经开始，反映这个事实的国际政治的新时代，在世界政治中首先都是以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和第三国际的建立作为开始的。

由于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经常发生间歇性的阶级斗争，这一新时代的爆炸性特点表现于，国际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已经筋疲力尽，整个说来是不能再前进了。这并不是说，个别的工业部门和个别的国家不能发展，不再发展和甚至不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了。然而，这是在损害而且必然损害其他工业部门和其他国家的情况下发展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支出，以空前未有的增长比例吞噬着它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收入。

因此，由于战前飞速的和几乎不停頓的发展带来的慣性、新的力量对比、世界市場的重新瓜分和战争加深了的矛盾等原因，慣于对世界进行統治的欧洲，現在比其他各洲冲突得更加厉害。正是在欧洲，从“有組織的”时代到革命时代的过渡是特別急驟的。

确实，理論上，甚至并不排除資本主义有可能在最强大的、居于統治和主要地位的国家內，取得新的普遍进展。但要做到这一点，資本主义必須首先扫除一个巨大的階級的障碍，和具有国家与国家之間性质的障碍。它必須絞杀无产阶级革命使其长期不再发生；它必須完全奴役中国，推翻苏維埃共和国，等等。我們距离这种境地仍然远得很。理論上可能发生的事情同政治上估計会发生的事情根本是两回事。自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决定于我們自己，即决定于共产国际的革命战略。归根結蒂，这个問題将取决于国际力量之間的斗争。虽然如此，但在作为草拟綱領着眼点的当代，总的讲，資本主义的发展仍面临着不可克服的障碍、矛盾，并瘋狂地企图扫除障碍和矛盾。正是这一事实使我們的时代具有革命的性质，使革命具有不断性。

**时代的革命性质并不在于它容許完成革命，即在一切特定时刻都可以夺取政权。它的革命性在于这个时代存在着深刻的和激烈的波动，在于直接的革命形势——換句話說，就是能使共产党能夺取政权的那种局势，——經常会突然轉化为法西斯或半法西斯反革命的胜利，再从后者轉化为溫和的临时政权（“左翼联盟”，社会民主党加入联合政府，政权轉入麦克唐納的党的手中等等），由此立即迫使各种对抗再度达到頂点并尖銳地提出政权問題。**

在战前的几十年內，欧洲局势是怎样的呢？在經濟方面：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伴随着危机时期的“正常”波动。在政治方面：在牺牲自由主义和“民主”而又沒有发生重大动蕩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得到了发展。換言之，这是一个經濟的和政治的矛盾經常不断

地加剧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讲,它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了前提。

战后时期的欧洲局势又是怎样的? 经济方面是不定期的、痉挛性的生产萎缩和扩大。虽然若干工业部门在技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生产大体上环绕着战前水平而波动。政治方面:政治局势时左时右地急剧地摆动。十分明显,在一年、两年或三年内政治局势的陡变,并不是任何基本经济因素的变化造成的,而是由完全属于上层建筑性质的原因和冲激所造成的,因此显示出整个制度的极端不稳定性,不可调和的矛盾腐蚀着这个制度的基础。

革命战略——和策略迥然不同——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其原因正在于此。党和党的领导的新的意义也是由此产生的。

同上,第79—82页。

布尔什维克党从帝国主义大战开始的时候起,并且在十月革命后,就以发展的形式在世界革命斗争中起着领导作用。今天,这种地位已经完全丧失了。不仅党的官式的滑稽模拟物是如此。俄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所处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也使他们不可能在国际范围起到领导的作用。除此以外,苏联的左翼反对派集团只有在新国际顺利组成和成长以后才能发展成为一个新党。革命的中心确定已经转到了西方,在西方,立即建立新党的可能性要大得很多很多。

摘译自《苏联与第四国际》(1934年),  
纽约1934年版第28页。

商业、工业、农业和财政方面灾难性的危机,国际经济联系的中断,社会生产力的衰退,阶级矛盾和国际矛盾的极度尖锐化,——这些都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日暮途穷,并且充分地证实了关于我们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的列宁主义的论断。

摘译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  
纽约1934年版第4页。

总的說来，无产階級革命的經濟先决条件的成熟程度已經达到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的頂点。人类的生产力已陷于停滞。新的发明和改进再不能提高物质财富的水平。在整个資本主义体系陷入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相互交錯的危机为广大群众带来日益深重的貧困和痛苦。不断扩大的失业反过来又使国家的財政危机更趋严重，并且还破坏本来已不稳定的貨幣制度。民主政权，和法西斯政权一样，也跌跌撞撞地从一个破产走向另一个破产。

摘譯自《資本主义的垂死掙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1938年9月3日)，紐約1946年版第5頁。

第四国际并不严格区分落后国家和先进国家、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它配合这两种国家，这两个革命，使之从属于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世界斗争。既然在我們的时代只有国际无产階級是真正的革命力量，那么，也只有不断革命的綱領才是真正消除一切社会和民族压迫的綱領。

摘譯自《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階級世界革命》(第四国际紧急會議宣言，1940年5月)，第25頁。

## 二、鼓吹革命在一国胜利后 立即向国际舞台扩展

认为“革命不能不在民族基地上开始”，但“不可能在民族基地上完成”。夺取政权是要“完成一項国际义务”，是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整个战线上“占領最重要的陣地之一”。革命一旦开始就不能中断，就必须“不断地把革命推向前去”，国际主义和階級自卫都要求这样做。声称工人国家的政策“不能降低到仅仅限于本民族的經濟建設”，“如果无产階級专政不发展成欧洲和世界規模，它必

然会朝着它本身崩潰的方向发展”。說什么“欧洲工人的失敗將把我們拋回到帝国主义独裁和君主制去，最后变为英国和美国的殖民地”。說革命“在民族障綫和世界障綫这两个决定性障地上站稳以前，是决談不到它的完全胜利的”。只有“在整个地球上获得最終胜利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才告完成”。“社会主义世界和資本主义世界之間的主要历史斗争的結局”决定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此外，俄国无产阶级在执掌革命賦予的政权的同时，將做到环境所規定的一切，以便立即把本民族事业的命运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直接联系起来。不仅无产阶级政策的一般国际主义原則要求这样做，——阶级自卫的威严的要求也將迫使它走上这条道路。

俄国无产阶级只有在打破我們伟大革命的民族框子，并使之成为劳动取得世界胜利的序幕的条件下，才不会被赶回去，才能够把我們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摘譯自《三十五年以后，一八七一——一九〇六年》  
(馬克思著《巴黎公社》一书序言，1905年12月)，載于《巴黎公社》彼得堡1906年版第XXI頁。

为反对联邦口号而提出的唯一的多少是具体的历史性的理由，曾由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归結为下面的一句話：“經濟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义的绝对規律”。《社会民主党人报》由此得出結論說，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內胜利，因而每一个別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須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决条件<sup>①</sup>。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完全无可爭辯的意見。可

<sup>①</sup>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布尔什維克的中央机关报。托洛茨基这里指的是列宁1915年在該报发表的《論欧洲联邦口号》一文(見《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1頁)。——編者注

是，这个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国、奥国、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是不一样的。可是，跟非洲和亚洲比较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已经成熟到实现社会革命的资本主义“欧洲”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在自己的斗争中“等待”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使国际间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际间消极等待的思想所暗中顶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说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国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国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

在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就会意味着成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实质的那种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瓦扬至死还认为法国是社会革命的福地，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主张护国到底。连奇等人（有的是虚伪地，有的是真诚地）认为，德国的失败首先意味着社会革命基础的破坏。最后，我们的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在我们的民族条件下重复法国内阁主义的极为悲惨的试验时宣誓说，他们的政策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因此同盖得和桑巴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不应当全然忘记，除了最庸俗的改良主义，在社会爱国主义中还有民族-革命救世主义在作祟，这种救世主义认为，正是自己的民族国家，由于工业水平、或者由于民主形式和革命成就而负有把人类引向社会主义或“民主制”的使命，如果革命在一个比较有准备的民族的范围内取得胜利是真的可以想象的话，那末同护国的纲领联系在一起这种救世主义就会有其相对的历史依据了。但是事实上这是不存在的。用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联系的办法来为保存革命的民族基地而斗争，这就是在实际上挖革命的墙脚；**革命不能不在民族基地上开始，但是在目前欧洲各国经**

济上和軍事政治上处于相互依賴的情况下（这种相互依賴正是在目前这场战争中空前有力地暴露出来了），革命是不可能**在民族基础上完成的**。欧洲联邦口号也就是这种将直接促使欧洲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行动一致的相互依賴的表现。

摘譯自《和平綱領》（1917年5月），載于《战争与革命》莫斯科1925年版第2卷第499—501頁。

孟什維克国际主义者，馬尔托夫同志的同道們，与我們相反，他們否认对政治任务的社会革命的提法。他們在自己的政綱中宣称：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所以我們的任务只能限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整个議論是建立在完全践踏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和国际任务之上的。如果說世界上只有俄国，那末馬尔托夫的議論或許是对的。可是，問題却在于消灭世界大战、同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世界无产阶级包括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向俄国的工人进行解释：說俄国的命运現在跟欧洲的命运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必将保证我們更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反过来说，欧洲工人的失敗将把我們拋回到帝国主义独裁和君主制去，最后变为英国和美国的殖民地；不是使我們的全部策略服从于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总目标和总任务，馬尔托夫同志反而从具有局限性的民族的框子来看俄国的革命，并把革命任务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样提问题是根本錯誤的，这种提法籠罩着一种导致第二国际崩潰的該受詛咒的民族局限性。

馬尔托夫同志在实践上把自己局限于民族的前景，因而还保留着跟社会爱国派在一个組織內和睦相处的可能。他希望跟唐恩和策烈铁里一起熬过那种将和战争同时消失的民族主义的“疫病”，然后又指望与他們一起回到“正常的”阶级斗争的軌道上来。把馬尔托夫跟社会爱国派联結在一起的并不是空洞的派別传统，



而是对社会革命所抱的程度极深的机会主义态度，把社会革命看作是不能决定今天任务的安排的遥远目标。而这就把他跟我们分开了。

**夺取政权的斗争，对于我们不只是当前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不，这是完成一项国际义务，这是在同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整个战线上占领最重要的阵地之一。正是这一基本观点，决定着我们对所谓民族自卫的态度。战线暂时移动到某个方面，既不能使我们停止，也不能使我们放弃反对资本主义基础本身的斗争，这种资本主义已到了使各国人民进行帝国主义的互相残杀的地步。**

**不断革命反对不断屠杀！这就是决定人类命运的斗争。**

摘译自《国际主义的策略》(1917年9月)，  
载于《无产者报》1917年9月6日第10号  
第4—5版。

**德国的处境异常严重。只有本来应该拯救我们的东西，即敌人国内爆发的革命（而这一次是在法国和英国），以及国际范围内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展和扩大，能够拯救它。但是，为了使这一切能更迅速、更正确地发生，需要使德国本国的革命沿着自己的自然的道路继续前进，需要撤换胆小的妥协派，因为他们力图缩小、诬蔑和麻痹德国革命，把它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框里，使它丧失它所应该发挥的那种鼓动力量，——一句话，需要使李卜克内西领导的革命政府代替谢德曼分子和艾伯特分子。**

摘译自《捍卫世界革命》(1918年11月8日)，载于《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莫斯科1923年版第1卷第383页。

至于说到“不断革命论”，我认为没有理由要摈弃我在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和一九〇六年以及后来就这个主题所写的一切。在今天看来，我仍坚决认为在当时我所发挥的思想，整个说来要比当

时許多布尔什維克同志所写的更加接近于列宁主义的眞諦。

“**不断革命**”这个術語是馬克思对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所用的一个術語。在馬克思主义文献中——当然不是在某些修正主义的馬克思主义文献而是在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文献中——，这个術語是被公认的。弗兰茨·梅林曾用这个術語來說明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的革命。“不断革命”这个術語忠实地翻譯出来也可以譯为“永久革命”或“不間断的革命”。这个術語所包括的政治概念究竟是什么呢？

就我們共产党人說来，在既經取得这一个或那一个政治成就之后，在实现了这种或那种社会改革之后，革命并不就此完結，它仍旧繼續向前发展，而它的唯一限界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因此，革命一旦开始（既然我們参与其間，特别是当我們在领导革命的时候），不論在哪个形式阶段上，我們都决不能使它中断。反过来说，只要革命运动的所有潜力和所有資源尚未耗尽，当然我們就要根据情况繼續不断地坚持把革命推向前去。这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內的革命胜利同时也适用于革命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展。

对俄国說来，这个理論意味着：我們需要作为政治上最高成就的并不是資产階級共和国，甚至也不是无产階級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而是受到农民支持并开辟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紀元的工人政府。<sup>①</sup>

可見，不断革命这个概念是和布尔什維主义的基本战略方針完全符合的。

摘譯自《对农民的“估計不足”》（1923年年底），  
載于《新方針》，伦敦 1956 年版第 52—54 頁。

布哈林說，就世界范围而論，无产階級和农民的力量对比絲毫

---

① 参看列·托洛茨基著《总结与展望》，俄文版。——托洛茨基注

不比苏联现在的情况更为有利。因此，如果说由于落后状态而不可能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那末在世界经济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这种议论值得作为烦琐思维的典范编进所有的辩证法教科书里。

首先，很可能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对比与苏联国内这两者的力量对比没有多大差别。但是，世界革命决不是按照算术平均数的方法来完成的。顺便说一句，民族革命也不是这样完成的，例如，十月革命首先是在无产阶级的彼得格勒发生和巩固的，并没有选择工农之间的力量对比与全俄国一般情况相当的地区。在彼得格勒，随后在莫斯科，产生了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以后，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不得不花几年的时间去推翻边远地区的资产阶级；只是作为被称作革命的这个过程的结果，才在苏联境内建立起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现有的力量对比。革命不是按照算术平均数方法发生的。它可以在比较不利的障地开始，但是在它在民族障地和世界障地这两个决定性的障地上站稳以前，是决谈不到它的完全胜利的。

其次，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对比（假定技术已达到“一般的”水平），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因素。除此以外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战争。包围着苏联的不是工人和农民的世界，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假若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被推翻，那末这个事实本身仍然既不会改变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对比，也不会改变苏联国内以及全世界的一般技术水平。但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会立即获得绝非目前所可比拟的完全不同的机会和规模。

第三，假定每个先进国家的生产力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国家界限，那末按照布哈林的理论，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国家的生产力加在一起，就超出了我们所在星球的界限，因此社会

主义非在太阳系的規模上建立不可了。

我們再說一遍，从工农平均比例出发的布哈林式的論证必須編进所有政治入門的教科书，自然它在教科书中所占的位置不能同現在一样(現在是为了替一国社会主义理論辯护)，它在教科书中應該作为煩瑣詭辯同馬克思主义辯证法完全不相容的一个证明。

摘譯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 1936 年版第 59—61 頁。

当綱領草案說苏联的經濟成就是世界无产階級革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它表达的思想是无可非議的。但是，这个新理論在政治上的危險性在于对世界社会主义的两种杠杆——一种是我們的經濟成就，另一种是世界无产階級革命——作了錯誤的比較。沒有胜利的无产階級革命，我們就不能建設社会主义。欧洲工人和全世界工人必須清楚地懂得这一点。經濟建設的杠杆是极为重要的。沒有正确的領導，无产階級专政就会削弱；它的垮台将使国际革命遭到許多年都无法复原的打击。但是，社会主义世界和資本主义世界之間的主要历史斗争的結局决定于第二种杠杆，即世界无产階級革命。苏联的巨大重要性在于它是世界革命爭夺的基地，根本不在于它能够独立于世界革命以外而建成社会主义的这个假設。

同上，第 63 頁。

只有在世界革命胜利地发展的时候，才能真正地、彻底地解除外部和內部的危机。对于馬克思主义者來說，这是最起碼的常識。但是这种看法和布哈林主义的經院哲学給我們描繪得娓娓动听的絕望的宿命論之間存在着一道无法填補的鴻沟。危机是各种各样的。資本主义社会的本性决定它是无法摆脱危机的。这絕不是說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政策无足輕重。正确的政策可以促进資產階級国家的发展，錯誤的政策則使它們遭到毀灭或阻碍。

官方的經院哲学完全不能理解在机械决定論(宿命論)和主观自我意志之間还存在唯物主义的辯证法。宿命論认为：“面临如此落后的状况,什么也办不成。”庸俗的主观主义认为：“这有何难!我們有决心,我們要建設社会主义!”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你意識到自己对世界局势和国内落后状况的依賴,那末,如果采取正确的政策,你就可以爬起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使自己进入胜利的世界革命。”

在先进国家的无产階級坚定而巩固地夺得政权以前,过渡性的苏維埃政权发生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統治政策的任务就是要防止苏維埃政权内部危机的积累,使它不至发展成为整个政权的危机。要做到这一点,首要条件是維護、发展和加强作为統治階級的无产階級的地位和自觉。而一个能够独立行动的、灵活而积极的无产階級政党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唯一的工具。

同上,第 298—299 頁。

在民族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象的。资产階級社会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种社会所創造的生产力不再能同民族国家的界限协调一致。因此,一方面产生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就产生一种资产階級的欧洲联邦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舞台上开始,然后发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最后在世界舞台上完成。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一种在更新的和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不断革命,只有当新社会在我們整个地球上获得最終胜利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才告完成。

摘譯自《不断革命論》(1929年),  
伦敦 1962 年版第 155 頁。

托洛茨基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即在取得政权的时候說过：“如果欧洲人民不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我們就会被打倒,这是肯定无疑的。不是俄国革命将在西方掀起斗争的旋风,就是各国

**资本家将扼杀我国的革命。”**当时会议席上有一人喊道：“还有第三条道路！”也许，这是斯大林的喊声吧？不是，这是一个孟什维克的喊声，这是在布尔什维克发现那个“第三条道路”以前若干年的事。

摘译自《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1932年），载于《俄国革命史》伦敦 1936 年版第 1231 页。

**工人国家的正确政策不能降低到仅仅限于本民族的经济建设。如果革命不循着无产阶级的螺旋线向国际舞台扩展，那它必然会开始沿着官僚的螺旋线局限于民族范围内。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不发展成欧洲和世界规模，它必然会朝着它本身崩溃的方向发展。作为广泛的历史远景，所有这些都是完全无可争辩的。**

摘译自《苏联与第四国际》（1934年），纽约 1934 年第 4 页。

### 三、說我們的直接責任是用武装力量 帮助其他国家革命

說“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将不可避免地变成革命战争的时代”。“使革命扩大到毗邻的国家并拿起武器支持这些国家的起义是极为必要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将不可避免地要“和世界反动势力的列强作战”。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必须突破民族国家的范围，开展军事进攻，进行世界革命，用武装力量帮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的可耻的背叛”。攻击斯大林的“我們不要别人一寸土地”的公式，說这“是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进攻性质根本矛盾的、維持现状的保守綱領”。

革命胜利后，只能把政权交给能依靠城市的武装人民即无产阶级民警的政党手里。社会民主党执掌政权后就处于最深刻的矛盾之中，它不能用“只是民主主义专政”的天真的幌子来克服。工人政府的“自我限制”不是别的，而只会是为了实现共和国而叛卖失业者、罢工者、以至全体无产阶级的利益。在革命政权面前摆着种种客观的社会主义任务，但是要解决这些任务在一定阶段上就会和国家的经济落后发生冲突。在民族革命的范围内没有摆脱这种矛盾的出路。在工人政府面前从最初起就提出下列任务：自己的力量和西欧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只有在这条道路上，它的暂时的革命统治才会变成社会主义专政的序幕。因此不断革命对俄国无产阶级来说是阶级自卫的要求。如果工人政党缺乏足够的革命-进攻<sup>①</sup>政策的主动性，并且打算转向干巴巴的只是民族的和只是民主主义的专政，那么欧洲联合起来的反动派将会毫不延迟地对它说明，执掌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必须把全部政权放在天平的社会主义革命一边去。

摘译自《我们的意见分歧》（1909年），载于《一九〇五年》  
莫斯科1922年第2版第286页。

如果德国无产阶级作进攻的尝试，那么，对苏维埃俄国来说，主要的义务就是在革命斗争中不考虑民族的界线。德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将是我們自己的斗争。苏维埃俄国感到自己只是德国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鋒队，——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但是，不能排除革命的德国在一定时期内即几个月内有击退帝国主义匪帮的可能性。而預见到这一点，我們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一个拥有全部技术的德国无产阶级和我們无組織的、但是拥有丰富的自然财富和二亿人口的俄国将形成一个强大的联盟，帝国主义的一切风浪

---

<sup>①</sup> “进攻”也可译作“侵略的”。——編者注

都将被它粉碎。对我们来说，不可能有帝国主义阵营中的同盟者。同帝国主义进行着公开斗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阵营才是我们的同盟者。李卜克内西用不着和我们签订条约，没有条约我们也将竭尽一切力量和使用一切手段在斗争中帮助他。为了共同的无产阶级的世界斗争，我们将献出一切。在宣读过的列宁同志的信里明显地和清楚地指出，要竭力建立一支百万人的军队来保卫苏维埃共和国。这个纲领是狭隘的。历史在说：你们的任务不仅是保证喘息时机，你们的任务已经变得更加广泛。因为在德国和整个中欧，危机正在成熟。也许，德国的工人阶级明天就向你们求援，因而你们所要建立的不是一百万人的军队，而是二百万人的军队，因为你们的任务已经加重了两三倍。我们已经准备把我们的力量加强两三倍。它们正在天天增长。德国无产阶级忍受的饥饿比我们多。但愿它去夺取政权，但愿它把政权夺取到手，并且依靠它来帮助我们整顿铁路，而我们将从萨马拉省和顿河区——我在那里见到有取之不尽的粮食储藏——取得丰富的粮食，并且为了共同斗争的胜利而和德国工人阶级兄弟般地分享它们。这是俄国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因为这里聚集着他们的赋有声望和威信的代表——俄罗斯共和国的优秀分子。这里有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代表。这是俄国的精华和意志。当德国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将完全和他们站在一起。作为共产党人，我们要把我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伸延到德国工人阶级中去。我们的一切就是他们的一切。我们的力量和粮食就是他们进行共同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和粮食。

摘译自《国际局势》(1918年10月3日)，载于《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莫斯科1923年版第1卷第372—373页。

一九〇五年我们有个很大的优越性，这就是在革命序幕的时代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用认识历史过程的科学方法武装起来



了。这使得有可能从理論上来搞清楚那些历史的物质过程只給予某些暗示的关系。南俄一九〇三年混乱的七月罢工已提供了作出下列結論的材料，即俄国革命的基本方法是无产阶级的总罢工及其随后向武装起义的轉变。明显地证实了这一預测的一月九日的事变，要求具体地提出革命政权問題。从这时起，在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尖銳地提出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内部阶级动力的問題。正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个期間，本书作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論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奇妙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統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絕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在由于历史的必然性而突破了俄国革命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之后，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突破其民族国家的范围，也就是应当自觉地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序幕。

虽然事隔十二年，这种估計却完全被证实了。俄国革命不能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完成。它必須把政权交給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一九〇五年还无力夺取政权，它是被迫在六月三日政变后的沙皇制度下的地下活动中、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壮

大和成熟起来的。无产阶级依据其老一輩在一九〇五年获得的經驗，在一九一七年掌握了政权。年輕的工人們应当掌握这些經驗，应当知道一九〇五年的历史。

摘譯自《〈一九〇五年〉第一版序言》(1922年)，載于《一九〇五年》莫斯科1922年第2版第3—5頁。

人們將對我們說，並且現在也這樣說：在決議和法令中，紅軍的國際作用、特別是為革命的進攻戰爭作準備的必要性強調得不够。佐羅明特別重視這一點，他在同一個地方（第22頁）寫道：“……我們建立一支無產階級的階級軍隊，一支工农軍隊，不僅是為了防禦資產階級和容克的反革命，而且也是為了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革命戰爭（無論是防禦性的或是進攻性的），為了半內戰(?)型的戰爭。在後一種戰爭中，進攻性的戰略能夠起巨大的作用。”可見這就是佐羅明的啟示，這就是他的革命的齋期福音。但是很可惜，如果我們的作者自以為發現了什麼嶄新的東西，那他就犯了大錯誤，就象使徒常常犯錯誤一樣。他只是很糟地表述了已有的東西。正因為戰爭是政治通過手中武器的繼續，所以關於革命戰爭在工人階級世界革命的發展中能夠和應該起什麼作用的問題，對我們黨來說，過去不可能現在也不可能有原則性的爭論。這個問題在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報刊上並不是從昨天起才被提出並得到解決的。我可以引證黨的報刊上的許多社論尤其是帝國主義大戰時期以來的社論，在這些社論中，一個工人國家的革命戰爭被看作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是我要追溯更遠的過去並引證我自己在一九〇五年所寫的幾段話。

“這點（俄國革命的發展）一開始便賦予正在展開的事件以國際的性質，並開拓了一個最偉大的前景：俄國工人階級所領導的政治解放把領導者提到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高度，使他掌握了巨大的力量 and 手段，並使他成為在世界上消滅資本主義——歷史已經為

它提供了一切客观前提——的开路先锋。

如果俄国无产阶级在暂时取得政权的情况下不是出于自己的主动把革命推行到欧洲的土地上，那末，欧洲的封建-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将迫使它这样去做。

现在来预测俄国革命将通过怎样的道路去干涉老资本主义的欧洲，这自然是白费力气，因为这条道路可能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们打算谈谈作为联系革命的东方和革命的西方的波兰问题，这与其说是预言，倒不如说是为思想提供例证。

俄国革命的胜利必然意味着波兰革命的胜利。不难想象，俄属波兰十个省的革命制度将必然使加里西亚和波兹南行动起来<sup>①</sup>。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政府将把他们的军队集中到波兰边境上来回答这一点，以便然后越过边境并在敌人的中心华沙打击他们。无疑，俄国革命是不会听任它在西方的先头部队落在普鲁士-奥地利大兵的手中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威廉第二及弗兰茨·约瑟夫政府作战对于俄国革命政府来说将成为自卫的法律。那时德国和奥地利的无产阶级将采取怎样的态度呢？无疑，他们不会漠不关心地旁观本国军队的反革命十字军征伐。封建-资产阶级的德国反对革命的俄国的战争必然意味着在德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让那些认为这种断言过于绝对的人去臆想另一个更适合于把德国工人和德国反动势力推上公开的力量较量的道路的历史事件吧。”（见托洛茨基《我们的革命》（1906年），俄文版第280—281页）

当然这些事件没有按照在十六年前的这几段话中仅仅作为假设并且为了叙述生动而预先描绘的历史顺序发生。但是整个的历史进程已经证明并且今后还要证明这一预言：无产阶级革命的时

---

① 我回想起，这是我1905年写的。——托洛茨基注

代将不可避免地变成革命战争的时代，年轻的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这就将不可避免地把它推向和世界反动势力的列强作战。可见我们在十五年以前就已经基本上弄清楚我们将必须创造“什么样的军队”以及“为了什么任务”而创造它。

摘译自《军事学说还是臆造的军事空谈》(1922年)，载于《共产国际》杂志德文版1922年第9期第148—149页。

同志们，要知道我们总是肯定，我们的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可能时间拖得长些，但它的胜利是有保证的，和它一同到来的是我们的胜利。我们总是痛斥以社会主义命运和他们个别国家联在一起为辩护的爱国的机会主义者，不论这班爱国者是否还向革命献媚，或者象他们大多数人那样完全拒绝革命而采取改良主义的纲领。另一方面，我们总是说，如果情况使一国的无产阶级有可能向前推进，掌握政权，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或军事逼攻，或者，确切些说，两者一同开展的话，它没有权利去等待别的国家，因为世界革命也正是在这样扩展的。我们的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者掌握了政权，我们建设着社会主义，我们以此向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伟大的范例，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巩固我们的国家，这种种对于我都是不言而喻的。争论的难道是这个吗？但正因为如此，正因为我们是世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部分，用自己的建设参加世界革命的胜利发展，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不能要求有什么特别的保证，使我们能不依赖世界革命而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而在这种情况下还竟然说，如果我们要求(向谁要求?)这种保证而不可得，我们就该辞职，把事情归之为内阁危机，并转为苏维埃国家的在野党。这样提问题难道不是伪善透顶吗？

摘译自《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1926年12月)，载于《真理报》1926年12月14日第289号。

如果我们从一个国家发展甚至完成社会主义的概念出发，事情就完全变样了。我们今天有一种“理论”，说什么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说什么这个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相互关系可以建立在“中立”世界资产阶级的基础上(斯大林)。如果采取这种基本上是民族改良主义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观点，那末就没有必要、至少是不象原来那样必要提出欧洲联邦的口号。但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个口号是重要的，十分必需的，因为它包含着对孤立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的谴责。对于每一个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使革命扩大到毗邻的国家并拿起武器支持这些国家的起义是极为必要的，甚至比对苏联更为必要——当然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这样说并不是出于任何有关国际团结的抽象的考虑——仅仅这些考虑是不能使各个阶级行动起来的——，而是出于列宁曾经千百次提出过的那些重要理由，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国际革命的支持，我们就无法支持下去。苏维埃联邦的口号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进程，无产阶级革命不会在所有国家内同时爆发，但是它会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要求这些国家——特别是在欧洲范围内——为了抵抗最强大的外部敌人和进行经济建设而建立最紧密的联系。

摘译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纽约1936年版第16—17页。

极左派抛弃了阶级观点，采取抽象的民族观点，就必然从革命的立场滚到纯粹和平主义的立场上去。鲁钟叙述苏联军队当时如何占领西伯利亚铁路，后来“红军”又如何“按照列宁的反帝国主义的政策，小心地在中国边境上停下来了，再也没有试图重占中东铁路区”(《无产阶级革命报》第228页)。原来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任务：在国家的边界上应当把自己的旗帜小心地放下来。照鲁钟的意思，列宁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本质就在于此！读

到这一种“一国革命”的哲学真令人难堪。紅軍之所以在中国边境前停下来，是因为它的力量还不足以越过边境，并抵挡日本帝国主义的必然的攻击，如果紅軍当时有足以展开这次攻势的力量，那末它就應該采取攻势。如果紅軍拒絕为中国工农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向帝国主义的力量展开革命的攻势，那就不仅沒有实行列宁的政策，而且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的可耻的背叛。魯钟之流的不幸到底在什么地方？就在他用民族和平主义的政策来代替国际革命的政策。这与列宁毫无共同之处。

紅軍当时攻进了孟什維克的格魯吉亚，帮助格魯吉亚的工人起来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权，第二国际直到如今还在痛罵我們。在格魯吉亚住的是格魯吉亚人，而紅軍主要是由俄罗斯士兵組成的。在这个过去的冲突中魯钟站在哪一边呢？

对一九二〇年夏天向华沙进军又怎样呢？魯钟也許知道，我当时是反对这次战役的。然而我之所以反对，純粹是从实际出发的。我认为波兰的劳动群众来不及起义（因为战争的进展通常比革命快），而且远离我們的根据地，我觉得这对我們有危险。后来的事件证明了这个預見的正确：向华沙进军是一个錯誤。然而这不过是实践上的錯誤，絕不是原則上的錯誤。如果那时的物质条件好一些，我們首要的义务就是要用武器来援助波兰革命，正如我們应当援助所有其他革命一样。然而，那时正是劳合·乔治、邦納·劳首先罵我們是赤色帝国主义。社会民主党又照样責罵，极左派不知不觉地从那里接受了这套罵法。

魯钟反对革命的“干涉”，牛头不对馬嘴地提出了老的而又毋容爭辯的原則：“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个原則是就民族范围說的嗎？是仅仅就一国范围說的嗎？一国的工人可不可以援助其他国家的罢工工人？他們可不可以送武器給起义的工人？如果他們有軍隊，可不可以派他們的軍隊去援助起义者，或

者去发动起义，犹如罢工工人派自己的队伍去发动留在車間里的工人罢工一样？

摘譯自《保卫苏联与反对派》(1929年9月7日)，  
巴黎版第15—17頁。

37、苏联政府有权在同帝国主义者的任何协定中以最大的精确性确定侵略的定义，对于这种权利，我們决不能爭論。但是如果企图把这个有条件的合法主义公式变成調节国际关系的最高准绳，那就是要用保守主义的标准来代替革命的标准，而把无产阶级的国际政策降为保卫以用武力兼并建立起来的現有边界了。

38、我們不是和平主义者。我們认为，革命战争和起义同样是无产阶级政策的一种手段。我們对待战争的态度，不是取决于对“侵略”作出的合法主义定义，而是取决于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战争的問題。在国与国的冲突中，也和在这个阶级斗争中一样，“防御”与“侵略”仅仅是实际的权宜的問題，而不是法律标准或伦理标准的問題。单单一个侵略标准只能为莱昂·勃魯姆和王德威尔得等人的社会爱国主义政策創立一个支座，这些人是由于凡尔赛条約才有可能在保卫和平的幌子下保卫帝国主义的脏物的。

39、斯大林的著名的公式“我們不要別人的一寸土地但也不放弃自己的一寸土地”，是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进攻性质根本矛盾的、維持現狀的保守綱領。一國社会主义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模糊民族国家的反动作用，使人們安于民族国家，把民族国家理想化，并削弱革命的国际主义的重要意义。

摘譯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紐約  
1934年版第18—19頁。

我們取得胜利以后，在一九一九年建立了共产国际。我們不止一次地宣称，革命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責任去援助被压迫

的和起来反抗的阶级，而且不仅是思想上进行援助，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拿武器去援助。我们也并没有局限于只是三番五次地宣告这一点。我们在我们自己那个时期曾经用武装力量去援助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工人。我们曾经试图以红军进攻华沙的行动去援助正在暴动的波兰无产阶级。我们派遣了组织者和指挥官去帮助中国人革命。一九二六年我们募集了千百万卢布去援助英国的罢工工人。而现在，所有这些似乎都变成误会。是悲剧的误会吗？不，是喜剧的。难怪斯大林宣称，住在苏联已经成为“愉快”的事。甚至共产国际也从一个严肃的角色变成一个喜剧性的角色了。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48页。

作者在报刊上答复了古谢夫，请他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革命进程中，外国军事力量只能起辅助性的作用，而不能起根本性的作用。只有在有利的条件下，它们才能加速革命的完成和促进胜利的到来。“军事干涉就象医生的产钳一样。运用得及时，就可以减轻分娩的痛苦；运用得过早，就只能造成流产。”(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五日)

同上，第153—154页。

波兰军队在一九二〇年一月占领了得文斯克，迫使红军放弃了拉特加利亚，在三月间占领了莫泽尔，并且在波兰的“解放者”约瑟夫·皮尔苏茨基亲自统率下，在四月间会同已经垮台了的佩特留拉政府的部队，向乌克兰发动了猛烈的攻势。虽然红军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作战的，然而苏维埃政府的目标却不仅是要打退进攻，而且要把布尔什维克革命引入波兰，并由此为共产主义打开进入欧洲的大门。

摘自《斯大林评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年版下册第427页。



## 四、宣传“欧洲联邦”是我们 这个时代的口号

宣称“‘欧洲联邦’是我们已经进入的革命时代的口号”，是欧洲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可以设想的形式”。说什么民族国家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它“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框框，作为阶级斗争的基地，因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都已经过时了”。欧洲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永远保持边界，而是通过革命来废除边界。断言“无产阶级只有以共和欧洲为出发点，才能使全世界革命化，才能把全世界组织起来”。认为世界经济组织的另一个中樞将是“美洲联邦”。只有“南美和中美苏维埃联邦”才能使南美和中美人民“摆脱落后和被奴役状况”。欧洲联邦将“通过苏联这个桥梁扩大到亚洲，从而实现一个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邦”。

**资本主义所发展的生产力，已经突破民族和国家界限。民族国家，即当前的政治形式，对于这些生产力的运用来说，已嫌过于狭窄。因此，我们经济制度的自然趋势，乃是力求打破国家疆界。整个地球，陆地与海洋，地面和地下，都已变成一个经济工场，地球的各个部分已彼此不可分离地连结着。这项工作是由资本主义来完成的。与此同时，这项工作的完成也促使资本主义国家使世界经济服从各国资产阶级的利润收入。帝国主义的政治首先证明：在一七八九——一八一五年，一八四八——一八五九年，一八六四——一八六六年以及一八七〇年等革命和战争中产生的旧式的民族国家，已经衰老，它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可容忍的障碍。**

当前的战争，归根结蒂是生产力对于民族和国家这种政治形式的一种反抗。它意味着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的民族国家的瓦解。

民族，作为一种文化的、思想的和心理的事实，还一定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它的经济基础却已被从脚下抽去了。一切有关的谈论，说当前这次流血冲突是保卫民族的结果，不是伪善，就是盲从。相反，战争的真正的和客观的意义，乃是摧毁当前的民族经济中心，而代之以世界经济。但是各国政府谋求的解决这一帝国主义任务的方法，不是通过全人类生产者的明智的、有组织的合作，而是通过战胜国资本家阶级对于世界经济的利用；而战胜国经过这次战争，就会从一个大国变成一个世界强国。

战争宣布了民族国家的没落。但同时它也宣布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没落。资本主义利用民族国家已使世界上全部经济制度进行了革命。它把整个世界瓜分给少数大国巨头，大国周围是处在列强角逐之中的它们的卫星国，即弱小国家。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意味着无休止地争夺资本主义剥削的新而又新的场所，而这种场所却只能得自这同一个唯一的来源——地球。在军国主义旗帜下进行的经济竞争，是与破坏人类经济基本原则的掠夺和毁坏行为不断交替的。世界生产不仅反抗着由民族和国家的区分而产生的混乱，而且也反抗着现在业已陷入野蛮的无政府状态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

在上述历史条件下，对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说来，问题不在于保卫这个过时的和陈旧的民族“祖国”，因为它业已变成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创立一个远为强大的、更能抵御强敌的祖国——欧洲共和联邦，以作为世界联邦的基础。

无产阶级只能用社会主义的世界经济组织作为现在的实践纲

領，來對付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混亂局面。

戰爭乃是資本主義在其發展的登峰造極階段，用以尋求解決其不可解決的矛盾的方法。無產階級只能用它自己的方法，即社會革命的方法，來制止戰爭。

摘譯自《布爾什維克與世界和平》(原名《戰爭與國際》)(1914年10月)，紐約1918年版第20—23, 28—29頁。

因此，預計會給生產者和消費者以及整個文化發展帶來巨大好處的歐洲經濟聯合就成了歐洲無產階級同帝國主義的保護關稅政策及其工具——軍國主義作鬥爭中的革命任務。

因此，沒有君主政體、常備軍和秘密外交的歐洲聯邦是無產階級和平綱領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摘譯自《和平綱領》(1917年5月)，載于《戰爭與革命》莫斯科1925年版第2卷第495頁。

如果德國軍國主義像普魯士軍國主義當時實現德國的半統一一樣，真正得以強制實現歐洲的半聯合，那麼歐洲無產階級的中心口號會是什麼呢？是廢除強制實行的歐洲聯合和讓一切民族返回到孤立的民族國家的屋頂下去嗎？是恢復“自治的”關卡、“民族的”貨幣、“民族的”社會立法等等嗎？自然不是。在保持和繼續發展已實現的聯合的基礎(如完全消滅關稅壁壘，統一立法、首先是工人立法以及其他等等)的同時，消滅其強制和反民主的形式將會成為歐洲革命運動的綱領。換言之，沒有君主政體和常備軍的歐洲聯邦口號在上述情況下就會成為歐洲革命的聯合的和指導性的口號。

，同上，第496頁。

但是現在，在俄國革命的大有希望的開端之後，我們有一切理

由期望，就在这次战争期间，强大的革命运动会在全欧洲开展起来。很明显，它只有作为全欧的运动才能顺利发展和走向胜利。如果它仍然是民族范围内的孤立的运动，那么它必然会遭到毁灭。我们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指出了威胁着俄国革命的来自德国军国主义的危险。这种危险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危险。对俄国革命来说，英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军国主义比起霍亨索伦王朝的军事机器来，并不是威胁性更小的敌人。拯救俄国革命的方法是把革命转到整个欧洲去。如果革命运动在德国扩展开来，那么德国无产阶级就会在西方的“敌对”国家中寻找并找到革命的反响；而如果欧洲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了政权，那么即使仅仅是为了掌握住这个政权，它也会不得不立即使这个政权去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换言之，稳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建立，只有在全欧洲的幅员之内，也就是说在欧洲共和联邦的形式下才是可以想像的。在这种场合下，靠武力、靠工业和外交协定都不能取得的欧洲的国家联合就会成为得胜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一项迫切任务。

欧洲联邦是我们已经进入的革命时代的口号。不管今后军事行动的进程如何，不管外交对目前的战争如何总结，不管革命运动在最近时期的发展速度如何，欧洲联邦口号在一切情况下都将作为欧洲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政治公式而获得巨大意义。这一纲领中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民族国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框框，作为阶级斗争的基地，因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都已经过时了。只有当我们把建立新的、更高级的革命“祖国”——共和欧洲的进步任务同保守地保卫过时的民族祖国对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对“保卫祖国”这一过时的无产阶级政治纲领的否定才不再成为在思想政治上的自卫的纯粹消极的行动，而获得自己的全部革命内容。无产阶级只有以共和欧洲为出发点，才能使全世界革命化，才

能把全世界組織起来。

.....

不言而喻，欧洲联邦将仅仅成为世界經濟組織的两个中枢中的一个。另一个中枢将是美洲联邦。

同上，第 497—499 頁。

真正能够保证民族发展自由的民主共和的欧洲联合，只有通过反对軍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和王朝的集权制的革命斗争，通过各个国家的起义，通过把这些起义汇合成全欧洲的革命才有可能。但是，得胜的欧洲革命——不論它在个别国家遇到什么样的波折——由于沒有其他的革命阶级，只能把政权轉交给无产阶级。可見，欧洲联邦首先是欧洲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也是唯一可以設想的形式。

同上，第 502 頁。

资产阶级民主派当时曾經幻想过欧洲联邦。这个理想在这次战争的第一个时期，在法国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言論里得到了虛伪的和为时已晚的反响。资产阶级不可能使欧洲联合起来，因为它把民族帝国主义的分割願望和經濟发展的联合趋向对立起来了。要把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就必须把經濟从私有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把民族发展的要求納入自然的合理的疆域之内，把各民族結合在劳动协作的統一体中：这就是欧洲各族人民在自由自决基础上所建立的欧洲苏維埃共和国联盟。其它的解决办法是沒有的。如果英国在革命的发展中落后于大陆，那么这个联盟将反对英国。当大洋彼岸的美国仍然是金元共和国的时候，当紐約交易所内洋洋得意的猪哼声还没有变成临死前的沙哑声的时候，欧洲联邦将和苏維埃英国一起把自己的斗争鋒芒指向

## 北美的帝国主义专政。

摘譯自《由混乱构成的秩序》(1919年1月13日),  
載于《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第2卷第1分冊  
莫斯科1924年版第12—13頁。

《和平綱領》按其內容來說同編在第一卷中的《战争与國際》是緊密地銜接在一起的。

在《和平綱領》中一再重復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不能在民族範圍內勝利完成的論斷，在某些讀者看來也許已被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將近五年的經驗推翻了。但這樣的結論是沒有根據的。工人的國家在一國而且是在落後的一國抗住了全世界，這個事實證明無產階級有雄偉的力量，這種力量在其他比較先進比較文明的國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蹟來的。可是，我們雖然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保持為一個國家，但是我們並沒有達到甚至還沒有走近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階段。這個時期為革命-國家的自衛而進行的鬥爭使生產力大為下降；而只有在生產力增長和繁榮的基礎上，社會主義才是可以想象的。同資產階級國家進行的貿易談判、租讓、熱那亞會議等等，都是不可能在民族國家範圍內孤立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極其鮮明的證據。當其餘的歐洲國家還是資產階級掌握着政權的時候，我們為了打破經濟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設法和資本主義世界達成協議；同時可以確信地說：這種協議至多只能幫助我們治愈某些經濟創傷，獲得某些進展，可是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高漲只有無產階級在歐洲幾個最重要的國家內獲得勝利以後，才會是可能的。

歐洲不僅是地理上的術語，而且是經濟和政治上的術語，最近幾年的事件：歐洲的衰落，美國實力的增長，勞合-喬治借助於把帝國主義的與和平主義的方法同時並用來“拯救”歐洲的嘗試鮮明地證明了這一點。

目前，欧洲工人运动处在防御、积聚力量和准备的时期。夺取政权的公开革命战斗的新时期必然会提出革命欧洲各族人民相互之间的国家关系问题。唯一能够纲领性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欧洲联邦。既然俄国的经验提出了苏维埃国家这一最自然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既然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原则上接受这种国家形式，那就可以设想：在恢复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时，欧洲无产阶级将提出欧洲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纲领。俄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是极为有益的。它证明在无产阶级制度下，最广泛的民族和文化自治同经济上的集权制是完全相容的。在这种意义上说，翻译成苏维埃国家语言的欧洲联邦口号不仅保持着自己的全部意义，而且看来还刚刚开始预示出自己在即将来临的社会革命时代中的巨大意义。

译自《〈和平纲领〉跋》(1922年)，载于《战争与革命》莫斯科1925年版第2卷第503页。

一九一五年，我们在为欧洲苏维埃联邦口号辩护时曾经指出，关于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本身并不能作为反对这个口号的理由，因为不同国家和不同大陆之间的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这个情况本身就是不平衡的。欧洲国家的发展相互之间是不平衡的。然而，可以象历史事实一样绝对肯定，至少在我们考察的这个历史时期内，这些国家里面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以美洲超过欧洲的程度超过其他国家。对于美洲有一种衡量不平衡的尺度，而对于欧洲则需要另一种尺度。欧洲各国之间的紧密的有机联系是地理和历史条件决定的，是无法摆脱的。现代欧洲的资产阶级政府象一伙绑在同一个车上的杀人犯。如前所述，欧洲的革命归根结底将会对美洲也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从直接影响来说，从历史发展的直接顺序来说，德国发生革命对法国比对美国的影响要大得无可

比拟。欧洲苏维埃联邦这个口号的政治生命力正是来自这种历史上一脉相传的关系。我們談的是它的相对的生命力，因为这个联邦理所当然地将会通过苏联这个巨大的桥梁扩大到亚洲，从而实现一个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盟。然而这将組成另一个时代，或者說是继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出現的新的伟大的一章。当我们进一步接近这个时代的时候，我們也将发现与之相适应的法则。

摘譯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 1936 年版第 14—15 頁。

17. 在南美洲，兴起較晚并已开始衰退的资本主义正在維持半封建的或半奴隶的生活条件，在那里，世界性的对抗矛盾引起了买办集团間的剧烈火拚，引起了各国内部連續不断的政变，也引起各国之間曠日持久的武装冲突。美洲的资产阶级在其历史上的兴盛时期把美洲大陆北半部联合成为一个联邦，因而它現在可以利用他們由此而得到的全部力量用来瓦解、削弱和奴役这个大陆的南半部。南美和中美只有把自己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組成一个强大的联邦，才能使自己摆脱落后和被奴役的状况。但是，能够响应号召解决这一任务的，决不是后起的南美资产阶级，完全为外国帝国主义所收买的代理人，而是年輕的南美无产阶级这个被压迫群众的理想的领导者。因此，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暴行和阴谋以及反对当地买办集团的血腥勾当的斗争中的口号是：**南美和中美苏维埃联邦。**

無論在什么地方，民族問題都同社会問題合为一体。

摘譯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  
紐約 1934 年版第 11 頁。

欧洲工人和殖民地各国人民是不能在維持現状的旗帜下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也不能在这个旗帜下起来反对这样一种战争，即它必然要打破和推翻現状，几乎就象发育好的胎儿不可避免地要



破坏怀孕的现状一样。劳苦者对保卫现存的边界一点兴趣也没有，特别是在欧洲——在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指挥下是这样，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暴动中更是这样。欧洲的衰落正是由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即它在经济上已经分裂成差不多四十个半民族国家，这些国家拥有自己的海关、护照、币制以及庞大的军队来保卫民族特殊性，它们已经成为人类经济和文化发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碍。

**欧洲无产阶级的任务并不是使边界永远保持下去，而恰恰相反是通过革命来废除边界；不是维持现状，而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欧洲联邦！**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69—170页。

### (三) 关于一国建設社会主义

#### 一、一国社会主义理論的 由来、錯誤和目的

1. 声称“欧洲无产阶级的規模失敗”和“社会主义建設遭到了挫折”，使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創造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論，以給无产阶级“一种‘精神’安慰”。胡說一国社会主义理論的先驅其实是德国老修正主义者福尔馬尔。

但是你們知道斯大林是师承哪个“乐观主义者”的嗎？

我带来了一份重要的文件，如果你們想要的話，可以发給你們。这是福尔馬尔<sup>①</sup>在一八七九年写的一篇文章——福尔馬尔后来以德国社会爱国主义分子聞名。文章的題目是《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篇东西應該翻譯出来发給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監察委员会的全体委員，当然也應該发給全体黨員參閱。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福尔馬尔早在一八七九年就提出了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論，他的門徒却一直在一九二四年才开始提出他这种“獨創的”理論。为什么是在一八七九年？因为，当时是一个反动时代，是欧洲工人运动普遍衰退的时期。法国的公社在一八七一

---

<sup>①</sup> Vollmar, Georg Heinrich von (1850—1922), 德国社会民主党內的修正主义者。——編者注

年被击碎。一直到一八七九年，法国沒有出現过革命运动。在英国，自由派工联主义和自由派工人政策一帆风顺。当时是英国和欧洲大陆革命运动处于最低潮的时期。同时，社会民主党在德国迅速发展。这种矛盾使福尔馬尔形成了他的独创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論。你們知道福尔馬尔最后的結局嗎？他最后成了极端右派的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沙文主义者。你們会說今天的局势不同了。当然，今天的总的局势是不同了，但是，欧洲各国的无产階級在最近几年遭受了重大的失敗。进行国际革命的前景，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时期出現过的国际革命立即胜利的前景被推迟了，多数派內的某些“乐观主义者”完全失去了希望，于是他們就得出結論說我們不要国际革命也可以存在下去。从福尔馬尔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論开始到狹隘民族主义的福尔馬尔主义，这一机会主义墮落的前提恰恰就在这里。

摘譯自《在中央監察委员会主席团會議上的发言》(1927年6月)，載于《斯大林伪造学派》紐約1937年版第135—136頁。

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現在那些預言家的先驅正是福尔馬尔先生。在一八七八年写的一篇題为《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章里，福尔馬尔描述了德国——这个国家的无产階級比先进的英国的无产階級还要发达得多——孤立建設社会主义的前景。在好几个地方，他肯定而且十分明确地談到据斯大林說連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了解的发展不平衡的規律。根据这个規律，福尔馬尔在一八七八年就得出这个无法駁斥的結論：

“在当前普遍存在而且将来也会保持其力量的状况下，可以預見，社会主义在一切文明国家同时取得胜利是絕對談不上的。”

在进一步闡述这个思想时，福尔馬尔說：“这样我們就得出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結論。我希望我已經证明这是最有可能虽然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这里我們可以把“孤立的國家”这个詞理解为无产階級专政的國家。就这个意义來說，福尔馬尔表达了一个为馬克思和恩格斯熟知的、也是列宁在前面引用的一九一五年的文章中曾經表达过的不容駁斥的思想。

但是接着下来就純粹是福尔馬尔自己的思想了。附帶說一句，和我們現在鼓吹一个國家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論的那些人的提法比較起来，福尔馬尔的提法远不是那样片面和錯誤。福尔馬尔在他的解释中以下列論点作为出发点之一：**社会主义德国将和世界資本主义經濟保持活跃的經濟关系，同时具有技术远較发达而生产成本远較便宜的有利条件。这种解释以社会主义制度和資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的前景作为基础。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必須不断显示它在生产上的巨大优越性，世界革命的必要性就自行消失了：社会主义将以在市場用更低的价格銷售貨物的办法战胜資本主义。**

摘譯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1936年版第43—44頁。

由于一九二五年四月的决定<sup>①</sup>已經使农村日趋分化的現象合法化，为这种分化敞开了大門，所以結合<sup>②</sup>意味着工人国家和富农之間的商品交換将不断增加。人們不但不承认这种可怕的危險，而且立即制造出使富农并入社会主义的卑鄙理論。这种办法第一次作为脫离世界經濟和世界革命而独立地“在一个國家建成社会主义”的办法，以党的名义一古脑儿提交給党的代表會議。由此可知，这种小資產階級反动理論之所以出現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設真正取得了成就——这些成就是不可爭辯的——而恰恰是因为社会

① 指1925年4月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作出的一些关于农村工作的决定。  
——編者注

② 指城乡之間的“結合”。——編者注

主义建設遭到了挫折，从而领导人认为有必要給无产阶级提供一种“精神”安慰，以便抵消对資本主义作出的新的物质让步的影响。

同上，第 269 頁。

斯大林把不平衡发展的規律奉为偶像，也就宣布它是民族社会主义的充分根据，不过这种民族社会主义不是所有国家共同的型式，而是例外的、救世主的、純粹俄国的型式。据斯大林看来，只有俄国有可能建設一个自給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他就从这一点出发，把俄国的民族特殊点不仅提高到各个資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点”之上，而且提高到整个世界經濟之上。斯大林全部概念的致命的裂口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苏联的特殊点是那样强有力，以致它可以使苏联在自己的边界以內建設自己的社会主义，而不管人类的其他部分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于其他国家，由于救世主沒有批准，它們的特殊点只不过是共同点的“补充”，只不过是脸上的贅疣。斯大林教导說：“把共产党的活动建立在这些特殊点上，那就錯了”。这个訓誡适用于美国、英国、南非以及塞尔維亚的共产党，——但是不适用于俄国共产党，因为俄国共产党的活动不是建立在“共同点”的基础上，而恰恰是建立在“特殊点”的基础上的。从这里就产生了共产国际的彻头彻尾二元論的战略。当苏联在“消灭阶级”并建設社会主义的时候，所有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却完全不顾現有的民族条件，而被迫按照日历（八月一日，三月六日，等等）进行一模一样的活动。救世主的民族社会主义以官僚的抽象的国际主义为补充。这种二元論貫穿在共产国际的整个綱領中，使它失去了任何原則的意义。

如果我們把英国和印度当作截然相反的資本主义类型国家，那末，我們就不得不說，英国和印度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决不是建立在同样的条件任务和方法上，而是建立在不可分割的相互依靠关系上。印度解放运动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是英国展开革命运

动,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无论印度或者英国,都不可能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两者都必须作为一部分加入更高的整体。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就建立在这一点上,而且也只建立在这一点上。

最近,即一九三〇年三月八日,《真理报》重新解释了斯大林的不走运的理论。这家报纸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即作为生产关系的一定形式,可以“在苏联的民族范围内”完全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即保证不受资本主义包围的干涉”,那就又是另一回事了。因为社会主义的这样一种最终胜利“实际上要求无产阶级革命在几个先进国家中取得胜利”。在列宁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摆出一种学识渊博的姿态来解释这样拙劣的经院哲学,要理论思想堕落到多么严重的程度才行!如果我们有一刹那的可能在孤立的苏联范围内实现作为一种完善的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那末,那就是“最终胜利”,——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还谈得上什么可能的干涉呢?社会主义秩序的先决条件是高度的技术、文化水平和居民的团结一致。由于苏联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时候,可以设想,将拥有二亿至二亿五千万人口,我们不免要问:到那时候还有什么干涉可言呢?在那种情况下,哪个国家或者国家联盟还敢于妄想进行干涉呢?可以想像的干涉只有可能来自苏联方面。但是有这种必要吗?几乎没有。一个落后的国家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榜样对于世界资本主义将意味着一个致命的打击,将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要付出的代价减少到如果不是零的话,至少也是最低的程度。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斯大林主义的全部概念实际上是导致共产国际的消灭。的确,如果社会主义的命运由可能有的最高权威即国家计划委员会来决定的话,那末,共产国际还有什么历史意义呢?在那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任务将是同臭名远扬

的“苏联之友”一道，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使免遭干涉，也就是说，从实质上看，扮演边防哨兵的角色。

摘译自《〈不断革命〉德文版序言》(1930年3月29日)，  
载于《不断革命》伦敦1962年版第25—27页。

欧洲无产阶级的大规模失败和苏联所取得的最初的微小的经济成就，使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秋天产生了这样的思想：苏维埃官僚们的历史使命是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建立社会主义。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在对许多见识浅薄的人看来似乎是学究气的或者是烦琐的，但是，实际上，这场争论反映了第三国际堕落的开始，并为第四国际准备条件。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13页。

在第二个阶段，在一九二四年，发动了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政治内容缩小到这一主题，即我们对国际革命不感兴趣，为了发展我们的经济，我们只关心自己的安全。官僚主义越来越担心，同国际革命政策发生关系的危险，正在危害它的地位。反对不断革命论的运动，其本身没有任何理论价值，但是表现了脱离布尔什维主义的保守的民族主义倾向。从这个斗争中出现了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摘自《斯大林评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年版下册第514页。

2. 攻击“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一个庸俗的民族改良主义的乌托邦”，说它的错误在于：“夸大了苏联的生产力”；“故意不看各个工业部门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忽视国际分工”；“忘记了帝国主义时代内在的最重要的矛盾，即生产力和国家壁垒的矛盾”。

在力图证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論时，綱領草案犯了双重的、三重的以至四重的錯誤：它夸大了苏联的生产力；它故意不看各个工业部門发展不平衡的規律；它忽視国际分工；最后，它还忘記了帝国主义时代內的最重要的矛盾，即生产力和国家壁壘的矛盾。

摘譯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1936年版第59頁。

世界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比苏維埃国家强大得不可限量，这是无疑义的。因此，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是一个庸俗的民族改良主义的烏托邦。但是，我們并不是这样提問題的。世界无产階級的生产上和政治上的作用是力量对比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斗争是在世界范围上进行的，十月革命的命运就在这場斗争中决定。

摘自《保卫苏联与反对派》(1929年9月7日)，巴黎版第40頁。

3. 攻击一国社会主义理論的“目的”在于向社会意識灌輸一套思想：“革命已經彻底完成；社会矛盾将不断緩和；富农将逐渐长入社会主义；整个发展与外部世界的事件无关，将保持和平的和計劃的性质”。断言任何資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接受了这种思想，就与社会民主党“相差无几了”。

关于根本的階級目的甚至比局部的目标还不能用民族手段或在国家界限內实现这一无比坚定的信念构成革命国际主义的核心。然而，如果这个最終目的能够在民族界限內通过民族无产階級的努力来实现，那么，国际主义的脊梁就被打断了。关于一国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論破坏了胜利了的无产階級的爱国主义和資產階級国家无产階級的失敗主义之間的內在联系。先进資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階級仍然在通往夺取政权的道路上移动。它怎样以及用



什么方式夺取政权，完全要看它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看做是一项民族任务还是一项国际任务。

假定說有絲毫可能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那不仅在夺取政权以后，而且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可以相信这个理論。如果社会主义能够在落后的俄国的民族界限内实现，那就更有理由相信它能在先进的德国实现。明天德国共产党的領袖們将担負起闡发这个理論的任务。綱領草案授权他們这样做。后天就該輪到法国党了。这将是共产国际沿着社会爱国主义路綫瓦解的开端。任何資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如果接受了它本国具备有单独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需的和足够的”先决条件的思想，那它在实质上同革命社会民主党就相差无几了。

摘譯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1936年版第72頁。

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附带說一下，这是斯大林本人过去从未說明过或提出过任何根据的一种“理論”)現在变成了一种内容枯燥和非历史的观点：由于有国家的自然財富，在苏联国境内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此类推，你也可以断言，如果地球上只有現在人口的十二分之一，社会主义就能胜利。实际上，这种新理論的目的是要向社会意識灌輸一套更加具体的思想，这就是：革命已經彻底完成；社会矛盾将不断地緩和；富农将逐漸长入社会主义；整个发展与外部世界的事件无关，将保持和平的和計劃的性质。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16頁。

## 二、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

說“真正建成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階級”，“使国家消

亡”；农业的“高度工业化”，“克服城乡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超过资本主义的“最先进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在包括农业在内的各种生产过程电气化和化学化的基础上，建立在使现代尖端技术结合起来、普遍化并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基础上”。由于生产力是“世界性的”，单独一国“不能作为完备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地盘”；由于世界资产阶级还存在，因而不能使国家消亡。因此，一国范围内是无法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

同志们，这以前在这个问题上相当片面的争论倒也收了良好的效果，它促使斯大林比较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思想，从而暴露了自己立场的荒谬无稽。且看斯大林同志报告第一部分的最重要的地方，这里的荒谬无稽是白纸黑字明摆着的。斯大林同志说：

“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是否可能呢？……

如果用具体的阶级语言解释这一公式，建成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在斗争进程中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本国的资产阶级……（请注意这一思想！——托洛茨基注）因此，当人们说在苏联有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时，也就是想说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的资产阶级。在解决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课题时，问题就是如此，而且只能如此。

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①

这样说来这里的全部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战胜本国资产阶级、仿佛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解决就在于此。其实不然！建成社会主义的前提是消灭阶级、按社会主义方式组织全部生产和消费，以取代阶级社会。问题在于克服城乡之间的矛盾，这又要求农业

---

①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页。——编者注

本身的高度工业化。而这一切都要在资本主义依然包围的环境下进行。不能把这个问题和仅仅对国内资产阶级的胜利等同起来。

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对“社会主义胜利”的理解各有不同。例如，当谈到西欧时，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写道，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可能夺取政权，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然后向其他国家资产阶级交战。他这里说的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近年来已经获得的：工厂已经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采取了必要的步骤由国家负担费用来保证生产，从而使人民能够生活、建设、保卫自己抵抗资产阶级国家等等。这也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也是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只不过是最初的而已。然而从这里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还远得很。因为，重复一遍，**真正建成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然后并使国家消亡。**而斯大林同志居然说，我们只要战胜国内的资产阶级，就能保证在我国建成这种完全意义的社会主义。可是，同志们，我们需要国家和军队反对外来的敌人。可见，只要还有世界资产阶级，这个因素就总是要保留的。此外，能不能设想，在欧洲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我们就能仅仅依靠国内的经济与文化资源，使无产阶级和农民溶和在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中？上面说过，为此我们就必须大力提高技术，这首先要增加粮食的出口和机器的进口。机器在世界资产阶级手中，它又是我国粮食和原料的买主。世界资产阶级暂时还操纵着世界价格，因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就得依赖它并同它作斗争。为了消除这种依赖，战胜本国资产阶级是决不够的，因为这里问题不是在政治上镇压资产阶级，政治上我们早在一九一七年就在我国把它推翻了，问题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即在向世界资产阶级作斗争（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斗争）中建成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只有使这个孤立并且暂时还是非常落后的国家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更为强大才行。因为，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需的不是一年，不是十年，甚

至也不是二十年，而是好几十年，所以只有使我国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生产力才能达到这一点。所以問題不是民族的无产阶级反对民族的资产阶级，而是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作殊死的斗争。問題只应该这样提。

摘釋自《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  
(1926年12月)，載于《真理报》1926年12月14日第  
289号第2—3版。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此起彼伏的，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也是時間不一的、不平衡的、此起彼伏的；由于各国的相互依賴是极为紧密的，所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也是不可能的。

讓我們从这个角度再一次比較仔細地看看綱領本文是怎样說的。我們已經在导言中看到这样一句話：

“帝国主义……使世界經濟生产力的增长和民族国家的壁障之間的矛盾加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我們已經說过，这个論点是——毋宁說原来打算成为——国际綱領的基础。但是，正是这个論点先天地把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作为一种反动理論而排斥、拒絕和拋到一边去了，因为这种理論不仅和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且和这一发展已經取得的物质成果是互相对立的，不可調和的。生产力和国家疆界是不相容的。結果不仅带来了对外貿易、人力和資本的輸出、强占領土、殖民政策和上次帝国主义战争，而且使建立一个自給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在經濟上成为不可能的事。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早已打破国家疆界。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最先进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在包括农业在內的各种生产过程电气化和化学化的基础上，建立在使現代尖端技术結合起来、普遍化并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基础上。从馬克思开始，我們不断重复指出资本主义不

能适应它自己带来的新技术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撕破了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外皮，而且正如一九一四年战争所表明的那样，打破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国界的铁箍。然而社会主义不仅必须把资本主义最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接收过来，而且必须立刻推动生产力的进步，把生产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使生产力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未达到的发展状况。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如此，社会主义怎么能够把生产力赶回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曾经猛烈企图冲破的民族国家的疆界中去呢？或者说，是否我们应当放弃使国家疆界从而也使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的疆界显得过分狭隘的、让生产力“肆意”发展的想法，而局限于——譬如说——受约束的、驯服的生产力即经济落后的技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在许多工业部门我们现在就应当立即停止前进，而且逐渐降低到甚至比我们目前这样可怜的技术水平更低的水平去，因为目前的水平曾经使资产阶级的俄国和世界经济结成不可分离的纽带，使俄国卷入帝国主义为了扩张领土、使已经突破国家疆界的生产力获得新的领域的战争漩涡中去。

在继承和恢复这些生产力以后，工人国家就不得不开展进出口贸易。

摘译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纽约1936年版第51—53页。

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而进行的有计划的、和谐的社会生产的组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还不是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它在法律上的先决条件而已。社会主义社会问题不能同生产力问题分开，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生产力实质上是世界性的。单独一个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已经变得过分狭小，因此更加不能作为完备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地盘。此外，一个革命国家的落后条件还增加它被人拉回到资本主义去的危险。布尔什维克在拒绝孤立的社

会主义发展前途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机械地孤立开来的武装干涉问题，而是与社会主义的国际经济基础有关的问题之总和。

摘译自《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1932年)，载于《俄国革命史》伦敦1936年版第1237页。

### 三、关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1. 声称“企图把个别国家从世界经济整体的联系和相互依属中抽出来，从而去看个别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命运，这是根本错误的；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是完全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

目前的结论是，我所说的由于落后所产生的内部矛盾必须在国际革命中得到解决的观点，并不是我的特殊观点，伊里奇也不止一次地，并且是更尖锐和坚决地表达过同一个观点。

有人对我们说，这在似乎还未发现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时代，即在帝国主义以前的时代是正确的。对于这点我不能详细谈。但是遗憾的是，应当说，斯大林同志陷入了最严重的理论上和历史上的错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要比帝国主义老一些。此其一。没有疑问，资本主义在一切国家就是现在也是发展得极不平衡的，但在十九世纪这种不平衡要比在二十世纪更加厉害。当时，英国是世界的霸主，而例如日本，根据我们上一代的记忆，曾是一个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封建等级国家。在我国农奴制废除的同时，日本开始加入资本主义文明世界。中国在酣睡，等等。在这个时期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要更加尖锐，更加深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不平衡性知道得不比我们差。正因为金融资本是最活跃和灵活的资本形态，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使

“均衡的”趋势比金融資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更为加强了。現在仍然保持着发展的巨大不平衡性，这是无容爭辯的。但如果說在过去，在十九世紀，在帝国主义以前，資本主义发展得較為平衡，因而說什么当时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是不正确的，而現在，当帝国主义增加了发展的不同形态，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就是正确的了，——不，这是說不通的，这和全部历史經驗相矛盾，这完全顛倒事实，應該寻找别的更有份量的論据。

摘譯自《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发言》（1926年11月1日），載于《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速記記錄）》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524頁。

同志們，这个理論的前提是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斯大林指責我不承认或不完全承认这个規律。其实不然！不平衡发展的規律并不是帝国主义的規律，这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規律。資本主义在其初期的发展大大加深了不同民族在經濟和文化发展水平上的悬殊；帝国主义的发展，即資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并没有扩大这种水平的悬殊，相反地，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助长了水平的均衡化。这种均衡化从来不会是比较完全的。发展速度的差异将一再破坏均衡化，这就使得稳定在一定水平上的帝国主义成为根本不可能的事。列宁把不平衡总的归結为两点：第一，速度；第二，不同国家經濟和文化发展的水平。由于問題牵涉到速度，帝国主义在这里使不平衡发展到极高的程度；而由于問題牵涉到不同資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所以这里速度的悬殊引起一定的均衡化趋势。誰不懂得这点，他就是不懂得这全部問題的根本点。且拿英国和印度來說。印度某些部分的資本主义发展，比英国最初的資本主义发展要快得多。但是英国和印度的差別，經濟上的距离現在比五十年前要大些还是小些呢？小些。再以加拿大、南美、南非为一

方，英国为另一方为例。加拿大、南美、南非近一个时期的发展以疯狂的速度进行着。英国的“发展”则是停滞，甚至下降。因此，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不平衡些。在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方面，彼此比三十年或五十年前更加接近。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很重要的结论。正由于某些落后国家最近一个时期的发展速度是急剧的，而某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却延缓甚至倒退，正是这种事实使得考茨基关于按计划组织起来的超帝国主义的假设完全不可能实现，同时因为不同的国家在水平上彼此接近（当然决不会达到平衡），它们就发生了同样的要求（销售市场、原料等等）、同一类型的竞争。正因为如此，战争的危險才越来越尖锐，而战争本身也必然具有庞大的规模。但是也正是这一点才保证和加深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质。

同志们，世界经济并非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近二、三十年来由于落后国家和整个整个大陆加速发展而日益确立起来的现实。这是一个根本事实，正因为如此，企图把个别国家从世界经济整体的联系和相互依属中抽出来，从而去看个别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命运，这是根本错误的。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是完全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

帝国主义大战是什么？是生产力暴动，它不仅反对资产阶级所有制形式，而且反对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帝国主义大战意味着下列事实，民族国家的范围对于生产力已狭小到难以容忍的程度。我们总是肯定说，资本主义不能掌握它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容纳超出了资本主义国家范围而成为更发达的经济整体的生产力。退回到孤立的国家去是走不通的。

摘译自《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1926年12月），载于《真理报》1926年12月14日第289号。



2. 說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能比先进国家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要比他們晚进入社会主义,換句話說,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夺得政权要比落后国家困难得多,但是他們夺得政权以后,不仅会“超过”落后国家,而且“会带动”落后国家“走向以最高的世界技术和国际分工为基础的真正社会主义建設”。

……你們就会毫不犹豫地承认,我和你們一同认为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对于这个国家是否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問題,我已經在許多引文中作了回答。如果你們問,国内有沒有足够的力量和資金,以便不管全世界将发生什么,在三十年或五十年內把建成社会主义的事业进行到底,那我要說,問題的提法本身就是根本不正确的。我們有足够的資金向前推进社会主义建設,从而帮助世界革命无产阶级,而世界无产阶级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內夺得政权的机会决不比我們建成社会主义的机会少;机会决不更少,而是更多!

同志們! 請問,當我們建設社会主义时,欧洲会发生什么事件呢(而且这是基本点,是整个問題的中心)? 你們說:不管在这段期間在全世界发生什么事件,我們将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好的。我們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多少時間? 伊里奇认为,二十年內我們無論如何建不成社会主义,由于我們农民国家的落后,就是三十年內也建不成。姑且以三十——五十年作为最低标准。那末請問,这一时期內欧洲会发生什么事件呢? 我不能預測欧洲的情形,也不能預測我国的情形。这里可能有几种前景。如果你們說,三十——五十年內欧洲无产阶级自然会夺得政权,那时也就什么問題也沒有了,因为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在最近十——二十——三十年內取得政权,那末社会主义的障地在我国和在国际范围都是有保

证的。

摘譯自《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发言》(1926年11月1日),載于《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速記記錄)》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531頁。

“帝国主义陣綫在其最薄弱的环节上,即在沙皇俄国(被一九一七年革命)冲破了。”(着重号是我們加的。)

这是列宁的光輝的公式。它的意思是說,俄国是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最落后、經濟上最薄弱的国家。正因为如此,它的統治階級才第一个垮台,因为他們使这个国家的不足的生产力承受了不堪忍受的負担。不平衡的、間歇的发展就这样迫使这个最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第一个夺取了政权。从前我們受到的教誨是:恰恰由于这个理由,“最薄弱的环节”的工人階級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相比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难最大;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将比較困难,但是当他們在我們还远未克服落后状态的时候夺得政权以后,他們将不仅超过我們,而且还会带动我們走向以最高的世界技术和国际分工为基础的真正社会主义建設。

摘譯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紐約1936年版第56頁。

产生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是不相同的,不相似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相对立的。俄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取得政权的事实,决不意味着它将第一个走到社会主义。引起了十月革命的那种矛盾的发展不平衡状态,并没有随着十月革命成功而消失。它恰恰是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基础。

.....

历史上各时代的文化水平各不相同。要超越过去,是需要时

間的，但是不需几百年，只需几十年就够了。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上說：“我們的下一代会更发达一些，但也不見得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sup>①</sup>約两年之后，在农业公社的代表大会上，他把期限推迟得更远了：“我們現在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劳动制，希望我們的儿子也許孙子能够把这种制度建成也就好了。”<sup>②</sup>俄国工人比其他国家工人动身得要早，但却要比他們晚点到达目的地。这并不是悲观主义，而是历史的现实主义。

摘譯自《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1932年），載于《俄国革命史》伦敦1936年版第1239—1240頁。

十一月八日，列宁在苏維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說：“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內的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們还不能把俄国列为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sup>③</sup>列宁不仅否认俄国有权利建設自己的社会主义，而且明确地指定俄国在与其他国家一起建設的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只占次等的地位。把我国搞得“威信扫地”，这是多大的罪过呀！

同上。

发言人在代表大会上解释共产主义青年团新团綱的必要性时这样說：“旧团綱中有一个非常錯誤的反列宁主义的說法，即俄国‘只有通过世界无产階級革命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团綱上的这个观点是根本錯誤的。它反映了托洛茨基主义观点。”而这正是斯大林到一九二四年四月还在保卫的观点。除此以外，还有一点一直得不到解释，即一九二一年由布哈林起草而在列宁参加下由政治局慎重通过的一个团綱，十五年以后怎么会变成“托洛茨基主义”，并且必須修改成完全相反的意思！但是，合乎邏輯的辯論对利益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頁。——編者注

② 同上，第30卷第175頁。——編者注

③ 同上，第28卷第134頁。——編者注

攸关的問題是无能为力的。官僚既然摆脱本国无产阶级而赢得了独立，它就不能承认苏联必须依靠世界无产阶级。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已经使技术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之间的矛盾粉碎了世界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是第一个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破产付出代价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是由联合发展的规律来加以补充的。俄国资产阶级的崩溃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使一个落后的国家跳到先进国家前面去了。然而，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同不相称的技术和文化水平发生了抵触。十月革命本身是高度的世界生产力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的产品，而它自己却产生了低下的民族生产力和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19页。

#### 四、关于国际分工

1. 声称世界经济“不是各民族部分的总和”，而是“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所形成的强有力而独立的现实”。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世界分工才能得到最高度的发展，“世界范围的分工超出于单独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上，而且用命令的方式指出它前进的道路”。断言“如果要在民族范围内孤立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经济各部门的均衡”，就是“把生产力拉回到甚至比资本主义还落后的境地”，就是“追求一种反动的乌托邦”。孤立地建设，虽能取得暂时的成就，但“总不能达到一个和谐的新社会的高度”，只是“在‘贫困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

在《和平綱領》中一再重复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民族范围内胜利完成的論断，在某些讀者看来也許已被我們苏維埃共和国将近五年的經驗推翻了。但这样的結論是沒有根据的。工人的国家在一国而且是在落后的一国抗住了全世界，这个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有雄伟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比較先进、比較文明的国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迹来的。可是，我們虽然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們並沒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这个时期为革命一国家的自卫而进行的斗争使生产力大为下降；而只有在生产力发达和繁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可以想象的。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的貿易談判、租让、热那亚會議等等，都是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极其鮮明的证据。当其余的欧洲国家还是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的时候，我們为了打破經濟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設法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協議；同时可以确信地說：这种協議至多只能帮助我們治愈某些經濟創伤，获得某些进展，可是俄国社会主义經濟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

摘譯自《〈和平綱領〉跋》(1922年)，載于《战争与革命》第2卷莫斯科1925年版第502—503頁。

根据以上所說，不难理解，对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提法应当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就得出了結論，认为不平衡的即此起彼伏的历史发展使无产阶级革命要延續整整一个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各个民族将相继卷入革命的洪流；而另一方面，向国际分工发展的各国之間的有机的相互依賴关系排除了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就是說，在帝国主义已經发展了、加深了和加剧了这两种对立的趋势的現代，断言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民族的基础上开始、然而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

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已經变得加倍地甚至三倍地真实，現在則更是如此。在这一点上，列宁只是发展了馬克思自己的提法和馬克思为这个問題提供的答案，使它們具体化了。

摘譯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1936年版第22頁。

以資本主义的尺度来衡量，工业取得了、并且不断取得惊人的成就。而农业在这几年中的发展就慢得多了，但无疑在上升。我們同时注意到一种完全反常的現象：尽管就整体來說經濟在发展，市場上商品严重匱乏的現象却年复一年地沒有改变，甚至在某些时期危机达到严重的程度。尽管工业在高速前进，但必要的工业品都缺乏。尽管这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产品的不足却使人感到实在无法忍受。

这些矛盾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原因有两类。

一个經濟落后的国家，勉强地首先实行无产階級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設，这种客观形势是主要原因。領導受到小資產阶级的影响，执行了錯誤的政策，不能及时地认清形势和合理地使用专政的經濟和政治手段，这是次要的原因。

摘譯自《十月革命十二周年》(1929年  
10月17日)，載于《托洛茨基文选》第1  
卷巴黎1955年版第73頁。

首先，讓我們回忆一下，一国社会主义理論是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秋天首先提出来的，这个理論不仅同馬克思主义的所有传统和列宁学派完全矛盾，而且甚至同斯大林本人在同年春天所写的东西完全矛盾。从原則的观点来看，斯大林“学派”在社会主义建設这一問題上背离馬克思主义的意义和严重性，并不亚于，例如，一九一四年秋天即斯大林轉变以前整整十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战争和爱国主义的問題上同馬克思主义的决裂。这一对比，从

性质上說，完全不是偶然的。斯大林的“錯誤”，同正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錯誤”一样，也是民族社会主义。

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經濟并不是各民族部分的总和，而是一种由国际分工和在我们这个时代中专横地統治着民族市場的世界市場所形成的强有力而独立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早已发展得超过了民族界限。（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种事实的表現之一。在生产技术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必須代表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阶段。如果要在民族范围内孤立地建設社会主义社会，那末，不管暂时取得多少成就，都意味着把生产力拉回到甚至比资本主义还落后的境地。不顾构成世界統一体的一部分的国家发展在地理、文化的和历史方面的条件，而试图在一个民族范围内实现一种与外界隔絕的經濟各部門的均衡，那就意味着追求一种反动的烏托邦。如果这种理論的先驅和追随者还参加国际革命斗争（取得什么成就，是另外一个問題），那是因为作为不可救药的折衷主义者，他們把抽象的国际主义同反动的烏托邦民族社会主义机械地結合在一起了。这种折衷主义的最高表現就是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綱領。

摘譯自《〈不断革命〉美国版序言》（1930年3月29日），  
載于《不断革命》伦敦1962年版第22—23頁。

要想了解被十月革命喚醒而进入新生活的广闊的土地上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必須清楚地考虑到，除了最近由于經濟上取得的成就而重新出現的旧矛盾以外，还增加了一种新的最强有力的矛盾，这种矛盾就是苏联工业的集中性质和苏联經濟的孤立处境之間的矛盾；苏联工业的集中性质为空前的发展速度提供了可能性，苏联經濟的孤立处境則排除了正常利用世界經濟潛力的可能性。旧矛盾加上新矛盾就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令人感到痛苦的困难也产生了。这些困难最直接最强烈

地表现在这样一件每个工人和每个农民天天都感觉到的事实上，即劳苦群众的生活条件并没有随着经济的普遍增长而改善，而是由于粮食困难目前正在日益恶化。苏联经济的严重危机说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不适应于民族市场，只有在国际的规模上才能做到社会主义式的协调和一致。换句话说，苏联经济的危机不仅是成长期间产生的病症，一种初期的病态，而且表明了更加有意义得多的事情——即世界市场的严格控制，这个市场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从属于它，我们同它结合在一起，我们摆脱不了它。”（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同上，第30頁。

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中，未来社会的因素可以说是分散的。把这些因素汇集和互相结合起来，这便是构成总的世界革命的一系列的国家的任务。

列宁预先嘲笑了关于苏维埃经济自给自足性的观念。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他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个孤立的边沿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①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发出警告说：我们面临着“俄国和国际市场举行的考试，我们依靠这个市场，同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这是一次严格的考试，因为在这场考试中人家可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把我们打垮。”②

现在，共产国际竟然把社会主义经济依赖世界经济的这种思想，看成是“反革命的”。社会主义不能依赖资本主义！不肖徒辈聪明得忘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以世界分工为基础的，这种分工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得到最高度的发展。一个孤立的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447頁。——編者注

② 同上，第33卷第243頁。——編者注



工人国家内的经济建设，无论其本身如何重要，终究是残缺的、狭隘的和矛盾的，它总不能达到一个和谐的新社会的高度。

摘译自《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1932年)，载于《俄国革命史》伦敦1936年版第1240—1241页。

事实上，目前苏维埃经济的增长仍然是一个对立过程。经济的成就虽然加强工人国家，但决不自动地导致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相反地，它们正在准备孤立的社会主义结构的种种矛盾在更高的水平上的尖锐化。同过去一样，农村的俄国需要一个与城市的欧洲共同的工业计划。世界范围的分工超出于单独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上，而且用命令的方式指出它前进的道路。十月革命没有把俄国排除于人类其他部分发展之外，反而使俄国同他们更密切地联系起来。俄国既不是未开化之邦，但也还不是社会主义乐土。它是我们这个过渡时代的过渡性最强的国家。“俄国革命只不过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世界经济的现状使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资本主义离无产阶级革命，比苏联离社会主义要近得多。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命运，是同西方和东方解放运动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同上，第1257页。

左翼反对派在一九二七年三月秘密散发的一个文件中写道：社会主义必须在一切领域不可避免地“超过”资本主义，“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同一般资本主义的关系的问题，而是苏联的经济发展同德国、英国和美国比较的问题。怎样理解‘最短历史时期’这几个字呢？一系列的五年计划将使我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的水平。在这个时期内，资本主义世界将发生什么变化呢？……如果你们承认资本主义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有重新繁荣的可能，那末，谈论在我们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可怜的

廢話。這樣，也就有必要說：我們過去把整個時代估計為一個資本主義腐朽的時代是錯誤的。這樣，蘇維埃共和國也將證明，它是巴黎公社以來在無產階級專政方面的第二次試驗，雖然更廣泛，更富有成就，但畢竟是一次試驗……然而，對於我們的整個時代，對於十月革命是國際革命的一個環節的意義，有沒有任何嚴肅的理由進行這樣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重新考慮呢？沒有！……在資本主義國家或多或少比較完全地度過其恢復時期〔戰後〕的時候，……它們也在日益復活，而且正在以無比尖銳的形式恢復戰前一切舊的國內矛盾和國際矛盾。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基礎。我們正在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事實。然而更大的、一點也不小的事實——因為一般說來，全局總是大于局部——是歐洲的和世界的革命都在準備中。局部只有同全局結合在一起才能取得勝利。……歐洲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所需要的時間，遠比我們在技術上趕上歐美所需要的時間短得多……同時我們還必須有系統地縮短我國的勞動生產率同世界其他部分的勞動生產率之間的差距。我們愈向前進，可能遭到廉價商品干涉並進而遭到武裝干涉的危險就愈小……我們把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水平提得越高，我們就越能真正加速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而這種革命就能更快地把世界技術供給我們，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就能作為歐洲和世界建設的一部分而更真實地向前邁進。”這個文件象其他文件一樣，一直沒有得到回答——除非是把開除出黨和逮捕當作對它的回答。

烏龜速度的想法放棄以後，與此有關的富農長入社會主義的想法也必須否定了。然而，用行政手段消滅富農的作法卻給予一國社會主義理論提供了新的論據。一旦階級“基本上”被消滅了，那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基本上”建成了（一九三一年）。從本質上說，這個公式恢復了在“貧困的基礎”上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概念。我們記得，在那些日子裡，有一位官方記者解釋說，嬰兒沒有牛奶

喝是由于缺少奶牛，而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缺点。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17—218页。

2. 說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敌对社会制度的勝負取决于“两个制度間劳动生产率的对比”。认为“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就取决于速度”，由于苏联在物质上“依賴”世界經濟，“受着世界市場的相对监督”，苏联的发展速度是由“整个世界发展”予以規定的，“全部建設受着国际的制約”。“閉关自守、自給自足的經濟”“必然以降低发展水平和速度为代价”。

我肯定，如果沒有两个国际条件，世界上就不会有我們所理解的我們的革命：第一，金融資本，它猛烈地推动了我們的經濟发展；第二，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論概括——馬克思主义，它推动了我們无产階級的斗争。在一九一七年以前，革命是通过伟大世界力量的相互作用而准备起来的，十月革命就是通过这种相互作用，經過世界大战而产生的，現在却有人對我們說：“撇开”国际环境，在我們家里來建設社会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种态度是形而上学的。决不可能撇开国际环境。什么是出口？内部事务还是国际事务？要在国内收集出口的产品，这仿佛是内部的事务，但是要輸出国外，这好象是国际事务吧。（笑声）

而什么是进口？进口好象是国际事务，因为要到国外去购买商品，但輸入国内却象是内部事务。（笑声）請看，布哈林同志建議“撇开”国际环境的全部理論在进口与出口的問題上立刻破綻百出。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就取决于速度，而我国經濟发展的速度現在却最直接、最尖銳地由輸入原料和装备所决定。固然，可以

“撇开”外汇不足的情况并订购大量棉花和机器，但这只能来一次，下一次就不能再“撇开”了。（笑声）**我們全部建設受着国际的制約。**

摘譯自《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发言》(1926年11月1日)，載于《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速記記錄)》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530—531頁。

……如果旧俄国家是一个孑然独存的国家，如果俄国站在世界发展的旁边，站在帝国主义旁边，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旁边，如果俄国既沒有金融資本在本国經濟中的統治，也沒有馬克思主义在本国无产阶级先鋒队中的精神統治，它就决不能“凭自己的力量”如此迅速地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如果以为当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以后，它能够象一掀电鈕关上电灯一样使一个国家脱离世界经济，那是根本錯誤的。

社会主义的前提是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这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杠杆。希望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点。我們自問，我国工厂的技术装备如何？根据这一問題的专家瓦尔查尔的統計，战前我国工业的装备有63%是进口的机器。只有三分之一的装备是国产貨，而且这三分之一都是极簡單的机器，因为比較复杂的和最重要的机器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因此，**如果你們察看一下我国工厂的技术装备，你們就会亲眼看見俄国以及苏联在物质上对世界經濟的依賴。**誰要是不注意問題的这方面，誰要是議論這個問題而把它的經濟技术基础和世界經濟政治关系撇开不談，他就必然会成为赤裸裸的抽象概念和断章取义的引文的俘虏。

近十年来，我們几乎沒有更換我国工业的固定資本。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我們根本沒有从国外輸入机器。显然，这种情况就使得某些人认为我国工业的技术装备属于我国的天然財富，仿佛今后可以在这种“自然的”基础上孤立地繼續建設社会主

义，直至完全建成。但这是幻想。我們現在处在所謂恢复时期的終点。我們接近了战前水平。但是恢复时期的終点同时也就是恢复我們和世界經濟的物质联系的始点。我們應該更新現在經歷着危机的固定資本。誰要是以为今后几年我們就能够自己制造全部或大部分装备，他就是一个幻想家。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重要任务提出的国家工业化，意味着在最近时期和相当长的时期中不是减少，反而是增加我們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从而也意味着增加我們对世界市場、对資本主义、对它的技术和經濟的依賴（当然是互相的依賴），并意味着加强向世界資產階級作斗争。这就是說，不能把我国建設社会主义的問題和这一时期資本主义經濟变化的問題割裂开来。这两个問題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如果有人對我們說：“可是，亲爱的朋友們，你們自己可以制造机器”，那我就要回答：“当然，如果整个資本主义世界今天就垮台，那我們在一、二十年后就能制造出比今天多得多的机器。”如果我們想离开实在的資本主义世界而“隱居”，如果我們提出任务要就在最近時間內凭自己的双手制造出全部机器或至少是最重要的机器，就是說，如果我們企图忽視世界經濟中的分工，并跳过造成我国現有工业这种状况的先前的經濟历史，总之，如果我們走上前面提到的“社会主义的”門罗主义而一切靠自己的双手制造的話，这就必然会大大减低我們經濟发展的速度。因为极其自然，拒絕利用世界市場来弥补我国装备的漏洞，就会使我們自身的发展慢得惊人。而发展的速度是一个决定因素，因为地球上到底不止我們这些人，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暂时还只存在于新聞記者和決議起草人的幻想之中。实际上我們的社会主义国家总是（直接或間接地）受着世界市場的相对监督。这是問題的根本所在。发展速度不能任意規定。这是由整个世界发展給我們規定的，因为世界經濟处于最高一級的地位监督着自己的每一个部分，即使这个部分处

在无产階級专政之下并建設着社会主义。

为了使我国工业化，我們需要輸入机器。而农民需要輸出粮食及其他产品。如果我們不輸出，我們就不能輸入。另一方面，国内市場不能吞納全部农产品。因此，**無論农民的需要或工业的需要都把我們重新納入世界經濟，我們和世界經濟的联系，也就是說斗争将与时俱增。我們越来越走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孤立地位，而納入世界經濟联系和相互依从的体系中。而誰如果談論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而忽視我国經濟与世界資本主义經濟“合作”和斗争的事实，他就是在搞赤裸裸的形而上学。**

摘譯自《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1926年12月），載于《真理报》1926年12月14日第289号第2版。

**在两个不可調和的敌对社会制度——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未来长期的斗争中，最終說來，勝負决定于两个制度間劳动生产率的对比。而这在市場条件下，可以用我国国内价格同世界价格的对比来衡量。列宁在他最后的一些講話中有一次曾警告党說：即将到来的“考試”“是俄国和国际市場举行的‘考試’，我們依靠这个市場，同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sup>①</sup>当时他心中考虑到的就是这个根本事实。因此，布哈林关于我們可以用任何速度，甚至“龟行”的速度走到社会主义的观点，不过是小資产階級的廢話。**

**我們不能在閉关自守的經濟的掩护下躲开資本主义包围。正因为閉关自守，这样一种經濟就将不得不以极端緩慢的速度前进，于是就必将遇到不是削弱了的而是加强了的压力，这压力不仅来自資本主义的軍隊和舰队（“干涉”），而且首先来自資本主义的低**

---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43頁。——編者注

廉商品。

当资本主义国家拥有较高的技术时，对外贸易垄断制是社会主义存在下去的必要武器。但是，目前处在建设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只有在技术、生产成本、产品质量和价格问题上逐渐接近世界经济水平，才能保持这种垄断。经济领导方面的目标不应该是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经济，这种经济必然以降低发展水平和速度为代价。正相反，它的目标应该用最大限度加快速度的方法，达到我们在世界体系中的比重的全面增长。

为此：（一）必须了解我们出口的重大意义，目前，出口落后于我国工业的总发展，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苏联在世界商业交易量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以一九一三年的4.22%减少到一九二六年的0.97%。）（二）尤其必须改变我们对富农的政策，这项政策使富农可以囤积原料牟取暴利而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出口。（三）必须全面加速我国经济的工业化和加强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而不是资本主义成分），来发展我们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在最近将来不应该分散我们有限的积累，而应该通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把它逐步投入一种新的生产，这种生产首先要保证大量生产最必需和最有用的机器；我们应该有计划地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技术成就，周密而灵活地用这些成就来补充和刺激我们自己的工业。

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孤立发展社会主义上面，寄托在一种脱离世界经济的速度上面，这样就破坏了我们的整个前途。这样就使得计划领导机关离开了正轨，并且提供不出正确的方针以调整我们同世界经济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决定什么应由自己生产，什么应从国外输入。坚决抛弃孤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这意味着在很少几年的过程内我们的资源将得到无比迅速的利用，更快地工业化，我们自己的机器生产将更加有计划和有力地增长。这意味着就业工人数量的更快增加和物价的真正降低——一句

話，处在資本主义包围中的苏联得到了真正的加强。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4—56頁。

資本主义世界通过它的进出口数字告訴我們：除了軍事干涉以外，它还拥有其他的說服工具。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制度的生产率在市場上是通过价格的相互关系予以衡量的。就这个意义來說，苏維埃經濟所面临的最巨大、最直接的威胁也許并不是軍事干涉，而是更廉价的資本主义商品的干涉。单单这个事实就說明：問題决不仅仅是对“本国”資產階級取得孤立的經濟胜利：“世界各国行将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决不会只是一个无产階級战胜本国資產階級的事情。”<sup>①</sup> 这里涉及到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两种社会制度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一种社会制度还是刚刚开始落在落后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建設，而另一种社会制度今天仍然有大得无可衡量的生产力作为依据。

如果任何人认为承认我們依賴世界市場（列宁直率地談到过我們对世界市場的依靠）是一种“悲观”的表现，那就說明他自己在世界市場面前表现了土里土气的小資產階級的胆怯，說明他这种沒有見過世面的乐观——希望离开世界經濟，躲到一丛小树后面去設法用自己的資源敷衍一下——是极为可伶的。

摘譯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1936年版第47—48頁。

就任何一个具体国家独立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还是不可能”的問題作出决定，甚至只是提出這個問題，也是同样不能容許的。這個問題决定于两种制度、两个世界階級之間的斗争的发展进程；而在这个斗争中，無論我們在恢复时期增长系数是多高，一个无可

---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6頁。——編者注



爭辯的基本事实仍然是：

“如果就国际范围的資本來說，那末它現在不但在軍事上，而且在經濟上仍比苏維埃政权强大。应当从这一基本情况出发，而且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記这一点。”<sup>①</sup>

不同发展速度的相互关系問題仍然是一个尚待解決的問題。它不仅决定于我們是否能够达到“結合”，保证粮食的征收和增加进出口；換句話說，它不仅决定于我們国内的胜利——当然，这些胜利在这场斗争中是极其重要的因素——，而且决定于世界資本主义的命运，决定于世界資本主义是停滞、上升还是崩潰，也就是說，决定于世界經濟和世界革命的发展。因此，这个問題不是在国家范围内、而是在世界經濟政治斗争的范围内加以解决。

同上，第 50—51 頁。

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問題是在一九二三年开始的两种傾向的斗争过程中提出的。从理論上說，这个問題和国内国际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官方领导集团受到以取自资产阶级的現成資本作为基础而实现的恢复时期（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幻象的欺騙，越来越朝着以孤立发展經濟本身作为目标的立場滑下去。而正是在这种最严重的錯誤的基础上，由于国际上的失敗的打击，后来就出現了仅仅一个国家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論。正是在恢复时期結束，从而使和世界經濟保持联系的需要日益迫切的时候，和世界經濟断絕联系的理論却得到了宣揚。

我們的經濟发展速度問題根本不是官方领导集团提出来的。这个领导集团絲毫也不理解苏联經濟受到世界市場更加严格的节制，其程度和苏联經濟不得不通过进出口貿易和这个市場保持联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 30 卷第 463 頁。《列宁全集》无着重点，在“苏維埃政权”后面还有“和苏維埃制度”等字。——編者注

系的程度是一致的。

当我们坚持不懈地指出**苏联建设的速度以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为条件**的时候，官方路线的指导者和鼓舞者回答我们说：“没有必要把国际因素塞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中来”（斯大林），另一方面又说：“即使用蜗牛的速度我们也要建设社会主义”（布哈林）。如果人们敢于把这种思想按照逻辑引导到它的结论，即“没有必要把国际因素塞到”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中去，那末人们就会发现它的意思不过是说没有必要把共产国际“塞到”（德国的）十月革命的命运中去，因为共产国际正是“国际因素”的革命表现，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但是，问题在于中派主义对自己的思想是从来不彻底追究的。

速度问题显然不仅在经济中、而且特别在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中，都具有带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如果说在国内问题上我们之所以迟缓是因为对经济采取了错误的态度，是因为害怕往前走得太远，所以使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慢，那末在国际革命问题上则刚刚相反，在这方面，速度之所以一贯降低是因为中派主义不能充分估计革命形势，不能在关键时刻利用这种形势。

同上，第 253—254 页。

如果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为自己制订一个现实主义的纲领，那就不可能为自己规定脱离世界经济而“独立”的目标，尤其不可能为自己规定“在最短的时期内”建设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任务并不是要达到抽象的最高速度，而是达到最适宜的，也就是根据国内和世界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最好的速度，这种速度可以加强无产阶级的阵地，准备未来的国际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因素，同时首先有步骤地提高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和加强无产阶级同农村非剥削群众的联盟。这个前景应当适用于整个准备时期，这

就是說，一直到先进国家的革命取得胜利，把苏联从目前的孤立处境中解放出来为止。

摘譯自《〈不断革命〉美国版序言》(1930年3月29日)，  
載于《不断革命》伦敦1962年版第32頁。

說到底，苏联发展的一切矛盾就这样导致了孤立的工人国家同資本主义对它的包围之間的矛盾。由于不可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建設自給自足的社会主义經濟，就使社会主义建設的基本矛盾每到一个新阶段都要以更大的規模和更大的深度重新出現。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世界其他部分的資本主义政权表明自己能够維持另一个漫长的历史时代的話，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破坏。但是，只有那些相信資本主义是牢固的或长命的人才能认为这种前途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哪怕是最可能的。左翼反对派与这种資本主义的乐观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但它也同样不能同意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这个理論是向資本主义的乐观主义投降的表現。

摘譯自《苏联的发展問題》(1931年)，  
紐約1931年版第9—10頁。

3. 对外貿易垄断制使苏联“脱离国际分工”，“与世界經濟隔絕”，从而使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成为“不可能”。“假如在其他国家也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对外貿易垄断制当然就不需要了；苏联就可以以較資产阶级俄国有利得多的条件，从較发达的国家取得自己缺少的产品。”

……毫無疑問，任何一个領導，即使是最正确和最明智的領導，假如由于实行对外貿易垄断而使其国家与世界經濟隔絕，都不可能使苏联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推迟几十年，苏維埃共和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注定要垮台，

或者純粹是經不住經濟矛盾的壓力，或者由于軍事干涉而消亡。用政治術語來講，這就是說，蘇維埃共和國的命運，在我們前面說過的一般條件下，既取決于對國內的經濟領導，又取決于對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領導。總之，恰恰是後一因素才能解決一切。

摘譯自《十月革命十二周年》（1929年10月17日），  
載于《托洛茨基文選》第1卷巴黎1955年版第75頁。

但是不要忘記，對外貿易壟斷制自然而然地使俄國脫離國際分工，脫離資本主義演變賴以完成的基礎。其直接後果是就整體來說經濟在增長，而對外貿易卻大量縮減。因此，迅速發展用于工業化的資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蘇維埃共和國必須生產一切原來資產階級俄國以遠為有利的條件從國外取得的物品。假如在其他國家也存在着社會主義制度，對外貿易壟斷制當然就不需要了；蘇聯就可以以較資產階級俄國有利得多的條件，從較發達的國家取得自己缺少的產品。

摘譯自《十月革命十二周年》（1929年10月17日），  
載于《托洛茨基文選》第1卷巴黎1955年版第74頁。

4. 說“同農民的聯盟是蘇維埃政權的存在本身所必需的，但這不能代替國際革命”，用以“改造農村”的工業也得在“國境之外”去解決。

能不能設想，歐洲資本主義在三十一——五十年內將腐朽下去，而無產階級卻沒有能力完成革命？請問，為什麼我一定要接受這種只能稱之為對於歐洲無產階級抱着毫無根據的漆黑一團悲觀主義的前提，同時又得發揚對靠我國孤立無援的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的無批判的樂觀主義呢？我的共產黨員的理論或政治上的責任在什麼意義上使我必須接受這樣的前提：歐洲無產階級在四、五十年內奪取不到政權（如果奪得到政權，那末爭論的問題也就沒有了）。我肯定，我沒有任何理論或政治上的根據去設想，我們和農民一起

**建設社会主义会比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还容易些。**

**不，这里較大的成功的可能性完全是在欧洲无产阶级那一方面。**

摘譯自《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发言》（1926年11月1日），載于《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速記記錄）》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533頁。

不过，除了这个“最低限度的”方案之外，必須立即准备另一个更加长远的、不仅估計到国内資源而且估計到国外資源的方案。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决不比俄国农民真正集体化的前景的现实性更小。更确切地說，第二种前景只有同第一种前景联系起来才能成为现实。共产国际的官方领导执行着这样的政策，就好像我們处在欧洲无产阶级起义的前夕一样。同时，十至十五年的經濟計劃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制訂的，即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要把整个資本主义世界“远远抛在后面”。从反动的、空想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論产生出来的这种两重性，貫穿着共产国际的綱領和它所有的政策。沒有人知道日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說的：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毫無疑問将比在苏联消灭阶级更接近于这个日期。

摘譯自《世界失业問題和五年計劃》（1930年），科伦坡1952年英文版第2—3頁。

但是，苏联最剧烈的震动是由下列事实造成的，即目前的领导設法把迫不得已的事裝成心甘情愿的样子，他們从工人国家的政治孤立中制定出一个經濟上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綱領。这就导致試图在資本主义以前的农具的基础上把农民土地全盘社会主义集体化——一种最危险的冒险，这种冒险有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合作的可能性遭到破坏的危险。

摘譯自《〈不断革命〉美国版序言》（1930年3月29日），載于《不断革命》伦敦1962年版第31—32頁。

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写道：“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之后才有可能。”这些话竟然成了起诉书；然而当时它们却表达了全党的共同思想。一九一九年，列宁说过：“建设工作完全要看革命是否在欧洲最主要国家中迅速取得胜利。只有这个胜利之后，我们才能认真地抓建设事业。”<sup>①</sup>这些话不是说明对俄国革命缺乏信心，而是说明深信世界革命即将到来。而现在，当苏联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是在国际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的。这种说法仍然是正确的。

过去，党也是以同样的观点来观察农业集体化问题的。无产阶级若不通过一系列的过渡阶段引导农民到达社会主义，便不能建设新社会，因为农民在人口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在好多国家中占绝大部分——，而且在全世界也占很大的多数。一切问题当中的这个最困难的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依赖于工农业之间的量和质的对比关系。城市越是能够卓有成效地使农民的经济和文化繁荣起来，农民就会越自觉自愿地和成功地走上集体化道路。

然而，有没有足够的工业来改造农村呢？列宁又把这个问题推到了国境之外。他在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说道：“就世界范围来说，能够给全世界供给一切产品的发达的大工业是有的……这是我們估计的根据。”<sup>②</sup>俄国的工农业之间的对比关系比西方国家的要不相适应得多，这种关系至今仍是在某些时刻威胁着苏维埃制度的稳定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基础。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看出，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决不是以在一国之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念为基础的。惟有嘲弄苏维埃政权的孟什维克才把这样的计划算在它的账上。在布尔什维克看

① 没有查到列宁的原文。——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29—130页。——编者注

来，因經濟破坏和內战而不得不实行的斯巴达式制度的未来命运，直接依赖于西方革命的发展。一九一九年一月，正值战时共产主义处在高潮的时候，列宁說道：“我們还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共产主义粮食政策的原則，并把这些原則坚决贯彻下去，直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sup>①</sup>那时列宁和全党都錯了。后来我們不得不修改粮食政策。現在我們可以断定，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头两三年內欧洲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俄国要沿着新經濟政策的道路后退仍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如果回顾一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初阶段，我們就很清楚地看到：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及其幻想，同不断革命的前途是多么紧密地互相交織在一起。

三年內战結束时所发生的深刻的內部危机，包含着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間、党和无产阶级之間有发生直接破裂的危險。从根本上重新审查苏維埃政权所采用的方法，就成为必要的了。列宁解释說：“我們必須在經濟上滿足中农，实行周轉自由，否則，在国际革命延緩的情况下，在俄国要保持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sup>②</sup>。但是，在采取新經濟政策时，国内任务和 international 任务之間的联系会不会根本破裂呢？

列宁在他的給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写的提綱中对那时正在开始的新阶段作了一个总的估計：“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的观点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要在实际上考驗和檢驗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sup>③</sup>他对新經濟政策的輪廓所下的定义本身就把一国社会主义問題一笔勾銷了。

在討論和草拟工业中的一些新方法那些日子里，列宁为自己

① 《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377 頁。——編者注

② 同上，第 32 卷第 214—215 頁。——編者注

③ 同上，第 444 頁。——編者注

所写的那些話，也具有同样的教育意义：“只要在十——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sup>①</sup>

目标确定了：这就是要使我们自己适应于一个新的更长的时期，这个时期是西方革命成熟所必需的。在这个意义上，而且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才表示确信：“新經濟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sup>②</sup>

說在这里国际革命的思想根本没有改变，还嫌不够；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思想表现得更加深刻更加清楚了：列宁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解释新經濟政策的历史地位时說，“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有在几十年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只有在这个阶级相当发展的国家里，才能够从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們在許許多多的著作中，在我們所有的讲演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都強調說，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則占絕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它的及时支持……

“另一个条件，就是……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間互相協議……

“……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同农民協議，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sup>③</sup> 問題的一切因素在这里都集合为一点。同农民的联盟是苏維埃政权的存在本身所必需的；但这不能代替国际革命，惟有国际革命能够創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經濟基础。

摘譯自《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1932年)，  
伦敦1936年版第1241—1243頁。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3頁。——編者注

② 同上，第33卷第401頁。——編者注

③ 同上，第32卷第203—204頁。——編者注



## 五、世界社会主义經濟

1. 声称“世界社会主义經濟决不是民族社会主义經濟的总和”，它只有“通过把单独国家的各种内部不协调交给許多国家来共同解决，通过各国間的互相服务以及經濟和文化的各个部門的相互补充，才能建立起来”，即“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建立起来”。“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要从世界范围的分工出发，使国际間的貨物交換和互相服务得到最高限度的发展。”攻击說，斯大林所指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不是一种建立在国际分工之上的世界社会主义經濟，而是一种体现着极乐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給自足的社会主义公社的联盟”。

要是我們把“社会主义的胜利”这几个字解释为仅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种說法，那末我們就会得出一个任何人不能反駁的一般結論，虽然这个結論的表述應該不是那样模稜两可。但是这不是網領作者們所想的。他們所說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仅是夺取政权和生产資料的国有化，而且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要是我們接受这种解释，那我們得出的将不是一种建立在国际分工之上的世界社会主义經濟，而是一种体现着极乐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給自足的社会主义公社的联盟，所不同的只是，这些公社将扩大到現有民族国家的規模。

網領硬要利用旧的、习惯的公式，折衷地把新說法掩盖起来，它乞灵于下列論点：

“只有在无产阶级取得完全的世界范围的胜利、它的世界范围的政权得到巩固以后，一个长期的紧张的世界社会主义經濟建設

时代才会到来。”(第四章)

把这个原理作为一面理論盾牌实际上只能暴露出根本的矛盾。要是我們把这个論点解释为真正社会主义建設的时期只能在无产階級取得胜利,至少在几个先进国家取得胜利以后才开始,这簡直就是推翻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論,而回到了馬克思和列宁的立場。但是如果我們从体现于綱領草案各个章节中的斯大林、布哈林的新理論出发,那我們会得出如下的发展前景:在世界无产階級取得完全的世界范围的胜利以前,許多单个国家分別在本国内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然后由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世界社会主义經濟,就象小孩子用現成的积木造房子一样。事实上,世界社会主义經濟决不会是民族社会主义經濟的总和。它的基本特点只有在資本主义过去全部发展所造成的世界范围的分工的基础之上才能形成。就其基本成份來說,它的构成和建立不是在許多单个国家建立了“完全的社会主义”以后,而是在需要数十年時間的世界无产階級革命的风暴之中。衡量第一批无产階級专政国家的經濟成就的标准将不是它們接近自給自足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的程度,而是专政本身的政治稳定性和在准备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經濟要素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

摘譯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1936年版第54—55頁。

制訂其目的在于緩和正在来到的危机的最低限度的計劃,必須从苏联經濟目前所处的孤立地位的事实出发。但同时必須拟定一个以苏联經濟和世界經濟实行广泛的相互联系为基础的方案。十年、十五年、甚至更多年的总計劃不可能用別的办法制訂出来。

显然,有系統的、全面的、国际性經濟合作,只有在各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階級取得政权以后才有可能。然而,首先,这个大轉变的時間不能預見到。这就是为什么必須在政治上和經濟上

进行及时的准备的原因。

摘譯自《世界失业問題和五年計劃》(1930年)，  
科伦坡 1952 年英文版第 4 頁。

总之，我們沒有把十月革命归因于俄国的落后，而把它归因于綜合发展的規律。历史的辯证法既不知道有赤裸裸的落后，也不知道有化学般純粹的进步，这完全是一个具体的相互关系的問題。人类当前的历史充滿了各种“古怪現象”，虽然不象在落后国家产生无产階級专政那样古怪，属于同一历史典型。落后中国的学生和工人正在热烈接受唯物主义学說，而文明英国的工人領袖却相信教会的經咒魔力，这个事实无疑证明，中国在某些方面已經超过了英国。但是，从中国工人对麦克唐納那种中世紀式愚蠢的鄙視，不能得出中国在一般发展上已經超过大不列顛的推論。英国在經濟和文化上的优越性是能用准确数字表明的，这些数字尽管生动有力，却不能排除中国工人先于英国工人取得政权的可能性。而将来中国无产階級的专政也决不是意味着在万里长城的疆域內建設社会主义。学究式的和迂腐片面的标准或者过于近視的民族标准都不适用于我們的时代。世界的发展迫使俄国摆脱落后地位和亚洲式状态。离开这种发展的錯綜复杂的关系，俄国未来的命运是无法理解的。

历次資产階級革命既反对封建所有制关系，又反对地方割据的局面。在資产階級革命的解放旗帜上并排地写着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西方人早已穿破这种童鞋了。我們时代的生产力不仅突破了資产階級的所有制形式，而且冲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都已成为束縛世界經濟的桎梏。无产階級革命既反对生产資料私有制，又反对世界經濟的民族分裂状态。东方各国人民爭取独立的斗争包含在这个世界过程之中，而且必然要同这个过程汇合起来。建立一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这样一个

目的一般能够实现的话——意味着人类经济力量的大倒退。正因为如此，它是不能实现的。国际主义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经济事实的表现。正如过去自由主义是民族的一样，社会主义是国际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要从世界范围的分工出发，使国际间的货物交换和互相服务得到最高限度的发展。从来没有任何地方的一次革命完全符合革命参加者原来的想法，它也不可能做到这样。虽然如此，参加斗争的那些人的思想和目的却是革命的重要组成因素。这对十月革命来说尤其正确，因为过去革命者心目中的革命理想，从来没有象一九一七年那样与事变的实际内容如此密切相近。

摘译自《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1932年), 载于  
《俄国革命史》伦敦1936年版第1220—1221页。

由于世界性的分工，由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由于各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的不平衡性，由于当代生产力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的结构，只有通过经济螺旋体系统，通过把单独国家的各种内部的不协调交给许多国家来共同解决，通过各国间的互相服务以及经济和文化各个部门的相互补充，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只有在世界范围之内才能建立起来。

同上，第1252页。

2. 声称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是“力求打破国家疆界”，“只有废除了私有制和国与国之间的障壁”，才能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统一的世界经济“同民族界限和国家关卡无关，而只服从于土壤、地下资源、气候的性能和分工的需要”。因此，民族国家“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已经“过时”。宣称“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

創立一个远为強大的、更能抵御強敌的祖国——共和欧洲联邦”(欧洲联邦和美洲联邦是世界經濟組織的两个中樞),“以作为世界联邦的基地”。

資本主义所发展的生产力,已經突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民族国家,即当前的政治形式,对于这些生产力的运用來說,已嫌过于狭窄。因此,我們經濟制度的自然趋势,乃是力求打破国家疆界。整个地球,陆地与海洋、地面和地下,都已变成一个經濟工場,地球的各个部分已彼此不可分离地連結着。这项工作是由資本主义来完成的。与此同时,这项工作的完成也促使資本主义国家使世界經濟服从各国資產阶级的利潤收入。帝国主义的政治首先证明:在一七八九——一八一五年,一八四八——一八五九年,一八六四——一八六六年以及一八七〇年等革命和战争中产生的旧式的民族国家,已經衰老,它現在已經成为經濟发展的不可容忍的障碍。

当前的战争,归根結蒂是生产力对于民族和国家这种政治形式的一种反抗。它意味着作为一个独立的經濟单位的民族国家的瓦解。

.....

在上述历史条件下,对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說来,問題不在于保卫这个过时的和陈旧的民族“祖国”,因为它业已变成經濟发展的主要障碍。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創立一个远为強大的、更能抵御強敌的祖国——欧洲共和联邦,以作为世界联邦的基础。

无产阶级只能用社会主义的世界經濟組織作为現时的实践綱領,来对付資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混乱局面。

战争乃是資本主义在其发展的登峰造极阶段,用以寻求解决其不可解决的矛盾的方法。无产阶级只能用它自己的方法,即社

会革命的方法，来制止战争。

摘译自《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和平》(原名《战争与国际》)  
(1914年10月), 纽约1918年版第20—23, 28—29页。

资本主义力图把民族和经济都塞进国家的框框里去。它建立了强有力的、在整整一个时代当中作为民族和经济的发展舞台的建筑物。但是民族和经济既同国家发生了矛盾，二者彼此之间也发生了矛盾。对于经济说来，国家变得太狭小了。国家为了竭力扩张，就蹂躏民族。另一方面，经济拒绝使自己力量和资源的自然运动服从地球上民族集团的划分。国家本质上是经济的组织，它一定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闭关自守的民族国家的地位，必然会被各先进国家在消灭一切关税壁垒基础上的广泛民主联盟所取代。由文化发展的需要所产生的民族共同性，不但不会因此而消灭，相反地，只有在各先进国家共和国联盟的基础上，它才能臻于完善。作到这一点的必要条件就是要使民族的框框摆脱经济框框、以及经济框框摆脱民族框框的束缚。要在作为世界组织之中心的欧洲联邦的广阔舞台上组织经济。政治形式只可能是共和国联盟，在这一联盟的灵活的富有弹性的范围之内，每一个民族都可以非常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文化力量。

同德国的以及其他的社会兼并分子相反，我们决不打算抛弃对民族自决权的承认。相反地，我们认为，这种权利最后能付诸实现的时代快要来到了。另一方面，我们完全不是要把每一个民族集团和小集团的“拥有主权的”权利同经济的集中化的需要对立起来。但是我们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本身当中使民族的和经济的这两种“自发势力”辩证地调和起来。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对于我们来说，必须以一切先进民族民主联盟的口号、欧洲联邦的口号作补充。

摘译自《民族和经济》(1916年7月9日), 载于《托洛茨基全集》第9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215页。

民族自决权不可能从无产阶级的和平纲领中抹去，但是它不能妄求绝对的意义，相反地，它受到历史发展中我们遇到的深刻的进步趋势的限制。一方面，这种“权利”必须——通过革命力量——同奴役弱小和落后民族并蹂躏民族文化发源地的帝国主义集中方法相抗衡，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也不能允许“民族原则”阻挠现代经济在我们整个大陆、并进而在全世界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不可抑制的和深刻的进步趋势，帝国主义用资本主义的贪暴的形式表现了这种经济趋势——彻底摆脱民族局限性的愚昧状态，如同它当时摆脱村和区的局限性的愚昧状态一样。社会主义在反对经济集中的帝国主义形式的同时，不仅不反对这种趋势本身，而且相反地要把它作为自己的指导原则。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观点看来，现代经济的集中趋势是基本的，必须确保它有充分可能完成其真正解放的历史使命：建立联合的世界经济，这种经济同民族界限和国家关卡无关，而只服从于土壤、地下资源、气候的特性和分工的需要。波兰人、阿尔萨斯人、达尔马提亚人、比利时人、塞尔维亚人以及还没有被占领的欧洲其他弱小民族，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能得以复兴或者第一次在他们所响往的民族范围内立足，而主要的是，只有到民族集团不再成为经济集团，不再同国界联系在一起，不再在经济上彼此隔离和彼此对立这样的程度，他们才能留在这些范围之内并自由地保持自己的文化。换言之，为了使波兰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等等能够建立真正不受限制的民族统一，必须消灭目前把他们分割成各个部分的国界，必须使作为经济组织而不是民族组织的国家的范围扩展开来，而包括被海关和疆界所割开、被目前战争所撕裂的整个资本主义欧洲。欧洲本身的国家联合是欧洲大小民族自决的前提。只有在摆脱了国家关税壁垒的民主联合的欧洲的屋顶下，民族和文化才可能在真正自决的基础上，在摆脱

民族对抗和經濟对抗的情况下存在和发展。

摘譯自《和平綱領》(1917年5月),載于  
《战争与革命》第2卷莫斯科1925年版  
第493頁。

但是現在,在俄国革命的大有希望的开端之后,我們有一切理由期望,就在这次战争期間,强大的革命运动会在全欧洲开展起来。很明显,它只有作为全欧的运动才能順利发展和走向胜利。如果它仍然是民族范围内的孤立的运动,那么它必然会遭到毁灭。我們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指出了威胁着俄国革命的来自德国軍国主义的危險。这种危險是毫无疑問的,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危險。对俄国革命來說,英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軍国主义比起霍亨索伦王朝的軍事机器来,并不是威胁性更小的敌人。拯救俄国革命的方法是把革命轉到整个欧洲去。如果革命运动在德国扩展开来,那么德国无产階級就会在西方的“敌对”国家中寻找并找到革命的反响;而如果欧洲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階級从資产階級手中夺得了政权,那么即使仅仅是为了掌握住这个政权,它也会不得不立即使这个政权去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換言之,穩固的无产階級专政制度的建立,只有在全欧洲的幅員之内、也就是說在欧洲共和联邦的形式下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这种場合下,靠武力、靠工业和外交协定都不能取得的欧洲的国家联合就会成为得胜的革命无产階級的一項迫切任务。

**欧洲联邦是我們已經进入的革命时代的口号。**不管今后軍事行动的进程如何,不管外交界对目前的战争作出什么样的总结,不管革命运动在最近时期的发展速度如何,欧洲联邦口号在一切情况下都将作为欧洲无产階級爭取政权的政治公式而获得巨大意义。这一綱領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民族国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框框,作为階級斗争的基地,因而作为无产階級专政的国家形式,



都已經过时了。只有当我们把建立新的、更高级的革命“祖国”——共和欧洲的进步任务同保守地保卫过时的民族祖国对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对“保卫祖国”这一过时的无产阶级政治纲领的否定才不再成为在思想政治上的自卫的纯粹消极的行动，而获得自己的全部革命内容。无产阶级只有以共和欧洲为出发点，才能使全世界革命化，才能把全世界组织起来。

有些人教条主义地问：“为什么是欧洲的联合，而不是全世界的联合？”，这里顺便也对这种人作了答复。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而且是某种经济和文化历史的共同体。欧洲革命不必等待亚洲和非洲的革命，甚至也不必等待澳洲和美洲的革命。然而，没有德国的革命，俄国或英国的胜利的革命是不可想像的，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现在的战争被称为世界大战，然而甚至在美国参战以后，作战的仍然是欧洲。而革命的问题也首先摆在欧洲无产阶级面前。

不言而喻，欧洲联邦将仅仅成为世界经济组织的两个中枢中的一个。另一个中枢将是美洲联邦。

同上，第 497—499 页。

9. 在资本主义同中世纪地方割据主义进行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正统的活动场所。但是，民族国家刚刚形成，就成了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障碍。生产力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再加上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这个主要矛盾，使资本主义的危机变成世界性的社会制度的危机。

10. 如果国与国之间的边界，能够一下子废除的话，那末，甚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在一定的时期内还能够继续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的（这当然要作许多牺牲）。如果取消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那末正如苏联的经验所表明的，甚至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生产力也有可能获得较高的发展。但是，只有废除了私有制和

国与国之间的障壁，才能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

11. 保卫民族国家，首先在分裂成许多小国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发祥地——是一项十足的**反动的任务**。设有边界、通行证、货币制度、关卡以及保护关卡的军队的民族国家，已经变成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可怕障碍。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保卫民族国家，而是完全地、最后地清除掉民族国家。

摘译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  
纽约1934年版第9—10页。

## 六、西方革命和一国社会主义

胡說苏联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苏联国内的矛盾都“直接取决于欧洲和世界斗争的趋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在某些主要国家内的胜利将打破资本主义包围，并将解除我们沉重的军事负担”，在技术上大大加强我们，“大大加速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工厂和学校的全面发展”，使我们有可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声称“如果资本主义世界还能存在几十年，那末这对于社会主义俄国就等于判处死刑”。“苏维埃政权已不再可能单单依靠内部力量维持下去了”，“长期孤立的不可避免的结局不是民族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复辟”。“闭关自守”的苏维埃制度将“先蜕化，后垮台”。“没有西方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将会被国内反革命，或者国外武装干涉，或者此两者合伙消灭”。

如果资本主义世界还能存在几十年，那末这对于社会主义的

## 俄国就等于說是判处死刑。

摘譯自《关于俄国革命的讲話》(1922年11月14日)，  
載于《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公报》第10号。

以我們社会結構无比的优越性，我們在“和平”时期利用世界市場以加速我国的工业发展，我們將能够准备得更好和武装得更好地对付封鎖或者干涉。

任何国内政策本身都不能使我們免于資本主义包围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危險。国内問題就是用正确的階級政策——即工人階級同农民間的正确关系——加强我們自己，在建設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尽量前进。苏联内部資源极为丰富，我們完全能够这样前进。我們为了这个目的而利用世界資本主义市場，就是把我們对历史的根本估計同世界无产階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結合起来。世界无产階級革命在某些主要国家內的胜利将打破資本主义包围，并将解除我們的沉重的軍事負担。它将大大地在技术上加强我們，大大地加速我們的城市和乡村、工厂和学校的全面发展。它将使我們有可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这就是，以最先进的技术 and 所有成員真正平等地劳动和享用劳动成果为基础的无階級社会。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6頁。

我們国内的矛盾直接决定于欧洲和世界斗争的趨勢。如果以馬克思主义的預見性为基础采取正确的国内政策，可能对这些矛盾进行合理的控制，使它們有所緩和。但是只有在克服階級矛盾以后才能最終克服这些矛盾，而沒有欧洲革命的胜利就談不上克服階級矛盾。斯大林說得不錯，分歧正在于此。这是民族改良主义和革命国际主义的根本分歧。

摘譯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1936年版第65頁。

一国社会主义論的必然后果是低估必須加以克服的困难，夸大已經取得的成就。斯大林断言“社会主义已經在苏联实现了十分之九”。<sup>①</sup>再也找不出比这种断言更加反社会主义和反对革命的說法了。……为了加强他們的信心，需要的是严酷的真理，而不是甜蜜的謊言。我們不应当對他們胡說什么社会主义已經实现十分之九；我們必須告訴他們：我們今天的經濟水平以及社会和文化条件接近資本主义——而且是落后的不文明的資本主义——的程度远甚于接近社会主义的程度。我們必須對他們說：**只有在最先进的国家的无产階級夺得政权的时候，我們才会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設的道路；必須不屈不挠地为这个目的而努力，同时使用两种杠杆——我們国内的經濟努力这个短杠杆，还有国际无产階級斗争这个长杠杆。**

同上，第 66 頁。

**苏联同資本主义世界之間的矛盾是根本性的矛盾。这个矛盾靠机动手段是逃避不了的。依靠对資本实行明确的、坦率承认的让步，依靠利用它的各个部分之間的矛盾，可以延长喘息时机，可以贏得時間，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也只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而不是在任何的和所有的情况下。如果相信国际資产階級能够被“中立化”，直到社会主义建成，也就是說，相信根本矛盾能借助于机动手段克服，那完全是自欺。这种自欺可以使苏維埃共和国灭亡。只有国际无产階級革命才能使我們摆脱这个根本性的矛盾。**

同上，136—138頁。

因此在十月革命十二周年到来的时候，苏維埃共和国和共产

---

<sup>①</sup> 斯大林的原話是：“我国革命已經实现了这个綱領的十分之九。”这里說的“綱領”是指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的无产階級革命的綱領。參看《斯大林全集》第 8 卷第 270 頁。——編者注

国际正处于最大的困难和矛盾之中，这些困难和矛盾从反面证明了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論的正确。同列宁一样，在参加十月革命的时候，我們深信俄国革命不可能不依靠其他国家而取得完全的成功。我們认为十月革命只能是世界革命的第一环，而这一环的命运又决定于整个鏈条的命运。我們至今坚持这一立場。社会主义建設的进展及其矛盾同时在增长，如果苏維埃共和国日后得不到国际革命成功的支持，那么建設的进展必将被矛盾所吞沒。

摘譯自《十月革命十二周年》(1929年10月17日)，  
載于《托洛茨基文选》第1卷巴黎1955年版第  
79頁。

工人国家的正确政策不能降低到仅仅限于本民族的經濟建設。如果革命不循着无产阶级的螺旋綫向国际舞台扩展，那它必然会开始沿着官僚的螺旋綫局限于民族范围之内。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不发展成欧洲和世界規模，它必然会朝着它本身崩溃的方向发展。作为广泛的历史远景，所有这些都是完全无可爭辯的。

摘譯自《苏联与第四国际》(1934年)，  
紐約1934年版第4頁。

已經为官僚主义所削弱的苏維埃政权瓦解的危机和无产阶级团结在一个能够拯救十月革命遺產的新党周围的时机，哪一个会先到来呢？对于这个问题沒有現成的答案，这要由斗争来决定。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考驗——可能是一次战争——将会决定力量的对比。总而言之，随着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继续衰落和法西斯統治的继续扩大，苏維埃政权已經不再可能单单依靠内部力量来維持下去，这一点是很明显的。苏維埃国家唯一彻底改造的基本条件是胜利地开展世界革命。

同上，第26頁。

“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已不是一种历史的假设，而成为一个事实了——当然是在俄国，而不是在德国。但是，孤立状态这个事实也确切地表明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相对强大和社会主义的相对软弱。从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到一个永久废除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道路，而这条道路同国际革命的道路是完全一致的。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215 页。

说实在的，苏联的孤立并没有产生人们本来所害怕的那些具有直接危险的后果。资本主义世界太散漫混乱，瘫痪无力，因此它不能充分发挥它的潜力。事实证明，“喘息时机”比有眼光的乐观主义者所敢希望的还要长些。由于孤立，由于即使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对外贸易总额从一九一三年以来已经减少了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也不能使用世界经济资源，结果不仅使军事防御费用浩大，而且使生产力的分布极端不利，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得很慢。但是，孤立和落后所产生的一个更有害的产物却是官僚主义这条章鱼。

由革命所建立的法律和政治准则对落后的经济起了一种进步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准则本身却受到那种落后所发生的消极影响。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时间愈长，社会结构的蜕化也就愈深。长期孤立的不可避免的结局，不是民族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复辟。

如果说，资产阶级不可能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那末，同样真实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能和平地溶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摆在历史日程上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和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是接连不断的世界动乱，战争和革命。在苏联的国内生活中，动乱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官僚在争取实现计划经济的斗争

中被迫使富农非富农化，那么，工人阶级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就会被迫使官僚非官僚化。后者的墓碑将刻上这样的墓志铭：

“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此长眠。”

同上，第 219—220 页。

然而，布尔什维克不必等到莫斯科审讯的时候，才回过头来解释苏联执政党瓦解的原因。他们早就预见到并事先谈到过这一种发展的理论可能性。让我们回想一下不仅在十月革命前夜，而且在这以前许多年布尔什维克所作的预测。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力量的特殊结合使无产阶级可能在象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里首先取得政权。但是这种力量的结合也预先表明，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或早或迟地迅速取得胜利，工人国家在俄国是站不住脚的。闭关自守的苏维埃制度定将垮台或蜕化。更准确些说：先蜕化，后垮台。一九〇五年以来我个人不得不再论述这一点。在我的《俄国革命史》中（见最后一卷附录：《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我收集了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期间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所有这些言论都归结为一点：没有西方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将会被国内反革命，或者国外武装干涉，或者此两者合伙消灭。其中列宁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苏维埃制度的官僚化不是技术问题或组织问题，而是工人国家社会蜕化之可能的始点。

摘译自《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1937年），载于《反对派通报》1937年 9—10 月第 58—59 期第 9 页。

## (四) 民族和殖民地問題

### 一、鼓吹废除民族国家

声称“民族”国家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现在是打碎它的时候了”。把人类经济“拉到民族狭隘性襁褓中去”的赤裸裸的民族思想是“反动的”，保卫民族国家是个“十足反动的任务”。鼓吹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完全地、最后地清除掉民族国家”。

帝国主义用资本主义的野蛮方式来表现经济发展的这种进步趋势，使人类的经济从民族和国家的紧紧的镣铐中解放出来，然后把它建筑在世界规模之内。同帝国主义相对立的赤裸裸的民族思想，不仅是软弱无力的，而且是反动的，因为它把人类的经济拉向后退，拉到民族狭隘性的襁褓中去。为其软弱性所决定的民族思想的可悲的政治使命，就是为帝国主义屠夫的行动在思想意识上打掩护。

正在破坏着经济基础本身的目前的帝国主义战争——它是用思想贫乏的或招摇撞骗的民族思想来加以说明和补充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已陷入绝境的最有说服力的表现。只有社会主义——它应当使民族在经济上守中立，从而把人类联合在团结一致的合作之中；它要把世界经济从民族的虎头钳里解放出来，从而使民族文化从民族经济竞争的虎头钳里解放出来——，只有社



会主义能够提供一条出路来摆脱作为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可怕威胁而摆在我們面前的矛盾。

摘譯自《帝国主义和民族思想》(1915年5月6日),  
載于《托洛茨基全集》第9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  
年版第208—209頁。

目前的战争,以它包含的发展趋势来看,所威胁着的不是民族本身,而是作为民族在历史上的居住场所的国家。资本主义所实现的民族团结少得同它所实现的民主一样。它造成了民族团结的需要,但是它也产生了一些不容许实现这种需要的倾向。而民族则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强有力的和极其稳定的因素。民族正在经历着的不仅是目前的战争,而且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摆脱了国家的和经济的依赖性之桎梏的民族,将在长时期内一直是精神文化的最重要的发源地,因为这种文化的最重要的工具,即语言,是由民族来使用的。国家则是另外一回事。它是由于王朝的、帝国主义的和民族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以及由于各种暂时的物质力量的对比关系而形成的。国家比起民族来,是一种极其不稳定的历史发展因素。在过去的时代里,经济发展是在非常勉强地被称为“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的。通过国家机构剥削或者力图剥削其他民族的、几乎总是被分裂了的民族的文化发展,也是在这个称为祖国的国家中进行的。因为一个国家的范围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变得很狭小,于是这个国家就用兼并和殖民地附属建筑物而扩充起来。为争夺殖民地,即为蹂躏落后国的经济和民族独立而斗争,构成了所谓民族国家的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争夺殖民地的竞赛导致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斗争。一个国家的范围最后已经容纳不下生产力了。如果说现在的“民族”国家正处在危险中,那末这种危险是由于它的边界同已经达到的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而产生的。危险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

敌人,而是来自内部,来自经济发展本身,因为经济发展用世界战争的语言告诉我们:“民族”国家已经成为发展的障碍,现在是打碎它的时候了。在这个意义上,保卫祖国,即保卫已经过时的民族国家的思想,是一种很反动的意识形态。既然社会爱国主义者把民族的命运——民族本身决不麻痹经济发展,决不妨碍经济发展采取全欧洲的和世界的规模——同闭关自守的国家的和军事的组织联系起来,所以我们国际主义者就不得不起来反对民族的保守的“爱国主义的”卫士而捍卫各民族独立和发展的历史权利。

资本主义力图把民族和经济都塞进国家的框框里去。它建立了强有力的、在整整一个时代当中作为民族和经济的发展舞台的建筑物。但是民族和经济既同国家发生了矛盾,二者彼此之间也发生了矛盾。对于经济说来,国家变得太狭小了。国家为了竭力扩张,就蹂躏民族。另一方面,经济拒绝使自己力量和资源的自然运动服从地球上民族集团的划分。国家本质上是经济的组织,它一定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闭关自守的民族国家的地位,必然会被各先进国家在消灭一切关税壁垒基础上的广泛民主联盟所取代。由文化发展的需要所产生的民族共同性,不但不会因此而消灭,相反地,只有在各先进国家共和联盟的基础上,它才能臻于完善。作到这一点的必要条件,就是要使民族的框框摆脱经济框框、以及经济框框摆脱民族框框的束缚。要在作为世界组织之核心的欧洲联邦的广阔舞台上组织经济。政治形式只可能是共和联盟,在这一联盟的灵活的富有弹性的范围之内,每一个民族都可以非常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文化力量。

同德国的以及其他的社会兼并分子相反,我们决不打算抛弃对民族自决权的承认。相反地,我们认为,这种权利最后能付诸实现的时代快要来到了。另一方面,我们完全不是要把每一个民族集团和小集团的“拥有主权的”权利同经济的集中化的需要对立起

来。但是我們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本身当中使民族的和經濟的这两种“自发势力”辩证地調和起来。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对于我們來說，必須以一切先进民族民主联盟的口号、欧洲联邦的口号作补充。

摘譯自《民族和經濟》(1916年7月9日)，  
同上，第214—216頁。

9. 在資本主义同中世紀地方割据主义进行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变成了資本主义的正統的活动場所。但是，民族国家刚刚形成，就成了經濟和文化发展的障碍。生产力和民族国家之間的矛盾，再加上生产力与生产資料私有制之間的这个主要矛盾，使資本主义的危机变成世界性的社会制度的危机。

10. 如果国与国之間的边界，能够一下子废除的話，那末，甚至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在一定的时期内还能够繼續上升到一个較高的水平的(这当然要作許多牺牲)。如果取消生产資料的私人所有制，那末正如苏联的經驗所表明的，甚至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內，生产力也有可能获得較高的发展。但是，只有废除了私有制和国与国之間的障壁，才能为一种新的經濟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創造条件。

11. 保卫民族国家，首先在分裂成許多小国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发祥地——是一项十足的反动的任务。設有边界、通行证、货币制度、关卡以及保护关卡的軍队的民族国家，已經变成为人类社会經濟和文化发展的可怕障碍。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保卫民族国家，而是完全地、最后地清除掉民族国家。

12. 如果現在的民族国家还起着进步的作用，那末，不管它的政治形式如何，当然也不必去問是誰首先“发动”战争，还是必須保卫它的。把民族国家的历史作用的問題同某一特定政府的“罪行”問題混淆起来，那是十分可笑的。难道能够仅仅因为一所适于居

住的房子的火灾是由于房主人的不小心或意图不良所引起的就拒絕搶救嗎？但是这里所談的恰好是一所不适于生活而只适于死亡的房子。为了使各国人民能够生活下去，必須把民族国家的結構彻底夷平。

13. 进行保卫国家的說教的“社会主义者”，是为腐朽的資本主义效劳的小資产階級反动派。只有在和平时期已經向民族国家宣告了不可調和的战争的政党，才能在战争时期不受民族国家的束縛，才能做到不信奉战争的地图，而信奉階級斗争的地图。只有充分地認識到帝国主义国家客观上的反动作用，无产階級先鋒队才能經得起各种各样社会爱国主义的侵襲。这就是說，只有从国际无产階級革命的观点出发，才能与“保卫国家”的思想和政策真正地划清界限。

摘譯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  
紐約1934年版第9—10頁。

## 二、否认有反帝正义战争

声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正义战争”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殖民地、任何一个被压迫民族，“如果不依靠某一个帝国主义強国，或者不充当它手中的工具，都不可能进行解放战争”。胡說民族战争和民族革命的时代已經过去，“各落后国家的‘民族’战争再也不可能具有任何独立意义”。“落后国家的独立必然是半虛幻的”。“亚洲和非洲后起的革命并不能够为民族国家的复兴开辟一个新时代。”

由于不存在真正革命的資产階級民主派，俄国不可能有資产

階級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的时代已經过去了（至少对欧洲是如此），正如民族战争的时代已經过去一样。在民族革命和民族战争之間具有一种深刻的內在联系。我們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这不仅是一种殖民掠夺的体系，而且也是一定的国内政制。它不是使资产阶级民族和旧政权对抗，而是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族对抗。

摘譯自《为政权而斗争》（1915年10月17日），載于《一九〇五年》莫斯科1922年第2版第289頁。

当然，可以反駁英国的勋爵說：在将来的战争中，正如在目前的战争中一样，所有的主要参加者都是同一原則的代表者，因而現在用不着一般地談論什么“正义的”即在历史上进步的战争。在本报发表过的一些文章中，我們不止一次地闡述过：各资本主义民族爭取世界地位的斗争，是一条基本“原則”，現在無論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政策还是它們的国内統治，都完全服从这条“原則”。誠然，被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反对压迫它們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正义战争”，初看起来是可能的。但是在現今的世界关系和力量組合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殖民地，任何一个被压迫民族，如果不依靠某一个帝国主义强国，或者如果不充当它手中的工具，都不可能进行解放战争。各落后国家的“民族”战争再也不可能具有任何独立的意义。但是，资本主义历史所实现的对事情的这种簡化，即把国际政策以及由这种政策所产生的战争都以帝国主义作分母絲毫不減輕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和平的保障的任务。宣布目前的边界或战争所造成的边界不可侵犯，这并不困难：在历史上已經这样做过不止一次。然而任何条約，任何仲裁法庭都不能阻止生产力的增长、它对民族国家框框的冲击以及民族国家要借助于軍国主义来扩大民族資本的剝削場所的意图。一劳永逸地、或者哪怕是长期地冻结世界资本主义力量的对比关系是完全不可

能的，这就使得各种和平主义的计划和口号命中注定是毫无用处的。

摘译自《“和平的保障”》(1916年9月)，载于《托洛茨基全集》第9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238—239页。

16. 东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问题占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这些国家甚至到今天都还在为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战斗。它们的斗争具有双重的进步意义：它使落后人民摆脱亚细亚主义、地方主义和外国的束缚，从而给予帝国主义国家以有力的打击。但是必须预先清楚地理解到，亚洲和非洲后起的革命并不能够为民族国家的复兴开辟一个新时代。殖民地的解放在将来只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巨大的插曲，正如在半殖民地国家俄国发生的后起的民主革命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序曲一样。

摘译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纽约1934年版第11页。

同时，第四国际预见到，而且公开提醒落后的民族：它们的迟到了的民族国家，再不能寄望于独立的民主发展了。一个处在腐朽的资本主义包围中并陷入帝国主义矛盾中的落后国家的独立必然是半虚幻的，而它的政府在内部阶级矛盾和外部压迫的夹攻下，也将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压迫人民的独裁制，——土耳其的人民党，中国的国民党的政府如此；印度的甘地政府在将来也会如此。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从革命的无产阶级观点看来，不过是一个把落后国家引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去的过渡阶段罢了。

摘译自《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第四国际紧急会议宣言，1940年5月)，第24页。

### 三、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革命性

断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比“处在民主革命时代的一个非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更进步和更革命”。“越往东方去，资产阶级就越下贱、越卑劣”。声称认为“殖民地压迫必然会使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这就是“重犯”“孟什维主义的根本错误”。

和资产阶级达成任何协议的唯一“条件”，为了适应某一具体情况而达成的任何单独的、属于实用范围的、作为权宜之计的协议所需要的唯一“条件”，在于一天也不容许、甚至片刻也不容许组织上或旗帜上的混淆，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混淆；在于区分红色力量和蓝色力量，在于一分钟也不相信资产阶级能够或准备领导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或不去妨碍工人和农民。就作为权宜之计的实用的协议而言，我们绝对不需要上述那种条件。相反地，它只能给我们造成危害，和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即使在存在“协议”的短暂时期，这个斗争也不会中断——的总路线背道而驰。过去早就说过，如果在当时这种协议是有利的話，即使和魔鬼本身也可以达成纯属实用范围的协议，例如对我们不会有任何政治上的约束，也不会使我们承担任何政治义务的协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魔鬼完全皈依基督教，要求他不用自己的角来反对工人和农民而专门为虔诚的目的服务，这种要求是荒谬的。我们提出这种条件，实际上是在给魔鬼当保镖，祈求他让我们充当他的教父。

摘译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纽约1936年版第168—169页。

列宁事实上曾經教导我們要严格划分被压迫的和实行压迫的資產階級国家。由此可以得出极为重要的結論。例如我們对待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間的战争的态度：对于一个和平主义者來說，这样一場战争就和其他任何战争一样；而对一个共产党人來說，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則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战争。这样一来，列宁就把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起义和被压迫国家的战争提高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水平，特別是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水平。但是，**列宁根本沒有像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轉变以后的布哈林現在所做的那样，把民族解放战争置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上。**列宁坚持要区分被压迫的資產階級国家和資產階級压迫国家。但是**列宁在任何地方也沒有提出过，也决不可能提出这样的問題，仿佛处在民族解放斗争时代的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資產階級必定比处在民主革命时代的一个非殖民地国家的資產階級更进步和更革命。**这既不能从理論上找到任何根据，也不能从历史上得到任何证实。举例來說，尽管俄国的自由主义是很可怜的，尽管它的左面一半——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是一个大杂燴，但是未必能够說中国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的資產階級民主达到了比它們的俄国原型更高的水平，或者更为革命。

**把問題說成仿佛殖民地压迫必然会使民族資產階級具有革命性，那就是彻底重犯认为俄国資產階級的革命性是封建和专制压迫的必然产物的、孟什維主义的根本錯誤。**

同上，第 171—172 頁。

甚至在过去三年来的中国事态发展出現以前，馬克思主义者就清楚地知道——而今天甚至瞎子都應該清楚地知道——作为中国内部生活的一个直接因素的外国帝国主义，使中国的米留可夫



們和中国的克伦斯基們归根結底甚至要比他們的俄国原型更加卑劣。我們党在发表得最早的一个宣言中不是毫无原因地指出过：我們越往东方去，資產階級就越下賤、越卑劣，落在无产階級肩上的任务也就越重大<sup>①</sup>。这个历史“規律”对中国也是完全适用的。

摘譯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1936年版第179頁。

普列汉諾夫装腔作势地固执地閉起眼睛，不理會十九世紀政治史上的实际教訓：無論什么地方，无产階級一作为独立力量出現，資產階級就要轉入反革命营垒去。群众斗争愈加勇敢，自由派就愈加迅速变为反动派。至今还没有人发明一种能使階級斗争規律不起作用的办法。

摘自《斯大林評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年版下冊第553頁。

#### 四、混淆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 革命的不同阶段

断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要彻底地真正解决民主和民族解放任务只有通过无产階級专政才有可能。它們爭取民族独立、資產階級民主的斗争同社会主义革命“沒有分成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是彼此互为因果的”。胡說“在国民党与无产階級专政之間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中間阶段，即沒有工农民主专政”。

---

<sup>①</sup>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原文是：“在欧洲，越往东去，資產階級在政治方面也越軟弱、越怯懦、越卑劣，无产階級所担負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也越大”。——編者注

二、对于资产阶级发展较迟的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说来，不断革命論意味着，要彻底地真正解决它们的民主和民族解放任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被压迫民族的领导者、首先是作为它的农民群众的领导者——的专政才有可能。

三、在民主革命中，不仅土地问题而且民族问题都给落后国家中占人口絕大多数的农民安排了一个特殊地位。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民主革命的任务就不可能解决，甚至不可能认真地提出。但是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只有通过同民族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才能实现。

四、不管个别国家中革命的最初插曲性阶段的情况如何，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联盟，只有在組織为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领导下才有可能实现。这也就是说，民主革命，只有通过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为基础并且首先解决民主革命的所有任务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五、从历史的角度来估价，布尔什維主义的旧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确切地表达了上面所说的那种无产阶级、农民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这已經为十月的經驗所证实。但是列宁的旧公式并没有預先解决在革命联盟内部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間的相互关系问题。換句話說，这个公式有意保留了某种代数学的性质，这种性质就是要在历史經驗的过程中演算出比較确切的算术数字。然而，历史經驗表明，而且在不可能作任何歪曲解释的情况下表明，农民所担任的革命角色无论多么伟大，它决不能担任独立的角色，更不用说担任领导的角色。农民不是跟着工人走，便是跟着资产阶级走。这就是說，“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只有作为领导着农民群众的无产阶级的专政才是可以設想的。

六、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就其阶级内容來說，是与无产阶级专政不同的一种制度，它只有在建立了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

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这个党要能够代表农民的利益和总的来说也能够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要能够在无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程度的援助下夺取政权，并且要能够决定自己的革命纲领。整个现代史表明，特别是最近二十五年的俄国经验表明，在建立农民政党的道路上，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就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缺乏独立性及其深刻的内部分化，由于这种原因，小资产阶级（农民）的上层分子在一切决定性的关头，尤其是在战争和革命中，总是跟着大资产阶级走，下层分子跟着无产阶级走，中层分子则不得不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选择。在克伦斯基政权与布尔什维克政权之间，在国民党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阶段，即没有工农民主专政。

七、共产国际硬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这个口号强加于东方国家的企图，早已为历史彻底粉碎，这种企图只能起反动的作用。只要这个口号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对立，它在政治上就会促使无产阶级溶解于小资产阶级群众之中，这样就会为民族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因而也会为民主革命遭到失败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在共产国际纲领中采用这个口号，就是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十月传统。

八、无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取得了政权以后所实行的专政，必然立即面临同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有密切关系的任务。民主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不断革命。

.....

十一、上面关于世界革命发展的简要论述，一笔勾销了现在的共产国际纲领迂腐死板地把国家划分为社会主义“已经成熟”或“尚未成熟”的问题。既然资本主义已经建立了世界市场，创造了世界的分工和生产力，整个来说它也就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世界经济。

不同的国家都将以不同的速度经历这个过程。在一定的条件下，落后国家能比先进国家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要比它们晚进入社会主义。

一个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它的无产阶级没有作好联合农民和夺取政权的充分准备，就不能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反之，在一个无产阶级由于进行了民主革命而掌握了政权的国家，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命运归根到底不仅取决于本民族的生产力，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

十三、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理論同俄国革命的全部經驗背道而馳，它不仅机械地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对立起来，而且把民族革命同国际革命割裂开来。

这种理論向落后国家的革命提出建立一种根本不能实现的民主专政制度的任务，同时又把这种制度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这样，这种理論就把幻想和虚构带到政治中来，麻痹东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妨碍殖民地革命的胜利。

摘译自《不断革命論》(1929年)，伦敦1962年版第152—157頁。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就其本质說来是落后国家。但是落后国家是帝国主义統治下的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它們的发展具有綜合性质，即最原始的經濟形式同资本主义技术及文化的最新成就相結合。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治斗争也可以同样确定为：把爭取实现最基本的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与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結合起来。在这个斗争中，民主口号、过渡要求和社会主义革命問題沒有分成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是彼此互为因果的。中国无产阶级刚开始組織工会就不得不动手組織苏維埃。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綱領完全适用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

家，至少适用于无产阶级已经能够独立进行政治活动的国家。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土地革命（即消灭封建残余）和民族独立（即摆脱帝国主义束缚）。这两项任务彼此密切相关。

不能单单拒绝民主纲领，必须让群众在斗争中去取消它。对于象中国或印度这样的国家，争取成立国民（或制宪）议会的口号仍然具有充分的效力。必须把这个口号同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作为第一步，工人必须以这个民主纲领武装起来。只有他们能够号召和团结农民。必须让工人在革命的民主纲领的基础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然后，在革命的民主政体的口号下动员群众的某一个阶段，便能够而且应该建立苏维埃。在每一个特定时期，苏维埃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它们同国民议会的关系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水平、他们同农民的联系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的性质。苏维埃迟早必然会推翻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只有它们能够结束民主革命并且开辟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个别的民主和过渡的要求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相对重要性、它们的共同联系和提出要求的次序，决定于每一个落后国家的特点和具体条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它的落后程度。尽管如此，在所有落后国家中，革命发展的总趋势可以依据俄国的三次革命（一九〇五年、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一九一七年十月）所明确阐明的意义，由不断革命的公式来决定。

摘自《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1938年9月3日），纽约1946年版第40—41页。

## 五、鼓吹“欧洲联邦”，取消民族自决

說对许多被压迫民族来说，“自决就是废除现存的疆

界和肢解目前的国家”。声称民族自决权“不能妄求绝对的意义”，“欧洲本身的国家联合”、“经济和政治联合是民族自决成为可能的必要前提”，自决权只有在欧洲联邦共和国的条件下“才能有血有肉”。不应当“退回到‘自治的’民族国家”去，而应当建立“共和欧洲联邦”。

**对许多（如果不是对大多数）被压迫民族、民族集团和残余来说，自决就是废除现存的疆界和肢解目前的国家。同时，这一民主原则也包括使殖民地就得解放。然而，帝国主义的全部政策却是不顾民族原则去扩大国界，在于把弱小民族强行纳入关税界限之内，攫取新的殖民地。帝国主义在本质上就是扩张的和进攻的，它的特征正是自己的这种性质，而不是变化无常的外交手腕。**

摘译自《和平纲领》(1917年5月)，载于《战争与革命》  
莫斯科1925年版第2卷第491页。

民族自决权不可能从无产阶级的和平纲领中抹去，但是它不能妄求绝对的意义，相反地，它受到历史发展中我们遇到的深刻的进步趋势的限制。一方面，这种“权利”必须（通过革命力量）同奴役弱小和落后民族并蹂躏民族文化发源地的帝国主义集中方法相抗衡，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也不能允许“民族原则”阻挡现代经济在我们整个大陆、并进而在全世界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不可抑制的和深刻的进步的趋势。帝国主义用资本主义的贪暴的形式表现了这种经济趋势——彻底摆脱民族局限性的愚昧状态，如同它当时摆脱村和区的局限性的愚昧状态一样。社会主义在反对经济集中的帝国主义形式的同时，不仅不反对这种趋势本身，而且相反地要把它作为自己的指导原则。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观点看来，现代经济的集中趋势是基本的，必须确保它有充分可能完成其真正解放

的历史使命：建立联合的世界经济，这种经济同民族界限和国家关卡无关，而只服从于土壤、地下资源、气候的特性和分工的需要。波兰人、亚尔萨斯人、达尔马提亚人、比利时人、塞尔维亚人以及还没有被占领的欧洲其他弱小民族，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能得以复兴或者第一次在他们所向往的民族范围内立足，而主要的是，只有到民族集团不再成为经济集团，不再同国界联系在一起，不再在经济上彼此隔离和彼此对立这样的程度，他们才能留在这些范围之内并自由地保持自己的文化。换言之，为了使波兰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等能够建立真正不受限制的民族统一，必须消灭目前把他们分割成各个部分的国界，必须使作为经济组织而不是民族组织的国家的范围扩展开来，而包括被海关和疆界所割开、被目前的战争所撕裂的整个资本主义欧洲。欧洲本身的国家联合是欧洲大小民族自决的前提。只有在摆脱了国家关税壁垒的民主联合的欧洲的屋顶下，民族和文化才可能在真正自决的基础上在摆脱民族对抗和经济对抗的情况下存在和发展。

弱小民族的民族自决之直接取决于欧洲整个制度的这种情况，使无产阶级不可能离开欧洲革命而提出诸如波兰的独立或全体塞尔维亚人的统一的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意味着作为无产阶级和平纲领组成部分的自决权具有不是“乌托邦的”而是革命的性质。这种见解是针对两种人，既针对德国的大卫之流和兰德斯堡之流，也针对我们革命阵营中那些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的人说的，前者从自己的帝国主义“现实主义”的高度诬蔑民族独立原则为反动的罗漫蒂克，而后者则宣称这一原则只有在社会主义下才能实现，并以此使自己避开对战争所直截了当地提出的、必须回答的民族问题作出原则性的回答。

同上，第 492—493 页。

欧洲的經濟和政治联合是民族自决成为可能的必要前提。正如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希臘人等等的民族獨立口號如果沒有在巴尔干社会民主党的整个政策中起着如此巨大作用的巴尔干联邦共和国的口號作为补充，就会是干巴巴的抽象概念一样，在全欧范围内，自决“权”的原則只有在欧洲联邦共和国的条件下才能有血有肉。

但是，如果民主联邦的口號在巴尔干半島是純粹无产阶级的口號，那么对于存在着深刻得多的資本主义对抗的欧洲來說就更其如此了。

同上，第 494 頁。

如果欧洲的資本主义国家得以联結成帝国主义托拉斯，这自然是比目前状况前进了一步，因为它首先为工人运动建立了联合起来的全欧的物质基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也应该不是为退回到“自治的”民族国家，而是为把帝国主义的国家托拉斯变成共和欧洲联邦而斗争。

同上，第 497 頁。

国际主义拒絕——不是以一个宣传小組的名义、而是以一个最重要的阶级的名义拒絕在最大的灾禍期間支持国家，它在这样做的时候，不是单纯消极地避开“罪恶”；而是說明，对我们來說，世界发展的命运不再同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但如此，这种民族国家已成为限制发展的虎头钳，因而必須除去，即必須代之以在更广泛基础上的更高级的經濟-文化組織。如果社会主义問題同民族国家范围是能够相容的，那么它也就同民族防御是相容的了。但是，我們面临的社会主义問題是在帝国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就是在資本主义本身不得不强行打破它自己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的框子的那种环境下提出来的。

同上，第 501 頁。



## (五) 关于“欧洲中心論”

### 一、断言革命中心在西方

宣称革命問題“首先摆在欧洲无产阶级面前”，欧洲“比其他各洲冲突得更加厉害”；“从‘有組織的’时代到革命时代的过渡”“特別急驟”；“同非洲和亚洲比較起来”，欧洲是“已經成熟到实行社会革命的资本主义‘欧洲’”。声称“欧洲革命不必等待亚洲和非洲的革命，甚至也不必等待澳洲和美洲的革命”。断言“革命的中心确定已經轉到了西方”。

有些人教条主义地問：“为什么是欧洲的联合，而不是全世界的联合？”，这里順便也对这种人作了答复。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詞，而且是某种經濟和文化历史的共同体。欧洲革命不必等待亚洲和非洲的革命，甚至也不必等待澳洲和美洲的革命。然而，沒有德国的革命，俄国或英国的胜利的革命是不可想像的，反过來說也是一样。現在的战争被称为世界大战，然而甚至在美国参战以后，作战的仍然是欧洲。而革命的問題也首先摆在欧洲无产阶级面前。

不言而喻，欧洲联邦将仅仅成为世界經濟組織的两个中樞中的一个。另一个中樞将是美洲联邦。

摘譯自《和平綱領》(1917年5月)，載于《战争与革命》第2卷莫斯科1925年版第499頁。

为反对联邦口号而提出的唯一的多少是具体的历史性的理由，曾由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归结为下面的一句话：“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民主党人报》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因而每一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决条件<sup>①</sup>。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意见。可是，这个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国、奥国、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是不一样的。可是，跟非洲和亚洲比较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已经成熟到实行社会革命的资本主义“欧洲”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在自己的斗争中“等待”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使国际间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家间消极等待的思想暗中顶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说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国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国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

同上，第499—500页。

由于战前飞速的和几乎不停顿的发展带来的惯性、新的力量对比、世界市场的重新瓜分和战争加深了的矛盾等原因，惯于对世界进行统治的欧洲，现在比其他各洲冲突得更加厉害。正是在欧洲，从“有组织的”时代到革命时代的过渡是特别急骤的。

摘译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纽约1936年版第81页。

---

<sup>①</sup> 当时《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托洛茨基这里指的是列宁1915年在该报发表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1页)。——编者注

布尔什维克党从帝国主义大战开始的时候起，并且在十月革命后以发展的形式，在世界革命斗争中起着领导作用。今天，这种地位已经完全丧失了。不仅党的官式的滑稽模拟物是如此。俄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所处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也使他們不可能在国际范围起到领导的作用。除此以外，苏联的左翼反对派集团只有在新国际顺利組成和成长以后才能发展成为一个新党。革命的中心确定已经轉到了西方，在西方，立即建立新党的可能性要大得很多很多。

摘譯自《苏联与第四国际》(1934年)，  
紐約 1934 年版第 28 頁。

## 二、宣称只有“欧洲革命”才能拯救俄国

断言“一切都取决于欧洲革命的觉醒和发展”，“如果欧洲人民不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我們就会被打倒”，“不是俄国革命将在西方掀起斗争的旋风，就是各国资本家将扼杀我国革命”。

声称只有在西欧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下，俄国工人的“暂时的革命統治才会变成社会主义专政的序幕”。胡說“欧洲工人的失敗”会把俄国“抛回到帝国主义独裁和君主制去”，并最后变成“英国和美国的殖民地”。硬說“俄国社会主义經濟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內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宣称在战争中只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拯救苏联”，“如果帝国主义沒有因西方的革命而陷于瘫痪状态的話，它将会鏟除这个十月革命所产生的制度”。

但是在俄国的經濟条件下工人階級的社会主义政策能走多远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远在遇到国家技术落后之前，就会碰到政治上的障碍。沒有欧洲无产階級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暫时的統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但是另一方面，西方社会主义的胜利将使我们把工人階級的暫时統治直接变成社会主义专政，这也是不容怀疑的。

摘譯自《我們的革命》（1906年），格拉哥列夫出版社1906年版第277—278頁。

革命胜利后只能把政权交給能依靠城市的武装人民即无产階級民警的政党手里。社会民主党执掌政权后就处于最深刻的矛盾之中，它不能用“只是民主主义专政”的天真的幌子来克服。工人政府的“自我限制”不是别的，而只会是为了实现共和国而叛卖失业者、罢工者、以至全体无产階級的利益。在革命政权面前摆着种种客观的社会主义任务，但是要解决这些任务在一定阶段上就会和国家的經濟落后发生冲突。在民族革命的范围内沒有摆脱这种矛盾的出路。在工人政府面前最从初起就提出下列任务：使自己的力量和西欧社会主义无产階級的力量联合起来。只有在这条道路上，它的暫时的革命統治才会变成社会主义专政的序幕。因此不断革命对俄国无产階級来说是階級自卫的要求。如果工人政党缺乏足够的革命-进攻<sup>①</sup>政策的主动性，并且打算轉向干巴巴的只是民族的和只是民主主义的专政，那么欧洲联合起来的反动派将会毫不迟延地对它說明，执掌国家政权的工人階級必須把全部政权放在天平的社会主义革命一边去。

摘譯自《我們的意見分歧》（1909年），載于《一九〇五年》莫斯科1922年第2版第286頁。

① “进攻”也可譯为“侵略的”。——編者注

孟什維克国际主义者，馬尔托夫同志的同道們，与我們相反，他們否认对政治任务的社会革命的提法。他們在自己的政綱中宣称：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所以我們的任务只能限于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国。整个这种議論是建立在完全踐踏无产階級的国际联系和国际任务之上的。如果說世界上只有俄国，那末馬尔托夫的議論或許是对的。可是，問題却在于消灭世界大战、同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世界无产階級包括俄国无产階級的任务。不是向俄国工人进行解释：說俄国的命运現在跟欧洲的命运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欧洲无产階級的胜利必将保证我們更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反过來說，欧洲工人的失敗将把我們拋回到帝国主义独裁和君主制去，最后变为英国和美国的殖民地；不是使我們的全部策略服从于欧洲和世界无产階級的总目标和总任务，馬尔托夫同志反而从具有局限性的民族的框子来看俄国的革命，并把革命任务归結为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国。这样提問題是根本錯誤的，这种提法籠罩着一种导致第二国际崩潰的該受詛咒的民族局限性。

摘譯自《国际主义的策略》(1917年9月)，載于《无产者报》1917年9月6日第10号第4—5版。

我們来总结一下在我国革命和西欧革命的发展速度上出現不平衡的时期。毫無疑問，我們或多或少都曾是怀疑論者，但是我們大家曾一致认为，欧洲革命的速度应该和我国革命的規模相近。毫無疑問，我們大家曾一致认为，我国十月革命这一事实本身，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我們的社会措施、废除和公布旧条約、公开建議举行和談，所有这一切将会直接推动西欧风潮的发展。我們曾认为，这种震动将削弱欧洲資本主义的堡垒，为我們向俄国資產階級和欧洲資產階級进攻建立新的、日益壮大的支柱。这儿出現了某种不平衡，它的极其深刻的根源在于我国落后，在于我国无

力經受这种长期的世界大屠杀，然而却被卷进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漩渦。

从这种尖锐的不平衡中，我国革命在其他国家之先，远在欧洲革命之前成长起来了。它在自己发展的最初阶段就没有得到必要的支持。因此产生了我們所面临的一切极其深刻的策略上的困难。而現在（这种想法目前好象是个磨損了的硬币，然而它現在还保持自己的价值），不管我們怎样自作聪明，不管我們发明出什么样的策略，只有欧洲革命才能真正地拯救我們。

摘譯自《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18年3月7日），載于《联共（布）代表大会和代表會議速記記錄。第七次代表大会》莫斯科1928年版第67—68頁。

如果我們仅仅根据这些事实，那么，当然，我們就是在英国战胜的情况下，也会陷入最不幸的状况。因为在現代战争中付出代价的从来就是最弱的国家，而由于事物的整个历史进程，俄国已經成为所謂大国中最弱的一国。从这种观点出发，資產階級报刊认为如果我們的盟国同我們一起参加談判，我們就会处在更加有利的地位，这种論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当然是不对的，因为为了这个目的，我們就要首先繼續进行战争，而繼續进行战争，就要大量消耗我們的經濟力量，使国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陷于破产。这样，我們就会更加削弱我們在将来和平談判中的作用，最后，各国資本家就会彼此算賬，而迫使我们賠償一切伤亡和損失。因此，我們要避免最后彻底失敗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我們的命运——俄国革命的命运——同西欧革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摘譯自《談判总结》（1918年2月14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上的报告），載于《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1分册莫斯科1926年版第108頁。

《和平綱領》按其內容來說同編在第一卷中的《戰爭與國際》是緊密地銜接在一起的。

在《和平綱領》中一再重復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不能在民族範圍內勝利完成的論斷，在某些讀者看來也許已被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將近五年的經驗推翻了。但這樣的結論是沒有根據的。工人的國家在一國而且是在落後的一國抗住了全世界，這個事實證明無產階級有雄偉的力量，這種力量在其他比較先進、比較文明的國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蹟來的。可是，我們雖然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保持為一個國家，但是我們並沒有達到甚至還沒有走近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階段。這個時期為革命—國家的自衛而進行的鬥爭使生產力大為下降；而只有在生產力發達和繁榮的基礎上，社會主義才是可以想象的。同資產階級國家進行的貿易談判、租讓、熱那亞會議等等，都是不可能在民族國家範圍內孤立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極其鮮明的證據。當其餘的歐洲國家還是資產階級掌握着政權的時候，我們為了打破經濟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設法和資本主義世界達成協議；同時可以確信地說：這種協議至多只能幫助我們治愈某些經濟創傷，獲得某些進展，可是**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高漲只有無產階級在歐洲幾個最重要的國家內獲得勝利以後，才會是可能的。**

歐洲不僅是地理名詞，而且是經濟和政治名詞，最近幾年的事件——歐洲的衰落，美國實力的增長，勞合—喬治借助於把帝國主義的與和平主義的方法同時並用來“拯救”歐洲的嘗試——鮮明地證明了這一點。

目前，歐洲工人運動處在防禦、積聚力量和準備的時期。奪取政權的公開革命戰鬥的新時期必然會提出革命歐洲的各族人民相互之間的国家關係問題。唯一能夠綱領性地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歐洲聯邦。既然俄國的經驗提出了蘇維埃國家這一最合乎自然

的无产階級专政形式，既然其他国家的无产階級先鋒队在原則上接受这种国家形式，那就可以設想：在恢复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时，欧洲无产階級将提出欧洲联邦苏維埃共和国的綱領。俄国在这方面的經驗是极为有益的。它证明在无产階級制度下，最广泛的民族和文化自治同經濟上的集权制是完全相容的。在这种意义上說，轉譯成苏維埃国家語言的欧洲联邦口号不仅保持着自己的全部意义，而且看来还刚刚开始預示出自己在即将来临的社会革命时代中的巨大意义。

摘譯自《〈和平綱領〉跋》(1922年)，載于《战争与革命》第2卷莫斯科1925年版第503頁。

托洛茨基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即在取得政权的时候說过：“如果欧洲人民不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我們就会被打倒，这是肯定无疑的。不是俄国革命将在西方掀起斗争的旋风，就是各国資本家将扼杀我国的革命。”

摘譯自《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1932年)，載于《俄国革命史》伦敦1936年版第1231頁。

47. 但是，正是战争的曠日持久的性质，将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苏联过渡时期的經濟与官僚主义計劃的矛盾。許多巨大的新企业可能表明只是一大堆死資本。在政府迫切需要日用必需品的影响下，农民經濟中的个体主义傾向将会大大加强，集体农庄內的离心力量将随着战争逐月增长。不受监督的官僚的統治将会变成一种軍事独裁。缺少一个生气勃勃的党作为政治上的监督者和調节者，就会导致矛盾的急剧积累和加剧。在如火如荼的战争气氛中，人們将会看到农业和手工业方面急剧轉向个体主义原則、轉向吸收外国的和“盟国的”資本，将会看到对外貿易垄断制的破坏，政府对托拉斯的监督的削弱，托拉斯相互間竞争的尖銳化，以及它們同工人之間发生冲突等等。在政治方面，这些过程可能意味着波拿巴



主义已臻于成熟，同时在所有制关系方面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或一系列变化。換句話說，假使战争曠日持久而与此同时世界无产阶级又消极被动，那末苏联内部的社会矛盾不仅可能而且一定会导致一場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反革命。

48. 由此而得出的政治結論是明显的：

(1) 在战争曠日持久的情况下，只有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拯救苏联这个工人阶级国家。

(2) 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只有在摆脱苏联的官僚而完全独立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友好的”、“結盟的”以及敌对的国家中准备无产阶级革命。

(3) 无条件地支持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军队的行动，必須同对战争和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所进行的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批評密切地配合起来，必須同在苏联国内建立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維克列宁主义革命党的工作密切地配合起来。

摘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  
紐約1934年版第21—22頁。

工人国家的正确政策不能降低到仅仅限于本民族的經濟建設。如果革命不循着无产阶级的螺旋綫向国际舞台扩展，那它必然会开始沿着官僚的螺旋綫局限于民族范围之内。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不发展成欧洲和世界規模，它必然会朝着它本身崩溃的方向发展。作为广泛的历史远景，所有这些都是完全无可爭辯的。

摘譯自《苏联与第四国际》(1934年)，  
紐約1934年版第4頁。

然而，我們能够指望苏联在即将到来的大战中不致战敗嗎？对于这个坦率地提出的問題，我們將同样坦率地回答：如果战争始終只是一場战争，苏联战敗将是不可避免的。从技术、經濟和軍事意义上說，帝国主义是无可比拟地更为强大的。如果帝国主义沒有

因西方的革命而陷于瘫痪状态的话，它将会鏟除这个十月革命所产生的制度。

人們可以这样回答：“帝国主义”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也是被矛盾弄得四分五裂的。这是十分正确的，如果帝国主义不是因为有这些矛盾的话，苏联早就从舞台上消失了。苏联签订的外交和军事协定有一部分就是建立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的。然而，如果看不到这些矛盾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消失，那将是一个致命的錯誤。正如从最反动的政党到社会民主党这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在无阶级革命的直接威胁面前会消失一样，为了阻止苏联取得军事胜利，帝国主义的对抗也总会找到妥协办法的。

.....

如果资产阶级盟国得到这样的物质保证，即莫斯科政府不仅在战争的壕沟上而且在阶级的壕沟上也同它们站在一边，当然情况就会根本不同了。资本主义的“和平之友”利用苏联将在两面夹攻之下所遭到的困难，当然会采取一切措施在对外贸易垄断方面和苏联财产法方面打开一个缺口来。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白俄流亡者所展开的日益强大的“保卫”运动，就是完全依靠这种估计的。如果你认为，世界斗争将只限于在军事方面进行下去，那末，盟国就有达到它们的目的的好机会。如果没有革命来干涉，苏联的社会基础不仅在失败的情况下，就是在胜利的情况下也必然要被摧毁。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65—167页。

### 三、鼓吹“欧洲联邦”是 “革命时代的口号”

宣称“欧洲联邦是我们已经进入的革命时代的口号”，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创立“欧洲共和联邦，以作为世界联邦的基础”。断言“无产阶级只有以共和欧洲为出发点，才能使全世界革命化，才能把全世界组织起来”。说“欧洲革命归根结蒂将会对美洲也发生决定性的影响”。胡说“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东方的完全解放”。

在上述历史条件下，对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说来，问题不在于保卫这个过时的和陈旧的民族“祖国”，因为它业已变成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创立一个远为强大的、更能抵御强敌的祖国——欧洲共和联邦，以作为世界联邦的基础。

摘译自《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和平》(原名《战争与国际》)  
(1914年10月)，纽约1918年版第29页。

但是现在，在俄国革命的大有希望的开端之后，我们有一切理由期望，就在这次战争期间，强大的革命运动会在全欧洲开展起来。很明显，它只有作为全欧的运动才能顺利发展和走向胜利。如果它仍然是民族范围内的孤立的运动，那么它必然会遭到毁灭。我们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指出了威胁着俄国革命的来自德国军国主义的危险。这种危险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危险。对俄国革命来说，英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军国主义比起霍亨索伦王朝的军事机器来，并不是威胁性更小的敌人。拯救俄国革命的方法是把革命转到整个欧洲去。如果革命运动在德国扩展开来，

那么德国无产阶级就会在西方的“敌对”国家中寻找并找到对革命的反响；而如果欧洲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了政权，那么即使仅仅是为了掌握住这个政权，它也会不得不立即使这个政权去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换言之，**稳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建立，只有在全欧洲的幅员之内，也就是说在欧洲共和联邦的形式下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这种场合下，靠武力、靠工业和外交协定都不能取得的欧洲的国家联合就会成为得胜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一项迫切任务。

**欧洲联邦是我们已经进入的革命时代的口号。**不管今后军事行动的进程如何，不管外交对目前的战争如何总结，不管革命运动在最近时期的发展速度如何，欧洲联邦口号在一切情况下都将作为欧洲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政治公式而获得巨大意义。这一纲领中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民族国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框框，作为阶级斗争的基地，因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都已经过时了。只有当我们把建立新的、更高级的革命“祖国”——共和欧洲的进步任务同保守地保卫过时的民族祖国对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对“保卫祖国”这一过时的无产阶级政治纲领的否定才不再成为在思想政治上的自卫的纯粹消极的行动，而获得自己的全部革命内容。**无产阶级只有以共和欧洲为出发点，才能使全世界革命化，才能把全世界组织起来。**

摘译自《和平纲领》（1917年5月），载于《战争与革命》  
第2卷莫斯科1925年版第497—499页。

资产阶级民主派当时曾经幻想过欧洲联邦。这个理想在这次战争的第一个时期，在法国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言论里得到了虚伪的和为时已晚的反响。资产阶级不可能使欧洲联合起来，因为它把民族帝国主义的分割愿望和经济发展的联合趋向对立起来了。要把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就必须把经济从私有制的桎梏中解放出

来。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把民族发展的要求纳入自然的合理的疆域之内，把各民族结合在劳动协作的统一体中：这就是欧洲各族人民在自由自决基础上所建立的欧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其它的解决办法是没有的。如果英国在革命的发展中落后于大陆，那么这个联盟将反对英国。当大洋彼岸的美国仍然是金元共和国的时候，当纽约交易所内洋洋得意的猪哼声还没有变成临死前的沙哑声的时候，欧洲联邦将和苏维埃英国一起把自己的斗争锋芒指向北美的帝国主义专政。

摘译自《由混乱构成的秩序》（1919年1月13日），载于《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第2卷第1分册莫斯科1924年版第12—13页。

第三国际越过所有的障碍为自己开辟道路，走向并引导欧洲无产阶级走向革命。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欧洲就无法得救。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东方的完全解放。这两个过程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

摘译自《〈西方与东方〉序》（1924年7月15日），载于《西方与东方》莫斯科1924年版第II页。

一九一五年，我们在为欧洲苏维埃联邦口号辩护时曾经指出，关于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本身并不能作为反对这个口号的理由，因为不同国家和不同大陆之间的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这个情况本身就是不平衡的。欧洲国家的发展相互之间是不平衡的。然而，可以象历史事实一样绝对肯定，至少在我们考察的这个历史时期内，这些国家里面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以美洲超过欧洲的程度超过其他国家。对于美洲有一种衡量不平衡的尺度，而对于欧洲则需要另一种尺度。欧洲各国之间的紧密的有机联系是地理和历史条件决定的，是无法摆脱的。现代欧洲的资产阶级政府象一伙绑在同一个车上的杀人犯。如前所述，欧洲的革命归根结底将会对

美洲也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从直接影响来说，从历史发展的直接顺序来说，德国发生革命对法国比对美国的影响要大得无可比拟。欧洲苏维埃联邦这个口号的政治生命力正是来自这种历史上一脉相传的关系。我们谈的是它的相对的生命力，因为这个联邦理所当然地将会通过苏联这个巨大的桥梁扩大到亚洲，从而实现一个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盟。然而这将组成另一个时代，或者说是继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出现的新的伟大的一章。当我们进一步接近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也将发现与之相适应的法则。

摘译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纽约1936年版第14—15页。

官方的爱国主义乃是保卫剥削者利益的假面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要轻蔑地把这个假面具抛在一边。他们不要保卫资产阶级的祖国，而只要保卫本国以及全世界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利益。第四国际的提纲宣布说：“为了反对‘保卫祖国’这个反动口号，必须提出以革命手段粉碎民族国家的口号。必须提出作为走向‘世界社会主义联邦’的一个阶段的‘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纲领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欧洲疯人院。”

摘译自《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第四国际  
紧急会议宣言，1940年5月)，纽约版第12页。

## (六) 关于战争与和平

### 一、战争的根源

断言民族国家已经过时，“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可容忍的障碍”。声称世界大战是由生产的“世界性”和占有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产生的，是生产力对于民族和国家这种政治形式的反抗，其意义在于“摧毁当前的民族经济中心，而代之以世界经济”。

资本主义所发展的生产力，已经突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民族国家，即当前的政治形式，对于这些生产力的运用来说，已嫌过于狭窄。因此，我们经济制度的自然趋势，乃是力求打破国家疆界。整个地球，陆地与海洋、地面和地下，都已变成一个经济工场，地球的各个部分已彼此不可分离地连结着。这项工作是由资本主义来完成的。与此同时，这项工作的完成也促使资本主义国家使世界经济服从各国资产阶级的利润收入。帝国主义的政治首先证明：在一七八九——一八一五年，一八四八——一八五九年，一八六四——一八六六年以及一八七〇年等革命和战争中产生的旧式的民族国家，已经衰老，它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可容忍的障碍。

当前的战争，归根结蒂是生产力对于民族和国家这种政治形式的一种反抗。它意味着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的民族国家的

瓦解。

民族，作为一种文化的、思想的和心理的事实，还一定会繼續存在下去，但是它的經濟基础却已被从脚下抽去了。說当前这次流血冲突是保卫民族的事业，所有这些說法要么是伪善，要么是盲从。相反地，**战争的真正的和客观的意义，乃是摧毁当前的民族經濟中心，而代之以世界經濟。**但是各国政府謀求解决这一帝国主义任务的方法，不是通过全人类生产者的明智的、有組織的合作，而是通过战胜国資本家阶级对于世界經濟的利用；而战胜国經過这次战争，就会从一个大国变成一个世界强国。

**战争宣布了民族国家的沒落。但同时它也宣布了資本主义經濟制度的沒落。**資本主义利用民族国家已使世界上全部經濟制度进行了革命。它把整个世界瓜分給少数大国巨头，大国周围是处在列强角逐之中的它們的卫星国，即弱小国家。建立在資本主义基础上的世界經濟的未来发展，意味着无休止地爭夺資本主义剝削的新而又新的場所，而这种場所却只能得自这同一个唯一的来源——地球。在軍国主义旗帜下进行的經濟竞争，是与破坏人类經濟基本原则的掠夺和毁坏行为不断交替的。**世界生产不仅反抗着由民族和国家的区分而产生的混乱，而且也反抗着現在业已陷入野蛮的无政府状态中的資本主义經濟制度。**

摘譯自《布尔什維克与世界和平》(原名《战争与国际》，1914年10月)，紐約1918年版第20—23頁。

我們生活的时代首先是国际政治的时代。在“和平”、“安靜”的时期，国际政治問題对普通人來說，好象是对于他們的个人命运沒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天上的星星問題。但是，我們进入这样一个时代已經有几年了，即在这个时代里由于各种事件，每个公民的命运，不管他願意与否，不仅和他本阶级的本国的命运，而且和整个国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資本主义的功績或者說罪恶，——



你爱怎么说都行。资本主义把各民族结合成一个强大的经济有机体，同时又使各民族的统治阶级互相敌视。可以说，资本主义是通过国际交换，即世界市场，用苦役的暴力锁链把各民族联结成为一个整体，各民族为了力求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苦役中占个位置，被迫要打破这条锁链，从而把这个整体撕得四分五裂。这就是当代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因。它是由生产的世界性和占有、即资本主义掠夺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产生的。资产阶级是无法解决这个矛盾的。

摘译自《捍卫世界革命》(1918年11月8日)，载于《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第1卷莫斯科1923年版第377页。

9. 在资本主义同中世纪地方割据主义进行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正统的活动场所。但是，民族国家刚刚形成，就成了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障碍。生产力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再加上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这个主要矛盾，使资本主义的危机变成世界性的社会制度的危机。

摘译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纽约1934年版第9—10页。

## 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反战策略

### 1.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

声称“民族疆域的范围对欧洲的生产力已经是过于狭小”；一九一三年的经济危机“在各统治阶级中引起了紧张的神经质，期待和谨慎迅速地消溶于神经质之中，结果在一九一四年爆发了战争。”

一九一四年的战争，是历史上一种被自身固有的矛盾所摧毁的經濟制度的最巨大的崩潰。

一切以指导资产階級社会、以资产階級社会的名义說話和以剝削这个社会为其任务的历史势力，都被这次战争宣告了历史性的破产。这些历史势力把資本主义当作人类文明的制度来加以保卫，从而資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灾难主要地也就是这些历史势力自身的灾难。事变一开始，把各个国家的政府和軍队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使各民族暂时团結在它們的政府和軍队周围。但是当被隆隆大炮所震聳的人民，一旦認識到目前发生的事变的真相和可怕性之后，各国政府就将遭到更为悲惨的失敗。

当前历史所帶給人民的动乱越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的反作用也越有力。

資本主义創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經濟制度的物质基础。帝国主义把資本主义民族导向历史性的混乱。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强烈地迫使无产階級走上革命的道路，从而指出了摆脱这种混乱局面的出路。

摘譯自《布尔什維克与世界和平》(原名《战争与国际》，1914年10月)，紐約1918年版第23—24頁。

我們回忆一下：长期的蓬勃的工业繁荣，在一九一三年为經濟危机所代替，这一危机的性质已不仅是行情性的，而且也是結構性的：民族疆域的范围对欧洲的生产力已經是过于狭小了。一九一三年的危机在各統治階級中引起了紧张的神經质，期待和謹慎迅速地消溶于神經质之中：結果在一九一四年爆发了战争。

摘譯自《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1937年8月9日)，載于《反对派通报》1937年9—10月第58—59期第10頁。

## 2. 反战策略

1. 声称拒绝利用战争的失败进行“冒险主义的”“投机”。说失败只会“瓦解无产阶级的意志”，使无产阶级“组织涣散”。革命从战争失败中获得的遗产只是“被战争破坏得乱七八糟的经济生活，是耗费一空的国家财政以及困难重重的国际关系”。攻击“俄国失败——祸害较小”的口号给德国革命者“制造了困难，也没有丰富我们的鼓动工作”。说什么俄国的失败必然加强德国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暂时胜利了的俄国革命，也只是一个历史的流产”。断言无产阶级革命政策“不能把失败看作哪怕是自己的间接盟友”。

《我们的言论报》<sup>①</sup>（在它彻底转入左翼编辑手中之后也是这样）和《社会民主党人报》<sup>②</sup> 有三点不一致的地方。这三点涉及失败主义、争取和平的斗争和将来的俄国革命的性质。《我们的言论报》否定失败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报》否定为和平而斗争的口号…… 以国内战争与之对立。最后，《我们的言论报》持下列观点：我党的任务应当是为社会主义变革而夺取政权。《社会民主党人报》继续坚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立场。

摘译自《战争与革命》第1卷莫斯科版第27页。

难道沙皇制度的失败，不能在实际上促进革命事业吗？

这种可能性，是无可争议的。日本天皇和他的武士对于俄国

① 《我们的言论报》是大战期间托洛茨基在巴黎出版的俄文报纸。——编者注

②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布尔什维克的报纸。——编者注

的解放是絲毫也不感兴趣的，然而俄日战争却给了此后发生的革命事件以强有力的推动。

因此，德俄战争也是会有同样结果的。

但是要对这些历史的可能性作出正确的政治估计，我们就必须考虑到下列情况。

那些相信俄日战争引起了革命的人，既不知道也不理解历史事件以及它们的关系。那次战争仅仅只加速了革命的爆发，但是那次战争也削弱了革命。因为，如果革命是从内部力量的有机增长中发展出来的话，它就会来得迟一些，但是会来得更加强烈和更有计划。所以，战争对于革命是没有什么真正好处的。这是第一点理由。第二点是，俄日战争在削弱了沙皇制度的同时，却加强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对于目前的德俄战争来说，上述两点理由就更加适用了。

在一九一二——一九一四年期间，俄国由于工业的巨大发展，终于把这个国家从反革命的消沉状态里拖了出来。

革命运动在劳动群众的经济和政治罢工的基础上的增长，广大阶层人民的反抗的增长，导向了一个新的暴风骤雨时期。但是和一九〇二——一九〇五年相比，这次运动是在一种远为自觉，更有计划的状态中发展的，而且还可以说，是在一种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发展的。革命运动的成熟还需要时间，但是它并不需要普鲁士武士的枪矛。相反地，普鲁士武士倒给了沙皇以这种机会来扮演塞尔维亚人、比利时人和法国人的保护者的角色。

如果俄国遭到惨败，这次战争就能够促使革命更快地爆发，但是要以它的内在的衰弱作为代价。而如果革命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占了优势，那么霍亨索伦王朝军队的刺刀也会转而进攻革命的。这种前景就很难不使俄国的革命力量瘫痪；因为我们不能否认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站在霍亨索伦王朝的刺刀后面这一事实。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俄国的失败必然是以德奥在其他战场上获得决定性胜利为前提的，而这就意味着中欧和东南欧被迫保持着民族和政治的混乱，以及德国军国主义对整个欧洲的无限控制。

强迫法国裁军，索以亿计的赔款，把那些被征服国家强拉入关税壁垒，以及强加给俄国的一项通商条约，这一切联系起来，就会促使德帝国主义成为今后数十年的局势的主人。

随着无产阶级政党投降民族主义的军国主义而开始的德国的新政策，在未来的若干年内还会加强。德国的工人阶级固然可以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靠着那胜利的帝国主义的餐桌上的面包屑来养活自己，但是社会革命运动却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暂时胜利了的俄国革命，也只是一个历史的流产，这点用不着再证明。

因此，目前在各国间进行的这一次战争，是由资产阶级所强加给各国的军国主义来支配的，战争的本身包含着一些奇怪的矛盾，这些矛盾既不是战争本身，也不是进行战争的各国政府能够用任何方法，为着未来的历史发展的利益，来予以解决的。社会民主党人过去未能够，现在也不能够，把他们的目的和这次战争的任何历史可能性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不能够和三国同盟的胜利或者协约国的胜利结合起来。

摘译自《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和平》(原名《战争与国际》，1914年10月)，纽约1918年版第85—89页。

战争是阶级社会的一种历史的考试，它测验社会物质基础的力量、各阶级之间物质联系的牢固程度、国家组织的稳固性和灵活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胜利——在其他相同的条件下——揭示某一种国体的相对的牢固程度，提高这种国体的威望并且从而使它得到巩固。反之，失败损害国家组织的威信，从而使它受到

削弱。

俄国在反革命势力获得胜利之后，不可能发展胜利的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它会暴露出自己在社会和国家制度方面的一切流弊；——对于这一点在战前没有一个思维健全的社会民主党人会加以怀疑。当时我们党坚定不移地反对战争。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把我们的革命的或改良的政治希望同沙皇制度在军事上的失利联系起来，虽然我们毫不怀疑，一旦爆发战争，失利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跟现在的社会爱国主义的告密分子一样，认为一个革命的阶级盼望本国政府在军事上遭到破产是“道义上不能容许的”。这也不是由于盲目的民族和国家的本能——在俄国一些革命者当中这种本能具有十分强大的、能大大抵消对沙皇制度的仇恨的力量。最后，这也不是由于对战争必然带来的种种苦难的一般人道的考虑。数百以至数千年来的阶级社会的“正常”生活，都是建筑在群众遭受最骇人听闻的苦难上面，战争只不过是的一段时间内把这些苦难集中起来而已；如果战争是求得解放的一条最可靠的或最短的道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就会下定外科医生那样的决心毫不犹豫地走上这条道路，——当外科医生认为应当开刀时，他是不害怕痛苦和流血的。

如果说我们拒绝拿战争以及战争的失败进行投机，那末这并不是根据民族的和人道的理由，而是根据国际以及国内方面的革命的和政治的理由。

既然，在其他相同的条件下，失败动摇某一种国体，所以由此方失败所决定的对方的胜利巩固对方的国家组织。而我们不知道有这样一种欧洲的社会和国家机体，巩固这种机体对于欧洲无产阶级是有好处的；同时我们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也不能让俄国担任这样一个被遴选国家的角色，即其他欧洲各国的发展利益都应服从它的利益。问题的这一方面在我们的报纸上已经讲得够清楚的

了，現在就用不着更加詳細地來談了。

但是，即使不超出狹隘民族發展前景的範圍，俄國社會民主黨也不能把自己的政治計劃同軍事潰敗的革命化影響聯繫起來。

只有在這樣的历史條件下，即當內部改革的已經成熟的必要性在社會中根本找不到能夠實現、或者強迫實行這些改革的新的历史階級時，失敗才是無可爭辯和不可代替的發展推動力。在這種條件下，打了敗仗以後，由上面實行的改良，能夠有力地推動進步社會階級的發展。可是戰爭是一個異常矛盾的、很能引起兩種相反後果的历史發展的因素，所以認為自己是站在牢固階級基礎之上的、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信心的革命政黨，不能夠把失敗的道路看作是自己獲得政治勝利的道路。

失敗使統治的反動派組織渙散和士氣頹喪，但同時，戰爭也使得整個社會生活、首先是使得工人階級組織渙散。

其次，戰爭不是革命階級能夠對它進行控制的“輔助性的”因素；不可能在它提供了預期的革命推動力之後就任意把它消滅掉，就如同完成了自己工作的摩爾人<sup>①</sup>那樣。

最後，從失敗當中發展起來的革命所獲得的遺產，是被戰爭破壞得亂七八糟的經濟生活，是耗費一空的國家財政以及困難重重的國際關係。

如果說甚至在反革命勢力大獲全勝的暗無天日的年代里，俄國社會民主黨也斷然反對冒險主義的戰爭投機，那末這正是因為：假使戰爭能夠推動革命的，它同時也能夠造成這樣一種環境，這種環境使得人們很難從社會方面和政治方面利用革命的勝利。

然而現在我們不得不不僅估計到戰爭和失敗會朝着什麼方向

---

① 源於席勒的悲劇《熱那亞的費埃斯柯的陰謀》中的一句話“摩爾人已經干完了自己的事，摩爾人可以走開了”，比喻一個人完成了某種不光彩的任務之後已經沒有什麼用處了。——編者注

影响政治发展进程，我們首先不得不在失敗所造成的那个基础上进行活动。因为，不管战争将来发生什么样的波折，有一点是可以有充分把握說的：要在短期內把自己的实力恢复和增加到这种程度，以致在这一次战争中就可以实现世界性征服的计划，——关于这一点认真地說是根本談不到的。沙皇的军队已經被击潰了。它可能有一些个别的胜利。但是这场战争它打輸了。目前的一些失敗标志着軍事潰敗的开始。我們要再重复說一下：社会民主党人无法任意給自己創造历史环境。它只是历史过程的各种力量中的一种力量。它不得不站在历史为它所創造的基础上。

現在，在俄国的一切政党中政治上起领导作用的一代，完全是以我国发展中最近十至十五年来經驗教育出来的。仅仅由于这一点，他們一想到軍事潰敗可能造成的国内后果，就必然情不自禁地同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五年間的事变进行类比。一九〇三年，群众性罢工的狂风大浪震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当时把这些事变看作是革命的序幕。一九〇四年一月，日俄战争打响了。它馬上就使得革命运动停止了。在半年多的時間內，国家就好像丧失了知觉一般。戰場上的失敗灭了政府政权的威风而使它受到了削弱，同时有力地助长了各社会阶级和集团的不滿情緒。在这一基础上，革命急剧地向前发展了。

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間，正如在一九〇三年一样，群众运动的增长主要又是表现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罢工。这时候，工人运动依靠着俄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内容最丰富的十年的經驗，在更加高得多的水平上开展起来了。又正如上次一样，战争一爆发之后，馬上就使革命运动的发展停止了。国内几乎是一片万籁无声的沉寂。政权在最初打了几个胜仗、而且是性质极其有限的胜仗之后，就神魂顛倒起来，采取了革命前俄国所沒有見过的反动的方針。但是“打胜仗”的时期很快就結束了。随后接踵而来的接二連



三的失敗，徹底把統治集團搞得暈頭轉向，引起了資產階級地主聯盟的愛國主義的憤懣情緒，這樣一來，就為廣泛的社會運動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根據同過去十年的類比，可以設想，在有產階級的“反政府”動員之後，民主派的、首先是無產階級的動員一定會隨之而來，其結果就將是革命的震蕩。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開始散布俄國失敗會起拯救和解放作用這種希望的人，正是那些原來最殷切地盼望俄國勝利的人。英國的一位大臣勞合-喬治已經看到被潰敗驚醒了的俄羅斯巨人在怎樣扔掉反動派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鎖。王德威爾得在戰爭開始的時候曾經要說服我們的杜馬黨團，使之相信將來俄國勝利的進步意義，現在正在搖頭擺腦滔滔不絕地大談其俄國失敗的好處。愛爾威在寫文章談論痛苦的益處，說它是推動俄國歷史發展的一個因素。最後，在俄國獲勝的那幾個月里按照“先勝利，後改革”這個公式進行推理的某些社會愛國主義的投敵分子，在華沙失守之後奔走呼號要求大赦……在這種明顯的“失敗主義”之中，當然沒有任何革命性的成分。勞合-喬治也好，王德威爾得也好，愛爾威也好——他們全都把希望一古腦兒寄托在軍事失敗會喚醒俄國統治階級“國事理智”這一點上面。他們全都在內心深處輕視俄國，在對俄國所持的態度上都是赤裸裸的失敗主義者，他們指望着不要革命階級直接干預，軍事破產會有一種獨立的和自動的力量。而從我們的觀點看來，對於俄國最近將來的命運具有中心意義的，正是關於戰爭和失敗如何影響革命力量覺醒、團結和積極起來的問題。

從這種觀點看來，必須首先說明：在戰爭對人民群眾情緒的影響這一方面，如果把過去的經驗簡單地搬到當前的時代來，那就大錯特錯了。當前的潰敗，按其巨大的規模，也就是按它對於國內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破壞作用來說，根本不可以同日俄戰爭那一次殖民冒險相比擬。一方面，這當然一定會使得現在的失敗對於

人民群众的意識发生更加广泛和深刻得多的作用。在这里，社会民主党拥有进行革命鼓动的取之不尽的源泉，这种鼓动的每一句话都会引起强烈的共鳴。但是，另一方面，必須明确，耗尽居民的經濟和精神力量以及种种資財的軍事潰敗，只是在达到某种限度以前能够引起积极的憤怒、抗議和革命行动。耗費超过某种界限，就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以致能摧殘人們的精力和麻痹人們的意志。絕望、消沉和精神頹喪就会开始产生。失敗和革命之間的联系，具有不是机械的，而是辯证的性质。

劳合-乔治以及其他一些人希望俄国統治者会在失敗的独立自主的力量下面发出自由主义的“智慧之光”——如果說这种希望散发出絕望的自由主义的庸俗气味，那末，另一方面，根据被作了錯誤解释的“日俄”战争經驗断言軍事失敗对于群众会产生自动的革命化的影响，就是一种幼稚的糊涂思想。正是这次战争的巨大規模，在它不定期拖延下去的条件下，能够在长时期內妨碍整个的社会发展，因而，首先是妨碍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因此，必須为爭取尽快地停止战争而斗争。一个接着一个的失敗进一步发展下去，对于革命并没有好处。相反地，爭取和平的斗争，对于我们說来是革命的自我保存的遺訓。劳动者反对战争的动員进行得愈坚强有力，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对失敗的經驗就会估計得愈充分，它就会愈快地变成革命运动的推动力。

摘譯自《軍事潰敗和政治前途》(1915年9月)，載于《托洛茨基全集》第9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146—151頁。

毫無疑問，俄国工人运动中，护国主义情緒和社会爱国主义思想风行的相当重要原因是去年德奧軍队的胜利攻势。失敗不仅使当权的官僚和整个六三联盟<sup>①</sup>全部陷于混乱，而且也使工人阶级

---

<sup>①</sup> 指1907年6月3日在俄国发动反动的“六三政变”的反革命集团。——編者注

队伍陷于混乱。失败不仅起了它的革命化的作用，而且还起了它的败坏士气和瓦解瘫痪的影响。“俄国失败——祸害较小”的口号至少在理論預見的意义上讲是个猜测性的口号，在鼓动的意义上是全然无用的，并因为这样而被俄国的所有国际主义集团所否定，这一口号终于在政治事件的考驗中被粉碎了：如果失败瓦解无产阶级的意志，給它的广大群众带来处于民族的和所謂“生物的”中間的那种情緒，那么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就不能把失败看作哪怕是自己的間接的盟友。

摘譯自《俄国的社会爱国主义》(1916年2月10日—3月15日)，  
載于《战争与革命》第2卷莫斯科1925年版第174頁。

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會議的思想准备工作的过程中以及此后以其決議为基础的工作中，《我們的言論报》过去和現在都不得不同作为一种思潮的极端主义进行思想斗争，这一思潮是对社会爱国主义和观望的調和主义的模糊观念的不調和的反动，它往往在忽視过去的发展所造成的或由战争引起的政治問題和民族問題中，在夸大革命的口号(“俄国失败——祸害较小”、“不是爭取和平的斗争，而是国内战争”)或者跟所有各种具有細微差別的国际主义在組織上划清界綫中寻找反对上述現象的虛假保障。

摘譯自《〈我們的言論报〉周年紀念》(1916年5月16日)，同上，第116—117頁。

2. 宣传停止战争的口号对无产阶级来說是“阶级的自我保全的口号”，只有在爭取和平的口号之下，“現在才能对群众进行真正广泛的动員”。指責列宁用国内战争的口号来同“爭取和平的斗争对立起来”，认为“爭取和平的斗争的口号是毫无革命內容的”。声称这种对立使国内战争的口号“悬在空中”，失去意义。

追随《社会民主党人报》立場的集团(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和波兰“反对派”)在单独的预备会议上把自己的立场表述如下:谴责各正式的社会主义政党;提出革命的阶级政策的原则并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联合志同道合的左派。争取和平的群众斗争的任务在这个提法中甚至提也没提到。列宁在自己的演说——他的最有原则性的演说正是在这次预备会议上发表的——中证明说,争取和平的斗争口号是毫无革命内容的。

阿克雪里罗得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在我们的一次正式会议上,在讨论表决方法问题时,阿克雪里罗得证明说,目前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基本倾向在进行斗争:一种倾向是想要利用会议,或者更确切点说,利用这次会议的一部分人,在某种革命策略纲领的基础上,把他们联合起来,作为建立第三国际的基石;另一种倾向是想依靠一切对战争抱否定态度的社会主义者,开始争取和平的国际运动,认为这正是恢复国际的最好的途径。

与此相反,《我们的言论报》的代表证明说,除上述两种倾向之外,还有第三种倾向,它认为争取和平的运动具有巨大的意义,认为只有在这种口号之下,现在才能对群众进行真正广泛的动员;但是,这种倾向同时想把争取和平的鼓动工作立即转上革命的阶级策略的轨道,决定对正在流行的社会民族主义方针采取毫不调和的态度,从而试图使这次会议成为建立第三国际的工作的出发点。

摘译自《结论》(1915年10月3—6日),  
载于《战争与革命》第2卷莫斯科1925年  
版第58—59页。

曾经提出了三种宣言草案:《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德国反对派右翼的和《我们的言论报》代表团的。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草案企图按照已被否定的决议案的精神

指出明确的斗争方法。把决议案中纯粹策略性的指示搬到宣言中来，在什么限度之内是恰当的呢，对于这一点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显然，下面的一点是与此漠不相干的，即当决议案已被否决之后，没有任何希望可以把决议案的基本策略思想搬到另一文件中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草案的主要过错是对争取和平的斗争口号抱不坚决的、模稜两可的、骑墙的态度。列宁同志充分地表示过——特别是在预备会议上，正如过去在他的一些摘要性的报告和文章中一样——，他个人对争取和平的斗争口号完全抱否定的态度。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我们的任务是不要让四二大炮沉默，而是要叫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毫无疑问，革命者同和平主义的区别，顺便说说，在于连军事手段我们也想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但是，把这一任务同争取和平的斗争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要使德国无产阶级愿意把四二大炮对准自己的阶级敌人，那末它应当不再愿意向阶级兄弟射击。换句话说，它应当在对这一战争持敌视态度的基础上同阶级兄弟联合起来，因为这场战争毁灭和摧残它自己以及塹壕那一边的它的社会同盟者。停止战争的口号，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来说，是阶级的自我保全的口号、国际接近的口号，因而是革命行动的前提。可是，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草案中，正象在它的全部政纲中一样，和平口号不是作为动员起来反对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无产阶级在当前的中心号召提出的，而是作为纯粹革命精神对和平主义的人类肉体所作的<sup>不</sup>坚定的让步提出来的。

摘译自《罗·格里姆和奥·莫尔加利》(1915年10月14日)，同上，第51—52页。

6. 在俄国国际主义者阵营里，我们首先遇到《社会民主党人报》集团。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这个组织的某些特点，这些特

点在目前的危机时代沒有使它失去重要的革命因素的作用，却妨碍了它吸收运动中的一切革命人士。从战争刚一开始时起，《社会民主党人报》就对争取和平的斗争的口号采取敌对的态度，而經驗证明，正是在这些口号下，无产阶级反对派到处动员起来了并正在动员起来，并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現在才能有成效地进行自己的工作。国内战争的公式实质上正确地表达了在已經到来的时代里一切形式的阶级斗争必然尖锐化的事实，但由于同争取和平的斗争对立起来，因而是悬在空中的，并且对我们所处的时期來說它正在失去自己的意义。最后，似是而非的和自相矛盾的公式“俄国失败——祸害較小”给我们的德国同志们制造了困难，也沒有丰富我们的鼓动工作，反而增加了它的困难，这个公式是跟我们共同的旗帜作斗争中的最重要的社会爱国主义的蛊惑煽动的武器。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立即把这些公式变成国际主义的绝对标准，对革命口号的这种夸大就更为危险了。

上述这些消极的特点从来沒有妨碍我们——而現在更不会妨碍——承认与《社会民主党人报》协同行动的迫切必要性。

摘譯自《俄国社会民主党內的派別》  
(1916年8月)，同上，第208—209頁。

### 三、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反战策略

#### 1. 战争的性质和起因

声称大国間的现代战争“并不就是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間的冲突，而是两个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在两个陣营中都既会有法西斯主义国家”，“也会有‘民主主义的’国家”。攻击为拥护民主反对法西斯而

战的口号，說这是騙人的。认为无产阶级只能提出这样的問題：“資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某一个帝国主义陣营的胜利，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污蔑苏联的外交政策“为了斯大林集团的利益而牺牲了世界革命的利益”，說什么“斯大林与希特勒的联盟揭开了世界大战的序幕”，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領袖們“帮助资产阶级发动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

18. 保卫国家的騙局，是到处都补以保卫民主的騙局作为掩飾的。如果說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今天也不把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看做是一样的东西，而且随时准备击退法西斯主义对民主主义的进攻，那末在战争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不应该支持民主政府来反对法西斯政府嗎？

真是奇談怪論！我們是通过无产阶级的組織和方法来保卫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我們决不把这种保卫的責任委托給资产阶级国家（“Staat, greif zu!”<sup>①</sup>）。如果說在和平时期，我們同最“民主”的政府就处于不可調和的对立状态，那末，到了資本主义的一切丑行和罪行都采取了最殘酷而且血腥的形式的战争时期，难道我們还能对它負担絲毫的責任嗎？

19. 大国之間的一場現代的战争，所意味着的并不就是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間的冲突，而是两个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同时，战争不可避免地具有国际的性质，在两个陣营中都既会有法西斯主义的（半法西斯主义的，波拿巴主义的，等等）国家，也会有“民主主义的”国家。法帝国主义的共和国形式在过去并没有防止它在和平时期把自己的基础建立在波兰、南斯拉夫和羅馬

---

① 归国家負責！——編者注

尼亚的軍事資產階級專政之上，而將來在必要時它也會恢復奧匈君主國家來阻止奧地利與德國的聯合。最後，在法國本身，議會民主制今天已經相當削弱了，這個議會民主制如果在戰爭開始前還沒有被推翻的話，那末它毫無疑問將會成為戰爭的首批犧牲者之一。

.....

22. 帝國主義戰爭，遠比資本主義統治的國家形式的問題更為重要。它向每一個民族資產階級提出了民族資本主義的命運問題，向各國的資產階級提出了總的資本主義命運的問題。因此無產階級也必然提出這樣的問題：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某一個帝國主義陣營的勝利還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摘譯自《戰爭與第四國際》（1934年6月），  
紐約1934年版第11—13頁。

為了替自己的軍國主義和沙文主義政策辯解，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宣傳一種思想，彷彿新的戰爭將有保護自由和文化，抵制法西斯侵略者的使命：一方面——由新舊大陸的民主大國所領導的“和平”國家；另一方面——德國、意大利、奧地利、匈牙利、波蘭、日本。這樣的分類，即使從純粹形式方面來看，也是值得懷疑的。南斯拉夫國家的“法西斯性”並不遜於匈牙利，而羅馬尼亞也不比波蘭更接近民主一些。軍事獨裁不但統治着日本，而且統治着中國。斯大林的政治制度日益接近希特勒的制度。在法國，甚至在新的戰爭發生以前，法西斯主義就有可能掃除民主：“人民陣綫”的政府在任何地方都盡其所能地幫助這一轉變。我們看，在現代世界體系中，區分野狼和羔羊並不這麼容易呵！

摘譯自《在新的世界大戰之前》（1937年8月9日），載於《反對派通報》1937年9—10月第58—59期第8頁。



为维护民主反对法西斯而战这个口号也同样是骗人的。难道工人们忘记了英国政府帮助希特勒及其匪徒取得政权了吗！帝国主义民主国家事实上是历史上最大的贵族国家。英法荷比都是建立在对殖民地人民的奴役上的。美国这个民主国家则是建立在对整个大陆的广大财富的掠夺上的。这些“民主国家”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这些帝国主义民主国家把战争负担的很大一部分转嫁到自己的殖民地人民头上。奴隶们不得不供给血和金钱来保证自己的主人继续做奴隶主。没有殖民地的小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则是诸大帝国的卫星，分沾一部分殖民地利润。这些小国的统治阶级为了保全自己的特权是可以随时抛弃民主的。

.....

战争并没有使民主国家转化为反动的独裁政制的过程停顿下来；恰恰相反，战争正在我们眼前把这个过程进行到底。

摘译自《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第四国际紧急会议宣言，1940年5月），纽约版第12—13页。

斯大林与希特勒的联盟揭开了世界大战的序幕，直接导致了波兰民族的被奴役；这是苏联的软弱以及克里姆林宫在德国面前惊慌失措所造成的。苏联所以软弱的责任，完全在于克里姆林宫本身：在于它在统治阶层和人民之间划下一道鸿沟的内政政策，在于它为了斯大林集团的利益而牺牲了世界革命的利益的外交政策。

同上，第18页。

如果西班牙革命取得胜利，欧洲本可以开始一个革命的时代，因而就会阻止此次战争的发生的。但是这次本有种种可能获得胜利的英勇的革命却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怀抱之中被窒息了，这两个国际在这样作的时候还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积极合作。世

界无产階級又丧失了一次大希望，又增加了一次駭人的背叛的教訓。

一九三六年六月間法国无产階級的强有力运动，显示了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特別有利的条件。一个法兰西苏維埃共和国本可以立即取得欧洲的革命領導权，并在每个国家造成革命的波瀾，动摇极权国家的統治，这样使全人类免于目前这次帝国主义大屠杀及其不可数計的牺牲。然而萊昂·勃魯姆和萊昂·茹奧的极端卑鄙，怯懦和背叛的政策，在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积极援助下，竟把十年来最有希望的运动之一引上了失敗的道路。

西班牙革命的被絞杀和法国无产階級攻势的被破坏，是这次战争前夜的两个悲惨事件。資产階級深深相信，有这样的“劳动領袖”供其驅使他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連对人民的大屠杀也敢去做。第二国际的領袖們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結束的时候曾經阻止无产階級去推翻資产階級。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領袖們又帮助資产階級发动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让这次战争成为他們的政治坟墓吧！

同上，第 28—29 頁。

## 2. 反战策略

攻击一国社会主义理論“破坏了胜利了的无产階級的爱国主义和資产階級国家无产階級的失敗主义之間的內在联系”。說今天保护祖国“也就是保护束縛他們自己的鎖鏈”。宣传“为了反对‘保护祖国’这个反动口号，必須提出以革命手段粉碎民族国家的口号”“必須提出作为走向‘世界社会主义联邦’的一个阶段的‘欧洲社会主义

联邦'綱領来反对資本主义的欧洲瘋入院”。

說“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无产階級政党战时的全部工作所必須服从的总战略任务”。曲解列宁的公式“失敗是較輕的禍害”，說这“并不是意味着本国的失敗要比敌国失敗的禍害輕，而是意味着革命运动的增长所造成的軍事上的失敗，肯定比‘国内和平’所保证的軍事胜利更有利于无产階級和全体人民。”宣传和平的口号同失敗主义的公式“并不矛盾”，“爭取和平的斗争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最可靠的手段”。

关于根本的階級目的甚至比局部的目标更不能用民族手段或在国家界限内实现这一无比坚定的信念构成革命国际主义的核心。然而，如果这个最終目的能够在民族界限内通过民族无产階級的努力来实现，那么，国际主义的脊梁就被打断了。关于一国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論破坏了胜利了的无产階級的爱国主义和資产階級国家无产階級的失敗主义之間的內在联系。先进資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階級仍然在通往夺取政权的道路上移动。它怎样以及用什么方式夺取政权，完全要看它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看做是一项民族任务还是一项国际任务。

假定說有絲毫可能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那不仅在夺取政权以后，而且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可以相信这个理論。如果社会主义能够在落后的俄国的民族界限内实现，那就更有理由相信它能在先进的德国实现。明天德国共产党的領袖們将担負起闡发这个理論的任务。綱領草案授权他們这样做。后天就該輪到法国党了。这将是共产国际沿着社会爱国主义路綫瓦解的开端。任何資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如果接受了它本国具备有单独建立“完全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必需的和足够的”先决条件的思想，那它在实质上同革

命社会民主党就相差无几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同样不是从諾斯克事件开始，而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恰恰在这个問題上跌了决定性的一跤。

如果宣称：苏联存在本身就是抵御社会爱国主义的保证，因为在对待工人共和国时爱国主义是一项革命义务；如果这样说，那么这种对正确的思想的片面应用就表现了民族狭隘思想。讲这样的话的人脑子里想的只是苏联，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則閉眼不看。要能够使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国家采取失败主义立场，只有在綱領中对这个中心問題貫徹国际主义方針，并且无情地反对社会爱国主义的私貨。社会爱国主义到現在为止还戴着假面具，但企图在列宁的国际的綱領中給自己搭一个理論巢穴。

摘譯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 1936 年版第 72—73 頁。

58. 假如发生資本主义国家互相冲突的問題，那末这些国家中任何一国的无产阶级都会毅然决然地拒絕为了资产阶级在軍事上的胜利而牺牲自己的历史的利益，因为这种利益归根結底是与民族和人类的利益一致的。列宁的公式“**失败是較輕的禍害**”，并不是意味着本国的失败比敌国失败的禍害輕，而是意味着革命运动的增长所造成的軍事上的失败，肯定比“国内和平”所保证的軍事胜利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卡尔·李卜克内西为战时的无产阶级政策提出了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公式：“人民的主要敌人是在本国国内”。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会弥补失败所引起的禍害，而且还会建立起防止未来的战争和失败的最后保证。对待战争的这种辯证的态度，是进行革命訓練从而也是进行反战斗爭的最重要的因素。

59. **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政党战时的全部工作所必須服从的总战略任务。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普法战

爭的結果以及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大屠殺的結果（巴黎公社、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德國和奧匈帝國的革命、若干交戰國中的起義運動），無可辯駁地證明，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一場現代戰爭會為每個國家帶來國內各階級之間的戰爭，而革命黨的任務就是在後一種戰爭中為無產階級的勝利進行準備工作。

60.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經驗還證明，**和平的口號同“失敗主義”**的戰略公式並不矛盾，恰恰相反，它能發展磅礴的革命力量，在戰爭曠日持久的情況下尤其是如此。和平的口號只有當民主黨人和其他政治家利用它來進行誑騙的時候，當牧師們舉行禱告祈求最迅速地停止屠殺的時候，當“人類的博愛者”（包括社會愛國主義者在內）淚汪汪地敦促政府在“正義的基礎”上迅速媾和的時候，它才具有和平主義的性質，亦即欺騙、麻痺和渙散人心的性質。但是，當和平的口號是發自工人階級的營房和戰壕，並且同作戰雙方兵士攜手友愛、團結被壓迫者反對壓迫者的口號結合起來的時候，它就同和平主義毫無共同之處了。採取更廣泛更大膽的形式的爭取和平的革命鬥爭，是“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最可靠的手段。

摘譯自《戰爭與第四國際》（1934年6月），  
紐約1934年版第26—27頁。

差不多一百年以前，當民族的国家還是一個比較進步的因素的時候，《共產黨宣言》便已宣告：無產階級沒有祖國。無產階級唯一的目的，就是創建一個包括全世界的勞動者祖國。及至十九世紀末，擁有軍隊和關稅壁壘的資產階級國家就已經成為妨害那需要更廣闊的活動場所的生產力發展的最壞的障礙了。今天出來保護祖國的社會主義者所起的反動作用和法蘭西大革命時代起來保護封建制度也就是保護束縛他們自己的鎖鏈的汪德農民的反動

作用是完全一样的。

摘譯自《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第四国际紧急會議宣言, 1940年5月), 紐約版第11頁。

官方的爱国主义乃是保卫剝削者利益的假面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要輕蔑地把这个假面具抛在一边。他們不要保卫资产阶级的祖国, 而只要保卫本国以及全世界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利益。第四国际的提綱宣布說:“为了反对‘保卫祖国’这个反动口号, 必須提出以革命手段粉碎民族国家的口号。必須提出作为走向‘世界社会主义联邦’的一个阶段的‘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綱領来反对資本主义的欧洲瘋人院。”

同上, 第12頁。

## 四、关于反苏战争

### 1. 反苏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声称“对革命后果的恐惧, 到现在止还麻痹着种种武装干涉的計劃”, “然而工人国家和帝国主义世界之間不可調和的对抗, 正日趋表面化”。断言世界资产阶级不会中立到社会主义制度完成时为止。

**一場帝国主义者反对苏联的战争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推迟这个危险, 爭取尽可能多的时间来加强苏联并团结国际上革命的无产阶级, 这应该是我們主要的实际任务之一。只有主

**要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才能最后消除这个危险。**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3页。

欧洲资产阶级在上次战争中吃够了苦头,不肯轻易发动另一次战争。对革命后果的恐惧,到现在为止还麻痹着种种武装干涉的计划。但是恐惧的因素是不稳定的。革命的威胁还没变成革命本身。一个危险如果迟迟不实现,便失去它的效力。同时,工人国家和帝国主义世界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正在日趋表面化。近来的种种事变已经雄辩地说明:要使世界资产阶级“中立化”,直到社会主义制度完成时为止的这种希望,已经被现在的当权派抛弃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变成了自身的反面。

摘译自《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1932年),  
载于《俄国革命史》伦敦1936年版第1256页。

## 2. 保卫苏联的策略

说“第四国际只能以革命的阶级斗争来保卫苏联”。扬言在战争中将按克里孟梭的先例行事:“在对莫斯科的寡头政治进行不懈斗争的同时,坚持反对任何足以帮助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政策”。声称“无产阶级在保卫苏联时,并不是保卫国界线,而是保卫暂时被国界包围起来的社会主义专政”。

断言“如果战争始终只是一场战争,苏联的战败将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帝国主义没有由于西方革命而陷于瘫痪状态的话,它将会铲除这个十月革命所产生的制度”。胡说“如果没有革命来干涉,苏联的社会基础不仅在战败的情况下,就是在胜利的情况下也必然要被摧

毀”。“只要其它国家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即使苏联在軍事上遭到失敗也只是一个短暫的插曲”。“如果帝国主义在世界其余部分还能坚持下来，那末，什么样的軍事胜利也不能拯救十月革命的遗产”。重申“惟有世界革命才能拯救苏联的社会主义，但是世界革命不可避免地要連帶着消灭克里姆林宫的寡头政治”。

我們的整个工作應該早已在这些口号下进行：（一）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工人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战争。（二）在所有进攻苏联的国家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三）使一切对苏联进行战争的资产阶级国家陷于失敗。资本主义国家内一切正直的无产阶级应该为“本国”政府的失敗而积极努力。（四）一切不願帮助“本国”劳动剝削者的外国士兵，投向紅軍这边来。苏联是所有工人的祖国。（五）除了正在进行反帝民族革命战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外，“保卫祖国”的口号只不过是一切资产阶级国家的帝国主义利益的伪装。在苏联，“保卫祖国”是真实的口号，因为我們所保卫的是社会主义祖国和世界工人运动的基地。（六）自从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来，我們就是“祖国的保卫者”。我們的“爱国”战争是“为了作为社会主义世界大軍的一个团队的苏維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战争。“我們的‘爱国’战争不是走向资产阶级国家的一步，而是走向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步”（列宁）。我們保卫祖国即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們的战争是由工人和雇农，在貧农的支持之下，并和中农联盟反对“他們的”富农、新资产阶级、官僚、烏斯特里雅洛夫派的专家以及白俄之下进行的。我們的战争是真正的正义战争。誰不是苏联的保卫者，誰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彻头彻尾的叛徒。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5—86頁。



(五)我們必須始終如一，有步驟和頑強地進行爭取和平的鬥爭。我們必須推遲戰爭，“用贖買辦法使我們自己免于戰爭”。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一切可能的和可允許的事情都必須去做(參閱第一點)同時我們必須立刻做好戰爭準備，不能有片刻的懈怠。我們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制止一切關於是否存在戰爭迫近的危險這種渙散精神的知識分子式的政治閑談和猜測。

(六)我們必須堅決地糾正我們在國內的階級路線。假使戰爭不可避免，只有嚴格的布爾什維克政策才能贏得戰爭，這就是：**工人和雇農，取得貧農支持，同中農聯盟，反對富農、耐普曼、官僚。**

同上，第 99—100 頁。

在英俄關係破裂的時候，俄國的反對派抱着鄙視的態度駁斥了那些責備它是失敗主義者、並給它扣上有條件的護國主義的帽子的人的謠言，同時用正式的文件宣告，在它看來，一切不同意見在戰時比在和平時期還要更加尖銳地提出來。在同英國斷絕外交關係的時候，在革命專政的國家發表的這種宣言，用不着作別的解釋，無論如何比起在這兒那兒寫的某些小文章來，提供了莊嚴得多的保證。

這問題在一九二七年引起了激烈的鬥爭。烏爾邦斯和贊同他的觀點的人聽說過所謂《克里孟梭論綱》嗎？幾個月來，中央機關手里拿着這個提綱，鼓動全黨。要知道，我曾舉克里孟梭的態度作為帝國主義者陣營內的愛國反對派的例子，他從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不顧資產階級世界已宣告訂立神聖同盟，而進行反對資產階級其餘的各派的鬥爭，他掌握了政權，並確保法國帝國主義的勝利。我曾問道，在資產階級的陣營中，是否找得着這樣的蠢材，他為這件事情稱呼克里孟梭是失敗主義者，或者是有條件的護國主義者？這就是在幾千篇論文中和在幾萬次演說中受批評的有名

的《克里孟梭論綱》。

摘譯自《保卫苏联与反对派》(1929年9月7日)，  
巴黎版第51—52頁。

34. 在取得政权后，无产阶级本身就要轉到“保卫祖国”的立場上。但是从这时起，这个公式获得了全新的历史內容。孤立的工人阶级的国家并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实体，而仅仅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练兵場。无产阶级在保卫苏联时，并不是保卫国界綫，而是保卫暂时被国界围起来的社会主义专政。只有深刻地理解这样的事实：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一国的范围内完成；沒有无产阶级在主要国家里的胜利，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一切成就都注定要失敗；除了通过国际革命以外，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得不到拯救；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建成——只有把这个坚定的信念注入血液和骨髓，才能为战争时期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策創立可靠的基础。

摘譯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  
紐約1934年版第17頁。

47. 但是，正是战争的曠日持久的性质，将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苏联过渡时期的經濟与官僚主义計劃的矛盾。許多巨大的新企业可能表明只是一大堆死資本。在政府迫切需要日用必需品的影响下，农民經濟中的个体主义傾向将会大大加强，集体农庄內的离心力量将随着战争逐月增长。不受监督的官僚的統治将会变成一种軍事独裁。缺少一个生气勃勃的党作为政治上的监督者和調节者，就会导致矛盾的急剧积累和加剧。在如火如荼的战争气氛中，人們将会看到农业和手工业方面急剧轉向个体主义原則、轉向吸收外国的和“盟国的”資本，将会看到对外貿易垄断制的破坏，政府对托拉斯的监督的削弱，托拉斯相互間竞争的尖銳化，以及它們同工人之間发生冲突等等。在政治方面，这些过程可能意味着波拿巴

主义已臻于成熟，同时在所有制关系方面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或一系列变化。換句話說，假使战争曠日持久而与此同时世界无产阶级又消极被动，那末苏联内部的社会矛盾不仅可能而且一定会导致一場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反革命。

48. 由此而得出的政治結論是明显的：

(1) 在战争曠日持久的情况下，只有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拯救苏联这个工人阶级国家。

(2) 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只有在摆脱苏联的官僚而完全独立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友好的”、“結盟的”以及敌对的国家中准备无产阶级革命。

(3) 无条件地支持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军队的行动，必須同对战争和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所进行的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批評密切地配合起来，必須同在苏联国内建立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革命党的工作密切地配合起来。

同上，第 21—22 頁。

然而，我們能够指望苏联在即将到来的大战中不致战敗嗎？对于这个坦率地提出的問題，我們將同样坦率地回答：如果战争始終只是一場战争，苏联战敗将是不可避免的。从技术、經濟和軍事的意义上說，帝国主义是无可比拟地更为强大的。如果帝国主义沒有由于西方的革命而陷于瘫痪状态的話，它将会鏟除这个十月革命所产生的制度。

.....

如果资产阶级盟国得到这样的物质保证，即莫斯科政府不仅在战争的壕沟上而且在阶级的壕沟上也同他們站在一边，当然情况就会根本不同。資本主义的“和平之友”利用苏联将在两面夹攻之下所遭到的困难，当然会采取一切措施在对外貿易垄断方面和

苏联财产法方面打开一个缺口。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白俄流亡者所展开的日益强大的“保卫”运动，就是完全依靠这种估计的。如果你认为，世界斗争将只限于在军事方面进行下去，那末，盟国就有达到他们的目的的好机会。如果没有革命来干涉，苏联的社会基础不仅在战败的情况下，就是在胜利的情况下也必然要被摧毁。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65—167页。

战争危险和苏联战败是一个现实，但革命也是一个现实。如果革命不阻止战争，战争就会帮助革命。第二次分娩通常总比第一次容易些。在新战争中，将不需要等待整整两年半的时间才发生第一次暴动。不仅如此，一旦战争爆发，这一次革命就不会半途而废。归根到底，苏联的命运将不是在参谋本部的地图上决定，而是在阶级斗争的地图上决定。只有坚决反对资产阶级以及和他们同一阵营中的那些“和平之友”的欧洲无产阶级，才能保护苏联，使它免遭毁灭或者“盟国”的暗害。只要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即使苏联在军事上遭到失败也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另一方面，如果帝国主义在世界其余部分还能坚持下来，那末，什么样的军事胜利也不能拯救十月革命的遗产。

同上，第168—169页。

破坏国防的流血清洗，首先表明执政的寡头已和人民、包括红军在内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矛盾的尖锐性本身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国内经济和文化的巨大进步已越来越难于容忍斯大林政制了。苏联的政治革命，即推翻腐化透顶的官僚等级，无疑地将是战争的最近后果之一。然而，一切都使我们相信，只要整个人类不退到野蛮时代，则苏维埃制度的社会基础(新的所有制关系及计划经济)，

一定会經得住战争的考驗，甚而在战争中得到加强。

摘譯自《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1937年8月9日)，載于  
《反对派通报》1937年9—10月第58—59期第15—16頁。

**第四国际只能以革命的階級斗争来保卫苏联。**教导工人去正确了解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国家，工人国家——的階級性，理解它們相互間的关系，以及每一国家的內部矛盾，使得工人能够在每个特定的形势下做出正确的实际結論。**第四国际在对莫斯科的寡头政治进行不懈斗争的同时，坚决反对任何足以帮助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政策。**

保卫苏联，在原則上是与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相一致的。我們断然拒絕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这是无知而反动的斯大林主义的精神产儿。唯有世界革命才能拯救苏联的社会主义。但是世界革命不可避免地要連帶着消灭克里姆林宫的寡头政治。

摘譯自《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第四国际紧急會議宣言，1940年5月)，第21頁。

## 五、关于保卫和平的道路

### 1. 裁軍問題

攻击苏联以“普遍裁軍”和“互不侵犯”为基础的对外政策是“最恶劣的和平主义幻想和社会爱国主义的錯誤的根源”。說裁軍不是反对战争的手段，而是“重整軍备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普遍’裁軍即使可以实现，也只能意味着比較強大的工业国的軍事优势的加强”。“‘百分之五十的裁軍’决不是完全裁軍的道路，而是絕對的百

分之百的重整軍备的道路”。“所謂‘逐步裁軍’的思想，只不过意味着在和平时期設法削減过多的軍事費用。这是一个資金問題，而不是爱好和平的問題”。說在資本主义制度下，裁軍的要求显然是“幻想”，“只会轉移工人对武装自己的必要性的注意”。

35. 从一国社会主义理論出发的苏联对外政策，即实际上把国际革命的問題置之不理的政策，是以普遍裁軍和互不侵犯这两个主张为基础的。为了寻求外交上的保证，苏联政府对战争与和平問題不得不采取純粹形式主义的說法，这是从有資本主义包围的情况出发的。但是由于国际革命的軟弱并且在頗大程度上由于苏联政府本身以往的錯誤而不得不采取的这些迁就敌人的方法，是决不能上升为一种普遍适用的办法的。然而苏联外交的行动和言論，长久以来超越了不可避免的、可以容許的实际妥协的界綫，这种行动和言論居然被規定为第三国际的国际政策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并且已經成为最恶劣的和平主义幻想和社会爱国主义的錯誤的根源。

36. 裁軍并不是反对战争的一种手段，因为，正如德国本身的經驗表明，插曲性质的裁軍只不过是走上新的重整軍备道路的一个阶段罢了。有了現代工业技术，就有重新发动十分迅速的重整軍备的可能性。“普遍”裁軍即使可以實現，也只能意味着比較强大的工业国的軍事优势的加强。“百分之五十的裁軍”决不是完全裁軍的道路，而是絕对的百分之百的重整軍备的道路。把裁軍說成是“防止战争的唯一现实的手段”，就是为了同小資产階級和平主义者結成共同陣綫而把工人階級引入歧途。

摘譯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  
紐約1934年版第17—18頁。

**要求資產階級國家解除法西斯匪幫武裝，正如斯大林分子做的那樣，是走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的道路。正是威爾斯和奧托·鮑威爾“要求”這個國家解除納粹的武裝，確保國內的和平。的確，“民主”政府在對自己有利的时候是可能解除個別法西斯集團的武裝的，但這僅僅是為了更加凶殘地解除工人們的武裝和防止他們進行武裝。就在第二天，資產階級國家會讓昨天才“被解除武裝”的法西斯分子加倍地武裝起來，並以加倍的力量把武器對準手無寸鐵的無產階級。向國家，也就是向資本家要求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裝，意味着散布最壞的民主幻想，意味着麻痺無產階級的警惕性，意味着腐蝕無產階級的意志。**

同上，第 27 頁。

在帝國主義矛盾還存在的時候，“裁軍”計劃是最有害的假象。這種計劃即使由於取得普遍協議而實現了——這顯然是荒誕的假定！——也一點也不會防止新戰爭。帝國主義者並不是由於有了軍備才進行戰爭的；恰恰相反，他們製造武器是因為他們需要打仗。要想進行新的而且很迅速的武裝，關鍵在於當代的技术。不管有了什麼樣的協議、限制和“裁軍”，軍火庫、軍事工廠、實驗室以及整個資本主義工業都還保留着自己的力量。例如，德國雖然被它的征服者在最細致的監督下解除了武裝（順便說一句，這才是唯一真正的“裁軍”形式！），可是由於它擁有強大的工業，現在又開始變成歐洲軍國主義的堡壘。在德國方面，則想把它的某些鄰國“解除武裝”。所謂“逐步裁軍”的思想，只不過意味着在和平時期設法削減過多的軍事費用。這是一個資金問題，而不是愛好和平的問題。但是即使這樣，這項任務也還是沒有實現。由於地理位置、經濟力量以及殖民地的大小不同，任何裁軍標準都不可避免地會使力量對比的改變有利於一些國家而不利於另外一些國家。這就是在

日内瓦所作的努力总是没有结果的原因。在裁军问题上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谈判和会谈以后，只不过是掀起了新的扩军浪潮，这种浪潮的推进使我们迄今所看到的一切事情都远远地落在后面。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建筑在裁军计划上，意味着不是把这种政策建筑在沙漠上，而是建筑在军国主义的烟幕上。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46页。

然而军备状况只是战争的因素之一，而且不是最主要的。一切国家都感觉到自己已“充分地”武装起来的时刻是永远不会到来的。军备的动向，单就其自身而言，自然是走向战争而不是走向和平的。但军队不是目的本身，而是政治的工具，而政治又是物质利益的工具。引起新战争的推动力，多半将由经济状况的转变来提供。

摘译自《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1937年8月9日)，  
载于《反对派通报》1937年9—10月第58—59期第  
10页。

其实“技术”和“群众”的对立，或像有时所说的“质”与“量”的对立，只是一种毫无生气的抽象概念。假使二十万人的机械化军团能作出奇迹，那么两个这样的军团所能作的，将不是二倍而是四倍多的奇迹。数字的法则，就是在最高的技术基础上也是有效的。简单地说，作战的民族将不得不派出尽量多的武装得尽量好的士兵。

同上，第12页。

然而，不管无畏舰的情况如何，英国将不得不重新在欧洲大陆上来保卫自己。人不是生活在水上，也不是在空中，而是生活在



地上的。海軍和空軍只是侵入敵人領土或防卫自己領土的輔助工具，战争的命运还是决定于陆地上。陸軍至少在歐洲或世界的范圍中，是进攻和防守的主要力量。軍隊的基础是步兵。別的条件如果相等，則陸軍的人数愈多，胜利的机会便愈大。

同上，第 13 頁。

“**裁軍嗎？**”——但是整個問題在于誰解除誰的武裝。唯一能够避免或結束战争的裁軍是工人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裝。但是为了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裝，工人自己必須先武裝起來。

“**中立嗎？**”——在日本与中国的战争中，或者在德国与苏联的战争中，无产阶级决不是中立的。“那么这里所指的是不是保卫中国和苏联呢？”当然是！但是，不能由要扼杀中国和苏联的帝国主义者来保卫。

“**保卫祖国嗎？**”——但是資產階級这一抽象概念的意思是保卫他們的利潤和掠夺物。如果我们首先束縛住我們自己的（資本家的）手脚，使他們不能进攻外国人的祖国；如果我们国家的工人和农民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如果国家的財富从一小撮人的手里轉到人民的手里；如果軍隊成为被剝削者的武器而不是剝削者的武器，我們就准备保卫祖国不受外国資本家的侵略。

摘譯自《資本主义的垂死掙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1938年9月3日)，紐約1946年版第29頁。

战争是一桩大买卖，对軍事工业說来尤其如此。因此，“**六十大家族**”是第一綫的爱国者和主要的战争煽动者。**由工人对軍事工业实行监督**是对战争“**制造商**”进行斗争的第一步。

改良主义者提出的口号是：**对战争利潤征税**；为了对抗这个口号，我們提出这样的口号：**沒收战争利潤和剝夺經營軍火工业的据**

客。在把軍事工业“收归国有”的地方，如法国，工人監督的口号仍然充分有效。无产階級不信任資產階級政府，正如他們不信任資本家个人一样。

不給資產階級政府一个人，一分錢！

不要軍备綱領，而要兴办有用的公共事业的綱領！

工人組織完全摆脱軍隊和警察的控制！

我們必須一劳永逸地掙脫背着人民玩弄陰謀貪得无厌而又殘酷无情的帝国主义集团任意摆布人民命运的魔掌。

根据这一点，我們要求：

完全废止秘密外交，让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知道所有的条約和协定；

在工人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的直接監督下武装工人和农民，实行軍事訓練；

成立軍事学校，訓練由工人組織挑选出来的劳动者为指揮官；  
以与工厂、矿山、农場等等保持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民兵来代替常备軍。

同上，第 31—32 頁。

用和平主义者对和平的虔誠哀叹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是不行的。“和平主义和抽象地宣传和平，是愚弄工人階級的形式之一。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特别是在帝国主义阶段，战争是不可避免的。”<sup>①</sup> 帝国主义者所締結的和約只是取得新战争以前的喘息時間。只有对战争和战争所产生的帝国主义进行革命的群众斗争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认为不經過一系列革命就能实现所謂民主和平的想法，是极其錯誤的。”<sup>②</sup>

① 《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140 頁。——編者注

② 同上，第 141 頁。——編者注

反对和平主义幻想的斗争是列宁理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他特别痛恨地拒绝了“裁军”的要求，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显然是幻想，只会转移工人对武装自己的必要性的注意。“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使唤。”<sup>①</sup>而且，“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sup>②</sup>列宁拒绝了空洞的“和平”口号，而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来与它相对抗。

摘自《斯大林评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年版上册第223页。

## 2. 国际联盟、集体安全和仲裁法庭

认为国际联盟、集体安全、仲裁法庭、裁减军备都是些“和平主义的幻想”，“只不过是欺骗劳苦群众的一种方法，使他们在新战争爆发的时候措手不及”。说“国联在维护现状方面并不是一个‘和平’组织，而是一个少数帝国主义者用暴力对付绝大多数人类的组织”。“苏联加入国际联盟不能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却给自己增加了严重的限制和义务”。说外交协定不过是“废纸”，“到欧洲任何一部分有发生社会革命的直接威胁的时候，同苏联订立的条约就没有一个还会存在下去”。认为应当区别两种和平主义：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充满了欺骗”，是“帝国主义的烟幕”；被压迫者的和平主义是“对毁灭性战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94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95页。——编者注

爭的憎恨”，是“不信任帝国主义的混乱表示”。

和平主义对于被事变吓破了胆的那部分社会党上层來說意味着自我摆脱和消极等待。对于群众來說，和平主义則意味着思考的时刻、在由奴隶式的爱国主义走向行动的国际主义道路上的一个阶段。

摘譯自《五·一·》(1916年5月1日)，  
《載于战争与革命》第2卷莫斯科1925  
年版第110頁。

那个时期<sup>①</sup>的领导人特別反对各种各样的和平主义幻想——如国际联盟、集体安全、仲裁法庭、裁减軍备等等。他們认为这些幻想只不过是欺騙劳苦群众的一种方法，使他們在新战争爆发的时候措手不及。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7頁。

苏联官僚利用戈培尔慣用的那套欺騙手法，把苏联加入国际联盟这件事向俄国人民說成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世界无产阶级施加“压力”的結果。实际上，资产阶级之所以接受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只不过是由于革命的危險已經大大减少。这件事并不是苏联的胜利，而是热月官僚向这个无原則妥协的日内瓦机构的投降。按照上面所引的布尔什維克党綱上的話，这个机构“将在将来努力于镇压革命运动”。自从布尔什維主义的大宪章頒布以来，什么东西使国际联盟的性质、和平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职能以及苏維埃的政策发生了这样根本性的变化呢？提出这个問題也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

① 指列宁领导苏維埃国家的时期。——編者注

經驗很快就证明，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并不能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这种实际利益通过同个别资产阶级国家訂立协定是可以得到的），与此同时，却给自己增加了严重的限制和义务。苏联为了维护它刚刚得到不久的保守声望，正在最忠实地遵守这些限制和履行这些义务。

同上，第 141 頁。

国际联盟在维护现状方面并不是一个“和平”組織，而是一个少数帝国主义者用暴力对付絕大多数人类的組織。要保持这样的“秩序”，只有依靠接連不断的战争——小的和大的，今天在殖民地，明天在大国之間。帝国主义对现状的忠实，总是具有一种有条件的、暫时的和有限度的性质。

同上，第 145 頁。

人們可以这样回答說：“帝国主义”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也是被矛盾弄得四分五裂的。这是十分正确的，如果帝国主义不是因为有这些矛盾的話，苏联早就从舞台上消失了。苏联簽訂的外交和軍事协定有一部分就是建立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的。然而，如果看不到这些矛盾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消失，那将是一个致命的錯誤。正如从最反动的政党到社会民主党这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間的斗争，在无产阶级的直接威胁面前会消失一样，为了阻止苏联取得軍事胜利，帝国主义的对抗也总会找到妥协办法的。

正如某位总理有一次不无理由地說的，外交协定不过是一些“廢紙”。哪里也沒有写着这样的話：甚至到爆发战争的时候，这种协定还必须存在下去。到欧洲任何一部分有发生社会革命的直接威胁的时候，同苏联簽訂的条約就沒有一个还会存在下去。不用

說法国，只要西班牙的政治危机进入革命阶段，劳合-乔治所提出的对救世主希特勒的希望就会不可抗拒地掌握所有资产阶级政府的心灵。另一方面，如果西班牙、法国、比利时等国的不稳定的局势最后导致反动的胜利，那末，苏联签订的公約也不会留下一点痕迹。最后，即使这些“废纸”在军事行动的初期还能有效，毫无疑问，各种力量集团在战争的決定阶段，将决定于比外交家的誓言强大得无可比拟的一些因素，因为外交家的职业就是說假話。

同上，第166頁。

有必要严格地区別外交家、教授、新聞記者的和平主义与木匠、农业工人和女帮工的和平主义。前一种和平主义是帝国主义的烟幕；后一种和平主义是不信任帝国主义的混乱表示。当小农或工人談到保卫祖国的时候，他們指的是保卫他們的故乡、家庭和其他类似家庭不遭受侵略，不受炸弹和毒气的危害。而资本家及其新聞記者所謂的保卫祖国則是指夺取殖民地和市場，掠夺性地增加“本民族”在世界收入中所占有的部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和爱国主义充滿了欺騙。被压迫者的和平主义、甚至是爱国主义中，有一些因素一方面反映了他們对毁灭性战争的憎恨，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們对他們认为是自己利益的东西紧紧抓住不放——为了得出必要的結論，我們必須知道如何利用这些因素。

摘譯自《資本主义的垂死掙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1938年9月3日)，紐約1946年版第29—30頁。

### 3. 人民陣綫

污蔑共产国际所执行的人民陣綫政策是阶级合作的背叛政策，是“帝国主义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所凭

借的最后的政治手段”。攻击它“麻痹劳动群众”，使之“替‘进步的’资产阶级当炮灰”。“在一切可能建立的人民阵线中，流亡的‘人民阵线’是最恶毒和不忠实的”，这是同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自由资产阶级的联合”。声称“无情地揭发‘人民阵线’的理论和实践是进行反法西斯革命斗争的最重要的条件”。

54. 用共产主义官僚和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集团(其中每一个忠实的迷失方向者就有数十个野心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即工人阶级组织的战斗协议,那就会导致完完全全的策略问题中的折衷主义。巴比塞-明岑堡(Barbusse-Muenzenberg)代表大会认为他们的特殊功绩是把各种类型的反战“斗争”结合起来,其中包括:人道主义的抗议,个人拒绝服兵役,“舆论”的教育,总罢工甚至起义。他们把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调和地矛盾着的而在实际上只能互相冲突的一些方法,说成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组成成分。在反对沙皇的斗争中宣传“综合策略”(自由主义者、个人恐怖行动和群众斗争的联合)的俄国“社会革命党人”,比起阿姆斯特丹集团的鼓舞者来倒可说是一批实实在在的人物。但是工人们必须记住,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民粹派的折衷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摘译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  
纽约1934年版第24页。

共产国际明确地倒向了资产阶级政府秩序的一边,它在全世界,尤其是西班牙、法国、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扮演了无耻的反革命角色,所有这一切都为世界无产阶级增添了异乎寻常的困难。“人民阵线”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下实行的妥协策略必然使无产阶级陷于软弱无能状态,并且为法西斯主义扫清道路。

一方面是“人民陣綫”——另一方面是法西斯主义；这就是帝国主义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所凭借的最后的政治手段。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这两个手段都只能是权宜之計。在法国，资本主义继续在自由帽<sup>①</sup>的标志下衰朽下去，正如它在德国在卐字旗的标志下继续腐朽下去一样。不推翻资产阶级就无法找到一条出路。

摘译自《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1938年9月3日)，纽约1946年版第7—8页。

共产国际为了维持与“民主的”奴隶主的友谊而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以后，不能不同时背叛争取殖民地人民解放的斗争，其无耻程度甚至超过它以前的第二国际。人民陣綫和“保卫祖国”政策的任务之一是把亿万殖民地人民变成“民主的”帝国主义的炮灰。为解放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即人类的足足一半)而斗争的旗帜肯定已经转到了第四国际的手里。

同上，第42页。

第四国际与早就破产的旧政党正是从这一点上开始发生不可调和的分歧的。在一切可能建立的“人民陣綫”中，流亡的“人民陣綫”是最恶毒和最不忠实的。本质上它只是无能为力地渴望与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自由资产阶级联合。如果它成功了，也只不过为无产阶级准备了一系列西班牙类型的新失败。因此，无情地揭发“人民陣綫”的理论和实践是进行反法西斯革命斗争的最重要的条件。

同上，第45页。

最近五年来，克里姆林宫以阶级合作这一背叛的政策帮助了

---

① 古罗马解放后奴隶所戴圆锥帽，共和政体的标志。——编者注



資本主义政府准备战争，那些政府一旦不再需要和平主义的伪装，就立刻抛弃这种政策。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不仅在中国和印度，而且在拉丁美洲——“人民障蔽”的騙局还继续在麻痹劳动群众，使群众替“进步的”资产阶级当炮灰，这样来为帝国主义在本国創造政治基础。

摘譯自《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第四国际紧急会议宣言，1940年5月)，第27頁。

#### 4. 国际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

认为苏联在战时“同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結盟”可能是“铁的需要”，但“不会因此而不再是对苏联和对世界革命的最大危险”。說国际无产阶级应当“保证自己在政治上完全不依賴苏联外交”。“一个同苏联結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須充分地、完全地保持它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不可調和的敌愾心”，进行“不可調和的反对活动”，“应当以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夺取政权为目的”，而不能成为“苏联的帝国主义盟国的盟友”。

20. 一些文明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經表明而且还在繼續表明，在发生国内危险时，它可以不費多大周折就能把議會制的統治形式变成极权的、专制的、波拿巴主义的或法西斯主义的形式。一旦发生战争，国内和国外的危险，会以十倍的力量威胁它的基本阶级利益，到那时候，它会更迅速得多地、更果断得多地实行这种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工人党如果为了一个脆弱的民主外壳而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那就意味着放弃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策，意味着沙文主义的道德敗坏，也就是說，毁灭了能够把人类从灾难中拯救

出来的唯一的因素。

21. “保卫民主的斗争”在战争时期首先是意味着为保存工人的出版物和工人的组织以防放肆的军事检查和军事当局的侵害而斗争。革命的先鋒队，要在这些任务的基础上寻求同其他工人阶级的组织建立统一战线——反对本国的“民主”政府，但决不是寻求同本国政府的团结以反对敌对的国家。

摘译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  
纽约1934年版第12—13页。

40. 第三国际的领导人，以工人国家必须利用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为理由，来为苏联的外交政策辩护。这种论断本身固然无可厚非，但需要加以具体化。

每个阶级的对外政策，都是它的国内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如果说当权的无产阶级必须认识和利用国外敌人阵营中的矛盾，那末，仍在为取得政权而战斗的无产阶级，就必须知道如何认识和利用国内敌人阵营中的矛盾。第三国际原来是根本不能理解和利用改良主义的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矛盾，从而直接地导致了无产阶级极大的失败，并使它面临一场新的战争的危險。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各国政府之间的矛盾，也必须从国际革命着眼才能加以利用。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鋒队只有在不以苏联外交政策为转移的情况下，只有在有充分自由来揭露这种违反国际革命利益从而也违反苏联利益的民族主义的保守方法的情况下，保卫苏联才是可以理解的。

同上，第19页。

43. 在当前的形势下，苏联在发生战争时同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结盟或是同某一个帝国主义集团结盟反对另外一个集团，这决

不能认为是不会有的。在形势的压迫下，这种暂时的結盟可能成为铁的需要，而且还不会因此而不再是对苏联和对世界革命的最大的危險。

即使苏联被迫同某些帝国主义者結成軍事同盟来反对另外一些帝国主义者，国际无产阶级也不会拒絕保卫苏联。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无产阶级甚至更需要保证自己在政治上完全不依賴苏联外交，因而也不依賴第三国际的官僚。

44.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际无产阶级仍旧是工人国家的坚决而忠誠的保卫者，但决不会成为苏联的帝国主义盟国的盟友。一个同苏联結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須充分地和完全地保持它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不可調和的敌愾心。在这个意义上讲，它的政策和同苏联作战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政策是没有什么差异的。但是实际行动的性质，可能由于具体的战争形势而产生許多差异。譬如說，在苏联和日本之間发生战争时，假若美国的无产阶级阻撓美国的軍火运往苏联，那就是可笑的和犯罪的了。但是，同苏联作战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就应义不容辞地采取罢工和怠工以及諸如此类的行动。

45. 无产阶级对苏联的帝国主义盟国的不可調和的反对活动，必須一方面根据国际阶级政策，另一方面根据該政府的帝国主义目的，来揭示这个“联盟”的背叛性质，揭示它利用苏联资本主义顛复的图謀。因此，在“結盟的”和在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应当以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夺取政权为目的。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同苏联的真正的联盟，才能把第一个工人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

同上，第 20—21 頁。

## 六、战争与革命

說“在历史上，战争往往是革命之母”。认为“对于一場新的战争的后果的恐惧，是唯一束縛帝国主义意志的因素”；“所有研究人类未来大屠杀的认真的理論家，都考虑到这种大屠杀的結果有可能引起革命，甚至不可避免引起革命”。断言“如果革命不阻止战争，战争就会帮助革命”。“战争不仅是一场‘大灾难’，而且也是立即把我们的社会发展，而首先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推到新的更高范围上去的历史因素”。战争将成为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崩潰的巨大“加速器”，无产阶级只能用“社会革命的方法”去制止战争，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作原則的抉择。說“沒有新的战争，社会主义革命也将发展，但新的战争必将导致社会主义革命”。

在上述历史条件下<sup>①</sup>，对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說来，問題不在于保卫这个过时的和陈旧的民族“祖国”，因为它业已变成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創立一个远为强大的、更能抵御强敌的祖国——欧洲共和联邦，以作为世界联邦的基础。

无产阶级只能用社会主义的世界經濟組織作为現时的实践綱領，来对付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混乱局面。

战争乃是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登峰造极阶段，用以寻求解决其不可解决的矛盾的方法。无产阶级只能用它自己的方法，即社

---

<sup>①</sup> 指“資本的扩展已經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这个界限对它的束縛已不可容忍。民族的大国必須让位，必須由帝国主义大国取而代之”。——編者注

## 会革命的方法,来制止战争。

摘譯自《布尔什維克与世界和平》(原名《战争与国际》)  
(1914年10月),紐約1918年版第28—29頁。

这件工作不仅加深国际主义者和社会爱国主义者之間的鴻沟,而且也揭露了国际主义者陣营內的各种傾向間的差异。在其右翼聚集了和平主义分子和消极的国际主义者,最能說明他們活动綱領的是面面俱到的口号 *status quo ante bellum*<sup>①</sup>, 回到国内正式反对党的策略上去; 回到战前那样的第二国际去; 最后, 恢复旧的欧洲疆界(不割地的和平——并且仅限于此)。对消极的国际主义来說, 战争实质上仅仅是暂时侵害社会主义文明的积累过程的外部大灾难, 它认为必須采取較为和解的态度去对待作为外部大灾难的“暂时”反映的社会爱国主义。

对革命的国际主义来說(《我們的言論报》是站在它的旗帜下的), 战争不仅是一场“大灾难”, 而且也是立即把我們的社会发展, 而首先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推到新的更高范围上去的历史因素, 在这个范围上, 在帝国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之間作原則的抉择是作为直接的革命行动的任务客观地摆在无产阶级的面前的。从这一观点看来, “和平綱領”問題对我們来說, 不是恢复昨天的欧洲的空想保守綱領的問題, 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不能再复活它了, 而是历史迫使其直接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自主的革命綱領的問題。消极的和革命的国际主义之間的矛盾: 一端在恢复第二国际的口号上, 另一端在爭取第三国际的斗争中得到了明显的表現。海牙和齐美尔瓦尔得!

摘譯自《〈我們的言論报〉周年紀念》(1916年5月16日), 載于《战争与革命》第2卷莫斯科1925年版第116—117頁。

① 战前秩序。——編者注

(7)在我們整个經濟、預算等方面,进行应付战争事变的全面准备。

资本主义正进入一个新的混乱时期。一場对苏联的战争就象一場对中国的战争一样,它对世界资本主义意味着一系列的灾难。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的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加速器”(列宁)。新的战争,特別是一場反对苏联的战争,只要我們这方面在战争中有一項正确的政策,我們就会赢得全世界劳动群众的同情,這場战争就将成为更加巨大的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崩溃的“加速器”。**沒有新的战争,社会主义革命也将发展,但新的战争必将导致社会主义革命。**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00頁。

1. 与現代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造成上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同样問題,現在已經达到了远比一九一四年六、七月間更严重的紧张局面。对于一場新的战争的后果的恐惧,是唯一束縛帝国主义意志的因素。但是,这种遏制力量的效用是有限的。内部矛盾的压力,把一个个的国家先后推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而法西斯主义本身,除了准备国际性的爆发行动外,是不能保持政权的。各国政府都害怕战争。但是無論哪一国政府都沒有任何选择的自由。**不經過一次无产阶级的革命,一場新的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摘譯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  
紐約1934年版第5頁。

然而,上面談到的种种考虑一点也不会得出所謂“悲观主义的”結論。如果說我們不願閉眼不看资本主义世界的巨大物质优势、帝国主义“盟国”不可避免的背叛以及苏維埃制度的内部矛盾,那末,另一方面我們也就絕不会倾向于过高地估計敌国或者同盟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在一場使双方精力消耗殆尽的战

爭能够彻底衡量經濟力量的对比情况以前，它早就使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受到考驗。所有研究人类未来大屠杀的认真的理論家，都考虑到这种大屠杀的結果有可能引起革命，甚至不可避免引起革命。某些集团一再提出的小規模的“职业”军队的想法，虽然不比关于大卫和歌利亚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想法实际多少，但是它的荒唐想法正好显示了那种畏惧武装起来的人民的现实情况。希特勒从来不放过一次机会来加强他“对和平的爱”，其办法是大談西方一旦进行战争，就不可避免地招来一場新的布尔什維克风暴。暂时抑制战争狂热力量并不是国际联盟，也不是共同安全公約，更不是和平主义的公民投票，而完全是統治階級在革命面前的那种自卫性的恐惧。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167—168 頁。

战争危险和苏联战败是一种现实，但是革命也是一种现实。如果革命不阻止战争，战争就会帮助革命。第二次分娩通常总比第一次要容易些。在新战争中，将不需要等待整整两年半的时间才发生第一次暴动。不仅如此，一旦战争爆发，这一次革命就不会半途而废。归根到底，苏联的命运将不是在参謀本部的地图上决定，而是在阶级斗争的地图上决定。只有坚决反对资产阶级以及和他們在同一阵营中的那些“和平之友”的欧洲无产阶级，才能保护苏联，使它免遭毁灭或者遭“盟国”的暗害。只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即使苏联在軍事上遭到失败也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另一方面，如果帝国主义在世界其余部分还能坚持下来，那末，什么样的軍事胜利也不能拯救十月革命的遗产。

同上，第 168—169 頁。

由于新的战争的结果，人类的长期衰落，并非不可能，但幸而

这不是唯一的前途。在各民族的互相毁灭完成之前，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将受到考验。革命能够制止战争的进行。

上面说过，为什么我们不大把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能在必要的时刻用自己的力量阻止战争的爆发上。相反地，在临近战争危险的月份，以及在战争的初期，由于自然反射，群众将为“国家的”、向心的、爱国主义的倾向所掌握。这无论是在一国内各阶级和民族集团，或是在例如不列颠帝国的各组成部分，都是如此。然而随着军事行动的发展，及随之而来的贫困化、野蛮化和失望，一定不仅将使一切磨擦、对抗和离心的倾向复活，而且将使其得到极端的发展，它们迟早将以起义和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自然，战争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要使人类陷于前所未有的灾难。然而人民群众使战争结束得愈早，则人类医治它给自己带来的创伤亦愈容易。然则从这观点看来，未来战争的时间将延续多久呢？

由于新的各族人民的大屠杀是从旧的战争结束的地方开始的，因而从战争一开始，人类生命之牺牲及军用物资的耗资，一定要比过去战争开始时的牺牲与耗资高几倍，而且其趋势是继续迅速增加的。速度将是更为狂热的，破坏力将是更大规模的，各民族的痛苦将是更为不可忍受的。所以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群众的反作用不会像在沙俄时代那样需要经过两年半，像在德国及奥匈之需经过四年多才出现，而是要快得多。但是自然只有事变本身才能给期限问题提供最后的答案。

摘译自《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1937年8月9日)，  
载于《反对派通报》1937年9—10月第58—59期  
第14—15页。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已由历史经验来确立了，而且在理论上也解释清楚了。(一)资产阶级没有出路因而造成了统治阶级的徬徨无措；(二)小资产阶级深刻不满，因而要求断然改变现



狀，沒有他們的贊助，大資產階級是站不住腳的；(三)無產階級覺悟到現在的局勢不可忍受，並準備採取革命行動；(四)無產階級先鋒隊有明確的綱領和堅定的領導。——這些便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四個條件。好多次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就在於這四個條件很少同時達到必需的成熟程度。在歷史上，戰爭往往是革命之母，正是因為戰爭從根本上動搖了衰朽的制度，削弱了統治階級，並促進了被壓迫階級中革命怒氣之發展。

摘譯自《帝國主義戰爭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第四國際緊急會議宣言，1940年5月)，第40頁。

## (七) 关于布列斯特和談

### 一、鼓吹不战不和同时复員軍队的机会主义路綫

1. 声明苏俄拒絕在和約上签字,单方面退出战争,同时复員軍队。声称不能用俄国革命的签字来“使暴力神圣化”。說要把軍队“領出杀人場”,让士兵回去从事和平劳动。“已經经历了战争造成的巨大苦难和灾禍的人民群众必須被送回田間和工厂,以便通过工作而在精神上体力上得到恢复”,从而“建立必要的內部紀律”。声称要让庄稼汉士兵“回到自己的耕地”,以便就在今春“和平地耕种”革命夺来的土地;让工人士兵回到工場,以便“生产不是进行破坏的工具,而是建設的工具,和庄稼汉一起建設新的社会主义經濟”。瞎說德国軍队发动进攻“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的”,“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性。”

正像我們所了解的,小組委员会的任务是回答如下問題:对方所提出的边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哪怕是在最低限度內保障俄国人民的自决权。我們听取了参加小組委员会的我方代表关于領土問題的報告,我們认为,在对問題作了長時間的討論和全面研究以后,作出决定的时刻已經到了。各国人民在迫不及待地等待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談判的結果。各国人民在問,什么时候才

能結束这种由世界各国的統治階級的自私和貪权所引起的空前的人类自相殘杀？如果战争在某个时候曾經是为了自卫而进行的，那么它对交战两个陣营來說早就不再是这样的了。如果大不列顛攫取非洲殖民地、巴格达和耶路撒冷，那末这就不是自卫战争；如果德国攫取塞爾維亞、比利时、波兰、立陶宛和羅馬尼亞以及侵占莫昂群島，这也不是自卫战争。这是分割世界的斗争。現在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

我們再不願意参加这场純粹帝国主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为了滿足有产階級的貪欲，公然以人类的鮮血为代价。我們对两个陣营的帝国主义采取同样的不妥协的态度，我們不再同意用我国士兵的鮮血去保卫一个帝国主义者陣营的利益，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陣营。

我們正在等待我們所相信的那个即将到来的时刻，那时，世界各国的被压迫劳动階級将象俄国的劳动人民那样把政权掌握到自己的手里，我們正在把我們的軍隊和人民撤出战争。我們的庄稼汉士兵要回到自己的耕地，以便就在今春和平地耕种革命从地主手里夺来轉交給农民的土地。我們的工人士兵要回到工場，以便在那里生产不是进行破坏的工具，而是建設的工具，和庄稼汉一起建設新的社会主义經濟。

我們退出战争。我們把这一点通告各国人民和他們的政府。我們向目前正在抗击德国、奧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等国軍隊的我国軍隊发出了全面复員的命令。我們等待并且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不久也会按照我們的榜样去做。同时我們声明，德国和奧匈帝国政府向我們提出的条件是根本违背各国人民利益的。这些条件遭到世界各国劳动群众（其中也包括奧匈帝国和德国人民）的拒絕。波兰、乌克兰、立陶宛、庫尔兰、爱斯兰的人民认为这些条件是强奸他們的意志；而对俄国人民來說，这些条件則意味着經常

的威胁。根据政治認識或道德本能行事的全世界人民群众都拒絕接受这些条件，他們正在等待由世界各国的劳动階級制定各国人民和平共居和友好合作的准則的那一天到来。我們拒絕認可德国和奥匈帝国主义用利剑刺在活着的各国人民身上的那些条件。我們不能以俄国革命的名义在給千百万活着的人带来压迫、痛苦和不幸的条件上签字。

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政府想根据軍事占領的权利占有各国的土地和各国人民。让他們公开地去干自己的勾当吧。我們不能使暴力神圣化。我們退出战争，但是我們不得不拒絕在和約上签字。

根据上述声明，我向同盟国联合代表团递交如下业已签署的书面声明：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政府以人民委员会名义，茲通知同我国交战的同盟国和中立国政府和人民，俄国拒絕在割地条約上签字，同时单方面宣布結束同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战争状态。同时向全俄的俄国部队发出全面复員的命令。”

托洛茨基、越飞、波克罗夫斯基、比岑科、卡列林

摘譯自《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宣讀的声明》(1918年2月10日)，載于《联共(布)代表大会和代表會議速記記錄。第七次代表大会》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版第244—246頁。

丘尔曼<sup>①</sup>詢問：苏維埃政府在停战以后是否打算声明，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境綫准确地通过哪些地方？苏維埃政府是否同意恢复与各国間和平状态相适应的貿易关系和法律关系？

托洛茨基：我要对我们所发表的声明再作一些补充。俄国政

---

① 德国代表团团长。——編者注

府在这个书面声明里說：它单方面宣布結束战争状态；为了执行这个决定，它已向整个前綫发出全面复員军队的命令。至于由現存局势所产生的实际困难，我不能提出任何解决它們的法律条文。提不出必要的法律条文的情况，并不是由于偶然的誤会；和平談判的整个进程证明，由于基本观点的深刻分歧，不可能找出一种确定俄国政府和中欧列强相互关系的条文。据我对德国代表团团长先生的了解，至少在理論上，他似乎认为今后依靠大炮和刺刀能够找到我們在实践中所找不到的条文。我不相信这一点。不管你們在这次战争期間怎样濫用国家防御的概念，不管保卫祖国的思想怎样受到糟塌，全世界没有一个正直的人会說，德国和奥匈帝国繼續采取軍事行动在当前条件下是保卫祖国。我深信，德国人民和奥匈帝国的人民不容許这样做；如果我們的基本立場为各国人民所了解，那么，这些实际困难就会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徑而得到解决。我們递交的文件明确无誤地表达了我們的意图。**我們单方面宣布結束战争状态并且讓我們的士兵回到和平劳动中去。**

插譯自《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代表团會議（政治委员会）》（1918年2月10日），載于《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1分册莫斯科1926年版第104—105頁。

在此以后，俄国代表团只好发表声明，它曾及时发表在报上。托洛茨基同志說，这个声明不仅对中欧列强代表团的代表，同时对当时驻扎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德国士兵都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印象。不仅德国士兵，而且軍官們也說：“我們不是强盜”，“要我們向俄国推进，办不到。”，“可見，我們受騙了”，等等。但是，托洛茨基同志断定，**不应当认为进攻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他只是說，迫使德国帝国主义者参加和平談判并且至今阻止他們进攻的一切因素，不仅保持了自己的作用，而且相反地，为布列斯特的和

平談判所加强了。因此，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可以毫不犹豫地复員我們飽尝痛苦的軍隊，讓他們回到日常劳动中去，以便建立劳动紀律和在他們的各个部分之間重新建立劳动联系。而如果，一方面，中欧列强和協約国帝国主义者之間已經达成默契，而且可能不只是默契，如果世界帝国主义在搞反对俄国革命的陰謀，那么，另一方面，我們則以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全部策略保持并且巩固了同我們的天然同盟者——法国、英国、德国、奥地利和美国的工人——的联系。同盟国大使反对废除債務等等的抗議在我們的周圍形成了世界帝国主义的包围圈。但是，世界革命、西欧无产阶级起义不用說会粉碎这种陰謀，并且会把世界从压迫者反对被压迫者的陰謀中永远解放出来。

摘譯自《談判总结》(1918年2月14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上的报告)，同上，第110頁。

**我們在布列斯特曾經声明，我們要退出這場大屠杀。我們应当建設新的社会主义經濟。當我們宣讀了这个声明的前半部时，德国人就以为他們的事業已經取得了胜利。可是，在听取我們声明的第二部分的时候，他們确信，俄国革命不会在这个和約上盖章。我們坦率而公开地实說：我們不能作战，但是，也不能締結帝国主义的和約。而我认为，我們的国际地位只会因此而得到好处。为什么丘尔曼和霍亨索伦还是需要同我們坐在綠絨桌旁談判整整两个月？他們需要我們盖章。要知道，他們仇恨我們，并不亚于我們對他們的仇恨。但是，如果你們記得，他們老向我們說恭維話并且无条件地同意与仇視他們的苏維埃政权进行談判，这只是因为他們要应付本国的工人，需要有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图章，以便向他們表明：我們在他們的和約上签字了，簽署的正是德国工人走上街頭表示抗議的那种和約。因此，我們千万不能簽訂这样的和約。**

让丘尔曼回德国去，把他的和約告訴他的工人們并向他們解

释,为什么上面沒有我們的签字。

我认为德国军队向我们发动进攻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把进攻的可能性化成百分比,那么,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性,而百分之九十是不可能的。

从军事观点和粮食观点来看,从他们方面发动进攻是困难的;至于在国内方面,现在派遣德国士兵来进攻大声疾呼地声明要摆脱战争状态的俄国,那就一定会激起德国工人方面的强大的革命抗议,唤起他们进行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妄想扼杀我国革命的斗争。因此,我们保卫我们国家的这种步骤是当前最好的步骤。

我们在发表退出战争声明的时候,同时向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们呼吁:

我们向他们说:请你们听着!我们要退出战争。但是,如果德国军国主义调动他们的反革命军队来进攻我们,如果德国的兼并者妄图打击我国的革命,那么,我们就要德国社会民主党担负全部责任,它必须尽最大努力,运用自己的一切影响,以便不让帝国主义者来扼杀我们。而我们将尽我们之所能去做。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珍惜我们的运动即我国革命的生存和发展的正直公民都将用自己的生命奋起保卫革命,我们将竭尽全力,不惜任何牺牲来保卫自己和我們建设新生活的权利。

摘译自《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报告》(1918年2月17日),同上,第115—116页。

我们不能宣战,因为我们太弱。军队内部处于完全瓦解状态。为了使我国免于灭亡,必须重新建立劳动群众的内部组织。这种精神上的团结只有靠乡村里、车间里、工厂里的建设性工作才能建立起来。已经经历了战争造成的巨大苦难和灾祸的人民群众必须被送回田间和工厂,以便通过工作而在精神和体力上得到恢复,从而才能够建立必要的内部纪律。沒有别的拯救我国的办法,我

国必須为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所犯下的罪行偿付代价。我們被迫退出战争，把我們的军队領出这个杀人場。同时我也面对面地向德帝国主义声明过：“你們强迫我們接受的和平条件是武力和掠夺的和平条件。我們不能允許你們这些外交官对德国工人这样說，‘你們罵我們是兼并主义者；看，那些要求已經由俄国革命签字同意了！’是的，我們弱，我們目前不能打仗，但我們有足够的革命勇气对你們說，我們永远不会自願地签字同意你們正在用軍刀在活人身上写下的那些条件。”我們拒絕了签字，同志們，我相信我們的行动正是我們所应采取的行动。

“同志們，我不想說德国人决不会再向我們进攻。如果考虑到德帝国主义方面的力量，这样說是太冒险了。但是我认为，我們在这个問題上已采取的立場已經使得任何新的进攻对德国軍国主义者說来都是难办的事。如果他們仍然进攻了又会怎样？这个問題只有一个答案。如果說在我們被置于絕境的疲憊不堪的国家里最革命、最健全分子之中还可能鼓起精神，如果說俄国还可能起来保卫我們的革命和革命的領土，那末其所以可能，只能是由于目前的情况，由于我們退出战争和拒絕在和約上签字。”

摘譯自《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上的发言》  
(1918年2月27日)，載于《俄国革命》伦敦  
1919年版第138—142頁。

2. 宣传当时在党内要通过列宁的观点只有“分裂和政变”才行，在这种情况下，“不战不和”的公式是“通向列宁的立場的桥梁”。

党内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不管后来散播的謠言如何，当时的爭論并非发生在列宁和我之間，而是在列宁和絕大多数的主要党組織之間。当时爭論的最重要的問題是：那时我們是否能够继



續进行一場革命战争？一般說来是否可以容許革命政府同帝国主义者簽訂協定？在这两个問題上我是毫无保留地站在列宁一边的，我和列宁一样，給予第一个問題以否定回答，对第二个問題給予肯定回答。

在党和国家的一切領導机关中，列宁是居于少数地位。人民委员会要求各地苏維埃就和战問題表示意見，有二百多个苏維埃表示了意見。其中只有两个較大的苏維埃——彼得格勒和塞瓦斯托波尔的苏維埃贊成和平（后者还附有保留条件）。在另一方面，有几个大工业城市，莫斯科，叶加特林堡，哈尔科夫，叶加特林諾斯拉夫，伊凡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喀琅施塔得等等則以压倒的多数主张中止談判。同样态度也流行在我們的党組織中，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間当然也是如此。在当时要通过列宁的观点，除了分裂和政变外沒有其他道路。然而贊成列宁主张的人必然一天天在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不战不和”的公式实际上是通向列宁的立場的桥梁，党内大多数或至少其領導分子都跨过了这个桥梁。

.....

中央委员会正是在一月二十二日召开的决定性會議上通过了我的建議：拖延談判，如果德国提出最后通牒，就宣布战争已經結束，但是拒絕簽訂和約，到以后再見机行事。

摘譯自《托洛茨基自传》(1929年)，  
紐約1930年版第382—384頁。

## 二、变相拥护“革命战争”

声称如果“全党意見一致”，就可采用“革命战争的政策”。那时即使被迫放弃彼得堡和莫斯科，“也不会起不好的作用”，“就能使整个世界保持紧张状态”。但是“当党

內存在以列宁为首的一半人或大部分人反对自己的时候”，就不可能进行反对德国人和本国资产阶级的战争。说什么如果革命的无产阶级在目前条件下不能给德国以“作为国家统治阶级应给予的反击”，这就说明，“苏维埃政权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是过重的负担，我们出来得太早了，应该回到地下去”。扬言“如果不得不下台的话，我们应该作为一个革命政党下台，即为每一个阵地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在党内发生分裂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进行革命战争。要考虑的不仅是国际关系，而且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党无力领导战争，尤其是一部分拥护战争的人不愿意要进行所需的物质资料<sup>①</sup>。弗·伊·〔列宁〕的论据是远不足以说服人的。如果我们意见一致，我们就能担负起组织防御的任务，我们就能胜任这个任务。那时即使我们被迫放弃彼得堡和莫斯科，我们也不会成为坏角色。我们就能使整个世界保持紧张状态。……从国内政策来看，没有列宁所描绘的那种非此即彼的情况，但是从国际政策的角度来看，可以赢得很多东西。然而这便要有最大限度的意见一致；既然没有一致的意見，我就不能承担拥护战争的责任。**

摘译自《1918年2月23日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载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速记记录》  
莫斯科1958年版第211—212页。

由于两个原因，在决定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时，我在中央委员会表决时弃权。第一，因为我不认为，我们对这个问题采取这种或那种态度能够决定我国革命的命运。我不认为它有决定意义。关

<sup>①</sup> 指1918年2月22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向协约国购买武器和粮食以抵御德帝国主义者的问题。——原编者注

于哪里成功的希望大一些的問題(那里还是这里),我认为,較大的希望不在列宁同志所站的那一边,这一点我下面再談。第二,我过去和現在都认为,所謂反对派所支持的那种政策——革命战争的政策,为了能够真正在实际中得到采用,就需要各派意見一致,全党的意見一致——这是首要的一点。当党内存在以列宁为首的一半人或大部分人反对自己的时候,要克服落后的人民群众广大阶层的因循守旧心理去进行反对德国人和反对我国资产阶级的战争是不可能的……

摘譯自《在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18年3月7日),載于《联共(布)代表大会和代表會議速記記錄。第七次代表大会》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版第68頁。

情况是严重的:党内一部分人不承认主张簽訂和約的人的决定,——我指出这一点不是作为譴責;主张革命战争的人认为,战争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和唯一的拯救办法,他們應該不顾党的正式意見,直截了当地提出問題。我們面临的情况是:在目前条件下,我們党的很大一部分人退党了,这一点大大地削弱了苏維埃政权。在国家衰弱、农民消极、无产阶级的情緒显然很低落的情况下,党还有分裂的危险。〔对我來說,下述一点是很清楚的:在号召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防御的时候,我們在党内應該是团結的,我們的策略应该是一致的。〕鉴于在中央委员会内形成的力量对比,我这一票关系重大;这个問題的決定就取决于我这一票,因为,某些同志是同意我的立場的。我弃权了,并以此表明,我不能对党内未来的分裂承担責任。〔对我來說很清楚:党不應該发生分裂,少数應該服从多数。〕我认为,退却比为了取得虛构的喘息时机而簽訂和約更合适些,但是我不能在这种情况下承担起领导党的責任。我认为,在国家所处的目前局势下,在心理上和政治上分裂是不可設想的。拉狄克同志說得完全正确,外交人民委員沒有权利在战争与

和平問題上弃权。因此，我当时就在那一次我們党中央委员会會議上提請免除我的外交人民委員的职务。

同上，第72—73頁。

如果革命战争是持久性的战争，这两种前景都是可能的。它們会把党弄到分裂的地步。如果欧洲革命发展得过于迟緩，如果我們为了取得喘息时机而簽訂和約，并为此而交出乌克兰的話，这种危险性不会消失，也不会减少。我們對我們革命軍队的直接斗争沒有給以支持，然而，据最近消息看来，那里的斗争进行得非常激烈，而且取得了一些胜利。我們沒有进行战争，而同时我們苏維埃联邦的部队却在进行斗争。明天彼得格勒或莫斯科可能会面临支持乌克兰无产阶级的問題，但是它們能做些什么呢？后天德国人会要求我們同乌克兰拉达簽訂和約；这一点在他們的和約条件中是有的，但目前還沒确定下来。我們能不能去同被我們和乌克兰工农一块儿驅散了的乌克兰拉达簽訂和約呢？其次，当斯文胡伍德击潰了芬兰紅軍的时候，还会要求我們同斯文胡伍德去簽訂和約。这种要求不是不可能的，相反地，这种要求是从和約条件中合乎邏輯地产生出来的。我們能不能还說我們力量薄弱、我們不能拒絕和抵抗而同意这样做呢？这說明什么呢？革命无产阶级在目前条件下不能給以作为国家統治阶级应給予的反击。那么就請說出来，苏維埃政权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是过重的負担，〔我們出来得太早了，应该回到地下去〕——这就是含意所在。对于革命阶级來說，同帝国主义者勾結是不能容許的<sup>①</sup>，——主要之点就在这里。我們仍然保持苏維埃政权。这个政权应该发展并加强。难道我們在保持着政权的同时却由于那喘息时机的不确定的期限，还

<sup>①</sup> 在《托洛茨基全集》中，这里加了一个注，意思是說，記錄中記錯了，因为托洛茨基曾主張接受盟国帝国主义者的援助，以便去同德国人作斗争。——原編者注

要繼續退却和接連不斷地作出新的讓步，而根本不提出任何限度，不提出任何保障嗎？我們力量薄弱，並因而不僅在地理上，而且在政治上即在廢除債務、我國工業國有化等問題上作出讓步。如果我們為了一個前景不清的喘息時機而讓這種退却發展下去的話，那末這就會使我們陷入內部矛盾的地步。我們以此表明，俄國無產階級無力保持住階級政權，〔歷史過早地把政權交給了俄國無產階級〕。歷史上種種情況的配合把這個政權交給了它，但是它由於各種條件，不僅在地理上，而且也在政治上正在交出這個政權並實行退却。我認為，我們能建成即使不是很好的、但多少能過得去的鐵路的事情是會出現的。這個喘息時機最多不過幾個月，而更可能是只有幾個星期和幾天。在此期間，問題將會弄清楚：或者我們將聲明，我們出來得太早了，我們要下台，回到地下去，同時讓切爾諾夫、古契可夫、米留可夫這些著名的政客去同斯文胡伍德或烏克蘭算賬。但是我認為，如果不得不下台的話，我們應該作為一個革命政黨下台，即為每一個陣地而戰鬥到最後一滴血。歷史條件正使我們面臨着這種前景。

同上，第73—74頁。

正式締結和約的巨大政治困難即宣傳心理上的困難就在於這種情況<sup>①</sup>。由此產生了意見分歧。我們大家一致認為：談判必須盡量拖延下去，以便從中取得全部宣傳“資本”，同時盡量贏得更多的時間，為歷史提供使我們與德國革命和全歐革命靠近的機會。意見分歧是從這樣一個問題開始的：一旦下了最後通牒怎麼辦？列寧同志直截了當地提出問題：無論如何，不能使談判破裂。既然我們不能進行戰爭，那就不容許把戰爭當兒戲。黨的少數派則恰恰

---

<sup>①</sup> 指有人受了資產階級欺騙以為蘇德早有勾結而和約只是幌子。——編者注

相反，认为必須使談判破裂，而用游击战争来回击进攻。最后，还有一派认为不可能进行軍事抵抗，同时认为必須坚持談判到公开破裂，到德国发动新的进攻的时候为止，要到帝国主义明显地使用武力的时候才不得不投降，从而根除說什么談判仅仅是为了掩飾已做成的交易的种种誹謗和怀疑。本文作者认为，这种宣传論据具有决定意义。在党内两个极端派别进行斗争的时候，“中間”的观点暂时占了优势，它使每一个派别抱着希望：事件的下一步进程将证实它的判断和預測的正确性。

談判中斷。德国甚至违反停战协定中关于七天前提出警告的規定而轉入了进攻。为进行这种欺騙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是由丘尔曼男爵和霍夫曼將軍友好地商定的，虽然，一般說来他們在其他一切方面还象猫狗共处那样的不和。德国人轉入进攻，占領許多城市，在乌克兰枪杀共产党人，所有这一切十分清楚地表明，沒有暗中交易的行为。我們除了在武力面前暂时投降以外，沒有別的办法。

毫無疑問，如果我們沒有卷入這場会使俄国革命在两三个月內就被摧毀的毫无希望的战争中去，那么，党和革命应当把这一点归功于列宁同志当时提出必須暂时投降問題所表現的那种果断精神，——“轉入秘密状态去对付德国帝国主义”，如他在党的會議上所說的那样。但是，回顾过去，現在可以充满信心來說，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談判的暂时破裂和德国軍隊向我們发动进攻，归根到底，不但沒有損害，反而帮助了欧洲革命的事业。德国人占領得文斯克、列維里和普斯科夫以后，英国工人和法国工人当然不会相信布尔什維克同霍亨索伦进行了幕后的合作。这在很长時間內使協約国强盜难于向我們发动进攻。拉柯夫斯基同志有一次这样說：“如果簽訂第二阶段的布列斯特和約使我們免遭德国帝国主义繼續不断的进攻，那么，在此以前拒絕簽訂第一阶段的布列斯特和

約則使我們很久免遭協約國的進攻”。無論如何，在這裡比在任何地方都更適宜於這樣說：結果好就好。

摘譯自《布列斯特階段》(1919年8月1日)，載于《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1分冊莫斯科1926年版第147—148頁。

### 三、攻擊贊成簽訂和約 是投降情緒的表現

1. 污蔑贊成簽訂和約是同反對十月革命一樣的“投降情緒的表現”。聲稱在口頭的最后通牒逼迫下就立即簽訂和約有“使黨分裂”、“陷入極端右傾”、失去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支持和“導致無產階級的瓦解”的危險。

如果我們今天接受德國的最后通牒，那我們明天還會有新的最后通牒。所有的措詞都提供了日後提出最后通牒的可能性。我們可以簽訂和約；這會在無產階級先進分子中失去支柱，無論如何也會導致無產階級的瓦解。

摘譯自《1918年2月23日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載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速記記錄》莫斯科1958年版第212頁。

在共產黨代表大會上，在蘇維埃第四次代表大會上，贊成媾和的人得勝了。在一月間曾反對在布列斯特和約上簽字的人們中間有許多人現在贊成媾和。他們說：“那個時候，我們如果簽字，會被英國和法國的工人理解為不試圖鬥爭就可耻地投降，甚至英法沙文主義者關於蘇維埃政權同德國人秘密勾結的這種无耻誹謗也會使西歐某些部分的工人相信。但是在我們拒絕簽字以後，在德國人對我們發動新攻勢以後，在我們試圖抵抗以後，我們的軍事弱點

在世界面前暴露得一清二楚以后，誰也不敢責備我們不戰而降。”第二次的比原来更苛刻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約正式簽訂并被批准了。

与此同时，在乌克兰和芬兰，劊子手們正繼續逞凶肆虐，越来越厉害地威胁着大俄罗斯的最重要的一些中心城市。因此，我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問題就不可分割地同欧洲革命問題联系起来。

摘譯自《第二次战争及和約的簽訂》（1918年5—6月），載于《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1分冊莫斯科1926年版第127—128頁。

在這些問題的主要困难以外，还加上党內的許多严重困难。在党内，至少在领导人中間，大半对簽訂布列斯特条約抱不調和的态度。我們的報紙上所揭載的关于談判的消息煽动了，并且加强了这种情緒。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左派共产党人集团中間，他們提出了革命战争的口号。这种局势，当然使列宁感到极大的不安。

我說：“如果仅在一種口头的最后通牒的压迫下，中央委员会就决定簽訂德国所提出的条件，我們就会冒使党分裂的危險。我們的党需要把事态的真相揭露出来，并不亚于欧洲工人。如果我們与左派决裂的話，党就会陷入极端右傾。要知道，那些坚决反对十月革命或贊成各社会主义党派联合的同志，都无条件贊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我們的任务并不因締結和約而完成。左派共产党人中有許多人在十月革命时期及其他等等方面起了极大的战斗作用。”

列宁回答道：“这一切是无可爭辯的，可是此刻的問題是革命的命运問題，我們將恢复党的平衡。但首先需要拯救革命，而只有簽訂和約，才能拯救革命。分裂較諸武力摧毁革命的危險来得好些。左派同志鬧一陣，以后——即使发生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分



裂，——将回到党里来。而如果德国击潰了我們，那末，我們中間就沒有一个人能回到党里来……好吧，就算接受你的計劃。我們拒絕簽訂和約。然而德国立刻向我們进攻。那时你怎么办？”

“我們就在刺刀下簽訂和約。那时，全世界的工人就都明了真相了。”

“但是你将不支持革命战争的口号么？”

“决不。”

摘譯自《关于列宁》(1924年)，莫斯科  
1924年第2版第60—61頁。

無論如何，要明了并評價列宁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策略，只有把它和列宁的十月革命的策略联系起来看。反对十月革命和贊成布列斯特和約，两者实质上都是同一种投降情緒的表現。全部实质在于，列宁發揮了与曾保证党在十月取得胜利的同样无穷的革命毅力来爭取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投降。正是这种十月革命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約、伟大的胆略与大胆的謹慎、进击与前后照应之自然的、有机的結合提供了衡量列宁的方法与列宁的力量的准繩。

同上，第65頁。

2. 认为必須以拒絕签字和复員軍隊来“弄清楚实际情况”。竟說德軍的推进，城池被占是我們无力作战的最好证据，这样就可以消除同德国人串演滑稽戏的謠言。声称“从‘爱国的’观点来看，立即簽訂这些条件会比较有利”，但是“不战不和”是为了“革命的鼓动”，拒絕签字“具有不可估計的鼓动影响”，应把“国际革命的任务放在爱国考虑之上——在和約的領土条件和其他一切条件之上”。

托洛茨基同志提出了一个問題，革命战争怎样对待世界国际关系？要知道，目前整个問題在于力量的对比。我們是积极地参加帝国主义战争还是表示不积极，我們反正是参加了战争。因此我們应当考虑怎样对我們更有利。把我們的全部力量变成军事力量，这是空想。因此关于革命战争的問題，是一个不现实的問題。军队必須遣散，但是遣散军队并不就是签订和約。在談判期間，我們怎样也未能摸清奥匈帝国和德国的相互关系。我們通过拒絕签订和約和复員军队就会弄清楚实际情况，因为德国人正是在我們复員军队的情况下才会进攻。我們这样就清楚地告訴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存在按事先分配好的角色演戏一事。我們也未能摸清德国的反抗力量有多大，因为德国人不知道报刊上发表的和約条件，德国的书报检查机关編造了談判情况。斯图奇卡同志建議我們向德国人提議成立仲裁法庭，我认为这个建議作为再次拖延談判的办法是可以采納的；如果他們拒不接受，我們就停止談判，但是我們声明我們也不打下去。

譯自《在 1918 年 1 月 24 日中央委员会會議上的发言》，載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速記記錄》莫斯科 1958 年版第 170—171 頁。

托洛茨基同志（反对发出建議和談的电报）证明說，現在群众刚刚領会所发生的事情；在目前签订和約只会在我們的队伍中造成混乱；对于德国人也是同样的，他們认为，我們只是在等待最后通牒。可能他們指望心理上的影响。必須等一等看这一切对德国人民产生怎样的印象。在德国，人們曾高兴地迎接停战，有可能德国的进攻在德国引起强烈的爆发。应该等一等看影响，如果这种影响沒有发生的話，那时还可以建議媾和。

譯自《1918 年 2 月 18 日在中央委员会會議上的发言》，同上，第 198 頁。

如果国内有一个能够反抗德国帝国主义的党，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党，我再說一遍，甚至同盟国大使館也是这样确信不疑的。在两个半月期間，我們依靠革命的道义力量，使德国政府无法了解和平談判的結局。我們拒絕簽訂和約。这样，我們就越过了德国軍事检查机关和官方造謠家，而使德国劳动群众知道，向我們提出的和約是兼并的、苛刻的和掠夺的和約。我們拒絕簽字，这件事具有不可估計的鼓动影响，它的后果可能在最近的将来还会显示出来。

摘譯自《为什么我們同意德国的和平条件？》  
(1918年2月24(11)日)，載于《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1分册莫斯科1926年版第122—123頁。

显然战争是不能繼續进行下去了，关于这一点，列宁和我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問題，那就是：霍亨索伦政府究竟能把对我們的战争进行到怎样的地步？二月革命以及后来的十月革命对德国軍隊产生了什么影响？这种影响还須經過多久才能表現出来？这些問題都还没有答案。我們必須在談判过程中設法弄清楚。因此我們必須尽可能地拖延談判。須得让欧洲工人有时间来好好了解苏維埃革命的事实，尤其是革命的和平政策，由于协約国报纸和俄国“妥协派”一样事先都把此次媾和談判說成是一种各方角色已巧妙派定的滑稽剧，因而拖延談判就更加重要了。……协約国的資產階級和社会民主党如果能成功地在工人群众中散播有关我們的錯誤观念，那就会更便于协約国對我們实行軍事干涉。因此我坚持：在簽訂单独和約——如果簽訂单独和約是絕對不可避免的話——之前，我們必須不惜任何代价給欧洲工人一个明白无誤的证据，证明我們和德国統治階級之間存在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时候，正是这些考虑使我得出政治示威的想法，提出了“我們停止战争，复員

軍隊，但不簽訂和約”的口號。我的推理是：如果德國帝國主義沒有能力驅使其軍隊來進攻我們，這就表示我們取得了一個影響深遠的、驚人的勝利。如果霍亨索倫王朝還能夠給我們以打擊，我們到那時再屈服還不算遲。

摘譯自《托洛茨基自傳》（1929年），  
紐約1930年版第380—381頁。

在整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機期間，列寧所採取的政策同斯大林的政策之間當然有很大的差別。斯大林更加接近季諾維也夫。必須說明，只有季諾維也夫有勇氣要求立即簽訂和約，他預言拖延談判會更加真正地增加和約條件的苛刻性，以此來吓唬我們。我們沒有一個人懷疑，從“愛國的”觀點來看，立即簽訂這些條件會比較有利，但是列寧認為，拖延和談是進行革命鼓動，國際革命的任務在愛國考慮之上——在和約的領土條件和其它一切條件之上。對列寧來說，這是一個在國際革命鬥爭中爭取喘息時機的問題。斯大林認為國際革命是一個我們不能依靠的“可能性”。不錯，後來他的確修正了這些話，以便使自己可以反對其他人，但是實質上，在當時正如在很久以後一樣，國際革命對他來說一直是一個沒有生命的公式，他不知道如何在政治實踐中利用這個公式。

摘自《斯大林評傳》（1940年），三聯書店  
1963年版下冊第334—335頁。

革命鬥爭要求我們向工人們表明，我們不能採取別的行動，敵人正在輕易地擊敗我們，我們不得不簽訂和約。正是為了這個理由，德軍的進攻是我們的最好證據，證明這項條約是被迫簽訂的。德國的一項最後通牒是不夠的；一項最後通牒可能同樣是預演的一出戲的一部分。德軍的真正的調動，城市的被攻占，軍用財產的被劫奪，則完全不同了。我們失掉大量財富，但是我們卻贏得全世

界工人階級的政治信心。分歧意見的意義就在于此。

同上，第 335 頁。

#### 四、依賴歐洲革命

胡說蘇俄的整個策略是“建立在冒險的基礎上的”。宣傳“一切都取決於歐洲革命的覺醒和發展速度”，“只有歐洲革命才能拯救”蘇維埃政權。斷言如果歐洲無產階級不支持我們，“我們將被擊潰”。

……如果我們僅僅根據這些事實，那麼，當然，我們就是在英國戰勝的情況下，也會陷入最不幸的狀況。因為在現代戰爭中付出代價的從來就是最弱的國家，而由於事物的整個歷史進程，俄國已經成為所謂大國中最弱的一國。從這種觀點出發，資產階級報刊認為如果我們的盟國同我們一起參加談判，我們就會處在更加有利的地位，這種論點是完全站不住腳的。這當然是不對的，因為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就要首先繼續進行戰爭，而繼續進行戰爭，就要大量消耗我們的經濟力量，使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陷於破產。這樣，我們就會更加削弱我們在將來和平談判中的作用，最後，各國資本家就會彼此算賬，而迫使我們賠償一切傷亡和損失。因此，我們要避免最後徹底失敗的唯一辦法，就是把我們的命運——俄國革命的命運——同西歐革命的命運聯繫在一起。

摘譯自《談判總結》（1918年2月14日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的報告），載於《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1分冊莫斯科1926年版第108頁。

我們來總結一下在我國革命和西歐革命的發展速度上出現不

平衡的时期。毫无疑问，我們或多或少都會是怀疑論者，但是我們大家會一致认为，欧洲革命的速度應該和我国革命的規模相近。毫无疑问，我們大家會一致认为，我国十月革命这一事实本身，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我們的社会措施、废除和公布旧条約、公开建議举行和談，所有这一切将会直接推动西欧风潮的发展。我們曾认为，这种震动将削弱欧洲資本主义的堡垒，为我們向俄国資產階級和欧洲資產階級进攻建立新的、日益壮大的支柱。这儿出現了某种不平衡，它的极其深刻的根源在于我国落后，在于我国无力經受这种长期的世界大屠杀，然而却被卷进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漩渦。

从这种尖銳的不平衡中，我国革命在其他国家之先，远在欧洲革命之前成长起来了。它在自己发展的最初阶段就沒有得到必要的支持。因此产生了我們所面临的一切极其深刻的策略上的困难。而現在（这种想法目前好象是个磨損了的硬币，然而它現在还保持自己的价值），不管我們怎样自作聪明，不管我們发明出什么样的策略，只有欧洲革命才能真正地拯救我們。

摘譯自《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18年3月7日)，載于《联共(布)代表大会  
和代表會議速記記錄。第七次代表大会》莫斯科  
1928年版第67—68頁。

……再說一遍，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得到最有利的和平，我們早在十一月間就應該同意簽訂和約了。但是沒有一個人（無論是在中央委員會，还是在我們全党）曾贊成这样做。〔我們曾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运动上。〕当时我們大家都主张进行鼓动，进行爭取和平的斗争，促使德国、奥匈帝国和整个欧洲工人階級起来革命。当时我們主要是指望西欧革命运动的发展。最近我們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得到了德国和奥地利罢工的消息。試問：在这种情况下，

我們應不應該考驗一下德國無產階級的力量、它的政治覺悟、它的鬥爭能力呢？我認為，我們當時首先應該承認簽訂和約是不可能的事。

我們應該作最後一次試驗，在這裡，列寧同志是反對這樣做的，雖然他反對這一點並不那麼堅決。然而，那些因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聲明而譴責我們的同志們當時是和我們站在一起的。這一點必須予以考慮。如果硬要我去同德國人繼續談判，我在一月十日就會重做我已做過的事情。我就不會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sup>①</sup>。我會認為，在那種情況下簽訂和約是絕對不能容許的，雖然我清楚地知道，每拖延一天都會使和約條件更加不利。為什麼？因為所有我們過去同德國人的談判和我們的宣傳，只有當人們相信它們的真實性時，才有推動革命的意義。在第三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我曾在黨團中說，正象前奧匈帝國的部長格拉茨所說過的，德國人只是需要一個提出最後通牒的借口。他們以為，我們示意要他們提出最後通牒。我們的敵人和愚昧知無的、不夠覺悟的朋友把我們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談判時期的立場說成是玩弄早先做出的決定，說我們把我們進行單獨媾和和早先答應簽訂任何和約的做法當作兒戲，說我們在演革命的滑稽劇。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簽訂這個和約，而不試驗一下德國無產階級的戰鬥力，那末我們一方面有喪失列維里和其他地區的危險，另一方面又有失去法國和英國無產階級或他們的很大一部分人的同情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把責任放在德國無產階級和它的黨身上，結果，黨是完全軟弱無力的，它不僅沒有試圖反抗（喊聲：“正式的黨，——而另一個黨呢？”），而且還不斷地為德帝國主義對俄國的侵略行為進行辯護。〔德國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已經成了叛變的黨。〕

<sup>①</sup> 這裡顯然是荒謬的。在《托洛茨基全集》中改正為：“如果硬要我去同德國人重開談判，我在2月10日就會重做我已做過的事情。”——原編者注

我是曾經认为德国人不会进攻的那些人中的一个。当时我說，如果他們进攻，我們随时都有時間簽訂这个和約，哪怕是在更坏的条件。随着時間的推移，大家都相信了，别的出路我們是沒有的……

我們現在还不知道迫使或促使德国举行进攻的一切因素。拉狄克同志說，德国的报纸現在指出，在我們动身四天以后，德国的报刊說过，进攻不会举行。这里牵涉到哪些因素，是在暗中摆弄我們的同盟者呢，还是可能只是德国本国的最极端的軍国主义派取得了胜利，——这对我們現在來說几乎是无关紧要的。显然，我們采取了冒險的步骤。这不是个人的、不是小集团的冒險。这里會下了很大的賭注：欧洲的无产階級支持不支持我們？在后一种情况下，我們將被击潰。这种冒险是由我們所意識到的形势的本质引起的。我們对目前这种冒险的危险程度的估計是不同的。列宁同志认为，在德国人攻克了列維里和其他城市以后，現在必須簽訂和約；另一派人认为，對我們來說（既然这取决于我們的意願），現在是以革命化的方式影响德国无产階級的唯一时机。这样就不割断我們會进行的鼓动的继承性，不給它造成历史的間断。当然，以后一切都会弄明白的。

現在必須使欧洲的无产階級，首先是德国无产階級，面对那个不是由我們造成而是从国际形势的本质中产生的政治悲剧，要德国党对它不支持我們这一点負全部責任。〔如果把全部責任推到德国无产階級身上，那是不正确的。〕我們在退却、在自卫，因为这是我們能胜任的。我們將实现列宁所預言的前途：我們要退到烏拉尔，撤出彼得格勒、莫斯科。我应当說，列宁同志會說过德国人想在彼得格勒簽訂和約，几天以前我和他會是这样想的。但是我記得，好象列宁在一次具有莫大社会意义的私人談話中，对德国人的这个計劃实现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显然，他认为，攻克彼得格勒的



事会使德国工人大大革命化。这是可能的。攻克彼得格勒是危险的事实，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但是，这对德国人来说，显然也是一种冒险的策略。但是所有这些可能性都是冒险的，而我们的整个策略正是建立在这种冒险的基础上的：我们不可能有任何把握，只能在许多不清楚的情况下采取这种和那种政策来寻求解决，而一切都取决于欧洲革命的觉醒和发展的速度。如果甚至在我們批准这个和約的情况下它也将得到发展……那些說明和平的必要性的論据就不仅瓦解建立軍隊的工作，而且瓦解直接的动員工人群众的工作。同时在普斯可夫和其他地方对他们說，工人被赶去屠杀，但是这不会有什么結果的。我們不知道，是否会有結果。

同上，第 69—72 頁。

斯大林在二月二十三日的會議上第二次发言，这次是为簽訂和約的必要性辯护。他还乘此机会糾正了他自己对国际革命問題的看法，〔因为〕<sup>①</sup> 列宁〔批評了他。斯大林說，〕“我們也是把賭注押在革命上。你們估計几周会发生革命，而我們估計几个月才会发生。”这番話完全符合当时的情緒以及謝尔盖也夫(阿尔乔姆)〔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十一日)〕的會議上所說的話：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員在一件事情上意見一致，即如果没有国际革命的胜利，在最短不过的时间里（据斯大林說是在今后几个月內），苏維埃共和国就会灭亡。这样，“托洛茨基主义”当时就在党中央委员会里得到了一致的贊同。

摘譯自《斯大林評传》(1940 年)，三联书店  
1963 年版下册第 333 頁。

① ( ) 內的文字是《斯大林評传》原編者整理托洛茨基此书遺稿时加上去的，  
以下同。——編者注

## (八) 工业化問題

### 一、工农业的关系

认为“如果国营工业赶不上农村剩余产品的积累，那么，在这种积累的基础上就会产生私人資本”，“促成商业資本同手工业者和富农的結合”。断言“‘专政’权必須掌握在工业手里”，只有这样才能使国营經濟綜合体和农民經濟的結合“轉入經濟现实的范围”。說在缺乏工业品的情况下，农业丰收就会“破坏經濟”，“使城乡关系尖銳化”，推动农民“反对社会主义工业”，“会成为使經濟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速度不能加快的因素”。

新經濟政策的第一个总结是：工业在恢复起来，不过我們暂时有亏损，这种亏损是我們在历史的“預备班”或“一年級”对学习权所付的学费——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我們是在預备班学习。

在“二年級”，我們应当减少“学费”，然后不再付“学费”，而要經營謀利。我們將向国外輸出粮食，并用粮食从那里换来商品。我們將加重資本主义自发势力对我国的年輕經濟——它在工业方面共拥有二十五亿固定資金和流动資金——的压力。我不知道未来的收成怎样，我們希望有好收成。但是，好收成意味着危险的增長。固然，好收成是需要的，但好收成不只是为国家工业扩大市場容量，而且也為商人、資本家和私人資本扩大市場容量。在我們国

家存在着竞争者，他们正在壮大、抬头，我们如果经商亏本，他们就会经商取利，而且还有从西方来的由我们通过粮食输出而使我国农民与之发生联系的西欧资本的压力。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增长和发展的时代开始了。而且这只野兽正在大步跃进。因此，谁能知道，我们在最近几年不需要用一切力量去反对私人资本主义势力的离心倾向而保卫社会主义领土的每一寸土地即保卫国营经济所辖的每一个小单位呢？

摘译自《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1923年4月20日夜)，载于《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公报》，莫斯科克里姆林1923年版第7号第256页。

既然我提出的只是第一个标准，我就来分析一下：小手工业在恢复起来吗？这样好吗？这有什么不好，这是需要的、正常的、必然的和进步的东西。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前进。这是市场的基础。这是正常的、必然的和进步的东西，但这毕竟是初级的东西。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小手工业意味着什么呢？这里有一些人会說，不知是我自己被小手工业者所吓倒呢，还是我在用他们吓唬别人。不应该这样提问题。小手工业本身现在是进步的事物。它的发展是一种必然现象。但是，在国营工业不能同时增长和发展的情况下，在它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并且处于亏本的情况下，这种小手工业将不是处在我国合作社的影响之下，不是处在我们所组织的国家信贷的影响之下，而是将处在私人商业资本的统治之下。因此，现在在我国已有相当广泛影响的商业资本和开始逐渐支配其他手工业者的富农小手工业者的结合，可能第二次在我国造成真正俄国土产的资本主义。这就是客观的分析。这个危险大吗？怎么讲呢？这是一种不能用统计数字事先估计出来的危险，它取决于事物的进程，取决于各种力量的斗争，而我们是这个斗争中的主力。但是看不到这种前景，对它估计不足，就等于盲目行动，必然

要大碰釘子。我在报告中說过，小手工业和手工业所提供的产品，共有四亿一千五百万卢布。

从这里应得出什么結論？难道还是那个压制小手工业者或者重新限制我国农业經濟的結論嗎？只有瘋子才能得出这种結論。非常清楚，我們不但不准备压制这种小手工业，恰恰相反，我們越往后去，就越要从我們这方面尽一切努力，通过合作社和国家信贷去同它实行結合，使它逐步納入国营經濟系統。而这个任务我們只是在着手解决。另一方面，我們將使我們的国庫、征稅机构日益适应农民經濟和小手工业經濟的各种特点，即更多地压制富农和富农小手工业者。我們將千方百計帮助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发展，而同时要尽力使这种发展納入一定的軌道，与我們的国营經濟联系起来。但是，如果閉眼不看这一事实，即它可能成为反对我們的另一种发展的源泉，成为可能发展私人資本主义的营养肉湯，那就是犯罪的和荒謬的行为，我現在正是要談这个問題。我們是否能够——怎样說好呢——用机械地把农村和手工业的生产力轉入工业的办法强迫农村和小手工业的发展有利于国营經濟呢？不，我們不能。这在經濟上会造成灾禍。而在經濟灾禍发展以前，我們会碰到政治灾禍。

我們二月間在喀琅施塔得听見了这种灾禍的暗示。因此，我們經營管理的艺术就是要在外国資本(我們还要单独談它)涌入我国以前，把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特别是农民經濟最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种依賴关系是通过复杂的道路来建立的。首先，我們通过合作社和私人貿易額的情况来摸清市場，另一方面，我們通过国庫和稅务机关来摸清农民的购买力。稅务机关現在对农民的压力太重；我們大家都想把这种压力减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关于这点，将有专门报告。我們的工业企图用一个翅膀直接依靠农民市場，这就是輕工业，另一个翅膀則依靠預算，而預算同样来自农民。因

此，如果我們不能保持平衡，破壞平衡，如果我們不能滿足農民，脫離他們，或者我們在這裡或那裡把賦稅增加得太重，因而破壞平衡，那麼，工業就可能從某一塊基石上滑跌下來。這是關於正確和實事求是地估計農民的力量、弱點及其經濟彈性的問題。

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向自己提出跳過農民經濟或乘汽車超過它的任務，那麼，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敢落在它的後面。這是問題的另一方面。我們的提綱在這方面明確地寫道：“對國營工業同樣重要的是，不要落後於農業，否則，私人工業就會在農業基礎上產生出來，它最後將吞噬和擠垮國營工業”。這種危險並不亞於第一個危險；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我們太冒進了，脫離了農民群眾。但是，現在有工人階級專政被推翻的危險；有落後於農業經濟及其剩餘產品積累的危險，有被私人資本碰得頭破血流的危險，而在農民經濟剩餘產品積累的基礎上，私人資本是必然要產生的。關於這些危險，同志們，我在昨天報告的主要部分中已經談過了。

我們說，要是趕不上去，那麼，隨着今年和明年的豐收，會有很大的危險。如果接連三年豐收，這對我們來說，自然是一種天賜厚禮，但這種豐收就要在國內外尋找銷路。我們能夠向國外運出多少，這取決於歐洲的購買力，但是，主要取決於運輸條件和我們的技术條件。國內將有農村本身不需要的大量剩餘農產品。這意味着什麼？是優點還是缺點？這是最大的優點。但是，這個優點既能夠為國營工業奠定基礎，也為私人資本打下基礎。如果國營工業趕不上農村剩餘產品的積累，那麼，在這種積累的基礎上就會產生私人資本，這就是說，這種剩餘產品會促成商業資本同手工業者 and 富農的結合，如此等等。這就是問題的本質，我們進入了整個經濟機體恢復的時期，但面臨着一個嚴重危機——我國工業原料的危機。而且我們正面臨着另一個更為深刻的危機——固定資金的危機，即我們的設備的損耗日益增加，需要更新設備，為此，在工業

的国家手中需要拥有资金。同志们，这就是总的情况，但是，这不是为了吓唬人，而是为了对它作清楚的估计。国家的经济正在恢复。有两三个丰收，恢复就将大踏步前进。超过农村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能落后。决不能落后。

摘译自《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上的发言》  
(1923年4月21日夜)，同上，第8号第297—299页。

无论大小工业部门或是任何企业，如果没有指引方向的计划，就决不能合理地分配它们的资源和力量。同时所有这些局部计划又都是有关联的，它们是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必须把这种互相依存关系作为制订计划和计划执行的基本准绳，也就是说要在既经获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对计划定期加以核实。

有些为期多年的长期计划事后证明都不能实现，嘲笑这些计划是容易的。这样的计划多得很，毋庸说经济幻想在经济中是没有地位的。但为了要制订出合理的计划，不幸的是必须从最简单和概括的计划开始，正如在得到钢刀之前必须先使用石斧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对计划经济问题抱有幼稚的想法，他们说：“我们不需要这样多(?)的计划；我们有了一个电气化计划，让我们实现这个计划就够了！”这种理解意味着对于这个问题完全缺乏最起码的认识。电气化远景计划是完全从属于工业、运输、金融和最后还有农业各主要部门的远景计划的。首先必须使所有这些局部性计划在我们所拥有的关于经济资源和潜力的资料的基础上彼此保持协调。

正是这样一个协调的总计划，例如一个年度计划(包括三年或五年等等的特殊计划的年度部分，并且只代表实际分配的计划任务)才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保证计划的执行和在执行的过程中作出必要调整的主管机关在实践中的根据。这样一种领导具有切必要的灵活性和行动自由，不致蜕变(也就是说应该不会蜕变)成为

一系列临时应急行动，因为这种领导方法有一个合理的有关整个经济过程的总概念作为依据，而在作出必要的调整的时候，它会努力使经济计划完善化，并根据物质情况和资源使其具体化。

这就是国家经济计划工作的最一般的方式。但是市场的存在使这种计划的执行变得异乎寻常地复杂化。在边远地区，国家经济会与小农经济结成联盟或者至少试图与它结成联盟。结合的直接工具是轻工业产品和部分的中型工业产品的贸易，而直接为国家（为军队、运输和国营工业）服务的重工业只是间接地、部分地或者附带地参与贸易。农民经济是不受计划的控制的，但是它受自发地发展的市场的影响。国家能够而且应该对农民经济施加影响，推动它前进，但国家还绝对没有能力根据单一的计划把农民经济纳入轨道。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好多年（恐怕首先要依靠电气化）。在下一个时期，（这是我們实际上最感到兴趣的）我们将有一个计划国营经济，使国营经济与农民市场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其结果则是国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适合农民市场的需要。虽然这个市场自发地发展着，但国营工业并不是无意识地适应这个市场的。相反地，我们在经济组织中的成就，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够多大程度上通过对市场情况的确切了解和正确的经济预测成功地根据明确的计划协调国营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各个国营工厂之间或者各个托拉斯之间的一定程度的竞争，丝毫也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即国家是所有国有化工业的所有者，国家作为一个所有者、管理者和经理，在对待农民市场的关系上是把它的全部财产看作一个整体的。

显然，对农民市场不可能作精确的预计，正如我们不可能精确预计世界市场的情况一样，因为我们同世界市场加强联系主要是通过输出谷物和原料，单单因为收成等等情况的变化无常，估计的错误就在所难免。这种差错将通过市场以局部的或者甚至普遍的

产品不足、混乱和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如此，但是只要更加认真地把计划经济推行到国家经济所有部门中去，使这些部门不断地统一步伐，那末这些危机就不会尖锐和持久，这是很明显的。如果说布伦坦诺派（德国经济学家路约·布伦坦诺的信徒）和伯恩施坦派的学说——根据这个学说，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统治可以“调节”市场从而使工商业危机成为不可能——是根本错误的話，那末把它应用到工人国家方面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个国家是托拉斯的托拉斯和银行的银行。换言之，在我国经济中，国营经济与私人活动相比危机范围的扩大和缩小是其是否取得成就的最清楚和最正确无误的晴雨计。在国营工业争取控制市场的斗争中，计划经济是我们的主要武器。没有它，国有化本身就会成为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障碍，而私人资本将不可避免地破坏社会主义的基础。

所谓国营经济，我们所指的除工业之外，当然还有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和金融事业。这一整个“综合体”<sup>①</sup>——就其整体及其各个部分而言——是在适应农民市场和适应作为纳税人的个体农民。但是这种适应有其基本目的，那就是提高、巩固和发展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基石和社会主义基础的国营工业。如果认为有可能孤立地发展这个“综合体”的某一部分——不论是运输和金融或者其他部分——并使其臻于完善，那就大错特错了。它们的进步和它们的退步都是紧密地互相依赖的。因此，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具有原则的巨大意义的，它的作用在我们当中还很难为人所理解。

国家计划委员会必须调整国家经济中的一切基本因素，也就是说有系统地统一并指导国家经济中所有的基本因素，使它们与

---

<sup>①</sup> Combine, 通常译为联合企业、综合工厂。——编者注



国家經濟，也就是主要与农民經濟保持正常的关系。国家計劃委员会所关心的主要目标必須是发展国营(社会主义)工业，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說在国营經濟綜合体当中，“专政”权必須掌握在工业手里，而不是在財政金融手里。当然，正如我业已指出的那样，“专政”这个字眼的意义在这里是极其有限和有条件的：这是用来与財政金融所要求的“专政”的相对提法。換句話說，不仅对外貿易，而且还有恢复稳定的通貨，都必須严格服从国营工业的利益。当然不用說，这决不会是針對結合关系的，也就是說决不是违背国家整体和农民經濟之間的正常关系的。相反地，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我們才能逐渐順利地把这种“結合”从純修辭的范围轉入經濟现实的范围。如果說，这样提出問題就是“忽視”了农民，或者說让国营經濟独攬一切就不符合整个国民經濟的状况，那真是荒謬透頂，無論怎么說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摘譯自《計劃經濟》(1923年底)，載于  
《新方針》倫敦1956年版第70—73頁。

在这样的条件下<sup>①</sup>，丰收，即农业剩余商品数量的可能增加，会成为使經濟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速度不能加快的因素，相反地，会成为破坏經濟，使城乡关系尖銳化的因素，而在城市里則成为使消費者和国家的关系尖銳化的因素。从实际上說，丰收在缺乏工业品的情况下就会意味着把更大数量的粮食蒸餾为私酒，延长城市居民购买粮食的行列。从政治上說，丰收就将意味着农民反对对外貿易的壟断即反对社会主义工业。

摘自《对李可夫的決議草案的修正案》，  
1926年中央四月全会會議速記記錄第  
164頁，轉引自《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  
257頁。

---

① 斯大林在引述这段話时加注說：“托洛茨基說的是現時不按比例的条件。”——  
編者注

工业发展的迟緩已經在价格上造成令人不能容忍的“剪刀差”。官僚主义者为降低价格而进行的斗争仅仅扰乱了市場，剝夺了工人而并未給农民带来任何好处。农民从十月革命以后完成的土地改革中获得的大量利益正在遭受工业品价格的吞噬。这种情况損害了联盟，把农村中广大阶层驅赶到大喊国内貿易和对外貿易自由化口号的富农那边去。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商人找到了便于发展的土壤和掩护，国外的资产阶級也获得了一个基地。

摘譯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1936年版第294—295頁。

## 二、工业的发展速度

### 1.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

指責“工业发展得太慢”，“是蝸牛的速度”。这阻碍了农业的发展，破坏了工农联盟。声称“如果有集中的领导，工业生产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决不是办不到的”。攻击斯大林反对超工业化的斗争，說这是“官僚不想干扰居民中开始致富的阶层”——“小资产阶級上层”，是直接为“富农的利益”服务的。

在一定的历史情况下——資本主义的包围和世界革命的迟迟不来——，在目前最初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就是工业化的速度必須迅速到足以保证在最近的将来至少解决下列問題：

(一)国内无产阶級的物质地位必須絕對地和相对地加强(增加就业工人的数量，减少失业人数，改善工人阶級的物质水平，特別需要按照卫生标准扩大工人阶級的住房面积)。

(二)工业、运输和电站工作的发展速度至少必须同全国需要和资源的生长相适应。

(三)必须使农业有可能逐步过渡到较高的技术基础上，并且保证为工业提供日益增多的原料。

(四)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在技术问题上，在改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物质条件问题上，苏联绝不能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而必须在最近的将来超过它们。

(五)工业化必须达到足以保证国防的程度，特别是保证军事工业的适当增长。

(六)社会主义成分、国家成分和合作社成分必须有步骤地增长，排挤一部分、同时控制和改造另外一部分前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资本主义的和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

虽然我们在工业、电气化和运输方面有很大成就，但是工业化还远没有得到必需和可能的发展。目前工业化的速度以及为今后几年规定的速度是显然不够的。

没有，当然也不可能有一种政策使我们可以一下子解决所有的困难，或者把有步骤地发展我国工业和文化的一个长时期一下子跳过去。但是我们在工业和文化上十分落后的状态要求特别紧张的努力，把我们的一切财富真正地、及时地动员起来，正确地利用每一种资源，最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工业，还有运输、电气化和建筑长期落在人民的要求和需要后面，落在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制度的要求和需要后面；由于这种落后，全国经济周转好象被夹在一把钳子里。这种落后使得农产物商品部分的成交和出口降低。它使进口受到极为狭窄的限制，使生产价格和成本提高，使切尔文<sup>①</sup>不稳定，使生产力的发展迟缓和。它延迟了无产阶

---

<sup>①</sup> 二十年代的十卢布纸币。——编者注

級和农民群众一切物质条件的改善，造成了失业的惊人增长和生活条件的恶化。它破坏了工业同农业的联盟，削弱了我国自卫的能力。

工业发展速度不够快，轉过来又导致农业发展的迟緩。同时，沒有农业生产力的决定性的提高和商品生产的大量增加，工业化也是不可能的。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0—51頁。

我們經濟困难的总的、基本的原因可以簡單說明如下。

近年来工业发展得太慢，落后于整个国民經济的发展，結果城市缺乏商品去交換农产品。錯誤的政治路綫，尤其是錯誤的稅收政策使富农易于在自己手中集中粮食和其他儲备中的最大最好的一份。这种比例失調的現象是寄生分子滋长、投机倒把、資本主义阶层获取巨額利潤的經常的源泉。

同时，农业中資本主义成份也在小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迅速增长。因此，国营經济在原料、出口、粮食儲备方面对富农資本主义成份的依靠在增长。

富农依据自己日益加强的經濟障地和不断增多的儲备，和自己在城市中的資本主义补充力量結成联盟，破坏苏維埃政权的經濟計劃，对于出口以及基本投資和工业化的速度，即对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实际上提出了富农的界限。

出口不发展，生产資料进口不足，缺乏新資金来修建新工厂、扩建和改建旧工厂，城乡失业人数不断增加，都和这些基本現象有着直接的联系。

結果，在十周年的末尾，我們不仅取得若干經濟成就，如：国营工业产量不断增加，基本投資和新建設的增长，在合作社和国营商业絕對和相对增长的条件下乡商品交流的增多，中农物质生活

的改善；但是与此同时具有社会阶级性质的困难也无疑地增加了。

摘译自《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反提纲》(1927年11月)，载于《真理报》1927年11月17日第263号第4版。

为了了解斯大林目前政治困难的<sup>意义</sup>，有必要简单追溯一下使我们与斯大林派之间发生争论的那些分歧的实质。反对派曾指出：官僚低估了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可能性；他们以得过且过的经验主义方法执行经济工作；**必须扩大规模和加快速度**。反对派要求放弃一年计划而采用五年计划，断定如果有集中的领导，工业生产每年增长20%决不是办不到的。斯大林官僚集团当时指责反对派的主张是超工业化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他们向个体农民叩头，准备放弃土地国有化，为乌龟爬的工业发展速度辩解，嘲笑计划的原则，**这些就是斯大林派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八年的纲领**。现在所有的政治局委员无一例外地都以一个固定不变的问题来回答我们关于加快工业化速度的要求：我们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弄资金呢？政府机关在被迫害的“托洛茨基派”的压力下于一九二七年开始实行的五年计划的第一个草案，是建立在下降曲线的原则上的。生产的增长率曾被规定从9%降到4%。这一草案曾受到反对派的严厉批评。经党的第十五次大会批准的五年计划第二次修正案（这次大会曾指责反对派为工业的“浪漫主义”）所要求的平均增长率是9%。

仅仅下面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斯大林本人在现在的五年计划批准前一年对这个计划是多么不了解：当他在一九二七年的四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回答托洛茨基的时候——后者那时是德涅泊水电站建筑工程委员会的主席——曾宣布：“对我们来说从事德涅泊水电站建筑工程（德涅泊河上的巨大的电力站）的建设，等于替农民买一架留声机而不给他们买一头牛。”在中央委员

会的速記記錄中曾經注明这些話的的确确是斯大林的意見。他后來說反对派的提議“不成熟”，企图以此来为他反对工业化的斗争进行辯解，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那不是当时一項特殊任务的問题，而是工业和五年計劃的总的前景的問题。約在一年前的公开审判叛国工程师的事情表明：实际領導权是操在社会主义經濟的不可調和的敌人手中。斯大林在为他的計劃的“烏龟爬的速度”辯护的时候，对反对派使用了镇压的手段。

摘譯自《是斯大林还是苏維埃在削弱？》（1932年），載于《政治季刊》1932年7—9月第3卷第3期第312—314頁。

**反对超工业化的斗争，在一九二二年进行得非常謹慎，在一九二三年公开而激烈。反对不断革命的斗争，在一九二四年公开开始，在这之后的几年里，以各种形式和各种方式繼續进行。反对托洛茨基对不平等的指責的斗争在一九二五年年底前开始，而且在实质上成为官僚主义社会綱領的軸心。反对超工业化的斗争是公然直接地为富农的利益进行的。所以需要以蜗牛速度来发展工业，是为了让富农得到对抗社会主义的沒有痛苦的解药，这种哲学在当时是右翼的哲学，也是斯大林中派的哲学。官僚同城乡小资产阶级組成的集团在这个时期鼓吹在一国建設社会主义的理論。反对平等的斗争把官僚不但同农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而且同工人貴族空前牢固地結合在一起。不平等成为这些同盟者的共同的社会基础、根源和存在的原因。因此，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八年，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紐帶把官僚和小资产阶级連結在一起了。**

摘自《斯大林評传》（1940年），三联书店1963年版下冊第515頁。

在斯大林派机器和反对派进行論战的过程中，逐漸形成了一些新的概念，这些概念給发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人提供了思想上的工具，从而获得了决定性的意义。只要指出其中一些突出的

概念，對我們的目的是足夠了。各種政治力量集結在這些概念的周圍。這些概念有三個。它們有時部分地互相補充，部分地互相替代。

第一個概念同工業化有關。三巨頭<sup>①</sup>起初反對我提出的工業化計劃，為了進行論戰，他們把它叫做超工業化計劃。在三巨頭分裂，斯大林同布哈林和右翼組成集團後，這種態度更加強了。反對所謂的超工業化的官方論點的總的傾向是，迅速工業化只有犧牲農民才能辦得到。因此，我們必須以蝸牛的速度前進。工業化速度的問題實際上是沒有意義的，等等。事實上，官僚不想干擾居民中開始致富的階層，也就是新經濟政策小資產階級的上層。這是它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中所犯的第一個嚴重錯誤。但是它從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它僅僅在這個問題上整整翻了一個筋斗，然後輕鬆愉快地着手打破以前一切超工業化的紀錄——大部分是在紙面上和演說中，嗚呼！

同上，第 513—514 頁。

## 2. 一九二八年以後

聲稱斯大林派“在成就的影響下，開始魯莽地加快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的速度”。胡說什麼烏龜爬行速度被“冒險主義”所代替，兩者的“理論基礎”都是“民族社會主義觀念”。斷言如果採取過份快的速度，“那末城市與鄉村之間，工業各部門之間可能產生不平衡，因而造成可怕的危機”；而且工業投資太快“將會過分地減少分配給日常消費的部分，不能保證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必要提高”。

---

<sup>①</sup> 指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編者注

鼓吹“从冒险主义的障地上实行有计划的退却”。

我們必須在尽可能迅速的工业化和集体化速度的帮助下尽可能迅速地取得經濟的“独立性”！——这就是民族社会主义的經濟政策在过去两年中所发生的轉变。爬行的和小手小脚的做法被冒险主义代替了。而两种做法的理論基础都是一样的：民族社会主义观念。

摘譯自《〈不断革命〉美国版序言》(1930年3月29日)，  
載于《不断革命》伦敦1962年版第31頁。

苏联国内的发展已經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无论我們怎样来評价目前的集体化进程——它在一年当中已超过了預定在整整五年之内完成的計劃一倍半：原定到第五年年底有百分之二十的农户实现集体化，而結果現在已有百分之五十的农户实现了集体化——，显然集体化的速度早已突破了整个五年計劃。到目前为止，官方领导对这点一直保持沉默。但是，要长期保持沉默是不行的。认为这个計劃的所有其他部分——工业、运输、商业、财政——都能以預定的規模发展，而农业却实行完全沒有預料到的跃进，这就标志着經濟計劃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只是一些部令的簡單汇集。直到最近才承认、至少在原則上承认，工业和农业之間的关系(結合)构成这个計劃的主要軸心。那末，这个軸心又怎么样了呢？如果在这个計劃中考虑到了結合的話，那末，这种結合現在一定已被沒有人預見到的集体化的巨大跃进破坏了。这个計劃的路綫要按照什么方向来加以糾正呢？

目前“全盘集体化”已經在吓慌了的领导人中間引起了某种后退的运动。业已开始的退却要到什么地方才能停止呢？現在还不可能預言。可能这一次的退却又比客观条件所需要的走得更远。但是，退却本身是不可避免的。很可能由于通貨膨脹要开始修改



“五年計劃四年完成”这个口号。

退却，在軍事方面和政治上一样，总归是一种令人痛苦的行动。但是，进行得及时的和有秩序的退却，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損失和为将来展开攻势准备机会。致命的危險向来是当敌人已迫得迫近时在炮火下进行的、为时已晚的、惊惶失措狼狽不堪的那种退却。因此，我們左翼反对派不怕对正在盲目向前奔馳的官僚高呼：**后退！必須停止工业化的奖励竞赛，根据經驗和理論預見修改速度，使集体化同技术及其他資源协调起来，使对待富农的政策服从集体化的真正可能性。一句话，在尾巴主义和冒险主义时期以后必須走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的道路。**

在这个意义上經過修訂的計劃将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方案。它必須从由于巨大的成績以及同样巨大的錯誤而造成的当前形势出发。这样一个計劃不能消除由历史的过去和世界环境所造成的种种矛盾。但是，它必須使錯誤所产生的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部分地緩和及部分地推迟危机的爆发，从而使孤立的工人国家获得一个新的喘息时期。目前的任务是要从冒险主义的陣地上实行有計劃的退却。

摘譯自《世界失业問題和五年計劃》(1930年)，  
科伦坡 1952年英文版第1—2頁。

素来短視的經驗主义的斯大林官僚集团在成就的影响下，于一九二八年开始魯莽地加快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速度。这里两种角色对調了位置。左翼反对派提出警告說：如果采取未經以前經驗证明的过份快的速度，那末城市与乡村之間、工业各部門之間可能产生不平衡，因而造成可怕的危机。而且——这是反对派的主要論据——过份迅速地把資本投入工业将会过分地减少分配給日常消費的部分，不能保证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必要的提高。拉柯夫斯基虽然被流放在巴尔瑙尔，处在与全世界隔絕的状态，他还是

发出了警告,他說,即使要付出降低速度的代价仍然必須改善工人群众的物质状况。在这个問題上,斯大林官僚集团最后不得不听从反对派的意見。最近由最高国民經济委员会分出单一个独立的輕工业人民委員部。它的任务是照管居民的日常需要。在目前阶段这一改革还是具有純粹官僚主义性质的,但是它的目标很明白:在政府机构中創造某些保障,不要因为重工业而太多地牺牲群众的日常需要。在这个問題上,缺乏远見和創造力的斯大林派在今天不得不称赞他們在昨天詛咒的东西。

摘譯自《是斯大林还是苏維埃在削弱?》(1932年),載于《政治季刊》1932年7—9月第3卷第3期第312—314頁。

### 三、資金的来源

声称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的五年內,“每年从預算中投入工业化需要的純投資可以而且应当达到五亿至十亿”。这些資金的主要来源是:对私营企业家各种超額利潤征收不少于一亿五千万至两亿卢布(現在只有五千万)的稅款;从約占农戶总数10%的富农和富裕阶层的存粮中征借不少于一亿五千万至两亿普特的粮食;“压缩龐大的官僚机构”。“資金的补充源泉应当是正确地利用和世界經济的联系”。

污蔑联共中央想“加紧压榨工人的肌肉”,“靠实行更严格的劳动定額、减少工資的附加开支(免除企业对公用事业、托儿所、休养所等等开支)和减少社会保險費扣款的百分比来减低成本”,同时在各种借口下“保存資本主义阶层的积累”。

中央的提綱在五年計劃的这个重要問題上說了什么？提綱提出了什么样的基本投資的数字呢？提出了旨在消除商品荒的必要数量的工业投資数字了嗎？沒有。提綱只限于下列模糊指示：

“在把国民收入作有利于工业的再分配的同时，增加工业内部的积累就能实现足以保证生产的必要增长及其合理化的数额的工业基本投資。”

可見，中央对于社会主义建設的基本問題沒有作出任何切实的、具体的答复。但是在談“主导基础——工业”和巩固城乡結合的同时，却不善于指出防止商品荒增至十亿至十五亿卢布这龐大数字的具体办法，就等于使党盲目地走向巨大的經濟震蕩。

然而我們有国家計劃委员会对这个問題的回答。在国家計劃委员会預見到上述商品荒的增长的同一个五年計劃中，委员会肯定，可以而且应当只靠牺牲工人階級的利益来治疗这种病症。国家計劃委员会的五年計劃絲毫不指望夺取城市資產階級的收入，因为：

“第一，革命后新出現的耐普曼資產階級阶层在我国城市居民中很单薄，仅仅因此就不可能成为預算收入的源泉，第二，这并不是独立的源泉，因为，我們对資本主义成分的收入征税，反正只能从中征得由农民和工人劳动所創造的那部分。”（《国家計劃委员会的五年計劃》，第28頁）

总而言之，国家計劃委员会认为从資本家的收入中吸取工业化的資金是不行的、也是无望的，因为，第一，其数不多，第二，因为这些收入是由工人和农民的劳动所創造的！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低下和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收入少，“农村”（应讀作富农）也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积累的源泉。由此就得出一个自然的結論：

“一般只有生产力更高的非农业劳动（应讀作工人階級）才能

**是預算收入和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源泉。”**

国家計劃委员会的五年計劃並沒有得到正式的承认，但是在其中得到表現的“許多思想”却是很能說明現在的經濟領導的特点的。这个五年計劃是很清楚的。它为加紧压榨工人的肌肉来堵塞我們发展中的矛盾的**做法作辯护，同时在任何一种借口下保护资本主义阶层的积累。但是中央的提綱用什么来同这种政策对立呢？什么也沒有。它是否給予这些傾向以坚决的反击呢？沒有。它有沒有提出一个解决工业基本投資的根本問題的独立計劃？沒有。这样一来，提綱就助长了反无产阶级傾向在我国經濟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相互关系的基本問題上在实际上取得越来越多的胜利。**

摘譯自《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国民經济五年計劃的反提綱》(1927年11月)，載于《真理报》1927年11月17日第263号第3版。

减低成本、减低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是苏維埃政权可以而且应当执行的唯一的政策。但是中央的提綱又忘記了小事：我国經濟发展的矛盾，苏联的階級环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建設的利益和我国經濟中资本主义成分利益的冲突。

非常明显，**减低成本和价格的先决条件首先是更改工厂的装备和修建新工厂。可是中央的提綱却极力迴避下列問題：为此必須事先实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把其中的一大部分从资本主义成分手中轉入社会主义成分手中，从富农經濟手中轉入国营工业手中，把耐普曼的积累轉用于改善工人階級的物质状况，作为提高其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条件。关于这一点反对派早就一再申說，而我們这里却无可救药地拖延下来，借口說如果触动富农和富裕农民，中农是会为他們而見怪的。**

中央的提綱閉口不談这点，从而必然把解决这整个任务的重

担压在工人阶级肩上。

实际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五年计划新方案规定，在很大的程度上靠实行更严格的劳动定额、减少工资的附加开支（免除企业对公用事业、托儿所、休养所等的开支）和减少社会保险费扣款的百分比来降低成本。

不仅如此。中央的提纲不愿了解或至少是没有向党说明，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将不仅意味着扩大和农村的商品流转及缓和商品荒（这是必要和有益的），不仅意味着巩固和贫农及中农的结合并加强他们的经济（这是巨大的成就），而且也必然意味着给农村富农上层的积累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富农将能够用自己的储存换取大量的工业品，从而更为增加自己的积累，即加强压榨中农和贫农的工具，并提高自己的比重。如果中央的提纲清楚这一点，它就应当在提出降低成本和价格政策的同时，指出一系列防止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份利用这个正确的政策的后果的措施。

为了避免这种后果应当做些什么呢？

无可争辩的是，必须极力不断减低工业的成本，不断减低工业品价格，但农产品价格保持不变。但仅仅这样还不能解决比例失调的问题。必须同时在一所有一切五年计划方案中规定不断增加从殷实的、富裕的农户，尤其是从富农经济的积累中取出数以亿计的卢布用于工业化，同时压制私人工商业者和“压榨”官僚。否则，在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情况下发展工业的全部重担就会落到工人阶级肩上。可是，无论在哪一个五年计划方案中或是在中央的提纲中都甚至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除其他原因之外还由于农产品将和不断降低价格的工业品交换之故，富裕农户一年比一年增加的大量积累将向何处去。

九、从哪儿取得资金？

对于从哪儿取得资金以便采取更大胆、更革命的办法解决真

正工业化和更快地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任务，即社会主义专政的命运有賴于其解决的任务，反对派回答道：

**資金的基本源泉就是用正确地利用預算、信貸和价格的办法对国民收入实行再分配。資金的补充源泉应当是正确地利用和世界經濟的联系。**

一、最近五年內每年从預算中投入工业化需要的純投資可以而且应当达到五亿至十亿。

二、必須通过稅收系統：1、实际征收私营企业各种超額利潤的稅額不少于一亿五千万至两亿卢布，而不是象現在这样只有五千万；2、为了增加出口，从約占 10% 农戶的富裕阶层和富农阶层的实物儲存中征借不少于一亿五千万普特的粮食。在滿足城市需要的条件下，这些粮食就能为工业从国外換入額外的原料和装备。

三、执行不断减低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以及縮小批发和零售价格的“剪刀差”的坚决政策时，应首先减低工人和农民日常消費品的价格（但不应象現在这样使本来很低的质量更加下降），使物价的降低不减少国营工业的必要积累，而主要是靠增加商品的数量和降低成本、减少杂費、削減官僚机构等等来实现。

一种更适合市場条件、更灵活、更加分別对待，即考虑到市場上每一件商品状况的减低出厂价格的政策，可以使国营工业保存大量的資金，这些資金現在滋养着私人資本和一般商业寄生集团。

四、根据斯大林和李可夫去年所宣布的应当每年提供三亿至四亿卢布的節約制度，实际上取得的結果是微不足道的。節約制度是个階級政策的問題，只有在群众的直接压力下才能实现。为此工人們应当敢于施加压力。每年减少四亿卢布的非生产开支是完全可能的。

五、善于利用諸如对外貿易垄断制、外国的貸款、租让制、技术

援助合同等工具，能够提供一部分补充的资金，而主要的是能大大提高我们自己使用资金合理性，用新技术使其富有成效，加速我们发展的整个进程，并从而巩固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真正的社会主义独立。

六、关于自下而上挑选人材以及关于他们之间不正确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最次要的财政问题。挑选得越糟糕，越需要资金。官僚主义制度阻挠进行正确的挑选和建立正确的关系。

七、经济领导的尾巴主义意味着在实践上损失千百万元的卢布，作为无远见、不协调、舍本逐末、行动落后的罚金。例如，据某些统计，单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无远见和缺乏计划所引起的我们工业、商业及其他企业人员的流动不定，就使国家经济损失了约五亿卢布（《工商业报》1927年8月2日第173号）。

八、税款不足以满足国民经济日益增长的需要。信贷应当成为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越来越重要的杠杆，这首先要求巩固稳定的通货制度和健全货币流通。

九、缩小投机和高利贷活动范围的阶级性更坚定的经济政策，有利于国家机关和信贷机关更顺利地动员私人积累，并通过长期信贷的形式比现在更广泛地给工业以拨款。

十、削减目前消耗19%（战前只占8.5%）的国民收入的大量流通费用，加速国家资金的周转也是相当一部分资金的来源。

十一、国家专卖烧酒最初是作为试验，并且打算把卖酒的主要收入用于工业化事业，首先是用于发展冶金工业的。实际上，工业化事业由于国家专卖烧酒只是遭到了损失。应当承认这个试验是失败的。在苏维埃制度下国家专卖烧酒不仅和沙皇制度下一样对于私人经济是一个损失，而且主要地是对于国营经济是一个损失。旷工的增加、马马虎虎的工作、废品的增加、机器的损坏、不幸事故的加多、火灾、斗殴、残废等等的损失一年以几亿卢布计算。工业

由于烧酒而遭到的損失不比預算从烧酒中的所得小些，而要比工业本身从預算中得到的大好几倍。在最短期間(两三年內)停止国家专卖烧酒就会自然而然地增加工业化的物质和精神資源。

这就是对于从哪儿取得資金問題的回答。說工业化速度因缺乏資源而直接受到障礙是不对的。資金是菲薄的，但是有的。需要的是正确的政策。

\* \* \*

国家計劃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經济委员会的五年計劃应当坚决予以推翻和譴責，它們是和“变新經济政策的俄罗斯为社会主义的俄罗斯”的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必須改变各階級賦稅負擔的分配，加重富农和耐普曼的負擔，減輕工人和貧农的負擔。減低間接稅的比重。

保证貨幣单位的絕對穩定。切尔文的巩固一方面需要減低物价，另一方面需要一个沒有赤字的預算。不容許用发行紙币来弥补預算的赤字。

应当有一个有严格目标、沒有赤字、无伸縮余地的、不容許有追加的和意外的項目的預算。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預算应当大大增加对国防（主要是軍事工业）、对一般工业、对电气化、运输业、住宅建設和对农业集体化措施的撥款。

坚决反击破坏对外貿易垄断制的行为。采取在提高經济的技术力量和改善群众的物质状况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化、电气化和合理化的坚定方針。

#### 十、两条道路

国内有两种互相排斥的基本立場。一种是建設社会主义的无产階級立場，另一种是力图使发展回轉到資本主义軌道上去的資产階級立場。



資產階級以及跟着他們走的那些小資產階級階層的陣營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商品生產者的私有的主動精神和個人利益上。這個陣營指靠“人強馬壯的農民”，想使合作社、工業和對外貿易正是為它服務。這個陣營認為，社會主義工業不應當指望國家預算，其發展速度不應當破壞資本主義農場積累的利益。爭取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鬥爭在日益強大的小資產者看來就是壓榨工人的肌肉和神經。爭取減低價格的鬥爭對他來說就是為商業資本的利益而去削減社會主義工業的積累。反官僚主義的鬥爭在小資產者看來就是分散工業，削弱計劃基礎，把重工業推到次要地位，就是說，還是去遷就強壯的農民，並在最近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這是烏斯特里亞洛夫主義的道路。國內這股強大的潮流對我們黨的某些集團也有影響。

這些集團的綱領在今天看來會是什麼樣的呢？可以大胆無誤地說，這個綱領大致包括下列幾點：

第一、削減已經規定的基本投資的最低計劃；

第二、把這些已經削減的費用，在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品生產之間作有利於後者的再分配；

第三、從國外進口制成品；

第四、在信貸上壓制工業；

第五、削減國家預算對工業的撥款。

同上。

反對派要求通過在稅收上更堅決一貫地壓制富農和私人工商業者的辦法，通過壓縮龐大的官僚機構的辦法，更迅速地發展工業。中央的多數指責反對派犯了“超工業化主義”和在富農面前“驚慌失措”。多數派隨波逐流，指望僥倖成功。目前的困難是黨為尾巴主義的領導政策所付出的代價。

今年年初，农村中、主要是富农和富裕农民手中积存的粮食实物儲存达八亿至九亿普特。这些超过了必要防灾儲备量的儲存还在繼續迅速增长，到本农业年度末还要增加二亿至三亿普特，从而突破十亿。这个事实是同农村的商品流轉閉塞的可怕的明证，結果必然是播种面积停止增加。我們在这里遇到工业不够发展的后果，它无法提供換取农村这些儲存的資金。工业的緩慢发展阻碍了农业的发展。

和农村中实物儲存的积累密切相关的是我們出口不足以及富农和富裕农民阶层破坏我們进出口計劃的問題。加米涅夫同志在一九二五年秋季完全正确地解释粮食出口計劃沒有完成的原因，說这是因为富农掌握了粮食儲存，从而破坏了这个計劃。当时对他群起而攻之，并专门編制了統計表予以“駁斥”。可是現在农村中我們采购工作人員无法弄到的大量实物儲存，已經把加米涅夫同志的說法变为每个經濟工作人員都知道的常識。尤有甚者，接任他的职位的米高揚同志不得不去应付今年最初的粮食出口計劃所遭到的破坏，应付本来就大为削減了的进口計劃遭到破坏的前景。这第二次“失算”更不可以原諒，因为这是在第一次“失算”之后两年，即在农村分化的后果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条件发生的。米高揚同志在《真理报》第二五二号上的文章中非常正确地指出，“我国对外貿易額是确定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限度(界限)”。而这些限度倒底是誰規定的？对外貿易額一部分是由我国工业出口数字（占一九二五——二六年度の35.8%）确定的，而主要是由农业出口量（占一九二五——二六年度全部出口的64.2%）确定的。而由于我們首先是从农村富裕阶层取得供出口的多余的粮食和原料，由于正是这些阶层囤存的粮食最多，結果通过出口“調节”我們的首先倒是富农和富裕农民。我們正确地认为对外貿易是国营經濟最重要的命脉之一。我国农村資本主义发展的結果使这个經濟

命脉的某些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部分(其所以是重要的部分,因为我們主要是农业国)轉入我們的階級敌人手中。这里在党和工人階級面前充分呈現出中央从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起在“向左开火”的口号下所执行的那个政策的最危险的后果之一。現在每个普通工人都了解这个致命的后果了。这个后果就是:在有着十亿普特的粮食实物儲存的情况下削減出口量,在进口最必需的原料,包括生产日用必需品的紡織工业部門、羊毛加工工业部門、制革工业部門所必需的原料方面发生困难,在进口最必需的机器装备方面发生困难,在清算国外債務方面发生困难,城乡商品荒的加剧。

中央近两年来經濟政策的客观意义在于:在这个政策的庇护下,資本主义成分的障地(首先是在农业中)大为加强,資本主义成分現在对苏維埃政权的經濟計劃公然施加压力,破坏这些計劃。現在連瞎子也看得見这一点了(見上面所引米高揚同志的說法以及在他同一篇文章中其他的地方)。

但是只有仍然想繼續做瞎子的人才会看不見上述困难和对外貿易壟断制問題直接有关。

这种局面不可能长久拖下去,摆脱这种局面的出路只有两条。

**第一条出路就是反对派提出的向农村10%的富农和富裕农戶征借一亿五千万至两亿普特的粮食。**在滿足城市需要的条件下把这些粮食出口,用換得的外汇购买額外的原料和工业装备,从而在国内准备大量的补充商品以減少农村的商品荒和城市粮食方面的混乱。

誰拒絕走这条道路,他就只好放弃对外貿易壟断制,吸引外国資本到进出口方面来,为农村輸入外国商品并輸出积存的粮食。中央現在的多数在一切尖銳問題上慣于实行原地踏步的政策,自然不能及时地选定左的或右的道路来解决问题。但是犹豫不决本身就会导致匆忙地、惊慌失措作出决定并必然走上右傾政策的道路

上去。

反对派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仿佛中央委员会决定废除对外贸易垄断制，承认全部旧债等等。废除或者“缓和”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思想从来没有在会议上也没有在报刊上正式宣布过。但是在各主管部门的办公厅里面，在生意人、包括共产党生意人的狭小圈子里，越来越坦率地承认在“缓和”的意义上“改革”对外贸易制度是增加农业出口和发展全国生产力（当然是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而不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必要条件。中央委员会政策的总的方向及其客观后果比任何口头上的保证都更有力一些。反对派现在警告党制止在对外贸易问题上的正在向右转的曲折路线。

同上。

城市中两千万失业工人和农村中十亿普特未动用的粮食储存，这就是我国经济所面临的那些矛盾的最鲜明、最触目的图景，而这些矛盾在很大的程度上又是由于现在领导的错误所积下来的。

在国家经济中失业是什么？

这首先是国家缺乏新的生产资金，缺乏新的资本。

而十亿普特未经动用的粮食储存又是什么？

这是主要落在富农阶层和富裕阶层手中的苏维埃社会的死资本。从扣除保险储备以后剩下的五亿普特中拿出一亿五千万普特的粮食来，就会使我们获得几亿卢布的新的生产资金（按国内价格计算）。这一大笔新的资金就会使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获得就业的机会，把几亿额外商品投入市场并给予整个经济发展以有力的推动。反对派一分钟也不犹豫地愿意担负执行这个计划的责任，把它当作自己的摆脱危机的总纲领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则在束手无策地踏步，并且只能原地踏步，坚持自己的错

誤，从而使本來就很困難的狀況更加尖銳。把束手無策的原地踏步冒充為高度的“謹慎”的那種政策是毫不中用的！

\*                     \*                     \*

反對派在自己的政綱中從這樣一個簡單的思想出發：為了使社會主義建設獲得成就，必須使工人階級在事實上，根據逐年逐月的切身經驗感覺和意識到自己物質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自己在一切建設和創造部門中的作用的不斷增長。這就是為什麼**反對派反對通過壓榨工人的辦法來實行節約制度或實行合理化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麼**反對派要求更堅決地提高工人的工資和採取其他一系列措施，作為提高生產力的必要前提的原因**。

同上。

## 四、工業化和蘇聯經濟 對世界經濟的依賴

宣傳世界經濟“監督着自己的每一個部分，即使這個部分處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並建設着社會主義”。斷言國家工業化“意味着增加我們對世界市場、對資本主義、對它的技術和經濟的依賴”。揚言如果“要在最近時間內憑自己的雙手製造出全部機器或至少是最重要的機器”，“企圖忽視世界經濟中的分工”，“就必然會大大減低我們經濟發展的速度”。聲稱不能忽視“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合作’”。必須全面加速俄國經濟的工業化和加強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來發展俄國同世界經濟的聯繫；有計劃地利用世界資本主義的技術成就，來刺激俄國的工業。

社会主义的前提是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这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杠杆。希望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点。我們自問，我国工厂的技术装备如何？根据这一問題的专家瓦尔查尔的統計，战前我国工业的装备有63%是进口的机器。只有三分之一的装备是国产貨，而且这三分之一都是极简单的机器，因为比較复杂的和最重要的机器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因此，如果你們察看一下我国工厂的技术装备，你們就会亲眼看見俄国以及苏联在物质上对世界經濟的依賴。誰要是不注意問題的这方面，誰要是議論這個問題而把它的經濟技术基础和世界經濟政治关系撇开不談，他就必然会成为赤裸裸的抽象概念和断章取义的引文的俘虏。

近十年来，我們几乎沒有更換我国工业的固定資本。在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我們根本沒有从国外輸入机器。显然，这种情况就使得某些人认为我国工业的技术装备属于我国的天然財富，仿佛今后可以在这种“自然的”基础上孤立地繼續建設社会主义，直至完全建成。但这是幻想。我們現在处在所謂恢复时期的終点。我們接近了战前水平。但是恢复时期的終点同时也是恢复我們和世界經濟的物质联系的始点。我們應該更新現在經歷着危机的固定資本。誰要是以为今后几年我們就能够自己制造全部或大部分装备，他就是一個幻想家。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重要任务提出的国家工业化，意味着在最近时期和相当长的时期中不是减少，反而是增加我們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从而也意味着增加我們对世界市場、对資本主义、对它的技术和經濟的依賴（当然是互相的依賴），并意味着加强向世界資產階級作斗争。这就是說，不能把我国建設社会主义的問題和这一时期資本主义經濟变化的問題割裂开来。这两个問題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如果有人對我們說：“可是，亲爱的朋友們，你們自己可以制造机器”，那我就要回答：“当然，如果整个資本主义世界今天就垮台，

那我們在一、二十年後就能製造出比今天多得多的機器。”如果我們想離開實在的資本主義世界而“隱居”，如果我們提出任務要就在最近時間內憑自己的雙手製造出全部機器或至少是最重要的機器，就是說，如果我們企圖忽視世界經濟中的分工，並跳過造成我國現有工業這種狀況的先前的經濟歷史，總之，如果我們走上前面提到的“社會主義的”門羅主義而一切靠自己的雙手製造的話，這就必然會大大減低我們經濟發展的速度。因為極其自然，拒絕利用世界市場來彌補我國裝備的漏洞，就會使我們自身的发展慢得驚人。而发展的速度是一个决定因素，因為地球上到底不止我們這些人，孤立的社會主義國家暫時還只存在於新聞記者和決議起草人的幻想之中。實際上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總是（直接或間接地）受着世界市場的相對監督。這是問題的根本所在。發展速度不能任意規定。這是由整個世界發展給我們規定的，因為世界經濟處於最高一級的地位監督着自己的每一個部分，即使這個部分處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並建設着社會主義。

為了使我國工業化，我們需要輸入機器。而農民需要輸出糧食及其他產品。如果我們不輸出，我們就不能輸入。另一方面，國內市場不能吞納全部農產品。因此，無論農民的需要或工業的需要都把我們重新納入世界經濟，我們和世界經濟的聯繫，也就是說鬥爭將與時俱增。我們越來越走出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孤立地位，而納入世界經濟聯繫和相互依從的體系中。而誰如果談論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而忽視我國經濟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合作”和鬥爭的事實，他就是在搞赤裸裸的形而上學。

.....

這樣說來這裡的全部問題在於我們能不能戰勝本國資產階級，仿佛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解決就在於此。其實不然！建成社會主義的前提是消滅階級，按社會主義方式組織全部生產和消費以

取代階級社會。問題在於克服城鄉之間的矛盾，這又要求農業本身的高度工業化。而這一切都要在資本主義依然包圍的環境下進行。不能把這個問題和僅僅對國內資產階級的勝利等同起來。

.....

.....此外，能不能設想，在歐洲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前，我們就能僅僅依靠國內的經濟與文化資源，使無產階級和農民溶和在統一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之中？上面說過，為此我們就必須大力提高技術，這首先要增加糧食的出口和機器的進口。機器在世界資產階級手中，它又是我國糧食和原料的買主。世界資產階級暫時還操縱着世界價格，因此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就得依賴它並同它作鬥爭。為了消除這種依賴，戰勝本國資產階級是決不夠的，因為這裡問題不是在政治上鎮壓資產階級，政治上我們早在一九一七年就在我國把它推翻了，問題是在資本主義包圍下，即在向世界資產階級作鬥爭（經濟、政治和軍事的鬥爭）中建成孤立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只有使這個孤立並且暫時還是非常落後的國家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更為強大才行。因為，完全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需的不是一年，不是十年，甚至也不是二十年，而是好幾十年，所以只有使我國生產力超過資本主義生產力才能達到這一點。所以問題不是民族的無產階級反對民族的資產階級，而是孤立的社會主義社會向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作殊死的鬥爭。問題只應該這樣提。

摘譯自《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上的發言》（1926年12月），載于《真理報》1926年12月14日第289號第2—3版。

在兩個不可調和的敵對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未來長期的鬥爭中，最終說來，勝負決定於兩個制度間



劳动生产率的对比。而这在市場条件下，可以用我国国内价格同世界价格的对比来衡量。列宁在他最后的一些讲话中有一次曾警告党說：即将到来的“考試”“是俄国和国际市場举行的‘考試’，我們依靠这个市場，同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sup>①</sup>当时他心中考虑到的就是这个根本事实。因此，布哈林关于我們可以用任何速度，甚至“龟行”的速度走到社会主义的观点，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廢話。

**我們不能在閉关自守的經濟的掩护下躲开資本主义包围。正因为閉关自守，这样一种經濟就将不得不以极端緩慢的速度前进，于是就必将遇到不是削弱了的而是大为加强了的压力，这压力不仅来自資本主义的軍隊和舰队（“干涉”），而且首先来自資本主义的低廉商品。**

当資本主义国家拥有較高的技术时，对外貿易垄断制是社会主义存在下去的必要武器。但是，目前处在建設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經濟，只有在技术、生产成本、产品质量和价格問題上逐渐接近世界經濟水平，才能保持这种垄断。經濟领导方面的目标不应该是閉关自守、自給自足的經濟，这种經濟必然以降低发展水平和速度为代价，正相反，它的目标应该用最大限度加快速度的方法，达到我們在世界体系中的比重的全面增长。

为此：（一）必須了解我們出口的重大意义，目前，出口落后于我国工业的总发展，已經到了危险的地步。（苏联在世界商业貿易量中所占的比例，已經从一九一三年的4.22%减少到一九二六年的0.97%。）（二）尤其必須改变我們对富农的政策，这项政策使富农可以囤积原料牟取暴利而破坏我們社会主义的出口。（三）必須全面加速我国經濟的工业化和加强我国經濟的社会主义成分（而不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43頁。——編者注

是資本主义成分)，来发展我們同世界經濟的联系；在最近将来不應該分散我們有限的积累，而應該通过深思熟虑的計劃把它逐步投入一种新的生产，这种生产首先要保证大量生产最必需和最有用的机器，我們應該有計劃地利用世界資本主义的技术成就，周密而灵活地用这些成就来补充和刺激我們自己的工业。

把我們的希望寄托在孤立发展社会主义上面，寄托在一种脱离世界經濟的速度上面，这样就破坏了我們的整个前途。这样就使得計劃领导机关离开了正軌，并且提供不出正确的方針以調整我們同世界經濟間的关系。我們沒有办法决定什么应由自己生产，什么应从国外輸入。坚决抛弃孤立建設社会主义經濟的理論，这意味着在很少几年的过程內我們的資源将得到无比迅速的利用，更快地工业化，我們自己的机器生产将更加有計劃和有力地增长。这意味着就业工人数量更快地增加和物价的真正降低——一句話，处在資本主义包围中的苏联得到了真正的加强。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4—56頁。

还有另一問題，即最主要的問題，在斯大林与坎伯尔的对話中明确地被發揮了，这就是一国社会主义的問題，不顾一切半生不熟的預言，五年計劃並沒有增加苏联的經濟“独立”。恰恰相反，工业化的进展扩大了与加深了苏联經濟对世界經濟之依賴，也就是它們中間的相互依賴。

摘自《用一双手》(1932年)，載于《俄国革命  
与五年計劃》新生命书局1933年版第158頁。

## 五、国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

胡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不是

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厂轉到国家手中，只是从法律上改变了工人的地位”，工人对工厂的管理根本不发生影响，官僚是“他的經理”，国家是“他的雇主”，談不上什么“自由劳动”。声称只有“社会特权和社会分化消失以及国家的必要性从而消失”以后，国有制才会成为全民所有制。

由于各个托拉斯和工厂之間的竞争，由于劳动群众所处的沉重的物质地位，由于劳苦人民中占重要地位的阶层的文化水平不够，我国国营工业是极为分散的。国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工业的社会性质，在决定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作用，取决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觉自愿的内部团结，取决于行政管理人員、工会干部、車間核心成员等等有意识地服从纪律，并且通过这一切来加以保证。如果我们承认这个系统正在削弱、崩溃和瓦解，那末任何人都可以不言而喻，国营工业、运输业等等的社会主义性质很快就会蕩然无存了。托拉斯和各个工厂就会开始自行其是。目前已经如此薄弱的有计划的开端就会連影子也找不到了。工人的经济斗争将会达到除力量对比以外就毫无约束的程度。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将开始变成法律上的一紙空文，以后連这种法律上的存在也会被一扫而光。由此可知，在这里，問題也归结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須有意识地保持团结，必須保护无产阶级先锋队，使它不受官僚主义的侵蚀和烏斯特里亚洛夫主义的毒害。

摘譯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 1936 年版第 300 頁。

新宪法——我們在下面将要看到，它完全是建立在把官僚与国家等同起来，把国家与人民等同起来的基础之上的——写道：“国有制即全体人民的财产”。这种等同是官方学說的詭辯基础。

一点不错，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本人开始，在说到工人国家时，曾经把国家所有制，民族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几个名词，当作简单的同义语使用。在广泛的历史范围上，这种说法不致引起什么特别的麻烦。不过，当它被应用到一个新社会（而且是一个孤立的在经济上落在资本主义国家后面的社会）的最初的还没有得到保证的发展阶段时，它就变成巨大错误和公然欺骗的源泉了。

私有制要变成社会所有制，不可避免地要经过国有的阶段，正象幼虫要变成蝴蝶，必须经过蛹的阶段一样。但是蛹并不是蝴蝶。无数的蛹根本没有变成蝴蝶就死了。国家所有制成为“全体人民”所有制的程度取决于社会特权和社会分化消失以及国家的必要性从而消失的程度。换句话说：国家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程度是同它不再是国家所有制的程度成比例的。反过来说也是正确的：苏维埃国家越是高踞在人民之上，它越是激烈地把自己当作财产的保护人而和作为财产浪费者的人民相对立，它越是明显地证明这种国家所有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摘译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伦敦1937年版第224—225页。

如果我们用市场上的语言来说明社会主义关系的话，那末，我们可以把公民当作拥有国家财产的一家公司的一名股东。如果说财产是属于全体人民的，那就应当假定“股票”是平均分配的，因而所有的“股东”都有权分得一样的红利。然而，公民参加国家企业，不仅是作为“股东”，而且还要作为生产者。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就是在我们已经同意称为社会主义的阶段，劳动的报酬还是按照资产阶级标准来支付的——即按照技术和劳动强度等等来支付的。因此，从理论上说，每个公民的收入应当包括甲和乙两个部分——也就是红利和工资两个部分。技术越高，工业的组织越完善，甲所占的地位就比乙越大，而个人劳动的差别对生产水平的影

响就越小。苏联工资的差别不是比资本主义国家小些，而是还要大些；从这个事实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苏维埃公民所持有的股票并不是平均分配的，而在他们的收入中，红利和工资也不是一样的。不熟练的工人只能得到乙，这是在类似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也就可以得到的最低收入；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或者官僚则可以得到 2 甲 + 乙，或者 3 甲 + 乙，等等，而这里的乙还可以变成 2 乙、3 乙，等等。换句话说，收入的差别不仅决定于个人生产率的不同，而且还决定于隐蔽地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多少。拥有特权的少数股东是靠牺牲被剥夺了权利的多数股东的利益生活的。

如果你认为苏联的不熟练工人可以比在类似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下的资本主义企业收入多些——这就是说，他还是一个小股东——那末，必须认为他的工资等于甲 + 乙。工种较高的工资将表现为这样的公式：3 甲 + 2 乙，10 甲 + 15 乙，等等。这种情况意味着，不熟练工人只有一股，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有三股，专家则有十股。不仅如此，他们的真正工资的比例是 1:2:15。在这种情况下，对神圣的社会主义财产的赞美，在经理或者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看来是很有说服力的，在普通工人或者集体农庄庄员看来则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地方。然而，普通工人占社会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所关心的正是这些工人，而不是那些新贵族。

“我国的工人不是工资奴隶，不是称之为劳动力的商品的出售者。他是一个自由的工人。”（《真理报》）在目前这个时期，这个漂亮的公式还不容许加以夸大。工厂转到国家手中，只是从法律上改变了工人的地位。实际上，他还不得不在匮乏中生活，不得不为一定的工资干一定时间的活。工人从前对党和工会所抱的那些希望，在革命以后转而寄托在自己所创造的国家身上了。但是，这种工具的有用职能却受到技术和文化水平的限制。为了提高这种水平，新的国家使用老一套办法来压制工人的筋肉和神经。一批鞭

策奴隶的人已經成长起来。工业的管理工作变成超官僚主义式的了。工人对工厂的管理已經完全不能发生影响,在实行計件工資、物质生活条件艰苦、不能自由行动以及恐怖的警察压制深入到每个工厂的生活当中的情况下,的确很难让工人感到自己是一个“自由的工人”。他只能从官僚中看到他的經理,从国家方面看到他的履主。自由劳动同官僚国家是不能并存的。

同上,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175—177 頁。

## (九) 农业集体化問題

### 一、胡說农业集体化取决于 工业提供机器的能力

断言农业集体化的真正可能性主要决定于“工业供給大規模农业以必需机器的能力”。声称企图“在农民的土地的基础上”、“在資本主义以前的农具的基础上”实行全盘集体化，“是孕育着农业生产危机和危險政治后果的一种冒险”。它“有使无产階級和农民合作的可能性遭到破坏的危險”。宣传集体化和技术状态之間的这种“比例失調”是由“苏联經濟所处的孤立地位”、不能利用“国际关系中的資本主义‘正常’貸款”造成的。

在农民問題上，斯大林-布哈林集团正在修正列宁，他們修正的主要方面可以概括为以下八点：

(1) 放弃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則，即：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帮助农民沿着集体化道路改造农业。

(2) 对于雇农和貧农是无产階級专政在农村地区的社会基础这个問題，估計不足。

(3) 把我們农业經濟的希望寄托在所謂“力量强的”农民身上——这在实质上即是富农。

(4) 忽視或公然否认农民所有制和农民經濟的小資产階級性

质。这是离开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轉向社会革命党人的学說。

(5) 低估資本主义成分目前在农村中的发展，并且掩飾农民中正在发生的阶级分化。

(6) 創造了一种起瓦解作用的学說，大意是：“富农和富农組織是沒有任何希望的，因为我国发展的总框框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結構决定的”<sup>①</sup>。

(7) 鼓励“富农合作社的核心长入我們的制度里来”<sup>②</sup>。“这个问题可以表述为，必須让富裕农民和富农发挥他們的經濟潜力”<sup>③</sup>。

(8) 企图把列宁的“合作社計劃”同他的电气化計劃对立起来。按照列宁自己的意見，只有把这两个計劃結合起来才能保证过渡到社会主义。

新资产阶级的代表利用官方集团这些修正主义的傾向，已經同我們国家机关的某些环节勾結起来，他們正公然企图把我們在农村中的全部政策轉到資本主义的軌道上去。并且，附带說一下，富农和富农思想的辯护人把他們的野心用关心生产力的发展、关心“一般的”商品产量的增长等等托詞掩盖起来。事实上，富农的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农的商品生产的增长正在压制和阻碍着所有其他农民經濟生产力的发展。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3—44頁。

**在农民的土地的基础上实行的全盘集体化，是孕育着农业生产危机和危險政治后果的一种冒險。但是假使現在有可能大量采用先进技术使集体农庄立即繁荣起来，那么，集体化了的农业就可**

① 布哈林：《到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工农联盟》，第49頁。——托洛茨基注

② 同上，第49頁。——托洛茨基注

③ 《真理报》，1925年4月24日。——托洛茨基注



以非常容易地度过婴儿病时期，而且几乎在最近短短几年内就能获得很好的收成，有这样多粮食用于出口以致可以大大改变欧洲粮食市场的景况，然后把工人群众的消费置于一个新的基础上。集体化倾向和技术状态之间的有威胁性的比例失调，是直接由苏联经济所处的孤立地位产生的。如果苏联政府能够哪怕是仅仅利用国际关系中的资本主义“正常”贷款，那末作为集体化的支柱的工业化的速度甚至现在就可以大大增长。

摘译自《世界失业问题和五年计划》(1930)，  
科伦坡 1952 年英文版第 5 页。

苏联最剧烈的震动是由下列事实造成的，即目前的领导设法把迫不得已的事装成心甘情愿的样子，他们从工人国家的政治孤立中制定出一个经济上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纲领。这就导致试图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农具的基础上把农民土地全盘社会主义集体化——一种最危险的冒险，这种冒险有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合作的可能性遭到破坏的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种情况变得极其尖锐的时候，布哈林这位昨天的“乌龟速度”理论家已经为今天“疯狂的奔驰”的工业化和集体化创作了一首动人的赞美歌。令人担心的是，这首赞美歌不久恐怕也会被宣布为最大的异端。因为在空中已经出现了新的曲调。在经济现实抵制的影响下，斯大林不得不退却。现在危险的是，昨天的那种由惊慌情绪所产生的冒险主义攻势可能变成一次惊慌失措的退却。这种阶段的变来变去就是民族社会主义的性质无情地带来的结果。

摘译自《〈不断革命〉美国版序言》(1930 年 3 月 29 日)，  
载于《不断革命》伦敦 1962 年版第 31—32 页。

现在，谁也不会愚蠢到再去重复自由主义分子的谰言，说什么集体化整个说来是在赤裸裸的武力下实现的。在以前的几个历史

时期，农民在争取土地的斗争中，有一个时期举行了反对地主的起义，另一个时期向未开垦的地区输送了大批移民，还有一个时期则纷纷奔向形形色色的派别，这些派别答应用天上的乐园来补偿农民在地球上的那一小块土地。现在，在没收大庄园和彻底分配土地以后，要把小块土地再联合成大片土地，成了农民、农业以及整个社会的生死存亡问题。

然而，只是这种一般的历史性考虑，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集体化的真正可能性，并不决定于农村陷入困境的深度，也不决定于政府的管理能力，而主要决定于现有的生产资源——也就是工业供给大规模农业以必需机器的能力。这种物质条件是缺少的。集体农庄建立时所拥有的装备，主要只适用于小规模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冒过其实的迅速集体化便具有了一种经济冒险的性质。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8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5页。

## 二、污蔑全盘集体化使苏联 充满了毁灭的气息

攻击集体化所使用的是“一套盲目的、粗暴的和冒险性的方法”。反富农的斗争采取了“震动的、掠夺的和野蛮的方式”，是“踩在劳动者背上”进行的，有着“极其令人震惊的血腥性质”。“集体化的迅速实行乃是绝望的一种标志”。

污蔑集体化对农民来说是“没收他的所有财物的一种形式”，不仅把马、牛、羊、猪集体化，“而且把新生的小鸡也集体化了”。

说由于集体化，粮食产量由一九三〇年的八亿三千

五百万担降至一九三二年的七亿担以下，糖由一亿零九百万普特降至四千八百万普特；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四年間，馬减少 55%，牛 40%，猪 55%，羊 66%；人的死亡达数百万。其結果是使集体农庄庄員“对于社会化的财产以及自己的劳动成果根本漠不关心”。

由于事先沒有料到自己的政策进行了这样急剧的轉变，因此政府在新方針方面沒有、也不可能进行甚至基本的政治准备。不仅农民群众，就連地方政权机关也不知道要向他們提出什么要求。农民听到謠言，国家要攫夺他們的牲畜和财产，他們非常憤慨。而这种謠言同事实的距离并不远。实际上，官僚实现了他們以前諷刺左翼反对派的那句话：“掠夺农村”。对农民來說，集体化似乎基本上就是沒收他的所有財物的一种形式。官僚机构不仅把馬、牛、羊、猪集体化，而且把新出生的小鸡也集体化了。正象一个外国观察家所說的，官僚“把毡靴非富农化了，而这些毡靴都是从小孩子的脚上脫下来的”。結果，农民象患了流行病一样，紛紛廉价出售牲畜，或者为了得到肉和皮而把牲畜宰掉。

一九三〇年一月，在一次莫斯科代表大会上，有一个中央委員安德烈耶夫描繪了一幅集体化的两面图景：一面是，他断言正在整个农村强有力地发展着的合作化运动，“現在将摧毁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另一面是，农民在加入合作社以前爭先恐后地出售自己的工具、牲畜甚至种子，这种情况“所占的比例肯定日益具有威胁性”。不管这两种概括多么矛盾，二者对比之下却正确地表明，集体化的迅速实行乃是絕望的一种标志。上面提到的那位外国評論家写道，“全盘集体化使国民經济陷入一种几乎史无前例的毁灭境地，就象进行了三年战争一样。”

两千五百万单干农民的利己主义，昨天还是农业——虽然象

农民使用的老馬一样，但还有些力量——的唯一推动力，現在官僚却在缺乏技术設備、农学知識和农民本身的支持的情况下，設法一劳永逸地由两千个集体农庄管理处加以控制。这种冒险做法的悲惨后果，不久就产生了，并且一直延續了若干年。粮食的总收获量，一九三〇年曾經增长到八亿三千五百万担，在以后的两年中下降到七亿担以下。减少的数量从本身来看似乎并不是灾难性的，但它意味着，正好丧失了城市所需要的那一部分粮食，如果让城市即使保持那种长期的饥饿定量的話。在技术作物方面，后果还要糟。在集体化前夕，糖的产量曾經达到差不多一亿零九百万普特，到全盘集体化的高潮时期，由于缺少糖萝卜，产量下降到四千八百万普特——也就是說，减少了一半。但是遭到破坏力最大的颶风的是动物的王国。馬匹的数目减少了55%，即从一九二九年的三千四百六十万匹下降到一九三四年的一千五百六十万匹。牛的数目从三千零七十万只下降到一千九百五十万只，即减少了40%。猪的数目减少了55%；羊减少了66%。人由于饥饿、寒冻、流行病以及鎮压措施而死去的数目，不幸，沒有象牲畜屠宰数統計得那么精确，不过也达几百万。造成这些牺牲的責任，并不在于集体化，而在于集体化时所使用的那一套盲目的、粗暴的和冒险性的方法。官僚机构一点預見性也沒有。甚至企图把农民的个人利益同农庄的福利結合起来的集体农庄章程，到悲惨的农村遭到这样无情的破坏以后才公布出来。

这种新方針之所以具有强制性，是由于必須設法在一定的程度上摆脱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政策所带来的結果。但是即使如此，集体化本来也还是能够、也应当拥有一种比較合理的速度和比較慎重的形式。官僚既掌握着政权，也掌握着工业，本来可以把发展过程规划得不致把国家引向灾难的边緣。它本来可以、而且也应当采取比較符合农村的物质和精神資源的速度。“左翼反对派”

的流亡机关报在一九三〇年写道，“在有利的国内外环境下，农业的物质-技术条件在大約十年或十五年的时期内，可以得到彻底的改造并为集体化提供生产基础。但是在这个时期内，将会有不止一次的机会推翻苏维埃政权。”

这个警告并没有夸大其词。在全盘集体化的年代里，十月革命的领土上从来没有这样直接地充满了毁灭的气息。不满、不信任、苦难，逐步侵蚀着全国。通货的混乱，稳定的“传统的”自由市场价格的高涨，国家和农民之间从贸易关系过渡到粮食、肉类和牛奶征税，同大规模掠夺集体农庄财产以及大规模隐蔽这种掠夺行为进行的殊死斗争，为了反对富农的破坏行为（在“消灭”富农阶级后）党所进行的纯粹军事性的动员，以及随之而来的恢复粮食卡片和饥饿口粮，最后还有恢复护照制度——所有这些措施使整个国家重新充满了那种表面上早已结束的国内战争气氛。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8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5—27页。

在农民政策还是针对着富裕农民的时期，据说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开始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将通过合作社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完成。合作社由于一个接一个地拥有了购买、销售和信贷的职能，最后一定也会使生产本身社会化。所有这些合起来，就叫做“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实际情况是沿着完全不同并且几乎相反的道路发展的，即用暴力来非富农化和全盘集体化。单个经济职能的逐步社会化，以及为此而在物质和文化条件方面进行准备，这些事都闭口不说了。集体化实行以后，好像共产主义制度在农业中也同时实现了。

这种做法带来的直接后果，不仅是一半以上的牲畜被消灭，而且更重要的是，集体农庄的成员对于社会化的财产以及自己的劳动成果根本漠不关心。政府被迫作了一次仓促的撤退。它又一次

提供給农民小鸡、猪、羊和乳牛，作为个人的财产。它把农场附近的土地分給农民，作为私人的土地。集体化的影片开始倒过来放映。

同上，第 52 頁。

**土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綱領**应该从根本上排除沒收小农的土地和强迫实行集体化的可能性。只要小农认为可能或者有必要，就仍然让他们作那一小块土地的主人。为了恢复社会主义綱領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必須无情地揭发斯大林主义的集体化方法，这种方法不是根据农民或者工人的利益，而是根据官僚的利益决定的。

摘譯自《資本主义的垂死掙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1938年 9 月 3 日)，紐約 1946 年版第 26—27 頁。

在苏維埃民主的条件下，即劳动者自己統治的条件下，**反对富农的斗争**本来不应采取那样震动的、惊扰的和野蛮的方式，本来可以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导致群众的經濟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但，**官僚反对富农的斗争**，是踩在劳动者背上进行的一对一的决斗。因为角斗的双方沒有一方相信群众，因为它们都怕群众，所以斗争有着极其令人震惊的血腥性质。由于无产阶级的支持，斗争才以官僚的胜利而告終。

摘自《斯大林評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 年版下册第 529 頁。

### 三、断言集体农庄不是社会主义企业

揚言全盘集体化决不是表示“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由于“缺乏技术和文化基础”，也“不能阻止小商

品生产者內部的分化”和資本主义分子的产生。攻击把土地的“永久”使用权交給集体农庄，說这实质上是“廢除了土地社会化”。說級差地租、不合理的土地分配和官僚的无限权力大大促进了集体农庄之間的进一步分化，形成一种“資本阶級农庄”。大农庄庄員的收入等于低等集体化农民收入的十倍到十五倍。普通农民从个体經營中所得的收入往往比从农庄所得收入多两倍。宣传出租土地“广泛地流行着”，不仅集体农庄，而且国营农場也出租土地。正是在农业中，集体化为“官僚的寄生主义”及其“同农庄上层集团相互帮助发展提供了巨大机会”。声称集体农庄不是社会主义企业，它是否会导致社会主义，“还要看一系列条件”，其中包括集体农庄內的、苏維埃制度的一般条件內的和世界舞台上的条件。低生产水平同社会主义的甚至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形式不断发生矛盾的情况，“在农业中比在工业中要严重得多”。

“全盘”集体化，即使在今后两、三年內真正实行，也絕不是表示富农作为一个阶級被消灭了。生产合作社的形式，由于缺乏技术和文化基础，并不能阻止小商品生产者內部的分化以及資本主义分子从他們中間出現。为了真正消灭富农，需要在农业技术方面来一次彻底的革命以及把农民同工业无产阶級一起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經濟的工人和无产阶級社会的成員。但是，这是几十年以后的远景。由于个体农民的工具和工具占有者的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占优势，正是在相对成功的集体化以后，亦即随着农业生产的普遍增长，农民的分化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发生和增强。如果我們进一步假定，具有新的技术因素的集体化将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如果没有这种提高，集体化在經濟上就沒有什么道理，从而也

就維持不下去了)，那么这就会立即在現在人口已經过多的农村中造成一千万，二千万甚至更多的过剩工人，即使有最乐观的計劃，工业也不能够吸收这么多工人。随着过剩的，也就是說，在集体农庄找不到位置的半无产和半貧民化的人口增长，富裕的集体农庄以及貧穷的和中等的集体农庄內部的富裕农民将在另一个极端相应地增长起来。由于领导沒有远見，預先宣布集体农庄是社会主义企业，資本主义农民分子就能把集体化当作自己最好的掩护，結果对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更加危險。

因此，目前过渡时期的經濟成就，並沒有消灭基本矛盾，而是为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基础上更深一层地再現这些矛盾作了准备。

摘譯自《苏联的发展問題》(1931年4月4日)，  
紐約1931年版第7—8頁。

如左派反对派自一九二三年以来所宣布的，工业化是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前提。不发展工业化，無論麻布或釘子，更不用說拖拉机，都不能供給农民。但是工业化必須有如此的速度和依照如此的計劃，以使城市与乡村間貨物的量的关系坚定地进步，即使是緩慢地进步，使工人与农民的生活标准提高。这一整个制度的安定之最先决条件，使工业化与集体化可以允許的速度受限制。

“五年計劃已廢除了階級和實現了社会主义嗎？”这閑話是无意思的。但我們必須要問：“城市与乡村間的联盟已穩固了嗎？”我們的回答是：“沒有，它(五年計劃)已动搖了和削弱了这联盟。”斯大林在中央委員會全体會議的最近一次演說中吹牛說有計劃的集体化已超过了三倍以上，但是除官僚的吹牛家們以外，誰需要这些数字呢？集体化的統計代替不了面包。集体农庄是多，但是沒有肉类与菜蔬。城市沒有东西吃。因为工人挨餓而工业敗坏。城市与农民的关系已从半自願的經過粮食稅的交換轉变到强制征发，



換言之，轉變到戰時共產主義的方法。

飢餓的工人不滿於黨的政策。黨不滿於其領導。農民不滿於工業化、集體化和不滿於城市。一部分農民不滿於政治制度。哪一部分；我們不能知道，但在現在狀況之下，這種不滿顯然只有在發展。

“有計劃的集體化超過了三倍以上”！但這正是不幸的所在。被強迫組成的集體農莊不僅不走上社會主義，而且恰好相反，因其成為農民對城市罷工之組織的形式而動搖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農民對國家隱藏糧食，或有意限制播種，走上了富農的道路。農民說：“讓我自由地買賣罷”。從誰買和賣給誰呢？就是和那些出正確的價格的人做買賣，無論他是國家、私商或外國資本家。農民為國內貿易自由之鬥爭，立即引到要求對外貿易壟斷制之廢除。這是五年計劃的錯誤之邏輯。

摘自《熱月的危險》(1933年1月11日)，載於《俄國革命與五年計劃》新生命書局1933年版第134—136頁。

如果撇開集體農莊的貴族不談，那末，普通農民的日常需要，在較大的程度上還是依靠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而不是依靠參加集體農莊。一個農民從個別經營當中所得到的收入，特別是從事技術性工作，如種植果樹或飼養牲畜，往往比在集體經濟中所得到的多兩倍。這個事實已經為蘇聯的報刊本身所證明，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千百萬的勞動力，特別是婦女，在小型經營中完全野蠻地浪費掉了；另一方面，集體農莊的勞動生產率還非常低。

為了提高大規模集體農業的水平，必須再用農民所懂的語言同農民交談——這就是說，恢復市場，從實物稅再回到商業上來——一句話，把過早地送到撒旦那里去的新經濟政策，再从撒旦那里請回來。因此，過渡到一種多多少少穩定的貨幣核算，便成了

进一步发展农业的一个必要条件。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8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2—53页。

如果說工业企业“原則上”是社会主义企业,那末,集体农庄还不能这样說。集体农庄所依靠的不是国家,而是集体财产。同分散的个体經濟比較起来,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集体企业是不是会导致社会主义,那还要看一系列的条件,其中有一部分条件是在集体农庄的范围以内,有一部分是在苏維埃制度的一般条件以内,还有一部分——并且是同样大的一部分——則在世界舞台上。

农民和国家之間的斗争还远远沒有結束。目前还很不稳定的农业組織,只不过是两个斗争中的陣营在彼此之間进行了可怕的內战以后的一种暫时的妥协。的确,百分之九十的农庄已經集体化,百分之九十四的农产品是从集体农庄来的。即使考虑到有一定百分比的集体农庄是一种假象,在它們那里基本上是个体农民,但还是必須承认,战胜个体經濟的工作看来至少已經完成了十分之九。然而,农村地区的各种力量和傾向之間的真正斗争,远远不是局限于个体农民和集体农民之間的針鋒相对的对立这样一个范围。

为了安撫农民,国家认为自己不能不向农村的私有的和个体化的傾向作很大的让步,首先是把“永久”使用土地权正式轉交給集体农庄——这就是在实质上废除了土地的社会化。这是一种法律上的假象嗎?从力量对比来看,这种假象有可能成为现实,并且在最近的将来使全国范围的計划經濟遭到巨大的困难。然而,更加重要的是,国家被迫恢复了个体农民經濟,农民有了自己的小块田地,还有了自己的牛、猪、羊、家禽等等。由于这种违反社会化和限制集体化的做法,农民們才温順地——虽然还没有多大热

情——同意了在集体农庄中干活，而这样一方面可以使他們有机会完成对国家的交售义务，同时也可以使他們自己得到一些东西。这种新的关系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形式，因此即使苏联的统计学家比较诚实，也很难用数字来衡量这种关系。然而，从许多事情看来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从农民个人的角度来看，自己的小块田地并不比集体农庄不重要。这一点意味着，**个体化倾向和集体化倾向之间的斗争还在整个农村居民中进行，同时斗争的结果还没有决定。**那末农民们究竟倾向于哪一条道路呢？他们自己还不太清楚。

一九三五年底农业人民委员说，“到目前为止，在完成国家的粮食供应计划方面，我们遭到了富农分子的猖狂反抗。”换句话说，这一番话意味着，大多数集体化农民“到最近”（今天的情况又怎样呢？）还认为把粮食交给国家是一件对自己不利的事，他们倾向于搞私营商业。这种情况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证明，即国家制订了严厉的法律来保护集体财产，防止集体化农民自己进行掠夺。很有启发的是，集体农庄向国家保险的财产是二百亿卢布，而集体化农民所保险的私有财产是二百一十亿卢布。如果这种对比不一定意味着分散的农民比集体农庄富足，那末无论如何说明了这一点，即农民在私有财产保险方面比在公共财产保险方面要慎重得多。

从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样说明问题的是畜牧业的发展情况。马的数目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以前是在不断地减少，只是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年才略有增加；而牛的数目到去年已经增加到四百万头。在一九三五年这个条件有利的年头，养马计划只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四，而养牛则大大超过了计划。这些材料的意义从这样一个事实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即马只能是集体财产，而牛则已经是大多数集体化农民可以私有的牲畜。这里只需要补充这样一点，即在草原地区，集体化农民作为一种例外的情况可以拥

有一匹馬，因此这些地区的馬比集体农庄的馬增加得快，而集体农庄的馬又比国营农場的馬增加得快些。这些情况并不是說，私有小經濟比大規模社会化經濟优越，而是說明从私有小經濟过渡到大規模社会化經濟，从野蛮主义过渡到文明，其中隐藏着許多困难，而这些困难都是不能仅仅用行政压力来克服的。

“法权永不能超过社会經濟制度以及由此經濟制度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发展程度。”出租土地虽然是法律所禁止的，实际上却很广泛地流行着，不仅如此，还以最致命的分成制形式流行着。这个集体农庄的土地租給那个集体农庄，有时租給一个外面的人，最后，有时甚至租給本农庄比較有个人事业心的庄員。說来难以相信，国营农場——即“社会主义”企业——居然也出租土地。另外，尤其說明問題的是，干这种事的竟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国营农場！在这个维护法律的高級机关的保护下，国营农場的經理向农民提出的租地条件，几乎完全是从旧地主与临时工訂的契約中抄下来的。我們从这些方面看到了官僚剝削农民的情况，这种官僚已經不再具有国家代理人的性质，而具有半合法地主的性质了。

尽管一点也沒有扩大这种丑恶現象的范围——这种現象当然无法統計——我們还是不能不看到这种現象所具有的巨大的带有征兆性的意义。这种現象明白无誤地证明了，在这个包括絕大多数人口的还极端落后的經濟部門，资产階級傾向多么强烈。与此同时，尽管所有制关系具有新的結構，市場关系还是不可避免地加强着个体化傾向，加深着农村的社会分化。

平均計算，每个集体农庄的收入大約四千卢布。但是，关于农民的“平均”数字甚至比关于工人的“平均”数字还要具有欺騙性。例如在克里姆林宮，有人汇报說，集体化漁民在一九三五年的收入比一九三四年增加了一倍，即每人得到一千九百一十九卢布，后面这个数字得到了掌声，这一点說明这个数字大大超过集体化基本

群众的收入。另一方面，有些集体农庄的每户收入高达三万卢布，这还没有把个人经济的货币和实物收入计算在内，也没有把整个企业的实物收入计算在内。总的说来，这些大集体农庄的每个庄员的收入等于“平均”的工人工资和低等集体化农民收入的十倍到十五倍。

收入的等级只是部分地决定于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勤奋程度。集体农庄和农民个人的土地，由于气候、土壤和作物类别的不同以及距城市和工业中心的远近不同，而必然处于非常不平等的状态。城乡的对立不仅没有在五年计划期间减轻，反而由于城市和新工业区的迅速发展而大大尖锐化。苏维埃社会的这种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对立，主要是因为级差地租，不可避免地会在集体农庄之间以及集体农庄内部派生出矛盾。

官僚的漫无限制的权力，也是促使社会分化的一个同样有力的工具。他们掌握着工资、物价、捐税、预算以及信贷这样一些杠杆。中亚地带有一系列种植棉花的集体农庄，收入很不平衡，这主要是由于政府规定的价格不同，而不是由于集体农庄庄员的工作好坏。某个居民阶层剥削另一个居民阶层的现象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掩盖起来了。几万个“富裕”集体农庄庄员的幸福是牺牲其他集体农庄庄员和产业工人的利益而得到的。使所有的集体农庄庄员都达到富裕的水平，是一个比牺牲多数人而使少数人拥有特权要困难得多和费时得多的任务。一九二七年内左翼反对派曾宣称，“富农的收入已经增加得比工人的收入多到无法衡量的地步”，这个说法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上层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已经增加得比基本工农群众的收入多到无法估计的程度。目前物质生活水平的差别也许比消灭富农以前还要悬殊。

集体农庄内部的分化，一部分表现在个人的消费上；一部分表现在同集体农庄毗连的个人企业上，这是因为集体农庄本身的基

本财产已經社会化。集体农庄之間的分化已經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后果,因为富有的集体农庄有机会使用更多的肥料和更多的机器,因而可以更快地富足起来。取得成就的集体农庄往往雇用穷苦集体农庄的劳动力,而当局对此閉眼不問。把价值不等的土地分配給集体农庄,这就大大地促进了集体农庄之間的进一步分化,并因而形成一种资产阶级集体农庄,或者叫做“百万富翁集体农庄”,甚至現在它們还被人这样称呼。

在农民发生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国家政权当然可以作为調整者进行干預。但是朝哪个方向做呢?干預到什么限度为止呢?进攻富农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庄員;这就会同农民当中比較“进步的”阶层发生新的冲突,而这种阶层的农民只是經歷了一段痛苦的停頓以后,現在才开始感到迫不及待地需要一种“幸福的生活”。不仅如此——而这一点还是主要的——国家政权本身变得越来越不能进行社会主义监督了。在农业当中也象在工业当中一样,国家政权設法寻找强有力的、順利的“田間斯达汉諾夫工作者”的支持和友誼,寻找百万富翁集体农庄的支持和友誼。国家政权最初所关心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到最后就只关心自己了。正是在消費与生产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农业中,集体化已經为官僚的寄生主义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并为这种寄生主义同集体农庄的上层集团相互帮助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集体农庄的庄員在克里姆林宮的庄严會議上献給領導人的祝賀性“礼品”,只不过是他們向地方政权代表經常納貢的象征性表現。

由此可見,低生产水平同社会主义的甚至合作社(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形式不断地发生冲突的情况,在农业中比在工业中还要严重得多。归根到底,官僚正是从这种矛盾中产生的,而他們反过来又加深了这种矛盾。

同上,第 93—97 頁。

## (十) 关于苏联过渡时期的 阶级和阶级斗争

### 一、过渡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 1. 说“谁战胜谁”的问题要 在长期阶级斗争中解决

说“‘谁战胜谁’的问题要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文化战线的各个方面长期进行阶级斗争来决定胜负。”

“谁战胜谁”的问题要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文化战线的各个方面长期进行阶级斗争来决定胜负——这个斗争将最后决定：是社会主义发展路线呢，还是资本主义发展路线；是按照社会主义路线分配国民收入呢，还是按照资本主义路线分配国民收入；是单一的无产阶级政权呢，还是和新资产阶级平分政权。在一个小农、小小农和一般的小有产者占压倒多数的国家里，最重大的事变常常是断断续续地和在暗中进行的，只是在最后才“意外地”爆发出来。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4—25页。

## 2. 談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 期間的基本階級

认为苏联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期間的基本階級是工人階級、农民和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阶层为其上层的新資產階級。富农、新資產階級和官僚相結合而且力量日益增长,工人階級和貧农的地位不断削弱。

說以工业为主导基础的問題是國內“階級斗争的中心問題”。断言被推翻的階級、新形成的資產階級和官僚中的資產阶层只有“通过反革命的顛复”才能重建私有制。

认为國內的階級路綫应当是：“工人和雇农，取得貧农支持，同中农联盟，反对富农、耐普曼和官僚”。

**革命的社会矛盾就是階級矛盾。我国的基本階級都有哪些呢？一、无产階級，二、农民，三、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阶层为其上层的新資產階級。**

从經濟作用和政治重要性的观点看来，首要地位應該給于組織成为国家的无产階級，以及提供在我国經濟中占支配地位的农产品的农民。新資產階級的主要作用是作为苏联工业和农业之間，以及在苏联工业的不同部門和农村經濟的不同范围之間的中間人。但它并不限于成为中間商，新資產階級还起一部分組織生产的作用。

摘譯自《官僚主义和革命》(1923 年底)，  
載于《新方針》伦敦 1956 年版第 36 頁。



在我党中央机构的政策实际上决定于斯大林集团的这两年<sup>①</sup>的結束之际，我們可以认为已經充分证明了这个集团无力防止：**(1)那些企图把我国的发展推上資本主义道路的势力的无节制增长；(2)在富农、新資產阶级和官僚力量增长的相形之下，工人阶级和貧农地位的削弱；(3)工人国家在和国际資本主义斗争中一般地位的削弱，苏联国际威信的下降。**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9頁。

**在新經濟政策下，私人資本的作用在工业落后的边疆地区异常迅速地增长着。在这些地区，經濟机关常常把它们的賭注完全押在私人資本家身上。它們确定物价时不考虑貧农和中农群众的实际情况。它們人为地降低雇工的工資。它們无节制地在工业同供給原料的农民之間实行官僚主义的私人中介的办法。它們把合作社导向使乡村富裕阶层得到更多好处的方向。它們忽視特别落后的畜牧业者和半畜牧业者的利益。主要問題——如何实现工业建設计划，特别是农业原料生产的机械化计划——完全置諸脑后了。**

同上，第64頁。

**(6)我們必須坚决地糾正我們在国内的級阶路綫。假使战争不可避免，只有严格的布尔什維克政策才能贏得战争，这就是：工人和雇农，取得貧农支持，同中农联盟，反对富农、耐普曼、官僚。**

同上，第100頁。

**三、“經濟命脉、首先是大工业是整个国民經济发展的主导基**

---

<sup>①</sup> 指1925—1926年。又，英譯者在此处加注說：“实际上是四年”。这可能是把1924和1927年也包括进去了。——編者注

础。”(中央提綱, 第二條)

这是对的。但是党应当知道, 这是反对派的論点, 而且最初受到中央的激烈抨击。現在中央委员会也理解这一論点了。但是单单承认还是不够的。为了使大工业在事实上成为主导基础, 需要有一个加强无产阶级经济与政治陣地的明确的阶级政策。否則, 关于“大工业是主导基础”的論点就会成为空洞无物的大言壮語。关于“主导基础”的問題是无产阶级和貧农与中农结成联盟向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进行阶级斗争的中心問題。中央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政策不是工业是“主导基础”的政策。这既表现在工业一直落后于整个经济的发展, 也表现在, 中央沒有下决心着手实行重新分配国民收入(反对耐普曼、富农、官僚主义者)的坚决的阶级政策, 以利于更快的工业化。

摘譯自《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农村工作的反提綱》(1927年11月), 載于《真理报》1927年11月5日第254号第3版。

提綱的第二个缺点在于起草人忘記了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 这就是: 在新经济政策发展的現阶段上, 每一个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問題, 尤其是整个经济的五年計劃, 都是阶级斗争的問題。向那些本来就发了財的人提出“发财吧”的口号, 这并不难。这个口号永远会受到城乡新资产阶级代表們的拥护, 而且会被他們百分之百地加以实现。延迟了两年多以后, 好容易中央委员会在《宣言》和提綱中宣布了压制富农和耐普曼的口号, 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认真看待这个口号的話, 它是要求改变整个政策, 重新配置力量, 使所有国家机关有新的方針。这一点必須确切而明显地提出来。要知道, 无论富农或者貧农都沒有忘記, 中央委员会在两年当中所捍卫的完全是另一种政策。十分明显, 提綱起草人所以閉口不談自己过去的方針, 是以为改变政策只要发布新的“命令”就够了。可是, 要想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实现新的口号, 不克服一

些階級的猛烈反抗和不动員另一些階級的力量是不行的。

近几年来，富农越来越厉害地对农村中的貧农和城市中的国家政权施加压力，迫使国家政权改变它的經濟計劃和打算。

富农、私人工商者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仅同国家的、而且同党的官僚制度的許多环节相接合，乃是我們社会生活中最无疑問、同时也是最令人担心的过程。从这里正在产生威胁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萌芽。

为了排除这种危险，为了认真地压制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特别是为了认真地使富农交納附加稅，首先必須揭露富农、其次必須查清富农所隱瞞的不断增加的收入。

沒有貧雇农本身的积极性，就不可能用适当的办法使貧雇农不受富农的剝削。但是，要使貧雇农能够說出自己的話并且真正帮助压制富农，就必须使他們不再害怕富农。必須使貧雇农在最后不至于說：我揭露了富农，苏維埃政权却抛弃了我；我又和富农面对面了，而現在将不会对我留情了，但是我已經无路可走，到处都是失业。为了避免这一切，必須認真組織农村貧农向富农作階級斗争。誰不坚决参加这种斗争，不考虑斗争的后果，不制訂斗争的計劃，那末他只是徒然地提出“压制富农”的口号。結果只是煽动性的空話而已。

城市內压制耐普曼的事情也完全一样。近几年来，在城市中耐普曼的卢布显然对工人的戈比施加了压力。它在住宅問題上、在国家机关內、在市場上、在学校里、在剧院里和其它等等地方，都在施加这种压力。为了扭轉这种情况，仅仅向財政人民委員部的稅收人員发布新的指令是不够的。只有愚蠢的官僚主义者才会认为全部問題仅在这里。如果不在城市內喚起工人的积极性，不在苏維埃中恢复工人民主，不使一切苏維埃机关对工人选民負起真正的（而不是做样子的）責任，那末压制耐普曼是不可想像的。对

于工会，而首先是对党来说，也同样如此。不解决所有这些最重大的阶级斗争问题，要执行稍为令人满意的经济五年计划是不可想像的，但中央委员会的提纲对此不置一詞。

摘自《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反提纲》(1927年11月)，载于《真理报》1927年11月17日第263号第3版。

苏联经济和政治中的矛盾过程，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发展着的。社会政权的性质首先由所有制关系决定。土地国有化，工业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国有化以及国家掌握对外贸易的垄断，是苏联社会制度的基础。为十月革命所剥夺的各阶级，新形成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官僚中的资产阶级，都只有通过反革命的颠覆才能重建土地、银行、工厂、制造厂、铁路等等的私有制。这些所有制关系是阶级关系的基础，它为我们决定了苏联作为无产阶级国家的性质。

摘译自《苏联的发展问题》(1931年)，  
纽约1931年版第3页。

### 3. 断言新的阶级分化不断出现

说苏联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资产阶级倾向在农民、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上层集团中还有力量，城乡差别加深，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社会差别扩大，官僚阶层和下层人民的生活条件悬殊很大。苏联的工资差别比资本主义国家还大一些，不熟练工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和专家的实际工资的比例是1:2:15。集体农民把自留地和私养家畜放在首位，产生出一批富裕农民。认为苏维埃社会的实际划分应该是：过着资产阶级生活的高

級官僚、专家等；过着小资产阶级生活的中下层；工人贵族和集体农民贵族；中等工人群众和集体农民；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断地变成流氓无产者的下层工人和农民；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妓女，等等。

說新的社会分化不断出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分配标准实行得越来越彻底，这为资产阶级复辟創造条件。

在工业方面，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几乎普遍地占着优势。在农业方面，这种所有制只是在国营农场中占着绝对优势，而这种农场在全部耕地中所占的百分比不超过百分之十。在集体农庄中，合作社的或者集体的所有制表现为各种不同比例的国有制和私有制的結合。土地虽然从法律上說是属于国家的，实际上已經交給集体农庄“永久”使用，这种情况同集体所有制并没有什么不同。拖拉机和复杂机器属于国家；較小的设备才属于集体农庄。此外，每个集体农民都經營个体农业經濟。最后，还有 10% 以上的农民依然是个体农民。

根据一九三四年的人口調查，全国有 28.1% 的人口是国家企业和机关的工人和职员。产业工人和建筑工人，不包括他們的家属，在一九三五年达七百五十万。集体农庄和手工业合作社的成员，在人口調查的时候，占人口的 45.9%。学生、紅軍的士兵、領养老金者以及其他直接依靠国家的人，共占 3.4%。总起来說，74% 的人口属于“社会主义部分”，而 95.8% 的国家基本資金分配在这 74% 的人口身上。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在一九三四年还占人口的 22.5%，而他們所占有的国家資金只不过比 4% 稍微多一些。

一九三四年以后，沒有再进行人口調查；下次調查将在一九三七年进行。然而，毫无疑問，在过去两年中，私营企业部分已經縮

小得更加有利于“社会主义部分”。根据官方经济学家的估计，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现在大约占人口的10%，即大约一千七百万人。这些人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已经大大减小，远不及他们在人数上所拥有的重要性。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德烈耶夫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宣布说，“我国社会主义生产所占的相对比重，在一九三六年应当达到98.5%。这就是说，还有微不足道的1.5%属于非社会主义部分。”乍看起来，这些乐观的数字似乎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已经取得“最后和不可变更的”胜利。但是，谁要是不能看出数字背后的社会现象，那才可悲！

数字本身是有些夸大的。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集体农庄旁边那些私人小块土地也都算在“社会主义”部分内。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经济的国有形式和集体形式在统计上所表现的完全无可怀疑的巨大优越性，虽然对将来是重要的，但它们并没有消除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资产阶级倾向在“社会主义”部分当中所拥有的力量问题，而这种情况不仅在农业中存在，而且在工业中也存在。目前达到的物质水平已经足以提高人们对各方面的要求，但是，整个说来还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因此，经济进展的动力必然会不仅在农民和“脑力”劳动的代表当中而且也在无产阶级上层集团中唤醒小资产阶级的欲望。只是把个体农民和集体农民，把个体手工业者和国营工业进行简单的对比，那还一点看不出这种欲望所具有的爆炸性力量；这种欲望可以渗透到整个国家经济当中，而且一般地来说还会表现为这样一种愿望，即每个人给予社会的越少越好，而取之于社会的越多越好。

国家在解决赚钱者和消费者的问题方面所花的精力和智力，并不比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少。这也是社会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部分原因。在国家继续同这些离心力的分散行动进行斗争的时候，统治集团本身却在变成个人合法和非法积累的主要贮藏所。

在新法律标准的掩盖之下，小资产阶级倾向当然不容易从统计上加以确定。但是，这种倾向在经济生活当中所占的实际优势首先已为“社会主义的”官僚本身所证明；而官僚这种极端丑恶的内部矛盾重重的集团，这种丑恶的不断发展的社会变态，反过来又成为滋长社会毒害的泉源。

我们将会看到，新宪法的整个基础是把官僚和国家混为一谈，把国家和人民混为一谈。这个新宪法中说，“……国家所有制——即全体人民的所有物。”这种混为一谈的说法是官方学说的诡辩基础。一点不错，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本人开始——在谈到工人国家的时候，是把国家所有制、国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当作同义语来使用的。从广泛的历史范围上说，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妥的地方。但是，运用到一个新社会的初期的和还没有得到保证的发展阶段上，而且是运用到一个孤立的和经济上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上，这种说法就会变成产生根本错误和公然欺骗的泉源。

私有制要变成社会所有制，必须经过国有阶段，正好象幼虫要变成蝴蝶，必须经过蛹的阶段一样。但蛹并不是蝴蝶。无数的蛹没有变成蝴蝶就死了。国家所有制要变成“全体人民”的所有制，只有到社会特权和社会差别消失的时候，到国家也因而没有必要存在的时候。换句话说，国家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程度决定于它本身不再是国家所有制的程度。反过来说也是正确的：苏维埃国家越是高高地站在人民的上面，越是强烈地把自己当做财产的保卫者而把人民当作财产的浪费者，就越是明显地证明它自己是反对这种国家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

“我们离彻底废除阶级还很遥远”，这是官方报刊在谈到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还存在着差别时说出一句话。这种纯粹学院式的承认有这样一种好处，即可以使官僚在“脑力”劳

动这样可尊敬的名义下把自己的收入掩盖起来。“友人們”——这些人：爱真理，但尤爱柏拉图<sup>①</sup>——也只限于学院式地承认还存在着旧的不平等“残余”。实际上，这些欺騙意味很濃的“残余”完全不足以解释苏联的现实。如果说城乡之间的差别在某些方面已經減輕了的話，那末，在另外一些方面是大大地加深了，这是因为城市和城市文化——也就是城市少数人的舒适——都发展得非常迅速。近年来，虽然从下层来的人使科学干部有所扩大，但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社会差别不是縮小了，而是扩大了。千年来在各方面限制着每个人的生活的阶级壁垒——文雅的城市人和粗野的农民，卓越的科学家和临时的小工——不仅沒有把过去保留下来的东西稍微減輕一点，反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重新产生出来，并且还具有越来越严重的性质。

“干部决定一切”这句臭名昭彰的口号典型地說明了苏維埃社会的性质，这种說明比斯大林本人所願意說明的远为坦率。干部就其本质來說代表着統治和指揮的机关。迷信“干部”首先意味着迷信官僚，迷信官吏——技术貴族。苏維埃政权在培养和发展干部方面，也正象在其他事情上一样，还不得不解决先进的资产阶级在他們本国早已解决了的那些問題。但是，由于苏維埃干部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产生出来的，他們便要求一种几乎是神圣的尊敬和一种不断增加的薪金。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干部的发展，资产阶级的不平等也恢复了。

从生产資料的所有权这个观点来看，元帅和女佣之間，托拉斯經理和临时小工之間，人民委員的儿子和无家可归的孩子之間，似乎根本沒有什么差别。虽然如此，可是前者占有堂皇的住宅，在乡

---

① 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曾說过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里把这句名言顛倒过来，意指这些“友人們”并不爱真理。——編者注



下不同的地点有好几处避暑别墅，还有最好的汽车供自己使用，并且早就忘记了怎样擦亮自己的皮鞋。后者则住在往往没有隔开的木棚里，过着半饥饿的生活，他们之所以也不擦自己的皮鞋，只是因为他们是光着脚走路的。在官僚看来，这种差别似乎并不值得注意。然而，在临时小工看来，这却似乎是非常重要的，而这样看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肤浅的“理论家们”当然可以用这样的话来为自己解嘲：财富的分配同财富的生产比较起来，毕竟是次要的因素。然而，交互作用的辩证法在这里还是具有它的全部效力的。国有生产资料的命运，归根到底，决定于个人生活上的那些差别究竟朝哪个方向发展。如果一只船宣布为集体财产，而乘客还是照旧分成头等二等三等，那末，显然对三等乘客来说，生活条件的差别要比所有权在法律上的改变重要得多。另一方面，头等乘客喝着咖啡，吸着雪茄，会提出这样一种想法：集体所有制是最最重要的，一间舒适的舱室则没有什么。从这种情况产生出来的对抗，很可能打破不稳定的集体所有制。

苏联报刊满意地提到这样一件事：在莫斯科动物园里，记者问一个小孩子：“这只象是谁的呢？”回答是：“国家的。”于是这家报刊马上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就是说，有极小的一部分也是我的。”然而，如果这只象真被分配起来的话，那末，贵重的象牙会落在最上层的一些人手中，少数人会尝到象的大腿，大多数人则只能胡嚼烂咽象的蹄子和五脏。什么都分不到的孩子们是很难把国有财产和自己的财产合而为一的。至于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只有把国家的东西偷到自己手中的时候才认为是“自己的”。动物园里的那位小“社会主义者”也许是这样一位高级官员的儿子，他已经习惯于从这样一个公式中得出结论，即“朕即国家”。

如果我们用市场上的语言来说明社会主义关系的话，那末，我

們可以把公民当作拥有国家财产的一家公司的一个股东。如果說财产是属于全体人民的,那就应当假定“股票”是平均分配的,因而所有的“股东”都有权分得一样的紅利。然而,公民参加国家企业,不仅是作为“股东”,而且还要作为生产者。在共产主义的低級阶段,也就是在我們已經同意称为社会主义的阶段,劳动的报酬还是按照资产阶級标准来支付的——即按照技术和劳动强度等等来支付的。因此,从理論上說,每个公民的收入应当包括甲和乙两个部分——也就是紅利和工資两个部分。技术越高,工业的組織越完善,甲所占的地位就比乙越大,而个人劳动的差別对生活水平的影响就越小。苏联工資的差別不是比資本主义国家小些,而是还要大些,从这个事实必須得出这样的結論,即苏联公民所持有的股票并不是平均分配的,而在他們的收入中,紅利和工資也不是一样的。不熟练的工人只能得到乙,这是在类似的条件下在資本主义企业中也可以得到的最低收入;斯达汉諾夫工作者或者官僚則可以得到2甲+乙,或者3甲+乙,等等,而这里的乙还可以变成2乙、3乙,等等。換句話說,收入的差別不仅决定于个人生产率的不同,而且还决定于隱蔽地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多少。拥有特权的少数股东是靠牺牲被剝夺了权利的多数股东的利益生活的。

如果你认为苏联的不熟练工人可以比在类似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下的資本主义企业收入多些——这就是說,他是一个小股东——那末,必須认为他的工資等于甲+乙。工种較高的工資将表现为这样的公式:3甲+2乙,10甲+15乙,等等。这种情况意味着,不熟练工人只有一股,斯达汉諾夫工作者有三股,专家則有十股。不仅如此。他們的实际工資的比例是1:2:15。在这种情况下,对神圣的社会主义财产的贊美,在經理或者斯达汉諾夫工作者看来是很有說服力的,在普通工人或者集体农庄庄員看来則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地方。然而,普通工人占社会的絕大多数。社会主

义所关心的正是这些工人，而不是那些新贵族。

“我国的工人不是工资奴隶，不是称之为劳动力的商品的出售者。他是一个自由的工人。”（《真理报》）在目前这个时期，这个漂亮的公式还不容许加以夸大。工厂转到国家手中，只是从法律上改变了工人的地位。实际上，他还不得不在匮乏中生活，不得不为一定的工资干一定时间的活。工人从前对党和工会所抱的那些希望，在革命以后转而寄托在自己所创造的国家身上了。但是，这种工具的有用职能却受到技术和文化水平的限制。为了提高这种水平，新的国家使用老一套办法来压制工人的筋肉和神经。一批鞭策奴隶的人已经成长起来。工业的管理工作变成超官僚主义式的了。工人对工厂的管理已经完全不能发生影响。在实行计件工资、物质生活条件艰苦、不能自由行动以及恐怖的警察压制深入到每个工厂的生活当中的情况下，的确很难让工人感到自己是一个“自由的工人”。他只能从官僚中看到他的经理，从国家方面看到他的雇主。自由劳动同官僚国家是不能并存的。

把上面说的话加以必要的改变，也同样地适用于农村。按照官方的理论，集体农庄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种特殊形式。《真理报》写道，集体农庄“从本质上说已经和国营企业属于同样的类型，因此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它又立即补充说：农业社会主义发展的保证在于“布尔什维克党管理集体农庄”这样一个条件。这就是说，《真理报》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已经从经济方面转到政治方面。这一点实质上意味着，社会主义关系还没有在人与人的实际关系当中体现出来，而只是存在于当局仁慈的心中。如果工人们认真注意那颗心的话，那就很好了。实际上，集体农庄还站在个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当中，庄员经营的私有小块土地或者其他个人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于集体农庄内部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尽管个人耕种的土地只有四百万公顷，同集体农庄耕种的一亿零八百万公顷土地比较起来还不到百分之四，但是，由于这片土地精耕细作，特别是经营了菜园，结果它可以供给农民家庭最重要的消费品。大部分牛、羊和猪都是集体农民的财产，而不是集体农庄的财产。农民往往把自己的辅助性田地摆在主要地位，而让无利可图的集体农庄居于第二位。另一方面，劳动日报酬高的集体农庄正在不断地提高社会水平，产生一种富裕农民。离心倾向不仅还没有消失，相反，正在日益加强。无论如何，集体农庄到现在为止只是改变了农村中经济关系的法律形式——特别是收入的分配方法——而旧茅草房子和菜园、仓库的杂活以及农民的整个繁重劳动，则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这些集体农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以过去的态度对待国家。国家的确不再为地主或者资产阶级服务，但是，它为了城市的利益从农村中拿走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供养的贪婪的官僚也太多了。

由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六日要进行人口调查，关于社会的分类已经拟出这样一张单子来：工人；职员；集体农民；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教士；其他非劳动人民。根据官方的解释，这个人口调查表之所以没有包括任何其他社会特点，只是因为苏联已经没有阶级。实际上，设计这个表格的直接意图是掩盖拥有特权的上层和被剥夺了权利的下层。苏维埃社会的实际划分是应该而且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一次诚实的人口调查而表现出来的，这种划分如下：过着资产阶级生活的高级官僚、专家等；过着小资产阶级生活的中下层；生活水平差不多的工人和集体农庄的贵族；中间的工人群众；中间的集体农民；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断地变成流氓无产者的下层工人和农民；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妓女，等等。

新宪法宣称，“废除人对人的剥削”在苏联已经完成，这不是说

实話。新的社会分化已經創造条件，使人对人的剝削以最野蛮的形式复活，即又开始买卖人口来做个人的奴隶。在新的人口調查表上，个人的佣人根本沒有提到。这些人显然都列在一般的“工人”类当中了。然而，这样做有很多問題：社会主义公民有沒有佣人呢？有多少呢（如女仆、厨子、保姆、女管家、司机）？社会主义公民是否有汽車供自己使用呢？他占有多少房間呢？等等。这种表格竟只字不提收入的等級！如果剝削他人劳动者沒有政治权利这一条法律恢复的話，那就会有些出乎意料地出現这样的情况：統治集团的核心不在苏联宪法的保护范围以內。幸好他們已經为佣人和主人……建立了完全平等的权利！两种相反的傾向正在从苏維埃制度的深处滋长起来。与日益衰落的資本主义相反，苏維埃制度在发展生产力，这样它就正在准备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另一方面，为了上层的利益，它把資產阶级分配标准实行得越来越彻底，这样它就又在准备資本主义复辟。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标准之間的这种对立是不能无限制地发展下去的。或者是資產阶级标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扩大到生产資料方面去，或者是使分配标准适应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体系。

官僚是怕暴露这种选择的。他們随时随地——在报刊上，在演說中，在統計中，在文学家的小說中，在詩人的詩篇中，最后在新宪法的条文中——都絞尽脑汁用社会主义字典中的抽象名詞来掩飾城市和农村的实际关系。这就說明了为什么官方的意識形态是那樣的沒有生气、无能和虛伪。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71—179頁。

## 二、工 人

### 1. 宣传应当不断改善工人的生活

声称“工人阶级各方面生活条件的改善”，是估计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情况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在估计我国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发展的情况时，决定性的因素应当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的优势——加上工人阶级各方面生活条件的改善。这种改善在物质方面（产业工人就业的数目，实际工资的提高，工人预算的性质，居住条件，医药治疗等等）、在政治方面（党，工会，苏维埃，共青团）、最后在文化方面（学校，书籍，报纸，剧场）都应该是明显的。企图把工人根本的具体利益放在不重要的地位，并且在“基尔特社会主义”这个诬蔑性的借口之下把工人的根本的具体利益同工人阶级的总的历史利益对立起来，这种企图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2—33页。

### 2. 造謠工人生活水平显著下降

宣传“工人的生活水准明显地下降”，非熟练工人、季节工人、女工和青工下降尤甚，工人住房面积在社会各阶层中“居末位”，“失业打击着无产阶级的基本队伍”，从而断言工人所创造的一大部分剩余价值已被官僚和资产阶级

級所盜取。

說雇农的工錢往往低于国家規定的最低标准，污蔑这是党执行“錯誤方針的后果”，“这种方針在实践上、在事实上、在生活中主要注意的是农村的上层，而不是下层”。

工人国家占有剩余价值当然不是剝削。但是首先，我們的工人国家是一个有官僚主义偏差的工人国家。庞大臃肿而享有特权的行政管理机构吞掉了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其次，日益成长的資產階級用貿易和在不正常的差价上投机的手段，盜取了国营工业所創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3頁。

到一九二五年秋季为止，我們的經濟恢复时期使工資有了充分迅速的提高。但是从一九二六年开始的实际工資大为降低的情况直到一九二七年初才被扭轉。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会計年度的头两个季度，大工业中的每月平均工資以莫斯科卢布計算，分别为三十卢布六十七戈比和三十卢布三十三戈比；而一九二五年秋季为二十九卢布六十八戈比。第三季度——按照初步估計——为三十一卢布六十二戈比。因此今年的实际工資沒有变动，大致在一九二五年秋季的水平。

当然，特殊部类和特殊地区——首先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工人的工資和一般物质水平无疑是高于这个平均水平的。但是另一方面，其他广大工人阶层的物质水平却大大低于这些平均数字。

而且，所有的資料都证明工資的增长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劳动强度加强了，而恶劣的劳动条件仍然未变。

工資的提高越来越以要求加强劳动强度为条件。这种新趋势

是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相容的，而中央委员会在其著名的关于合理化的决议<sup>①</sup>中加强了这种趋势。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这项决议。这种政策意味着，由于发展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增加的社会财富本身并不导致工资的增加。

工人数目的微小增长意味着每一个家庭中劳动成员的数目的降低。以实际卢布计算，从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以来，工人家庭的开支预算降低了。住房费用的增高迫使工人把他的一部分住房出租。失业者直接或间接地加重了工人预算的负担。迅速增加的酒类消费加重了他的预算负担。从总数可以看到工人的生活水准明显地下降了。除非在实行生产合理化的同时，把工业和交通扩大到足以吸收被解雇的工人，否则现在推行的生产合理化必将使得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化。实际上，“合理化”的结果常常是把一些工人“赶出去”，并且降低其余工人的物质条件。这必然使得工人群众对合理化本身充满不信任。

在劳动条件恶化的情况下，常常是工人中最弱的部分最倒霉，这就是：非熟练工人，季节工人，女工，青工。

一九二六年，几乎在工业的所有部门中，女工的工资同男工相比较有了明显的下降。在三个工业部门的非熟练工人中，女工一九二六年三月的收入分别为男工收入的51.8%，61.7%和83%。在泥炭工业和装卸工作等方面，一直没有实行改善女工工作条件的必要措施。青工的平均收入和所有工人的收入相比较是在不断地下降。一九二三年为47.1%，一九二四年为45%，一九二五年为43.4%，一九二六年为40.5%，一九二七年为39.5%<sup>②</sup>。

一九二六年三月，49.5%的青工收入少于二十卢布<sup>③</sup>。规定在

---

① 《真理报》，1927年3月25日。——托洛茨基注

② 1924—1925年和1925—1926年青年经济状况调查。——托洛茨基注

③ 中央劳动统计局。——托洛茨基注



每一工业单位的一定数目的工人中要雇用一定数目的青工的条例被取消了，这对青年工人和工人家庭是沉重的打击。青工的失业数字正在大大地增加。

同上，第 34—35 頁。

工人通常的居住面积向来大大低于整个城市居民的平均居住面积。大工业城市的工人在这方面是居民中受惠最少的。在所調查的一系列城市中，各社会阶层在居住面积分配上的情形如下：

产业工人，每人五点六平方米；职员，每人六点九平方米；自由职业者，每人十点九平方米；非工人成分，每人七点一平方米。工人居末位。而且，工人的居住面积正在一年一年地缩小，而非无产阶级分子的居住面积却在扩大。

同上，第 36 頁。

工业化发展迟緩的情形在其他任何方面都不如在失业問題上表现得那样可怕，失业打击着工业无产阶级的基本队伍。一九二七年四月失业登記的官方数字是一百四十七万八千<sup>①</sup>。失业的实际人数大约为二百万。失业人数的增长比起就业工人总数来快得无可比拟。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制定的五年计划，我国工业在整个五年期间将吸收四十万稍多一点的固定就业工人。这意味着，加上不断从农村流入的工人，到一九三一年底时失业人数将增加到三百万人。这种情势将引起的后果是，无家可归的儿童、乞丐和妓女的增多。付给失业者的少量失业保险金引起了人们正当的不满。救济金的平均数为十一点九卢布——约等于战前五卢布。工会救济金的平均数为六点五到七卢布——而且在失业的工会会员

---

<sup>①</sup> 《劳动报》，1927 年 8 月 27 日。——托洛茨基注

中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可以領到这种救济金。

同上，第 36—37 頁。

三十四、农村从事雇佣劳动的人总数为三百五十万，其中男女雇农为一百六十万。只有 20% 的雇农参加了工会。对于往往是奴役性的雇佣合同，未必进行了登記。雇农的工資往往低于国家規定的最低标准，而且常常国营农場也不例外。实际工資平均不高于战前的 63%。工作日很少少于十小时，而且大多数实际上是沒有限制的。工資的发放不正常，发得很迟。雇农极其困苦的状况不仅是落后的农民国家中社会主义建設的困难的結果，而且毫無疑問也是錯誤方針的后果，这种方針在实践上、在事实上、在生活中主要注意的是农村的上层，而不是下层。必須全面系統地保卫雇农的利益，不仅防止富农、而且也防止所謂殷实的中农的侵犯。

摘譯自《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农村工作的反提綱》(1927年 11 月)，載于《真理报》1927年 11 月 5 日第 254 号第 4 版。

### 3. 声称无产階級內部分化，出現工人貴族

說无产階級內部发生了分化，“在工資的不平等方面，苏联已經不仅赶上而且远远超过了資本主义国家。”上层工人或工人貴族每月收入达一两千卢布以上，而下层工人的收入还不到一百卢布；斯达汉諾夫工作者的实际所得往往等于下层工人的二三十倍；专家的薪水往往等于八十到一百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資。声称“在无产階級的底层，正在形成一个被遺弃的苏維埃貧民层”。

每个人的“平均”工資，連托拉斯的經理和女佣都包括在內，一九三五年大約是兩千三百盧布，一九三六年將達兩千五百盧布左右——即票面價值達七千五百法國法郎，雖然實際購買力很難超過三千五百到四千法郎。這個數字本身就很不高，而如果考慮到一九三六年的增加工資，是為了部分地補償由於取消消費品的特價和取消一系列的免費服務而遭到的損失，那末，這個數字就更加微小了。但是，主要的還是，每年兩千五百盧布，即每月兩百零八盧布，正如我們所說的，是平均工資——即一種算術上的假象，這種假象的職能在於掩飾工資的真正悲慘的不平等。

毫無疑問，上層工人的情況，特別是所謂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的情況，去年有了相當大的改善。報刊不是沒有根據地那樣熱衷於列舉這個或那個得獎的工人為自己買了多少衣服、鞋子、留聲機、自行車或者多少瓶糖果。附帶說一句，這樣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普通工人得到這些好處的機會是多麼微乎其微。斯大林在談到斯達漢諾夫運動的推動力的時候宣稱，“生活得更好了，生活得更愉快了，生活既然愉快，工作也就順利了。”在對計件工資制——這一點可以說明統治階層的最大特色——所作的這種樂觀的說明中，包含着這樣一個平凡的真理，即工人貴族之所以能夠形成，完全是由於國家以前所取得的經濟成就。但是，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的動力並不是來自“愉快”的情緒，而是來自那種想得到更多的錢的欲望。莫洛托夫用這樣的話糾正了斯大林的說法：“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提高生產率的直接動機，就是對增加收入感到興趣。”這句話一點也不錯。在短短的幾個月中，一個工人階層出現了，他們被稱為“千字號人物”，因為他們每月的收入已經超過一千盧布。還有些人每月的收入甚至在兩千盧布以上，而低等工人的收入往往還不到一百盧布。

看來好象只靠這種工資的差別就可以使“富”工人与“不富”工

人之間有足够的区别。但是对官僚来说，这一点还不够。他们把各种各样的特权几乎象下骤雨般地给予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给他们新住宅或者给他们修缮旧房子，优先把他们送到休养所或者疗养院去，派教师和医生到他们的家里去免费教授和治病，给他们发免费电影票。在某些地方，他们还可以免费理发和修面，并且可以随到随理。在这些特权中，好象有许多是故意用来伤害和侮辱一般工人的。当局方面之所以有这样过分的善意，除了权位观念以外，还由于他们良心上感到不安。地方上的统治集团，都急于抓住机会让上层工人同他们共享特权，以免自己陷于孤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实际所得往往等于下层工人的二三十倍。至于那些特别幸运的专家，他们的薪水在许多情况下可以支付八十个到一百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在工资的不平等方面，苏联已经不仅赶上而且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那些最优秀的真正为社会主义动机所推动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对于自己得到的特权并不感到愉快，而是感到烦恼。这是不奇怪的。他们是在普遍贫困的情况下享受到各种各样的东西的，因此周围充满了嫉妒和恶意，这就使他们受到了损害。这种关系同社会主义道德的距离，比资本主义工厂的工人关系同这种道德的距离还要远得多，因为资本主义工厂的工人还能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剥削的斗争。

尽管如此，在日常生活方面，甚至熟练工人也是不好过的，在各个省里尤其如此。七小时工作日在提高生产率的情况下越来越受到损害，不仅如此，还要花费不少时间来另外设法补助生活。他们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国营农场比较好的工人所过的特别幸福的生活，即拖拉机手、联合收割机手等等——这些人都是已经臭名远扬的贵族——都有自己的乳牛和猪。没有牛奶的社会主义比没有社会主义的牛奶好这样一种理论已经抛弃了。现在承认的

是，在既不缺牛也不缺豬的國營農業企業中，工人們為了使自己的  
生活得到保障而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小經濟。同樣顯著的一件事是，  
官僚洋洋得意地宣稱，哈爾科夫有九萬六千名工人有自己的菜  
園——其他城市也都被要求同哈爾科夫競爭。在“自己的乳牛”和  
“自己的菜園”這些字眼里，包含着多么可怕的人力浪費！官僚加  
在工人身上的，特別是加在工人的妻子兒女身上的，又是怎樣一種  
中世紀式的掏糞挖土的重担！

至於基本群眾，當然既沒有乳牛也沒有菜園，大部分甚至沒有  
自己的住宅。非熟練工人的工資，每年是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盧  
布，甚至還要少些——這種情況在蘇聯的物價下就意味着一種貧  
困。作為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最可靠的標志的生活條件是極其惡  
劣的，常常是無法忍受的。絕大多數工人擠在公共宿舍里，其設備  
和維修比營房還要差得多。在有必要為工業部門遭到的失敗、工  
人裝病怠工和出產次品等現象辯解的時候，管理機關本身也會通  
過新聞記者的筆描繪出這樣的生活狀況來：“工人們睡在地板上，  
因為床上的臭蟲咬得他們睡不着。椅子壞了；沒有喝水用的杯子，  
等等。”“兩家人住在一間房子里。房頂是漏的。下雨的時候，他們  
就把屋內的雨水一桶一桶地倒出去。”“廁所髒得熏死人。”這種描  
述同全國各地都有聯繫，而且想寫多少就可以寫多少。由於這種不  
堪忍受的條件，例如石油工業的領導人就寫道，“勞動力的流動性  
已經達到最高點。……由於沒有工人，很多油井完全廢棄了。”在條  
件特別不利的某些地區，只有在其他地方由於各種各樣的違反紀  
律行為而被開除或解雇的人，才願意來干活。因此，**在無產階級的  
底層，正在形成一個被遺棄的蘇維埃貧民層，他們沒有權利，可是  
象石油生產這樣重要的工業部門還不能不使用他們。**

由於這種懸殊的工資差別，再加上專橫的特權，官僚便在無產  
階級當中製造了尖銳的矛盾。斯達漢諾夫運動的材料有時就呈現

出一幅小規模內战的图景。例如工会的机关报就写道，“损坏和破坏机器是反对斯达汉諾夫运动的斗争所喜欢使用的(!)办法。”接着又说，“阶级斗争在每一个步骤当中都可以感觉得到。”在这个“阶级”斗争中，工人站在一边，工会站在另一边。斯大林曾经公开建议，向那些反抗的人“直接开火”。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也不止一次地进行威胁，要把“蛮横的敌人”从地球上清除干净。斯达汉諾夫运动的经验特别清楚地表明，当局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痕，官僚在运用“分而治之”这个的确并不是他们发明的格言时非常坚决。不仅如此，为了安慰工人，这种强制性的计件劳动被称作“社会主义竞赛”。这个名称听起来就象一种嘲弄！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9—92页。

### 三、农 民

#### 1. 說农村在进行着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

宣称或者是无产阶级国家克服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并把它們組織起来，或者是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破坏“城市里的社会主义基础”。指责联共中央“在农业生产力增长的后面没有看到日益增长和尖锐的阶级矛盾”。

“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sup>①</sup> 或者是无产阶级国家依靠工业的高度发展

---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6页。——编者注

和电气化去克服千百万的小企业技术上的落后性，并且在集中化和集体化的基础上把它们組織起来；或者是資本主义在农村积蓄力量，破坏城市里的社会主义基础。

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农民——这是指不剝削別人劳动的基本农民群众——是同盟軍，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都依靠同它之間的正确联盟。关于农民問題，列宁在下面的話里早已正确地規定了我們現阶段的任务：“善于同中农达成协议，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只是牢牢地依靠貧农。”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2—43頁。

二、反对派看到并考虑到由于十月革命而发生的一切重大变化。无产阶级专政，工业、运输业、信贷业的国有化，商业的社会化，对外贸易的垄断，合作社——这一切为有成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創造了可能。这个建設已取得重大成就。但是反对派反对粉飾现实，反对掩盖在我国特別严重的危险。

粉飾现实必然会引起机会主义的錯誤。中央的提綱說：

“資本主义社会中工业的发展是以形成一种使基本中农群众破产、使他們由于无产阶级化而解体的国内市場为基础的。与此相反，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内市場形成过程是和資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内市場形成过程根本不同的。这里市場的发展不是依靠基本农民群众的貧困化和无产化，而是依靠中农和貧农福利的增长。”(中央的提綱，第一条)<sup>①</sup>

后来中央不得不承认，富农的“福利”也在增长。这就是說，貧农、中农及富农的“福利”都在增长！这番田园风光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并不存在。农村中阶级斗争正在农业发展的条件下展开。

<sup>①</sup> 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會議和中央全会決議汇编》，中文版第3分册第396頁。——編者注

同时农村在无产化，无力播种的农户在增多。中央委员会在农业生产力量增长的后面没有看到日益增长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只有在社会主义下，在没有阶级和农业根据大规模公有生产的原则组织起来时，才能谈到全体居民群众福利的同样增长。由列宁起草的党纲对问题就是这样提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政纲对问题就是这样提的。

摘译自《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农村工作的反提纲》（1927年11月），载于《真理报》1927年11月5日第254号第3版。

## 2. 指责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在农民问题上修正列宁主义

指责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在农民问题上对列宁主义作了八点修正：放弃马克思主义关于“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帮助农民沿着集体化道路改造农业”这一基本原理；对贫雇农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的社会基础这一点估计不足；把农业经济的希望寄托在富农身上；“否认农民所有制和农民经济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低估资本主义成分在农村中的发展并掩饰农民的阶级分化；认为富农总是无路可走的；“让富裕农民和富农发挥他们的经济潜力”；“企图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同他的电气化计划对立起来”。新资产阶级的代表利用这些修正主义倾向，“公然企图把农村政策扭转到资本主义轨道上去”。

在农民问题上，斯大林-布哈林集团正在修正列宁，他们修正的主要方面可以概括为以下八点：

（1）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即：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



业才能帮助农民沿着集体化道路改造农业。

(2) 对于雇农和贫农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地区的社会基础这个问题, 估计不足。

(3) 把我们农业经济的希望寄托在所谓“力量强的”农民身上——这在实质上即是富农。

(4) 忽视或公然否认农民所有制和农民经济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这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转向社会革命党人的学说。

(5) 低估资本主义成分目前在农村中的发展, 并且掩饰农民中正在发生的阶级分化。

(6) 创造了一种起瓦解作用的学说, 大意是: “富农和富农组织反正是无路可走的, 因为我国总的发展范围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所早就规定了的”<sup>①</sup>。

(7) 鼓励“富农合作社的核心长入我们的制度里来”<sup>②</sup>。“这个问题可以表述为, 必须让富裕农民和富农发挥他们的经济潜力”<sup>③</sup>。

(8) 企图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同他的电气化计划对立起来。按照列宁自己的意见, 只有把这两个计划结合起来才能保证过渡到社会主义。

新资产阶级的代表利用官方集团这些修正主义的倾向, 已经同我们国家机关的某些环节勾结起来, 他们正公然企图把我们在农村中的全部政策转到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并且, 附带说一下, 富农和富农思想的辩护人把他们的野心用关心生产力的发展、关心“一般的”商品产量的增长等等托词掩盖起来。事实上, 富农的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农的商品生产的增长正在压制和阻碍着所有其

---

① 布哈林:《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工农联盟》, 第 49 页。——托洛茨基注

② 同上, 第 49 页。——托洛茨基注

③ 《真理报》, 1925 年 4 月 24 日。——托洛茨基注

他农民經濟生产力的发展。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3—44頁。

五、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农民、即不剝削別人劳动的基本农民群众是一个重要的同盟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也就是說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和他們的正确关系。列宁用下面的話最确切地表述了現阶段我們在农民方面的任务:“善于同中农达成协议,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只是牢牢地依靠貧农。”(《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564頁<sup>①</sup>)反对派也正是这样看待工农关系問題的。

六、一九二五年党内形成了另一个修正主义思潮。最初否认富农的存在。

“富农是吓唬人的东西,是旧世界的幻影。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个社会阶层,甚至不是一个集团,甚至也不是一小撮了。这是已在垂死的东西。”(波古舍夫斯基,載《布尔什維克》,第九——十期〔第63頁〕)。

后来制造出一种麻醉人心的理論,說富农在很好地长入社会主义。“富农和富农团体反正是无路可走的,因为在我国总的发展范围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所早就規定了的。”(布哈林:《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49頁)

“我們給他(富农)帮助,而他也給我們帮助。到头来,也許富农的孙子还会因为我們这样对待他而向我們說声謝謝。”(尼·布哈林,載《布尔什維克》,一九二五年第8期)

关于富农的这些“甜蜜蜜的謊言”(不是共产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的謊言)和列宁学說的基础公然矛盾,因而娜·克魯普斯卡娅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73頁。——編者注

同志早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就不得不就布哈林的理論写道：

“布哈林同志在另外一点上也是不正确的。他說，他不是农村階級斗争的拥护者。不管是不是拥护者，但农村中階級斗争正在进行，不能不进行。”

我們看到，列宁对布哈林在无产階級专政下使富农、資本主义和階級斗争甜蜜化的言論作了一針見血的反击：

“在无产階級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階級同資产階級的階級斗争并没有終止，相反地，这种斗争会变得更广泛、更尖銳和更殘酷。”（《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綱》，《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 234 頁）<sup>①</sup>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問題的決議中写了下面一段話：

“大农是农业中的資本主义企业主，他們通常在經营业务时都雇有几个雇佣工人，他們所以同‘农民’有关，只是因为文化水平不高，生活习惯相同，亲自参加自己农場的体力工作。这是直接地坚决地与革命无产階級为敌的那些資产階級阶层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在农村工作中，共产党應該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同这个阶层进行的斗争上，把农村居民中被剝削的劳动者多数从这些剝削者的思想和政治影响下解放出来，等等。”<sup>②</sup>

列宁写道：

“以前欧洲的革命都是这样：由于工人軟弱，富农使共和制退到了君主制，使劳动人民的政权退到了剝削者、富人、寄生虫的专政……富农可以而且不难同地主、沙皇、神甫讲和，即使他們互相爭吵过，但是永远不会同工人階級讲和。……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他們屡次恢复过地主、皇帝、神父、資本家的政权。”（《工人同志

① 《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166 頁。——編者注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136 頁，全集无着重号。——編者注

們！大家都来进行最后一次决战！》，列宁研究院出版，第1—2頁）<sup>①</sup>

誰不了解这点，誰相信“富农长入社会主义”，他就只能使革命陷入困境。

七、然后又在农业中依靠所謂殷实的农民，即实质上依靠富农。

“我們对农村的政策应当朝下列方向发展，以放松和取消許多妨碍富裕农民的和富农的經濟增长的限制。应当对农民、对全体农民說：发财吧，发展自己的經濟吧，不要担心你們会受到压制”<sup>②</sup>，这是布哈林同志在第十四次党代表會議之前說的。

这一个从法国資产階級那里套来的而布哈林仿佛已經抛弃了的口号，又由中央委員什尔卓夫在一九二七年西伯利亚边区代表會議上再一次提出来了：“在大好时光积累吧！”

这是重复烏斯特里亚洛夫主义的口号，即重复新資产階級的口号，新資产階級幻想依靠富农和耐普曼，依靠他們在經濟上的发展，以便首先在經濟上、然后在政治上向工人政权坚决进攻。

过了两年，布哈林同志現在若无其事地突然宣传，应当“現在轉而压制富农及一般資产階級分子。这是我們应当实行的轉变，而且我們应当根据这个轉变的精神来进行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同一位布哈林同志現在写道：“应当轉入对資本主义分子、首先是对富农更为加紧的进攻。”（布哈林《关于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报告）

这就是某些无原則的政治家变来变去的典型！

但这也是說明，反对派並沒有徒然地进行斗争，既然它甚至能够在代表大会之前从布哈林那儿逼出这样言論来那它就是对的。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第37—38頁，全集无着重号。——編者注

② 見《真理报》1925年4月24日第92号第5版。——托洛茨基注

为什么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被宣布为在富农面前“惊慌失措”和“掠夺农民”的东西，现在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却被宣布是正确的？布哈林写道，“我们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来了个大规模的随机应变。我们解除了中农的许多羁绊，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农实行让步，使富农能够‘转动’”（布哈林：《关于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报告）。

来了个随机应变！列宁有一次写道：“如果按照布哈林那样随机应变，就会把很好的革命断送掉。”（《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145页<sup>①</sup>）现在不禁令人想起列宁的这些话。布哈林用随机应变的话徒然地企图掩盖这样的事实：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央委员会在农村问题上的政策不是列宁主义的政策，在反对派批评的影响下，现在不得不急剧地改变。最后，中央实行跟富农斗争的急剧转变（暂时还是口头上的）向党的政策的现在领导人提出下列问题。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布哈林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仍然有效。可是老实说那为什么要向这些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富农宣战呢？或者宣布新方针的事实本身说明这种“理论”是错误的。但是那就应当直截了当地宣布这一点。

**八、朝富农磕头的必然后果是脱离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社会支柱的雇农和贫农。**

中央书记之一柯秀尔同志曾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这样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在贫农当中有一定比例的根本就无所事事、简直可以称为懒汉的人？这些懒汉叫喊得最响，说我们执行富农的政策。”（速记记录，第313页）

资产阶级教授乌斯特里亚洛夫为此曾夸奖柯秀尔说：“由一位做地方实际工作的人员嘴里说出的这个神圣的真理是很不合反对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03页。——编者注

派官員們的口味的。”（烏斯特里亚洛夫教授的文章：《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加里宁同志說：“經營自然經濟的农村中的貧农是不幸的、生产中的殘废者”。（《論农村》，改善学生生活委员会出版社 1925 年版第 61 頁）。

人民农业委員斯米尔諾夫写道：“我們現代的农村痛恨富农，同样也看不起懶汉。对于例如在农忙时不和大家一样劳动，而是像通常所說的‘垂釣河边’或‘到森林里采蘑菇’的‘当家人’，勤劳的农家也只能如此对待……苏維埃政权和这样的‘貧农’当然是不能走一条路的。”（《苏維埃政权在农村中的政策》，国家出版局一九二五年版第 42 頁）

“說无产階級現在在农村中的主要支柱是貧农，这是老生常談，这象一个无能的小学生按照从哪里听来的公式做一切事。說共产党在农村中的主要支柱是貧农，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說只有貧农可能是苏維埃政权的主要支柱，苏維埃政权仅仅依靠貧农就能够維持政权，这是否对呢？……在沒有战争、沒有人对我们进攻的和平时期，我們可以維持住政权，但是那时我們就是沒有貧农也可以維持政权……且举征收农民参军为例：貧农中无文化、能力差的最多，而参军的是最强的、最高的……最后，誰在军队中起作用？在体力上比較强的、比較发展的……而你們怎么能指望，在战争时期、在国家真正危险时期能够仅仅依靠貧农……”（加里宁在一九二七年春特維尔党代表會議上的講話）

“貧农还有依賴心理，他們指靠国家政治保卫局，指靠領導，随便什么都指靠，只是不指靠自己，不指靠自己的力量。这种消极情緒和依賴心理應該从貧农意識中清除出去。”（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講話）<sup>①</sup>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275 頁。——編者注

上述中央委员会最有名的领导人的言论离开列宁关于贫农的言论之远，犹如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离开马克思主义一样。这不是无产阶级对贫农的估价，而是富农的估价，是从小业主的观点作出的估价。

只有富农、小业主、小资产阶级在观察必然会日益削弱贫农经济的贫农无产者化的过程时，才会说这些贫农是“懒汉”、“靠别人养活的”等等。

九、在关于农民所有制和农民经济的小资产阶级性质的问题上，也表现出离开马克思主义立场走向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

斯大林同志在谈到西方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时写道：“在俄国却不是这样。我国农业是不能循着这样的道路去发展的，因为单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基本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事实就不容许循着这条道路去发展。”（《论列宁主义基础》）<sup>①</sup>

“农民按其地位来说是非社会主义性的。但是，他们应当走上而且一定会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因为……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足以使农民免于贫困和破产的道路。”（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第56页）<sup>②</sup>

说这些话而只字不提农村阶级斗争和向富农作坚决斗争的必要性的人，就简直是重弹机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的老调。而这还作为列宁主义呈献给党！事实上这仅是粉饰富农、掩盖他们把农村扭转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的企图的政策。这是以虔诚的愿望来掩盖和粉饰我国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无怪乎《舵报》的立宪民主党人在读了布哈林和斯大林关于富农的言论后写道：

“严格地说，社会革命党人现在有权安心地束手以待：时间和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19页，全集无着重号。——编者注

② 同上，第8卷第79页，全集无着重号。——编者注

苏維埃政权本身在为他們效劳。”(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六日社論)

十、离开馬克思主义关于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帮助农民在集体化的原則下改造农业这一个基本原理,乃是修正主义。有人企图把列宁的合作社計劃和列宁的电气化計劃对立起来。事实上列宁本人认为合作社不是取消、也不是代替电气化計劃,而是对电气化計劃的补充。

請看布哈林說的話:

“当我们轉而采取新經濟政策的时候,对于解决这个問題列宁同志曾有一个战略計劃,而当他写論合作制的文章,即給我們留下在經濟政策原理方面的最后遺囑的时候,他有另外一个战略計劃。”(《布尔什維克》,一九二五年第八期)中央的提綱对布哈林关于列宁仿佛曾有两个战略計劃的臆想也表示支持(第十一条)。

对列宁思想的这种歪曲与指靠“殷实的中农”的方針、与关于反对派有“超工业化傾向”的叫喊声完全吻合,并且是向小資产階級对党的压力作直接的让步。把“合作社計劃”和电气化計劃对立,也就是否认大工业在經濟中和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的“主导”作用。

“增加财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資本主义的大工厂,沒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談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來說就更談不上社会主义了;我們在俄国,对于这一点比以前知道得具体得多了,我們現在所談的已經不是模糊的或抽象的恢复大工业的方式,而是确定的、精确計算出的、具体的电气化計劃。”(《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一分册第 260 頁)①

中央在反对派批評的压力下被迫退却,企图以对反对派的攻

---

① 《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399 頁。——編者注



击作廉价的报复：

“应当指出，反对派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相信能够通过合作社吸引基本农民群众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这是放弃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从而也是反对派直接背离了列宁主义。这种背离是反对派否认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总的取消主义方针的必然结果。”

只要看一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政纲，就会相信这种论断是荒谬的。由于企图把社会革命党人关于有不经过内部阶级斗争长入社会主义的单一的农民群众的典型观念归在列宁身上，这就更其是一种无可救药的诽谤了。其实这是在掩盖富农的作用及其控制合作社、使合作社成为自己发财工具的意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列宁主义的取消主义者是那些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两年内实际执行了掩盖富农的政策，向指出富农增长、富农积累及影响增长的人进行疯狂斗争的那些人。

**十一、和我们国家机关的一定环节搅在一起的新资产阶级的代表依靠官方方针的这些修正主义倾向，公然企图把农村政策扭转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而且富农及其思想家用关心发展生产力、提高“一般”商品率来掩盖自己的打算。其实富农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农商品率的增加只会减低和阻碍所有其余农户生产力的发展。**

中央委员会应当推翻这些指责或者申斥修正主义者。这些指责是以事实和文件作根据，它们是推翻不了的。所以只能实行后者。

摘译自《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农村工作的反提纲》(1927年11月)，载于《真理报》1927年11月5日第254号。

### 3. 宣传农民的阶级分化

声称在新经济政策下，“工业的落后延缓了农业的发展”，“破坏了城乡联盟，引起了农民中迅速的阶级分化”。出租土地和雇工现象年年增多。机器和贷款“经常落入富农和富裕农民手中”，成为剥削贫雇农和下中农的工具。全国只有8%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

虽然我们农业恢复的过程比较迅速，但农民经济的商品生产是很低的。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间，投入市场的商品总量为战前水平的64%，出口量仅为一九一三年出口量的24%。这除了由于农村本身一般消费量增加<sup>①</sup>以外，主要由于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差价，以及富农加紧囤积食物。甚至五年计划也不得不承认“由于一般地缺乏工业品，就使得城乡间货物的等价交换受到一定的限制，降低了可能投入市场的农产品数量”<sup>②</sup>。因此，工业的落后延缓了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延缓了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它破坏了城乡联盟，并且引起农民中迅速的阶级分化。

反对派在有关农民政策的有争论的问题上的看法，已经得到了完全、绝对的证实。在反对派尖锐批评的压力下，我们的总路线有了部分的改正，但是这些改正并没有阻止住官方集团继续倒向“力量强的农民”方面去的倾向。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从加里宁的报告来看，在第十四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没有一个字提到农村的阶级分化或者富农的增长。

① 由于人口增加和财产分散，产粮区百分之三十八的农庄购进粮食。——托洛茨基注

② 第117页。——托洛茨基注

这种政策只有一个结果：我们将要失掉贫农，并且争取不到中农。

近年来农业地区已经朝着资本主义阶级分化的方向走了很远。

在过去的四年间，无地和少地的阶层减少了35—45%。同时占有六到十俄亩（合十七到二十八英亩）的阶层增加了100—120%。占有十俄亩以上的阶层增加了150—200%。无地和少地阶层百分比的减少，很大原因是由于破产和流散。例如，在西伯利亚，在一年的期间，15.8%的无地农户和3.8%的占有二俄亩以下土地的农户流散和消失了。在北高加索，14.1%的无地农户和3.8%的占有二俄亩以下土地的农户流散了。

没有马匹和农具的农户要升入下中农地位是极端缓慢的。目前全国仍然有30%到40%没有马匹和农具的农户，这类农户中的基本群众正在下降到贫农的地位中去。

在北高加索，主要生产资料的分配如下：50%的最贫穷农户占有生产资料15%。中间阶层，占农户总数的35%，占有主要生产资料的35%。最高阶层，占农户总数的15%，占有生产资料50%。在其他省份（西伯利亚、乌克兰等地）也可以看到生产资料分配的同样情形。

上述土地和生产资料分配不平等的情况在不同阶层农户的存粮分配中也可以得到证实。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农村中58%的剩余粮食是在6%的农户手里。<sup>①</sup>

出租土地所占的比例一年年地增加。在多数情况下，出租土地的业主都是占有生产资料的大土地所有者。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为了逃税，出租土地的事情是隐秘的。贫农既缺乏农具又缺乏

---

<sup>①</sup> 《统计汇报》，1927年第4号第15页。——托洛茨基注

牲口，他們大部分是用租来的工具和牲口耕种土地。地租的条件和农具及牲口租費的条件几乎苛刻到奴隶制的程度。伴随着这种物质上的奴役，金融上的高利貸也在发展。

目前农民所有权的分裂不但沒有减弱、而是加强了阶级分化的过程。机器和貸款并没有在农业社会主义化上发生作用，而是經常落入富农和富裕农民的手中，从而加强了对雇农、貧农和下中农的剝削。

除了土地和农具集中在最高阶层的手中以外，他們使用雇工的程度在日益增高。

另一方面，或者由于彻底破产和流散，或者由于个别家庭成员出走，因此一批数目不断增加的“雇农”正从下层和部分中层农户中出现。这些剩余劳动力有些落在富农和或“力量强的”中农的奴役之下，有些流入城市，还有很多人找不到任何职业。

尽管这些情况已經发展得很严重，并且使得中农在經濟上的比重下降，但中农仍然是在数量上最大的农民阶层。把中农爭取到社会主义农业政策方面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主要問題。把我們的希望放在所謂“力量强的农民”身上，实际上就是把我們的希望放在中間阶层的进一步分化上。

只有对雇农的适当关心，只有以貧农和雇农同中农联盟为基础的路綫，只有同富农坚决斗争，只有工业化的道路，只有阶级路綫的合作社道路和阶级路綫的农村信貸制度，才能把中农吸引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上来。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4—46頁。

十三、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間，农村中随同十月革命而来的是人所共知的农村平等化。列宁在說到一九二〇年农村“中农化”的时候，指的正是这个。耕地极多和耕畜成群的农户大大减少了，

缺地和缺耕畜的农户也减少了。

这种平等化的过程大概一直继续到一九二二年。在新经济政策下，分化过程恢复了。请看共产主义科学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根据对一九二四——二五年度预算的调查共同整理的材料。这些材料描绘了农户按社会集团划分的鲜明图画。这是在供应国家粮食和出口方面都起决定作用的那些经济地区的材料。

所有农户分为五类：A、无产者，B、半无产者，C、中农，D、企业主，E、小资本主义。这里采用的按社会集团划分农户的方法有碍于准确规定富裕农户的数量和比重。然而，可能作出的修正并不改变基本的结论，因为很大一部分第四类的农户正在“发展”到资本主义的第五类去。

.....

应当极其仔细地看这些数字：第一，因为这是初次按社会集团划分所有农户的认真尝试，第二，因为这件工作是由权威机关做的，绝对不可能怀疑它们有所夸大。

我们把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农户合为贫农集团，它们在上述地区<sup>①</sup>大致占全体农户的25—40%。中农集团占40—50%，即占一半，而在两个地区（高加索和乌克兰）少于全体农户的一半。最后，按照共产主义科学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分类的包括企业主和小资本主义农户的这一类富裕集团占15—25%。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引用这个表格并加以解释时（《一九二七——二八年度控制数字》，第353—355页）写道：“资本主义上层掌握了农村相当大的一部分财富。”这一承认非常重要：它根本推翻了仿佛反对派过高估计了富农的神话。如果国家计划委员会不得不承认反对派两年来一再肯定的东西，却又企图安慰自己说，

---

① 指北高加索、乌克兰、乌拉尔和新西伯利亚区。——编者注

“然而，財富的主要部分并不在他們(資本主义上层)手中”，——必須认为，这种安慰是毫无用处的。如果不仅农村相当大的一部分財富、而且財富的主要部分都轉入了資本主义上层手中，这就会意味着資本主义在农村的胜利。以沒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安慰自己，是不聰明的。应当：一、承认反对派对富农在农村中的作用的估价是正确的；二、让全党和工人群众知道这点；三、由此作出实践的和政治的結論，而不要安慰自己說，資本主义虽然夺取了农村相当大的一部分財富，但沒有把它全部夺走。

某一类农戶的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比重不仅取决于他們在經濟中的比重，而且也取决于占有基本生产資料的比重。

生产資料中分配得最不平衡的是机器。貧农农戶只占全部机器总值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只有在乌克兰占12%。农村中的富裕农戶在全部机器总值中大致占40—60%。在上述地区，半数或半数以上的机器集中在他們手中。

耕畜的分配大致也和机器的分配一样，虽然这方面某些地区貧农的比重要比机器分配方面大些。應該指出，关于耕畜的統計是按耕畜头数計算，而不是按它的价值計算的，而这并不是一回事。富裕农戶的馬匹总是要好些，更值錢些。因此如果不按数量，而按质量和价值計算耕畜的分配，那末富裕集团的比重就会大大增加，而貧农集团的比重将下降。

播种面积的分配略有不同，虽然和上述关系也很接近。貧农集团的播种面积占10—25%，中农集团在各地区約占一半，富裕农戶占25—45%。貧农部分在播种面积上比在机器和馬匹方面的比重要高些。这是因为，相当大的一部分貧农农戶沒有生产資料，用按照奴役性条件从富农那里租来的牲口和农具耕地。其次許多貧农农戶的播种地只是記在他們名下，而实际上是属于富裕农戶的，富裕农戶租用土地，但为了偷稅，便把这片租用土地的播种面积不

算作富裕农户的，而算作贫农的。统计材料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从这些数字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基本生产资料的主要部分属于农村的富裕阶层。这些生产资料是富裕农户手中剥削贫农的工具。

摘译自《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农村工作的反提纲》  
(1927年11月)，载于《真理报》1927年11月5日  
第254号第3版。

当然，“原则上”统治集团就在当时<sup>①</sup>也并没有放弃农业集体化。他们只不过是按照自己的愿望把这项工作推迟几十年。后来担任农业人民委员的雅柯夫列夫在一九二七年写道，虽然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有通过集体化才能完成，但是“这项工作显然不是一年、两年或者三年能够完成的，也许十年也完不成。”他还说，“集体农庄和公社……现在和将来很长一个时期，毫无疑问都只不过是个体农业经济这个汪洋大海中的一些小岛。”实际上，那个时期只有8%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7—18页。

#### 4. 攻击官僚为争权夺利 而进行反富农斗争

声称逐渐出现的富农阶层“正重演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破坏社会主义的基础。富农“要十足的土地所有权”，“要取得自由处理全部收成的权利”，竭力在城市中造成相应代理人——自由商人和自由工业家，要处理剩余产品的权利，总之，富农同小工业家一起“力图完全恢

<sup>①</sup> 指1923—1926年。——编者注

复资本主义”。“誰处理剩余产品，誰就取得了国家权力”。說官僚需要无产阶级的帮助来粉碎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富农和小资产阶级，于是“为夺取剩余产品和权力而对小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表现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复辟的斗争”，即反富农的斗争。攻击这种斗争說，在“劳动者自己统治的条件下，反对富农的斗争本来不应采取那样震动的、惊扰的和野蛮的方式，本来可以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导致群众的经济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

同时新经济政策在初步阶段的发展，沒有受到坚决的阶级政策的制约和修正，将造成同样性质的更大危险。

二千五百万小农户是俄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根源。逐渐从这一大批人中出现的富农阶层，正重演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下埋装一个大地雷。这个过程的前途最终取决于国营企业增长和私营企业增长的对比。我们工业增长的缓慢步伐大大增加了农民中的阶级分化的速度和由此而产生的在政治方面的危险。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0页。

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斯大林和他的机器越来越大胆。特别是他们摆脱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限制性影响后。的确，官僚为了迎合它的同盟者的利益和要求，已经大胆地走得这么远，以致到一九二七年，就象一切有见识的经济学家一直看到的那样，大家清楚地看出他们的资产阶级同盟者的要求，由于他们的本性，是漫无止境的。富农要土地，要十足的土地所有权。富农要取得自由处理其全部收成的权利。富农竭力制造以自由商人和自由工



业家为形式的他自己在城市中的相应代理人。富农不想忍受以固定价格繳售其收成的强制办法。富农同小工业家一起，力图完全恢复资本主义。因此，对国家劳动的剩余产品展开了不可調和的斗争。在最近的将来，由誰来处理剩余产品——由新资产阶级呢还是由苏維埃官僚？——这成了下一个問題。誰处理剩余产品，誰就取得了国家权力。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小资产阶级（它帮助官僚打垮了劳动群众及其发言人左翼反对派的抵抗）和热月式官僚主义本身（它帮助了小资产阶级騎在农民群众的头上）之間的斗争。这是爭夺权力和爭夺收入的直接的斗争。

显然，官僚击败无产阶级的先鋒，摆脱国际革命的影响，和使不平等的哲学合法化，并不是为了向资产阶级投降，变成后者的仆从，而最后被拖离国家錢袋。官僚給自己的六年政策的后果吓得要死。因此它剧烈轉而反对富农和耐普曼。

摘自《斯大林評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年版下册第515—516頁。

在头脑简单的人的心目中，“第三时期”的理論和实践似乎推翻了关于俄国革命的热月政变时期的理論。然而事实上，这些理論和实践正好证实了关于热月政变的理論。热月政变的本质过去是、现在是、也不能不是社会性的。它代表着一个新的特权阶层的形成，一个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阶级的新下层的产生。覬覦这一身分的有两种人：小资产阶级和官僚本身。它們在〔打垮〕无产阶级先鋒队的抵抗的〔斗争〕中并肩作战。这一任务完成后，在它們之間爆发了殘酷的斗争。官僚由于孤立和脱离无产阶级而感到害怕了。它单凭自己的力量不能够粉碎在新經濟政策的基础上发展壮大和繼續发展壮大起来的富农和小资产阶级；它需要无产阶级的帮助。因此，它集中力量，把为夺取剩余产品和权力而对小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表现为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

这里，它不再同法国的热月政变有相同之处了。苏联的新的社会基础变得至高无上了。保卫生产资料 and 土地的国有化，是官僚的生死攸关的法則，因为这些是它的統治地位的社会根基。这就是它要进行反对富农的斗争的原因。官僚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支持下才能进行这一斗争，并把它进行到底。新反对派的代表們大批投降这一事实，是它已經取得这种支持的最好的证据。反对富农、反对右翼、反对机会主义——那一时期的官方口号——在工人們和許多左翼反对派的代表們听来，好象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复活。当时，我們警告他們說：問題不仅仅在于正在做的是什么事，还在于誰在做这些事。在苏維埃民主的条件下，即劳动者自己統治的条件下，反对富农的斗争本来不应采取那样震动的、惊扰的和野蛮的方式，本来可以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导致群众的經濟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但，官僚反对富农的斗争，是踩在劳动者背上进行的以一对一的决斗。因为角斗的双方沒有一方相信群众，因为它們都怕群众，所以斗争有着极其令人震惊的血腥性质。由于无产阶级的支持，斗争才以官僚的胜利而告終。可是，无产阶级在这个国家政治生活中所特有的重量并没有因此而增加。

同上，第 529—530 頁。

## 5. 妄談党应当采取的政策

声称“在农村正在激烈起来的阶级斗争中，党应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领导雇农、貧农和基本中农群众，并組織他們反对富农的剝削意向”。

认为“必須把有关土地整理和土地使用、稅收和党在农村的政策的全部基本法令”提交应当經常召开的貧雇农代表會議和代表大会“預先討論”；貧雇农代表大会和

代表會議应当給在黨領導下的“貧農聯合會”創造基礎，貧農聯合會應當是“無產階級專政在农村執行它的政策的支柱”，是“團結那些準備和蘇維埃政權一同建設社會主義农村、反對富農和投機分子、反對农村資本主義分子的基本農民群眾的中心”。

說“把农村貧農組織成爲集體農莊的任務”應當成爲“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務”。要盡力促進中農經濟的發展使中農逐漸過渡到大規模集體經濟，使農業合作制成爲貧農和中農“反對富農經濟勢力增長的鬥爭武器”。

宣稱“應當粉碎並不斷粉碎富農的基層組織”，“從各方面限制他們的剝削活動”。

**在目前正在進行的农村階級鬥爭中，黨必須不是口頭上而是實際上站在雇農、貧農和中農基本群眾前面，並且把他們組織起來反對富農的剝削企圖。**

爲了加強農業無產者——這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階級地位，需要採取我們在工人階級的狀況那一節里所提出的一系列措施。

必須不再使農業貸款在大多數情況下成爲农村富裕階層的特權。我們必須結束目前的狀況——貧農的微乎其微的儲蓄不是用於他們所希望的用途上，而是用於爲富裕階層和中等階層服務上。

必須迅速發展集體化耕作，用以抵銷农村私人所有制的增長。必須有步驟地、逐年資助貧農組織集體農莊。

同時，我們必須更有步驟地幫助集體農莊以外的貧農，方式有：完全免稅，適當的土地政策，農具貸款，吸收他們參加農業合作社。“使蘇維埃活躍起來，從而造成非黨農民的活動中心”（斯大林-莫洛托夫），這個口號既沒有階級內容，並且實際上會加強農

村上层的支配作用，我們必須采取下面的口号来代替它：“建立由雇农、貧农和接近雇貧农的中农所組成的非党活动中心。”

我們必須建立一个真正有計劃的、普遍的、长期的貧农組織，这个組織以生活中的实际政治和經濟問題为中心，諸如选举問題，稅收問題；对貸款、机器等的分配的影响、土地分配和利用、合作社的建立、貧农从合作劳动中得到現金報酬等等。

党應該用一切手段促进中农在經濟上的发展——在谷物价格上采取明智的政策，在組織貸款和合作社方面使他們可以得到貸款和加入合作社，有步驟地、逐漸地使这个人数最多的农民阶层可以得到大規模的、使用机器的、集体經濟的好处。

党在日益增长的富农階級这个問題上的任务應該是从各方面限制他們的剝削活动。我們絕不能允許繼續违背我們宪法載有的剝夺剝削階級在苏維埃中的选举权的条款。下述的措施是必需的：实行累进稅制度；采取国家立法措施保护雇农和規定农业工人的工資；在土地分配和土地使用問題上采取正确的階級政策；在向农村提供拖拉机和其​​他生产工具問題上也同样采取正确的階級政策。

农村地租制度的发展，目前使用土地的办法（按照这个办法，土地由土地公社处理，而土地公社是处在一切苏維埃的領導和控制之外并且日益处于富农的影响之下），第十四次苏維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在每年分配土地时“給以补偿”的決議——所有这一切都在破坏着土地国有化的基础。

加强土地国有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把这些土地公社从属于国家地方机关，在处理一切有关土地分配和使用的問題上确立地方苏維埃（清洗其中的富农分子）的有力控制。这种控制的目的應該是最大限度地保护貧苦和无力的的小农的利益免受人数众多的富农的侵害。必須在我們現有經驗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补充的措施，

用以制止土地公社中富农所占比例的过分增长。尤其是，必須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把作为土地出租者的富农置于农村苏維埃政权的完全和絕对的監督和控制之下。

**党應該粉碎一切旨在取消和破坏土地国有化的傾向——土地国有化是无产階級专政的一个基本支柱。**

目前实行的普遍农业稅制度應該改变，改变的方針是：完全免除 40—50% 最貧困农戶的稅收，并且不許因此在中农基本群众身上增加任何稅收作为补偿。收稅的日期應該适合下层納稅人的利益。

應該撥出为数要大得多的一笔款項用于建立国营农場和集体农庄。必須最大限度地放寬新建立的集体农庄和其他形式的集体化組織归还貸款的期限。被剝夺选举权的人不能作为集体农庄的庄員。把小生产变成集体大生产的思想應該貫穿到合作社的全部工作中去。在机器供应方面必須坚决实行階級路綫，必須对欺詐的机器公司特別进行斗争。

分配土地的工作必須繼續进行，其一切損失由国家負担，首先必須关心集体农庄和貧苦农戶，最大限度地保护它們的利益。

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應該保证貧农和中农里的基本群众起碼能够維持和逐漸提高他們現有的經濟水平。應該采取措施消除秋季和春季之間的谷物差价。因为这种差价对于农村貧苦阶层來說損失极大，而其全部利益都归于上层。

不仅必須大大地增加貧农基金的撥款，并且必須彻底改变农业貸款的方針，使之保证貧农和无力的中农能得到低利长期貸款，并且取消現在实行的保证人和担保的制度。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 1963年版第46—49頁。

**农村社会主义建設問題就是要在大規模的、使用机器的、集体**

**經濟的基础上改造农业。**正如列宁在《論合作制》一文里所說的，对于农民基本群众來說，合作制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简单的道路。这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維埃制度給予农民的巨大利益。**只有发展农业机械化这个方法才能为社会主义合作制（或者集体制）造成广闊的基础。沒有生产方法上的技术革命——这就是說，沒有农业机器，沒有作物輪作制，沒有人造肥料，等等——，农业真正集体化的工作就不可能成功和展开。**

供銷合作社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导向社会主义：（一）这个过程在社会主义成分（特别是大工业和工会）的經濟和政治的直接影响之下发生。（二）农业合作社发挥貿易职能的过程逐渐导致其本身的集体化。农业合作社的阶级性质不仅决定于参加合作的农民的不同阶层在数量上的比重，而且尤其决定于他們在經濟上的比重。**党的任务就是要尽力使农业合作制成为貧农和中农的真正联盟，成为貧农和中农反对富农經濟势力增长的斗争武器。我們必須有步驟地和坚持不懈地把农业无产者引导到建立合作社的事业中来。**

只有在参加合作的人口得到最大限度独立的条件下才可能有成功的合作社結構。合作社同大工业和无产阶级国家間的真正联盟应该是各合作社組織的正常制度联盟，不允許官僚主义的控制方法。

**党领导显然背离布尔什維克在农村的基本路綫，他們倾向于寻求富裕农民和富农的支持；他們用反无产阶级的言詞掩盖他們这种背离行为，說什么“穷人的幻想”，“吃白飯”，“懶汉主义”，并說在保卫苏联上貧农的价值不大——鉴于所有这些情形，我們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牢記我們党綱上的話。在明确指出我們同中农联盟的极端重要性之后，党綱簡單明了地宣称：“俄国共产党在其全部农村工作中仍旧是依靠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农民力量。**

党首先把他們組織为独立的力量，建立农村党核心，建立貧农組織，建立农村无产階級和半无产階級分子的特殊类型的工会，諸如此类。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使他們同城市无产階級联合起来；使他們摆脱农村資产階級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sup>①</sup>

同上，第 49—50 頁。

**給予貧农真正的支持，使一般中农群众接近貧雇农，把后者組成独立的階級力量——所有这一切在民族州和共和国里有着特別重要的意义。如果不把雇农真正組織起来，不建立合作社和組織貧农，我們就有使我国东方落后地区停留在他們传统的奴役状态中，使这些地区的地方党組織完全失掉真正下层階級党员的危險。**

同上，第 65 頁。

二十七、必須用集体組織的更为迅速的发展来对抗农村中发展着的私人农場。

中央提綱的作者莫洛托夫同志的观点是极端錯誤的，他在不很久以前在这个极重要的問題上提出了一个根本錯誤的方針：

“……决不能陷入关于就在目前条件下立即使广大农民群众集体化的貧农幻想之中。”（維·莫洛托夫：《党在农村的政策》，国家出版局版第 64—65 頁）

恰恰相反，在大規模公共生产基础上改造千百万极小的貧苦农戶的基本道路正在于他們的集体化。

只有把貧农組織为集体农庄，才有可能在比較大的規模上实现給予貧农以經濟援助的任务。把农村貧农組織成为集体农庄的任务，应该作为我們农村工作中的中心任务提出来。只有把农村

---

<sup>①</sup> 參看《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93 頁。——編者注

中党、合作社和苏維埃机关吸引来参加这个工作，而政府从国家預算中撥出足够的款項，以根据充分优惠的条件供应組織起来的集体以生产資料，才能胜利地完成这个任务。現在給貧农的撥款数目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分散到千百万农户，因而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实际支援的任务。必須年复一年地对撥給組織成集体組織的貧农以相当数量的款項作为經濟援助。应当从来自农村、熟悉农村情况的人們当中培养集体組織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应当在农村小学和农村青年学校中宣传集体农庄的优越性。

摘譯自《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农村工作的反提綱》(1927年11月)，載于《真理报》1927年11月5日第254号第4版。

应当对国营农場的建設投入更多的資金。

同时必須更加經常地支援沒有参加集体組織的貧农农户，办法是完全免除他們的賦稅，实行适当的土地整理政策、提供經濟設備的貸款、吸收参加农业合作社等等。

同上。

在农村正在激烈起来的階級斗争中，党应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領導雇农、貧农和基本中农群众，并組織他們反对富农的剝削意向。

同上。

三十五、必須真正地、有計劃地、普遍地、巩固地組織貧农圍繞在生动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周围：如改选，稅收运动，对信貸、机器等的分配的影响，土地整理和土地使用，合作化，貧农合作基金的使用等等。

如果我們不建立真正巩固的組織，不确切指出貧农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那时团结貧农只会停留在口头上。

我們应当粉碎并不断粉碎富农的基层組織（不論它們用什么



形式作掩盖)。

雇农自然应当有完全独立的阶级组织(除了苏维埃和合作社外)。这就是工会。

中农的基本群众应当组织在村苏维埃和合作社周围。

贫农则正因为他们他们是贫农,需要有补充的组织(除了苏维埃和合作社以外)。

必须把有关土地整理和土地使用、税收和党在农村的政策的全部基本法令提交贫雇农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预先讨论。

贫雇农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不应是偶而召开、而应经常召开。

和富农及富裕农民上层成立只能起反革命作用的“农民协会”的意图相对立, 这些贫农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今后应当给组织在我们党领导下的“贫农联合会”创造基础, 在这个联合会中应保证无产阶级的影响, 这个联合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执行它的政策的支柱。在农村以贫农和中农为一方、富农为另一方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 这个贫农联合会应当保证和那些反对富农的基本中农群众的友好关系; 贫农联合会尽力支持中农的这个斗争(在合作社、苏维埃等等中), 它是团结那些准备和苏维埃政权一同建设社会主义农村、反对富农和投机分子、反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基本农民群众的中心。

三十六、党应当通过正确的采购价格政策, 组织中农也能享受到的信贷和合作化, 来尽力促进中农经济的发展, 逐渐不断地使这个人数最多的农村阶层过渡到采用机器的大规模集体经济去。

三十七、党在对待日益增长的富农阶层方面的任务应当是用一切办法限制他们的剥削意图。绝对不许违背宪法中剥夺农村剥削阶层在苏维埃选举时选举权的条款。必须实行: 急剧的累进税; 国家立法保护雇佣劳动和调整农业工人工资的措施; 在土地整理和土地使用方面正确的阶级政策。保护贫农不受奴役性合同的

損害，其中包括在貧农出租土地时从立法上予以保护。应当改变农村机器供应的整个政策，要比迄今为止更多地增加对貧农的供应。

同上。

## 6. 断言全盘集体化沒有消灭富农， 反而培植了“资产階級集体农庄”

断言“由于缺乏技术和文化基础”，全盘集体化沒有消灭富农階級，不能阻止农村的階級分化。相反地，为苏維埃社会基本階級矛盾的加深作了准备。

說集体化以后，“农民和国家之間的斗争还远远沒有結束”，“个体化傾向和集体化傾向的斗争还在整个农村居民中进行”：大多数集体农民不願把余粮卖给国家；私养家畜大大超过公养家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場出租土地的现象广泛流行；某个居民阶层剝削另一个居民阶层的现象并没有消失；市場关系“加强着个体化傾向，加深着农村的社会分化”。

认为“級差地租”在集体农庄之間以及在农庄內部造成“根本性的社会对立”，官僚的无限权力促进社会分化。农庄之間的分化表现在：富有的农庄能够使用“更多的肥料和更多的机器”，雇用穷农庄的劳动力。农庄內部的分化表现在个人消費和私营經濟上。說一九三五年集体农庄的平均收入約为四千卢布，有些集体农庄每戶收入高达三万卢布；大集体农庄每个庄員的收入等于“平均的”工人工資和低等集体农民的十倍到十五倍。农村中“形

成一种资产阶级集体农庄”——“百万富翁集体农庄”。

声称国家政权在设法寻找强有力的“田间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支持和友谊”，“寻找百万富翁集体农庄的支持和友谊”。一部分人的“自觉的资本主义趋势”受到官僚的“有意识的鼓励”。

**“全盘”集体化，即使在今后两、三年内真正实行，也决不是表示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生产合作社的形式，由于缺乏技术和文化基础，并不能阻止小商品生产者内部的分化以及资本主义分子从他们中间出现。为了真正消灭富农，需要在农业技术方面来一次彻底的革命以及把农民同工业无产阶级一起改造成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工人和无产阶级社会的成员。但是，这是几十年以后的远景。由于个体农民的工具和工具占有者的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占优势，正是在相对成功的集体化以后，亦即随着农业生产的普遍增长，农民的分化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发生和增强。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具有新的技术因素的集体化将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如果没有这种提高，集体化在经济上就没有什么道理，从而也就维持不下去了），那么这就会立即在现在人口已经过多的农村中造成一千万、二千万甚至更多的过剩工人，即使有最乐观的计划，工业也不能够吸收这么多工人。随着过剩的，也就是说，在集体农庄找不到位置的半无产和半贫民化的人口增长，富裕的集体农庄以及贫穷的和中等的集体农庄内部的富裕农民将在另一个极端相应地增长起来。由于领导没有远见，预先宣布集体农庄是社会主义企业，资本主义农民分子就能把集体化当作自己最好的掩护，结果对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更加危险。**

因此，目前过渡时期的经济成就，并没有消灭基本矛盾，而是为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基础上更深一层地再现这些矛盾作了

准备。

摘譯自《苏联的发展問題》(1931年4月4日)，  
紐約1931年版第7—8頁。

如果說工业企业“原則上”是社会主义企业，那末，集体农庄还不能这样說。集体农庄所依靠的不是国家，而是集体所有制。同分散的个体經濟比較起来，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集体企业是不是会导致社会主义，那还要看一系列的条件，其中有一部分条件是在集体农庄的范围以內，有一部分是在苏維埃制度的一般条件以內，还有一部分——并且是同样大的一部分——則在世界舞台上。

**农民和国家之間的斗争还远远沒有結束。**目前还很不稳定的农业組織，只不过是两个斗争中的陣营在彼此之間进行了可怕的內战以后的一种暫时的妥协。的确，90%的农庄已經集体化，94%的农产品是从集体农庄来的。即使考虑到有一定百分比的集体农庄是一种假象，在它們那里基本上是个体农民，但还是必須承认，战胜个体經濟的工作看来至少已經完成了十分之九。然而，农村地区的各种力量和傾向之間的真正斗争，远远不是局限于个体农民和集体农民之間的針鋒相对的对立这样一个范围。

为了安撫农民，国家认为自己不能不向农村的私有的和个体化傾向作很大的让步，首先是把“永久”使用土地权正式轉交給集体农庄——这就是在实质上废除了土地的社会化。这是一种法律上的假象嗎？从力量对比来看，这种假象有可能成为现实，并且在最近的将来会使全国范围的計划經濟遭到巨大的困难。然而，更加重要的是，国家被迫恢复了个体农民經濟，农民有了自己的小块田地，还有了自己的牛、猪、羊、家禽等等。由于这种违反社会化和限制集体化的做法，农民們才溫順地——虽然还没有多大热情——同意了在集体农庄中干活，而这样一方面可以使他們有机会完成

对国家的交售义务，同时也可以使他們自己得到一些东西。这种新的关系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形式，因此即使苏联的统计学家比较诚实，也很难用数字来衡量这种关系。然而，从许多事情看来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从农民个人的角度来看，自己的小块田地并不比集体农庄不重要。这一点意味着，个体化倾向和集体化倾向之间的斗争还在整个农村居民中进行，同时斗争的结果还没有决定。那末农民们究竟倾向于哪一条道路呢？他们自己还不太清楚。

一九三五年年底农业人民委员说，“到目前为止，在完成国家的粮食供应计划方面，我们遭到了富农分子的猖狂反抗。”换句话说，这一番话意味着，大多数集体化农民“到最近”（今天的情况又怎样呢？）还认为把粮食交给国家是一件对自己不利的事，他们倾向于搞私营商业。这种情况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证明，即国家制定了严厉的法律来保护集体财产，防止集体化农民自己进行掠夺。很有启发的是，集体农庄向国家保险的财产是二百亿卢布，而集体化农民所保险的私有财产是二百一十亿卢布。如果这种对比不一定意味着分散的农民比集体农庄富足，那末无论如何说明了这一点，即农民在私有财产保险方面比在公共财产保险方面要慎重得多。

从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样说明问题的是畜牧业的发展情况。马的数目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以前是在不断地减少，只是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年才略有增加；而牛的数目到去年已经增加到四百万头。在一九三五年这个条件有利的年头，养马计划只完成了94%，而养牛则大大超过了计划。这些材料的意义从这样一个事实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即马只能是集体财产，而牛则已经是大多数集体化农民可以私有的牲畜。这里只需要补充这样一点，即在草原地区，集体化农民作为一种例外的情况可以拥有一匹马，因此这些地区的马比集体农庄的马增加得快，而集体农庄的马又比国

营农场的馬增加得快些。这些情况并不是說，小私有經濟比大規模社会化經濟优越，而是說明从小私有經濟过渡到大規模社会化經濟，从野蛮主义过渡到文明，其中隐藏着許多困难，而这些困难都是不能仅仅用行政压力来克服的。

“法权永不能超过社会經濟制度以及由此經濟制度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发展程度。”出租土地虽然是法律所禁止的，实际上却很广泛地流行着，不仅如此，还以最致命的分成制形式流行着。这个集体农庄的土地租給那个集体农庄，有时租給一个外面的人，最后，有时甚至租給本农庄比較有个人事业心的庄員。說来难以相信，国营农场——即“社会主义”企业——居然也出租土地。另外，尤其說明問題的是，干这种事的竟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国营农场！在这个维护法律的高級机关的保护下，国营农场的經理向农民提出的租地条件，几乎完全是从旧地主与临时工訂的契約中抄下来的。我們从这些方面看到了官僚剝削农民的情况，这种官僚已經不再具有国家代理人的性质，而具有半合法地主的性质了。

尽管一点也沒有扩大这种丑恶現象的范围——这种現象当然无法統計——我們还是不能不看到这种現象所具有的巨大的带有征兆性的意义。这种現象明白无誤地证明了，在这个包括絕大多数人口的还极端落后的經濟部門，资产階級傾向多么强烈。与此同时，尽管所有制关系具有新的結構，市場关系还是不可避免地加强着个体化傾向，加深着农村的社会分化。

平均計算，每个集体农庄的收入大約四千卢布。但是，关于农民的“平均”数字甚至比关于工人的“平均”数字还要具有欺騙性。例如在克里姆林宮，有人汇报說，集体化漁民在一九三五年的收入比一九三四年增加了一倍，即每人得到一千九百一十九卢布，后面这个数字得到了掌声，这一点說明这个数字大大超过集体化基本群众的收入。另一方面，有些集体农庄的每戶收入高达三万卢布，

这还没有把个人经济的货币和实物收入计算在内，也没有把整个企业的实物收入计算在内。总的说来，这些大集体农庄的每个庄员的收入等于“平均”的工人工资和低等集体化农民收入的十倍到十五倍。

收入的等级只是部分地决定于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勤奋程度。集体农庄和农民个人的土地，由于气候、土壤和作物类别的不同以及距城市和工业中心的远近不同，而必然处于非常不平等的状态。城乡的对立不仅没有在五年计划期间减轻，反而由于城市和新工业区的迅速发展而大大尖锐化。苏维埃社会的这种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对立，主要是因为级差地租，不可避免地会在集体农庄之间以及集体农庄内部派生出矛盾。

官僚的漫无限制的权力，也是促使社会分化的一个同样有力的工具。他们掌握着工资、物价、税捐、预算以及信贷这样一些杠杆。中亚地带有许多种植棉花的集体农庄，收入很不平衡，这主要是由于政府规定的价格不同，而不是由于集体农庄庄员的工作好坏。某个居民阶层剥削另一个居民阶层的现象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掩盖起来了。几万个“富裕”集体农庄庄员的幸福是牺牲其他集体农庄庄员和产业工人的利益而得到的。使所有的集体农庄庄员都达到富裕的水平，是一个比牺牲多数人而使少数人拥有特权要困难得多和费时得多的任务。一九二七年内左翼反对派曾宣称，“富农的收入已经增加得比工人的收入多到无法衡量的地步”，这个说法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上层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已经增加得比基本工农群众的收入多到无法估计的程度。目前物质生活水平的差别也许比消灭富农以前还要悬殊。

集体农庄内部的分化，一部分表现在个人的消费上；一部分表现在同集体农庄毗连的个人企业上，这是因为集体农庄本身的基本财产已经社会化。集体农庄之间的分化已经产生了更为深刻的

后果，因为富有的集体农庄有机会使用更多的肥料和更多的机器，因而可以更快地富足起来。取得成就的集体农庄往往雇用穷苦集体农庄的劳动力，而当局对此闭眼不问。把价值不等的土地分配给集体农庄，这就大大地促进了集体农庄之间的进一步分化，并因而形成一种资产阶级集体农庄，或者叫做“百万富翁集体农庄”，甚至现在它们还被人这样称呼。

在农民发生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国家政权当然可以作为调整者进行干预。但是朝哪个方向做呢？干预到什么限度为止呢？进攻富农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庄员，这就会同农民当中比较“进步的”阶层发生新的冲突，而这种阶层的农民只是经历了一段痛苦的停顿以后，现在才开始感到迫不及待地需要一种“幸福的生活”。不仅如此——而这一点还是主要的——国家政权本身变得越来越不能进行社会主义监督了。在农业当中也象在工业中一样，国家政权设法寻找强有力的、顺利的“田间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支持和友谊，寻找百万富翁集体农庄的支持和友谊。国家政权最初所关心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到最后就只关心自己了。正是在消费与生产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农业中，集体化已经为官僚的寄生主义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并为这种寄生主义同集体农庄的上层集团相互帮助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集体农庄的庄员在克里姆林宫的庄严会议上献给领导人的祝贺性“礼品”，只不过是它们向地方政权代表经常纳贡的象征性表现。

由此可见，低生产水平同社会主义的甚至合作社（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形式不断地发生冲突的情况，在农业中比在工业中还要严重得多。归根到底，官僚正是从这种矛盾中产生的，而它们反过来又加深了这种矛盾。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8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3—97页。



即使在所謂“无階級的”社会的下层群众内部，无疑也存在着与官僚内部所存在的完全一样的集团，只是表現得不那么鮮明而且人数不多，自觉的資本主义趋势成为集体农庄中的富裕的人們的主要特色，这些趋势只是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人的特色。但是这个阶层給自己准备了发展小資产階級趋势的广泛基础，这种趋势也就是以普遍貧困为代价来积累个人財富，它受到官僚的有意識的鼓励。

摘譯自《資本主义的垂死掙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1938年9月3日)，紐約1946年版第48頁。

#### 四、新資产階級

說資本主义势力在农村和城市巾都有增长，其主要表現是农村資产階級和城市私人資本家的“增多”。“农村上等阶层和城市資产階級分子正越来越紧密地同我們国家-經济机关的各种环节联結起来”。私人資本“正在从新开始原始积累的过程，首先是在商业領域，然后是在工业領域”，它已“不滿足于作中間人了”。

声称“官僚机构(一直包括它的最上层)对于富裕的、在进行积累的、在发财致富的上层的索求”“有求必应”。由于新資产階級和富农比重不断增加、他們和官僚接近、领导的总的方針不正确，富农和耐普曼“能够影响基层苏維埃机关的成分和政策”。

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危机是自然的，而且归根到底，危机是調节經济的唯一办法，也就是协调工业中不同部門之間的关系和总产量与市場容量之間的关系的唯一办法。但在我們苏維埃經

济——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間物——中，不能认为商业和工业危机是协调国民經济不同部分关系的正常或者甚至必然的道路。危机会夺走、消灭或者分散国家财产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当中有一些便落入中間人、零售商手中，总之是落到了私人資本手里。由于我們所继承的是极其支离破碎的工业，在战前这种工业的各个部分彼此所起的作用与我們現在所要求的比例完全不同，要想使工业的不同部分通过市場关系适应农民經济从而达到工业各个部分的协调，是十分困难的。如果我們完全听命于危机的行动来实现必要的改組，那末就必然会把一切利益都让給私人資本，后者現在已經立足于我們和乡村之間，也就是立足于我們和农民及手工业者之間了。<sup>①</sup>

私人商业資本現在已获得相当大的利潤。它越来越不满足于作为中間人了。它企图組織生产者和从国家手里租用工业企业。換句話說，它正在从新开始原始积累的过程，首先是在商业領域，然后是在工业領域。显然我們所經歷的每次失敗和每次損失，对于私人資本說来都是一种收获：首先，因为这会使我們的地位削弱，其次，因为这种損失的相当大一部分会落入新資本家的手里。

在这种情况下我們有什么办法能够成功地打退私人資本呢？是不是有这种办法呢？确实有的——那就是有意識地对市場、一般說来就是对經济工作进行計划控制。工人国家手里掌握了工业的基本生产能力以及交通運輸和信用手段。我們不需要等待局部危机和总危机来暴露我国經济的各个因素間缺乏协调的情况。我們不需要在暗中摸索，因为市場的主要关键都掌握在我們手里。我們能够——而且我們必須学会！——不断改善对經济的基本口

<sup>①</sup> 不待說，在最終建成社会主义經济以前，我們还会有許多次危机。問題在于使他們的次数减至最低限度并使每次危机的危害性減輕。——托洛茨基注

素所作的估計，預測這些因素在生產過程和市場方面未來的相互關係，使所有經濟部門在數量方面和質量方面都協調一致，并使整個工業能夠適應農村經濟。這就是使“結合”能夠兌現的真正道路。

摘譯自《論城鄉“結合”》(1923年底)，載于《新方針》倫敦1956年版第92—94頁。

列寧說汽車常常駛往我們敵對力量所指示的地方，他這麼說使我們注意兩個極其重要的事實。第一，在我們社會里存在敵視我們事業的力量，這就是富農、新資產階級和官僚；他們利用我們的落后和我們政治上的錯誤，他們依靠國際資本主義的支持。第二，這些力量是強大到能把我們政府的、經濟的汽車推向錯誤的方向，並且最後甚至企圖(開頭用隱蔽的形式)把汽車方向盤抓過去。

列寧的話給我們規定了如下的責任：

(1) 對富農、新資產階級和官僚這些敵對力量的增長要提高警惕；

(2) 要記住，隨着國家的全面恢復，這些力量將竭力聯合，把他們的“修正案”加進我們的計劃里去，對我們的政策施加日益增大的壓力，通過我們的各種機器來滿足他們的利益；

(3) 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措施去削弱這些敵對力量的增長、聯合和壓力，防止他們在實際上(雖然表面上看不出來)造成兩個政權制度，這是他們一心想達到的目的；

(4) 把這些問題的全部真相坦白地告訴全體勞動群眾。其中包括“熱月”的危險和反對這一危險的鬥爭這個根本問題的真相。

自從列寧發出他的警告以來，我們有許多事情改善了，但是也有許多事情更壞了。國家機器的影響在增長，但同時工人國家的官僚化也在發展。由於資本主義勢力在農村中的絕對和相對增長以及在城市中的絕對增長，因此我國資產階級分子開始產生政治上的自覺意識。這些分子對於他們在工作中和在社交中接觸到的

那部分共产党人，极力进行腐化，而其结果并不是总不成功的。斯大林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向左开火”的口号不能不促使党内右派分子和国内的资产阶级-烏斯特里雅洛夫分子更进一步联合起来。

.....

**资本主义成分的主要表现是农村阶级分化和城市私人资本家的增多。农村的上等阶层和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越来越紧密地同我们国家一经济机关的各种环节联结起来。而这个机构常常在统计数字的掩盖下帮助新资产阶级，使它的增大自己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的活动取得成功。**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4—25页。

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和私营的贸易机构占去我们国民收入的一个很大份额，超过总生产量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近年来，私人资本以商业中间人的资格所经营的贸易，大大超过了全部贸易额的五分之一，每年的绝对数字则超过了五十亿。一直到現在，一般消费者所需产品的50%以上是来自私人资本家之手。这对于私人资本家则成为他们利润和积累的根本来源。农业价格和工业价格的差额，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差额，农村经济不同部门在不同地区和季节的价格的差额，国内和国际价格（走私货品）的差额，这些都是私人收益的经常来源。

**私人资本在贷款上获取高利，在政府公债上赚钱。**

私人资本在工业上的活动也是很可观的。虽然在最近这个时期私人资本的相对数字减少了，但它的绝对数字仍在增长。登记的私人资本经营的工业每年总产值为四亿。小型工业、家庭工业和手工业每年总产值为十八亿以上。总计，各种非国营工业加起来占全部商品生产的五分之一，占全部市场商品的40%左右。属于非国

营工业的广大群众和私人資本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商业資本和家庭工业資本对于手工业工人群众各种公开的或隐蔽形式的剝削是新資產階級积累資本的一个极其重要并且日益增大的来源。

同上,第 25—26 頁。

在新經濟政策下,私人資本的作用在工业落后的边疆地区异常迅速地增长着。在这些地区,經濟机关常常把它們的賭注完全押在私人資本家身上。它們确定物价时不考虑貧农和中农群众的实际状况。它們人为地降低雇工的工資。它們无节制地在工业同供給原料的农民之間实行官僚的私人中介的办法。它們把合作社导向使乡村富裕阶层得到更多好处的方向。它們忽視特別落后的畜牧业者和半畜牧业者的利益。主要問題——如何實現工业建設計劃,特別是农业原料生产的机械化計劃——完全被置諸脑后了。

同上,第 64 頁。

三十一、中央也不能容許地拖延了反对派早在七月全会上提出的另一个建議的执行。

农村中有了大量存糧。这些存糧集中在农村富裕阶层手中,并且远远超过必需的防灾儲备。另一方面,虽然这是第三个丰收年,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仍嫌不足。虽然这是第三个丰收年,粮食出口沒有增加,反而减少下去。虽然这是第三个丰收年,粮食采购量比去年还少,而粮价却已在上涨,农民卖糧的价格和消費者买糧的价格之間的悬殊太大。这种悬殊滋养了商业寄生阶层。富农存糧显然在阻碍工业和整个經濟的經濟发展,破坏苏維埃政权的計劃。

必須通过征借的形式从富农手中取得一部分存糧。这个措施只涉及到 10% 的农户,并且能够提供不少于一亿五千万普特的粮食,这些粮食可以成为出口、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新动力。强制执行这一措施是有利于工人階級和貧农的。

如果工人阶级从自己的低工资中还能够并且在支持工业化的公债，那末使农村上层用自己那沉重地压在国民经济身上的一部分存粮来支持苏维埃国家、支持出口和工业，就不应有什么障碍了。为此只要不限于口头上向富农进攻，而要立即转入行动。

摘译自《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农村工作的反提纲》(1927年11月)，载于《真理报》1927年11月5日第254号第4版。

给予人数众多的农村剥削分子以选举权的一九二五年的“指令”，仅仅是下列情况的明显表现之一：官僚机构(一直包括它的最上层)对于富裕的、在进行积累的、在发财致富的上层的索求何等地有求必应。这个实际破坏苏维埃宪法的指令的取消，无疑是反对派批评的结果。但是按照新指令实行的最初一批改选，在许多地方已经暴露了得到上面鼓励的、尽量缩小富裕阶层中被剥夺选举权人数的意图。然而，问题的中心已不在于此。在新资产阶级和富农的比重不断增加，他们和官僚接近，领导的总的方针不正确的情况下，富农和耐普曼甚至被剥夺了权利，也仍然能够在幕后至少影响基层苏维埃机关的成分和政策。

从一九二五年开始，后来由于反对派的反对而局部遏止的富农或“富农的帮手”和城市市侩向基层苏维埃渗透的过程，是一个极深刻的政治过程，如果不注意或者掩盖这个过程就会给无产阶级专政带来极严重的后果。

同上。

目前的市場关系与新经济政策(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下的市場关系是不同的，不同的地方在于，目前的市場关系应当在国家合作社和集体农庄组织同各个公民之间没有中间人和私商的情况下得到直接的发展。然而，这一点只有从原则上看是正确的。国家和合作社的零售贸易额增长得很迅速，按照说明书，应当在一九三六年达到一千亿卢布。集体农庄的贸易额，一九三五年达到一

百六十亿，今年还会大大地增长。不合法的和半合法的中間人在这些貿易額当中以及以外究竟占什么地位——至少不是无足輕重的地位！——是很难断定的。不仅是个体农民，就是集体农庄，特别是集体农庄的个别庄員，也都很喜欢依靠中間人。家庭工业的工人、合作社社員以及和农民进行交易的地方工业，也都走同样的道路。渐渐地就发生了这样出乎意料的事，即在一个广大的地区，肉、牛油和鸡蛋等商业都被“投机商”垄断了。甚至最必需的日用品，如食盐、火柴、面粉、汽油等，尽管国家的仓库里储备着足够的数量，但是在官僚化的农村合作社中有时竟好几个星期或者好几个月沒有。显然，农民会通过其他道路来取得他們所需要的物品。苏維埃报刊常常在談到經紀人的时候，就象談到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一样。

至于其他形式的私人企业和积累，作用似乎比較小些。独立的馬車夫、小客栈的老板以及单独的手艺工人，就象单干的农民一样，都是半容許的职业。在莫斯科，就有相当多的私人小企业和修理店。这些商店的存在是得到默許的，因为它們填补了經濟中的巨大裂縫。可是还有多得多的私人企业家，在各种劳动組合和合作社的虛假招牌下或者在集体农庄的掩护下活动着——就好像是为了扩大計划經濟中的裂縫这样一个特殊的目的。莫斯科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員，常常按照恶毒的投机商这样的性质，把在街上出售家庭制造的圓扁帽或者布衬衫的饥餓妇女逮捕起来。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87 頁。

## 五、官僚阶层

(見本书第十二部分：《关于苏維埃国家和布尔什維克党“官僚化”和“蜕化变质”問題》)

## (十一) 关于苏联国家的性质

### 一、污蔑当时苏联的社会制度 不是社会主义制度

1. 污蔑当时苏联是一个“以国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的”，由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来管理的并被他们叛卖了的国家”。

不平等(尤其是如此显著的不平等)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当然是绝对不可能有的。但是同官方和半官方的谎言相反,目前的苏维埃制度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过渡性质的。它的内部仍然有着可怕的资本主义残余,尤其是社会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存在于官僚和无产阶级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官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在一定阶段,不平等依然存在,在某种限度内,发展社会主义所用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工具如工资差别、奖金等等仍将作为竞赛的鼓励。

虽然不平等可以作这样解释,但是决不能因为目前制度的过渡性质,就能说官僚的无法无天的上层所据为己有的那些荒谬的(公开和秘密的)特权是正当的。左翼反对派……就曾宣布官僚主义的一切表现正在扯掉苏维埃社会的道德约束;在群众中引起尖锐而正当的不满,为巨大的危机准备基础。然而,官僚的特权本身并没有改变苏维埃社会的基础,因为官僚的特权并不是来自一个



**“階級”特有的特殊的所有制关系，而是来自十月革命所开創的所有制关系，这种关系基本上是适合无产阶级专政的。**

摘譯自《苏联与第四国际》(1934年)，  
紐約1934年版第19—20頁。

不过，苏联的全部社会关系，包括苏維埃貴族的特权在內，归根到底是以从资产阶级那儿剝夺来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为基础的，与资本主义所有制不同，它提供了发展經濟和文化的可能性，这仍然是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十月革命所掘的历史鴻沟仍繼續隔离着苏維埃有計劃的国家經濟与資本主义的“国家主义”，資本主义的“国家主义”是为拯救私有制而进行的国家干預，用阻止生产力的发展和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办法来“調整”业已过时的經濟体系。自由派經濟学家慣常把苏維埃經濟与法西斯（意大利、德国）經濟等同看待，这是无知或冒充內行的結果。苏联波拿巴官僚对无产阶级先鋒队的胜利还决不等于資本主义反革命的胜利，虽然它也为之扫清道路。

摘譯自《第四国际和苏联》(1936年7月)，載于  
《反对派通报》1937年3月第54—55期第50頁。

苏联是个工人国家嗎？苏联是个基于无产阶级革命所創立的所有制关系上的、由机会主义分子即新的特权阶层来管理的并被他們叛卖了的国家。如果由机会主义分子即資本的代理人所管理的和被他們叛卖了的工会可以叫做工人組織的話，苏联才可以大致上叫做工人国家(虽然在規模上有巨大的差別)。

同上，第51頁。

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原是为了加速物质力量的增长，这种标准应当为社会主义目的服务——但只是在最終的意义上是这样。国家直接并且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性质：当它在生产資料方面維

护社会财产的时候，它是社会主义的；当生活日用品是以资本主义价值尺度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的情况下进行分配的时候，它是资产阶级的。对于特点的这种矛盾的说法，可能使教条主义者和经院哲学家感到害怕；我们只能向他们表示吊慰。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7—38页。

2. 说苏联“没有建立起生产和分配的平衡制度”，苏维埃所有制形式的基础是比资本主义国家差得多的“低劳动生产率”，因而断言苏联的制度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种预备性的过渡性制度”。

就个人生活状况而言，苏维埃社会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等级：从流浪儿、妓女和流氓无产者直到过着西欧资本巨头生活的“万把”统治者。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论断相反，无论在苏联的客观的经济关系（劳动生产率的标准）方面，无论在劳动群众的觉悟方面（个人消费的标准）社会主义都还没有取得胜利。

摘译自《第四国际和苏联》(1936年7月)，载于  
《反对派通报》1937年3月第54—55期50页。

苏联的经济文化发展进程已经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可是还一点也没有达到内部平衡的状态。如果你们记得，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团结一致和一切需要得到妥善的满足为基础的无阶级的社会，那么，从这个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苏联还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影子。固然，苏维埃社会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矛盾很不相同，但是这些矛盾还是很尖锐的。它们的表现是物质上的和文化上的不平等、政府的压制、政治上的各种派别以及派别斗争。警

察的压制可以緩和和改变政治斗争，但是不能消灭政治斗争。被压制的思想在每个阶段都对政府的政策发生影响，有时对它有帮助，有时对它是障碍。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序言》（1936年8月4日），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5页。

馬克思把新社会的这个初期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的低級阶段”，以区别于高級阶段；在高級阶段，物质上的不平等以及匱乏的最后痕迹将一齐消失。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經常是以新社会的低級阶段和高級阶段来对比的。目前官方的苏联学說是，“当然我們还没有完成共产主义，但是我們已經建成了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低級阶段。”为了证明这一点，官方提出的論据是，在工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国家托拉斯，农业中是集体农庄，商业中是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企业。乍看起来，这种情况完全符合馬克思想象的——因而也是假定的——方案。但是，正是对于馬克思主义者來說，如果不問劳动生产率处于什么水平而只考虑所有制的形式，那末，这个問題并没有真正解决。馬克思的意思是，归根結蒂，共产主义的低級阶段是这样一个社会，它从一开始就比最先进的資本主义經济发展水平要高些。从理論上說，这个概念是无可非議的，因为如果就世界范围來說，共产主义即使在其最初阶段也意味着，其发展水平要比資產階級社会高些。此外，馬克思还曾預期，法国人将开始社会革命，德国人将把这种革命繼續下去，而由英国人来完成它；至于俄国人，馬克思把他們排列在很靠后的位置上。但是，这个想象中的次序被事实推翻了。現在誰要是想把馬克思的普遍历史概念机械地运用到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苏联这个特殊的例子上，誰就会立即陷入无法摆脱的矛盾。

在資本主义鏈条上，俄国并不是最坚固的环节，而是最薄弱的环节。目前的苏联并不是超过了世界經济水平，而只不过是

法赶上资本主义国家。如果馬克思把在资本主义时期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社会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称为共产主义的低級阶段，那末，这个名称显然不适用于苏联，因为今天它在技术、文化和生活享受方面仍旧比资本主义国家差得很多。因此，这样說比較真实，即目前拥有各种矛盾的苏联制度，不应称为社会主义制度，而应称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种預备性的过渡性制度。

在这方面，一点也沒有搬弄辞藻、咬文嚼字的意思。制度的力量和稳定性，归根結蒂，决定于相对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經濟如果拥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技术，其社会主义发展就会真正得到保证——姑且說，保证自动发展——不幸，对苏联經濟来說，这一点还根本談不上。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8月)，  
同上，第32—33頁。

正是由于苏联还远远沒有达到社会主义的初級阶段，也就是說沒有建立生产和分配的平衡制度，因此苏联的发展不是和諧地进行的，而是在矛盾中进行的。經濟矛盾产生社会矛盾，而社会矛盾有它自己的发展邏輯，它并不等待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我們刚刚看到，在富农的例子这一点是多么真实。富农并不願意演变地“长入”社会主义，出乎官僚及其思想家的意料的是，富农要求进行一次新的补充的革命。掌握着权力和财产的官僚本身，願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嗎？关于这一点，肯定可以提出疑問。无论如何，如果相信官僚在这个問題上所說的話，那是輕率的。在未来的三年、五年或十年当中，苏联社会的經濟矛盾和社会矛盾会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目前不能最后肯定地回答的一个問題。結局取决于活生生的社会力量的斗争——不是在一国范围内，而是在国际范围内。

同上，第33—34頁。

近年来，有好几次宣布，說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經“完全胜利”——在談到“消灭富农階級”問題时采取了特別明确的口气。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日，《真理报》在闡述斯大林的一篇演說时說，“在第二个五年計劃期間，我国經濟当中資本主义因素的最后残余将被消灭。”（重点是我們加的）从这种前景来看，国家在同一时期一定会消亡，因为資本主义的“最后残余”被消灭以后，国家便沒有事可做了。布尔什維克党綱在这个問題上这样說，“苏維埃政权公开承认，只要社会划分为階級的情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整个国家权力沒有完全消失，每个国家就必不可免地具有階級性。”然而，有些不謹慎的莫斯科理論家，由于相信資本主义的“最后残余”已被消灭而得出了国家消亡的結論，結果官僚便立即宣布了这种理論是“反革命的”。

官僚的理論錯誤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基本前提上呢？还是在結論上呢？两方面都有錯誤。最初宣布“完全胜利”的时候，左翼反对派作出的答复是：你們不可以把自己局限于各种关系的社会法律形式上，因为这些关系是不成熟的，是互相矛盾的，在农业方面还很不稳定，同时离开了基本标准：生产力水平。法律形式本身由于它所依据的高度技术水平而具有一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社会內容。“法权永远不能高于經濟結構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文化水平”（馬克思語）。如果苏維埃的所有制形式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把最先进的美国技术成就运用到經濟生活的各个部門去——那就的确是社会主义的初級阶段了。但是苏維埃的所有制形式，如果以低劳动生产率为基础，那就只能意味着一种过渡性的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命运，历史还没有作出最后的估計。

我們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写道，“这不是怪事嗎？国家不能摆脱物品荒。每采取一个步驟都会发生供应停止的情况。孩子們沒有牛奶喝。但是官方的神諭却宣称：‘国家已經进入社会主义时期！’

还有什么能够比这样玷污社会主义的名字更恶毒的吗？”卡尔·拉狄克——现在是苏联统治集团的一位著名政论家——在德国自由派报纸《柏林日报》的一期苏联专号（一九三二年五月）上，对于上面的评论避而不答，而写了这样几句堪称不朽之作的话：“牛奶是乳牛的产物，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产物，你们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同一个乳流成河的国家形象混为一谈了，因此才不了解一个国家即使没有相当大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条件，也能在一个时期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这几句话是在可怕的饥荒正在全国猖獗的时候写的。

**社会主义是一种使人类需要得到最大满足的计划生产结构；否则它就不配称为社会主义。**如果乳牛都社会化了，但是数量太少，或者产奶不够，那就会由于牛奶供应不足而在下列一些方面发生冲突：城市和乡村之间，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民之间，无产阶级的不同阶层之间，整个劳苦群众和官僚之间。事实上，正是由于把乳牛社会化，才引起农民大批屠宰乳牛。由于匮乏而产生的社会冲突，可以反过来引起“一切旧欺詐行为”的复活。从本质上说，这就是我们的答复。

同上，第 42—44 页。

3. 认为“苏联是一个介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它“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也可能倒退到资本主义去”。

苏联工业生产资料的主要部分已经大大增长了，而且是集中在国家手里；而在农业方面则掌握在介于个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之间的集体农庄手里。但是，**国有制也还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因为后者是以作为所有制保卫者的国家的消亡，减少不平等现象，

并在社会风尚和习惯上逐渐消除财产观念本身为前提的。近年来，苏联的实际发展道路恰恰相反：不平等现象在增长；同时国家的压制也在增长。在有利的国内外的形势下，目前的国有制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可是，在不利的条件下，也可能倒退到资本主义去。

摘译自《第四国际和苏联》(1936年7月)，载于《反对派通报》1937年2月第54—55期第49页。

把苏维埃制度说成是过渡性的或者中间性的制度，那就意味着抛弃资本主义（包括“国家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这样完整的社会范畴。这样一种定义除了本身根本不能自圆其说以外，还有可能产生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目前的苏维埃制度只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可能性。其实，这种制度倒退到资本主义也是完全可能的。一个更加完整的定义必然是复杂的和烦琐的。

苏联是一个介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生产力还远远不足以使国有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二）由于匮乏而造成的原始积累的倾向，通过计划经济的无数漏洞而滋长起来；（三）保持着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标准，建立在一种新的社会分化的基础上；（四）经济的增长一方面使劳苦者的景况改善得很慢，另一方面却促进了特权阶层的迅速形成；（五）官僚利用社会的对抗而把自己改变成一个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不受监督的阶层；（六）社会革命虽然被执政党背叛了，但是在所有制关系和劳动群众的意识当中仍然存在；（七）日益增长的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走向社会主义，也可以退回到资本主义；（八）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反革命将不得不击溃工人的抵抗；（九）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将不得不推翻官僚。归根到底，问题将决定于国内和世界舞台上现有社会力量的斗争。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86页。

## 二、說超过限度的“資產階級的分配标准”摧毀国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

1. 攻击“‘按劳分配’实际上是牺牲体力劳动、特別是不熟练劳动而对‘脑力’劳动有利的一种工資支付办法”；声称“只要被迫用強制的办法维护不平等”，国家就“依然是一个‘資產階級’国家”。

每个工人国家，在初期，都将为了提高生产力而保留工資制，或者象馬克思說的，保留“資產階級的分配标准”。不过，問題要由整个发展方向来决定。在先进国家卷入革命、社会財富迅速增长的情况下，不平等現象会迅速消除，而国家也就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保卫”的了。在苏維埃国家处于孤立和落后的状态下，資產階級的分配标准就将带有一种粗暴的和羞辱的性质（駭人听闻的工資悬殊、奖金、头衔、勳章等等），并且产生危及国有制本身的复辟趋势。

摘譯自《第四国际和苏联》(1936年7月)，載于《反对派通报》1937年3月第54—55期第45頁。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美国那样最先进的資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也不能立即滿足每个人的各种需要，因此它就会被迫鼓励每个人尽量增加生产。在这种情况下，**鼓励者的职责**自然就落在国家身上，結果它只好采取資本主义所制訂的工資支付办法，尽管作了各种各样的修改和减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写道，“資產階級式的法权……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在它經過长久的陣痛刚刚从資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



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sup>①</sup>

列宁在解释这段值得注意的话的时候补充说，“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规的机关，权利也就等于零。可是，〔下面还是引用列宁的话〕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的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sup>②</sup>这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结论被当前官方的理论家完全忽视了，但它对于了解——或者更确切点说，对于初步了解——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负有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国家，只要被迫用强制的办法维护不平等——即少数人在物质上的特权，那末它就依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即使已经没有资产阶级。这些话既没有褒的意思，也没有贬的意思；这些话只不过是如实描绘事实。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7页。

苏维埃国家就其一切关系来说，与其说接近共产主义，不如说更为接近落后的资本主义。它甚至还不能想象“按需分配”。而且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它也不能使自己的公民“各尽所能”地工作。苏维埃国家发觉自己不得不继续保持计件工资制，而这种工资制的原则可以归纳为这样两句话：“取之于每个人的越多越好，给予每个人的则越少越好。”说实在的，从绝对的意义来说，在苏联没有一个人的工作能够超过自己的“能力”，即超过自己在肉体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潜力。但是，在资本主义下面也是这样。最粗暴的以及最巧妙的剥削方法都不能超过自然所规定的限度。甚至一匹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页。——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8页。——编者注

子在鞭子下面也是“各尽所能”的，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結論說，鞭子是騾子的社会原則。甚至在苏維埃制度下，工資劳动也仍然带着令人感到羞辱的奴隶制标签。“按劳分配”实际上是牺牲体力劳动、特别是不熟练劳动而对“脑力”劳动有利的一种工資支付办法，这办法对大多数人來說是不公平、压迫和强制的泉源，对少数人来说則是特权和“幸福生活”的泉源。

这部宪法的作者們不是坦率地承认苏联在劳动和分配方面还实行着资产阶级标准，而是把这个統一的共产主义原則分割成两半，把后半推遲到无限遙远的未来，而宣布前半已經实现，并把这一点同資本主义的計件工資标准机械地結合起来，然后就把这一套做法称为“社会主义原則”，并且在这个伪造的“原則”上面建立了他們的宪法結構！

同上，第 189—190 頁。

在經濟方面具有最大的实际意义的，毫無疑問是第十条。这一条同大多数条文相反，十分明确地保障公民在家庭經濟、消費、舒适和日常生活的用品方面的个人所有权，防止官僚本身加以侵犯。除了“家庭經濟”以外，这种所有权在清除了往往与之結合在一起的那种貪婪和妒忌心理以后，将不仅在共产主义下面存在，而且还会得到空前的发展。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人还会不会要一大堆奢侈品来拖累住自己，固然是一个疑問。但是，他是不会放弃已經得到的任何享受的。共产主义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保证人人过舒适的生活。然而，在苏联，个人所有权問題还具有小资产阶级面貌，而不是共产主义面貌。农民和不富裕的城市居民的个人財產是官僚方面进行粗暴掠夺的对象，官僚的下层也經常靠这种手段来保证自己的相对舒适的生活。国家的逐步繁荣可以消除这种侵占別人財產的現象，甚至还可以迫使政府保护个人的积累，作为提

高劳动生产率的一种推动力。同时——而这一点并不是不重要的——由于法律保护农民、工人或者办事员的茅草小屋、乳牛和家具，也就使官僚的城市住宅、避暑别墅、汽车以及所有其它“属于个人消费和享受的东西”合法化，而这些东西都是官僚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取得的。官僚的汽车肯定会比农民的马车受到新的根本大法更为有效的保护。

同上，第 190 页。

2. 声称社会不平等现象尖锐化，“‘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早就发展到所能容许的极限”，它“将最终破坏计划经济的社会纪律，从而也就摧毁国家-集体农庄所有制”。

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加上大量投资、巨额军事开支和不受监督的机构的惊人浪费，意味着就是现在大多数居民最重要的日用品也是极端缺乏的。经济成就对显著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来说是微小的，但对分化出广大的特权阶层来说却是绰绰有余的了。社会矛盾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没有缓和，而是大大加剧了。不平等现象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幸福生活”的赞歌只是由上层人物来唱，而下层则不得不保持沉默。

摘译自《第四国际和苏联》(1936年7月)，  
载于《反对派通报》1937年3月第54—  
55期第48页。

上边已经说过，苏联社会的社会分化主要发生在分配方面，只有部分(主要是在农业方面)是在生产方面。但是，分配与生产之间并不是隔着一道无法超越的屏障。官僚激起私有的、集团的和

个体的野心的公然猖獗，从而败坏公有制思想本身。经济特权的  
增长在群众中产生一种合理的怀疑：整个制度归根到底是为誰服  
务的？“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早就发展到所能容许的极限，将最  
終破坏计划经济的社会纪律，从而也就摧毁国家—集体农庄所  
有制。

同上，第50頁。

建立一个沒有官僚主义的国家的初次尝试，首先遭到了这样  
的困难：群众对于自治不熟悉，缺少为社会主义而努力的熟练工  
人，等等；在遇到这些直接的困难以后，这种尝试又很快地遇到其  
他一些更加严重的困难。党纲要求，国家改为执行“核算和监督”  
的职能，同时逐渐缩小强制的职能，这种改变至少具有一种普遍满  
足的相对条件。恰恰沒有这种必要的条件。西方沒有給予援助。  
当时的任务是顺应那些特权集团，因为他们的存在对于国防、工  
业、技术以及科学来说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主苏维埃的权  
力便受到压制，甚至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把十个人創造的东西拿  
来給一个人用的这种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的做法，在分配方面便  
形成并发展成一个强有力的专家阶层。

最近一个时期在经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沒有緩和不  
平等关系，反而使不平等现象更加尖锐化了；与此同时，官僚主义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前是一种“腐化现象”，现在却变成一种行政  
制度了，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并且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在  
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以前，让我们听一听苏维埃官僚的权威领导人  
怎样估计他们自己的制度吧。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1—42頁。

### 三、攻击当时苏联已从无产阶级 专政退向资产阶级政制

1. 宣称国家消亡的程度是“衡量社会主义发展成就的最可靠尺度”，国家消亡的始点应当是官僚的消灭，可是苏维埃国家存在了二十年以后还“没有开始‘消亡’”，“新宪法巩固了苏联社会特权阶层对劳动群众的专政”。

苏联新宪法的政治意义是同官方的解释截然相反的。“斯大林宪法”并没有象官方权威人士厚着脸皮所说的，“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了一步，恰恰相反，是后退了一步，从无产阶级专政退到资产阶级以前的政制去。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在政治方面，应当表现在国家消亡上面。这种消亡的程度是衡量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就的最可靠的尺度。国家消亡的始点，应当是消灭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但是，事实上新宪法却使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合法化并固定下来。不可能不是这样：特权的增长需要宪兵来保护它。

摘译自《第四国际和苏联》(1936年7月)，载于  
《反对派通报》1937年3月第54—55期第50页。

同时宪法在法律上取消了无产阶级在国家里的事实上早已被剥夺了的统治地位。此后，专政被宣布为“没有阶级的”和“全民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种说法是纯粹的胡说八道：“人民”对自己专政应当意味着国家消融于社会之中，即国家的死亡。事实上，新宪法巩固了苏联社会特权阶层对劳动群众的专政，从而使国家和平消亡成为不可能，给官僚开辟了进行经济反革命的“合法”道路，即通过“陆”路恢复资本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官僚用

“社会主义胜利”的谎言所直接准备起来的。我们的任务是号召工人阶级起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反抗官僚的压迫——保卫十月的伟大成果。

同上，第 51 頁。

从一九一七年开始——即从夺取政权成为党的一个实际问题的时候起——列宁一直在思考消灭这个“寄生虫”的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每一章中都重复和说明了这一点：无产阶级在推翻剥削阶级以后，将打碎旧官僚机器而从职员和工人当中创立自己的机器。同时无产阶级将采取措施来防止自己的机器转入官僚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办法：（一）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二）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三）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都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sup>①</sup>你不要以为列宁所说的是十年当中的问题。不是，这是“我们应当而且必须在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方面开始”采取的**第一个步骤**。

在夺取政权一年半以后，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包括关于军队的部分，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这种大胆的看法有了完整的说明。强有力的国家，但是没有官吏；武装的政权，但是没有武士！军事的和国家的官僚制度的建立并不是由于防御任务，而是由于社会阶级结构带进了防御组织。军队只不过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缩影。当然，在工人国家象在其他国家一样，防止外来危险的斗争，需要的是一个专门军事技术组织，而不是一个特权的军官阶层。党纲要求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常备军。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从一开始就不再是原来意义的那种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 25 卷第 468 頁。——编者注

“国家”——即一个使大多数人服从的特殊工具。物质力量以及武器都直接立刻轉入象苏維埃这样的工人組織手中。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天起，国家作为一个官僚工具开始消亡。这就是党綱发出的呼声——而且到現在还没有停止。奇怪的是，这种呼声听起来就象幽灵从陵墓中发出的声音。

尽管你可以解释目前苏維埃国家的性质，但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苏維埃国家生存了二十年以后，不仅沒有消亡，而且沒有开始“消亡”。更糟的是，它已經发展成一个前所未聞的强制工具。官僚不仅沒有消失，让位給群众，而且已經变成一个支配群众的毫无控制的力量。军队不仅沒有被武装的人民代替，而且已經产生了拥有特权的军官阶层，他們享有元帅的荣誉；而人民，即“专政的武装担負者”，現在在苏联却被禁止携带甚至非爆炸性的武器。无论怎么想入非非，也很难想象有什么比按照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想法描繪的工人国家的图案与現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实际国家之間的对照更为鮮明。列宁的著作还在繼續出版（說实在的，检查官已經作了删节和歪曲），但是目前苏联的领导人以及他們的意識形态方面的代表們，甚至沒有提出为什么綱領和现实之間存在着这样显著的差别。我們一定要設法替他們做这项工作。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4—36頁。

工人国家的最后面貌，应当决定于国家的资产阶级倾向和社会主义倾向之間不断变化的关系。社会主义倾向的胜利，事实上意味着宪兵的最后消灭——即国家溶化为自治社会。只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足够清楚地了解，苏联的官僚主义这个问题，无论就其本身來說，或者作为一种征候來說，具有多么无可估量的意义！

同上，第38頁。

綜上所述，我們已經初步了解了布尔什維克綱領和苏联现实之間的根本矛盾。如果国家沒有消亡，反而變得越來越專橫，如果工人階級的全權代表們官僚化而官僚們凌駕于新社会之上，那末，这并不是由于过去的心理残余等次要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只要国家不能保证真正平等就会产生并支持拥有特权的少数人这样一种铁的必然性所造成的結果。

官僚主义的傾向使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遭到扼杀，这种傾向即使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也会到处表现出来。但是非常明显的是，从革命中产生的社会越是貧穷，这种“法权”的表现就会越加严酷越加赤裸，官僚主义所具有的形式就会越加粗暴，同时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就会越加危險。苏維埃国家不仅被阻止消亡，甚至被阻止摆脱官僚主义寄生虫，这并不象斯大林那种赤裸裸的警察理論所說的，是以前的統治階級“残余”造成的，因为这些残余本身并没有力量。苏維埃国家所受到的阻止，是来自力量大得无可估計的一些因素，例如物质匱乏，文化落后，以及由此产生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最直接最密切关系到每个人的領域居于支配地位——即在保证个人生存的那些事情当中居于支配地位。

同上，第 38—39 頁。

2. 攻击苏联新宪法規定的选举制度是回到以全体居民的“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就是“从政治上”把无产阶级“溶解于‘全民’之中”，“从法律上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在野蛮社会中，騎馬的人和步行的人构成两个階級。汽車使社会分化的程度并不下于有鞍的馬。只要甚至一辆中等的“福特牌”汽車还是为少数特权者所有，那么，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一



**切关系和习惯就会保留下来。与此同时，不平等的维护者国家也会保留下来。**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0—41页。

我們現在从莫斯科一家报纸的最新一期上看看对于苏联现行制度的固定说法，这种说法是全国到处天天重复和学校的儿童必须牢记在心的许多说法之一，即“在苏联，资本家、地主和富农等寄生阶级已经彻底消灭，因此已经永远结束了人剥削人的现象。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性质，而日益高涨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正在为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真理报》）不用说，共产国际在全世界的报刊对于这个问题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如果剥削已经“永远结束”，如果国家现在的确已经走上从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的道路上，那末，社会除了最终扔掉国家这件紧身衣以外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可是与此相反——这种矛盾现象甚至难以捉摸！——苏维埃国家反而具有了一种极权主义-官僚主义的性质。

同上，第77页。

在政治领域，新宪法同旧宪法的差别在于，从按照阶级和产业团体进行选举的苏维埃制度又回到以全体居民进行所谓“普遍、平等和直接”选举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简单地說，这就是从法律上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资本家的地方也就没有无产阶级——新宪法的创作者这样说——因此国家本身已经由无产阶级国家变成全民国家。这种论断不管从表面上看多么动人，不是提得晚了十九年就是提得早了许许多年。无产阶级在剥夺资本家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进入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自己的时期。但是，从原则上消灭到实际上溶解于社会之中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而新国家

被迫进行資本主义的初步工作越久，这条道路也就越长。苏維埃无产階級依旧作为一个与农民、技术知識分子和官僚大不相同的階級存在，而且作为自始至終关心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階級存在。新宪法要在这个階級从經濟上溶解于社会当中以前很久，就从政治上把它溶解于“全民”之中。

同上，第190—191頁。

3. 揚言“无产階級还必须再进行第二次补充革命来反对官僚专制”，以“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苏联工人階級已經被剝夺了合法改造国家的最后可能。反对官僚的斗争必然要变成一場革命斗争。第四国际忠于馬克思主义的传统，坚决反对个人恐怖，就象它反对其他一切政治冒险主义手段一样。只有反对篡位者、寄生虫和压迫者的自觉的群众运动才能消灭官僚。

如果要苏联回到資本主义去需要一次社会反革命，即推翻生产資料和土地的国有制并恢复私有制，那么，对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來說，一場政治革命，即用暴力推翻蜕化变质的官僚的政治統治，以便保存十月革命所建立的所有制关系，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苏联的无产階級先鋒队，依靠全国的劳动群众和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必須用暴力打倒官僚，恢复苏維埃民主，消灭駭人听闻的特权，保证真正向社会平等前进。

摘譯自《第四国际和苏联》(1936年7月)，載于《反对派通报》1937年3月第54—55期第51頁。

正如我們已經听到过的，階級矛盾的消除已經为政治上的平等奠定了基础。专政已經不再是階級专政，而是“人民”专政了。但是，如果专政者变成摆脱了階級矛盾的人民，那就只能意味着专政

已經溶解于社会主义社会中,而且首先意味着官僚已經消亡。馬克思的学說就是这样教导的。那么也許是搞錯了吧?但是,宪法的作者們尽管小心翼翼,还是提到了列宁起草的党綱。这里就是党綱里真正說过的話:“……对政治权利的剝夺以及对自由的所有其它限制,只是作为临时措施來說才是必要的……随着人剝削人的客观可能性的逐漸消失,这些临时措施的必要性也逐漸消失。”因此,放弃“对政治权利的剝夺”同废除“对自由的所有其它限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不仅在于农民同工人居于平等地位,也不仅在于资产阶级出身的少数公民恢复了政治权利,而且首先在于百分之百的居民享有真正的自由。随着阶级的消灭,不仅官僚消亡,不仅专政消亡,而且国家本身也消亡了。然而,只要哪个不谨慎的人试图在这方面拐弯抹角地說一句,国家政治保卫局就会在新宪法当中找到适当的根据把他送进无数集中营之一。阶级消灭了。苏維埃只留下了空名。但是官僚还存在。工人和农民的权利平等,实际上只不过意味着在官僚面前都沒有权利。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92—193頁。

一次工人革命所产生的国家存在下来,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国家所必需經歷的阶段还没有先例可循。不錯,苏联的理論家和創造者希望,完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和具有灵活性的苏維埃制度将会使国家按照社会的經濟文化演变阶段来和平地轉变、解体 and 消亡。然而,在这里,生活再一次证明比理論所預期的要复杂得多。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注定要完成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这个历史特权,从一切迹象来看,无产阶级还必须再进行第二次补充革命来反对官僚专制。新革命的綱領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于革命爆发的时刻、国家已經达到的水平以及国际形势。

这个綱領的基本因素已經清楚，在本书分析苏維埃制度的矛盾以后得出的客观論断中已經指出。

同上，第 211—212 頁。

十月革命后建立了工人国家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生产資料的国家所有制使生产力有了迅速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工人国家的机构在这同时也发生了全面的蜕化：它从工人階級的武器变成了官僚对工人階級使用暴力手段的武器，并且日益成为破坏国家經濟的武器。一个落后而孤立的工人国家的官僚化和官僚的变成一个十分强大的特权等級的事实是对在一国社会主义理論的最有說服力的反駁——不仅是在理論上，而且这一次是在实践上。

因此，苏联內部包含着可怕的矛盾。但是它仍然是一个蜕化的工人国家。对苏联的社会診斷就是这样。其政治前景不外两种可能：要么是愈来愈成为世界資產階級在工人国家中的机构的官僚集团推翻新的所有制形式，把国家拉回資本主义，要么是工人階級起来粉碎官僚集团从而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摘自《資本主义的垂死掙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1938年9月3日)，紐約1946年版第47頁。

## (十二) 关于苏維埃国家和布尔什維克党“官僚化”和“蜕化变质”

### 一、說世界革命不取得胜利，就会出现資本主义复辟

1. 胡說在落后国家內，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队伍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反动”。声称世界革命如不取得胜利，“长期孤立的不可避免的結局，不是民族共产主义，而是資本主义复辟”。

說到底，苏联发展的一切矛盾就这样导致了被孤立的工人国家同資本主义对它的包围之間的矛盾。由于不可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建設自給自足的社会主义經濟，就会使社会主义建設的基本矛盾每到一个新阶段都要以更大的規模和更大的深度重新出現。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世界其他部分的資本主义政权表明自己能够維持另一个漫长的历史时代的話，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破坏。但是，只有那些相信資本主义是牢固的或长命的人才能认为这种前途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哪怕是最可能的。左派反对派与这种資本主义的乐观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但它也同样不能同意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这个理論是向資本主义的乐观主义投降的表現。

摘譯自《苏联的发展問題》(1931年4月4日)，  
紐約1931年版第9—10頁。

工人国家的正确政策不能降低到仅仅限于本民族的經濟建設。如果革命不循着无产阶级的螺旋綫向国际舞台扩展，那它必然会开始沿着官僚的螺旋綫局限于民族范围之内。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不发展成欧洲和世界規模，它必然会朝着它本身崩溃的方向发展。作为广泛的历史远景，所有这些都是完全无可爭辯的。

摘譯自《苏联与第四国际》(1934年)，  
紐約1934年版第4頁。

已經为官僚主义所削弱的苏維埃政权瓦解的危机和无产阶级团结在一个能够拯救十月革命遺產的新党周围的时机，哪一个会先到来呢？对于这个问题沒有現成的答案，这要由斗争来决定。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考驗——可能是一次战争——将会决定力量的对比。总而言之，随着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继续衰落和法西斯統治的继续扩大，苏維埃政权已經不再可能单单依靠内部力量来維持下去，这一点是很明显的。苏維埃国家唯一彻底改造的基本条件是胜利地开展世界革命。

同上，第26頁。

战后的革命危机，并没有导致社会主义在欧洲取得胜利。社会民主党人拯救了资产阶级。在列宁和他的同事看来似乎是短暂的一段“喘息时机”，已經延长成一整个历史时代。苏联的矛盾的社会结构及其国家的极端官僚主义性质，都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和“未能預見”的历史停頓所带来的直接結果，与此同时，这种历史停頓还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导向法西斯主义和准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局面。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1頁。

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于世界形势和内部力量的具体对比。但是阶级本身是在沙皇統治和落后的资本主义的野蛮条

件下形成的，而絕不是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形成的。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正是由于这一点，在許多方面还落后的无产阶级，才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以空前的速度从半封建的君主政体跳跃到社会主义专政；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它的队伍中才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反动。这种反动发展成一系列連續不断的浪潮。外部条件和事态发展都不断促进这种反动。一次干涉接着一次干涉。革命沒有从西方直接得到帮助。国家沒有出現預期的繁荣，却长期陷于前景不妙的貧困状态。不仅如此，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不是在國內战争中死亡，就是高升几級而脱离了群众。这样，在力量、希望和幻想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紧张阶段以后，便产生了疲倦、消沉和对革命結果极度失望的情緒。“平民自豪感”进入低潮而让位給胆怯和自私自利的浪潮。新統治阶层就在这种浪潮上达到自己的地位。

五百万紅軍的复員，对于官僚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在戰場上取得胜利的指揮官，在地方苏維埃、經濟部門和教育部門担任了領導职务，他們把國內战争时期保证取得胜利的那种制度坚决地貫徹到每个地方。于是，群众便在各方面逐步地被排除实际参加国家的領導工作。

无产阶级內部的反动，使城乡的小资产阶级阶层有了极大的希望和信心，新經濟政策給了他們新生命，他們越来越大胆。最初作为无产阶级代理人的年輕的官僚，現在开始觉得自己是各个阶级之間的仲裁法庭了。官僚的独立性越来越得到加强。

同上，第64頁。

說实在的，苏联的孤立并沒有产生人們本来所怕的那些具有直接危险的后果。资本主义世界太散漫混乱，瘫痪无力，因此它不能充分发挥它的潜力。事实证明“喘息时机”比有眼光的乐观主义者所敢希望的还要长些。由于孤立，由于即使在资本主义基础上

(对外貿易額从一九一三年以来已經减少了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也不能使用世界經濟資源,結果不仅使軍事防禦費用浩大,而且使得生产力的分布极端不利,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得很慢。但是,孤立和落后所产生的一个更有害的产物却是官僚主义这条章鱼。

革命所建立的法律和政治准则对落后的經濟起了一种进步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准则本身却受到那种落后所发生的消极影响。苏联在資本主义的包围中的時間愈长,社会结构的蜕化也就愈深。长期孤立的不可避免的結局,不是民族共产主义,而是資本主义复辟。

同上,第 219—220 頁。

2. 断言各国革命的失敗“摧毀了苏联群众对世界革命的信心”,把官僚看作“唯一的救星”;領袖們的心里“普通人的特性,自滿官吏的感情和兴趣复活起来了”,他們有了“自己的独立目的”,热中于歌舞享乐,利用群众的“困惑和消极情緒”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大胆地依靠同富农和小資产阶级的联盟”。这种“蜕化思想的产物”就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論。

但是,由于世界革命运动一系列的失敗和从而产生的悲观情緒,斯大林集团甚至自己也沒注意到,它对于目前时代已經逐漸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和本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估計。一国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論”主要地是产生于这样的假設:資本主义的“稳定”将要持續几十年。这整个“理論”本质上是“稳定論”信徒的蜕化思想的产物。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受到社会革命党、無論其右翼或左翼的欢迎,这不是偶然的。切尔諾夫本人已經著文論述关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产主义的民粹主义”問題。左翼社会革命党



机关报写道：“斯大林和布哈林正象民粹主义者那样，肯定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胜利。”<sup>①</sup> 社会革命党支持这个理论，因为他们从这里看到世界革命的策略已被放弃。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2页。

领导过夺取政权斗争的革命者在某一阶段开始丧失——不论是以“和平的”方式或者通过灾变——政权，这个事实本身就意味着某些思想或某些情绪的影响在革命指导分子当中日趋衰落，或者表明群众内部发生了革命精神的衰退，或者表明同时发生了这两种情况。经历了地下活动的党，其领导集团是受到革命初期的领袖们明白宣布并在实践中完满地执行的革命倾向的激励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做了党的领导人，而且通过党做了工人群众的领袖，通过工人阶级做了国家领导者。某些个人就是经过这条道路把政权集中到自己手里的。但是革命初期的思想，在那些直接执掌政权的党员中，不知不觉地逐渐丧失了影响。

在国家中，也发生了一些过程，**这些过程可以概括在“反动”这个总名称之下。**这些过程也或多或少地波及工人阶级，甚至波及于他们的党组织。于是构成政权机关的那个阶层渐渐形成自己的独立目的，而且力图使革命服从这些新的目的。在那些代表阶级的历史路线而且能超越机关观察形势的领袖以及把平庸的共产党人卷入漩涡的庞大、繁复、成分复杂的机关之间发生了分化。起初，这种分化只是心理性质而不是政治性质的。过去的时代在人脑子里的印象仍然很新鲜。十月革命的口号还没有被人遗忘。革命初期的领袖的威信还有很大作用。但在传统形式的掩盖下，一种不同的心理逐渐形成了。……**国际范围的前景愈来愈黯淡。人们**

---

<sup>①</sup> 《斗争的旗帜》1926年第17号、18号。——托洛茨基注

完全淹沒在日常工作之中。結果新的方法不是为旧的目的服务，却引起了新的目的，尤其是引起了一种新的心理。在許多人眼中，暫时的局面似乎变成了最終的目的。一种新类型的人是在形成了。

革命者归根到底也和其他一切人一样是由同样的社会材料构成的。但他們当然具备某些特出的个性，因而他們才能在历史过程中成为与众不同的一群。彼此的交往，理論工作，在同一明确旗帜下进行的斗争，集体的紀律，被危险的烈火中所受的鍛炼，——这些漸漸造成了革命类型。人們可以完全正当地說，布尔什維克的心理类型与孟什維克的心理类型完全不同。……然而这并不是說一个布尔什維克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布尔什維克。他們的心理中有許多沒有防卫的障地，这些障地在形势改变的时候很容易遭到外来和敌对思想的侵袭。在地下斗争时期，暴动时期，国内战争时期，这一类人只是党的战士。他們的思想都扣在一条心弦上，而这一条心弦的音响是与党的声音和諧一致的。但是等到紧张的局面緩和下来，从革命者的流浪生活过渡到安定生活的时候，普通人的特性，自滿官吏的感情和兴趣便在他们的心里复活起来。

我常常听到加里宁，伏罗希洛夫，斯大林，李可夫等人不时說出一些前后不連貫、令人担忧的話。我不禁自問：这些話究竟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当我去参加会议的时候，我往往发现他們三五成群地在談話，他們一看见我到来，往往就停止不談了。他們这些談話中絲毫沒有反对我的东西，也完全沒有反对党的原則的地方。但这些談話表明了一种精神松懈，自滿，浅薄庸俗的情緒。人們开始感到有互相傾吐这种新情緒的冲动；順便說一句：在这种情緒中，小資产阶级的庸俗閑話占据非常显著的位置。

在新的当权阶层的生活中，娱乐活动愈来愈普遍。我所以不

去参加，并非因为道德的原因，而是因为我憎恨沾染上那些无聊的习气。互相拜訪，經常观看芭蕾舞剧，参加宴会，在宴会上私下議論人家的短长等等，这些我是毫不感兴趣的。新的統治集团认为我不能适应这种生活方式，他們甚至不想邀我去参加。正因为这个緣故，好多小集团的談話一見到我来就立即停止了，談話的人也散开了，他們自己感到有点难为情，同时也有点厌恶我。可以說，这就是我开始丧失政权的明白迹象。

反对不断革命論的論調，正是从这种心理根源产生出来的。这运动是庸俗、无知、而且簡直是愚蠢的。从观看芭蕾舞剧归来，或坐在一瓶酒面前閑聊的时候，这个自滿的官吏会对那个自滿的官吏說：“托洛茨基滿脑袋装的只是不断革命。”与这种情緒密切联系着的还有一些对我的責备，說我孤僻不爱交际，个人主义，貴族气派。“不能一切一切、时时刻刻都为革命，也得多少想想自己。”——这个情緒随后便变成为一声：“打倒不断革命！”这些人对馬克思主义的严格理論要求和革命的严格政治要求的反抗逐漸地采取了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形式。在这个旗帜下，小資产阶级的原形就从布尔什維克面貌中显露出来。这便是我所以丧失政权的緣故，这也决定了我丧失政权的方式。

摘譯自《托洛茨基自传》(1929年)，  
紐約1930年版第502—505頁。

国际形势也以巨大的力量朝同一方向推进。世界工人阶级遭到的打击越沉重，苏維埃官僚的自信心越强。二者之間不仅有一种年代上的关系，而且有一种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在两方面都起作用。官僚的领导人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失敗；而这种失敗又促进了官僚的兴起。一九二三年保加利亚起义的失敗和德国工人党不光彩的退却，一九二四年爱沙尼亚起义企图的瓦解，一九二六年英国总罢工的被贩卖和波兰工人党在毕苏斯基上台时的可耻行为，一

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惨遭屠杀，最后还有德国和奥地利最近遭到的更为不祥的失败——所有这些历史性灾祸，摧毁了苏联群众对世界革命的信心，并使官僚作为唯一的救星而越来越提高自己的地位。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4—65页。

的确，有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团聚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旗帜周围。先进的工人毫无疑问地是同情反对派的，但这种同情是消极的。群众不相信一次新的斗争可以大大地改变局势。与此同时，官僚说：“为了国际革命，反对派建议把我们拖进一次革命战争。动荡得已经够了！我们已经赢得了休息的权利。我们一定要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请信赖我们，信赖你们的领导人！”这种休息的福音大大地巩固了官僚以及军官和国家官员，并且毫无疑问地在疲倦的工人当中，特别是在农民群众当中得到了共鸣。他们问自己：反对派真是为了“不断革命”的想法而准备牺牲苏联的利益吗？实际上，这种斗争同苏维埃国家的生存利益是一直有关系的。共产国际在德国执行的错误政策，十年后造成了希特勒的胜利——即造成了一种来自西方的具有威胁性的战争危险。在中国执行的同样错误的政策，支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使东方的危险大大迫近。然而，反动时期的特点，首先还在于缺乏勇敢的思想。

反对派被孤立了。官僚们则趁热打铁，利用工人的困惑和消极情绪，使其中比较落后的阶层反对先进的阶层，而且一般地说来越来越大胆地依靠同富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不多的几年当中，官僚就这样破坏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

同上，第65—66页。

## 二、說当时苏联出现了五六百万人的官僚阶层，他们独占了文明的新老成果

1. 胡說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就“改变了无产阶级本身的内部结构”，出现了以“运用政权”为专门工作的固定社会集团，他们“急于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說苏联“由于政治路线和党的制度的蜕化变质”，到一九三六年产生了五、六百万人的官僚阶层，而成为“专制的统治集团的真正社会基础”的则达二千五百万人。认为这些占人口总数“15%或20%的居民所享受的财富，并不比其余的80—85%的居民所享受的少多少”。

克里斯琴·拉柯夫斯基，以前担任过乌克兰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后来担任过苏联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他在一九二八年流放期间曾经给他的朋友写过一封信，簡略地探讨苏维埃官僚。这封信，我们在上面已经已用过好几次，因为它至今还是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一篇最好的东西。拉柯夫斯基在这封信中说，“在列宁的心中，以及我们大家的心中，党领导的任务在于保护党和工人阶级，使他们不受当权者方面由于拥有特权、地位和任命权而做出的腐败行动的影响，不同旧贵族和旧市民的残余接近，不受新经济政策的腐化的影响，不受资产阶级道德和思想意识的诱惑……我们必须坦率地、明确地和高声地说，党机关并没有完成这项任务，它暴露了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发挥保护者和教育者的双重作用。它失败了，破产了。”

.....

政权的取得不仅改变了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的关系，而且改变了无产阶级本身的内部结构。运用政权成了一个固定社会集团的专门工作，这个集团越把自己的使命看得高，它就越急于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拉柯夫斯基继续作了解释：“在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中，执政党的党员是不容许进行资本主义积累的，分化最初是职务上的，但是后来就成了社会上的了。我不是说这种分化变成一种阶级分化，而是说变成社会分化……拥有汽车、美好住宅、定期休假和得到党的最高薪水的共产党员，同在煤井中工作、每月得到五六十个卢布的共产党员比较起来，社会环境是不同的。”拉柯夫斯基列举了雅各宾党人在执政时期蜕化的原因——如追逐财富、参加政府的商业合同和供应等等，他还引用了巴貝夫的这样一种奇妙的评论：新统治阶层的蜕化，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受了以前的贵族小姐的影响，雅各宾党人对于她们是非常友好的。巴貝夫叫喊道，“你们这些小心眼的平民，你们在干什么呀？今天她们拥抱你们，明天她们就会绞死你们。”如果调查一下苏联统治阶层的妻子，那就会显示一种类似的景象。苏联的著名记者索斯诺夫斯基曾经指出“汽车-闺房的因素”对于形成苏维埃官僚的精神面貌所起的特殊作用。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3—74页。

一九二三年，情况开始稳定。内战，象同波兰的战争一样，已肯定地过去了。饥荒的最可怕的后果已经克服，新经济政策刺激了国民经济，使它得到了蓬勃的恢复，经常把共产党员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从一个活动范围调到另一个活动范围，不久已成为例外的情况，而不再是一种常规。共产党员开始得到长期的职位，〔这是从他们自己的地盘导致更高的职位的地盘，他们〕开始以有计划的方式来管理那些交给他们管理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地

区。〔他們迅速地变成官員，变成官僚，因为〕黨員和官員的职位安排有了一种更有系統和更有計劃的性质。任命职务不再被认为是临时性的和几乎是偶然性的了，任命的問題同个人的生活問題，〔被任命者的〕家庭的生活条件，他的前途，有愈来愈大的关系。

摘自《斯大林評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年版下册第500—501頁。

目前在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一般领导机关里存在着三种基本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公然无忌的右倾。这种倾向又包括两个集团。其中之一，由于它的机会主义和軟弱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代表“經濟上有势力的”中农的。它的路綫是中农决定的，它受到中农思想的指导。属于这个集团的有这样一些同志：李可夫，亚·彼·斯米尔諾夫，加里宁，格·彼得罗夫斯基，楚巴尔，卡敏斯基及其他人。紧紧圍繞着他們活动的是一些“非党”政客：康德拉节也夫之流，薩基林之流，查雅諾夫之流，以及富农的其他代表們，他們或多或少地公开宣揚烏斯特里雅洛夫的理論。在每一个省，尤其在每一个县都可以看到不少小康德拉节也夫和小薩基林，他們在那里拥有一份真正的权力和影响。第一种总倾向的另一个集团是由工会領袖构成的，他們代表着工人和職員中的高薪阶层。这个集团的特点是希望同阿姆斯特丹国际<sup>①</sup>加强联系。这个集团的領袖是托姆斯基，麦里尼昌斯基，多加多夫等同志。这两个集团之間有一定程度的摩擦，但是它們要使党和苏維埃国家的路綫無論在国际政策或国内政策上右倾的意图，却是一致的。它們都是以蔑視列宁主义理論和鄙弃世界革命策略著称的。**

**第二种倾向是官僚机器的“中派主义”。这种倾向的領袖是斯**

<sup>①</sup> 改良主义的工会国际組織，正式名称是“国际工会联合会”，1919年7月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立，受第二国际领导。1945年12月14日解散。——編者注

大林, 莫洛托夫, 烏格拉諾夫, 卡岡諾維奇, 米高揚, 基洛夫諸同志。实际上就是現有的政治局。不断搖擺的布哈林“代表了”这一集团的政策。这个官方中間集团本身絕不代表任何广大群众的态度, 但是它却企图——不是沒有成功——使自己代替党。党的、工会的、产业机构的、合作社的、国家机关的“行政人員”現在已达几万人。其中有不少“工人”官僚——这就是說, 以前是工人, 而現在同劳动群众已經失去了一切联系。

不消說, 在对革命前途有如此巨大重要性的行政和領導机关里, 当然也有成千上万坚定的革命者, 他們是沒有同群众断絕联系、无限忠誠于工人事业的工作人員。他們在这些机构里进行着真正的共产主义劳动。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由于政治路綫和党的制度的蜕化变质而产生了人数众多的真正官僚阶层这个事实。

这个阶层的实际权力是巨大的。正是这个“行政人員”集团坚持主张“安安靜靜”, “关心业务”——而最主要的是“不准討論”。正是这个集团自滿地宣布(并且有时是真正地认为), 我們已經“快要达到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革命“綱領的十分之九”已經完成。正是这个集团“高高在上地俯視”全党, 更加高高在上地俯視非熟练工人、失业者、雇农。这个集团认为主要的敌人在左边——这就是說, 在革命的列宁主义者之中。这个集团提出“向左开火”的口号。

目前, 右和“中間”这两种傾向, 由于它們共同敌視反对派而团結起来。但是如果清除了反对派, 它們之間的冲突就会加剧。

第三种傾向就是所謂“反对派”。这就是党的列宁主义派。由于統治集团要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 它就可鄙地企图把反对派說成是一个右傾派別(“社会民主主义傾向”等等)。反对派是拥护党的統一的。斯大林硬說反对派要建立“第二个党”, 他在这面謊言的旗帜之下宣传自己的綱領——“清除”反对派。反对派用自己的



口号回答道：“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列宁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统一”。目前这个文件阐明了反对派的纲领。党内的工人阶级成分和一切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将会拥护它。

反对派不得不在艰苦的条件下为列宁的事业而斗争，因此个人背离反对派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三种倾向的领袖中间将会发生个人的重新组合，但是这种重新组合并不能改变这个问题的根本事实。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4—76页。

按照官方数字，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的中央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约为五万五千人。但是，这个数字（最近几年又有了很大的增长）既没有包括陆军部、海军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也没有包括合作社和象国防航空化学协进会<sup>①</sup>这样的一系列所谓社会团体。此外，每个共和国还有自己的政府机关。

同国家机关、工人、合作社以及其他机关（有一部分是互相交错的）平行的，还有强有力的党机关。如果我们说苏联和各个共和国的上层领导集团有四十万人，那很难说是夸大。目前这个数字很可能已经增加到五十万。这还没有包括一般干部，而只包括“达官贵人”、“领导人”——姑且这么说——即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统治阶层，虽然说实在的，它本身又为很重要的界限分成若干等级。

这个拥有五十万人的上层，由一个巨大的行政金字塔支持着，而这个金字塔的基础是宽阔的和多方面的。各省各县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及与此平行的党机关、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地方运输机关、陆军和海军的司令部以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直属机构，总共大约有两百万人左右。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六十万个城乡苏维

---

<sup>①</sup> 全称是苏联国防和航空化学工业发展协进会。——英译者注

埃的主席。

工业企业的直接管理权在一九三三年(沒有更新的材料)是掌握在一万七千名經理和副經理的手中。車間、工厂和矿山的全部行政管理人員和技术人員,甚至包括較低的职位如工长,大約有二十五万人(虽然其中有五万四千名专家,严格地說来并沒有担負行政管理的职能)。此外,我們还必須加上工厂中的党机关和工会机关。正象我們所知道的,在工厂里,行政管理就是以这种“三角”的形式进行的。有五十万人管理着全国性的工业企业,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这个数字并沒有夸大。另外我們还必須加上各个共和国和地方苏維埃的企业中的管理人員。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官方的統計数字表明,一九三三年整个苏联經濟有八十六万以上的行政人員和专家——工业中有四十万以上,运输业中有十万以上,农业中是九万三千人,商业中是两万五千人。这个数字固然包括了沒有行政权力的专家,但并沒有包括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这些材料在最近两年半当中也大大地落后于实际情况了。

就二十五万个集体农庄來說,如果只計算主席和党的組織者,那就有五十万行政管理人員。实际数字要大得多。如果加上国营农場和机器拖拉机站,社会化农业的領導者总数,远远超过一百万。

一九三五年,国家有十一万三千个商业部門,有二十万个合作社。这两类机构的領導人,从本质上說并不是商业雇員,而是国家干部,并且还是垄断者。連苏联报刊也不时地抱怨,“合作社的管理人員已經不把合作社社員看成自己的选民了”——好象合作社机构在性质上可以同工会、苏維埃和党本身截然分开! **这个阶层都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而只是管理、下令、指揮、寬恕和惩罚,撇开教师和学生不算,这个阶层总在五六百万人之間。这个总数**

就象构成这个数字的各个项目一样，根本谈不上准确，但很够我们进行初步的研究。事实足以使我们确信，领导的“总路线”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精神。

在这个统治结构的各个阶层中，从下到上，共产党员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到九十。在全部官僚当中，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大约有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人——由于接连不断的清洗，目前这个数字只有少了一些，而不会增加。这就是国家政权的支柱。这些共产党行政管理人員也正是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支柱。以前的布尔什维克党，现在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成了官僚的政治组织。剩下的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是构成这种“积极分子”的泉源——即补充官僚队伍的后备军。非党的“积极分子”也是为同一目的服务的。从假定的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工人贵族和集体化农民贵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非党“积极分子”、得到信任的人以及他们的近亲远戚，差不多等于我们估计的官僚数字，即大约也在五六百万人之间。如果再加上他们的家属，那这两个相互交错的阶层大约有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人。我们对家庭成员的估计相对地说比较低些，因为往往丈夫和妻子，有时甚至儿子和女儿都在机关里占着一个位置。此外，统治集团的妻子在限制家庭人口方面要比劳动妇女，特别是比农村妇女容易得多。目前的反堕胎运动是官僚发起的，但并不适用于他们自己。人口的12%，也许有15%——这就是专制的统治集团的真正社会基础。

只要还是只有很少数人能够得到单独的住宅、足够的食品和整洁的衣服，那末，几百万大小官僚就会首先设法利用权力来保障自己的福利。这样就会使这个阶层具有浓厚的自私自利心理，使它的内部有一种牢固的团结一致精神，使它害怕群众的不满情绪，使它顽固地坚持压制一切批评，最后还使它向“领袖”进行虚伪的宗教式的膜拜——这是因为这位“领袖”正是这些新贵族的权力和

特权的体现者和维护者。

**官僚本身在协调一致方面比无产阶级或农民还要差。**农村苏维埃的主席和克里姆林宫的达官贵人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各种范畴的低级干部基本上过着一种很原始的生活——比西方熟练工人的生活水平还要低。但是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他们周围的居民的生活水平还要低得多。集体农庄主席的命运，党的组织者的命运，合作社下级管理人员的命运，就象最高级上司的命运一样，一点也不决定于所谓“选民”。为了平息某种不满情绪，这些干部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自己的直接上司搞下去。但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有时也可以高升一步。这些人至少在遇到第一次严重的波折以前，是由于共同的安全保障而同克里姆林宫结合在一起的。

**统治阶层在生活条件方面包括各种各样的等级，**从边远地区的小资产阶级生活一直到大都会的大资产阶级生活。同这些物质条件相适应的，也有各自的习惯、兴趣和思想范围。目前苏联工会的领导人在心理形态方面与西特令、石乌和格林<sup>①</sup>之流并没有多大的不同。虽然言词有所不同，但是同样的以傲慢的恩人态度对待群众，同样的以没有良心的狡猾手段施展二流的阴谋诡计，同样的保守，同样的眼界狭小，同样的只关心自己的平静生活，最后，同样的崇拜最浅薄的资产阶级文化形式。苏联的大多数将校军官跟世界其他地方的将校军官也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不顾一切地竭力模仿后者。苏联外交家从西方外交家那里学到的不仅是燕尾服，而且还有他们的思想方式。苏联新闻记者的愚弄读者方面也不亚于他们的外国同行，虽然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方式。

**如果说估计官僚的人数是一件困难的事，那末，要确切地说出**

---

<sup>①</sup> 都是英、法、美的改良主义工会领袖。——编者注

他們的收入更是一件困難的事。早在一九二七年左翼反對派就曾抗議，“龐大的享有特權的行政機關正在吞掉很大一部分剩餘價值”。根據反對派綱領中的估計，單單貿易機關就“吞掉一大部分國民收入——占全部生產的十分之一以上”。由於這種估計，當局便採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使別人無法再做這種估計。但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經常性開支不僅沒有削減，反而增加了。

其他方面的情況並不比貿易方面好些。正如拉柯夫斯基一九三〇年所寫到的，正是由於黨的官僚和工會的官僚之間偶然發生的一次爭吵，居民才從報刊上發現，在工會的高達四億盧布的預算中，就有八千萬盧布是用來養活工作人員的。我們要指出，這裡還只不過是一個合法預算的問題。除此以外，工會官僚還從工業部門的官僚方面得到大量表示友誼的禮品，例如現金、住宅、交通工具，等等。拉柯夫斯基問道，“究竟有多少錢是用來維持黨、合作社、集體農莊、國營農場、工業機關和行政機關以及它們的分支機構呢？”他的回答是，“我們連假設的材料都沒有。”

擺脫監督的不可避免的後果是濫用職權，其中包括金錢方面的不法行為。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政府又一次被迫提出了合作社的工作情形不好的問題，在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簽字下，政府確定了這樣的事實：“在許多農莊消費合作社中，存在着大量掠奪、浪費和損失現象。”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財政人民委員抱怨說，地方執行委員會容許隨便濫用國家的資金。如果這位委員對於中央機關的情況保持沉默的話，那只不過是因為他本人就屬於那個範圍。

要估計官僚在國民收入方面占用了多大的比例是不可能的。這不僅是因為官僚連自己的合法收入也謹慎地隱蔽起來。也不僅是因為他們可以利用不法行為的最後界限，常常還可以越過這種界限來廣泛地使用事先預計不到的收入。而主要是因為在社會福

利、市政公用事业、舒适、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整个进步，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主要还是为这个特权上层服务的。

关于官僚的消费情况，我们只要作一些必要的修改，就可以把说过资产阶级的话重说一遍。没有理由夸大官僚对于个人消费品的欲望，这样做也没有意义。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官僚几乎独占了文明的新老成果，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从名义上说，这些东西当然是属于全体居民的，至少是属于城市居民的。但是实际上，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居民才可以得到这种东西。官僚的情况恰好相反，他们通常想什么时候使用就什么时候使用，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就好像是他们个人的财产一样。如果不仅计算薪水和各种各样的实物收入以及各种型式的半合法补充收入，而且还加上官僚和苏维埃贵族在影剧院、休养所、医院、疗养院、避暑地、博物馆、俱乐部以及体育场等地方所享受的待遇，那也许有必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15%或20%的居民所享受的财富，并不比其余的80—85%的居民所享受的少多少。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8—103页。

2. 认为官僚不是“一个独立的统治阶级”，它不进行“阶级剥削”，而是“社会寄生”，它“并没有改变苏维埃社会的基础”。

阶级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极其重要的，而且有科学限制的意义。一个阶级并不是单单依据它参加国民所得的分配情况来确定的，同时还要根据它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独立作用以及它在社会经济基础中的独立根源来决定。每个阶级（封建贵族，农民，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其特殊的所有制

形式。官僚沒有这些社会特征。他們在生产和分配的过程中沒有独立的地位。他們沒有独立的所有制基础。他們的作用基本上同階級統治的政治技巧有关，每一个階級統治都有各种形式和不同規模的官僚存在。它的政权是属于反映的性质。官僚同經濟上的統治階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依靠后者的社会基础而生存，它和后者一同存在，并隨着后者一同灭亡。

摘譯自《苏联与第四国际》(1934年)，  
紐約1934年版第18頁。

在各种政权中，官僚总归是要吞沒不小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例如，計算一下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蝗虫所吞沒的国民所得也許不是沒有兴趣的！但是这个本身相当重要的事实，仍然完全不足以把法西斯官僚轉变成一个独立的統治階級。他們是資產階級的走狗。尽管这种走狗常常騎在主子的脖子上，不时夺取他口中最肥的肉，而且还对着主子的秃头吐痰。不管你怎么說他們是极不听话的走狗！但是仅仅是走狗而已。資產階級所以容忍他們，因为沒有他們，資產階級和它的統治必然会灭亡。

把上面所說的作一些必要的更改就可以适用于斯大林官僚。他們吞沒，浪費，侵占了相当大一部分国民所得。无产階級為他們的管理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在苏維埃社会中，他們不仅在享有政治和行政特权方面，而且在拥有巨大物质利益的方面都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但是最大的住宅，最肥美的肉排，甚至是洛尔斯·罗埃斯<sup>①</sup>都不能把官僚变成一个独立的統治階級。

同上，第18—19頁。

不平等（尤其是如此显著的不平等）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

---

<sup>①</sup> 英国汽車和飞机工业的大垄断企业，建于1906年。——編者注

当然是绝对不可能有的。但是同官方和半官方的谎言相反，目前的苏维埃制度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过渡性质的。它的内部仍然有着可怕的资本主义残余，尤其是社会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存在在官僚和无产阶级之间，而且也存在在官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在一定阶段，不平等依然存在，在某种限度内，发展社会主义所用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工具如工资差别，奖金等等仍将作为竞赛的鼓励。

虽然不平等可以作这样解释，但是决不能因为目前制度的过渡性质，就能说官僚的无法无天的上层所据为己有的那些荒谬的（公开和秘密的）特权是正当的。左翼反对派……就曾宣布官僚主义的一切表现正在扯掉苏维埃社会的道德约束；在群众中引起尖锐而正当的不满，为巨大的危机准备基础。然而，官僚的特权本身并没有改变苏维埃社会的基础，因为官僚的特权并不是来自一个“阶级”特有的特殊的所有制关系，而是来自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所有制关系，这种关系基本上是适合无产阶级专政的。

坦白地说，尽管官僚掠夺人民（这种掠夺是各官僚以各种方式进行的），我们并不能说这是阶级剥削（按这个词的科学意义而言），而只能说是社会寄生，虽然其规模非常大。……就寄生的特征而论，官僚以及教会牧师都接近于流氓无产阶级，正如大家所知，流氓无产阶级并不能说是一个独立的“阶级”。

同上，第19—21页。

### 三、认为官僚统治的基础是缺乏消费品

断言“官僚统治的基础是社会缺乏消费品”，“把十个人创造的东西拿来给一个人用”，这就必然在分配方面“形成并发展成一个强有力的专家阶层”。胡说“谁也不会



在有財富可分的时候把自己除外”，“当然要把最大的好处留给自己”。

綜上所述，我們已經初步了解了布尔什維克綱領和苏联现实之間的根本矛盾。如果国家沒有消亡，反而变得越来越专橫，如果工人階級的全权代表們官僚化而官僚們駕于新社会之上，那末，这并不是由于过去的心理残余等次要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只要国家不能保证真正平等就会产生并支持拥有特权的少数人这样一种铁的必然性所造成的結果。

官僚主义的傾向使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遭到扼杀，这种傾向即使在无产階級革命以后也会到处表現出来。但是非常明显的是，从革命中产生的社会越是貧穷，这种“法权”的表現就会越加严酷越加赤裸，官僚主义所具有的形式就会越加粗暴，同时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就会越加危險。苏維埃国家不仅被阻止消亡，甚至被阻止摆脱官僚寄生虫，这并不象斯大林那种赤裸裸的警察理論所說的，是以前的統治階級“残余”造成的，因为这些残余本身並沒有力量。苏維埃国家所受到的阻止，是来自力量大得无可估計的一些因素，例如物資匱乏，文化落后，以及由此产生的“資產階級法权”在最直接最密切关系到每个人的領域居于支配地位——即在保证个人生存的那些事情当中居于支配地位。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38—39 頁。

建立一个沒有官僚主义的国家的初次嘗試，首先遭到了这样的困难：群众对于自治不熟悉，缺少为社会主义而努力的熟练工人，等等；在遇到这些直接的困难以后，这种嘗試又很快地遇到其他一些更加严重的困难。党綱要求，国家改为执行“核算和监督”的职能，同时逐漸縮小强制的职能，这种改变至少具有一种普遍滿

足的相对条件。恰恰沒有这种必要的条件。西方沒有給予援助。当时的任务是順应那些特权集团，因为他們的存在对于国防、工业、技术以及科学来說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主苏維埃的权力便受到压制，甚至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把十个人創造的东西拿来給一个人用的这种絕對不是“社会主义”的行动，在分配方面便形成并发展成一个强有力的专家阶层。

最近一个时期在經濟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沒有緩和不平等关系，反而使不平等現象更加尖銳化了；与此同时，官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前是一种“腐化現象”，現在却变成一种行政制度了。

同上，第41—42頁。

实际上，他們也不能抛弃政权。要是用客观的語言来說就是这样：目前的苏維埃社会不能沒有一个国家，甚至也不能——适当地——沒有一个官僚阶层。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决不是过去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残余，而是目前的强大的力量和傾向，苏維埃国家作为强制性机关而存在的理由在于，目前的过渡性結構还充滿了社会矛盾，这种矛盾在消費領域——这是人人最亲切地最敏感地感觉得到的領域——处于极端紧张的状态，而且时时刻刻有在生产領域出現的危險。社会主义的胜利不能說是最終的，也不能說是不可变更的。

官僚統治的基础是社会缺乏消費品，因此便引起了你爭我夺的斗争。如果商店里的貨物充足，购买者就可以随时去买。如果貨物很少，购买者就不能不排队。而在队排得很长的时候，就必須指派一个警察来維持秩序。这就是苏維埃官僚的权力的起点。它“知道”什么人可以得到东西，而什么人必須等待。

乍看起来，物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应当减少特权的必要性，縮小“资产階級法权”适用的范围，从而动摇这种法权的保卫者即

官僚的立足点。实际上，情况恰好相反：截至目前为止，随着生产力的增长，各种形式的不平等、特权和优待都得到了极端的发展，官僚也因而得到了极端的发展。这也不是偶然的。

苏维埃制度在初期，毫无疑问要比现在平等得多，官僚作风也要少些。不过，当时是一种普遍贫穷的平等。国家的资源是那样贫乏，以至没有可能从居民群众中分化出一个特权阶层。同时，工资的“平等化”摧毁了个人的兴趣，也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苏维埃经济必须从它的贫穷基础上提高到相当高的水平，特权的大量积蓄才有可能。目前的生产状态还远远不能保障每个人的一切需要，但是已经足够给予少数人相当大的特权，并且可以把不平等当作一条鞭子来驱赶大多数人。这就是生产的发展到现在为止没有加强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反而加强了它的资产阶级因素的第一个原因。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除了在现阶段支配资本主义工资制的经济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这个政治因素就是官僚本身。从本质上说，官僚阶层是不平等制度的建立者和保护者。它最初是作为工人国家的资产阶级机关出现的。在使少数人得到好处并维护这些好处的时候，它当然把最大的好处留给自己。谁也不会因为在有财富可分的时候把自己除外。这样，由于一种社会需要而产生了一个机关，这个机关已经远远超过自己的社会必要职能，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因而也就成为使整个社会机体遭到巨大危险的泉源。

苏维埃热月的社会意义，现在开始在我们面前具体化了。群众的贫穷和文化落后又一次体现为掌握大权的统治者的那种恶劣形象。被废除的和遭到诅咒的官僚，从社会的仆人又一次变成社会的主人了。它在社会方面和道德方面已经达到这样脱离人民群众的地步，以致它现在无论在活动方面或者收入方面都不容许任何监督了。

官僚对于“小投机商、侵占者和誹謗者”的近乎神秘的恐惧，由此便可得到完全合乎邏輯的說明。苏联經濟由于还不能滿足居民的基本需要，因此它每走一步都要产生和复活那些侵占和投机的傾向。另一方面，新貴族的特权在居民群众中也引起了一种傾向，这种傾向就是傾听反苏維埃的“誹謗”——也就是傾听对于上司的貪婪和专橫行为提出的任何批評，即使是悄悄的批評。因此，这不是一个关于过去的幽灵的問題，不是一个关于不再存在的残余的問題，也不是一个关于过去的积蓄的問題，而是一个关于新的、有力的和不断重新生长的个人积累傾向的問題。国家的第一个繁荣的浪潮还是很微弱的，正因为还很微弱，因此它沒有削弱反而加强了这些离心傾向。另一方面，沒有特权的人也产生了这样一种欲望，即把新显貴的貪婪的手擋回去。于是社会斗争又趋于尖銳化。这就是官僚的权力的泉源。但是，也正是这个泉源产生了一种威胁，一种对官僚的权力的威胁。

同上，第80—82頁。

苏联是一个介乎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矛盾社会，在这个社会里，（1）生产力还远远不足以賦予国家所有制以社会主义的性质；（2）由于貧乏而产生的进行原始积累的要求，通过計劃經濟的所有毛孔表現出来；（3）保留着資產階級性质的分配标准是社会分化的基础；（4）經濟的发展緩慢地改善劳动者的状况，但却促使一个特权阶层迅速形成起来；（5）官僚利用了社会的对抗，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馳的、不受監督的等級；（6）被占統治地位的党所出賣了的社会革命还活在所有制关系和劳动群众的意識中；（7）积累起来的矛盾的繼續发展可能导致社会主义，也可能把社会拖回到資本主义去；（8）在走向資本主义的道路上，反革命势力必須打垮工人的反抗；（9）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必須推翻官僚。归根到底，問題将由两种活的社会力量在民

族范围和国际范围内的斗争来最后解决。

摘译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伦敦1937年版  
第241页,参看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86页。

官僚机构把国民收入中它能够或靠使用暴力、或靠运用权势、或借直接干预经济关系而攫取那一部分据为己有。在有关国家剩余产品的問題上,官僚机构和小资产阶级很快地从联盟变成了敌人。对剩余产品的控制开辟了官僚机构取得政权的道路。

摘自《斯大林评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年版下册第532页。

#### 四、攻击斯达汉诺夫运动培植了 工人贵族,集体化建立了一 批资产阶级集体农庄

声称“在商品流通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意味着“不平等的加剧”,“随着国家财富的增加,新的社会分化也在发展”。攻击斯达汉诺夫运动培植了“工人贵族”;集体化“为官僚的寄生主义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在农村造成一批“资产阶级集体农庄”——“百万富翁集体农庄”。

“全盘”集体化,即使在今后两、三年内真正实行,也决不是表示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生产合作社的形式,由于缺乏技术和文化基础,并不能阻止小商品生产者内部的分化以及资本主义分子从他们中间出现。为了真正消灭富农,需要在农业技术方面来一次彻底的革命以及把农民同工业无产阶级一起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工人和无阶级社会的成员。但是,这是几十年以后的远景。由于个体农民的工具和工具占有者的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占优势,正是在相对成功的集体化以后,亦即随着农业生产的普遍

增长，农民的分化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发生和增强。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具有新的技术因素的集体化将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如果没有这种提高，集体化在经济上就没有什么道理，从而也就维持不下去了），那么这就会立即在现在人口已经过多的农村中造成一千万，二千万甚至更多的过剩工人，即使有最乐观的计划，工业也不能够吸收这么多工人。随着过剩的，也就是说，在集体农庄找不到位置的半无产和半贫民化的人口增长，富裕的集体农庄以及贫穷的和中等的集体农庄内部的富裕农民将在另一个极端相应地增长起来。由于领导没有远见，预先宣布集体农庄是社会主义企业，资本主义农民分子就能够把集体化当作自己最好的掩护，结果对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更加危险。

因此，目前过渡时期的经济成就，并没有消灭基本矛盾，而是为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基础上更深一层地再现这些矛盾作了准备。

摘译自《苏联的发展问题》（1931年4月4日），  
纽约1931年版第7—8页。

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实行计件工资制以后，将来就可以增加商品的数量，降低物价，从而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即资本主义在繁荣时期也不例外的一面。社会的现象和进程还必须从彼此的联系和相互的影响方面进行考察。在商品流通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还意味着不平等的加剧。领导阶层的福利的提高开始远远超过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国家财富的增加，新的社会分化也在发展。

按照日常生活条件，苏维埃社会已经分成安全的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和在贫乏中生活的多数人。不仅如此，从苏维埃社会的两种极端情形来看，这种不平等还具有极其对立的性质。准备广泛流通的产品，通常总是价格高而质量低，而且离开中心城市越远就

越难买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投机而且公然盗窃消费品，都成了普遍的现象。过去这些行为是计划分配制下的一种补充，现在则成为苏维埃商业的一种调节办法了。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3页。

毫无疑问，上层工人的情况，特别是所谓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情况，去年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报刊不是没有根据地那样热中于列举这个或那个得奖的工人为自己买了多少衣服、鞋子、留声机、自行车或者多少瓶糖果。附带说一句，这样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普通工人得到这些好处的机会是多么微乎其微。斯大林在谈到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推动力的时候宣称，“生活得更好了，生活得更愉快了，生活既然愉快，工作也就顺利了。”在对计件工资制——这一点可以说明统治阶层的最大特色——所作的这种乐观的说明中，包含着这样一个平凡的真理，即**工人贵族之所以能够形成，完全是由于国家以前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但是，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动力并不是来自“愉快”的情绪，而是来自那种想得到更多的钱的欲望。莫洛托夫用这样的话纠正了斯大林的說法：“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提高生产率的直接动机，就是对增加收入感到兴趣。”这句话一点也不错。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一个工人阶层出现了，他们被称为“千字号人物”，因为他们每月的收入已经超过一千卢布。还有些人每月的收入甚至在两千卢布以上，而低等工人的收入往往还不到一百卢布。

看来好象只靠这种工资的差别就可以使“富”工人与“不富”工人之间有足够的区别。但是对官僚来说，这一点还不够。他们把各种各样的特权几乎象下骤雨般地给予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给他们新住宅或者给他们修缮旧房子，优先把他们送到休养所或者疗养院去，派教师和医生到他们的家里去免费教授和治病，给他们发

免費的电影票。在某些地方，他們还可以免費理发和修面，并且可以随到随理。在这些特权中，好象有許多是故意用来伤害和侮辱一般工人的。当局方面之所以有这样过分的善意，除了权位概念以外，还由于他們良心上感到不安。地方上的統治集团，都急于抓住机会让上层工人同他們共享特权，以免自己陷于孤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斯达汉諾夫工作者的实际所得往往等于下层工人的二三十倍。至于那些特別幸运的专家，他們的薪水在許多情况下可以支付八十个到一百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資。在工資的不平等方面，苏联已經不仅赶上而且远远超过了資本主义国家！

同上，第90—91頁。

平均計算，每个集体农庄的收入大約四千卢布。但是，关于农民的“平均”数字甚至比关于工人的“平均”数字还要具有欺騙性。例如在克里姆林宮，有人汇报說，集体化漁民在一九三五年的收入比一九三四年增加了一倍，即每人得到一千九百一十九卢布，后面这个数字得到了掌声，这一点說明这个数字大大超过集体化基本群众的收入。另一方面，有些集体农庄的每戶收入高达三万卢布，这还没有把个人經濟的貨幣和实物收入計算在內，也没有把整个企业的实物收入計算在內。总的說来，这些大集体农庄的每个庄員的收入等于“平均”的工人工資和低等集体化农民收入的十倍到十五倍。

收入的等級只是部分地决定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勤奮程度。集体农庄和农民个人的土地，由于气候、土壤和作物类别的不同以及距城市和工业中心的远近不同，而必然处于非常不平等的状态。城乡的对立不仅沒有在五年計劃期間減輕，反而由于城市和新工业区的迅速发展而大大尖銳化。苏維埃社会的这种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对立，主要是因为級差地租，不可避免地会在集体农庄之間以及集体农庄內部派生出矛盾。



官僚的漫无限制的权力，也是促使社会分化的一个同样有力的工具。他们掌握着工资、物价、税捐、预算以及信贷这样一些杠杆。中亚地带有一系列种植棉花的集体农庄，收入很不平衡，这主要是由于政府规定的价格不同，而不是由于集体农庄庄员的工作好坏。某个居民阶层剥削另一个居民阶层的现象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掩盖起来了。几万个“富裕”集体农庄庄员的幸福是牺牲其他集体农庄庄员和产业工人的利益而得到的。使所有的集体农庄庄员都达到富裕的水平，是一个比牺牲多数人而使少数人拥有特权要困难得多和费时得多的任务。一九二七年内左翼反对派曾宣称，“富农的收入已经增加得比工人的收入多到无法衡量的地步”，这个说法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上层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已经增加得比基本工农群众的收入多到无法估计的程度。目前物质生活水平的差别也许比消灭富农以前还要悬殊。

集体农庄内部的分化，一部分表现在个人的消费上；一部分表现在同集体农庄毗连的个人企业上，这是因为集体农庄本身的基本财产已经社会化。集体农庄之间的分化已经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后果，因为富有集体农庄有机会使用更多的肥料和更多的机器，因而可以更快地富足起来。取得成就的集体农庄往往雇用穷苦集体农庄的劳动力，而当局对此闭眼不问。把价值不等的土地分配给集体农庄，这就大大地促进了集体农庄之间的进一步分化，并因而形成一种资产阶级集体农庄，或者叫做“百万富翁集体农庄”，甚至现在它们还被人这样称呼。

在农民发生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国家政权当然可以作为调整者进行干预。但是朝哪个方向做呢？干预到什么限度为止呢？进攻富农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庄员，这就会同农民当中比较“进步的”阶层发生新的冲突，而这种阶层的农民只是经历了一段痛苦的停顿以后，现在才开始感到迫不及待地需要一种“幸福的生活”。不

仅如此——而这一点还是主要的——国家政权本身变得越来越不能进行社会主义监督了。在农业当中也象在工业当中一样，国家政权設法寻找强有力的、順利的“田間斯达汉諾夫工作者”的支持和友誼，寻找百万富翁集体农庄的支持和友誼。国家政权最初所关心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到最后就只关心自己了。正是在消費与生产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农业中，集体化已經为官僚的寄生主义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并为这种寄生主义同集体农庄的上层集团相互帮助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集体农庄的庄員在克里姆林宮的庄严會議上献給領導人的祝賀性“礼品”，只不过是他們向地方政权代表經常納貢的象征性表現。

由此可見，低生产水平同社会主义的甚至合作社(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形式不断地发生冲突的情况，在农业中比在工业中还要严重得多。归根到底，官僚正是从这种矛盾中产生的，而他們反过来又加深了这种矛盾。

同上，第95—97頁。

## 五、断言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和平溶入世界資本主义体系；資产階級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实现复辟

1. 說耐普曼、富农、沒有逃到国外去的地主、資本家及其子弟混入党和国家机关，支持官僚集团，出現“两个政权并存的萌芽”。

苏維埃的官僚主义問題还不仅是一个文牘紛繁和机构人員庞大的問題。根本上这是官僚机构所扮演的階級角色的問題，它的社会联系和同情的問題，它的权力和特权地位的問題，它同新資产阶

級和不熟练工人之間的关系，同知識分子和文盲之間的关系，同苏維埃“閣下”夫人和无知农妇之間的关系等等，等等的問題。干部站在哪一边呢？这是千百万工人每天在实际生活中不断提出的問題。

.....

必須注意，近几年来官員队伍的人数一直在增长。它在巩固自己，把自己置于一般人民之上，在同城市和农村的較富有的分子結合在一起。一九二五年的“指示”把选举权給了为数众多的剝削分子，这不过是一次很清楚的表现，表明这个官僚机构（直到它的頂峰）对于社会上富有的、发财的、兴旺的分子，已經变得有求必应了。取消这些指示——它們实际上是对苏維埃宪法的破坏——，是反对派批評的結果。但是在新指示下的第一次选举在一些地方已經暴露出有一种得到上面鼓励的意图，要尽可能地减少富裕阶层中被剝夺公民权的人数。但是，問題的中心不在这里。在新資產階級和富农不断相对增长、并且日益同官僚机构靠攏的情况下，在我們总的領導机关的錯誤路綫下，即使富农和耐普曼被剝夺了选举权，他們仍然能够影响——虽然是在幕后——行政人員和政策，至少对基层苏維埃机关是如此。

从一九二五年开始，后来由于反对派的反击而局部遏止的下层富农和“半富农”分子及城市資產階級对苏維埃的渗透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政治过程，如果忽視或者掩盖这个过程，就会給无产阶级专政带来可怕的后果。

城市苏維埃，这是使工人和劳动群众直到最后一人参加国家管理工作的基本工具，近年来它已經失掉了一切真正的作用。这是階級力量对比无可怀疑地向着不利于无产階級的方向改变的表现。仅仅在行政上“复活”苏維埃来抵抗这种現象是不可想象的。只能用坚决的階級政策来抵抗它——坚决反对新的剝削者，毫无例外地在苏維埃国家的一切組織和机关中增加无产階級的活动和

比重。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0—62页。

近几年来,富农越来越厉害地对农村中的贫农和城市中的国家政权施加压力,迫使国家政权改变它的经济计划和打算。

富农、私人工商业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仅同国家的、而且同党的官僚制度的许多环节相结合,乃是我們社会生活中最无疑问、同时也是最令人担心的过程。从这里正在产生威胁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萌芽。

摘译自《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反提纲》(1927年11月),载于《真理报》1927年11月17日第263号第3版。

解决誰战胜誰的問題的办法是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文化战线的一切陣地上的不断的阶级斗争: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按照哪种发展道路来分配国民收入,无产阶级完全掌握政权还是与新资产阶级平分政权。在我們这个小农和小小农与一般小业主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内,最重要的过程有时是分散和隐蔽地进行的,以后才一下子“突然”爆发出来。

资本主义的自发性首先表现在农村的分化和私人工商业者的增多。农村的上层分子以及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国家-经济机关的各种环节越来越密切地搅在一起。这个机关往往帮助新资产阶级用统计数字的迷雾来掩饰他们在争取增加自己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的成功的斗争。

……国家机关的影响正在增加,而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反常现象也随着滋长。由于乡村中资本主义的绝对增长和相对增长,以及城市中资本主义的绝对增长,使得我国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意识也在增长。这些分子也企图(并且常常不无成效)使一部分跟

他們在工作上和生活上有接觸的共產黨人精神墮落。

同上。

雖然十月革命的性質是無比深刻的，但“蘇維埃熱月”的隊伍，主要是從舊執政黨的殘余和它們的思想意識的代表們中間集結來的。那些沒有逃到國外去的地主、資本家、律師和他們的兒子被吸收到國家機器內，不少人甚至被吸收入了黨。更多的進入國家和黨機器里的人是小有資產階級的舊黨員——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徹頭徹尾的市儈們，這些人在暴雨狂風的革命和內戰的年月里，畏首畏尾躲在一旁，而最後相信蘇維埃政府穩定了，以專一的热情致力於爭取安適的永久地位的高貴工作，如果不是在中央，起碼在各省是這樣的。這一人數眾多、形形色色的烏合之眾是“熱月”的當然支持者。

這一烏合之眾的政治思想從淡淡的粉紅色直到雪白。當然，社會革命黨人總在準備以一切方法維護農民的利益和反對卑賤的工業家的威脅。總的講，孟什維克認為應該給農民資產階級更多的自由和土地。他們也成了農民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言人。混得政府工作的上層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殘存的代表們，自然抓住農民作為他們的救生帶。當時，他們在維護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方面，不可能希望獲得任何成功。他們清楚地知道，他們必得經過一個保衛農民階級的階段。這些集團沒有一個能公開出頭露面。他們都需要執政黨和傳統布爾什維主義作他們的保護色。對他們來說，反對不斷革命的鬥爭就意味着反對永遠確立他們所曾遭受的剝奪的制度的鬥爭。他們自然而然樂於接受布爾什維克中那些反對不斷革命的人作為他們的領袖。

經濟復蘇了。出現了少量的剩餘。自然，剩餘集中在城市里，任憑統治階層支配。隨之，戲院、餐館和娛樂場所恢復了。在一種沉睡狀態中度過了生氣勃勃的內戰年代的、數以十萬計的各行各

业的人们，现在醒过来了，伸伸懒腰，开始参与重建正常生活的工作。所有这一切人都站在不断革命的反对者的一边。他们都需要和平，发展，和加强农民阶级，也需要城市里娱乐场所的继续繁荣。他们力求这一趋势不要间断，而不需要革命。乌斯特里雅洛夫教授对一九二一年的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还是一种“演变”表示怀疑。这个问题使列宁感到非常不安。事变的发展表明，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一种特殊的配置，这个“策略”变成了“演变”的根源。这个革命政党以后采取的战略退却是它的蜕化的开始。

当进步的社会成就开始丧失时，反革命开始了。这种进步的社会成就的丧失似乎是沒有止境的。然而，革命成就的某些部分始终被保持下来了。这样，尽管官僚机构进行了可怕的歪曲，苏联的阶级基础仍然是无产阶级的。可是，让我们记着，这一丧失的过程还没有终结。欧洲和全世界今后几十年的前途还未确定。

摘自《斯大林评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年版下册第525—526页。

2. 污蔑苏维埃国家在国内外异己阶级的联合压力下实行“全面投降”：“通过‘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通过‘新新经济政策’回到资本主义去”。

我国存在着两个互不相容的立场。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另一个是一心要把我们的发展转到资本主义轨道上去的资产阶级立场。

资产阶级和追随它的小资产阶级各阶层这个阵营，把它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工厂主的私人首创精神和个人利益上。这个阵营把它的赌注下在“力量强的农民”身上，要使合作社、工业和我们的对外贸易都为这种农民利益服务。这个阵营认为社会主义工业不应该依靠国家预算，它不应该发展得太快以致损害农业资本家的利

益。爭取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日益加强的小资产阶级來說，就是压榨工人的体力和神經。爭取降低价格对它來說，就是为商业資本的利益减少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反对官僚主义对它來說意味着解散工业，削弱計划中心；意味着把重工业置于不重要的地位——这又是进行一次有利于力量强的农民的調整，并且很快就放弃对外貿易垄断制。这就是烏斯特里雅洛夫之流的路綫。这条路綫的名字就是根据分期計划实现資本主义复辟。这在我国是一个强大的趋势，它影响着我們党內的某些集团。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0—31頁。

(一)在我們和英国断絕关系以及其他内外困难的影响下，在多数派的統治圈子里正准备着下述的“計划”：(1)承认債務。(2)多或少地取消对外貿易的垄断制。(3)或从中国撤退——这就是，“暂时”撤銷我們对中国革命，一般地說即是对民族革命运动的支持。(4)在国内实行向右的“策略”——这就是，把新經濟政策扩大一些。希望用这个代价来防止战争危險，改善苏联的国际形势，消除(至少减少)国内困难。这全部“計划”是以資本主义有几十年的稳定这一假設为基础的。

实际上这不是“策略”，而是苏維埃国家这方面在目前形势下的全面投降：通过“政治上的新經濟政策”，通过“新新經濟政策”，回到資本主义去。帝国主义者会接受我們的一切让步，然后更加迅速地进行新的攻击甚至战争。富农，耐普曼和官僚分子意識到我們的让步之后，他們会更加頑固地組織起所有反苏維埃力量来反对我們党。我們方面的这样一种“策略”将造成我們的新“资产阶级”同外国资产阶级之間最紧密的同盟。苏联的經濟发展将落在国际資本的完全控制之下——一辨士的貸款等于一卢布的奴役。工人阶级和农民基本群众将对苏維埃国家的强大，对苏維埃

国家知道领导人民走向哪里开始失去信仰。

如果可能“用贖买办法使我們自己”免于战争，我們当然要尽力这样做。但是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們必須强大和团结，必須毫不动摇地维护世界革命的策略，必須加强共产国际。只有这样，我們才真有可能使战争确实长期推迟，而不必付出会損毁我們力量基础的代价；同时，只有这样，我們才能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真有可能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并且赢得战争。

同上，第 97—98 頁。

小商品經濟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剝削者。随着农村恢复的程度，农民群众的分化也开始扩大。这种发展走上了过去走过的老路。富农的增长远远超过农业总的增长。在“面向农村”的口号下，政府的政策实际上是使自己轉向富农。加在貧农身上的农业稅比加在富裕农民身上的重得多，不仅如此，富裕农民还占有了国家的大部分貸款。余粮主要掌握在农村上层分子手中，这种余粮就被他們用来奴役貧农并进行投机，卖给城市资产阶级分子。当时的执政派理論家布哈林向农民提出了他的著名口号“发财吧！”从理論上說，这个口号的意思也許是富农逐步长入社会主义。实际上，它意味着牺牲压倒多数的利益而使少数人发财致富。

政府在自己政策的摆布下，面对着农村小资产阶级的要求被迫步步后退。在一九二五年，雇佣劳动力和租用土地在农业中已經合法化。农民在一方面是小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工之間日益两极化。与此同时，国家由于缺少工业商品而被排挤出农村市場。在富农和小家庭手工业者之間，就好象从地下钻出来的一样，出現了經紀人。国家企业本身，为了获得原料，越来越不得不同私商打交道。资本主义日益高涨的潮流到处可以看到。有头脑的人清楚地看出，在所有制的形式方面进行的一次革命，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問題，而只不过是把这个問題提出来而已。



一九二五年正当对富农的方针全力执行的时候，斯大林开始准备把土地非国有化。有一位苏联记者在他的暗示下提出了一个问题：“把每个农民耕种的土地立契出租十年，是不是符合农业的利益呢？”斯大林回答说：“符合，甚至可以出租四十年。”格鲁吉亚的农业人民委员在斯大林本人的倡议下，提出了土地非国有化法案。其目的是使农民对于自己的未来具有信心。在一九二六年春天这项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预定要出售的粮食有百分之六十是掌握在百分之六的农民有产者手中！国家不仅缺乏用来出口的粮食，而且连国内需要的粮食也不够。由于出口达到无足轻重的地步，结果必须放弃进口工业品，同时尽可能削减进口的机器和原料。

这种依靠富裕农民的政策推迟了工业化并且打击了一般农民群众，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的两年内清楚地显示了它的政治后果。这种政策使城市和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大大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使他们夺取了许多下层苏维埃，加强了官僚的力量和自信，加重了对工人的压力，并且完全压制了党和苏维埃的民主。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6—17页。

3. 宣称官僚统治将引起“新统治阶级的产生”，但是“把政权转入资产阶级手中，决不会只限于单纯的腐化过程，而是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公开的暴力颠覆的形式”，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和平地溶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苏联经济和政治中的矛盾过程，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发展着的。社会政权的性质首先由所有制关系决定。土地国有化，工业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国有化以及国家掌握对外贸易的垄断，是苏联社会制度的基础。为十月革命所剥夺的各阶级，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官僚中的资产阶级，都只有通过反革命的颠

覆才能重建土地、銀行、工厂、制造厂、铁路等等的私有制。这些所有权关系是阶级关系的基础，它为我们决定了苏联作为无产阶级国家的性质。

摘译自《苏联的发展问题》(1931年)，  
纽约1931年版第3页。

平民<sup>①</sup>纪律的瓦解不仅会涉及到党、行政、经济、工会和合作社的机关，而且会涉及到红军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某些情况下，爆炸可能就在最后这一头开始。这已清楚表明，把政权转入资产阶级手中，决不会只限于单纯的腐化过程，而是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公开的暴力颠覆的形式。

这种情况会以哪种政治形式发生呢？在这方面，只可能揭示主要的倾向。左翼反对派一直把热月式颠覆理解为由无产阶级政权向资产阶级政权的转移，这种转移实质上已成定局，只是在形式上还是苏维埃制度的范围内，在官方党的一个派别反对另一个派别的旗帜下完成的。与此相反，波拿巴式的颠覆则是表现为较为公开和“成熟”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形式，这种反革命采用了在资产阶级财产的名义下举起赤裸裸的军刀的形式，反对整个苏维埃制度和布尔什维克党。摧毁党的右派，以及右派放弃自己的纲领，减少了采用前一种的、逐步的、隐蔽的颠覆形式即热月形式的机会。党的机构的平民式蜕化无疑增加了波拿巴形式的机会。尽管如此，热月和波拿巴主义并不代表不可调和的阶级类型，而只是同一类型的不同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活生生的历史过程无穷尽地创造出种种过渡的混合的形式。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资产阶级敢于公开提出政权问题，最后的答案将由各种阶级力量在决死战

---

① 指古罗马平民，他们是下层自由民，但最初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利，也不能使用公社土地，为此他们和贵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历数世纪才取得胜利。——编者注

斗中彼此較量而得出。

同上，第 30—31 頁。

承认目前苏联是个工人国家，这不仅表明，资产阶级要夺得政权非用武装暴动不可，而且也表明无产阶级还没有失去使官僚机构服从自己，使党获得新的生命力和改进专政政权的可能——不用进行新的革命，而是用改良的方法，走改良的道路。

同上，第 36 頁。

无产阶级专政是靠一次政治革命和三年內战而建立起来的。关于社会的阶级理论和历史經驗同样地证明：无产阶级通过和平方法，也就是沒有經過大規模的阶级斗争，不手握武器，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情况既然是如此，那末怎么能想象资产阶级反革命是不知不觉地，“渐进地”进行的呢？总而言之，到目前为止，封建的以及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从来不是“在机体內”进行的，这种反革命一概都需要实行軍事上的外科手术。归根結蒂，改良主义理論（既然改良主义一般都形成了理論）的根本弱点在于不了解阶级对立的深刻性和不可調和性；因而怀有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希望。馬克思关于政权从一个阶级手中轉到另一个阶级手中的残酷性质的命題不仅适用于历史飞速前进的革命时期，并且也适用于社会倒退的反革命时期。說苏維埃政府已經从无产阶级性质逐渐地变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人們，那可以說只是把改良主义的影片倒着放映而已。

摘譯自《苏联与第四国际》（1934 年），  
紐約 1934 年版第 4—5 頁。

官僚不是一个統治阶级。但是官僚統治的繼續发展能够引起新統治阶级的产生，不是通过机体的蜕化，而是通过反革命行动。我們把斯大林主义机构的人員称为中派正是因为它起着双重的作用；今天当一个馬克思主义的領導不再存在，并且还没有这样的領

导出現的时候，它用它自己的方法卫护着无产階級专政；但是这种方法却有利于明天敌人的胜利。誰要是不了解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双重作用，那他就什么也沒有了解。

同上，第 22 頁。

各个階級是由它們在社会經济制度中所占的地位来划分的，并且首先是从它們同生产資料的关系来划分的。在文明社会中，财产关系是得到法律的确认的。土地、工业生产資料以及运输和汇兌的国有化，再加上对外貿易的垄断，便构成苏維埃社会結構的基础。对于我們來說，通过无产階級革命所建立的这些关系，苏联作为一个无产階級国家的性质便基本上确定下来。

苏維埃官僚在其仲裁和調节的职能上，在关心保持社会等級上，以及在为了个人目的而剝削国家机关上，都同任何其他官僚是类似的，特别是同法西斯官僚类似。可是也有很多地方不尽相同。在任何其他制度下，官僚从来沒有摆脱統治階級而达到这样独立的程度。在資產階級社会中，官僚代表有财产有教养的階級的利益，这个階級拥有无数的日常手段来监督官僚的事务管理工作。苏維埃官僚則已經上升到一个几乎还没有摆脱貧困和黑暗的階級之上，并且沒有統治或者指揮的传统。法西斯分子掌握政权以后，用共同利益、友誼、婚姻等紐帶同大資產階級联合起来，苏維埃官僚則只采取了資產階級的风俗习惯而沒有一个民族資產階級在自己的旁边。从这个意义上說，我們不能否认，官僚还不仅仅是官僚，而是苏維埃社会中不折不扣的唯一享有特权和发号施令的阶层。

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也同样重要。苏維埃官僚已經从政治上剝夺了无产階級，以便用自己的方法来保卫社会的战利品。但是，官僚在一个主要生产資料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国家掌握政权，这就在官僚和全国富人之間創造了一种新的前所未聞的关系。生产資

料属于国家。但是，国家——姑且这么說——“属于”官僚。如果这些整个來說还很新的关系一旦固定下来，成为标准并且合法化，那末，不管有没有工人的抵抗，归根到底，这种关系要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战利品完全毁灭。不过，現在談到这一点，至少为时还早。无产阶级还没有最后发言。官僚也没有为自己在特殊的所有制类型的形式下进行統治創造社会支持力量。官僚不得不保卫作为自己的权力和收入的泉源的国有制。从官僚的活动的这个方面來說，官僚依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武器。

试图把苏維埃官僚当作一种“国家资本家”阶级，这显然經不起一駁。官僚既沒有股票，也沒有公債。官僚的增加、补充以及更新都是在不依靠自己的任何特殊的所有制关系的情况下用行政等級的形式来进行的。官僚个人并不能把他的剝削国家机关的权利传給他的后代。官僚是在濫用权力的形式下享受他們的特权的。他們隱瞞自己的收入；他們欺騙別人說，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來說，官僚甚至根本不存在。官僚把一大部分国民收入据为己有的行为具有社会寄生虫的性质。所有这一切都使苏維埃指揮阶层处于非常矛盾、曖昧和不光彩的地位，尽管它拥有完整的权力，而且还有阿諛奉承的烟幕来为它打掩护。

资产阶级社会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經改換过許多种政治制度和官僚阶层，但是它的社会基础并没有改变。它依靠自己的生产方法的优越性而保全了自己，使封建的和基尔特的关系不能复辟。国家政权已經有能力同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或者是制止这种发展。但是，总的來說，生产力在私有制和竞争的基础上正在逐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与此相反，从社会主义革命产生出来的所有制关系同新的国家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因为新的国家是这种所有制关系的貯藏所。社会主义傾向之所以比小资产阶级傾向优势，并不是經濟的自动发展——我們距这种情况还很

远——所保证的，而是专政所采取的政治措施给予了保证。因此，整个经济的性质决定于国家政权的性质。

如果苏维埃制度崩溃，那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计划经济的崩溃，并进而导致国有制的废除。托拉斯同其工厂之间的强制性关系将会破裂。比较有成就的企业就会走上独立的道路。这种企业有可能改变为股份公司或者采取某种过渡的所有制形式——例如，工人也参加分配利润这样一种形式。集体农庄将同时瓦解，而且容易得多。如果目前的官僚专政垮台而不是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权来代替的话，那末，资本主义关系一定会恢复，接踵而来的将是工业和文化的灾难性的衰落。

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对于保持和发展计划经济来说仍然是绝对必要的话，那末，最重要的问题是：目前的苏维埃政府究竟依靠谁，并且采取什么措施来保证它的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举行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实际上是向党告别时对指挥集团说了这样一段话：“历史了解各种各样的转变。依靠信念、忠诚以及其他最好的道德品质——在政治上这些都是不能认真看待的。”存在决定意识。在最近十五年中，政府已经改变了它的社会结构，甚至比改变它的思想还要深刻些。由于官僚在苏维埃社会的所有阶层中最好地解决了自己的社会问题并且完全满足于现状，因此主观上对于自己的政策的社会主义方向已经不再提出任何保证。官僚之所以继续保持国有制，只是因为他們害怕无产阶级。这种绝无仅有的惧怕是由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这个不合法政党所鼓励和支持的，这个政党是那些反对资产阶级反动——热月官僚已经完全浸透了这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最自觉的表现。官僚作为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已经背叛了革命。但是，一次胜利的革命幸好不仅是一个纲领和一面旗帜，也不仅是一些政治机构，而且还是一种关于社会关系的制度。背

叛还不够。必須推翻才行。十月革命已經被統治阶层背叛，但是还没有被它推翻。十月革命具有一种伟大的抵抗力量，这种力量就在于已經确立的所有制关系、无产阶级生气蓬勃的力量、它的最优秀分子的觉悟、世界資本主义的末日以及世界革命的不可避免性。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81—184頁。

**如果說，資產階級不可能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那末，同样真实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能和平地溶入世界資本主义体系。摆在历史日程上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和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是接連不断的世界动乱：战争和革命。在苏联的国内生活中，动乱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官僚在爭取实现計划經濟的斗争中被迫使富农非富农化，那末，工人阶级在爭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就会被迫使官僚非官僚化。后者的墓碑上将刻上这样的墓志銘：**

**“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在此长眠。”**

同上，第220頁。

因此虽然不能事先否认有可能在严格規定的情况下，与官僚的热月派結成“統一战綫”来对付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公开进攻，苏联的主要政治任务仍然是推翻同一热月的官僚。它的統治多延长的每一天，都有助于破坏社会主义經濟成份的基础，并且增加資本主义复辟的可能。共产国际作为斯大林集团的代理人 and 同謀者正是沿着这个方向扼杀了西班牙革命和瓦解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士气。

正如法西斯国家的情况一样，**官僚的主要力量不在它本身，而在于群众幻想的破灭，在于群众的缺乏新的前途。**和法西斯国家的情况一样(除了野蛮統治更无节制这一点以外，斯大林的政治机

构与这种国家并没有什么两样),今天在苏联只可能进行准备性的宣传工作。正如法西斯国家的情况一样,国外的事件可能会成为推动苏联工人革命高潮的动力。全世界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是今天反对斯大林独裁的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有许多迹象说明,共产国际由于缺乏国家政治保卫局那样的直接基础,将比波拿巴主义集团和整个热月的官僚先垮台。

摘自《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1938年9月3日),  
纽约1946年版第50—51页。

## 六、声称党的执行机关之代替党、 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的对立 将使党和老干部蜕化变质

1. 说党的执行机构的行政手段代替党的领导,使党官僚化;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党的政治机器不止一次成为“党堕落的原因”。

而相反地,机关工作方法越是占优势,党的领导越会被它的执行机构(委员会、常委会、书记等)的行政手段所代替。我们看到,在这种方针得到加强的情况下一切事情都集中在一小群人手中,有时是书记一人手中,他任免,发布指令,追究责任,等等。在领导的这种蜕化下,党的基本的无可估价的优越性——它的多种多样的集体经验就退到了次要的地位。领导具有纯粹组织上的性质,常常转变成简单的发号施令和以琐事扰人。党的机构日益陷于解决苏维埃机关的琐碎任务和問題中去,一天到晚关心它的日常問題,受它的影响,变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如果说作为集体的党



組織一向具有比国家机构的任何机关更丰富的經驗，那末，对于党机构的个别負責人就决不能这么說了。认为書記有了書記这个头衔就能在他的身上体现党的领导所必需的全部知識和本領，这其实是幼稚的想法。实际上，他为自己建立起拥有官僚主义部門、官僚主义情报和文书的附属机构，并用这一使自己同苏維埃机构接近的机构，把自己和生气勃勃的党隔离开来。于是，产生了象德国的名言所說的情况：“你以为在推动別人，其实是別人在推动你。”苏維埃国家的官僚主义的日常生活的全部麻煩都轉入党的机构，造成了党机构內官僚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集体的党感觉不到自己的领导，因为没有实行领导。因此，即使在领导实际上是正确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不滿或困惑。但是，这种领导无法坚持正确的路綫，因为它把精力耗費在瑣事上，不具备有条不紊的、有計劃的和集体的性质。这样，官僚主义不仅破坏党内团结，而且削弱党对国家机关的正确的影响作用。这一点总是那些在党对苏維埃国家的领导作用上叫喊得最响亮的人們所沒有注意到和所不理解的。

摘譯自《新方針（三）》（1923年12月），載于《真理报》1923年12月29日第295号第4版。

同样的現象以更加丑恶的形式出現在国家机关里。人們在那儿常常会遇到苏維埃“党”老爷的完善典型。在庄严的場合，他以十月革命的名义发誓；他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对自己的工作完全漠不关心；他彻头彻尾地生活在資產阶级环境中，背后大罵他的上級，而在党的會議上“痛斥”反对派。

一个领导党员（首先是書記）的实际权利要比一百个普通党员的实际权利大得多。这种日益以党机器代替党的情形是由斯大林的“理論”所促成的，这种“理論”背弃了对于每一个布尔什維克來說是不可破坏的列宁主义原則——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并且只能通

过党的专政来实现。

党内民主的死亡导致工会和其他所有非党群众组织内的一般工人民主的死亡。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2页。

党的报刊已经在聳人听闻的揭露的幌子下公布了阿尔乔莫夫斯克、斯摩棱斯克和其他案件。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对腐化进行斗争的呼吁。问题到此似乎就算了结了,事实上是尚未开始。

首先,党内广大人士不能不感觉到,已经公布的只是一小部分——并没有谈正在发生的总的情况,只是谈已经暴露的情况。几乎每一个省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自己的“斯摩棱斯克”事件,而且不是今天才有,甚至不是今年才有的。早在“自我批评”时代以前,赤塔、赫尔松斯克、弗拉基米尔斯克和其他许多地方都爆发了这种事件,只是立刻就被扑灭下去了;百分之百的区委书记都被揭露出来,他们曾经偷偷地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浪费大笔钱财来维持自己家庭的仆从。每当这种事件暴露出来,都有无可争辩的证据表明成百的人、有时甚至上千的人,上千的党员对这些罪行了若指掌,但是都绝口不谈。他们保持沉默的时间常常长达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甚至报纸也提到过这种状况。但是,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因为要是这样做,就有必要完全重复反对派文件曾经非常谨慎温和地说过的那些话。不得出必要的结论,斯摩棱斯克和其他事件的暴露仍然只是聳人听闻的新闻。它们使党感到激动,并没有起教育作用,倒是分散了党的注意力。

问题的关键在于:机构越脱离党的控制而独立,依靠机构为命的人互相之间的依赖性也就越大。相互保险并不是地方性的“瑣事”,而是官僚统治的根本特点。机构的某些扈从尽情干坏事,其他的人则保持沉默。党员群众呢?党员群众都吓怕了。真的,在曾

經實現十月革命的列宁的党里，工人黨員却害怕大聲說出机构的某个百分之百的扈从是一个流氓，一个侵吞公款者，一个恶霸。这是“斯摩棱斯克”事件揭露出来以后提供的根本教訓。受到这种教訓而不感到羞愧，就不是一个革命者。

从社会意义上說，阿尔乔莫夫斯克、斯摩棱斯克等等事件的主角是誰呢？他是一个已經摆脱党的积极控制、已經不成其为无产阶级专政旗手的官僚主义者。他在思想上已經枯竭，在道德上則放蕩不羈。他是一个享受特权、不負責任的干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极为粗野的人，一个酒囊飯袋，一个恶霸。一言以蔽之，是一个杰尔治摩尔达<sup>①</sup>（見列宁論民族問題的信件。这封信沒有向党公布）。但是我們的主角有他自己的“特色”：当他对人拳足交加、浪费国家資源或者是接受賄賂的时候，苏維埃的杰尔治摩尔达不是凭藉“上帝的意志”而是以“社会主义建設”的名义发誓賭咒。当下面有任何人企图指摘他的时候，他不是像过去那样大叫“造反啦！”而是狂呼：“托派分子！”——于是就胜利了。

摘譯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6—7月），  
紐約1936年版第302—304頁。

我們已經解釋过我們党受到的压力的階級性质：党机构內的仆从的串謀活动；党机构的許多环节同国家官僚机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和农村富农互相勾結；世界資產階級对各种力量的內部結構的压力——所有这一切造成了社会双重政权因素，他們通过党的机关对党施加压力。正是这个社会压力，在最近几年已經有所增长，并且已被党的机构利用来威胁党的无产阶级核心，迫害反对派，并且用組織手段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过程。

---

<sup>①</sup> 杰尔治摩尔达是果戈里《欽差大臣》中一个爱打人的警士。——編者注

异己阶级的压力在一定限度内使党的机构居于党之上，强化党的机构，并且逐渐向它们灌输刚愎自用的思想。党的机关并不关心查明自己拥有“权力”的主要原因。它们把战胜党、战胜列宁主义路线的原因得意地归结为自己的聪明。但是这种压力，由于没有遇到抵制，正在日益增强，它已经超过了限度，而几乎威胁到党的机构的统治。它威胁到某种重要得多的事物，尾巴开始打脑袋了。

摘译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6—7月)，  
纽约1936年版第304—305页。

不应该忘记，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机器主要是由知识分子构成的，他们的出身和生活条件是小资产阶级的，他们的思想和他们跟无产阶级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变成职业革命家的工人们非常急切地参加到这派人中间去，他们参加进去以后就失掉自己的特点。党机器的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以及它对无产阶级的权威(这两点都不是偶然的，而完全是由历史的必然性决定的)不止一次成为党动摇的原因，最后成了党堕落的原因。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这个理论表示了整个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但是党机构中的人们按照自己的比较有限的经验，只吸收这个理论的零星部分。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往往只是死记现成的公式，而闭目不视情况的改变。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缺乏同劳动群众的独立的日常接触，也缺乏对历史进程的全面了解。因此他们易于受到其它阶级的影响。战时，党的上层大半受到来自资产阶级人士的妥协主义倾向的影响，而普通的布尔什维克工人在抵抗席卷全国的护国主义歇斯底里方面表现了大得多的稳定性。

摘自《斯大林评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年上册第269页。

2. 說领导干部与全体党员的对立会“使党遭到蜕化”，吹捧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只有新老一代“經常相互影响”，才能使老一代免于“僵化”和机会主义蜕化。

官僚主义扼杀首創精神，从而阻碍党的整个水平的提高。这就是它的主要过错。既然更有經驗的有功的同志必然会进入党的机构，所以机构的官僚主义最严重地影响党的青年一代的政治思想的提高。青年——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的反应最敏感，其原因正在于此。

但是如果认为，似乎濫用机构的办法来解决党内问题的做法会对体现着党的政治經驗及其革命传统的老一辈毫无影响，那就错了。不，这一方面的危险也是很大的。說我們党内的老一辈有巨大意义（不仅就俄国范围來說，而且也就国际范围來說）是大可不必的，因为这是众所周知和一致公认的。但如果把这个意义看作是独立自在的事实，那就大錯特錯了。只有老一代和青年一代在党内民主的范围内經常相互影响，才能保持老近卫軍这一革命因素。否則，老头們就会僵化，就会在本人也沒感觉到的情况下成为机构的官僚主义的最完备的体现。

“老近卫軍”的蜕化在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就拿第二国际的領袖和政党这个最新最显著的历史实例來說，我們不是知道嗎，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津盖尔、維克多·阿德勒、考茨基、伯恩施坦、拉法格、盖得等等，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教导出来的学生。但是，我們知道，所有这些領袖——有些人是局部地，另一些人是全部地——都在議會改良和党及工会机构独立发展的环境下朝机会主义方向蜕化了。我們看到，而在帝国主义大战的前

夜尤为清楚，在老一輩的声望掩盖下的强大的社会民主党机构怎样成了革命发展的极严重的障碍。我們——正是我們这些“老头子”——应当說，我們这一代在党内自然是起领导作用的，可是，假如党容許在政策中让机构的官僚主义的方法得到继续发展和加强，那末我們就沒有任何足以防止无产阶级精神和革命精神逐步地不知不觉地消沉下去的独立保障，因为这种方法使青年一代变成消极的教育对象，并不可避免地使机关和群众、老头和青年疏远起来。要防止这种无可置疑的危险，除了使方針作轉向党的民主方面的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改变，并越来越多地把直接参加生产的无产者吸收到党内来，是沒有别的办法的。

摘譯自《新方針(一)》(1923年12月8日)，載于《真理报》1923年12月11日第281号第4版。

有一点是必須一开始就清楚了解的：我們所遭受的摩擦和困难，其实质不在于書記在某些地方作得过火了，因而必須稍为阻止他一下，实质在于，整个党要轉入更高的历史阶段。黨員群众仿佛向党的领导机构說：“同志們，你們有十月革命以前的經驗，这些經驗是我們多数人所沒有的；可是，在你們的领导<sub>下</sub>我們获得了十月革命以后的經驗，这种經驗越来越多了。我們不仅想受你們领导，而且想同你們一起参加对阶级的领导。我們所以想这样作不只是因为这是我們黨員的权利，而且因为这是整个工人阶级所切身需要的。沒有我們下层的經驗(不是简单地从上級那里吸取来的，而是我們自己积极地帶到党的生活中来的)，党的领导机构是会官僚化的，而我們下层人物就会在非党群众面前感到自己沒有足够的思想武装。”

如上所述，目前的轉变是从过去的全部发展中产生的。肤浅的眼光所察觉不出的党的生活和意識上的細微变化过程，早就为轉变作了准备。銷售危机大大推动了思想批評工作。德国事变的

迫近使党精神一振。正是这个时刻非常突出地暴露了，党的两层楼生活已达到何等程度。上层作决定，下层只是打听决議。

摘譯自《新方針(三)》(1923年12月)，載于《真理报》1923年12月29日第295号第4版。

由于重大的历史原因和我們的錯誤而形成的旧方針，其主要危險在于它暴露出几千个领导干部同志和作为影响对象的全体党员群众日益对立的趋向。如果这种制度今后繼續固执地保持下去，无疑地，它最終会使党遭到蜕化的危險，而且，这种蜕化是在党的两极上同时发生的，即，既在青年党员身上也在领导干部身上发生。至于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工厂和学生支部等等，危險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相当多的党员由于感觉不到自己是全党工作中的积极参加者，由于自己向党所提出的問題得不到应有的及时答复，就会开始在各种各样的小集团和派別組織的形式下为自己寻找党员独立活动的代用品(錯誤的代用品)。象“工人集团”这样的小集团之所以具有征兆的意义，我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說的。

但在另一端上，即执政的一端上，这种拖延过久的、被党看作官僚主义的方針，它的危險性也是不小的。如果不懂得或看不到中央决議对官僚主义的譴責正是对党的领导干部的譴責，那是可笑的、不体面的鸵鳥政策。問題不在于党的实践在个别地方有脱离正确的最完善的路綫的傾向，而正是在于机构的方針，在于它的官僚主义傾向。官僚主义是否包含有蜕化的危險呢？否认这种危險是盲目无知的。官僚主义化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有下列这些危險：脱离群众，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管理、挑选和調动的問題上，縮小眼界，削弱革命嗅觉，也就是，或多或少地使老一輩至少是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遭到机会主义的蜕化。这种过程是緩慢地、几乎不知不觉地发展着的，但暴露出来却是很快的。只有有了官僚主义的病态的神經過敏和机构的傲慢态度，才会从这个以客观

的馬克思主义預見为依据的警告中看到某种“侮辱”、“謀害”之类的东西。

可是，实际上这种蜕化的危险是否很大呢？党懂得或感到这种危险并对此有积极的反应——比如政治局的決議就是因此而問世的——，这个事实证明党有深厚的生命力，从而也发现抵制官僚主义之毒的抗毒素的活的源泉。这就是党的革命自卫的主要保障。但是，既然旧方針力图千方百計地通过压制，通过越来越多的人工选择和恫吓的办法保持下来，总之，通过对党采取官僚主义的不信任的办法保持下来，那末，大部分干部遭到蜕化的实际危险就会不可避免地增加起来。党是不能只依靠过去的本錢为生的。过去准备了現在，这已經够了。但必須使現在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能跟得上过去，为将来作准备。現在的任务則是：把發揮党的积极性的重心轉移到党的基本群众中去。

同上。

### 3. 声称官僚作风是“从中央經過省向县里发展的”。

官僚作风并不是个别省組織的偶然特征，而是普遍現象。它不是从县經過省向中央发展的，而是恰好相反，是从中央經過省向县里发展的。它决不是战争时期的“残余”，而是把正是最近几年积累起来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方法搬到党里来的結果。不管战争时期的官僚主义在个别情况下具有何种畸形的形式，但它同目前的官僚主义比較起来，却是黄口小儿了，目前的官僚主义是在和平发展条件下形成起来的，現在尽管党的思想水平有了提高，但党的机构仍繼續固执地代替党考虑和决定問題。

摘譯自《新方針(三)》(1923年12月)，載于《真理报》  
1923年12月29日第295号第4版。



## **(十三) 关于工会国家化**

### **一、声称经济机构和工会并存 不是“工人国家的原則”**

声称经济机构和工会并存不是“工人国家的原則”，而是过渡时期的“暂时現象”。所以出現这种現象是因为经济落后、无产阶级的“准备不足”以及“低下的文化水平”。例如“在苏維埃政权的第一个时期工会曾试图直接掌握生产机构”，但它們“沒有能力这样做”。

**1. 根据我們党綱的精神，由相应的工会来管理铁路和水运应当成为我們的目标。**

但是党綱的意思决不是把管理直接轉交給在資本主义时代形成的那种样子的工会手里。在苏維埃制度下工会的社会作用根本改变了。与此相应，应当改变它的組織，应当选派負責工作人員。

旧的工会不是靠一紙决定就简单地变成生产机关的。只有通过选拔和培养工作人員、培养自己的专家、合理地 and 适当地分配力量等等坚持不懈的工作，它才会成为生产机关。

铁路机构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交通運輸人民委員及其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机构，另一部分是应当包括全体運輸工作人員的運輸工会，——这是过渡时期的現象，在此期間将完成內部改組和适应于新任务的过程，即适应于既由運輸部門的主管机关，也由

工会来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运输工作。

这一过程迟早应当导致工会和行政机构完全合并，即导致建立统一的机关，它将同样地统管运输的行政-技术需要及其工作人员的各个方面和利益。

摘译自《在走向产业工会的道路上》(给铁路工会代表大会的意见)(1920年)，载于《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386—387页。

2. 危机的基本原因是工会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明确和两重性。在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时期工会(在发生革命时的那种形式下)曾试图直接掌握生产机构。它们没有能力这样做。开始和它们并行地形成苏维埃管理工业及其他经济部门的机构。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依靠工会的同时，这一苏维埃机构完全离它而独立了，并把对经济的领导完全集中在自己手里。

这样，工会的机构就和管理该工业部门的机构并行存在。行政经济机关的自主性和闭塞性越来越发展，因而它对工会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发展。换句话说，工会越来越被排除对经济生活的实际参予。

留给它的是在推荐经济工作岗位的人选和在生产宣传方面的相当不明确的和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极其有限的作用。

在工会前面没有任何远景。然而为了发现合适的人选，以及进行生产宣传可以建立比工会远为经济的机关。工会的许多积极的工作人员为这种状况而苦恼，力图离开工会的工作。如果危机在其目前这种形式下拖下去的话，工会就有完全瓦解的危险。

3. 在工人国家内工会是旨在最正确和最有成效地服务于生产本身的利益和旨在同时提高工作人员本身的物质和精神水平的，包括该经济部门的工人的组织。产业工会不是从属于生产的工会，而是为了生产的工会，即为了全面地参加生产和为了领导

生产的工会。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出，**经济机构和工会组织的平行**只有作为暂时的现象，而不是作为工人国家的原则才是可以容忍的。

摘译自《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1920年11月9日提交俄共中央的提纲初稿），载于《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33年版第786页。

我认为，在这里洛佐夫斯基同志无疑是正确的——正是经济政策上的转变引出工会政策的形式。我们是从哪儿开始的呢？如昨天在这儿讨论时所說的，如列宁同志在第三天的报告中所說的，我们在经济政策中是以跟资产阶级的过去急剧而不可调和的决裂开始的。过去有过市场，现在废除了，自由贸易废除了，竞争废除了，商业核算废除了。用什么代替这些？集中的、至高无上的、神圣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它统管一切，组织一切，照顾一切：机器送往哪儿，原料送往哪儿，成品送往哪儿，——它从统一的中心出发通过自己的负责机构决定、统管一切。我们在这一计划上失败了。为什么？因为**事实证明准备不足，或如列宁同志所說的，由于我们低下的文化水平……**而如果没失败呢？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另一个工人阶级在其专政的某一阶段上，就文化修养而言有可能转向这种集中的国家规模上的废除市场、竞争、核算，并以包罗一切和预见一切的统一的经济计划来代替它，——**那时毫无疑问就不可能存在工会之间和经济机关之间的两重性。那时工会国家化和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领导就会意味着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那末，我们的错误到底在哪里呢？错误在于，如果从经济观点来说，——昨天我曾极力指出，总的来讲问题在于革命的必然性，——但是如果单就经济这一面而言，那么错误在于无产阶级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无力。在国家的当前条件下，在它本身的技术、生产和组织上的目前这种文化程度，它不能集中地建设社会主义，但如果

它这样做了，如果它沿这条道路走了，那末除了工会国家化的道路以外，我个人就是现在也没看到任何其他道路。一种情况是从另一种来的。错误不在于国家化的要求，而在于不合条件的经济政策。

摘译自《在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工会问题的发言》（1922年3月29日），载于《联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61年版第269—270页。

## 二、鼓吹工会国家化，由工会来管理生产

声称在苏维埃制度下工会的“意义和作用”在于“它力图、准备并加以改组来掌握整个生产管理，否则它就用不着存在”。因此要求“更坚决、更迅速地使工会国家化”，使工会“变成真正生产组织”，“保证工会在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地位”，“把对经济生活的全部领导集中在自己手中”。例如“铁路工会应当成为生产的，即管理运输的组织”，应当“把交通人民委员会的全部机构最终都变成工会的行政经济机关”。

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在有了全俄铁路总执委会和其他非铁路工会在还没有改组得适宜于干预生产的时候去直接干预生产的经验以后，现在似乎出现某种相反的极端：工会好象根本拒绝，在较近的将来——经过一年、两年、三年或五年（这取决于事情的发展情况）——好象拒绝领导生产，把自己的任务缩小为只是“协助”那些领导生产的机关和人。同志们，我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是根本错误的，并会完全缩小工会的历史意义和作用。我们暂时按照习惯还继续称它们为工会，虽然在苏维埃国家里，在向共产主义过渡

的时代，它們当然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社会作用、自己的社会职能和自己的使命。工会应当真正成为产业工会。如果它現在还有意义和作用，那只是因为它力图、准备并加以改組来掌握整个生产的管理，否則它就用不着存在。（鼓掌）

同志們，这是在关于你們工会問題上的主要准則，主要观点。如果我們不規定出工会这一生产领导机构的基本任务，我們就会在实际問題上迷失道路，絆腿跌交和常犯錯誤。它現在是不是这样的机构呢？不，不是。

在这里，我认为引证一下安奇波夫同志关于个别的然而是很重要的問題——关于綫路建設問題的提綱是有益的；在我看来，这个提綱好极了，虽然远不是你們所有的人都贊成这个提綱。

虽然如此，在这个提綱（发表在《汽笛报》第五十号上）里有一个論断，我是不能同意的。安奇波夫說：“許多大工会已經最后形成产业工会，并且已經巩固起来。”这是絕對不正确的。关于俄国的工会，决不能这样說，自然，这对铁路員工工会也是一样。工会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不是旧意义上的工会呢？不是。旧工会是工联，即本車間或本工业部門工人的联合，其任务是在反对資本和国家的斗爭中提高他們的物质和道德水平，改善他們的处境。任何資本主义社会的工联、工团和工会都是如此。自然，你們的工会沒有这样的使命。在你們所建立的苏維埃国家里，工会跟国家进行階級斗爭是荒謬的事情。那么，实际上干什么呢？“协助”組織生产。协助——这固然也是一种作用，但这不够；为了这一点，不需要如此龐大的机构，不需要这种人数众多的組織以及包括大量的宝貴的人力的复杂的上层机构。但是，我們且把問題提得准确点。同志們，什么是协助組織生产呢？这里产生了什么是組織生产的問題。組織生产就是組織人們进行生产。这种組織不是无生命的技术性的，而是活生生的，是把劳动的人們結合在一起，即把

人和人(在各个工厂、管理处和办事处里)结合起来进行生产。因此，生产的基础是用特殊方式組織起来的集体的，即人数众多的人。誰来組織铁路員工呢？铁路工会、工会組織他們干什么？为了生产，在这里就是为了运输。因此，**铁路工会应当成为生产的，即管理运输的組織。**应当成为这样的組織。但是，依靠我們从过去接受来的那种形式的工会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嗎？不，不能够。

全俄铁路总执行委员会的罪过和不幸在什么地方呢？据說，它干預了許多行政問題。它“干預”得好嗎？即把管理运输的工作組織得好嗎？不，不好。但是，**它力求把生产掌握在自己手中是否正确呢？绝对正确。**全部实质在于：这种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所产生出来的工会过去是工联主义的工会，它的内部組織适于另一些目的，即适于为爭取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而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而不适于組織运输。现在則要由原有的这些成分，这些人員建立另一种工会，另一种适合于管理生产的組織。这一点是可以办到的，正如同用同样一些磚瓦可以修建住房、教堂和练馬場一样。**我再說一次，必須由铁路員工建立直接适合于管理运输的組織。**这需要多少時間？我不来預言，这不仅仅取决于我們和我們的善良意願（虽然这自然也与它有关），而且也取决于我們还要花多少時間来打仗：我們是从你們这里調走工作人員(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作为軍事部門的代表說話的)，还是相反地把工作人員从軍事部門抽調給工会；我們是全力恢复經濟，还是繼續把它消耗在战争的需要上。这里有几十种能推迟或加速铁路工会成为直接管理运输的机关的原因和影响。但是，我已經說过，在这許多原因当中，工会本身的各种内部傾向和要求也起着不良的作用。我們必須为自己提出由工会在各方面，首先是在生产方面掌握运输的任务。为此，就必须摆脱由过去工会的工联主义作用

所造成的一切传统。

摘譯自《在全俄铁路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20年7月21日), 載于《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  
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388—390頁。

**我們給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使我們的工会变为真正生产組織，  
逐步掌握运输的机构并把运输需要的一切工作人員吸收到自己的  
队伍中来，最終应当完全消除工会組織和国家生产組織平行存在的  
現象，把它們联合为更高类型的組織。**

摘譯自《給铁路和水运工人中央委员会的信》  
(1920年11月6日), 同上, 第409頁。

……共产党、产业工会和工人国家的机关的思想和精力应当  
用于使經濟机关在較早或較迟的将来和工会合并，以便使工会一  
无例外地包括該工业部門的全体工作人員，使行政經濟机构成为  
工会內管生产的、即最重要的机关，在它的后面則有宣传教育、供  
应、紀律等机关。

4. 因此，对执掌政权的工人阶级来說，在工会方面的任务应从  
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必須使工会掌握生产，另一方面必須使工会善  
于掌握生产，而不仅仅是給予“协助”。

正是应当清楚明确地为工会提出这一目标。工会在工人国家  
中的生产作用根本有別于它在資本主义国家中的（基本上是）“工  
联的”作用。同时，**在保存和巩固国家-經濟机关和工会机关的独  
立性的情况下，工会內部繼續保存着把国家当作締約一方的关系。**  
由于上述情况的結果而流传在許多工会工作人員的心理中的这种  
工联主义成份对工会、对經濟机关，換句話說，对整个工人阶级是  
极其危险的。

5. 在为自己和工会提出清楚明确的任务，即保证工会在經濟

生活中的統治地位的任务之后，党应当在自己和工会面前提出为此目标改組、改造工会，对它进行重新教育的任务。

我們建立、改組、解散和重新建立經濟-苏維埃机关，同时选拔和审核不同崗位上的不同工作人員。工会同这一工作几乎完全无关。然而极其明显，如果为工会提出在两三年之內掌握自己的生产的任务，那么現在就必须开始改組工会，即首先从这一观点出发去选拔領導人員。

6. 显然，整个說来，只有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苏維埃国家才能对把工会从职业的改組成生产的工作<sup>①</sup>实行思想領導，才能为这种改組提供必要的人員和物质条件(人員、技术机构等等)。在某些地方(中央运输工会)旨在使工会接近产业类型的組織变更是通过极其尖銳的和急剧的組織措施实现的，这种措施是由特殊条件引起的。如果清楚明确地規定苏維埃国家工会組織的目标并使这一作用成为全体工会工作人員的財富，那么改組工会的組織措施就能在摩擦最少的情況下具有远为平靜的性质。然而极其明显，这一决定工会今后命运的(瓦解或者上升到較高的历史水平)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工会是不能自行处理的，而必須听取党的清楚明确的指示和取得工人国家組織上和物质上的全面援助。这种領導和行动的机关在一种場合下是政治部(交通总政治部)，在另一种場合則是党中央委员会、相应的工会的中央委员会、經濟管理总局的代表参加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临时委员会。

.....

8. 应当这样改組工会：

(1) 賦予工会以广泛的生产的宗旨(掌握生产)，这个宗旨应当是鼓动宣传、組織、选拔人員的基础；

---

<sup>①</sup> 即职工会改組成产业工会。——編者注



.....

12. 在那些在該工业部門复兴的基础上业已完成向提高方面内部轉变的工会里，可以而且应当越来越广泛地采用工人民主的方法：在广泛的群众會議上系統地討論全部經濟-生产措施，一系列經濟-行政职位实行选举，同时使这些职位同生产組織內的一定地位結合起来，等等，等等。

.....

15. 繼續发展这种制度，逐渐扩大运用从基层到上头的选举原則，越来越紧密地把工会中的負責作用和生产中的負責作用結合起来，我們就将在或早或迟的最近期間处于下列状况，即工会完全地和全面地統管某生产部門的同时，将运用选举和选拔的办法从自己那儿分出在协调所有經濟部門的工作的工人国家的总的监督和領導下的全部行政經濟机构。

摘譯自《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1920年11月9日提交俄共中央全会的提綱初稿)，載于《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記記錄》莫斯科1933年版第786—789頁。

工会应当把对經濟生活的全部領導集中在自己手中。它們不是簡單地协助生产，而应当組織生产，成为这一組織的有充分权力的領導者。和官僚主义斗争并不是个别的、孤立的、可以由个别反官僚主义的技术专家(可惜，有这种专家)专门来搞的任务，——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只能在实际組織生产本身以及吸引劳动群众本身参加这一組織工作的基础上进行。請看我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問題的決議，在原則部分它只是重申党綱，而在实践部分它拟定了关于工会和經濟机关在其現存形式下如何协调工作的某些阶段、某些过渡阶梯；因为如果有必要使工会越来越成为經濟的領導机构，那就不能不看到，現在還沒做到这一点，而试图机械地把經濟轉交給个别工会的做法必遭失敗。这种情况我們在铁路運輸

方面見到过，——曾通过全俄铁路总执委会作过这种嘗試，——而当时工会无法胜任、也不能胜任运输任务，因为，再說一遍，它是从旧时代来的，完整地保留着旧的組織系統、旧的工作习惯及旧的全班工作人員。象整个工业一样，旧运输业有两层：首先是行政、领导上层——私有制的桂冠——，其次是中級技術人員和下等工人群众。革命砍去了資本主义私有者的首脑，它摧毁了行政技术机构，不仅如此，它还接着从工人階級中調走一批接一批的优秀工人，把他們送到国内战争的前綫或苏維埃工作的各部門去。因此，所剩下的在很大的程度上全都是些軟弱无力的人，成千上万富有經驗的老組織家都已离开，革命应当而且也有权把这些老組織家調走，否則它就不成其为革命了。革命不能不摧毁旧的行政机构，由于迫不得已它还砍去了另一个头領——思想革命組織的头領。而苏維埃国家不能把运输业交給这种被削弱的工会。为了使工会能够成为产业工会，它必須把全部参加生产的人員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因为运输业和工会所需要的任何一個工作人員都应当参加組織运输的工作。在把各种工作人員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的同时，工会逐步地掌握生产机构。但是为此它应当积聚自己的力量，同时由于旧工会沒有碰到过这一任务，沒有按这一原則工作过，因而需要审核自己的領袖、老工作人員、老领导人；因为其中的許多人完全适于从事旧的組織斗争和工作、领导罢工和街垒战，然而他們中間并不是所有的人就其能力而言都适于运输本身的組織工作的。所以，从新的生产的观点，而不是从职业的观点严格地审核旧干部，在工作中對他們进行严格的挑选，——这是任务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从所有其他的机关，而在目前首先是从軍隊中抽調所有的下列工作人員，这些人以前是由铁路工人中还是从其他什么地方調去的都一样，只要他們在工作中显示出他的組織才干就行，必須把这些工作人員抽調到工会部門，并协助工会使之成

为产业工会。

摘譯自《在中央运输工会扩大全会上的发言》(1920年12月2日),載于《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412—414頁。

只有这样,从其他部門吸收行政技术人員,在工会內部进行重新教育,从工会中提拔大量的工人并使**經濟机构和工会机构融合**,工会才能創立工人民主。只有这样**工会机关和苏維埃經濟机关并存局面才会消失**。現在工会設立生产部这种做法是过渡措施。生产部及相应的分部無論如何都不能作为**經濟管理机关而永存**。这不是**孤獨自在的机关**:这仅仅是从工会伸展到苏維埃經濟机关以**促进融合过程的触須**。每一个这样的分部必須有相应的工作部門的領導人参加;所有这些問題都应当一起討論,即这种分部应当参加**經濟机关**。經濟机构的人員中最有才干的实际工作者或专家应当参加工会。这样,存在于有专门知識的人和工会代表之間的鴻沟就会消失。这就是中央运输工会最根本的任务。

同上,第425—426頁。

**1. 运输工会給自己提出的直接任务是真正成为产业工会,即不仅是按照生产組成的工人組織,而且是搞生产的組織。**

**在工人国家里只有当工会实际上掌握生产,把它的全体工作人員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改善劳动組織,提高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改善群众的物质状况和提高他們的精神水平,工会才具有意义。**

摘譯自《中央运输工会扩大全会就托洛茨基同志关于工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通过的決議》(1920年12月8日),同上,第438頁。

在全俄铁路执行委员会解散之后,在去年六月工会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关于铁路工会的生产作用这一問題。我

在大会上作了报告，这个报告出了单行本。无论是担任大会主席的魯祖塔克同志，还是其他同志，都没有对我的报告的实质发表任何反对意见。这个报告印出以后由我分发给各中央委员，并鉴于报告中所提出的关于必须把工会从职业轨道转到生产轨道（例如，由此就必须组织上不按地区，而按路线来建立工会，即根据生产本身的技术条件和行政管理条件来建立工会）这一问题在实践上的重要性，要求注意这份报告。显然，没有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在我的报告中找到任何不正确的地方，因为谁也没有在中央委员会内提出这方面的問題。用心看过上述报告的同志们确信，那里所谈的正是关于工会的生产作用問題，关于工会必须把自己全部政策和全部力量用于有计划地组织生产的問題，以便把交通人民委员会的全部机构最终都变成工会的行政经济机关，当然工会要在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总监督下和在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活动。

摘译自《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1921年)，  
载于《真理报》1921年1月14日第2版。

但是，有一项建议即关于扩大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这一问题，是此刻必须要谈的。在“十人”草案中到处都提到，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太小，应当加以扩大和增大。但是，同志们，这里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工会现在的环境和工作是同一九一七年末或一九一八年初不一样，当时就组织经济来说，工会面临的是一片荒野或敌占区。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或初步的经济组织体系。他们向工会说：“你们应当扩大自己在组织上对生产的影响。你们应当比以前更多地掌握直接领导组织经济的工作。”这一点，在这个提纲里提过两三次，但这是什么意思呢？采取什么办法呢？你们知道，对合并进行了斗争。但是，在经济方面，工会面前有现存的有组织的苏维埃国家机关。用什么办法工会才能增加自己在经济上的领导作用，是越过这些机关，还是通过它们或者用组织

上和它們合并的办法呢？这就是我們处处都要遇到的一个問題。“工人反对派”有这样解决問題的傾向，即由工会掌握經濟，撇开那些集中了我們三年建設經驗的經濟机关。这种解决办法是絕對不正确的。这里，“十人”草案中說，过去工会和經濟机关是同时并存的，由于当时經濟机关的薄弱，这种并存局面证明是必要的，而今后将怎么样呢？看来，工会今后进行自己的活动仍然是不越过、不反对或通过經濟机关，同时也不是把它們丢在一边，不是同它們并行工作，而是达到在組織上的結合，这种結合也就是合并。在这方面，我們已經得到了你們这方面的某些让步。我們曾經力求使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和全俄国民經濟委员会在同一时期举行會議，在主要工作上它們有共同的日程，有共同的小組活动，等等。如果有条件实现这一点，那末我們就在組織上的結合和合并方面进了一大步。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当抛弃这个絕對不正确的提綱和这种既不能充实我們党、也不能充实共产国际的混乱提法。同志們，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們不能劝你們投票贊成这个決議案。

摘譯自《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工会問題的副报告》(1921年3月14日)，載于《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記记录》莫斯科1933年版第360—361頁。

因而，在一九二〇年二月第九次代表大会前夕我曾建議把余粮征集制改为粮食稅并在工业中实行合同关系，我在这一問題上在中央委员会得到四票贊同，十一票反对，在我的建議被否决以后，我得出必需消灭对經濟領導的双重性，即更坚决、更迅速地使工会国家化的結論。而这是正确的結論。

摘譯自《在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工会問題的发言》(1922年3月29日)，載于《联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記记录》莫斯科1961年版第270頁。

### 三、詭称工会国家化不是工团主义

詭称他的观点不是“工团主义”，因为这不是在越过和不要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的情况下，而是在它们的帮助和指导下进行的。

7.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指責所述观点为工团主义是多么不慎重。工团主义指的是工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組織想在沒有和越过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国家的情况下掌握生产的傾向。对問題的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国家才能帮助工会改組，以便使它能够掌握生产。

摘譯自《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1920年11月9日提交俄共中央全会的提綱初稿)，載于《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記記錄》莫斯科1933年版第786—789頁。

## (十四) 关于党内派别斗争

### 一、妄谈派别斗争的必然性

#### 1. 说派别斗争是社会矛盾的反映， 声称真正的革命组织不可能没有 暂时的派别组织

认为“一个政党只代表一个阶级的例子在全部政治历史当中是找不到的”，一个阶级可以产生好几个政党，一个政党可以依靠不同阶级的几个部分。“一个阶级只有经过内部的各种倾向、集团和政党之间的斗争才能解决共同的问题”，真正的革命组织也不可能没有“暂时的派别组织”。说党内的派别集团反映各种阶级倾向，因此“每当党的路线急剧转变”，党内就会发生派别变化；偶然的意见分歧和暂时的思想派别也“可能转变成固定的小集团”和“有组织的派别”。声称联共（布）中央和党的一般领导集团内的左中右三派的斗争不是“个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而是社会矛盾在执政党机关中的反映。“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派别斗争的历史”。

我们是国内唯一的党，在专政时代不这样是不行的。工人阶级、农民、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各种要求都向我们的党压来，

力图通过党找到政治表现。发展中的种种困难和矛盾，无产阶级不同部分或全体无产阶级同农民在利益上的暂时不一致，——所有这一切都通过工人和农民的支部，通过国家机构，通过青年学生对党施加压力。甚至偶然的暂时的意见分歧和意见的细微差异也可能在某一个穷乡僻壤的机关中反映出一定社会利益的压力；偶然的意见分歧和暂时的思想派别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变成为固定的小集团；同时，后者又可能迟早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派别；最后，业已形成的派别把自己和党的其他部分对立起来，从而更多地受到来自党外的影响。在共产党出于必要而独揽政治生活领导权的时代，党内小集团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结论究竟是什么？如果不想有派别组织，就不应当有经常性的的小集团；如果不想有经常性的的小集团，就要躲开临时的小集团；最后，为了防止党内出现临时的小集团，务必使党内根本没有意见分歧，因为凡是有两种意见的地方，那里的人们总是结成集团的。

摘译自《新方针(二)》(1923年12月)，  
载于《真理报》1923年12月28日第  
294号第4版。

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工具是党。根据我们的即使是仅仅取之于一年间(自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一九一八年二月)的经验，并根据芬兰、匈牙利、意大利、保加利亚、德国的补充经验，可以确定：由革命的准备工作转向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时，必不可免地要发生党内危机，这几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一般说来，每当党的路线急剧转变时，作为转变的序曲，或者作为转变的后果，就会产生党内危机。其原因是：在党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时期都具有自己的特点，要求一定的工作习惯和方法。策略上的转变，表明这些习惯和方法或多或少的破坏：这就是造成党内摩擦和危机的直接和最近的根源。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曾写道：“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



头，往往連先进的政党也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內不能理解新的局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些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但在今天已經失去任何意义。历史的轉变来得如此‘突然’，这些口号也是如此‘突然’就失去了意义。”<sup>①</sup> 由此就要产生一种危险：如果轉变过分急剧，或者过分突然，而在以前一个时期，在党的领导机构中聚集了过多的因循守旧和保守主义分子，那么党就会不能在最紧要的关头实现自己的领导，尽管它几年来或几十年来就已經准备应付这个时机了。党被危机所侵害，运动越过了党而前进，走向失败。

革命的政党处于其他政治势力的压力之下。它在自己发展的各个时期，要制定抵御和击退这些政治势力的对策。每当策略轉变及由此而引起了内部派别变化和发生摩擦时，党的抵抗力量就要削弱。因此，由于策略轉变的必然性而发生的党内各派别，經常有可能远远超过自己的出发点，而成为各种不同阶级倾向的支柱。簡言之，党如果不能与本阶级的历史任务步調一致，就要成为或者瀕于成为其他阶级的間接工具。

摘自《十月的教訓》(1924年)，載于《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38—239頁。

目前在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一般领导机关里存在着三种基本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公然无忌的右倾。这种倾向又包括两个集团。其中之一由于它的机会主义和軟弱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代表“经济上有势力的”中农的。它的路綫是中农决定的，它受到中农思想的指导。属于这个集团的有这样一些同志：李可夫，亚·彼·斯米尔諾夫，加里宁，格·彼得罗夫斯基，楚巴尔，卡敏斯基及其他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5卷第173頁。——編者注

人。紧紧围绕他们活动的是一些“非党”政客：康德拉节也夫之流，薩基林之流，查雅諾夫之流，以及富农的其他代表們，他們或多或少地公开宣揚烏斯特里雅洛夫的理論。在每一个省，尤其在每一个县都可以看到不少小康德拉节也夫和小薩基林，他們在那里拥有一份真正的权力和影响。第一种总傾向的另一个集团是由工会領袖构成的，他們代表着工人和職員中的高薪阶层。这个集团的特点是希望同阿姆斯特丹国际<sup>①</sup>加强联系。这个集团的領袖是托姆斯基，米尔尼昌斯基，多加多夫等同志。这两个集团之間有一定程度的摩擦，但是它們要使党和苏維埃国家的路綫無論在国际政策或国内政策上右傾的意图，却是一致的。它們都是以蔑視列宁主义理論和鄙弃世界革命策略著称的。

**第二种傾向是官方机器的“中派主义”。**这种傾向的領袖是斯大林、莫洛托夫、烏格拉諾夫、卡岡諾維奇、米高揚、基洛夫諸同志。实际上就是現任的政治局。不断搖摆的布哈林“代表了”这一集团的政策。这个官方中間集团本身絕不代表任何广大群众的态度，但是它却企图——不是沒有成功——使自己代替党。党的、工会的、产业机构的、合作社的、国家机关的“行政人員”这个阶层，現在已达几万人。其中有不少“工人”官僚——这就是說，以前是工人，而現在同劳动群众已經失去了一切联系。

不消說，在对革命前途有如此巨大重要性的行政和领导机关里，当然也有成千上万坚定的革命者，他們是沒有同群众断絕联系、无限忠誠于工人事业的工作人員。他們在这些机构里进行着真正的共产主义劳动。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由于政治路綫和党的制度的蜕化变质而产生了人数众多的真正官僚阶层这个事实。

---

<sup>①</sup> 改良主义的工会国际組織，正式名称是“国际工会联合会”，1919年7月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立，受第二国际领导。1945年12月14日解散。——編者注

这个阶层的实际权力是巨大的。正是这个“行政人员”集团坚持主张“安安静静”，“关心业务”——而最主要的是“不准讨论”。正是这个集团自满地宣布（并且有时是真正地认为），我们已“快要达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十分之九”已经完成。正是这个集团“高高在上地俯视”全党，更加高高在上地俯视非熟练工人、失业者、雇农。这个集团认为主要的敌人在左边——这就是说，在革命的列宁主义者之中。这个集团提出“向左开火”的口号。

目前，右和“中间”这两种倾向，由于它们共同敌视反对派而团结起来。但是如果清除了反对派，它们之间的冲突就会加剧。

**第三种倾向是所谓“反对派”。这就是党的列宁主义派。**由于统治集团要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它就可鄙地企图把反对派说成是一个右倾派别（“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等等）。反对派是拥护党的统一的。斯大林硬说反对派要建立“第二个党”，他在这面谎言的旗帜之下宣传自己的纲领——“清除”反对派。反对派用自己的口号回答道：“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列宁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统一。”目前这个文件阐明了反对派的纲领。党内的工人阶级成分和一切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将会拥护它。

反对派不得不在艰苦的条件下为列宁的事业而斗争，因此个别人背离反对派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三种倾向的领袖中间将会发生个别人的重新组合，但是这种重新组合并不能改变这个问题的根本事实。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4—76页。

布尔什维克党准备了并且保证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它创建了苏维埃国家，并供给这个国家一副坚强的骨骼。党的蜕化是国家官僚化的原因，也是结果。必须至少简短地说明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

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制度的特点是，采用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把民主和集中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并没有一点矛盾的地方。党不仅密切注意二者的界限应当随时划清，而且还密切注意运用这种方法的人应当真正有权规定党的政策方向。批评自由和思想斗争是党内民主不可变更的内容。目前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容许搞派别活动的说法，是堕落时期的神话。实际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派别斗争的历史。同时说实在的，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既然以推翻世界为自己的任务，把最大胆的叛逆者、战士和反抗者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那它要生存和发展下去，怎么能没有思想冲突、没有小圈子和暂时的派别组织呢？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远见，往往能使冲突缓和下来，使派别斗争的持续性减小，但也仅此而已。中央委员会所依靠的就是这种热烈的民主的支持。它正是从这种支持当中得到胆量，来作出决定和发布命令。领导在各个危急阶段所表现的明显的正确性，使中央委员会拥有很高的权威，这种权威是集中制的无价的精神资本。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7—68页。

左、中、右三派的领导人都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同一个参谋部——政治局，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对于正在发展中的斗争政治意义认识不清。在肤浅的人看来，这似乎完全是个人之间的勾心斗角，是一种争取列宁的“继承权”的斗争。但是在严峻的专政条件下，社会矛盾在初期除了通过执政党的机关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热月派人物都是从雅各宾党人当中产生出来的。波拿巴本人在早期就属于雅各宾党，后来法国的这位第一执政官和皇帝也正是从以前的雅各宾党人当中挑选其最忠实的臣仆的。时代改变了，雅各宾党人也随着改变了，二十世纪的雅各宾党人也不例外。

同上，第70页。

那位美国記者訪問斯大林的时候提出一个关于新宪法中如何規定党的作用的問題，斯大林回答說：“可是既然沒有階級，既然階級和階級之間的界限正在消失〔“沒有階級了，階級和階級——已經沒有了！——之間的界限正在消失”——托洛茨基注〕，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阶层之間只留下了某些非根本性的差別，那就不会有形成互相斗争的政党的土壤。沒有几个階級的地方，就不会有几个政党，因为政党是階級的一部分。”每个字都有錯誤，有些字而且是錯上加錯！从这段話看来，似乎階級是完整的，似乎階級的界限是划分得清清楚楚的，而且一旦划清就不再变动了，似乎一个階級的意識严格地符合于它在社会中的地位。这样一来，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階級性的学說便被歪曲了。政治意識的动力由于行政方面的利益便被排除在历史进程外面了。实际上，階級并不是完整的，它們往往被內部矛盾弄得四分五裂，只有經過內部的各种倾向、集团和政党之間的斗争才能解决共同的問題。附加一些条件才能够承认“一个政党是一个階級的部分”。但是，既然一个階級有許多“部分”——有些向前看，有些則向后看——那末，一个階級就可以产生好几个政党。根据同样的理由，一个政党也可以依靠不同階級的好几个部分。一个政党只代表一个階級的例子在全部政治历史当中是找不到的——当然，除非是把政治的表面現象当作真实的東西。

从社会結構上說，无产階級是资本主义社会当中最完整的階級。虽然如此，象工人貴族和工人官僚这样的“小阶层”的存在，已經足够产生机会主义政党，这种政党在事态发展的过程中变成为資產階級統治的一种武器。不管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学观点来看，工人貴族和无产階級群众之間的差別是带有“根本性的”，或者只不过具有根本无足輕重的“某种性质”，正是由于这种差別，才有必要同社会民主主义决裂而創建了第三国际。即使在苏維埃社会中

已經“沒有階級”，这个社会至少也比資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不完整得多，复杂得多，因而就能够提供形成好几个政党的适当土壤。斯大林在理論領域所作的这种不謹慎的漫談，证明了比他所要证明的东西多得多。根据他的推論，不仅苏联不可能有不同的政党，而且甚至不可能有一个政党。因为既然沒有階級，一般地說来也就无所谓政治。然而，斯大林却从这个法則当中得出一个有利于他担任总书记的那个政党的“社会学”結論。

同上，第 194—196 頁。

## 2. 声称官僚主义是派別活动的主要来源之一

宣称“派別活动的主要来源之一正是机构的官僚主义，它压制批評，把不滿情緒压往深处”；“机械的集中制不可避免地要由派別活动来补充”。“对党、对党的自觉性和紀律性抱着偏执的官僚主义的不信任态度，是产生机构制度中的一切禍害的主要原因”。“如果把回击官僚主义的行为看成是异己影响侵襲渠道的派別活动，那这种看法本身就是明显的官僚主义侵襲的渠道。”污蔑說，如果說执政党内不再有派別斗争，那只是“因为現在不同的意見已經由政治警察的自动干涉解决了”。

在討論中和文章中最近經常指出，“純粹的”、“廣泛的”、“理想的”民主是无法實現的，民主對我們說來決不是目的本身。这是完全无可爭辯的。但也可以有同样的权利和有同样的根据說，純粹的或絕對的集中制是无法實現的，是同群众性政党的本性不相容的，集中制和党机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目的本身。民主和集

中是党的建設中的两个方面。任务在于，用最正确的办法即最符合环境的办法把这两个方面平衡起来。这种平衡在最近时期内丧失了。重心不正确地轉到机构身上去了。党的首創精神被貶到最低限度。这就养成了根本违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精神的管理习惯和办法。用削弱党内首創精神的办法大力加强机构的集中制，就会在党内产生身体不适之感。它在极端的一翼中得到了极其严重的病态表现，直到在露骨敌视共产主义的分子领导下在党内建立非法的小集团的地步。

摘譯自《新方針(一)》(1923年12月8日)，  
載于《真理报》1923年12月11日第281号  
第4版。

不錯，如果我們的党分裂成为几个派別，它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是不应当有，而且也不会有有的。它遭到作为独立的集体的整个党的制止。但是，只有发展、加强和巩固工人民主这一方針，党才能成功地清除派別活动的危险。派別活动的主要来源之一正是机构的官僚主义。它压制批評，把不满情緒压往深处。它总是喜欢給每一个提出批評或警告的个人或集体带上一頂宗派的帽子。机械的集中制不可避免地要由派別活动来补充，而后者又是对党内民主的毒辣諷刺和可怕的政治威胁。

同上。

最近党的报刊上举了不少例子，說明党的风气和关系有严重的官僚主义的蜕化現象。对批評的声音的回答是：“拿出你的党证来！”在中央委员会关于新方針的決議公布以前，官僚化了的机构代表人物把凡提起改变党内制度的必要性的都看作是异端，是派別活动和瓦解紀律。目前，他們在形式上也准备对新方針予以“查照”，也就是以官僚主义的方法使之化为烏有。革新党的机构——当然是在党章明确規定的范围内——，其目的应当是由那些与集

体生活有密切联系的或能够保证这种联系的新人物来代替官僚化分子。而首先应当把那些一听到批评、反对和抗议就要党证以进行迫害的人从党的岗位上撤销下来。“新方针”的出发点应该是：使大家在机构内从下到上都感到没有人敢恫吓党。

同上。

上面我們已經說过，每一个比較严重的和长期的党内小集团，尤其是有組織的派別，都有反映某些特殊的社会利益的趋向。作为小集团基础的每一种不正确的倾向在其发展中可能成为与无产阶级相敌对或半敌对阶级的利益的反映。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完全属于，甚至是首先属于官僚主义的。正是需要从这儿着手。說官僚主义是一种不正确的、不健康的倾向，可以預料，这是无可爭辯的。既然如此，那么，它在发展过程中就有使党脱离正确道路即阶级道路的危险。其危险正在于此。但是那些比别人更激烈、更坚决、有时更粗暴地主张每一个意見分歧、每一类意見（那怕是暂时性的）都是不同阶级利益表现的同志们，却不願意把这一标准运用于官僚主义，这是大可注意，同时也是极其令人不安的。其实，社会标准在这里是最恰当的了，因为我們认为官僚主义是十分明显的恶行，是有目共睹和公然的有害的倾向，它遭到正式的譴責但并未根除。而且它怎能一下子根除呢！但是，如果象中央決議中所說的，官僚主义有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因而也有削弱党的阶级性质的危险，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的結論是：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决不能預先同某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等量齐观。相反的，党力图保持自己无产阶级性质的意願必然会在党本身产生对官僚主义的反击。当然，在这种反击的旗帜下可能出现各种倾向，其中也有不正确的、不健康的和有害的倾向。只有对它們的思想內容进行馬克思主义的分析，才能揭露这些有害的倾向。但是，如果把回击官僚主义的行为純粹从形式上看成是异己影响侵袭渠道的派別



活动，那这种看法本身就是明显的官僚主义侵袭的“渠道”。

摘译自《新方针(二)》(1923年12月)，载于《真理报》1923年12月28日第294号第4版。

对党的统一的关心是绝大多数同志最主要、最热切地关心的问题。但这里必须坦率地说：如果目前对党的统一有严重威胁的话，或者说，至少对党的思想一致有严重威胁的话，那么，这就是狂暴的官僚主义。正是从这个阵营中发出了只能被称之为挑拨的呼声。正是那儿有人胆敢说：我们不怕分裂！正是这个阵营的代表人物才在过去的历史中去搜寻，从中发掘一切能够使党内争论更加尖锐起来的東西，人为地使人回想起过去的斗争和分裂，以便不知不觉地逐渐使党在思想上同意新的分裂这样一种駭人听闻的自杀罪行的可能性。党要求减少官僚主义制度，有人则打算使之与党的统一的要求相抵触。如果党走了这一条道路并牺牲了其自身民主所最必不可少的极其重要的因素，那么，除了加剧内部斗争和动摇自身的基本团结之外，将一无所得的。如果对党本身都不信任，那么，决不能片面地和最后通牒式地要求党信任机构。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对党、对党的自觉性和纪律性抱着偏执的官僚主义的不信任态度，是产生机构制度中一切祸害的主要原因。党不希望也不允许有派别。认为党会打碎自己的机构或允许某人去打碎自己的机构，这种想法是令人惊奇的。党知道，在机构的成员中有体现着过去大部份经验的最宝贵的干部。但是党想革新机构，并向它提醒：它是党的机构，是由它选出来的，它不应当脱离党。

同上。

由于重大的历史原因和我们的错误而形成的旧方针，其主要危险在于它暴露出几千个领导干部同志和作为影响对象的全体党员群众日益对立的趋向。如果这种制度今后继续固执地坚持下去，无疑地，它最终会使党遭到蜕化的危险，而且，这种蜕化是在党

的两极上同时发生的，即，既在青年党员身上也在领导干部身上发生。至于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工厂和学生支部等等，危险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相当多的党员由于感觉不到自己是全党工作中的积极参加者，由于自己向党所提出的问题得不到应有的及时答复，就会开始在各种各样的小集团和派别组织的形式下为自己寻找党员独立活动的代用品（错误的代用品）。象“工人集团”这样的小集团之所以具有征兆的意义，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摘译自《新方针(三)》(1923年12月)，载于  
《真理报》1923年12月29日第295号。

列宁主义反对派<sup>①</sup>在党内的成长，迫使最坏的官僚主义分子使用了在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中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方法。由于再不能用命令阻止在党基层组织内讨论政治问题，于是一部分官僚现在正转向——恰好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建立暴徒组织，它们的任务就是用叫喊、吹口哨和熄灭灯光等办法来破坏关于党的问题的一切讨论。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10页。

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现在已经只剩下斯大林一人。当时的两个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流亡时期都曾同列宁共事多年，现在却以莫须有的罪名服着十年徒刑。另外还有三个政治局委员，即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已经完全离开领导地位，但是由于采取了屈服的态度，目前担任着次要的职务。最后，还有本书的作者，目前在流亡中。列宁的寡妻克鲁普斯卡娅，由于不能全力使自己完全适应热月，也遭到了软禁。

目前的政治局委员，在布尔什维克党史上都是居于次要地位

---

① 托派的自称。——编者注

的。如果有人革命的頭幾年預言他們以後會高升到那樣的地位，那他們首先會感到驚訝的，同時這種驚訝不會摻雜着虛偽的謙遜。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目前的作法更加嚴格了，即政治局永遠正確，反對政治局的人就不可能正確。但是不僅如此，由於斯大林不可能犯錯誤，因此政治局就不能反對斯大林，而斯大林也不能反對他自己。

在這整個時期，要求黨內民主是所有反對派的口號。這種要求實現的希望越小，這些派別要求實現的決心就越大。上面提到的左翼反對派綱領，在一九二七年就要求在刑法中加入這樣一條特別法律：“凡直接或間接迫害提出批評的工人，即以嚴重罪行懲處。”代替這條法律的是，刑法中加入了一條反對左翼反對派的法律。

.....

……如果說一九三六年三月莫洛托夫已經能夠向一個法國記者吹噓說，執政黨內部不再有派別鬥爭，那只是因為現在不同的意見已經由政治警察的自動干涉解決了。老的布爾什維克黨已經死亡，再也沒有什麼力量會使它起死回生。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70--72頁。

## 二、妄談對待派別活動的辦法

### 1. 攻擊禁止反對派是非常時期 的臨時不得已的壞做法

聲稱禁止反對黨的做法是黨在非常時期所採取的“一種暫時的自衛手段”和“臨時不得已的壞做法”，在局

勢好轉時應當取消。說禁止派別活動就是“懼怕批評”，用“派別活動的幻影恫嚇人”。宣揚擴大“爭論俱樂部網”，“黨內少數在任何原則問題上的觀點，都應通過黨報等方式使全體黨員得知”。中央委員會必須“通過報紙以及特刊和小冊子，發表對黨至今隱瞞的全部文件”。

但不言而喻，——過去的經驗和健康的政治理智都向我們證明這一點——光是依靠禁止的辦法，不僅沒有足以使黨防止新的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小集團的絕對保障，而且根本就沒有稍為重大點的保障。基本保障是領導的正確性、對那些通過黨反映出來的發展中的一切要求予以及時注意、黨機構的靈活性，黨的機構不是麻痺而是發揮黨的主動性，它不懼怕批評，也不用派別活動的幻影恫嚇人，因為恫嚇多半是恐懼的產物！第十次代表大會作出的禁止派別活動的決議只有輔助的性質，可是，這個決議本身還不能提供解決一切及任何內部困難的鑰匙。如果認為，一個空頭決議——不問黨的發展進程、領導的錯誤、機構的保守主義、外部的影響，等等——就能使我們防止小集團的產生和派別的震蕩，那就是過于無知的組織上的偶像崇拜。這種態度本身就已是深為官僚主義的了。

摘譯自《新方針(二)》(1923年12月)，載于  
《真理報》1923年12月28日第294號。

不錯，派別組織是我們條件下的最大惡行，而小集團——哪怕是臨時性的——又會轉變成派別。但是，象經驗所證明的，為了使它們無法產生，光宣布它們是惡行是完全不夠的。為了切實取得這方面的成就，必須有一個眾所周知的政策，有一個正確的方針，而且每一次都要適應具體的環境。

同上。

党的輿論必然会在各种矛盾和意見分歧中形成起来。使这个过程仅仅局限于机构之内，然后把現成的成果即口号、命令等授給党，这就是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削弱党。让全党都来参加決議的制訂——这就是助长暂时性的思想小集团，而这些小集团还有变成长期性的小集团，甚至变成派別組織的危險。到底怎么办？难道真的沒有出路了嗎？在党的“风平浪靜”状态和派別分裂之間难道就沒有党的路綫的余地了嗎？不，这样的路綫是有的，而党内領導的全部任务在于：每一次，特别是在轉变关头上，都要根据当时具体的情况找出党的路綫来。中央委员会的決議坦率地写道，**党内的官僚主义制度是派別集团的根源之一**。这个真理目前未必需要证明。旧方針同“广泛的”民主相距很远，并且它不仅絲毫不能使党防止秘密派別的形成，而且不能使党防止本身就孕育着形成暂时性或长期性小集团的这种爭論的爆发（閉眼不瞧这一点是可笑的！）。**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就要求党的領導机构听取广大党員群众的呼声，不要认为任何批評都是派別活动的表現，也不要以此把那些誠誠懇懇的和守紀律的党員推上閉塞的和派別活动的道路。**

摘譯自《新方針（二）》（1923年12月），載于《真理报》1923年12月28日第294号第4版。

然而不能把认为党内的意見分歧尤其是小集团活动是不同的階級影响的斗爭这种看法理解得过于簡單和肤浅了。举例來說，对是否需要在一九二〇年用武力試探波兰的問題，我們是有过一时的意見分歧的。有些人主张实行比較大胆的政策，另一些人主张实行比較謹慎的政策。这里是不是有不同的階級傾向呢？未必有人敢于作出这种武断。这是对局势、力量和手段的估計上的意見分歧。但是，双方在估計問題上的基本标准是一致的。党对同一个任务往往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解决。而意見分歧只出現在

哪一条途径更好、更短、更经济的问题上。这类意见分歧可能根据问题的性质不同而涉及广大党员，但这决不是一定意味着这里有两种阶级倾向在进行斗争。毋庸置疑，这种现象今后在我们这里还会不止一次而是几十次地出现，因为我们面临的道路是艰巨的，不仅政治任务而且象社会主义建设的组织和经济问题，都会造成意见分歧和暂时性的思想派别。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各种微小的分歧进行政治检验，向来都是我党最必要的预防措施。但必须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检验，而不是作为官僚主义自卫武器的保守的刻板公式。

摘译自《新方针(二)》(1923年12月)，载于《真理报》  
1923年12月28日第294号第4版。

(一)必须象我们在列宁在世时所做的那样，在真正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准备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列宁写道：“每一个党员应当冷静地和极其公正地研究：(1)意见分歧的实质，(2)斗争的发展……这两个问题都需要研究，同时还一定要有能够从各方面进行检查的最精确的印刷文件。”<sup>①</sup>中央委员会必须让每一个党员有可能研究目前党内分歧的实质和目前斗争的发展。为了这样做，它必须通过报纸以及特刊和小册子，发表对党至今隐瞒的全部文件。

任何一个或一部分同志，都应该有机会在报纸上、会议上等等场合对党阐述自己的观点。

中央委员会的、地方组织的、个别党员的和部分党员的中心提纲(政纲)，应该至少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月在《真理报》(或者《真理报》增刊)和地方党报上发表。

争论的进行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和真正同志式的，不允许攻击

---

<sup>①</sup> 参看《列宁全集》第32卷第26—27页。——编者注

个人和夸大事实。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全部准备工作的主要口号应该是统一——不是虚假的统一，而是俄国共产党的真正列宁主义的统一，整个共产国际的真正列宁主义的统一。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7页。

一般地说，党内少数在任何原则问题上的观点，都应通过党报等方式使全体党员得知。只有在有关问题是秘密的条件下，才允许有例外。不言而喻，在决议通过以后，就要按照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予以执行。党的争论俱乐部网必须扩大，必须使党的机关报刊能够被用来对党领导的错误进行真正的批评(采取争论专页，文选汇编等形式)。

同上，第78页。

列宁和他的同事的注意中心是，经常地关心保护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使它不受当权者的那些恶习的影响。然而，在开头几年，党和国家机关的特别密切关系，以及有时实际上融合在一起，毫无疑问已经给党内制度的自由和弹性造成了损害。随着困难的增加，民主越来越少。最初，党曾祝愿和希望在苏维埃机构内保持政治斗争的自由。但是国内战争使这种打算作了很大的改变。反对党一个接一个地遭到禁止。这种显然同苏维埃民主精神矛盾的作法，布尔什维主义的领导人不是当作一种原则，而是当作一种暂时的自卫手段。

执政党的迅速成长，它的任务的新颖和广泛，不可避免地使党内发生了分歧。国内的各种反对暗流，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对唯一合法的政治组织施加压力，这样就加剧了派别斗争的尖锐性。国内战争结束的时候，这种斗争采取了这种尖锐的形式，以甚有动摇国家政权的危险。一九二一年三月，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叛乱，不少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这次叛乱，这时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认为有

**必要禁止派別活動——這就是說，把國家實行的政治制度也運用到執政黨的內部生活中。這種禁止派別活動的做法也被當作一種非常措施，準備在局勢大大好轉的時候取消。與此同時，中央委員會極其謹慎地運用這種新辦法——這種辦法對於它本身的关系最大——以免因而扼殺了黨內生活。**

可是，這種辦法原來只不過是對付困難局勢的一種必要的讓步，官僚卻認為完全適合自己的胃口，於是他們便開始完全以行政上感到方便的观点來處理黨內生活。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68—69頁。

讓蘇聯人民自由選舉“他們所要選的人”這個諾言，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公式，不如說是一句詩詞。蘇聯人民只有權利從中央和地方領導人在黨的旗幟下向他們提出的候選人中挑選“代表”。固然在蘇維埃時代的初期，布爾什維克黨實行的也是一種壟斷。但是，如果把這兩種現象混為一談，那就等於把表面現象當作現實。**禁止反對黨派是在國內戰爭、封鎖、干涉和飢饉的條件下不得不採取的一種臨時措施。執政黨在那個時期代表真正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過着一种純潔的黨內生活。集團和派別的鬥爭在一定的程度上代替了政黨鬥爭。現在，在社會主義贏得了“最終的和不可變更的”勝利以後，組織派別反而要受到關進集中營或者槍斃的懲罰。禁止其他政黨本來是一種臨時不得已的壞做法，而現在已經確定為一項原則。甚至共產主義青年團也被取消了討論政治問題的权利，而且正是在新憲法公布的時候。不僅如此，男女公民年滿十八歲就享有選舉權，但是一九三六年以前所規定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年齡限制（二十三歲）現在却完全取消了。這樣，政治就被一勞永逸地宣布為不受監督的官僚的壟斷物。**

同上，第194頁。



## 2. 妄談联共党内几种消除 派別活动的正确方法

认为在联共(布)党史上有以下几种正确的消除派別活动的方法：在十月革命前夜，“用革命的行動战胜”了派別活动和党的分裂；在布列斯特时期，“暂时容忍党内存在有組織的派別”，采取“爭論、解释和靠政治經驗来檢驗”的办法；在軍事建設問題上，靠“武器檢驗”来消除分歧；在工会問題爭論时期，主要由于党“依靠自己极端重要的經濟决定和措施”战胜了已暴露出来的各种意見分歧和小集团。

**只要好好地細想一下我們党的历史，哪怕只是党史上的革命时期，即正当派別活动特別危险的时期，那就会清楚地看到，防止这种危险决不只是限于形式上对小集团的譴責和禁止。**

在世界历史的最伟大的任务上，即一九一七年秋夺取政权的任务上，党内产生了最严重的意見分歧。在事变的发展极其迅速的情况下，問題的尖銳性几乎立即使意見分歧具有尖銳的派別活动的性质：反对夺取政权的人甚至事与願违地实际上同非党人士結成了联盟，在非党的报刊上发表自己声明，等等。党的統一处于千鈞一发之际。如何避免了分裂的呢？只是由于事变的迅速发展 and 胜利的結局。如果事变拖延了几个月，而尤其是，如果起义遭到了失敗，分裂就会是不可避免的了。党在中央委员会多数的坚强领导下，以猛烈的进攻越过了反对派，夺得了政权，于是人数虽少但在党的意义上富有学識的反对派也站到十月革命这方面来了。派別活动和分裂的威胁，这一次不是用形式上的法規，而是用革命

的行动战胜的。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問題上产生了第二次規模巨大的意見分歧。主张革命战争的人結成了名副其实的派別，拥有自己的中央机关报，等等。我不知道，不久以前流传的关于布哈林同志几乎要来逮捕列宁同志的政府的无稽之談有何根据。总之，这有些象拙劣的里德·梅恩式的作品<sup>①</sup>或共产主义的……品克頓式的讀物<sup>②</sup>。应该认为，党史研究所会把这些弄清楚的。但是，无疑地，左派共产主义派別的存在对党的統一有极大的危險。在那个时期要把事情弄到分裂的地步是不必花費很大力气的，也不需要领导方面的……聪敏英明：只要简单地宣布左派共产主义派別已遭到禁止就行了。然而，党采取了较为复杂的办法：爭論、解释和靠政治經驗来檢驗，而暂时容忍党内存在有組織的派別这样一种不正常的危險現象。

在軍事建設問題上，我們党内有相当頑强的小集团。按事情的实质說来，这个反对派是反对建立正規軍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产物的：集中的軍事机构，吸收专家，等等。有时斗争具有极其尖銳的性质。但是，这里也和十月革命时一样，武器檢驗是有助于事的。政府軍事政策中某些不灵活的和夸大的地方有所減輕（不无反对派的影响），这对正規軍的集中的建設不仅无害，反而有利。反对派則逐渐消散了。反对派中很多非常积极的代表人物不仅参加了軍事工作，而且还在軍事工作中担任非常負責的职务。

在令人难忘的工会問題爭論时期中，小集团显得很突出。現在，当我们有可能回顾这一整个时代，并用后来的全部經驗來說明它时，一切就很清楚了，爭論的完全不是工会問題，甚至也不是工人民主問題：通过这些爭論表明党患有重病，其根源在于战时共产

① 里德·托馬斯·梅恩(1818—1883)，英作家，写过許多惊险小說。——編者注

② 指粗糙的偵探小說。——編者注

主义的經濟制度拖得过久。国家的整个經濟机体处在毫无出路的困境之中。在工会的作用和工人民主的表面爭論的掩盖下，轉弯抹角地寻找新的經濟道路。結果发现真正的出路在于废除余粮收集制和粮食垄断，在于使国营工业逐步摆脱总管理局制度的箝制。这些历史性決議为全体一致通过了，而它們完全压倒了工会問題的爭論，而且根据新經濟政策，工会的作用本身已完全不同了，所以几个月以后不得不根本修改关于工会的決議。

“工人反对派”这个小集团为时最久，某些方面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它歪曲地反映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矛盾、党的个别錯誤和社会主义建設的主要客观困难。但是，这里的问题也决不是只限于一种形式上的禁止。在解决党内民主方面采取了形式上的步骤，但在清党方面却采取了实际的极为重要的步骤来接受“工人反对派”的批評和要求中正确的和健康的成分。而主要的，由于党依靠自己极端重要的經濟决定和措施在基本的重要方面战胜了已暴露出来的意見分歧和小集团，才使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形式上禁止派別組織成为可能，也就是說，才有取得实际成效的希望。

摘譯自《新方針(二)》(1923年12月)，載于《真理报》1923年12月28日第294号第4版。

### 3. 攻击斯大林的办法是扼杀反对派， 进行人身攻击以至肉体消灭

污蔑斯大林采取下列方法来反对反对派：“取消党内民主”；剥夺反对派“在报纸上或在会议上的发言权”；“对于斯大林的孟什維主义严重錯誤的任何批評，都被說成是‘反党斗争’”；“誰不相信官方的話，誰就是反对派”。

誣称扼杀反对派，排挤他們，“把他們开除出党已經完全变成慣例”；任何公民如果“敢于大声讲出怀疑斯大林的绝对正确”，就会“失业”，“就会几乎当作恐怖阴谋的

同謀犯加以审讯和判罪”；“不是提出自己的观点来同对手辯論，而是对他的对手进行人身攻击，如果可能的話，在肉体上加以消灭”。

斯大林为自己所規定的当前任务是：**分裂党，清除反对派，使党习惯于肉体消灭的方法。**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  
三联书店 1963年版第20頁。

党内分歧被曲解了。对于那些被斥为“反对派”的布尔什維克的观点，进行一連几个月和几年的恶意論战。但是却不許这些布尔什維克在党的报纸上闡述他們自己的观点。昨天的孟什維克，社会革命党人，崩得分子，犹太民族主义者，都在《真理报》上攻击和譴責一些中央委員提交給中央委员会的文件。他們把这些文件断章取义。但是文件本身却从来没有发表过。党的基层组织被迫投票“譴責”他們对之毫无所知的文件。

党被迫根据官方的“說明”和注解来判断我們的不同意見，而这些“說明”和注解往往既不真实又极无知，使人作嘔。列宁的話：“誰仅仅根据无稽之談而相信什么，誰就是毫无希望的傻瓜”已由另外一句話代替：“誰不相信官方的話，誰就是反对派”。傾向反对派的产业工人为了他們的态度不得不付出失业的代价。普通党员不能大声說出自己的意見。党的老干部被剝夺了在报纸上或在會議上的发言权。

捍卫列宁观点的布尔什維克被誣蔑为想要制造“两个党”。这个精心編造的指責，是为了使工人一致反对反对派，因为工人自然是热情維護他們党的統一的。对于斯大林的孟什維主义严重錯誤的任何批評(关于中国革命問題，英俄委员会等)，都被說成是“反党斗争”。情况就是这样，尽管斯大林事先从来没有向党提出过任何問題，無論是中国革命政策，或者任何其他重要問題。关于反对派要制造“两个党”的指責，每天有一些人重复不休，这些人自己的

目的正是要把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党员排挤出党，以便他们可以放手实行他们的机会主义政策。

(六)几乎党的全部教育工作和全部基本政治文化事业现在都已成为整反对派的课程。强制的方法不仅几乎完全代替了说服的方法，而且补充以欺騙党的方法。党的教育成为仅仅是官方宣传，因此逃避这种教育成为一般的倾向。会议，党校和小组活动现在都供作整反对派之用，因此参加的人数大大下降。对于党机器目前的错误路线，全党正在采取消极抵抗。

(七)近年来，不仅个人野心、官僚主义和不平等现象在党内日益发展，而且发源于异己和敌对阶级的浊流也流入党内——比如，排犹主义。党要保全自己就必须对这类污秽进行无情的斗争。

(八)虽然有这样一些事实，但是压制的措施却完全针对左派。由于反对派在其所属的支部会上发言，由于他们大声疾呼，由于他们企图宣读列宁遗嘱，因而把他们开除出党已经完全变成惯例。在政治认识水平上，更加重要的是在他们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上，被开除者常常是高于开除者的。这些同志虽然处于党外——因为对蒋介石、柏塞尔或他们自己的官僚“不信任”和“抱悲观主义”，因此有罪——，但他们继续过党的生活。比起那些仍然是党员的野心家和市侩来，他们远为真诚地为党服务。

(九)由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临近，目前压制和威胁的冰雪大大地加紧了，为的是进一步威吓党。这就证明了这个事实：斯大林和李可夫联盟为了掩盖其政治错误，必然求助于极端手段。它在每一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把党置于既成事实之前。

(十)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这是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同斯大林一致的原则制定的）是错误的。目前中央委员会的核心继续在摇摆之中向右移动。取消党内民主是政治路线根本错误这个事实的必然结果。既然这条路线反映着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压力，反映着包围我们党的非无产阶级各阶层的影响，那么就必須

由上而下来强迫执行。

同上,第72—74頁。

同样致命的矛盾也表现在党的命运方面。在这里问题差不多可以这样加以表述: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旧统治阶级还拿着武器进行斗争,他们得到全世界帝国主义者的积极支持,同时武装的富农对军队和国家的粮食供应工作进行着破坏活动——在这样的時候,为什么党内对于最严重的政策问题进行公开的和无所顾忌的争论?而现在,干涉已经停止,剥削阶级已被推翻,工业化已经取得无可置疑的成就,绝大多数农民已经集体化,为什么反而不能容许对不可动摇的领导人进行最轻微的批评呢?为什么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如果按照党章要求召开党代表大会,就会马上被开除出党,而任何公民如果敢于大声讲出怀疑斯大林的绝对正确,就会几乎当作恐怖阴谋的同谋犯来进行审讯和判罪呢?这样可怕地、可恶地和难以容忍地加强镇压和警察机关是什么缘故呢?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7—78頁。

左翼反对派在其斗争的最初十年当中,并没有放弃下列纲领,即从思想上夺取党而不是通过夺取政权来反对党。当时它的口号是:改革,而不是革命。然而,就是在那个时候,官僚也已准备实行任何一种革命以保卫自己、反对民主改革。在一九二七年斗争达到特别激烈的阶段时,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就亲口对反对派说:“那些干部只有通过国内战争才能清除掉!”由于欧洲无产阶级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斯大林这句话由所威胁的东西变成了历史事实。改革的道路变成了革命的道路。

党和苏维埃组织之所以不断地进行清洗,就是为了防止群众的不满情绪变成一种一致的政治表现。但是,压制并不能扑灭思想,而只不过是把思想赶到地下。广泛的共产党人集团以及非党公民都保持着两种思想体系,一种是公开的,另一种是秘密的。暗探和告密活动到处都在腐蚀着社会关系。官僚当然总是把自己的

敌人当作社会主义的敌人。在伪造法律证据的帮助下——这种做法已经变成正常的情况——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任何罪名强加在自己的敌人身上。他们还可以用枪决的威胁从脆弱的人那里弄到他们自己所授意的供词，然后再把这种供词作为控告比较坚强的人的依据。

同上，第 204—205 页。

专政之剑本来是用来打倒那些要恢复资产阶级特权的人们的，现在却对准那些起来反抗官僚特权的人们。受到打击的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职能上的这种基本变化相适应的是，政治警察以前都是从特别忠诚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布尔什维克当中挑选出来的，现在则由官僚当中最堕落的一部分人组成了。

热月派在迫害革命分子的时候，特别仇恨那些提醒他们记住过去和防范未来的人们。监狱、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最遥远的角落，以及迅速增加的集中营，都关满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精华——最强最忠实的人们。即使在西伯利亚单独监禁的牢狱中，反对派分子还是要受到搜查、禁止通讯和饥饿等迫害。在流放中，妻子被迫同自己的丈夫分离，这种做法的唯一目的是瓦解他们的反抗并使他们悔过。但是，就是悔了过的人也并没有得到安全。一有嫌疑或者有告密者暗中告发，这种人就会受到加倍的惩罚。即使亲属帮助流放的人，也被认为是一种罪行。互相帮助是被当作一种阴谋来惩罚的。

在这种情况下，自卫的唯一手段是绝食。国家政治保卫局则以强迫吃饭或者听任饿死作为对策。这些年来，有好几百名俄国的和外国的反对派分子已经被枪杀，或者在绝食中死去，或者自杀而死。在最近十二年当中，当局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好多次：反对派已经被彻底根除。但是，在一九三五年最后一个月和一九三六年

上半年的“清洗”中，又有几十万党员被开除，其中有好几万“托洛茨基分子”。最积极的分子都立刻被逮捕，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至于其他人，斯大林则通过《真理报》公开劝告地方机关不要给他们工作。在一个国家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这种情况就意味着通过慢性饥饿而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旧原则已经代之以不服从者不得食这样的新原则。自从一九二三年波拿巴主义时代开始以来，究竟有多少布尔什维克被开除、逮捕、流放和扑灭，要到我们检查斯大林政治警察的档案时才会知道。还有多少人在地下，也要到官僚开始破产的时候才会知道。

同上，第206—207页。

政治局中的多数坚决要扼杀反对派——至少，要闷死它，排挤它，开除它，逮捕它。这就是斯大林反驳论点的方法。并不是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同意这种方针。但是逐渐地，斯大林把他们拖入了斗争。他削弱了他们精神上的保留，消磨他们的成见，使后一步成为前一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这是他的擅长。在这方面，他手段之巧妙是无可争辩的。持有不同意见的政治局委员终于甚至不再温和地抗议斯大林的更粗鲁的“活动家”的暴行。逐渐，他们被迫放弃不表示态度的沉默，而采取赞同一个又一个的暴行。

.....

.....他采用了自从他青年时期起就成为他一部分的那种做法，那就是：进行反驳时不是提出自己的观点来同对手辩论，而是对他的对手进行人身攻击，如果可能的话，在肉体上消灭他。在论点和批评面前，智力上的无能引起了愤怒，而愤怒又驱使他匆忙采取措施来消灭反对派。

摘自《斯大林评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年版下册第517—518页。



## (十五) 对列宁和斯大林的攻击

### 一、对列宁的攻击

攻击列宁是“无謂爭吵的能手”，“慣于利用俄国工人运动中一切落后性的老行家”，尽搞“毫无意义的蠱惑勾当”，进行“狹隘的小集团的阴谋活动”，从事“无原則的分裂”活动，“一面高唱自下而上的統一，一面推行自上而下的分裂”，“用小集团和派別的定义来解释階級斗爭的概念”。胡說列宁主义的大厦是“建筑在謊言和捏造上面”的，它是同“工人的党組織和政治組織势不两立的”。誣指列宁在国内战争中“曾經不止一次动搖过，并且好几次犯了严重錯誤”。

无謂爭吵的能手列宁，这个慣于利用俄国工人运动中一切落后性的老行家，他所經常掀起的恶劣的无謂爭吵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蠱惑勾当。任何一个智力未受損害的欧洲社会主义者都不会相信，会由于列宁在克拉柯夫贗造出来的那些意見分歧而造成分裂。

列宁的“成就”本身，无论这是怎样一种障碍，都不会引起我的更多的忧虑。現在不是一九〇三年，也不是一九〇八年。列宁用从考茨基和蔡特金那里挪扯到的“来历不明的金錢”办了一个机关报，給它挂了一块通俗报纸的招牌，拿出了一面“統一”和“非官方”的旗帜，招徠了許多工人讀者，他們一見出版了工人日报，自然就

认为是自己的一个巨大的收获。然后，当报纸站住了脚，列宁就把它变成小集团阴谋活动和无原则分裂行为的杠杆。但是，工人对统一的自发倾向是势不可当的，于是列宁不得不经常同读者玩捉迷藏的游戏，一面高唱自下而上的统一，一面推行自上而下的分裂，用小集团的和派别的定义来解释阶级斗争的概念。总而言之，现在列宁主义的整个大厦都建筑在谎言和捏造上面，它本身带有腐蚀自己的毒素。无庸怀疑，只要另一方措置得当，正是在统一还是分裂这个问题上，最近的将来列宁分子中间就会开始激烈的分化。

但是我重说一遍：这要以另一方措置得当为条件。如果列宁主义本身并不使人担忧，那么应当承认，我丝毫不相信我们的取消派朋友不会帮助列宁重整旗鼓，卷土再来。

现在可以有两种政策：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摧毁各种过时的派别障碍，而这就意味着摧毁列宁主义的基础本身，因为列宁主义同工人的党组织和政治组织是势不两立的，然而却能在派别门阀的粪便上开出灿烂的花朵。或者相反，通过细心培植策略上的意见分歧，用派别的方式纠集一班反列宁主义者（孟什维克或取消派）。一部分孟什维克分子——最保守的——正是倾向于第二种政策。依我看来，主要的忧虑也就在这里。

摘自《给尼·谢·齐赫泽的信》（1913年4月1日），  
载于《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三联书店1964  
年版第290—291页。

但是，结果杂志却被迁往瑞士出版，而且选定拉狄克为秘书，他在这一年内完成了从粉红色国际主义向列宁的极端主义的演化。在这种情况下，罗兰·霍斯特和潘涅库克这两个编辑就形同虚设，实际上却成了列宁的编辑。但那时杂志就只会是《共产党人》<sup>①</sup>的德文版。因此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同这种杂志合作只不过是替它的狭隘的小集团性质打掩护，成为诱骗个别的国际主义

者的釣餌。

摘自《給莫·索·烏里茨基的信》  
(1913年), 同上, 第293—294頁。

可是; 應該說, 列宁的支持不是无条件的。列宁曾經不止一次動搖過, 並且好幾次有嚴重的錯誤。我比他有利的條件在於我不間斷地到各個戰綫旅行, 同非常多的人接觸, 從當地的農民、戰爭俘虜、逃兵, 一直到前綫最高級的軍隊和黨的領導人。這種各種各樣的大量印象是有不可估量的價值的。列宁從沒有離開莫斯科, 而所有的綫又都集中在他的手裡。他必須根據多半來自黨的高級機構的情報, 對軍事問題做出決定, 而軍事問題對我們所有人都是新問題。沒有人比列宁更能了解來自下面的個別呼聲。但是這種聲音只是在例外的情況下他才聽得到。

摘自《斯大林評傳》(1940年), 三聯書店  
1963年版下冊第363頁。

## 二、對斯大林的攻擊

### 1. 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

誣蔑斯大林是具有“詭計多端、殘酷無情”等種族特點的亞細亞人, 是殘忍已“發展到野蠻程度”的“成吉思汗”。斯大林已設法“使一個專制君王的一切特性在他身上得到發展”。他充滿了“權力欲、野心和嫉妒”。“他將他的一个創傷、憎恨、怨憤、嫉妒和愛慕從一個省的狹小範圍帶到全國廣大範圍內”。他最善於記恨。“對人的、

① 《共產黨人》——布爾什維克的雜誌, 1915年在瑞士出版, 由列宁主編。——編者注

肉体上的残忍即通常所谓的虐待狂是斯大林的特点”。他驳斥对手的观点的方法是“人身攻击”和“肉体消灭”，并且“不惜在反犹太主义的混水中摸鱼”。

攻击斯大林“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观念、机会主义和妥协”。“新统治阶层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也就是他的观点”。他性格倔强，眼界狭小，不注意国际问题，对群众、对个人缺乏信任，经常走抵抗力最小的道路。他“在历史上一切伟大的转折点总是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有时比孟什维克更右”。他是一个“在政治上采取中庸之道而又毫不犹豫地采取最极端的措施的政客”。“在战略上，他是个机会主义者；在战术上他是个‘革命家’。他是一种玩弄炸弹的机会主义者”，是“中派分子和折衷主义者”，是“出色的阴谋家”。

宣传斯大林是“从后门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在国内战争结束时还是个“最不出名的中央委员”，政治上“默默无闻”，只是凭借了对党的机构的控制才爬上去的。他的天性渴望一种集中的政治机器，他“割断了机构和思想之间的脐带，使机构成为独立存在之物”，成为他个人的工具。

**斯大林为自己所规定的当前任务是：分裂党，清除反对派，使党习惯于肉体消灭的方法。**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0页。

如果以为在群众中默默无闻的斯大林，是突然夹着完整的战略计划出现的，那就太天真了。事实上绝不是这样。在斯大林找到自己的道路以前，官僚已经找到了他。斯大林给官僚带来了一

切必要的保证：一个老布尔什維克的威望，一种倔强的性格，狹小的眼界，以及同政治机器——他的努力的唯一来源——的密切联系。胜利落到他头上，最初是連他自己也感到惊奇的。这是新統治集团欢迎他的友好表示，这个集体企图摆脱旧的原则，摆脱群众的监督，同时在内部事务方面需要一个可靠的仲裁者。在群众面前和革命事态发展过程中作为二等人物的斯大林，显示了自己是热月式官僚的无可怀疑的领袖，是其中的第一号人物。

新統治阶层很快就流露出自己的想法、感情以及更为重要的私心。当前官僚当中較老一代的絕大多数人，在十月革命时期都是站在营垒的另一边的。（就以苏联的駐外大使为例吧：特罗揚諾夫斯基、馬伊斯基、波丹金、苏里茲、金楚克等就是这样。）要不然，在最好的情况下，他們也是站在斗争之外。在現在的官僚当中，那些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站在布尔什維克陣营里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至于年輕的官僚，都是年老一輩的官僚挑选和教育出来的，他們往往就是老官僚的子弟。这些人并不能完成十月革命，但是他們完全适合于利用十月革命。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66—67 頁。

从此以后，斯大林——当时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同他一道工作——便把全部努力放在促使党机器摆脱普通党员的监督方面。在这种“稳定”中央委员会的斗争中，事实证明了斯大林是他的同事当中最坚决最可靠的一个。他用不着分心去注意国际問題；他从来沒有关心过那方面的問題。新統治阶层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也就是他自己的观点。他深信，建立社会主义的任务，就其本质来说是民族性的和行政性的。他认为共产国际是一个必要的坏东西，只要能为外交政策的目的服务，就应当加以利用。在他的眼睛里，他自己的党之所以还有价值，也不过是因为它馴服地支持国

家机器。

同上，第69—70頁。

我认为整个人类历史上找不出和克里姆林宫在斯大林领导下組織起来的規模庞大的謊言制造工厂相似、即使是略微相似的任何事物。而这座工厂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为斯大林制造一部新传记。……有些来源是斯大林本人捏造的。

摘自《斯大林評传》(1930年)，三联书店  
1963年版上册第7頁。

在这方面，斯大林是一个完全例外的现象。他既不是思想家，又不是著作家，也不是演說家。当举行凱旋式的队伍通过紅場时，群众还不能在人群中认出他的形象。而这时他已經取得权力。斯大林并不是依靠个人才能、而是依靠一个与人无关的机构取得权力的。而且并不是他創造了机构，而是机构制造了他。机构以及它拥有的力量和权威是布尔什維克党长期英勇斗争的产物。党本身又是思想的产物。这个机构本来是思想的体现，后来机构本身却成了目的。斯大林割断了机构和思想之間的臍带，使机构成为独立存在之物。从那个时期开始，他就是这个机构的首脑。列宁通过經常联系群众的办法創造了这个机构——如果不是直接地、通过口語保持联系，就是以他的信徒作为媒介、通过印好的文字保持联系。斯大林并没有創造、而是占有了这个机构。要做到这一点，必須有非常特殊的才能。然而这不是历史創造者、思想家、著作家或演說家的才能。机构是从思想中产生的。斯大林的才能首先就是蔑視思想。

同上，第8頁。

如果我沒有弄錯，第一个把斯大林叫做“亞細亞人”的是已經去世的列昂尼德·克拉辛。克拉辛是老革命家，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苏联外交家，而首先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当克拉辛把斯大林

叫做“亞細亞人”時，他想到的不是值得爭論的種族屬性，而是被認為亞洲政治家共同具有的慍悍果敢、精明幹練、詭計多端和殘酷無情等特點的揉合。布哈林後來簡化了這個名稱，把斯大林叫做“成吉思汗”，顯然是為了使人注意他已經發展到野蠻程度的殘忍。斯大林本人和一個日本記者談話時，一度把自己稱為“亞細亞人”。

同上，第9頁。

參加布尔什維克黨對柯巴<sup>①</sup>來說是比較困難的，然而脫離這個黨對他也同樣比較困難，因為他既沒有理論的想象力，沒有直覺的歷史洞察力，也沒有先見之明，而從另一方面來看他也並不是一個輕率冒失的人。他的智力一直遠遜於他的意志力。碰到錯綜複雜的情況需要做某些新的考慮的時候，柯巴寧願等待時機，保持安靜，或者退却。凡是有必要在思想和政治機構之間作出抉擇的時候，他总是傾向於選擇機構。必須先建立一套執行綱領的機構，然後柯巴才可能對這種綱領表示任何尊重。他的本性是建立在對群眾、對個人都缺乏信任的基礎上的。他的經驗主義經常迫使他選擇抵抗力最小的道路。這就說明，這個目光短淺的革命家為什麼在歷史上一切偉大的轉折點總是採取機會主義的立場，這種立場使他和孟什維克極為接近，有時比孟什維克更右。與此同時，在解決他已經熟悉的問題時，他总是傾向於贊成採取最堅決的行動。照他看來，在一切情況下，組織得很好的暴力是達到目標的最迅速的捷徑。這裡自然而然地促使人作一種類比。俄國的恐怖主義者本性上是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然而他們極為堅決大膽。馬克思主義者習慣把他們叫做“玩弄炸彈的自由主義者”。斯大林過去一直是、現在也仍然是一個在政治上採取中庸之道而又毫不猶豫地採取最極端的措施的政客。在戰略上，他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在戰

---

① 斯大林的化名。——編者注

术上，他是一个“革命家”。他是一种玩弄炸弹的机会主义者。

同上，第72—73頁。

关于斯大林究竟是在會議上当选的还是以后由中央委员会补选为中央委員的問題，看来可能是不重要的。事实上，情况并不如此。斯大林想要成为中央委員。列宁认为有必要把他选进中央委员会。可以作为候选人的人选极为有限，以致二流人物也成为中央委員了。可是柯巴并未当选。为什么？列宁远不是他的党内的独裁者。此外，一个革命政党不会容忍对自己的任何独裁！列宁在与代表們进行初步商談以后，显然认为不提出柯巴作为候选人是比较明智的，“在一九一二年列宁把斯大林带进中央委员会时”，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写道，“人們对此表示憤慨。沒有人公开反对此事。但是他們在談話中表示了憤慨。”这位前外交家提供的情况一向是不值得相信的，然而它令人感到兴趣，因为它反映了官僚的回忆和閑談。列宁无疑遭到严重的反对。只有一件事是他能够做的：等會議結束，然后向人数不多的领导核心呼吁，这个核心不是依靠列宁的推荐，就是同意他对候选人的估計。这样，斯大林就第一次从后門进入中央委员会。

同上，第183—184頁。

有一次，在一場爭論的过程中，据说斯大林暴露出自己是一个反犹太分子，他用格魯吉亚的粗暴話罵犹太人。

同上，第230頁。

內战結束的时候，斯大林在政治上还是沒沒无聞的。党内的应声虫們当然知道他，但是并不把他当作重要的领导人之一看待。尽管他是具有无上权威的政治局的成員，然而对于一般黨員群众來說，他却中央委员会中最不出名的委員之一。国内一般很少听到关于他的話。非苏維埃世界甚至沒有感到有这个人存在。

同上，下冊第435頁。



要理解斯大林以及他后来获得成功的原因，必須首先弄清楚他的个性的主要动因：**权力欲、野心、嫉妒、——那种活跃的、永不熄灭的对于比他更有才能、更有权势、地位更高的人的嫉妒。**

同上，第 437 頁。

但是斯大林所消化了的只是列宁主义有关党的中央集权机器的概念。他一旦抓住了这个概念，就再也看不见它的理論考虑上的根源，它的綱領上的基础也变得根本不重要了，而由于他自己的过去，他自己的社会出身、培养和教育，他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观念、机会主义和妥协。在一九一七年，只是由于列宁不容許他那样做，他才沒有实现同孟什維克的合流；在中国革命期間，他打的是布尔什維克的旗号，实现的却完全是孟什維克的理想，用布尔什維克的手段，亦即他认为是布尔什維主义的实质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机器，实施着孟什維克的綱領。在西班牙革命期間，他用更高明得多的手法，以絕頂的效率推行着同样的政策。

同上，第 459 頁。

对于斯大林，原則从来不起任何作用——而在民族問題上也許比在任何其他問題上更是如此。在他看来，眼前的行政工作总是比一切历史法則要重大得多。在一九〇五年的时候，他只有在党委允許之下才会注意到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在反动的年代里，他之所以保卫地下运动，只是由于他的天性渴望一种集中的政治机器。在二月革命以后，那种机器同不合法斗争一道被打碎了的时候，斯大林又看不出孟什維主义和布尔什維主义之間的区别，并且准备同策烈铁里的党派联合起来。最后，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夺取了政权以后，一切任务，一切問題，一切前途都被置于国家这个工具中的工具的需要之下了。

同上，第 466 頁。

**政治局中的多数坚决要扼杀反对派——至少，要悶死它，排挤**

它, 开除它, 逮捕它。这就是斯大林反駁論点的方法。并不是所有政治局委員都同意这种方針。但是逐漸地, 斯大林把他們拖入了斗争。他削弱了他們精神上的保留, 消磨他們的成見, 使后一步成为前一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这是他的擅长。在这方面, 他手段之巧妙是无可爭辯的。持有不同意見的政治局委員終于甚至不再溫和地抗議斯大林的更粗魯的“活动家”的暴行。逐漸, 他們被迫放弃不表示态度的沉默, 而采取贊同一个又一个的暴行。

.....

.....他采用了自从他青年时期起就成为他一部分的那种做法, 那就是: 在进行反駁时不是提出自己的观点来同对手辯論, 而是对他的对手进行人身攻击, 如果可能的話, 在肉体上消灭他。在論点和批評面前, 智力上的无能引起了憤怒, 而憤怒又驅使他匆忙采取措施来消灭反对派。

同上, 第 517—518 頁。

斯大林进行反駁, 也不只是采用这几种办法。他和他的仆从甚至不惜在反犹主义的混水中摸魚。我特別記得《工人报》刊登的一张以“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諾維也夫同志”为題的諷刺画。在党报中有許多这种具有反犹性质的諷刺画和打油詩。对这些詩画博得了奸险的窃笑。斯大林对这种越来越猖狂的反犹主义的态度是友好的中立。但是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 他不得不发表一个声明說: “我們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斗争, 并不是因为他們是犹太人, 而因为他們是反对派”, 等等。对于任何从政治上考虑問題的人來說, 事情十分清楚, 他的故意含混的声明只是針對反犹主义的“过火行为”而发的, 同时在所有的苏联报纸上传播这个含蓄的提示: “不要忘記, 反对派的領袖是犹太人。”这种說法使反犹分子可以为所欲为。

同上, 第 518—519 頁。

斯大林，这个出色的阴谋家、中派分子和折衷主义者，这个零打碎敲的能手，为了他自己的利益逐步地利用了和无耻地滥用了〔对中央委员会的〕信任。

同上，第 521 頁。

毫无疑问，对人的、肉体上的残忍，即通常所谓的虐待狂是斯大林的特点。当斯大林被监禁在巴庫監獄里的时候，和他同住一間囚室的一个人曾經梦想革命。当时名叫柯巴的斯大林出其不意地問他：“你渴望血嗎？”他拿出藏在靴子里的一把刀子，高高地提起一只褲脚，在腿上扎了一个深而又长的切口。“这是血，給你。”在他当上苏維埃的要人以后，他在他乡下的家里，以割断羊的喉嚨或将煤油倒在蟻冢上放火去烧来取乐。这些独立的旁观者說出的关于他的故事是很多的。世界上具有这些倾向的人是很少的。这些恶劣的自然本能发展到这种可怕的程度，必然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

他将他的一切創伤、憎恨、怨憤、嫉妒和爱慕从一个省的狭小范围带到全国广大范围内。他任何事情都沒有遺忘。他的记忆力是最善于記恨的。他制訂了他自己进行报复的五年計劃，甚至十年計劃。

同上，第 537—538 頁。

斯大林只是在官僚机构在它自己的总书记的领导下完全消灭了列宁的全部工作人員后，才上升到天才的地位的。一个在任何时候任何論題上都沒有发表过片言只字的人，在他年龄远远超过四十以后，自动地升到他的官僚机构的頂峰，——这个人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天才。这是完全用不着证明的。

据尼古拉也夫斯基說，布哈林把斯大林說成是“一点一滴实现阴谋的天才”（*apportioner of genius*）。这是一个确切的說法，只是他並沒有“天才”。这是我第一次从加米涅夫那儿听来的。他指

的是斯大林一点一滴地、在一个分期計劃的基础上实现他的阴谋的才能。要使阴谋的实现成为可能，就需要一个强大的集中的政治机器。一点一滴实现阴谋的工作包括逐渐地顺着迂迴的道路钻进机器内部，然后控制这个国家的舆论。如果加速这个过程，一下子将这一变化全部摆在人们面前，就会引起惊惧、愤怒和抵抗。

在基督的十二个门徒中，只有犹大是一个叛徒。可是，倘若他大权在握，他会将其他十一个门徒以及所有的次要门徒（路可说，耶稣有七十个次要门徒）都说成是叛徒。

同上，第 539—540 页。

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斯大林已经设法使一个专制君王的一切特性在他身上得到发展。

同上，第 540 页。

## 2. 攻击所谓斯大林主义

1. 攻击斯大林主义是中派主义、机会主义，其“实质”是“对无产阶级核心进行压制，同各国妥协分子友好，向世界资产阶级投降”。这个官僚中派“经常摇摆于两条阶级路线之间，有步骤地游离无产阶级路线而走上小资产阶级路线”，它的“总的路线一直是在向右移动”的。它的“基本教条”是一国社会主义论。说这种机会主义有着深刻的客观根源，是官僚、冒牌工人、行政官员、工业经理、新私人资本家、享有特权的城乡知识分子、富农等等对无产阶级施加压力的产物。“‘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势力就是资本主义势力”，斯大林政制是“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一个阶段”。

組織制度不是獨立存在的。黨的整個政治路線表現在黨的制度上。近幾年來，這個政治路線已經離開正軌——它的階級核心和運動趨勢已經從左轉向右，從無產階級轉向小資產階級，從工人轉向專家，從普通黨員轉向幹部，從雇農和貧農轉向富農，從上海工人轉向蔣介石，從中國農民轉向資產階級的將軍，從英國無產階級轉向柏塞爾、希克斯和總委員會<sup>①</sup>——這是舉不勝舉的。斯大林主義的本質就在這裡。

摘自《俄國局勢真相》(1927年9月)，  
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16頁。

斯大林派似乎打擊了左面(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也打擊了右面(在北高加索)。事實上，這個“中間”派系的整個政策本身是在兩條鞭子的抽打下前進的——一條來自右面，一條來自左面。這個官僚主義中間派系完全缺乏階級基礎，經常搖擺於兩條階級路線之間，有步驟地游離無產階級路線而走上小資產階級路線。它不是直線式地游離出去的，而是急驟地搖擺着游離出去的。已往那些搖擺情形，我們已經看到太多了。特別急驟而令人難忘的搖擺是：在富農的壓力下(右面來的一鞭子)擴大選舉權，緊跟着在反對派的壓力下(左面來的一鞭子)取消擴大選舉權的指令。在工人立法、工資政策、稅收政策、對於私人資本家的政策等等方面，這一類的搖擺事例，我們已經看夠了。但是總的路線一直是在向右移動。

同上，第16—17頁。

通過斯大林機構，通過斯大林主義政權而對無產階級先鋒隊施加壓力的那些力量是：官僚、冒牌工人、行政官員、工業經理、新私人資本家、享有特權的城鄉知識分子——所有這些社會成分現在都指着富農向工人說：“記住，小伙子！這回可不是一九一

<sup>①</sup> 總委員會是英國工聯代表大會的執行機關；柏塞爾、希克斯是英國工運領袖，工黨分子。——編者注

八年”。

同上，第 17 頁。

**斯大林政策的全部实质可以用这几句話包括：对无产阶级核心进行压制，同各国妥协分子友好，向世界资产阶级投降。**

同上，第 21 頁。

列宁在他的《左派幼稚病》中，揭发了真正“极左派”的錯誤，同时写道，工人运动中布尔什維主义的主要敌人过去和現在都是机会主义。“現在它在国际范围内也仍然是主要敌人。”<sup>①</sup>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于上述的問題，列宁又补充道：“和這個問題相較，糾正共产主义左傾‘錯誤’是一个容易的問題。”<sup>②</sup>当列宁說“左派”这个詞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是极左派；可是斯大林，当他說和极左主义斗争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是革命的列宁主义者。

和作为主要敌人的右傾机会主义运动坚决斗争，同时改正“左”傾錯誤——这是列宁的口号。我們——反对派，提出这同一个口号。

归根結蒂，“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势力就是资本主义势力。在战后危机的最初几年里（一九一八——一九二一年），资本主义迅速地掉进深渊，这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也随之在削弱并掉下去。近几年来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带来了社会民主主义暫时的加强。意大利工人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的失敗，德国无产阶级一九二一——一九二三年的失敗，英国一九二六年大罢工的失敗，和中国无产阶级一九二七年的失敗，不管原因是什么，它們本身已經引起了无产阶级上层分子中間的革命浪潮的低落。它們在一定时期內加强了社会民主主义，而削弱了共产党。在共产党內，它們使右

① 《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13 頁。——編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203 頁有关字句如下：“另一个比較容易的任务，就是糾正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的錯誤。”——編者注

派暫時居于統治地位，而排斥了左派。工人貴族的作用、工運官僚及其小資產階級同事的作用，在這樣一個時期變得特別大了，也特別反動了。

這些過程必不可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蘇聯共產黨。行政“中央”已經集中向左開“火”，並且已經用完全機械的方法造成了一種新的內部力量對比，這對於左派列寧主義者是更加不利的。事實上已經造成這樣一種形勢，在這種形勢下沒有黨的選舉，只有機器的選舉。

這些就是在共產國際、俄國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的政策上，列寧派影響削弱的總原因。結果那些在十月革命後很長時間內仍然呆在敵人的隊伍里，但是最後好像經過一段預備期似的被吸收到共產國際中來的半社會民主主義分子（馬爾丁諾夫，施米拉里，腊非也斯，D·彼得羅夫斯基，佩帕爾等人），越來越經常和越來越高聲地以共產國際的名義發言。在這些人里還必須加進象海因茲·諾伊曼及其同類這樣一些純粹冒險家的名字。但是在群眾里面，新的左傾運動分子，新的革命起義的分子已經在聚集之中。反對派正在理論上和政治上為那個新日子從事準備。

同上，第96—97頁。

關於中央委員會的多數派在國內外政策的基本方面所犯的嚴重錯誤，我們已經坦白地說明了我們的意見。我們已經指明中央委員會這些錯誤怎樣削弱了我們的黨，這個革命的根本工具。我們已經指明，雖然如此，但是我們黨能夠從內部改正它的政策。但是為了改正這個政策，必須清楚地和坦白地說明黨領導上所犯錯誤的性質。

所犯的錯誤是機會主義的錯誤。根據列寧的經典式定義，機會主義在其發展了的形式中，是由工人階級領袖和資產階級組成的集團，它反對工人階級的多數。在蘇聯現在的條件下，機會主義

在其已臻于完全的形式中，是工人階級首領們要同正在发展的新資產階級（富农和耐普曼）妥协，同世界資本主义妥协，而牺牲工人和貧农广大群众的利益的一种願望。

同上，第106頁。

在目前条件下，俄国共产党內的机会主义傾向有着深刻的客观根源：（1）国际資產階級的包围和資本主义的暫时的局部稳定，造成一种相信这是全面“稳定”的傾向。（2）新經濟政策是一条絕對必要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它部分地复兴了資本主义，也复活了許多敌視社会主义的力量。（3）在一个农民占巨大多数的国家里，小資產階級成分不能不渗入苏維埃和党。（4）党在政治領域中的垄断地位对革命來說是絕對必要的，但这个事实也进一步造成了一系列的特殊危險。在列宁領導下的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曾經直接地和坦率地指出，我們党內已經存在着整批整批的人們（来自富裕农民的人，高級職員，知識分子），他們本来会加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党的，如果这些党不是非法的話。（5）党所掌握的国家机关反过来使許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分子流入党內，用机会主义影响党。（6）虽然专家、高級職員和知識分子對我們的建設工作是必要的，但是从他們那里发出一种非无產階級的影响，不断地侵入我們的各种机构——国家的、經濟的和党的机构。

这就是为什么党的列宁主义反对派对斯大林集团的明显的日益危險的背离傾向坚持敲起警鐘。要是认为党的伟大的过去和它的老布尔什維克队伍在任何条件下和任何時間都是反对机会主义蜕化的保证，这是一种有罪的大意想法。这种想法是同馬克思主义沒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这不是列宁所教导的思想。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說道：“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质；信念、忠誠和其他优秀的个



人品质，在政治上完全是不关紧要的东西。”<sup>①</sup>

同上，第108—109頁。

**恢复时期我国工业异常迅速地增长是产生机会主义错觉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央委员会在党和工人阶级里面系统地鼓励这种错觉。和內战时期相較，工人的条件迅速地开始有所改善，这种情形使工人广大群众产生了迅速地和沒有痛苦地克服新經濟政策的矛盾的希望。上述的情形阻碍了党及时看清机会主义傾向的危險。**

同上，第110頁。

**列宁一再重申：如果沒有西方无产階級革命的援助，俄国資产階級复辟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并沒有想錯：斯大林的官僚政制，不是別的，正是資产階級复辟的第一个阶段。**

摘自《斯大林評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年版下册第558頁。

可是当苏維埃社会冷靜下来的上层分子反对十月革命的官僚的反动活动开始的时候，就立即向不断革命論开火了，这个理論比别的理論更加完全地反映第一次无产階級的革命，同时也公开揭露这次革命之未完的、局限的和部分的性质。于是，**在排斥不断革命論的过程中产生了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論——斯大林主义的基本教条。**

同上，第565頁。

2. 声称“斯大林主义是社会还无法摆脱国家的拘束衣的这种社会状态的产物”。斯大林主义并不来自布尔什維主义，“从布尔什維主义或馬克思主义之中推論出斯大林主义”，这等于“从革命中推論出反革命”。污蔑斯

---

<sup>①</sup> 参看《列宁全集》第33卷第253頁。——編者注

大林主义是对馬克思列宁的最极端的修正主义，“在对馬克思的修正上伯恩斯坦甚至沒敢走到斯大林的一半那么远”。斯大林官僚“根本沒有任何理論体系”，“它的‘意識形态’浸透了警察的主观主义，它的实践則是赤裸裸的暴力的經驗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維主义“在肉体上也是势不两立的”。

攻击“斯大林政权凌駕于政治上分裂的社会之上，依靠警察和軍官集团，并且不受任何监督”。斯大林主义是凱撒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变种”，同法西斯主义“有很多特点是十分酷似的”。

凱撒主义或者它的資产階級形式波拿巴主义，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进入舞台的：两个陣营的尖銳斗爭把国家权力——姑且这么說——抬高到民族之上，而且表面上保证国家权力完全独立于階級之外——实际上只不过保证这种权力拥有維护特权者所必需的自由。斯大林政权凌駕于政治上分裂的社会之上，依靠警察和軍官集团，并且不受任何监督，这样一种政权显然是波拿巴主义的一种变种——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見过的新型的波拿巴主义。

凱撒主义是在由于內部斗爭而动摇了的奴隶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波拿巴主义是資本主义制度在危急时期的政治武器之一。斯大林主义則是同一制度的一种变种，不过是在工人国家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个国家已經被有組織的武装的苏維埃貴族和非武装的劳苦群众之間的对抗弄得四分五裂。

正如历史所证明的，波拿巴主义同普遍的甚至秘密的投票制度相处得不錯。波拿巴主义的民主仪式是公民投票。因而常常就会有这样一个問題向公民們提出：对領袖是拥护呢，还是反对呢？

于是选民就感觉到枪口对着自己的两个肩膀之间的部位。自从拿破仑第三——现在看来，他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外行——那个时代以来，这种技术已经有了特殊发展。在公民投票的基础上建立波拿巴主义的苏联新宪法，就是这种制度的真正顶峰。

归根到底，苏维埃波拿巴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世界革命的推迟。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同一原因却造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这样，我们就得出了一个乍看起来出乎意料而实际上却是不可避免的结论：苏维埃民主虽然是被全能的官僚所摧毁，资产阶级民主虽然是被法西斯主义所消灭，两者却出于同一原因，即世界无产阶级解决历史为它提出的问题太慢了。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尽管社会基础很不一样，却是两种对称的现象。两者有很多特点是十分酷似的。如果欧洲的革命运动取得胜利，那就会不仅使法西斯主义而且使苏维埃波拿巴主义立即动摇。斯大林主义官僚背弃国际革命的行为，从他们自己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他们只不过是按照自我保护的要求行事而已。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03—204页。

历史不是由即使是“最优秀的”少数人创造的；不仅如此，这些“优秀分子”还可能在“异己的”即资产阶级的文化精神中蜕化。不仅苏维埃国家可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在不利的历史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党也可能失去其布尔什维主义。

一九二三年最终形成的左翼反对派是以对这一危险的清楚认识为出发点的。它逐日记录蜕化的征候，力求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觉意志来对抗已经到来的“热月”。然而结果发现，靠这一主观因素还是不够的。那些按照列宁的说法决定斗争结局的“广大群众”因内部贫困和过久地等待世界革命而疲惫不堪。群众灰心失望。官僚占了上风。他们制服了无产阶级先锋队，践踏了马克思

主义，出卖了布尔什维克党。斯大林主义得胜了。布尔什维主义以左翼反对派为代表同苏联官僚及其共产国际决裂了。发展的实际进程就是这样。

不错，从表面上看斯大林主义出自布尔什维主义。莫斯科的官僚集团甚至今天还继续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党。它不过是利用布尔什维主义的旧商标，以便更好地欺骗群众。那些把表皮当内核、把皮相当实质的理论家尤其可怜。他们把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等同起来，给热月派帮了很大的忙，从而起了明显的反动作用。

在政治领域内排除所有其他党派的情况下，各居民阶层相互矛盾的利益和倾向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在执政党身上得到反映。随着政治重心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向官僚转移，党在社会成份上，在思想意识上也起了变化。由于暴风骤雨般的发展进程，党在最近十五年遭到比社会民主党在半世纪期间远为剧烈的蜕化。目前的“清洗”在布尔什维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不只是划下一道血的红线，而是划下一条血的河流。杀绝布尔什维克的整个老一代，杀绝相当多的参加过国内战争的中年一代以及较严肃地接受布尔什维主义传统的那部分青年，这表明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就是在肉体上也是势不两立的。

摘译自《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  
(1937年)，载于《反对派通报》1937年  
9—10月第58—59期第10—11页。

事实是：“国家”马克思主义的一支，社会民主党，在执政之后成了资本的公开代理人。另外一支则产生了新的特权等级。显然，祸根在于国家。从广阔的历史观点看来，在这一论断中可以找到真理的核心。作为强制机关的国家无疑是政治和道德病害之源。象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这也适用于工人国家。因此可以说斯大林

主义是社会还无法摆脱国家的拘束衣的这种社会状态的产物。

同上,第11頁。

从布尔什維主义或馬克思主义之中推論出斯大林主义,这等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从革命中推論出反革命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思想以及后来的改良主义思想一直都是按照这种死板的公式行事的。

同上,第13頁。

曾經密切参与西班牙革命的美国社会主义者李斯頓·奧埃克就在前几天說过：“事实上,斯大林主义分子現在是馬克思和列宁的最极端的修正主义者——在对馬克思的修正上伯恩施坦甚至沒敢走到斯大林的一半那么远。”这是完全正确的。只需补充一点,伯恩施坦当时是真的有理論需要:他誠心誠意地試图使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的实践和它的綱領协调一致。而斯大林官僚不仅与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而且根本就沒有任何理論或体系。它的“意識形态”浸透了警察的主观主义,它的实践則是赤裸裸的暴力的經驗主义。就利害关系本身而言,篡夺者等級是仇視理論的:它不能使自己或別人了解自己的社会作用。斯大林不是用理論家的笔尖,而是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皮靴去修正馬克思和列宁的。

同上,第16—17頁。

### 3. 叫嚷反对对斯大林的“神化”

叫嚷斯大林被“日益神化”,人們对領袖进行“宗教式的膜拜”,提出了“領袖不会犯錯誤的教条”,同时“禁止人們与沒錯的领导人有不同的想法”,“个人忠实于領袖和无条件服从”被說成是“人的最大光荣”。“由于斯大林不可能犯錯誤,因此政治局就不能反对斯大林,而斯大林

也不能反对他自己”。說斯大林自己也要报纸“天天对他大事吹捧，登他的照片”，“用大号铅字排印他的名字”。攻击“連俄文句子都写不通順的斯大林，竟被宣布为文学风格的一种典范”。文学艺术甚至农业展覽会都必須“繞着斯大林旋轉”。“关于苏維埃經濟，或国内外政策，人們只能抄襲‘領袖’演說中的一些陈辞濫調”。斯大林已成为“专制君王”，他可以說，“朕即社会”。

目前的政治局委員，在布尔什維克党史上都是居于次要地位的。如果有人革命的頭幾年預言他們以后会高升到那样的地位，那他們首先会感到驚訝的，同时这种驚訝不会掺杂着虛偽的謙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目前的作法更加严格了，即政治局永远正确，反对政治局的人就不可能正确。但是不仅如此，由于斯大林不可能犯錯誤，因此政治局就不能反对斯大林，而斯大林也不能反对他自己。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1頁。

我們絕不想把抽象的专政和抽象的民主加以对比，在純粹理性的天秤上衡量二者的优劣。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是相对的，只有变化是永恒的。布尔什維克党的专政，已为事实证明是历史上最强有力的进步工具之一。但是在这里也是一样，用詩人的話來說就是，“理性变成无理，仁慈变成灾禍。”反对党被禁止以后，派別也被禁止。而派別被禁止的結果則是，禁止人們与沒錯的領導人有不同的想法。由警察一手制造的党的磐石般一致，带来了官僚不受懲罰的結果，这种結果成了各种违法乱紀貪污腐化行为的泉源。

同上，第75頁。

只要还是只有很少数人能够得到单独的住宅、足够的食品和整洁的衣服，那末，几百万大小官僚就会首先设法利用权力来保障自己的福利。这样就会使这个阶层具有浓厚的自私自利心理，使它的内部有一种牢固的团结一致精神，使它害怕群众的不满情绪，使它顽固地坚持压制一切批评，最后还使它向“领袖”进行虚伪的宗教式的膜拜——这是因为这位“领袖”正是这些新贵族的权力和特权的体现者和维护者。

同上，第100—101页。

在工厂，在集体农庄，在营房，在大学，在教室，如果不是在托儿所的话，甚至也在幼儿园，人的最大光荣被说成是这样的，即个人忠实于领袖和无条件地服从。近来的许多教育上的警句和格言，似乎就是从戈培尔那里抄来的，如果大部分不是戈培尔从斯大林和同事那里抄来的话。

同上，第116页。

在同党内反对派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文学派别一个一个地被扼杀了。这不仅是一个文学的问题。所有的思想领域都出现了毁灭的过程，而由于这种过程大部分是不知不觉的，因此它进行得比较果断。目前的统治阶层认为自己的任务不仅是从政治上控制精神创作，而且还要规定它的发展道路。简单指挥的做法不仅应用到集中营里，而且同样地应用到农业科学和音乐方面。党的中央机关报刊载不署名的指示性社论，这种社论在建筑、文学、戏剧和芭蕾舞方面具有军事命令的性质，至于在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

官僚对于不直接为自己服务的东西以及自己所不懂的东西抱着一种迷信般的恐惧态度。当他们要求自然科学与生产有某种联系的时候，这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们命令科学研究者只以直接的实际重要工作为目的的时候，这就威胁到堵塞最珍贵的发

明泉源，其中包括实际的发现，因为这些发现大半是在沒有預見到的道路上出現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語言学家以及軍事理論家，由于有过辛酸的教訓，都避免作出各种广泛的論断，他們怕哪一个“紅色教授”——一般总是一个不学无术的钻营之徒——从列宁或者甚至从斯大林的言論中斷章取义地摘录一段話来威胁他們。在这种情况下，要維護自己的思想，或者保持自己在科学上的尊严，就往往意味着要遭到压迫。

但是，在社会科学領域，情况还要坏得多。不要說新聞工作者，就是經濟学家、历史学家，甚至統計学家，也都特別注意不要同——即使是間接地——官方路綫的暫時左右搖摆发生矛盾。关于苏維埃經濟，或者国内外政策，人們只能抄袭“領袖”演說中的一些陈辞滥調，并且事前就給自己規定了这样的任务，即在文章中要說明一切事物恰好是按照應該发展的那样发展着，甚至发展得还要好些。虽然这种百分之百地加以迎合的做法可以使人們免除日常的不愉快，但是它往往带来最重的惩罚：空洞无物。

尽管从形式上說，馬克思主义在苏联是国家所奉行的学說，但是在过去十二年中，沒有在經濟学、社会学、历史或哲学方面出現过一种值得注意和譯成外国文的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馬克思主义著作都不超过經院式的編纂范围（这种編纂只是重复那些事先批准了的旧概念），都是按照当时行政管理的需要重新編排那些旧引語。千百万册书籍和小册子通过国家机构分配到各地，这些书籍和小册子对任何人都沒有用处，都是一些用胶水、甜言蜜語和其他粘性物质拼凑起来的東西。可能說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和独立意見的馬克思主义者，不是关在牢里就是被迫默不作声，尽管事实上，社会形式的演变在每个阶段都提出了巨大的科学問題！进行理論工作所不可缺少的謹慎被玷污和踐踏在脚下了。甚至《列宁全集》的注释，在每次新版本中都从統治人物的个人利益出发作了彻



底的修改：对“领导人”的名字加以推崇，反对派的名字加以诽谤；事实则被掩盖起来。关于党史和革命史的教科书，情况也是一样。事实被歪曲，文献被隐藏起来或者加以伪造，名誉凭空制造出来或者有意加以诋毁。如果简单地比较一下任何一本书在过去十二年当中所作的修改，那末，我们就可以正确无误地看出统治阶层的思想和良心蜕化的过程。

同上，第 131—132 页。

由于斯大林对诗人马雅柯夫斯基称赞了几句，文学估价在几个星期内便发生了变化，教科书重新改编，街道改名，雕像建立起来。新歌剧给予高贵听众的印象马上变成作曲家的一种音乐指导。共青团的书记在一次作家代表会议上说，“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就是法律”，全体听众都鼓掌，但是毫无疑问，有些人是感到可耻的。好象是要彻底嘲弄文学一样，连俄文句子都写不通顺的斯大林，竟被宣布为文学风格的一种典范。这种拜占廷主义和警察统治，虽然某些表现具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喜剧情调，但是其中也包含着某种深刻的悲剧。

同上，第 133 页。

象天主教一样，它在衰落时期提出了领袖不会犯错误的教条，但是它把这个教条高举到连罗马教皇也从来没有梦想到的程度了。

对斯大林的日益神化以及这种神化所具有的种种漫画味道，是这个制度所必需的一个因素。官僚需要一个不可侵犯的最高仲裁者，即使不是一个皇帝，也是一个第一执政官，因此他们就把一个最能适应自己的统治要求的人抬到肩膀上。领袖的那种“性格力量”虽然使西方那些半真半假的文人雅士倾倒，实际上是一个不顾一切维护自己的地位的阶层所施加的集体压力的总表现。这个阶层的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位上都是这样想的：朕即国家。他们每个

人在斯大林身上都容易找到自己。而斯大林也能在每个人身上找到他自己的一小部分精神。斯大林是官僚的化身。这就是他的政治人格的本质。

同上,第203頁。

莫斯科几次审判已經表明：极权的寡头政治早已成为国家发展道路上的真正的障碍。經濟生活的日益复杂的需要的不断增长，再也不能容忍官僚的压制了。然而这群寄生虫还没有准备作任何让步。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他們破坏了国内一切最好的东西。不应认为在十二年間进行了三次革命的人民忽然变得愚蠢起来。人民是受到了压制，迷失了方向，但是正在注視着，正在思索着。官僚以其专橫的統治、压迫、貪婪和血腥报复，使人每天都想起他們的存在。半饥餓的工人和集体农民，怀着仇恨低声耳語控訴那些暴虐的部长老爷們的狂奢极欲的生活。为了斯大林的六十岁生日，烏拉尔工人不得不做一年半的苦工来为这位可恨的“人民之父”制造一尊宝石的巨大肖像，——这是古代波斯薛西斯大帝或埃及克娄巴特拉皇后一流人所做的事情。能够干出如此丑恶的事物的政权是不可能不激起群众的憤慨的。

摘譯自《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第四国际紧急會議宣言, 1940年5月), 第  
21—22頁。

他的野心具有一种被欧洲技术所加深的粗野的亚洲的特色。他必須使报纸天天对他大事吹捧，登載他的照片，只要有一点借口就提到他，用大号鉛字排印他的名字。今天，就連电报局職員也知道，如果打給斯大林的电报，不称他为人民的父亲，或伟大的导师，或天才，他們就不能接发这个电报。小說，歌剧，电影，繪画，雕塑，甚至农业展覽会等等，都必須繞着斯大林旋轉，象繞着它的軸心旋轉。斯大林时代的文学和艺术将作为最荒唐和卑鄙的拜占廷作风

的实例载入史册。

摘自《斯大林評传》(1940年), 三联书店  
1963年版下册第511頁。

官僚第一次看到斯大林不是地位平等的人当中的領袖, 而是一个亚細亚的暴君, 一个专制君王, 成吉思汗——布哈林曾这样称呼他。

同上, 第544頁。

“朕即国家”这句话比起斯大林的集权政权的实际情况来说, 几乎是一句自由主义的格言。路易十四只把自己与国家等同起来。罗马教皇把他们自己同国家和教会等同起来——但也只是在教皇統治俗世的时代。集权国家远远超过凱撒-天主教。因为它还干預国家的全部經濟。斯大林不象太阳国王<sup>①</sup>, 他可以正确地說: “朕即社会”。

同上, 第546頁。

#### 4. 历数斯大林的“錯誤”

##### (1) 起初是孟什維克, 一九〇六年屬分地派

造謠說, 斯大林开始活动时“是一个孟什維克”。他参加革命时是个“土包子”, “經驗主义者”, “列宁关于革命的国际性的思想对他是不着边际的, 陌生的”。宣传他在一九〇六年反对布尔什維克的土地国有化綱領, 而主张分地, 說“他心目中想到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 “对迫在眉睫的社会主义革命絲毫沒有认真考虑”。攻击說, 由于区别不清革命的低潮和高潮, “沒有能力确

---

<sup>①</sup> 指路易十四。——編者注

定自己的政治方向”，在革命的退潮中却参与了搶劫梯弗里斯銀行的冒险行动。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斯大林的几个最亲近的朋友在党报《东方曙光报》发表了一九〇三年警察当局的一篇报告如下：

“据我最近从我們的特工人員处获得的情报，朱加施維里〔斯大林〕在組織內的化名是索索和柯巴。一九〇二年以来，他先是作为孟什維克，后来是作为布尔什維克一直在社会民主党內积极活动，担任宣传工作者和第一〔铁路〕区的領導。”

就我們所知，任何报刊上都没有出現过斯大林的党羽駁斥这篇警察报告的文章。从报告中看来，**斯大林在开始活动的时候是一个孟什維克。**

摘譯自《斯大林的政治傳記資料》，載于《斯大林偽造學派》紐約1937年版第180頁。

在一九〇七年，斯大林参与了“剝夺”梯弗里斯銀行的行动。孟什維克們跟在資產階級市儈們的后面对布尔什維克的这一“陰謀”和“无政府的布朗基主义”大表憤慨。我們对于这种憤慨只能采取一种态度，那就是嗤之以鼻。斯大林既然参加了——即使只是部分地参加——一个断然打击敌人的行动，那末，这只会增加他的坚决革命的声誉。然而，人們不能不奇怪，为什么所有官方发表的斯大林的傳記中都畏首畏尾地略去了这一节事实？难道是怕有損于官僚的体面？我們大胆地认为原因不在这里。原因很可能是政治方面的。因为，虽然一桩剝夺行动的本身决不能在其他革命者的心目中損害一个革命者的面貌，然而，**斯大林对当时局势所作的錯誤估計却的确有損于他的政治家的声誉**。只有在群众采取攻势、也就是革命高涨的时候配合以局部打击敌人的机关——包括“財政机关”在內——的行动，才能相輔相成。**当群众正在退却的时**

候，局部的、孤立的和游击式的打击行动必然会退化为冒险行动，以致于挫折党的锐气。一九〇七年是革命正处于下降的时期，因此，剥夺行动也就成了冒险行动。总而言之，斯大林在那时期就表明了他没有能力区别低潮和高潮。他后来不止一次在重大的时局中表现出没有能力确定自己的政治方向（在爱沙尼亚、保加利亚、广州和“第三时期”）。

同上，第 181 頁。

因此，他这次发言支持并不十分受人欢迎的土地分配一定有更强有力的、使他不能不这样做的动机。按照现在也就是隔了三十多年以后所能作出的解释，斯大林的动机有两个，都是很能说明他的性格的。

柯巴<sup>①</sup>参加革命时是一个平民民主主义者，一个土包子，一个经验主义者。列宁关于革命的国际性的思想对他是不着边际的，陌生的。他希望找到近在眼前的“保证”。对个人土地所有制的向往在格鲁吉亚农民身上比在俄罗斯农民身上显得更强烈，而且得到远为自发的表现，因为格鲁吉亚农民缺乏直接的村社土地占有的经验。因此，这位来自吉第里洛村的农民的儿子肯定认为使这些小财产所有者得到一份额外的土地是防止反革命的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可以清楚看出：在他的情况下，“分配主义”并不是一种教条主义的信念——说实在的，他对从学说中得来的信念毫不在乎地加以拒绝——而是和他的最根本的性情气质、他的教养、他的社会环境完全合拍的有系统的纲领。事实上，二十年后，我们还会在他身上发现这种“分配主义”故态复萌的现象。

柯巴的第二种动机似乎也是同样明白无疑的。在他看来，十二月起义的失败肯定使列宁的威信有所降低：他一向认为事实比

---

① 斯大林的化名。——编者注

思想更重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处于少数地位。柯巴和列宁站在一边不可能取胜。仅仅这个事实就大大减少了他对国有化綱領的兴趣。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都认为和对方的綱領比較，分配土地的害处較小。因此，柯巴有理由希望在最后决定时，代表大会中的多数会就危害較小的方案达成協議。这样一来，激进民主主义者天生的气质就和阴謀家的策略考虑合而为一。但是柯巴的算盘打錯了：孟什維克拥有很大的多数，所以当他們宁願采取为害較大的方案时，不必选择危害較小的方案。

为了将来参考，必須指出：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期間，斯大林效法列宁，认为无产階級和农民的联盟是“暂时性”的，也就是說，仅限于完成共同的民主任务。他連想也沒有想到应当指出，处于这种地位的农民将来有可能成为无产階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軍。二十年后，对农民的这种“不信任”将被宣布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邪說。当然，二十年后，許多事情都将改头換面重新出現。斯大林曾經在一九〇六年宣布孟什維克和布尔什維克的土地綱領“都是不能採納的”，认为分配土地“并不和經濟发展趋向相抵触”。他心目中想到的实际上是資本主义发展的趋向。当时他对迫在眉睫的社会主义革命絲毫沒有認真考虑。他十分肯定地认为，还得过几十年才有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在这个期間，資本主义的自然法則将执行使农村經濟結構集中和无产階級化的任务。柯巴在他的传单<sup>①</sup>中用聖經上的字眼“乐园”来形容遙远的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沒有理由的。

摘自《斯大林評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年版上册第105—106頁。

---

① 指斯大林写的《高加索的工人們，是复仇的时候了！》。这篇文章原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用传单形式印发的。見《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65—70頁。——編者注

## (2) 在反动年代是調和派分子

污蔑斯大林在反动年代是調和派分子。指責他把列宁反对取消派和調和派的斗争說成是“杯水风浪”，把《明星报》当作“調和派的机关报，直接反对列宁”，按他制訂的編輯方針出版的《真理报》上取消派三字被“勾消”了。攻击斯大林压下列宁要求抗議七名孟什維克杜馬党团代表压制六名布尔什維克杜馬代表的信，把同“取消派的团结”看得高于布尔什維克的“政治独立”。說斯大林贊成《真理报》同取消派的《光綫报》合并。胡說克拉柯夫會議明确无誤地譴責了斯大林的政策。說在布尔什維克关于战争的理論中，“斯大林沒有为它貢獻一个字”。

一九一二年，斯大林参加了布尔什維克的合法报纸《明星报》工作。彼得堡編輯部最初发行这份报纸时把它作为調和派的机关报，直接反对列宁。斯大林在一篇綱領性的社論中这样写道：

“要是我們的报纸能够成功地捍卫坚实的民主的精神财富而不陷入不同派别的論战热；我們將感到滿意。这种坚实的民主的精神财富現在正遭到公开的敌人和虚伪的朋友的无耻践踏。”（《革命和苏联共产党——資料和文件》，第5卷第161頁。）

“不同派别的論战热”这句话的矛头完全是针对列宁的，是反对列宁“杯水风浪”<sup>①</sup>，反对列宁由于某种“論战热”而常常“暴跳如雷”的。

由此可知，斯大林这篇文章同他在上述一九一一年的信件內所表現出来的卑鄙的調和主义傾向是完全一致的。

摘譯自《斯大林的政治傳記資料》，載于《斯大林伪造学派》紐約1937年版第183—184頁。

<sup>①</sup> “杯水风浪”是俄文中的成語，指为无謂小事而激烈爭吵。——編者注

但是，作这种夸耀的动机只起辅助作用。这封神秘信件<sup>①</sup>的关键在最后一部分：

“当然，我們听到了关于国外的‘杯水风浪’的情况：一方面是列宁-普列汉诺夫联盟，另一方面是托洛茨基-马尔托夫-波格丹洛夫联盟。据我所知，工作者对第一个联盟的态度是赞同的。但是一般說，工作者开始看不起侨居国外的人員：‘让他们任意在墙上爬吧；但是，至于我們，凡是珍視运动的利益的人，应当工作，其余的就不用管了。’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

令人可惊的話！斯大林认为列宁反对取消派和調和派的斗争是“杯水风浪”。“工作者”——其中也有斯大林——“开始看不起”侨居国外的人員（也包括布尔什维克参謀部）。“凡是珍視运动的利益的人，应当工作，其余的就不用管了。”看来运动的利益与制訂运动綱領的理論斗争并无联系。

.....

.....他对“原則”的真正态度在第二封信里极为忠实地表示出来：“应当工作，其余的就不用管了。”这实质上就是許多不太聪明的調和分子的态度。斯大林对“侨居国外的人員”使用了非常輕蔑的語句，这不仅因为粗暴是他的性格的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且主要是因为他指望得到有經驗的人特别是格尔曼诺夫的同情。

摘自《斯大林評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年版上册第176—178頁。

不錯，斯大林并不仅仅闡释列宁的話。但是由于他要支持調和派，他就繼續在同时采取两条路綫，从他在索里維切果茨克所写的两封信中，我們对这两条路綫已很熟悉了，那就是：同列宁在一起反对調和派，同調和派在一起反对列宁。第一个政策是公开的，

---

① 指斯大林在1911年写給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一封信。——編者注



## 第二个政策是隱蔽的。

同上，第 187 頁。

这样，斯大林自己就肯定《真理报》編輯方針是他負責制訂的。这个方針的实质可以总括如下：“应当工作，其余的就不用管了。”不錯，四月二十二日，就在《真理报》第一期出版的那一天，斯大林本人被捕。但是，在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內，《真理报》是忠实于他与別人联合制訂的这个方針的。“取消派”这三个字从这家报纸的辞汇中勾消了。

同上，第 189—190 頁。

这七名孟什維克大部分是知識分子，他們想要把这六名布尔什維克（没有什么政治經驗的工人）置于他們自己的控制之下。十一月底，列宁亲自写信給瓦西里也夫〔斯大林〕：“既然我們在工人选民团中有六个代表，就决不能默默地服从那些西伯利亚人<sup>①</sup>。既然六人团受到多数的压制，他們就应提出强硬的抗議……”<sup>②</sup> 斯大林对这封信的答复，象对其它信的答复一样，仍然是郑重保管着的。但是列宁的呼吁并未得到同情：这六个人认为与那些被“开除出党”的取消派的团結高于他們自己的政治独立。在《真理报》发表的一项特別決議中，統一的党团承认，“社会民主党的团結是一个迫切的需要”，表示自己贊成将《真理报》与取消派的《光綫报》合并，并且作为朝这个方向走的一步，建議它的全部成員都成为两家报纸的撰稿人。十二月十八日，孟什維克的《光綫报》在它的撰稿人名单上胜利地公布了四个布尔什維克代表的名字（两人拒絕刊登自己的名字）；孟什維克派成員的名字同时在《真理报》的报头上出現。調和主义再次获胜，这在实质上意味着布拉格代表會議的精神和文字的失敗。

<sup>①</sup> 指在西伯利亚的政治流放者，他們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原編者注

<sup>②</sup> 《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 425 頁。——編者注

不久，《光綫报》的撰稿人名单上又出現了一个名字——高尔基的名字。这使人感到是一个阴谋。“你怎么与《光綫报》搞在一起了呢???”列宁写信給高尔基，打上三个問号。“难道你可能是在步代表們的后尘？可是他們完全是上当了！”在調和派取得这个暫时的胜利的时期，斯大林在彼得堡，执行中央委员会对党团和对《真理报》的控制权。沒有任何人透露过关于他对严重打击了列宁的政策的一些决定表示抗議的任何情况——这是一个肯定的迹象，表明調和派阴谋的幕后鼓动者是斯大林本人。巴达也夫代表后来为他的犯罪行为辯解說：“象在其他一切場合一样，我們的决定……是与我們当时有机会与之討論我們的活动的那些党内人士的态度一致的……”这个轉弯抹角的說法暗指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局，首先是暗指斯大林本人。巴达也夫謹慎地声辯說，罪責不应从领导人身上轉移到被领导者的身上。

同上，第 194—195 頁。

尽管缺乏人員，列宁并不急于派斯大林回俄国。必須在他回去以前完成在彼得堡的“必要的改革”。另一方面，斯大林在克拉柯夫會議以后也不急于回到他从前工作的地方，这次會議明确无誤地(不管是多么間接地)譴責了他的政策。

同上，第 203 頁。

某些传记作家断言斯大林是“失敗主义”理論或者“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公式的制訂者，这完全是捏造，并且证明他們完全不了解斯大林的智力和政治性格。他与政治革新和大胆創造理論的精神是最不符合的，他从未預見过任何事情；他从来没有走在任何人前面。他是一个經驗主义者，因此向来害怕預先作出結論，宁願在剪裁之前先量十遍。在这个革命者的内心，总是隱藏着一个保守的官僚。第二国际是一个强大的政治机构，斯大林是决不会主动与它决裂的。布尔什維克关于战争的理論的制訂完全

是列宁的成就的一个重要部分。斯大林没有为它贡献一个字，就象他没有为革命理论贡献一个字一样。

同上，第 220 页。

### (3) 二月革命后有考茨基主义倾向， 十月革命前夕暗中反对起义

攻击二月革命后斯大林有“考茨基主义倾向”，采取“与孟什维克左派的精神一致的完全机会主义的立场”：“参与草拟”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的机会主义决议，“支持临时政府”，“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主张“同策烈铁里式的孟什维克派联合”，反对列宁的四月提纲，“企图把斯维尔德洛夫排斥在中央委员会之外”，暗中反对列宁的主张而支持参加斯德哥尔摩社会党会议，变相抗拒列宁的两封信：《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在《真理报》上发表声明，“在‘基本原则’上支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起义的行为。

斯大林同志在这里列举了别人的错误，却漏了谈一谈他本人的错误。如果“不断革命”由于和列宁的真正观点不同，是不正确的，可是它里面仍然有某种正确的东西，这也就使我能够走向布尔什维主义。譬如说，“不断革命”并没有妨碍我在同布尔什维主义进行了斗争的尝试之后（上面已经说了，我这是不对的），在一九一七年在美国从根本上拟定了与列宁向党发挥并执行了的那条路线原则上相同的路线。斯大林同志在二月革命后执行了错误的策略（其它《真理报》上的文章以及在关于有条件支持临时政府的决议中），列宁曾称之为考茨基主义倾向。在民族问题上，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在党的专政及其他问题上，斯大林同志后来又犯了重

大的錯誤。但是我认为，他現在所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他的关于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

摘譯自《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1926年12月)，載于《真理报》1926年12月14日第289号第2版。

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中旬同加米涅夫一起到达彼得格勒。当时的《真理报》在莫洛托夫和施略普尼柯夫負責編輯之下观点模糊，不成熟，但是在性质上是“左”的，是反对临时政府的。斯大林和加米涅夫认为旧的編輯部太左了，于是就改組了旧編輯部，采取了同孟什維克左派的精神一致的完全机会主义的立場：(一)支持临时政府，“只要临时政府能如何如何”；(二)在軍事上保卫革命(即保卫資產階級共和国)；(三)同策烈铁里式的孟什維克派联合。《真理报》当时的态度的确是党的历史和斯大林的历史中的可耻的一頁。他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发表的那些文章都是他在流放期間考虑問題时所得出的一些“革命性”的結論，为什么到今天我們还看不到斯大林在战争时期的任何論述，完全可以由这些文章來說明。

摘譯自《斯大林的政治傳記資料》，載于《斯大林伪造学派》紐約1937年版第185頁。

象加米涅夫一样，斯大林更接近苏維埃中的多数派。《真理报》在編輯部易手后，早在三月十五日(二十八日)就宣布，“只要临时政府跟反动派或反革命进行斗争”，布尔什維克就坚决支持临时政府。这项宣布的自相矛盾之处是，反革命的唯一重要代理人就是临时政府本身。斯大林对战争的立場表现了同样精神：只要德国軍隊仍然服从德皇，俄国士兵就应该“坚守岗位，用子弹回敬子弹，用炮弹回敬炮弹”。好象帝国主义問題只是一个皇帝問題！文章是加米涅夫写的，但是斯大林絲毫沒有提出异議。如果他在那些日

子里跟加米涅夫有所不同的話，那就是他要比他的伙伴更加閃爍其詞。《真理報》解釋說：“一切失敗主義，或者不如說是唯利是圖的報紙在沙皇檢查制度的保護下稱為失敗主義的東西，在第一個革命團隊在彼得格勒大街上一出現時，就消失了。”這是公然否定了列寧的話（列寧在沙皇檢查制度所不及之處宣傳失敗主義），同時重申了加米涅夫在杜馬中的布爾什維克黨團受審時所作的聲明。但是這一次，這篇文章是斯大林認可的。至於“第一個革命團隊”，它的出現只是意味着從拜占廷式的野蠻走到帝國主義文明的一個步驟。

摘自《斯大林評傳》（1940年），三聯書店  
1963年版上冊第249頁。

**彼得格勒蘇維埃一致通過這項宣言一事**<sup>①</sup> 不僅標誌着帝國主義的米留可夫對小資產階級民主黨人的勝利，而且還意味着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對左翼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所有的人向假的愛國紀律屈服了。斯大林在《真理報》上寫道：“應該歡迎……蘇維埃昨天發出的……宣言。這個宣言如能深入廣大群眾，無疑會使數百數千的工人重新記起已經被遺忘的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sup>②</sup>。實際上，在西方也有類似的呼喚，它們所干的只是幫助統治階級維持為民主而戰這樣一個幻想。

斯大林關於宣言的文章不僅清楚地揭示了他在这个具體問題上的立場，而且還揭示了他的一般思想方法。他固有的機會主義在時間和環境的逼迫下會暫時隱藏在抽象的革命原則下，當事情到決定關頭時，他的機會主義就拋棄了這些原則。他在文章的開始几乎是逐字重復列寧的論點：即使在推翻沙皇制度後，俄國參加

① 指通過1917年3月14日執行委員會提出的《告全世界人民》宣言。托洛茨基在前文中認為這個宣言是社會愛國主義的。——編者注

②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8—9頁。——編者注

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性的。但是当他要作出他的实际结论时，他不仅以含糊的限制条件欢迎社会护国主义宣言，而且还效法加米涅夫断然拒绝动员群众反对战争这一革命作法。他写道，“首先，把一个光秃秃的‘打倒战争！’的口号当做实际方法无疑是完全不适当的<sup>①</sup>……”他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对临时政府施以压力，要它表示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谈判……”<sup>②</sup>借助对资产阶级施加友好“压力”（对资产阶级来说，征服是战争的整个目的），斯大林希望根据“民族自决权”来实现和平。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列宁一直给予最严重打击的，恰恰就是这种市侩乌托邦主义。不论多少“压力”都不能使资产阶级不再成为资产阶级：必须推翻他们。但是斯大林完全由于害怕而不敢作出这个结论——正象妥协派那样。

同上，第250—251页。

斯大林把这种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尽管妥协派尽了一切努力，这个斗争日益紧张而要变为内战）说成只是两个政治机构之间的分工。甚至左翼孟什维克马尔托夫也不会把问题说成是这样。这是策烈铁里——而策烈铁里是妥协派的圣人——的理论最庸俗的表现：“温和的”和比较“坚决的”两派力量在一个叫做“民主”的舞台上演戏，两者合演一出戏，有的人在“征服”，有的人在“巩固”。这就是后来在中国（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在西班牙（一九三四——一九三九年）以及一般在他所有倒霉的“人民阵线”中执行现成的斯大林主义政策公式。

同上，第254页。

斯大林在从西伯利亚回来的途中可能参与草拟了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的决议案。可能他在感到代表们的态度之后，认为最好是稍为离开加米涅夫一点。但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的决议案的质量甚至比彼得堡的决议案的质量还要低：“……十分

<sup>①②</sup>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8—9页。——编者注

清楚地表明，临时政府的权力和威信的唯一源泉是临时政府必須完全服从的人民的意志……只要临时政府采取滿足工人階級和革命农民的要求的方針，就支持临时政府。”从西伯利亚带来的这个騙人政策证明是十分簡單的：資產階級“必須完全服从”人民并“采取”工人和农民的“方針”。

同上，第 255 頁。

因此，布尔什維克代表會議在第二天的會議上考虑右翼孟什維克領袖策烈铁里关于两党合并的建議，并不是偶然的。斯大林以最同情的态度对此表示了反应：“我們應該这样做。有必要闡明我們关于統一的条件的建議。根据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的路綫統一是不可能的。”所說的路綫就是在瑞士举行的两次社会党會議上的“路綫”，在这两次會議上，溫和的和平主义者占了优势。……但是，被称为市僧的斯大林坚持立場：“我們不應該跑在前头并促进分歧。党的生活是不可能沒有分歧的。我們會忘記党内这些小分歧。”人們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斯大林宣布同苏維埃內占优势的集团的鼓动者策烈铁里的分歧是在党内可以“忘記”的小分歧。**这次討論是在四月一日（新历四月十四日）进行的。三天后，列宁宣布对策烈铁里进行誓死斗争。两个月以后，策烈铁里解除布尔什維克的武装并逮捕了他們。

同上，第 256—257 頁。

一九一七年三月會議对于了解布尔什維克党領導成員在二月革命之后的思想状况，特别是在西伯利亚蟄居四年之后回来的斯大林的思想状况，特別重要。他是一个普通的民主分子和痴呆的乡下佬，后来有了点名气，时势迫使他披上了馬克思主义的外衣。他在那几周里写的文章和发表的講話明确无誤地表明了他在战争年代的立場。如果他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間略微接受一点列宁的思想，象人們二十年后写的回忆录所声称的那样，他本来是不会象他

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那样无可挽回地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沼的。由于列宁不在和由于加米涅夫的影响，斯大林才有可能在革命爆发时显示他真正的为人，暴露他的最根深蒂固的特性——不信任群众，完全缺乏想象力，目光短浅，爱好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在以后的年代，每当斯大林有机会在重要的局势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时候，这种特性就继续暴露出来。斯大林在三月会议上十分彻底地暴露出自己是一个政客，因此三月会议今天已从党史中删去，有关这次会议的记录被封存起来。一九二三年，有人为“三人小组”成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秘密准备了三个副本。只是一九二六年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参加反对斯大林时，我才设法从他们那里获得这项了不起的文件，这样，我才能够在国外以俄文和英文加以发表。

同上，第 257 页。

继续由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编辑的《真理报》声称，列宁的提纲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并不同意他的意见，《真理报》本身将继续奉行自己的旧政策。这项声明是加米涅夫写的。斯大林默默地支持他。他必须长时期保持沉默。列宁的思想在他看来是流亡者的幻想，但是他等着瞧党机构如何反应。

同上，第 262 页。

在代表会议上，有人曾企图把斯维尔德洛夫排斥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死后谈及此事，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一大错误。他又说，“很幸运，我们得到了来自下面的纠正。”列宁本来很难有什么理由反对斯维尔德洛夫的候选资格。列宁只是通过通讯了解他是一个不倦的职业革命家。反对意见可能来自斯大林。斯大林没有忘记斯维尔德洛夫如何在他之后在彼得格勒把情况纠正过来，改组了《真理报》；他们在库莱卡的共同生活仅仅增进了他的敌意。斯大林决不宽恕任何事情。他显然企图在会议上进



行报复，以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我們只能猜测他用了什么办法）設法贏得列宁的支持。但是他的图謀沒有得逞。如果說在一九一二年列宁想使斯大林进入中央委员会时遭到了代表們的反对，那末現在当他想排斥斯維尔德洛夫于中央委员会之外时，遭到了同样的反对。

同上，第 268 頁。

在斯德哥尔摩社会党會議問題上爆发了公开冲突，举行这次會議的倡議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来的。想作垂死掙扎的俄国护国派和妥协派认为这次會議是“为和平而斗争”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被控同德国总参謀部有联系的列宁表示坚决反对参加显然是由德国政府发起的这次會議。在八月六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上，加米涅夫公开表示贊成参加这次會議。斯大林甚至沒有想到在《无产者报》（这是当时《真理报》的名字）为党的立場辯护。相反，斯大林沒有发表列宁反对加米涅夫的尖銳的文章，这篇文章只是在拖了十天以后，并且只在文章的作者坚持要求和向其他中央委員发出呼吁以后才发表。

同上，第 292 頁。

八月三十日，斯大林毫無保留地发表了季諾維也夫写的沒有署名的文章《不做什么》。这篇文章显然是反对准备起义的。

同上，第 293 頁。

在民主會議開幕的那天——（一切假民主議會中最愚蠢的一个）——列宁給党中央委员会写了两封著名的信件《布尔什維克必須夺取政权》和《馬克思主义和起义》。这次他要求立即行动：发动团队和工厂的人們，逮捕政府成員和民主會議成員，夺取政权。显然這項計劃不能在当天付諸实行；但是它的确引导中央委员会的思想和活动进入新的途徑。加米涅夫坚持断然拒絕列宁的建議——說它是灾难性的！加米涅夫害怕这些信件在党和中央委員

会中传閱，他主张把副本全部毀掉，只留一份存入档案，他得到六票。斯大林建議“把这两封信发給最重要的党組織，并建議它們进行討論”。最近的評論說，斯大林的建議的目的在于“組織地方党委员会对中央委员会施加影响，力促它执行列宁的指示”。如果情况是这样，斯大林原会直接出来为列宁的建議辯护，原会以他自己的決議来对抗加米涅夫的決議！但是他的想法远非如此。各省的大多数委员会委員比中央委员会更右傾。把沒有得到中央委员会贊同的列宁信件发給他們看，等于是表示不贊成这些信件。斯大林提出这个建議是为了爭取時間，如果发生冲突，就有可能申辯脫，地方委员会违抗。中央委员会由于优柔寡断而陷于瘫痪。會議决定把列宁信件問題推迟到下次會議討論。列宁极其不耐煩地等待答复。但是斯大林甚至沒有在五天后举行的下次會議上露面，信件問題甚至未被列入議程。气氛越热，斯大林的花招越冷。

同上，第 298—299 頁。

斯維尔德洛夫公布了列宁的信件，这封信斥責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工賊，要求把他們开除出党。由于在同一上午《真理报》发表了編輯部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辯护的声明，危机突然复杂化，声明說：“列宁同志的文章的尖銳語調并沒有改变我們基本上繼續同意他的意見的事实。”这个中央机关报认为指責列宁的抗議的“尖銳性”而不指責这两个中央委員反对党关于起义的决定的公开立場是适当的，而且表示它在“基本原則”上支持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好象在当时还有比起义問題更为根本的什么問題一样！中央委員們惊奇地揉揉自己的眼睛。

斯大林在編輯部的唯一的同事是索柯里尼柯夫——未来的苏联外交家，后来是“清洗”的受害者。但是索柯里尼柯夫宣布他与撰写反駁列宁的那篇社論的工作毫无关系，并且认为它是錯誤的。这样，斯大林迟在起义前四天，还在单独——在反对中央委员会和

反对他自己的編輯同事的情况下——支持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中央委员会是由于担心使危机延长才克制了它的憤怒。

斯大林繼續在起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間玩弄手法，他正式表示反对接受加米涅夫的辞呈，他爭辯說，“我們的整个形势是矛盾的。”加米涅夫的辞呈以五票对斯大林和另外两人的反对票被接受了。一項決議以六票对斯大林的一票被通过了，這項決議禁止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进行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斗争。會議記錄說：“斯大林說，他要离开編輯部。”对他來說，这意味着放弃他在革命情况下能够担任的唯一职务。但是中央委员会拒絕接受他的辞呈，从而防止了另一次分裂的发生。

同上，第304—305頁。

#### (4) 在布列斯特和平談判时主张

##### 只談判而不簽訂和約

污蔑斯大林在布列斯特和平談判期間“一无主見”，“游移不定，躲躲閃閃，或默然不語”。斯大林首說“托洛茨基的立場对当时的党來說是唯一可行的出路”。宣传斯大林在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当德国已开始进攻的时候，还要求只进行談判不簽訂和約。

(十八)多年以来，斯大林和他的庫西宁之流一直在向全世界宣传所謂托洛茨基违反中央委员会的決議，頑固地决定不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上签字。斯大林甚至企图在报上证明这种說法。关于这一点，我們現在拿已經公布的一九一七年中央委员会會議速記記錄上的正式記載來作证明(国家出版社一九二九年版)：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會議。托洛茨基同志提議表決下述方案：我們停止战争，不締結和約。提付表決。九票贊成，七票

反对。”(同上,第207頁。)

这似乎已足够证明了。

(十九)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这个方案持什么态度呢?在举行那次以九票对七票的票数通过这一方案的会议之后一星期,斯大林说了下面这番话:

“一九一八年二月一日(一月十九日)会议。斯大林同志:……中間观点——托洛茨基的立場——为我們提供了摆脱困境的出路。”(同上,第214頁。)

我們不能不奇怪,斯大林的这几句話怎么居然逃过了那位目光精細的編輯薩維利也夫的眼睛而一直保留在速記記錄內。因为这几句話彻底暴露了后来許多年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談問題上的宣传。現在看来,斯大林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九日(二月一日)的时候认为托洛茨基的立場为党提供了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在整个那个紧急时期里,党組織和苏維埃內的絕大多数人是贊成进行一場革命战争的,因而要貫徹列宁的立場,那除非是把党和政府推翻(那在当时当然是絕對办不到的)。如果我們記住这些情况,斯大林的那几句話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斯大林說托洛茨基的立場对当时的党說来是唯一可行的出路,这样說絲毫不錯。他不过是道出了一个无可爭辯的事实而已。

摘譯自《斯大林的政治傳記資料》,載于《斯大林  
偽造學派》紐約1937年版第193—194頁。

凡是熟悉当时情况的人,都能清楚地想象得出斯大林由于自己缺乏任何考虑周密的立場而陷入的一筹莫展的狼狽境地。在二月十八日德国人已經夺占了得文斯克,他們以非常的速度向前推进着。阻击和牽制政策已經完全无效。斯大林却在二月二十三日建議不要簽訂和約,而要……进行談判。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談判期間,斯大林一无主見。他游

移不定，躲躲閃閃，或默然不語。最后总是投票贊成列宁的动議。斯大林当时那种不知所措和軟弱的态度甚至在經過官方“改正”后的中央委员会正式记录中也流露得十分明确——虽然还不是纖毫毕露。

同上，第 194—195 頁。

了解当时情况的每个人——〔甚至象烏里茨基这样一个一貫极力主张同德意志帝国进行革命战争的人〕都可清楚看出，抵抗是毫无希望的。斯大林的話完全是由于根本沒有任何深思熟慮的立場。早在二月十八日，德国〔軍隊就攻占了〕得文斯克。它的进攻速度是特別快的。遇阻政策已經是山穷水尽了。〔但是〕斯大林却〔在五天后〕在二月二十三日建議不簽訂和約，而……进行談判。

摘自《斯大林評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年版下册第 333 頁。

### (5) 在国内战争中违抗軍令， 是軍事反对派的首脑

指責在国内战争中斯大林利用中央委員的身份把沙皇时代“大公的权力”带入軍隊中来，自己违反总司令的命令，同时“經常地慫恿別人违反战綫領導人的命令”。声称斯大林保卫察里津、彼得格勒的故事是伏罗希洛夫等篡改历史制造出来的“神話”。断言紅軍在华沙城下的失利是斯大林負責的西方集团軍司令部硬要攻占利沃夫而拒絕往援华沙的結果。污蔑斯大林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扶植軍事反对派作为反对托洛茨基的杠杆，是“反对派的首脑”。

軍事机器保证有可能发号施令。但是斯大林并不是那个机器

的首腦。最初他只統率二十個軍中的一個軍；後來他領導五六個戰綫中的一個戰綫。他建立了嚴厲的紀律，緊緊抓住所有的杠桿，不容許不服從。同時作為一個集團軍的統帥，他經常地慫恿別人違反戰綫領導人的命令。在領導南部或西南部戰綫時，他違反了總司令部的命令。在沙皇軍隊中，除軍事上的從屬關係外，還有一條不成文的關於從屬關係的規定：那些具有某種指揮官或高級行政職位的大公們，常常不把上級軍官放在眼里，從而在陸海軍的管理中造成混亂。我記得曾對列寧說，**斯大林不適當地利用其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地位的便利，把大公的權力帶入我們軍隊之中。**〔十年以後〕，伏羅希洛夫在他的關於斯大林和紅軍的文章中〔毫無隱諱地承認〕：“斯大林準備違反任何規章，任何從屬關係。”憲兵是從不法之徒中招募來的。

上下級之間有矛盾是自然的事。集團軍一級幾乎總是对戰綫一級不滿，戰綫一級總是对總參謀部有意見，特別是在情況不十分順利的时候。**斯大林的特点是**他經常利用這種摩擦，使它們發展成為激烈的抗爭。斯大林把他的合作者拉進危險的衝突，從而把他們捏合在一起，使他們更依賴他。有兩次，中央委員會直接下令把他從戰綫召回。但是每當形勢有新的轉折時，他又被派出去。儘管屢有機會，他在軍隊中並未建立起威信。可是，那些在他指揮下的軍事合作者，一旦被拉入反對中央的鬥爭之中，以後就一直同他保持密切的關係。察里津集團成了斯大林派的核心。

摘自《斯大林評傳》(1940年)，三聯書店  
1963年版下冊第354—355頁。

在內戰年代發表的記述材料中，**關於察里津的故事是**同斯大林名字毫無聯繫的許多事件之一。他在幕後起的作用，最多也只能說是十分短的時期，只有很少數的人知道，絕對無必要多談到他。

同上，第369頁。

正如同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間对付調和派以及在十月革命以前对付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派一样，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表面上与軍事上的反对派毫无关系，却努力地把它扶植起来并且利用它作为反对托洛茨基的杠杆〕。

.....

〔斯大林竭尽全力就軍事人民委員部在軍事問題上采取的立場在代表大会上散播毒素。〕所有手头的文件都充分证明，根据他在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中采取的立場看来，斯大林是反对派的首脑。如果說我过去还只是有点疑惑，而現在則是坚信不疑，斯大林同乌克兰人搞的阴谋，他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操纵以及諸如此类的行为都是同他在軍事反对派中的活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在察里津沒有能够得到桂冠，他就想在〔黑暗中〕找到报复的机会。

同上，第 388—389 頁。

〔十年之后，伏罗希洛夫利用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九年春末对彼得格勒所作的这次短暫的訪問，又一次酝酿篡改历史。現在这粒种子已經发展成为一个十足的神話，叫作“斯大林是彼得格勒的救星”。这是个狡黠的神話，他用一种相当奇怪的方式故意把事情发生的季节掉換了。事实是〕尤登尼奇在一九一九年曾經两度打算占領〔彼得格勒〕——一次在五月間，另一次在十月間。

同上，第 401 頁。

〔一口咬定說在南方战綫上取得了最后胜利的計划是斯大林作出的这件事里有着諷刺性幽默的味道。然而这个罵倒一切的狡賴就是斯大林本人的作品，它所根据的证明文件就是斯大林給列宁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斯大林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我起初在口头上后来又通过书面形式提出的反駁七月一九月計划的論点，而这些論点曾經是他和政治局大多数委員一道所批駁过的。

由于政治局的全体委员对这件事的原委都十分熟悉，因此斯大林在当时还不可能想到要把旧计划的责任栽在我的头上。相反地，他怪罪于总司令及其属下的“斗鸡式战略家”，也就是那个在七月间总司令部改组时斯大林所依恃的古谢夫。

同上，第422页。

在华沙附近遭遇到的灾难之所以达到那样异乎寻常的程度，原因之一在于指向利沃夫(林堡)的由南方战线各军组成的西方集团军司令部的指挥不当。斯大林是这个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首脑。他要在斯米尔加和图哈切夫斯基预定进入华沙的时候，不惜以一切代价同时进入利沃夫。我军向维斯杜拉河的迅速前进已经使波兰军队的指挥部把全部力量，以及在法国军事代表团的协助下调动的大批预备队集中在华沙和卢布林一带。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西南战线的前沿同主要的西方战线的前沿成直角分道扬镳：斯大林独自作战。当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受到的威胁已经十分明显的时候，总司令命令西南战线把前进的方向急剧地转向扎莫斯蒂-托马舍夫一线，以打击华沙附近的波兰部队的侧翼，然而西南战线司令部，在斯大林的怂恿下，却继续向西方前进：难道占领利沃夫本身不是比帮助“别人”攻占华沙更重要吗？在三、四天內我军总参谋部还没有能使这项命令付诸执行。只是在再三催促，外加威胁之后，西南战线司令部才改变了前进的方向。但是这时，几天的拖延已经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八月十六日，波兰人展开反攻，并且迫使我军后撤。

同上，第428—429页。

### (6) 在民族问题上犯过许多错误

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是斯大林“唯一的理论著作”，这是在列宁的“启发”和“不断监督”下写成并由



“列宁逐字逐句修改”过的。攻击斯大林在民族問題上犯过許多錯誤：一九一七年的三月會議上斯大林發揮了“认为民族压迫是封建主义的产物的看法”，一九一九年初由于斯大林“不适当地执行”了农民和民族政策，使乌克兰的苏維埃政府垮台，一九二三年他把大俄罗斯主义“同弱小民族的防卫性民族主义放在同等地位”，在处理格魯吉亚民族問題上采用軍事武断和行政命令措施，命令紅軍“侵入”格魯吉亚。污蔑斯大林在奥尔忠尼启泽、捷尔任斯基的帮助下，在格魯吉亚煽动了一場“反对最优秀党员的‘革命’”，“斯大林派在高加索把列宁派击潰了”。

**《馬克思主义和民族問題》无疑是斯大林最重要的——不如說是他的唯一的——理論著作。这一篇文章(它长达四十頁)使它的作者有权被承认是杰出的理論家。相当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在这以前或者以后，他沒有写出在质量上可以稍与比拟的任何东西呢？这个謎的解答在于：斯大林的这篇著作完全是列宁启发他写的，是在列宁不断监督下写成的，并且是由列宁逐字逐句修改的。**

摘自《斯大林評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年版上册第210頁。

在維也納，斯大林在列宁指导下，写过一本有价值的关于民族問題的书，但是他在西伯利亚想独立繼續这个工作的結果，却使列宁甚至认为不可能发表他的文章。在一九一七年的三月會議上，斯大林發揮了认为民族压迫是封建主义的产物的看法，而完全看不到帝国主义是我們时代民族压迫的主要因素。在一九二三年，他把具有悠久传统和压迫过弱小民族的大俄罗斯主义同弱小民族的防卫性民族主义放在同等地位。这些明显的錯誤，斯大林式的錯誤，放在一起看是可以理解的。上面已經指出，这是因为他在任

何一個問題上都沒有形成有系統的概念。他根據一時的需要利用一些互不相關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就象在鞋鋪里按大小挑選鞋子一樣從中進行選擇。這就是為什麼每遇到事件轉折點他總是那麼容易自相矛盾起來。因此，即使在他專長的民族問題上，斯大林也不能達到完整的概念。

同上，下冊第 343 頁。

他在烏克蘭的時期充滿了失敗，因此關於這個時期的情況一直完全沒有透露。斯大林主義者所寫的官方歷史，被迫記錄下在斯大林擔任民族人民委員部人民委員的整個時期在烏克蘭貫徹黨的路綫中所遭到的一次又一次失敗，但謹慎地避免提到他的名字同這種流行病般的失敗有關。這些歷史不說：歸根結底，“一九一九年初在烏克蘭犯的關於農民和民族問題的錯誤——這個錯誤使那裡的蘇維埃政府垮台”，是由於斯大林完全不適當地執行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制訂的政策。

同上，第 347 頁。

作為民族人民委員，斯大林不再從他在一九一三年竭力頌揚的歷史法則的觀點出發，而是從行政機構的方便的觀點出發來處理民族問題。這樣一來，他必然發現自己同最落後的，最受壓迫的民族的要求大為相左，並且為大俄羅斯的官僚帝國主義獲致了不應有的權益。

格魯吉亞人民在成分上幾乎完全是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他們強烈地反對把他們的國家蘇維埃化。但是由此引起的巨大困難却由於採用了軍事武斷的方式和方法來使格魯吉亞蘇維埃化而大大加劇。在這種情況下，執政黨對於格魯吉亞的群眾，需要採取加倍審慎的態度。正是在這一點上列寧同斯大林之間發生了尖銳的不和，列寧堅持對格魯吉亞以及一般說來對外高加索採取一種格外靈活、謹慎而耐心的政策，而斯大林則認為，既然國家機器已經掌

握在我們手中，我們的地位是穩固的。斯大林在高加索的代理人是奥尔忠尼启泽，这个头脑发热而性情急燥的格魯吉亞的征服者认为每一件反抗的表示都是对他个人的冒犯。〔斯大林似乎忘記了不久以前〕我們已經承認了格魯吉亞的獨立並且同它簽訂了條約。〔那是一九二〇年五月七日的事。但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一日，〕紅軍部隊已經奉斯大林的命令侵入了格魯吉亞並且使我們面臨着既成事實。

同上，第 466—467 頁。

〔接着發生的事可以用簡單幾句話來說明。〕斯大林再一次辜負了列寧的信任。為了在格魯吉亞給自己建立堅實的政治支持，他背着列寧和整個中央委員會，借着奥尔忠尼启泽的帮助，同时也并非沒有得到捷尔任斯基的支持，在那里煽動了一場不折不扣的、反對最優秀的黨員的“革命”，同時背信棄義地用中央委員會的權威把自己掩蓋起來。由於他同格魯吉亞的同志們開會的情況達不到列寧那里，斯大林就抓住這一點企圖用假的情報把他包圍起來。列寧覺察到有問題，就命令他的私人秘書處搜集有關格魯吉亞問題的全部情況；經過研究，他決定把問題公開提出來。很難說最使列寧感到震驚的是什麼：是斯大林個人不忠誠呢，還是他長期以來無力把握住布爾什維克黨的民族問題政策的要旨；很可能是兩者都有。

.....

〔列寧是做得對的。如果他認識到局勢的全部嚴重性，還要把它輕描淡寫那就太可惡了，因為正如托洛茨基八年以後所描繪的那樣，在他背後所發生的事實上是〕斯大林派在高加索把列寧派擊潰了。這是黨內反動派的首次勝利。它掀開了革命的第二章〔——斯大林主義的反革命〕。

同上，第 469—470 頁。

## (7)和列宁的关系

攻击斯大林早在一九二〇年，在庆祝列宁五十寿辰会上，公开“数說列宁的錯誤”；以后还会指責列宁犯有“民族自由主义的錯誤”。說在季諾維也夫支持斯大林担任总書記之职时，列宁表示异議，认为“这位大司务除了辣菜之外再也不会做什么别的”，列宁还指責斯大林“阴谋反对皮达可夫”。声称“列宁改組中央監察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建議完全是针对斯大林当时已經过度的官僚权力的，是針對着他的不忠順的”。列宁还会和托洛茨基協議，打算由中央委员会建立一个特別委员会以反对斯大林負責的組織局內的官僚主义。列宁的遺囑“特別提到由于斯大林的粗暴和不忠應該免除他的总書記的职务”，并在两个月之后同他断絕了“私人 and 同志关系”。造謠列宁是被斯大林毒死的。

說斯大林用“最狂暴的話”斥責克魯普斯卡婭，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还“指責她‘阴谋’反对他”，“她由于列宁触怒斯大林而受到报复性的惩罚”，“遭到了軟禁”。

所有老的政治局委員都知道——斯大林比誰都清楚——，列宁那些說到阴谋反对忠誠、博学和天才的頓巴斯領導人的措詞尖銳的話<sup>①</sup>，指的是斯大林阴谋反对皮达可夫。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  
三联书店 1963年版第157頁。

象其他許多文件一样对党隐瞒起来的这些特別說明問題的通信，都是早于列宁那封著名的关于民族問題的信的。列宁关于斯

<sup>①</sup> 参看《列宁全集》第33卷第264頁。——編者注

大林的草案所說的話都是非常節制的，語氣是緩和的。那時列寧仍然希望不經過大的衝突而糾正這個問題。他溫和地批評斯大林“急躁”。列寧把斯大林指責穆吉瓦尼主張“獨立”的話加上引號，顯然表明他自己是和這個指責無關的。此外，列寧特別強調，他要在同穆吉瓦尼和其他同志談話的基礎上提出他的修正案。

**斯大林的回信完全相反，是以粗暴為特點的；第四點的最后一句特別值得注意：**

“毫無疑問，這種‘急躁’將為鼓吹‘獨立’的人火上澆油，而有損列寧的民族自由主義(!)。”

這樣一來，列寧就等於被指責犯有民族自由主義的錯誤。

關於民族問題的鬥爭的進一步發展使列寧看到，他不能用內部方式，或者說用在家庭內部影響斯大林的方法解決問題；必須把問題向代表大會、向黨提出。為此，列寧寫了幾封關於民族問題的信。

摘自《斯大林偽造歷史》(1927年10月21日)，載于《俄國局勢真相》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166頁。

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的行為首先向我清楚地表明，列寧的改組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的建議完全是針對着斯大林的當時已經過度的官僚主義權力，針對着他的不忠順的。所以斯大林頑固地反對列寧計劃。

同上，第170頁。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想了一會，然後說道（我在這裡幾乎逐字逐句引用了他的原話）：‘這就是說，我提議和蘇維埃的官僚主義鬥爭，而你要加上黨的組織局的官僚主義。’

.....

“在我們談話結束的時候，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說，他將要提議由中央委員會建立一個和‘一般’官僚主義鬥爭的委員會，我們

可以通过这个委员会触及党的組織局。他答应‘进一步’考虑組織方面的問題。说到这里我們就分手了。以后我有两个星期等着他召見，但是伊里奇的健康状况繼續恶化，不久就臥床了。这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他关于民族問題的信通过他的秘书送交給我。这样，那項工作就再也沒有进行。”

**从实质上来說，列宁的計劃完全是針對斯大林的。**

同上，第 171 頁。

是的，我和列宁之間有过分歧。但是斯大林根据这些东西来歪曲我們关系的一般性质的企图，一碰到我所提到的时期中的一些事实，就化作齏粉；在这个时期中，我已經說过，決定問題不是用不留記錄的談話和投票，而是用通信的方式；这也是列宁第一次和第二次患病之間的时期。其間的事实概括起来如下：

(一)在民族問題上，列宁准备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攻击。关于这件事，是列宁的秘书以他的名义并在他的指示下告訴我的。她重复得次数最多的一句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在准备一枚攻击斯大林的炸弹。”

(二)列宁在論工农检查院的文章里說：

“工农检查人民委員部現在沒有絲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沒有比我們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搞得更坏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員部沒什么要求可提。……一个人民委員部，如果工作馬馬虎虎，得不到任何人信任，并且說話毫无威信，那又何必組織它呢？……

“我要問一問工农检查院現在的領導人或任何与之有关的人，他能不能真心地告訴我，象工农检查院这样的人民委員部实际上有什么用处呢？”<sup>①</sup>

**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年間，斯大林始終是工农检查院的首脑。**

<sup>①</sup> 参看《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444、445 頁。——編者注

列宁在这里的打击完全是针对他的。

(三)同一篇文章說：

“(官僚主义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sup>①</sup>

这些话本身已经够清楚了，如果把它们同我在上面引述的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间的最后谈话联系起来，意思就特别尖锐；在那次谈话里，他说到我们组织一个集团来反对作为官僚主义发源地的组织局。括号中的列宁式的朴实语言完全是针对斯大林的。

(四)关于遗嘱不需要多說。其中充满对斯大林，他的粗暴和不忠顺的丧失信任。其中說到斯大林可能滥用权力以及因此引起的党的分裂的危险。从遗嘱的所有性格描述中引出的唯一组织结论是：“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调开。”

(五)最后，列宁在世时所写的——或者不如說所口授的——最后一封信，是給斯大林的断絕和他之間一切同志关系的信。加米涅夫同志在这封信写成的同一天夜里（一九二三年三月五——六日）告訴了我这件事。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加米涅夫同志述說过这封信。瑪·伊·烏里揚諾娃<sup>②</sup>的证詞的速記记录证实了这封信的存在。

季諾維也夫同志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全会上历数列宁給斯大林的“警告”时說：

“第三个警告是这样的：一九二三年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給斯大林的一封私人信中，断絕了和他之間的一切同志关系。”<sup>③</sup>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33卷第449頁。——編者注

② “有关这个事件的文件是存在的。”——引自瑪·伊·烏里揚諾娃在联席全会上主席团上的声明。——托洛茨基注

③ 速記记录，第1号第32頁。——托洛茨基注

瑪·烏里揚諾娃試圖把事情說成是，列寧在逝世前給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中聲明斷絕一切同志關係這件事，是由個人的原因而不是政治的原因引起的。<sup>①</sup>難道有必要指出，列寧的個人動機永遠產生於政治的、革命的、黨的原因嗎？“粗暴”和“不忠順”也是個人品質。但是列寧却在這上面警告黨，不是為了“個人的”原因，而是為了黨的原因。列寧斷絕和斯大林間的一切同志關係的信有着完全相同的性質。那封信是在關於民族問題的信以後和在遺囑以後寫的。要減低列寧最後這封信的道義分量的圖謀，一直在煞費心機地進行着。可是黨有權利知道這封信！

這就是事實真相。這就是斯大林怎樣地在欺騙黨。

同上，第 171—173 頁。

列寧時期的政治局委員，現在已經只剩下斯大林一個人。當時的兩個政治局委員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流亡時期都曾同列寧共事多年，現在卻以莫須有的罪名服着十年徒刑。另外還有三個政治局委員，即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已經完全離開領導地位，但是由於採取了屈服的態度，目前擔任着次要的職務。最後，還有本書的作者，目前在流亡中。列寧的寡妻克魯普斯卡婭，由於不能全力使自己完全適應“熱月”，也遭到了軟禁。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聯書店 1963 年版第 70—71 頁。

〔早在一九二〇年春天〕慶祝列寧的五十壽辰的儀式上，斯大林就發表了一通演說，數說列寧的錯誤。很難說他這樣做的動機是什麼。不管怎麼說，這篇演說叫人聽起來那樣不入耳，以至第二天，四月二十四日，《真理報》和《消息報》〔在報道這次慶祝會的消息中〕只提了一句，“斯大林同志談到了他們在革命以前一道工作

---

① 速記記錄，第 4 號第 104 頁。——托洛茨基注



期間的几件事”，再沒有別的了。

摘自《斯大林評傳》（1940年），三聯書店  
1963年版下冊第457頁。

〔列寧希望誰來繼承他呢？一直到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他的病第二次發作使他躺下來之前，他並沒有認真考慮過這個問題，他滿心期望可以恢復健康，重新擔負起領導的責任來。他在幾天以後寫的遺囑中，顯然是試圖就各個繼任人選提出坦率的意見，而不是作出硬性的決定。正由於他的壓倒一切的威望使他握有大權，他不願意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他提出贊成和反對的方面，推薦人選，特別是提到由於斯大林的“粗暴”和“不忠”應該免除他的總書記的職務，但是除了提出關於他的繼任人怎樣才能合作得最好的忠告，以及關於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間的嚴重爭執會給黨和布爾什維克的事業帶來災難的警告之外，再也沒有說什麼別的。然而，不到兩個月之後，他就發現不得不採取決然而一無反顧的步驟，正式同他的助手之一的斯大林斷絕了同志關係——這意味著斷絕一切政治上的和私人的聯繫。這個“革出教門”的行動發生在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的籌備期間，列寧在他的病第三次嚴重復發之下臥床不起，沒有能參加這次代表大會。這是第一個沒有列寧參加的代表大會，也是第一個充滿着由總書記親手挑選的代表的大會。它标志着列寧主義政權末日的開始，标志着斯大林主義這個新的政治方向的降臨。

同上，第464頁。

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期間，季諾維也夫和他的最親近的盟友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底支持斯大林擔任總書記之職，以期利用後者對我的敵視來為他們自己的目的服務，這時候，列寧對這個人選表示了異議，〔他在同他的密友們作的一次非正式的討論中〕這樣

說道，“这位大司务除了辣菜之外再不会做什么别的。”

同上，第 464—465 頁。

我开始不断地問自己：在列宁患病的时候，斯大林实际上起的是什么作用？这个門徒有沒有做什么事来加速他主人的死亡？

我比任何別的人更了解这种怀疑是使人吃惊的，但是从情况、事实和斯大林的性格来看，不能不有这种怀疑。在一九二二年，聰穎的列宁警告說：“这个大司务除了辣菜之外再不会做什么别的”。这些菜证明不仅是辣的，而且是下了毒的，这不仅是比喻的說法，而且实际上真是这样。

同上，第 485 頁。

医生关于列宁健康的报告越加不利，总書記的行为就越加大胆。在这些日子里，斯大林悶悶不乐，紧紧地咬着他的烟斗，他的猜忌的眼中露出阴险的光芒，回答別人时总是咆哮。他的命运是在危险中。他下定决心克服一切障碍。这就是他同列宁最后决裂的时候。

前苏联外交家季米特里耶夫斯基——他同斯大林非常友好——讲起过这个在总書記的随从們中間传播的戏剧性的插曲：

“由于克魯普斯卡婭經常打扰他，他就非常討厭她。有一次，克魯普斯卡婭又打电話到乡下来找他要一些情况，斯大林……用最狂暴的話斥責她。克魯普斯卡婭滿面流泪，立即向列宁訴說。列宁的神經已經由于看到种种阴謀而紧张得快要破裂，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克魯普斯卡婭赶忙把列宁的信交給斯大林。……‘但是，你是了解弗拉基米尔·依里奇的，’克魯普斯卡婭胜利地对加米涅夫說，‘如果他不认为有必要在政治上打垮斯大林，他是决不会下决心断絕私人关系的。’”

克魯普斯卡婭的确說过这些話，但决非是“胜利地”說这些話；相反地，这个非常真誠和敏感的妇人对这件事非常不安和担心。說她向列宁“訴說”是不确的，相反地，她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起

了緩冲的作用。但是，在回答列宁不断的詢問时，她向他讲的东西，不可能比書記告訴她的东西更多，而斯大林隱瞞了最重要的事情。三月六日向一个可靠的速記員口授的这封絕交信，或者毋宁說是寥寥数行的便条，冷冷地宣布断絕“同斯大林的一切私人 and 同志关系”。这个便条是列宁留下来的最后一个文件，同时也是他同斯大林的关系的最后总结。接着，列宁最重要的一次中风发作了，失去了說話的能力。

一年后，当列宁已經塗上防腐剂躺在他的陵墓中的时候，造成这次决裂的責任尽管从季米特里耶夫斯基所讲的情况看来很明显，竟然公开推到克魯普斯卡婭的身上。斯大林指責她“陰謀”反对他。臭名昭彰的雅罗斯拉夫斯基（他常常替斯大林办一些曖昧的差使）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一次中央委员会會議上說：“他們墮落到如此地步，竟敢向病中的列宁訴說他們受到斯大林伤害。多么可耻——用私人問題使关于这样重大的問題的政策复杂化！”这里，所謂“他們”指的是克魯普斯卡婭。她由于列宁触怒斯大林而受到报复性的懲罰。至于克魯普斯卡婭，她告訴我說，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对斯大林极不信任。“沃洛佳說：‘他’（克魯普斯卡婭沒有提他的名字，但是她的头朝着斯大林的房間摆了一摆）‘沒有最起碼的正直，沒有最微小的人的正直……。’”

同上，第 487—488 頁。

我大致这样地設想事情的过程。列宁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底要毒药。在三月初，他再次癱瘓。当时的医疗預断是謹慎地不利的。斯大林感到自己更加有把握了，他开始象列宁已經死了一样地行事。但是病人作弄了他。他的强有力的体质，在他的不屈不撓的意志的支持下，再次表現出自己的力量。快到冬天的时候，列宁开始慢慢地好轉，可以比較随意地轉动；听別人讀或自己閱讀；他的說話能力开始恢复。医生的診斷越来越有希望。列宁的恢复，当

然不能阻止官僚反动势力替代革命。克魯普斯卡婭有正确的理由在一九二六年說：“如果沃洛佳还活着，他現在是在監牢里。”

对斯大林本人來說，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发展过程的問題，而是他自己命运的問題：他要末立即就在这一天設法成为党机器的头脑，从而成为党和国家的头脑，要末就要給貶黜到第三流的角色，直到他生命的結束。斯大林不顾一切地追求权力，全部权力。他已經牢牢地抓住了权力。他离目标已經很近了，但是从列宁那里来的危險离他更近。在这个时候，斯大林一定下了决心：必須立即行动。他到处有自己的同謀，他們的命运同他自己的命运是完全連系在一起的。他旁边有药剂师雅戈达。斯大林是把毒药送給列宁、同时暗示医生认为他已沒有希望康复呢，还是采取更直接的手段，那我不知道。但是我坚信，斯大林在自己的命运悬在一根絛上时，不能消极地等待，他只要稍微动一动，事情就定局了。

.....

.....斯大林在他的危險行动中受更具体的考虑的指导。他可能担心，我要把列宁的死同前一年关于毒药的談話連系起来，要問医生有沒有用过毒药，并要求进行特别的尸体檢驗。因此，从一切方面來說，在把遗体上防腐剂，內臟火化，而不再可能由于这种怀疑而进行驗尸之前，使我留在外边，那是比較安全的。<sup>①</sup>

同上，第 495—497 頁。

### (8) 全盘集体化使用粗暴、冒險的方法， 使苏联充滿了毀灭的气息

污蔑反富农的斗争是“踩在劳动者背上”进行的，具有“极其令人震惊的血腥性质”，集体化的方法是“盲目、粗暴和冒险性的”，在全盘集体化的年代里苏联“充滿了

① 托洛茨基当时正在南方疗养，沒有回莫斯科参加列宁的葬礼。——編者注

毁灭的气息”和“国内战争的气氛”。

造成这些牺牲的责任，并不在于集体化，而在于集体化时所用的那一套盲目的、粗暴的和冒险性的方法。官僚机构一点预见性也没有。甚至企图把农民的个人利益同农庄的福利结合起来的集体农庄章程，到悲惨的农村遭到这样无情的破坏以后才公布出来。

.....

……在全盘集体化的年代里，十月革命的领土上从来没有这样直接充满了毁灭的气息。不满、不信任、苦难逐步腐蚀着全国。通货的混乱，稳定的“传统的”自由市场价格的高涨，国家和农民之间从贸易关系过渡到粮食、肉类和牛奶征税，同大规模掠夺集体农庄财产以及大规模隐蔽这种掠夺行为进行的殊死斗争，为了反对富农的破坏行为（在“消灭”富农阶级以后）党所进行的纯粹军事性的动员，以及随之而来的恢复粮食卡片和饥饿口粮，最后还有恢复护照制度——所有这些措施使整个国家重新充满了那种表面上早已结束的国内战争气氛。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7页。

土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纲领应该从根本上排除没收小农的土地和强迫实行集体化的可能性。只要小农认为可能或者有必要，就仍然让他们作那一小块土地的主人。为了恢复社会主义纲领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必须无情地揭发斯大林主义的集体化方法，这种方法不是根据农民或者工人的利益，而是根据官僚的利益决定的。

摘自《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1938年9月3日）纽约1946年版第26—27页。

在苏维埃民主的条件下，即劳动者自己统治的条件下，反对富农的斗争本来不应采取那样震动的、惊扰的和野蛮的方式，本来可

以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导致群众的經濟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但，**官僚反对富农的斗争，是踩在劳动者背上进行的一对一的决斗。**因为角斗的双方沒有一方相信群众，因为它们都怕群众，所以斗争有着极其令人震惊的血腥性质。由于无产阶级的支持，斗争才以官僚的胜利而告終。

摘自《斯大林評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年版下册第529頁。

### (9) 暗害和处死了大批领导人

造謠說，斯大林用阴谋暗害伏龙芝，暗杀基洛夫，毒死高尔基。指責斯大林处死图哈切夫斯基，“消灭了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全部高級指揮人員”。

在真正估計形势的时候，經常对政权的代表人采取的恐怖行为具有很大的意义。其中最臭名昭彰的一件事就是暗杀基洛夫案件。基洛夫是列宁格勒的聪明而比較随便的独裁者，是他那一伙人的典型代表。就恐怖行为本身來說，它推翻波拿巴主义寡头政治的可能性最小。虽然各个官僚都害怕手枪，但是整个官僚阶层却能利用一件恐怖行为来为自己的暴行辯护，而且能够順便把它自己的政敌牽連在暗杀案件中(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案件就是这样)。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10頁。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一連串改变信仰的言論以几何級数增加着，一九三六年八月他們却因此成了阶下囚，罪名是暗杀基洛夫，其实他們同这个罪名的联系当然沒有斯大林本人同这个罪名的联系来得密切。

摘譯自《斯大林伪造学派》美国版序》(1937年  
3月3日)，紐約1937年版第XXXIII頁。

被告席上，坐在雅戈达旁边的是四名克里姆林宮的医生，被控謀杀高尔基和两名苏联內閣部长。……在审讯中，并不是一切都是扯谎。的确有被毒害的人，也有下毒的人。并不是所有下毒的人都在被告席內。下毒的主犯那时正在用电话指揮审讯。

高尔基既不是一个阴谋家，也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一个軟心腸的老人，是那些被損害的人的保卫者，是一个重感情的抗議者。在十月革命初期，他起的就是这种作用。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計劃饥荒时期，不滿和鎮压达到了最大的限度。朝臣們抗議了。就連斯大林的妻子阿利路也娃也抗議了。在这种气氛中，高尔基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他同欧洲的作家通信，外国人訪問他，被損害的人向他訴苦，他决定輿論。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不可能默然忍受当时正在准备的消灭他深交多年的那些老布尔什維克的做法。高尔基公开抗議这些誣裁案，就会立即在全世界眼前摧毁斯大林主义的魔力。

要让他保持沉默是决办不到的。逮捕他，流放他，則更加办不到，更別說枪毙他了。通过雅戈达“不流血地”加速消灭病中的高尔基，这种想法在这个克里姆林头子看来，一定是在当时情况下唯一的出路。斯大林天生这样一付脑筋，只要想到馬上就作出决定。雅戈达接受这个任务后，就叫他“自己的”医生去执行。他根本不冒什么风险。据列文医生自己說，“拒絕，就会毀掉我自己和我的一家。”而且，“你是怎样也逃不过雅戈达的手掌的。雅戈达是一个什么东西也阻擋不了他的人。即使你躲到地下，他也会抓住你。”

但是这些权威的、受人尊敬的克里姆林宮医生为什么不向他們很熟悉的、作为他們的病人的政府及要人們控訴呢？仅仅在列文医生的病人名单上，就有二十四個高級官員，其中包括政治局委員和人民委員會會議成員在內。答案是，列文医生，象克里姆林宮內和周圍的人一样，十分清楚雅戈达是誰的代理人。列文医生屈服

于雅戈达，是因为他没有力量反对斯大林。

摘自《斯大林評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年版下册第493—494頁。

在他任职的几个月中，伏龙芝在保卫紅軍不受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監督問題上，表現出来过多的独立性；这就是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十二年后丧命的那种罪过。……党内流传的謠言說，伏龙芝的死是因为斯大林的需要。

根据現有材料，事情的經過是这样的：伏龙芝患了胃潰瘍；他的私人医生认为，他的心臟受不了哥罗芳麻醉剂；伏龙芝于是坚决反对动手术。斯大林派了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医生——他的心腹特务——召集了一个挑选出来的医生小組，这个小組建議动手术；政治局批准了这一决定；伏龙芝不得不服从，就是說，不得不接受死于麻醉的結局。

同上，第542頁。

清洗是一种严重病症的表現。消除症候很难說就是治好病症。我們有沙皇政府专制政权的先例。这个政府在战争时期以叛国罪逮捕了国防大臣苏霍米尔諾夫。协約国的外交官对薩宗諾夫說，“你們的政府是个强大的政府，竟敢在战争时期逮捕它自己的国防大臣。”事实上，那个强大的政府当时正处在崩潰的边緣。苏联政府不但逮捕了和处死了它的現任国防部长图哈切夫斯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它消灭了陆軍、海軍和空軍的全部高級指揮人員。斯大林宣传机器在圓通的駐莫斯科外国記者的帮助下，有計劃地就苏联的实际情况欺騙了世界輿論。所謂固若磐石的斯大林政府是一个神話。

同上，第545頁。